刘中国　余俊杰　著



劉鑄伯傳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刘铸伯传

刘中国　余俊杰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铸伯传 / 刘中国，余俊杰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360-8188-8

Ⅰ. ①刘… Ⅱ. ①刘… ②余… Ⅲ. ①刘铸伯（1870-1926）—传记 Ⅳ. ①K8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5103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技术编辑：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刘绮琪
书名题字：苏　炜

书　　名	刘铸伯传 LIU ZHU BO ZH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8.75　1插页
字　　数	650,000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序　一

黄树森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质疑：深圳文化到底有没有“老爸”？对它的文化有无，历来啧有烦言。那么，是在奉行一种“弑父文化”，把“老爸”杀掉了？是出生时家境贫穷，被“老爸”遗弃了？还是后辈不争气、不长进，找不到“老爸”了？

刘中国积二十多年极为艰难困苦的劳作，为深圳文化找到了几个“老爸”，且是相当显赫、颜值素质俱佳的“老爸”。

“大鹏所城”，是一个；孙中山三洲田庚子首义，是一个；李朗圣山，是一个；“白石龙大营救”，算是一个。刘铸伯的著作《社会主义平议》（1919年香港出版的），隐藏得很深，这一回，给善于挖掘“文墓”的刘中国捯饬出来了，也算是这些年来，深圳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发现吧。

从茅洲河挖淤泥说起

“文革”期间，平头百姓想购买广九线车票，很难。即便凭“革委会”证明侥幸购到票，一旦被检票员发现没有随身携带“边防证”，他们必须在东莞天堂围火车站下车。天堂围下一站是平湖火车站，已经是“边防区”。平湖以南，则是戒备更加森严的边防重地深圳镇，当时号称“南天门”。

1973年，我走出粤北花坪干校的“牛棚”，专案组都作“鸟兽散”，我还傻傻地在那儿等着“结论”，同室难友启发我：审查你的人都溜回广州了，你个被审查的还待在这干吗？我遂回到广州，也算是自己 “解放”自己，有了出门排队买菜的“自由”。

历史的荒唐翻过一页不久，我又奉命与一大帮“解放”不久的“牛鬼蛇神”结伴，到宝安县茅洲河挖淤泥。这条河发源于羊台山北麓，流经石岩、公明、光明华侨农场、松岗和沙井等地，然后在沙井民主村流入珠江口伶仃洋。当时，与陈残云、周钢鸣、秦牧、秦咢生、李门诸前辈“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他们私下里压低嗓子讲谈香港的高楼

大厦、灯红酒绿以及各种美食。阴天不出工，爬到山顶上远眺香港，远眺伶仃洋。有次周钢鸣讲：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了，1942年春天，自己和茅盾、邹韬奋、杨刚等被组织上营救到了宝安县白石龙，后来撤退到桂林，先是由游击队护送翻越广九铁路，在平湖一个叫木古的村子里住了一宿……周钢鸣说这话时我走了神儿：因为那时我六七岁了，背着一根“猪肠子”一样的袋子（装着金银细软，那时候土匪不绑架小孩子），跟着爸爸妈妈正在湘桂黔铁路线上逃难“躲日本”。逃难是1938年从武昌徐家棚火车站开始的，一直逃到今天隶属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独山县。

“文革”结束后，1979年宝安撤县设市，很多人把“深圳”读成“深川”。其实此地无崇山峻岭、长河大川。“圳”也者，小河沟是也，一条条流进太平洋。但是，这几十年里眼见到那么多人，在小河沟里湿了脚、落了水、翻了船，死鱼一般白花花地陆陆续续漂上来，令人浩叹！他们当初哪一个不是豪气干云，唾沫横飞？被“双规”后或许会念叨起他奶奶昔年教唱的民谣：“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抱猫来，叽里咕噜滚下来。”

深圳市成立后，时任副书记的黄施民老前辈有意调我过去“帮闲”。囿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应允，但一直关注深圳的各项改革与文化建设。特区成立初期杂音不断，我为《特区文学》创刊号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82年7月7日《南方日报》上，不外是为深圳的改革者呐喊助威。后来听说，这篇文章还在深圳市委常委会上被人朗读过。深圳当时历经超极限的心理弹压，急需哪怕片言只语的精神支持和客观评判，由此可见一斑。

“一夜城”拔地而起初期，我常常坐着“灰狗”大巴到特区，看香港电视，领略现代文明，也大包小包地购买嘉顿饼干、玻璃丝袜、太空褛，有许许多多的兴发感怀。近些年与深圳学人梳理深圳城市发展史，亦有诸多拍案而起的惊艳与慨叹，我和于爱成、夏和顺、刘中国联手编撰《深圳九章——开放史记　改革通鉴》（花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后，深圳有关部门为此举办了“深圳经与中国梦：《深圳九章》首发暨学术研讨会”，邀请京、津、沪、穗与港澳专家学者以及省、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与会。大家认为：

——“这是一部关于深圳历史文化、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全景式、权威性的优秀读本。”（王京生）

——“《深圳九章》通过审视深圳历史发展，站在深圳市未来创新发展的思路上，以全球化为背景，以深圳文化为主脉，以当代性和现代化为动因，以求得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文化连接为最终目的，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全方位地解读深圳发展的轨迹和文明状态，对深圳的形象、品格和精神进行阐述和概括，极具深度和广度阐述了深圳文化和文化深圳。”（黄尚立）

——“用‘九章’这种形式也是黄树森的治学精神新的结晶、新的体现。这本书编写的方法确实是一种创造，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阅读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份一种新的形式。它把严谨的学术性和生动活泼的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著作有很强的可读性。用独特的编辑方式，使文本具有极生动的、极丰富的表现形式。”（刘斯奋）

——“《深圳九章》是思想的阐述，具备思想性，但是它又不是全面地进行思想阐述，它又不是做严谨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它并不是完全以思想深刻和学术境界独特为见长，但是它有强烈的思想冲击力，我觉得这就是‘九章’最根本的特征，它是以思想来抒发情感的，它是伟大时代的思想抒情。它把思想要素转化为一种抒情的要素，我们就在阅读中获得一种淋漓尽致的快感和兴奋，让我们心潮澎湃，精神振奋，领略到这种思想和历史的震撼力、冲击力。”（贺绍俊）

……

鉴于《深圳九章——开放史记　改革通鉴》篇幅有限，许多重要的文献史料，以及深层次的专题研究、卖力气的史传书写，只有俟于来日、俟于来者了，这其中就包括刘中国与青年记者余俊杰最近完成的《刘铸伯传》《刘铸伯文集》。近些年，我提出深圳打造联合国“文学之城”的建议，为书写者圆梦，期望特区内外、体制内外的写作者，“贻我彤管”，而非戈矛、绞索、板斧以及祖传十八代照样削铁如泥的杀猪刀。

“红荔山庄”与“无政府共产主义”实验基地

深圳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兴奋点”，无不被刘中国近二十年间出版的一系列著述一一捕捉、具体呈现：为了洪武二十七年开筑的大鹏千户所（在大鹏半岛），他写出了史论专著《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几年后深圳有了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孙中山策划的三洲田庚子首义（今属盐田区），他完成了《打响世纪第一枪》；为了纪念巴色会来深圳传教160年，他推出了五卷本的“李朗圣山丛书”；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他与青年记者余俊杰等联手推出了多卷本的“白石龙大营救书系”（前五卷已经出版）。此外，刘中国还在深圳市档案馆的支持下整理出版了12卷本的深圳档案文献演绎，这套书上迄明清两朝，下至改革开放初期。早在2000年，深圳市领导为他担纲完成的《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作序，认为该书“系统全面地描摹了明清时期深港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驱动力，从而为深圳的昨天与今天架起了一座横亘不断的桥梁，为深港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交融提供了崭新的坐标，这对于日益加强的深港合作，对于深港地区携手共创辉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史实依据”。

2015年底，我应邀出席“白石龙大营救书系”座谈会，深圳市史志办主任黄玲女士和深圳市博物馆原馆长杨耀林先生等，对刘中国的治学精神与他出版的一系列著述予以高度评价；我则认为“白石龙大营救书系”的出版，是深圳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800名中国文化精英云集一地，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大事件”！更何况被营救的文化精英，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人又重新步入深圳。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这些被刘中国表述为“被抢救的圣火”，陆陆续续熄灭，“文革”期间更是全军覆没，灰飞烟灭。坐了25年牢的胡风当年在白石龙扔烟头差点烧了游击队的草寮，《胡风回忆录》还记录他在白石龙一毫子买了两只生蚝的细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2100人被牵连，92人被捕，62人隔离审查，成为中国文化一大污染的水源，造成其后千奇百怪的众多水源，聂

绀弩有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这一回，两位作者在《刘铸伯传》的"引子"与第六章里，轻描淡写地点出"红荔山庄"这个地名。这就让我啧啧称奇！"红荔山庄"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宗师刘师复1912年发起创建的一处"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据文定《师复先生传》记载："先生又以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到乡村居住，半耕半读，曾在新安的赤湾觅得一地，从香港航行约两小时可到，面临零丁洋，右傍宋帝陵，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这就是"红荔山庄"的由来。对于刘师复等人提倡的"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刘铸伯在《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一一予以驳斥。事实上，刘师复约集同志在"红荔山庄"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地的一番努力，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

刘师复创建的"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红荔山庄"早被人淡忘，刘铸伯、谭汝俭抨击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社会主义平议》绝版将近百年。但是，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来都有意想不到的巧合与吊诡，譬如，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偏偏是从密邻"红荔山庄"的蛇口响起的。而在1981年11月20日，刘铸伯长孙刘镇国（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总裁）、曾孙刘定中（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总经理）旗下的飞翔船，从九龙大角嘴码头首航蛇口。从此，停航三十多年的香港——蛇口航线得以恢复。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意想不到的"巧合"与"吊诡"，还在继续发生：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红荔山庄"，今属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辖。刘中国告诉我，去年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与龙岗区政府签署"深化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其中包括：将龙岗区平湖金融与现代服务业基地、平湖西部工业园区，打造为"前海后陆（平湖）拓展区"。这么一来，就像他说的，如今刘铸伯故里平湖，又与"红荔山庄"旧址所在地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搭上了一层关系。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一书中写道："现在怀着未来的胚胎，压着过去的负担。"钱钟书先生《读〈拉奥孔〉》一文引述这个经典名句时发挥道："抽象地说，时间的每一片刻无不背上负重而腹中怀孕。在具体人生经验里，各个片刻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负担或轻或重，或则求卸却而不能，或则欲放下而不忍，胚胎有的尚未成熟，有的即可产生，有的恰如期望，有的大出意料。""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来说，'内心的时间意识'的每一刻都是'留存'过去和'延伸'未来的辩证状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师复"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红荔山庄"，不仅与北伐前夜的蒋介石发生了关系，并且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对外开放的"窗口"重叠在一起，而今刘铸伯故里又成了"前海后陆（平湖）拓展区"，这就不免令人拍案叫绝。深圳文史学者、企业家不妨仔细考证筹划一番，早日恢复"红荔山庄"旧貌，这比再捯饬几个"人造景点"更具有人文意义。

一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人类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不计其数，即便那些当日挖空心思构建宏大思想体系的

大师巨擘，到后来也无不为时间“结构”，留下残简断篇、片语只言，这就像铜雀台坍塌后瓦当还可以磨成砚台。刘铸伯也是一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迄今出版的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专著，我们找不到他的名字。但是，刘中国、余俊杰在撰写《刘铸伯传》之余，整理的这部《刘铸伯文集》得以出版，使得刘铸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从此无法撼动。

我很佩服两位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挖掘原始文献的劲头儿，最感兴趣的是，刘铸伯的《社会主义平议》失传将近百年，这次也给他们捯饬出来，仔细整理编入《刘铸伯文集》。无论对于研究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的学者来说，这部著作都不失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

刘铸伯的《社会主义平议》得以重见天日，这也是深圳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

在《刘铸伯传》一书中，两位作者对刘铸伯的《社会主义平议》进行了详细解读，其中写道：

>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圣经》中有处记载耶稣曾提到恺撒，耶稣说出这条原则，是要回答犹太人应否缴纳“人头税”给罗马政府这个问题。“恺撒”一词，指的是政府或国家。既然刘铸伯、谭汝俭所著《社会主义平议》一书，在考察欧洲无政府主义起源时，上溯到“希腊古代之哲学家，如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已倡‘共产’之说，而基督教亦含有此种意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20世纪初的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同样包孕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科学社会主义里，也一样孕育着无政府主义的萌蘖（可以“文革”为例）？或者正如钱钟书先生《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所言：“即使在满纸荒唐言的神怪故事里，真实事物感也是很需要的成分；‘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 toads in them），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相反相成，才添趣味。绝对唯心论也得假设客体的‘非我’，使主体的‘我’遭遇抗拒（Anstoss）而激发创造力，也得承认客观‘必然性’，使主动性‘自由’具有意义和价值。这是同样的道理。”

这段文字看似几句“闲笔”，实则是一番快当之论。括号里的“可以‘文革’为例”六个字，传导了一个绵远的信息——刘铸伯批判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时已经指出：“彼见为社会之不良，经济之不均，无日不挟其偏陂之学说，以相为鼓煽，势必为子者归而革其父，为弟者归而革其兄，为妇者归而革其夫，为卑幼者归而革其尊长，为学生者归而革其校长，为庸役者归而革其厂主，为火伴者归而革其肆主，以力求其社会之良与经济之均，顾吾恐社会未良，经济未均，而斯民已无噍类矣。”为此，提出了消弭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种种办法。

《圣经》有言：“先知在自己家乡从来不受欢迎。”而且，先知的声音从来都是低

微的，时常被时代暴风雨的喧嚣声遮蔽、压倒。经历过“反右”“文革”“清污”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我辈，直到耄耋之年才读到《社会主义平议》这部“奇书”，十分痛切地感到：刘铸伯描绘的“为子者归而革其父，为弟者归而革其兄，为妇者归而革其夫，为卑幼者归而革其尊长，为学生者归而革其校长，为庸役者归而革其厂主，为火伴者归而革其肆主”状况，何尝不是对“文革”时期社会乱象的一种预言？刘铸伯预言了“十年动乱”这一乱象，开出了几剂“药方”，却无法予以阻止。这不是预言家的过错。我们经历了罄竹难书的“十年浩劫”，却没有对中国历史上创痛巨深的“文化浩劫”进行彻底的反思，“文革”一结束就“团结一致向前看”。领导人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尽管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是近些年为“文革”招魂者还大有人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香港“南风窗”与宝安“后花园”

我作序的《容闳传》（刘中国、黄晓东合著）出版于2003年，新书首发式与研讨会召开当天，珠海市宣布将容闳博士昔年捐建的“甄贤社学”辟为“容闳纪念馆”“中国留学生博物馆”。到会者中西嘉宾（包括容闳后人、留美幼童后裔）500余人，我与中山大学黄天骥、易新农、叶春生教授以及刘中国的同窗好友辛磊、陈美华夫妇等欣然与会。

《容闳传》出版后反响极大。次年，珠海召开了“留美幼童后裔座谈会”，珠海市与美国的哈特福特市结为“姊妹城市”，耶鲁大学竖起了容闳的雕塑。有次开会，刘中国奉呈深圳老领导李灏学长一册《容闳传》。不久，李灏约谈，说是读后思考了许多问题，既然容闳的出现与珠海毗邻澳门不无关系，那么深圳毗邻香港，是否也出现过容闳那样有影响的本土人物？

刘中国当天晚上给我电话，很是激动。三五年后，他出版了《深圳：李朗存真书院》《深圳：布吉凌家》《凌道扬传》《没有勋章的凯旋——外科医生凌宏琛传》等史传作品，算是交上一份“答卷”吧！人们这时才恍然大悟：1857年巴色会传入深圳后，曾经在布吉的李朗建立一所大学，该校毕业生的后人凌道扬后来发起创建香港中文大学，他的堂兄弟凌宪扬则是上海沪江大学末任校长，等等。

李朗存真书院（又称“李朗神科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之重镇。《深圳：李朗存真书院》出版不久，书院遗址就被推平了，建了一所传染病医院。这是一件颇可玩味的事情。

刘铸伯之所以成为刘铸伯，同样受“南风窗”香港的影响。1916年12月31日，刘铸伯主持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开幕典礼，省港大佬数百人参加盛典，其中就有广东省省长朱庆澜。两位作者找到了百年前旧报纸上刊登的《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

该文录有朱庆澜的演讲词："我国民族最富有进取心，亦最富有爱国心。世人诋之以守旧，目之以散沙，此未免一孔之见，盖在专制时代，内地人民一切行动，皆当受政治之支配，故耳目有所锢蔽，能力亦无由发展，惟交通处所与外人相接近者，则类能吸取世界文明以发扬其特性……"

快哉斯言朱省长！这位行伍出身的民初要人，砍砍杀杀接地气，而且快人快语，几句就说透了中华民族"守旧论""散沙论"祸根之所在，认为形成这种"病灶"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试想想：明代钦令"片板不许入海"，沿海地区"闹倭寇"，一直闹到朱明王朝崩了盘；清初下达"迁海令"，沿海地区"山贼海寇"啸聚揭竿者枚不胜举；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封锁深港边界，逃港者铤而走险、络绎不绝；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终于出现了"万邦来朝"从事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朱庆澜当日指出："惟交通处所与外人相接近者，则类能吸取世界文明以发扬其特性，于团体则务为结合，相与谋公共之治安，与国家则务为协助以为之后盾，不特其所营之各工商事业，足与世界相颉颃已也，盖于世界竞争之理，人类生存之故，知之较真，故行之尤力。"刘铸伯实乃19世纪末、20世纪初冲破锢蔽、觅求新知的深圳本土代表人物之一。诚如朱庆澜所言："刘君铸伯，经商于香港数十年，洞悉中外情形，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为当时开风气，为人类造幸福，生平于振兴商业外，如兴学校、设医院、救灾济贫等事，罔不惨淡经营，踊跃从事，其进取之勇敢，固令人惊叹，而爱国之热忱，尤人所难及……"

去年7月，孙女子萱归国过暑假，给我放了一曲无名歌手演唱的《闯码头》："我们一起闯码头/马上和你要分手/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止不住的眼泪流……"今天重听一遍，感到"码头"二字，衍生出一系列纷繁的意象。以本书披露的刘铸伯及其中央书院同窗、中西生意伙伴的经历来看，无一不在"闯码头"。闯下了"码头"，也就是有了自己的地盘、事业，但你不可能占地为王，拒绝别人来"闯码头"。于是，20世纪初期，香港"劳动家"与"资本家"发生了一次次冲突，最突出的两例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海员大罢工的领袖是宝安南头人陈炳根，省港大罢工领袖人物之一的陈郁，同样是宝安南头人。而在海员大罢工期间，刘铸伯、周寿臣等曾以宝安同乡的名义出面"调停"。与刘铸伯一样，他的晚辈同乡陈炳根、陈郁也是在香港这个"大码头"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

"耳目有所锢蔽"时代的信息发散地，也许就是一口井壁上长满青苔的老井，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所谓"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者是也。更多的信息传播源则在学堂、市井、车站与码头。刘铸伯等在香港"大码头"上接受西洋教育，他和何东、周寿臣、何泽生（何福）等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在文化取向方面偏于"守旧"，香港礼贤会王爱棠牧师、杨少泉医生以及麦梅生等基督教人士则偏重于"革新"，双方1921年至1922年就香港婢女制度废存问题展开大讨论，极力主张废除婢制的王爱棠牧师甚至公开撰文抨击刘铸伯"在上则傀儡国家之议员，在下则傀儡侨港之黎庶（小民）"。此事一直闹到英国众议院，最后由国务大臣丘吉尔出面才摆平。

这里拈出书中如上数例，想借此说明：互联网时代在尊重并相信自身文化实力的基础上，要包容和借鉴外来文化先进的部分。毕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角戏”早已收场，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几句话，倒是颇值玩咂。

至今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陶铸提出“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后花园”（原话是：“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要充分利用好香港建设宝安县。1961年深圳戏院建成，成为全国第一家有空调、音响等先进设备的戏院。全国著名的京剧、越剧、豫剧团都来过深圳戏院演出，包括谢贤（谢霆锋之父）在内的许多港澳同胞前来观看。李富林后来写回忆录时透露，当时周恩来对宝安、深圳非常重视，曾经说：“深圳是国家的窗口”，使他们受到很大鼓舞。但在 “文革”期间，陶铸、赵紫阳等广东领导人为此被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现如今“卖国贼”与“爱国贼”们又在网络上大开“口水战”，去年竟有人厉声吆喝：“别让李嘉诚跑了！”

“站好队”与“站错边”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不久，林雨纯到广州找我说：“《深圳特区报》拟试刊，想请个名家题写报名，张洪斌的意思是最好请秦咢生先生题写，你给想想办法吧。”我陪他到文德路75号广东作家协会对面马路一条小巷找到秦咢生家，秦先生听罢，欣然命笔，接连写了几幅，都不甚满意，有幅字还写错了，揉成一团扔在地上。《深圳特区报》“报头”的润笔费，是林雨纯带去的一小盒进口巧克力。

尔等小事，本不值一提。但是现如今讲谈“历史真相”的，就像太监谈性生活如何美好般样，又像有学者调侃的如横店里杀的鬼子都是戏剧性的。果不其然，这段所谓“难忘的记忆”“峥嵘的往事”，后来被人敷衍成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筹备试刊时，刚好遇上广东省著名书法家秦咢生来深圳，市领导就请他为特区报题报头。”相比之下，老友曾锦棠的回忆文字更接近事实，他说：“我和张洪斌还就《深圳特区报》的报头请谁书写的问题，商量过几次。几经考虑，最后决定请广东的著名书法家秦咢生先生书写。他写了爨宝子体及行书这两种字体，每种字体都各书写了两份，《深圳特区报》试刊第一期是采用爨宝子体，但有部分读者反映，这种字体有许多人看不习惯。于是，从《深圳特区报》试刊第二期开始，报头便改为秦老书写的行书，一直沿用至今。”曾锦棠当时是市委新闻秘书，时任新华社内参记者的张洪斌也是我的老朋友，林雨纯当时则是特区报财贸组记者，如今都“失联”好多年了，正庄周所谓“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重提陈年旧事，还有感于人们回忆往事时思维的混乱与记忆的缺失。其实，推动中央做出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是“逃港潮”，是亿万百姓饿扁的肚皮。民声乃天声，最高决策者顺应了民声，历史的车轮这才从泥潭里拔出来，开上坦途。明明是饥饿岁月无情

凌迟，哪里像“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唱得那样轻飘飘、甜腻腻？我们要回归“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常识。再比如，不少人根据平湖父老“刘铸伯是东莞何氏遗腹子”的口头传说，敷衍出一篇篇“励志体”好文章，本书两位作者则根据《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与香港历史档案馆的文献史料，订正了这一讹误。史传文字的写作，需要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容不得丝毫的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这是常识，也是底线。

综观这两部著作，有许多令人大开眼界之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平议》的发现与整理出版，奠定了刘铸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但是，两位作者丝毫没有回避，刘铸伯作为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在大力推销拳头产品“戒烟精粉”（李鸿章、刘坤一、沈葆桢等封疆大吏纷纷应邀题匾褒扬，甚或捐养廉银购买该药品馈赠瘾君子）的同时，他还与何东、何福（澳门赌王何鸿燊的祖父）、何甘棠、梁仁甫、吴理卿、陈启明等买办出身的慈善家从事过鸦片专卖。他们都是中央书院的早期毕业生，后来均成为香港的特许鸦片经营商，而且“在鸦片经营方面拥有丰富知识”。这就深刻揭示了“买办”人格的二重性：一方面他们博涉西籍、闳中肆外，成为中西方文化交往的津梁式人物；另一方面作为买办商人，他们在生意场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合法化。“买办”身上的这种双重人格，滋生出一种“原罪感”与自我救赎的努力，他们在囤积起了大量金钱的同时，一无例外地热衷于公益事业，抚恤孤寡，赈济贫民与灾民，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有了“慈善家”的头衔。这种“人格二重性”在中国现代文化人身上也有突出表现，甚至是精彩的“表演”。他们在“反胡风”“反右”时期，不是有过精彩“表演”吗？最后，“文革”爆发，一网打尽。此处按下不表。

刘铸伯作为20世纪初叶的香港华人领袖人物，时常被卷入故国与“番邦”、香港与内地、新潮与传统、“劳动家”与“资本家”冲突的夹缝之中。他敢于以议员身份叫板香港政府，要求取消香港华人“检疫”苛例；敢于约集华商公局同人，宴请下野后莅临香港的孙中山；他在讨论婢制废存大会上说：“自有定例局以来，华人议员，因政府立例，而在公众之地开大叙会者，此实为创举也，盖在三十年前，中国人对于公众事业，尚少注意，今则与前不同，盖今日程度已大增进，良堪贺喜矣。但自此次以后，如英国行何种则例，我两华人议员不力争，诸君尚敢骂我溺职否？”他主动出面调停包括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内的一系列劳资纠纷，等等，所有这些都存在一个“站好队”“站错边”的问题。这在书中均有详略不一的解读，容我不再一一评点。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近二十余年来，我对区域文化研究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主编出版了“中国九章”书系，深感任何一个区域都具有各自特色鲜明的人文传统，蕴藏着深厚的人文资源，始终拥有大致清晰的人文疆界。通过《深圳九章——开放史记 改革通鉴》的编撰，我们试图从区域的角度，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现象，不仅把各个区域人文系统当作整体的

产物来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探索其内在结构、各种对象及其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空间轮廓，系统内部的“运动曲线”和外部联系，区域文化系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扬弃、利用、改造的人文资源和社会条件，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护利用、发展创新人文资源所应该采取的措施，力图描绘出一幅面向现代化、面向全球化、面向未来的深圳人文地图。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盛赞欧洲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封疆大吏与知识分子发起“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应对列强的侵凌。所谓“自强”“变法”运动，何尝不是发“民族复兴”之先声？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渡时代”里，刘铸伯得以脱颖而出，“为当时开风气，为人类造幸福”，成为一位清末民初卓越人物、一个被时贤称道的“伟大的爱国者”。20世纪末，老是听人议论深圳是“文化沙漠”，没有大师巨擘。事实证明，深圳有自己丰腴的“文化水土”，从来不是一块莫名其妙的所谓“文化飞地”，并且近代以来也涌现出了包括刘铸伯在内的大批杰出人物，问题是如何保护本土文化资源，擦亮本土历史人物品牌。

就平湖一地而论，不妨借助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建设与这两本著作的出版，进一步梳理文脉，盘活文化资源，拓展区域文化系统内部“运动”和外部“运动”的双曲线，在保护好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修葺青奇坑刘铸伯家族墓地、享堂的同时，创建“刘铸伯纪念馆”。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拍摄历史纪录片、电影、电视连续剧，全方位、多角度向世人展示平湖乡贤刘铸伯的形象，增强平湖区域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创造人文关怀的福祉。

本书作者说，1996年有个去平湖工作的机会，因为交通不便而放弃了。他那次在凤凰山青奇坑捡了块陶片。我的同窗密友、中山大学金钦俊教授，今春在自己的这位弟子家小住，修订文集《记忆树上的杂花》，审阅《刘铸伯传》《刘铸伯文集》这两部书稿，见到了这块放在书架上的粗陶片，建议设计封面时放在两书的封底。我看也好。一本传记的撰写，一部文集的编订，何尝不是将散落各地的碎陶片，复原为圆润如初的陶器？这番“复原”工作大不易，刘中国前后下了多年工夫，也得到了他的师友、文友的支持，尤其是昔年“龙城文学社”发起人何小培、黄惠波、赖房千、魏琦、温波、陈少鹏诸君的支持。我与刘斯奋、陈俊年、章以武、韦丘等是“龙城文学社”顾问，“龙城文学社”后来变成了“文联”，我很欣慰地看到，“文学社”创社成员迄今仍然笔耕不辍，互相砥砺，“愿是月光下的歌者，不愿做殿堂里的诗人”，常葆初心，脚踏实地，拒绝合唱，时有作品问世。这是很可贵的。

这两部书稿很厚实，我读得十分沉重，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还是回到当年“茅洲河挖淤泥”这个话题吧！四十年来，深圳创作者一铲铲挖出河底的淤泥，一锤锤捣碎骇人的暗礁，让一条条河流肆意地流淌，让江河湖海上漂满南来北往的帆影，这是颇值得令人欣慰的。

《道德经》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西洋人也讲过"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这样的话。姑且录此数句，与本书作者以及久违的"龙城文学社"诸君共勉！

是为序。

2016年2月初稿
2016年4月定稿

作者简介

黄树森，文学评论家。1935年出生于武汉，195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联第六、第七届代表，历任《作品》编辑组长、编委，《现代人报》副总编辑，中国第一家文学评论月刊《当代文坛报》副主编、主编、编审。出版专著和编著有《题材纵横谈》《手记·叩问——经济文化时代猜想之子丑寅卯》《春天纪》《广东九章》《上海九章》《广西九章》《深圳九章》等，主编"叩问岭南"丛书五种、"流行蛊"丛书六种、"地道广东"六种；近年有《黄说》《说黄》等著作问世。现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序　二

黄惠波

“城市细节”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经络、血脉和细胞。一座充满“细节”的城市予人以自信、力量与想象的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个古老的民族开始走上复兴之路。但也毋庸讳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歌猛进、摧枯拉朽，“万丈高楼平地起”，城市的“细节”正从千篇一律的建筑群里逐渐退隐乃至消亡，城市记忆也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就深圳这座城市而言，既不缺乏自己鲜活的“城市细节”、绵长的“城市记忆”，也不缺乏自己的“高大上”人物。但是，人们更多瞩目的是它在改革开放数十年间演绎的宏大叙事，罕有人知的是，深圳平湖乡贤刘铸伯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叱咤香江，对香港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1978年11月，他的长孙刘镇国（时任油麻地小轮公司总裁）、曾孙刘定中（时任油麻地小轮公司总经理）在吹响改革开放集结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已经开通了香港——广州之间中断近三十年的直通船，堪称改革开放前夕飞进内地的第一只春燕。

任何一个地方的乡邦先贤、文化遗产，都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记忆与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彰显着历史文化根脉之所在、魂魄之所系。有感于“城市细节”的缺失、“城市记忆”的模糊，我们邀请深圳文史学者刘中国先生、深圳报业集团记者余俊杰先生完成了《刘铸伯传》，编撰了《刘铸伯文集》，向世人全方位展现刘铸伯这么一位学贯中西、视野开阔、民胞物与的本土人物，为深圳的“城市细节”增添经典故事，为“城市记忆”奏响华彩乐章，为深圳的“城市文脉”疏通经络。

曾经在香港中央书院求学的孙中山先生被人誉为“香港的珍珠”，他的学长、平湖乡贤刘铸伯亦然。我曾经在《维多利亚港》一诗中写道：“一滴水/如一颗泪/苦涩　辛酸/如一朝露/甘甜　清爽/千万滴水/汇聚成沧桑维港/坦荡　辉煌/这就是百年香江。”刘铸伯生长于香港，少年时就读于大华民义学、西营盘冯富义学，1885年毕业于香港大书院

（今皇仁书院），历任香港天文台译员、台湾淡水西学堂总教习兼洋务委员、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在清末西学东渐时代大背景之下，他勇于接受西学，珍爱传统文化，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时代一位桥梁式的人物，于兴革损益，多所主张，中西人士咸倚重之。

20世纪初叶，刘铸伯跻身香港华人领袖人物之列，先后出任东华医院总理、主席，华商公局及香港华商总会（今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广华医院倡建总理，香港政府定例局（立法局）议员、洁净局（市政局）议员、保良局局员等要职，为香港华人谋利益，关爱鳏寡妇幼弱势群体，团结华商与西商展开商战；他担任洁净局议员期间，“凡局例之不便者，必据理辩争；争之不获则奋髯抵几，未尝少屈，务得当乃已，故华侨之阴受其赐者，赜不胜举”。担任定例局议员八年间，“为华侨谋者，益复奋厉，遇事靡所阿附，崭然以风骨自见，一如其在清净局时”“在局同人，皆仰之如泰山北斗”。

刘铸伯12岁丧父，家无隔夜之粮，全靠寡母节衣缩食供其读书，才有了后来的成就。面对世纪之交，列强环视，国力式微，香港与内地失学儿童众多的现状，刘铸伯多次感叹：“今海禁大开，梯山航海，华洋杂处，中外通商，非尽吾民皆读中国之书以养其体，兼涉西国之学以广其用，何以人人能明道理、增见识、通语言、善交接，内以图一身之事业，外以彰一国之文明哉？”“处此生活程度日高之时代，以智识不开之贫民，夫将何以自立”？为此，他于1901年与犹太富商嘉道理爵士发起创建育才书社，担任司理一职，募集善款办学，得到了两广总督陶模等官绅的大力支持，陆续在香港、广州、上海创办了三所育才学校，免费招收贫家子弟就学，培养出了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中国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和活动家吴耀宗在内的大批人才。1908年，刘铸伯有感于“外人诋吾华为无教国”，发起创建孔圣会并任会长，孔圣会的宗旨包括“振兴孔圣之德行道艺，以期正人心，立风化；建立庙堂，以纪念孔圣之功德；倡设讲堂学校，俾得广传圣道及振兴教育”等，陆续在香港、广州、香山县（今中山市）、新安县（今深圳市）创办了30余所孔圣会义学，施惠学子。其中一所，就设在今天的平湖纪劬劳学校旧址。

故国故家，念念可亲。刘铸伯具有一腔浓厚的家国情怀，十分关心家乡平湖，诸如创设平湖火车站，规划建设平湖新圩，创建纪劬劳学校与念妇贤医院，创设工厂解决乡亲就业问题，等等，可谓众口皆碑，平湖父老感念至今，正如刘富宗（刘德谱）等《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所言：“平湖者，先人之庐墓在焉。先考既为国人谋，尤笃爱其乡。广九铁路方建设时，先考请于省吏，将原定路轨改近平湖，并于其地设车站，乡人称便，而路亦不纡。乡农贫苦，时以子妇质钱，而困于重息，子女多没为奴婢，先考悯之，乃创设昌裕公司，储赀出贷，取息甚微，农人贤称颂不置。吾国无市政，先考乃请于省吏，小试于其乡，创市场，设学校，立工厂，建医院，附以农林实业，规模粗具，于时人所称模范村者，庶几近之，其施于乡有如此者。”

刘铸伯施医兴学、救助孤寡、赈济香港与内地灾民的义举，得到清朝政府、民国政府、英国政府的褒扬。1909年地处直隶的永定河泛滥成灾，殃及京津地区，史称“顺直水灾”，刘铸伯发动香港华商赈捐出力，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奏保以道员候选加

盐运司衔（三品），赏换花翎。鼎革之后，以有功民国，奖给刘铸伯四等嘉禾章，寻晋给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以襄募内国公债，大总统传令嘉奖，奖给刘铸伯“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匾额；以襄办香港事务迭著劳绩，英廷传谕嘉奖，并奖给刘铸伯二等宝星。

1916年12月31日，刘铸伯捐建的平湖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举行开幕典礼，前来参加典礼的中西嘉宾，均为民国初年省港两地卓有声望的人物。据1917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记载：“省中政界大员，港中中西巨子，到会者济济有众。上午十点半钟，朱（庆澜）省长乘花车而至，同时有政务厅长罗树森、督军代表胡清瑞、教育科长吴在民，及统领魏邦屏、袁带等百余人。本港则有新界理民府罗士，大绅何东及夫人，及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同人等共有二百余人之多。……各政界人员，均有演讲，尤以朱省长为娓娓动听。”朱庆澜在演讲中说：“刘君铸伯，经商于香港数十年，洞悉中外情形，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为当时开风气，为人类造幸福，生平于振兴商业外，如兴学校、设医院、救灾济贫等事，罔不惨淡经营，踊跃从事，其进取之勇敢，固令人惊叹，而爱国之热忱，尤人所难及。”这是时贤对他的评价。

此外，刘铸伯为创建香港大学募捐70万元，担任香港大学校董会(Cour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董事、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委员职务；多次以香港华商领袖身份领衔募集资金，赈济内地灾荒；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吾国参焉，先考（刘铸伯）援国民外交之义，协大有银号，赠联军以飞机一乘，己则赠以红十字摩托车一辆，而中英邦交益加亲睦，论者咸以为识大体云”（《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参与调停解决包括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内的劳资纠纷，等等。所有这些，两位作者在广泛收集占有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在这部洋洋60余万言的传记中均有翔实、准确而又客观的解读与描述，令人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从清末民国浩如烟海的报纸杂志里，仔细梳理查找刘铸伯的演讲、访谈、文告、信札，以及刘铸伯失传近百年的著述《自治须知》（1907年出版）、《社会主义平议》（1919年出版）等，编辑了一册厚重的《刘铸伯文集》。

刘铸伯的著作《社会主义平议》（与谭汝俭合著）是较早出现的一部抨击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述。谭汝俭在序言中交代了该书写作缘起：“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入广州，余私心尝隐痛之。越丁巳（1917），避地香江，间涉译本，知各种主义，流布渐广，浸淫不已，终酿祸变，颇思着论辩之，顾卒卒未暇也。越己未（1919），应刘君铸伯之招，任《华商总会报》编辑撰述之役。……刘君幼通英文，博涉西籍，时刺取西国学者之说，相与往复讨论，于彼党谬义，多所辩正。余退而笔之于书，以付剞劂……”

谭汝俭所谓“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入广州”，指的是1912年5月，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性人物刘师复（1884—1915）在广州组织“晦鸣学社”(晦鸣学舍)，该社“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其宗旨有八项：“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

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晦鸣学舍印刷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品。刘师复还于1914年7月在上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发表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他还在《无政府浅说》一文中宣称：“无政府则剷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刘师复出版印行过十几种无政府主义小册子，系统阐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了“师复主义”，奠定了其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觉”和导师地位。

刘铸伯、谭汝俭出版《社会主义平议》之际，科学社会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他们在书中批驳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当时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刘师复等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当时以“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大同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名目出现）。该书1919年8月出版于香港，直到1920年5月，陈独秀才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同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才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同程度受到无政府主义理论影响，这已经是不争的史实，但他们很快就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这正如释家经典《金刚经》讲的：“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所谓佛法如筏，既已渡人到彼岸，法便无用，不可再执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并且，中共党组织成立不久，就与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就此写道：“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曾占着优势。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强权，也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私有财产制度，鼓吹绝对平均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强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并使国家走向消亡。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只能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战斗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这次论战的结果是，风靡一时的无政府主义从此偃旗息鼓。

显然，《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批驳的“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与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共产主义思潮没有丝毫关系。但是，无论对于研究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的学者来说，这本191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平议》，都不失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岭南文坛泰斗黄树森先生把刘铸伯定位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认为“刘铸伯的《社会主义平议》得以重见天日，这也是深圳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黄老的这一论断，可谓客观而又允当。

我上学时读到一首“大跃进”时期的“伪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

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首“民歌”宣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文化虚无主义。这种“文化虚无主义”论调，前些年在深圳也很流行，其主要表现，就是轻视、漠视甚或否定深圳本土历史文化，殊不知深圳的文化水土，也滋养了中国近代林业科学之父凌道扬、中国首位法学女博士郑毓秀等杰出人物。郁达夫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平湖出了刘铸伯这么一位学贯中西、视野宏大、爱国爱乡的杰出人物，一百多年来，他一直受到平湖父老乡亲的景仰与爱戴。人们谈及百年旧事，从不直呼其名，而说“铸伯公当年如何如何”，言辞间充满敬畏之情。

凤凰山下，黄花风铃绽放的季节，仔细披阅这两部厚重的书稿，我感到平湖“守真园”“守珍街”“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以及平湖火车站等人所熟知的历史符号，忽然间变得陌生而又弥足亲切，就连平湖父老耳熟能详的刘铸伯本人，也变成了别林斯基所说的那种“熟悉的陌生人”。这种“陌生感”“新奇感”“亲切感”“认同感”“自豪感”“敬畏感”，源于两位作者对平湖先贤刘铸伯多年的深入研究、新鲜发现与大量“证伪”。刘君曾在高校执教鞭多年，来深圳后继续坐“冷板凳”，兀兀穷年，孜孜矻矻。每次分享这位老友的“新发现”，我都艳羡不已。我在《读书偶感》中写道：“我希望在我垂垂暮矣/还能手捧一本心爱的书籍/我甚至衷心感谢世上的人们/幸亏他们匆匆的脚步都在追名逐利/才让我可以安心地读完一本本典籍……”刘君说颇有同感。

……

弹指之间，平湖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开幕典礼过去了一百年。在战乱年代、动荡岁月，刘铸伯创建的学校、医院及其家族墓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正所谓“故家不可复，故国已成丘”。改革开放数十年间，深圳一直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前沿裂变地带，刘铸伯的故里平湖自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深知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把乡邦先贤、文献文物视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它承载悠久的文明，传承历史记忆，维系族群精神，延续城市文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怎样让乡邦先贤从似是而非的传说中“站起来”，让乡邦先贤的言行泽被后世、惠及远人，怎样深翻细作“道德沃土”，让“文化息壤”用之不竭，助推社会和谐发展进步，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未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略可告慰平湖乡贤刘铸伯在天之灵的是：

——他昔年创建的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旧址，2001年6月被深圳有关部门列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

——他昔年规划创设、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平湖火车站，在停运8年之后，于2014年底正式启动改造工程。目前整体改造工程完工在即，预计今年下半年可重开客运列车，启用后将开行广深和谐号动车组，可抵达罗湖、樟木头、常平、东莞、广州东和广州等火

车站。

——他与长子刘德谱等20世纪初期投资开发的平湖凤凰山矿山，2012年7月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首批国家级矿山公园。深圳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已经正式向市民开放。

——位于平湖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青奇坑的刘铸伯夫妇墓，及其祖母墓、母亲墓以及享堂等，亦在修葺恢复之中，即将成为深圳的一处人文景点。

《刘铸伯传》《刘铸伯文集》的出版，无疑使得人们对位于“深莞惠”城市圈交界处的平湖增多一份了解，增多一份信心，增多一份敬畏。我想，所谓“敬畏”，就是在这个充满“秩序”的世界上，面对鳏寡孤老，面对病苦无助的穷人，面对失学流浪儿童，面对街头流浪歌手，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上班族”，面对一栋挂满蛛网的老屋，面对一处废弃百年的“享堂”，我们时而因为心有余、力不足而深感“羞愧”。当然，还有更多的“羞愧”：面对沐猴而冠者，面对咄咄逼人者，面对一餐豪掷千金者，面对惹是生非者，面对大言欺世者，“我为耻于为伍/而感到惭愧”。我想，所谓“信心”，就是听从良知的声音，脚步贴紧脚下的泥土，勉力而为，勉力而行。谢天谢地，“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子下的活人之一”（泰戈尔语），而且，我还遥想，百年后刘铸伯故里平湖，黄花风铃木，枝柯参天，岁岁芳菲，为参谒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平湖古村落，以及游览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的乡亲、市民与游客，蔚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工作，弹指间也30多年了。1993年龙岗新区成立不久，本书作者之一的刘中国君调来宣传文化口工作，我们与赖房千、魏琦、温波、陈少鹏等文学爱好者，在文坛老前辈黄树森、章以武、陈俊年先生指导下成立了“龙城文学社”，大家工作之余不废读书写作，个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次由刘君担纲完成的这两部大部头著作即将出版，在此谨表祝贺，并希望他在此基础上推出更多的专题研究。

岭南文坛泰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黄树森先生，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金钦俊先生仔细审阅书稿，中国大陆旅美著名作家、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主任苏炜教授，提供该校馆藏文献并为两本著作题写了书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耄耋之年的黄树森先生在长篇序言中高度肯定平湖先贤刘铸伯在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的地位，并对平湖文化事业发展愿景提出诸多可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谨表诚挚的谢忱。

乡邦先贤令城市灵动丰美，文脉弘盛让城市厚重。吾辈当务，守护本原，守护真容，珍重弘扬。

是为序。

2016年5月
黄花风玲木绽放的季节

作者简介

黄惠波，1983年大学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时任深圳市平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现任深圳市龙岗区副区长。笔名黄汇波、黄浪中、黄坪、黄花风铃等，1998年出版散文随笔集《山情海恋》，近年先后出版《禾火集》《知秋集》《三秋集》等三部诗集，并在《中国作家》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作品。组诗《胡杨·秋问》获得第五届郭沫若诗歌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认为，黄惠波的诗歌饱含激情，丰富的基层经验使其诗歌有血有肉，充满真情实感。

目录

引子

1916年12月31日，刘铸伯搀扶着77岁高龄的寡母伍氏，与自己的儿孙一道，乘坐广九路列车专程回到故里宝安县平湖，参加平湖纪劬劳学校（全称宝安县平湖纪劬劳国民学校）、念妇贤医院开幕典礼。

那一天，刘铸伯规划建设的平湖火车站人山人海，他发起捐建的平湖新墟冠盖如云，热闹空前，“省中政界大员，港中中西巨子，到会者济济有众”。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发表演讲说：“刘君铸伯，经商于香港数十年，洞悉中外情形，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为当时开风气，为人类造幸福，生平于振兴商业外，如兴学校、设医院、救灾济贫等事，罔不惨淡经营，踊跃从事，其进取之勇敢，固令人惊叹，而爱国之热忱，尤人所难及。”

《香港华字日报》1917年1月3日刊登的《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

民国时期的平湖，位于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交界处。农历丙辰己亥初七（阳历1916年12月31日），刘铸伯搀扶着77岁高龄的母亲伍氏，与自己的儿孙一道，乘坐广九路列车专程回到故里平湖，参加平湖纪劬劳学校（全称宝安县平湖纪劬劳国民学校）、念妇贤医院举行开幕典礼。

那一天，刘铸伯规划建设的宝安县平湖火车站人山人海，他发起捐建的平湖新墟（今属深圳市平湖街道办事处）冠盖如云，热闹空前。据1917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一文记载："省中政界大员，港中中西巨子，到会者济济有众。上午十点半钟，朱省长乘花车而至，同时有政务厅长罗树森、督军代表胡清瑞、教育科长吴在民，及统领魏邦屏、袁带等百余人。本港则有新界理民府罗士，大绅何东及夫人，及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同人等共有二百余人之多。至两点半钟，由刘铸伯君举行开幕礼毕。至四点钟，省政界方趁专车返省，港商则于五点半钟返港，惟刘君铸伯于初八（一号）下午五点方返港。"

远道前来参加这场开幕礼的中西嘉宾，均为民国初年省港两地要人：那位乘花车而至的朱省长，就是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至今镌有广东省长公署布告碑；督军陆荣廷未能参加开幕礼，广东省督军署布告碑依然镌刻在学校、医院的墙壁上，代表陆荣廷参加典礼的胡清瑞则是曾任广东都督的民国要人胡汉民之胞兄；统领魏邦屏1916年参加讨伐龙济光之役，任护国军第五军总司令兼广东省警察厅厅长，孙中山任大总统时委任其为广州卫戍司令；袁带曾任第一集团军总部咨议，抗战时期先后任第四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少将军衔）、第七战区挺队第三纵队司令，驻防中山、顺德，1941年2月率部击毁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的座机，大角岑生成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阵亡官阶最高的海军将领；教育科长吴在民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侨务家，终其一生从事教育行政工作，1917年任广西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时期出任私立广东国民大学校长、广东省参议会议长。

香港方面前来参加开幕礼的嘉宾，"中西巨子，济济有众"，可惜记者惜墨如金，只开列了新界理民府罗士、大绅何东的名字。理民府（District Office）是英国接收香港新界租借地后最早设立的新界管治中心，罗士大约是新界理民府的长官。至于大绅何东爵士，籍贯广东宝安（欧亚混血儿，跟随母系），是著名买办、企业家、慈善家，我们在本书其他章节还会提及，此处按下不表。

刘铸伯当时担任华商总会主席，他也担任过东华医院总理、主席，所以《纪事》特别提到，参加开幕礼的"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同人等共有二百余人之多"。但是，《纪事》一文似乎遗漏了育才书社、孔圣会这两家清末民初香港大名鼎鼎的文化教育机构。

此前，我们一直在猜想：既然刘铸伯与嘉道理创建的育才书社，1901年开始在香港、广州、上海创办了三所育才学校；既然他1908年发起成立的香港孔圣会，陆续在广州、香山（今中山市）、香港创办了几十所"孔圣会义学"，他自然会念及故乡子弟求学之艰难，在故里设立义学，栽培桃李，开启民智。那么，平湖纪劬劳学校的前身，究竟是一所由孔圣会出资创办的"义学"，还是一所由育才书社出资创办的"育



刘铸伯（1867—1922）

才学校”？

民国4年（1915）乙卯孟夏，维新印刷馆承印的刘彭龄《雕龙诗集怀古》书前水帘山人子谦氏“题词”有则小注说：“（刘彭龄）先生历充平湖孔圣会学校校长。”但这只是一条孤证，如今朱庆澜的演讲词佐证了平湖孔圣会学校的存在——“刘君（刘铸伯）就前办之孔教会义学，扩充为学校，名之曰纪劬劳者”，也就是说纪劬劳学校，是刘铸伯在原有的孔圣会义学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我们猜想，香港孔圣会副会长李葆葵、育才书社总主席嘉道理，以及刘铸伯的密友、热心慈善教育事业的宝安县留美幼童周寿臣爵士等香港名流，或许当日也应邀参加了开幕礼，只是记者未能一一载诸笔端罢了。

《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说，开幕典礼上，“各政界人员，均有演讲，尤以朱省长为娓娓动听”。下面是朱庆澜的演讲词：

我国民族最富有进取心，亦最富有爱国心。世人诋之以守旧，目之以散沙，此未免一孔之见，盖在专制时代，内地人民一切行动，皆当受政治之支配，故耳目有所锢蔽，能力亦无由发展，惟交通处所与外人相接近者，则类能吸取世界文明以发扬其特性，于团体则务为结合，相与谋公共之治安，与国家则务为协助以为之后盾，不特其所营之各工商事业，足与世界相颉颃已也，盖于世界竞争之理，人类生存之故，知之较真，故行之尤力……

夫我国近日之趋势，于文明之事业，非但赖政府之振兴，尤贵有国民之赞助，鄙人自莅粤以来，凡地方学务及其他公益，无不□□□□□，多得如刘君铸伯者相助为理，鄙人之幸，抑亦地方之幸。刘君就前办之孔教会义学，扩充为学校，名之曰纪劬劳者，刘君少孤，赖祖母及母氏减衣节食，供其读书，念己身有所成就，由于养育者之劬劳，又虑世之有子弟者，或恐因贫而废学，是即‘与子言孝，与父言慈’之义也。又竟其亡室未逮之志，创为念妇贤医院，合中西医法，以行其施赠之实惠；盖刘君之夫人素好施舍，刘君即原其心以成其志，博施济众，本于推爱妻之心以爱物，可谓善推其所为者矣。

世谓“有家族观念者，不必有国家之思想”，想如刘君此举，于慈母贤妇之德，既永矢不忘，于利人济物之功，且交相为用。人特患不爱国耳，岂以家族之故，遂足为国家之障碍物哉？今当纪劬劳学校及念妇贤医院开幕礼，鄙人以刘君热心社会事业，深嘉其见义勇为，欲举是为当世之爱国者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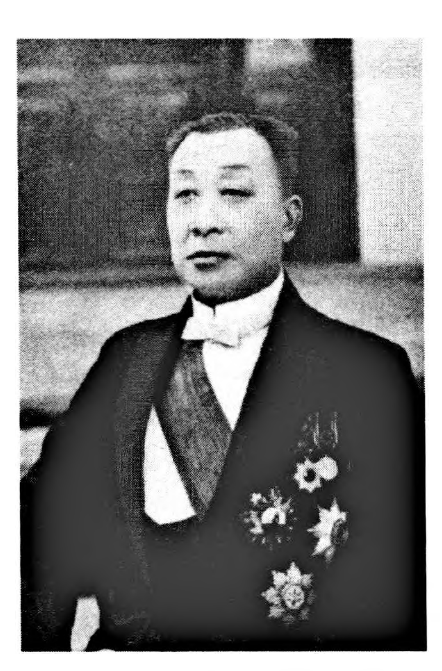
《香港华字日报》1917年1月3日刊登的《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

《纪事》说，朱庆澜演讲之后，“其余有进颂词者，有演说者”。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该文作者说：限于篇幅，未能一一细录。这样一来，刘铸伯在开幕式上的演讲，还有华商总会、东华医院、育才书社、孔圣会等团体与平湖乡耆老宣读的颂词，以及其他中西政要的演讲，也就随风而去，杳无踪影。但是，感谢上苍，《纪事》及时报道了时贤对刘铸伯的评价，譬如朱庆澜说：

> 刘君铸伯，经商于香港数十年，洞悉中外情形，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为当时开风气，为人类造幸福，生平于振兴商业外，如兴学校、设医院、救灾济贫等事，罔不惨淡经营，踊跃从事，其进取之勇敢，固令人惊叹，而爱国之热忱，尤人所难及。

我们今天读来，深感朱庆澜对刘铸伯的这番评价确属快当之论，并非溢美之词。

弹指间百年过去，当日出席开幕式的数百位“省中政界大员、港中中西巨子”，朱庆澜、何东二位，我们偶尔会在书册上和他们匆匆打个照面，更多的人则沉入忘川。



朱庆澜（1874—1941）

民国初年，战乱频仍，盗贼蜂起，地方不靖，

惠东宝一带匪患尤为猖獗。有鉴于此，刘铸伯在学校、医院竣工前夕，曾经分别致函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德馨等，禀请政府出示布告，予以保护。刘铸伯致广东督军陆荣廷信函原文如下：

> 窃以敝乡平湖村居僻壤，风气固塞，学务不兴，地复瘠贫，人多失学，处此生活程度日高之时代，以智识不开之贫民，夫将何以自立？仆情关故里，言念之下，用是矜怜，爰解私囊，倡办小学堂一所，名曰“纪劬劳学校”，一则藉以教育贫民，俾资自立；一则念家慈扶养育之劳，底仆于成，乃有今日，爰命是名，以留纪念，永志不谖。
>
> 复以敝乡村人贫苦，若遇疾病，苦无良医为之调理，并妇人生产亦无练习接生，以致夭折甚多，残乖天道，故复独自捐资，建设医院一所，名曰“念妇贤医院”：一则拯乡人之疾苦，一则念故室内助之贤，亦以示不忘之意。
>
> 刻下小学堂及医院两处，举工构筑以来数月，于兹工程均将告竣，开幕在即，用特肃函，敬请钧座给予宪示，俾资保护而兴观感，异时学风丕振，寿域宏开，无一非凭福曜所赐也。

而在当日（1916年12月31日）举行的开幕典礼上，督军代表胡清瑞宣读陆荣廷于中华民国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916年11月17日）签署的广东督军署布告第二十六号文告，朱庆澜宣读于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16年12月24日）发布的广东省长公署布告第七十三号文告，父母官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德馨宣读自己于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16年12月29日）发布的两份实贴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的布告。

开幕典礼结束后，当天下午四点钟，广东省政界人士乘专车返省，香港中西巨子则于五点半钟返港，这还要拜赐广九铁路交通之便，省港两地中外嘉宾来去方便。而平湖火车站之设，刘铸伯更是居功厥伟，据其子刘富宗（刘德谱）、刘荣宗（刘昆谱）、刘耀宗、刘光宗撰述《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平湖者，先人之庐墓在焉。先考既为国人谋，尤笃爱其乡。广九铁路方建设时，先考请于省吏，将原之路轨改近平湖，并于其地设车站，乡人称便，而路亦不纡。”

礼送罢前来参加开幕典礼的省港嘉宾，刘铸伯与母亲、子孙在平湖住了一宿，于1917年元旦（农历腊月初八）下午五点趁火车返回香港。逗留期间，他嘱咐平湖父老找来匠人，把广东督军、省长以及宝安县知事带来的布告，一一刻石镌碑，以示政府永久保护之意。但是事实证明，他祈望政府出示几份布告，就能够“保护”学校、医院无虞的想法，实在未免失之天真。

在191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平议》这部著作里，刘铸伯抨击过民国初年流入广州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潮，批评过以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为代表的俄国“过激派”，以及匈牙利“虚无党”的暴烈行径，指出“今者俄国过激派，又以此种学说，流播吾国，二三

暴烈魁硕，思藉是以为争政权之利器，遂提倡而鼓煽之”。为此，刘铸伯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救济办法，期望以此消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蔓延。但是，令刘铸伯始料不及的是，他去世不到三年（1925年），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首度沦为军营。

……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一度在莫斯科发布《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一切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这就让当时中国的许多青年欢欣鼓舞。然而，在苏联自身危机解决之后，国人才发现这只是一纸“宣言”而已，北极熊的贪婪本性并未改变。与此同时，苏俄正急于在中国编织一张“革命挂毯”，从1920年起陆续向中国派出秘密使节，进行实地考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中共“一大”代表里就有刘铸伯、嘉道理创建的广州育才书社早期毕业生陈公博。此后，孙中山逐渐接受了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同意国共合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为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在苏联的帮助和共产党人参与下，1924年 6月黄埔军校在广州创办。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广东开始成为当时大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革命挂毯”初现雏形。

孙中山挥师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以后，广东革命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时北方发动“首都革命”，冯玉祥电请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偕夫人宋庆龄乘舰离粤赴京。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认为反扑时机已经到来，遂自任“救粤军总司令”，于1925年1月7日发布大举进犯广州的命令。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1925年1月15日，广州大本营决定东征，并发布《东征宣言》。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州大本营发出总动员令，并做出东征陈炯明的部署。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了“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的文告。此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军校学生军（一般称为黄埔校军）和粤军。粤军由许崇智任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在粤军二师任参谋长的叶剑英，于1月16日奉命从香洲返回广州，全力投入东征作战。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其著述《包惠僧回忆录》中记载：“东征军是以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和两个教导团及粤军张民达一师，莫雄、陈济棠、陈铭枢各一旅组成的。革命武装的核心是黄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苏联高级军事顾问加伦将军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书影

埔军校校本部。蒋介石、加伦、周恩来等的紧密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2月2日，黄埔军校教导团由黄埔出发，水陆并进于3日抵达虎门。5日，军校本部行营亦进驻东莞县城。2月6日，东莞商界举行欢迎革命军大会。蒋介石、周恩来等率军校部分队伍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讲。

2月10日，蒋介石、周恩来等率领的东征军，沿广九线开进平湖火车站，与顽军展开激战；而在东征军里，就有苏联高级军事顾问鲍罗廷（1949年被斯大林逮捕流放）、加伦将军（1938年被斯大林清洗）及其率领的20位苏联军官。

作为东征右翼军先头部队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沿路展开攻势。此前已经做了部署：黄埔校军由平湖、龙岗突击淡水南面；粤军自淡水城西北、东北面进击。苏联顾问罗加乔夫目睹革命将士作战英勇，高兴地对张民达、叶剑英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革命军队这样了不起，当年与白匪军作战的苏联红军也不过如此。

苏联军事顾问之一的亚·伊·切列潘诺夫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中写道：“2月8日，许崇智将军和总顾问加伦在上塘站的列车上召集了会议，几乎全部政府成员和鲍罗廷都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准确的作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南路军应于2月中占领淡水城，其中，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和第十六独立团，应于2月10日前提前肃清铁路全线的敌军，准备从平湖地区向淡水进攻……2月10日，我团的先头部队在平湖火车站和敌人接火。刚开始射击时，我就建议何应钦将军登上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小高地，以便更好地判定方向。但他突然感觉不适：脸发青，翻着白眼，腿也站不住了。三个勤务兵（两

个架着胳膊，第三个从后面扶着）好不容易把他拖到高地上来找我。他像傀儡一样，重复我的建议，下达了把团队展开成战斗队列的命令，而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他在做什么。一会儿，何应钦的脸色如常了，他逐渐恢复了知觉，便自觉地听从我的建议了。本团展开以后立即发起猛攻，把一支三四百人的敌军部队赶出了平湖火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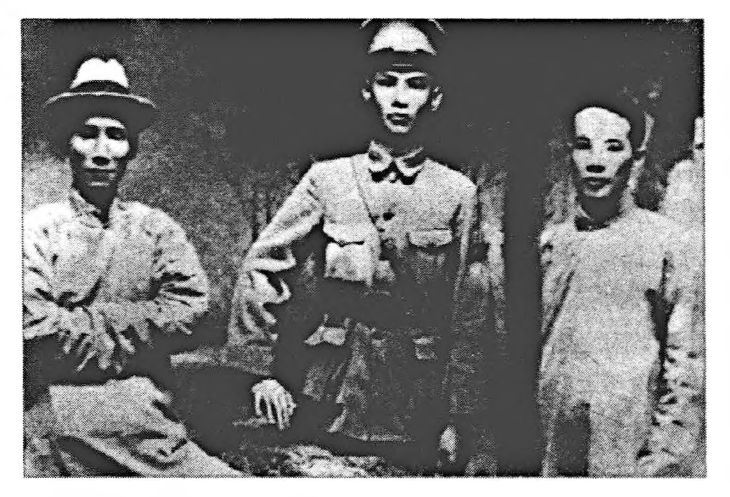
东征军肃清东莞、平湖之敌，势如破竹。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与东莞绅商、平湖耆老谈话时说：本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增加人民幸福而来，愿与大家戮力同心，共促革命成功。现希望于诸君者约有三事：一、县长由人民公选；二、为我军宣传解释；三、实行民治，各界均组织坚固之团体。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谈话时也说：兴利除弊，乃政治部之责任，力所能及，本校必为诸君尽力兴利除弊。本军征讨陈炯明之目的，是因陈炯明害国害民，阻碍革命军为人民谋利益，希望各界援助，使革命成功，则人民之痛苦可除。本军望从民意。诸位有何意见，可与政治部接洽。时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的何应钦，按理也应该发表了讲话，可惜没有文字记载。

切列潘诺夫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写道：“沿途举行了两次当地百姓参加的群众大会。百姓对我们部队起先是不信任的，现在他们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这段话指的是，黄埔军校随军宣传队展开广泛宣传活动，在平湖乡镇散发了《告人民同胞》《告东江人民》《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告农民传单》《三民主义浅说》等提前印刷好的大量宣传品，声称“我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军队来了！我们的记号是颈系红巾，军装齐整，衣领是翻领。我们是保护人民的，决不和陈军一样抽捐收税，也不和其他军队一样骚扰人民，我们出兵东江，为的是消灭陈炯明，为的是消灭残害你们的奸贼”，指出“陈炯明谄媚北军，勾结土匪，扰乱东江，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如果陈贼不除，东江战争永不能息。我们是打反叛，除奸贼，光明正大的军队，我们是保人民，安地方，公正和平的军队”。东征军还向民众广泛宣传部队实行不拉夫、不扰民、按价购物等政策，深受平湖父老的拥护与支持。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东征军开进平湖之前，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早已关门大吉，因为盘踞平湖的数百叛军，把邻近火车站的这两所学校、医院变成了军营与马厩。肃清平湖之敌当天晚上（2月10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及其指挥的教导团，在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留宿一夜；次日沿广九路挺进深圳。亚·伊·切列潘诺夫写道：“铁甲列车载着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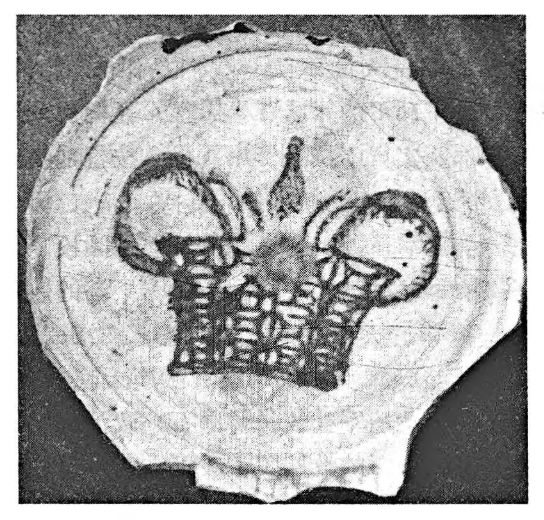

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中）

黄埔军校一百五十名学员组成的陆战队，于2月11日傍晚开进了边境的深圳车站。……装甲列车开到后，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登陆队走出车厢，在迎风招展的国民党旗下，在车站上整齐列队。营党代表（共产党员）向聚集拢来的百姓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大家齐声高呼口号：'革命的中国万岁！'"

关于蒋介石、周恩来率领东征军精锐部队教导团攻占平湖一事，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时任教导团第二团第四连第一排副排长的抗日名将宋希濂，在《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中亦有记载："2月10日，教导第一团由常平墟向天堂围前进，击退平湖之敌。次日，学生总队及炮兵营随校本部行营移至平湖。是日正午，学生总队的步兵队进入深圳，敌望风而逃。13日，校军进入龙岗，14日拂晓进迫淡水城……"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纪勅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历经百风雨，依然牢固地屹立在那里，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砌在学校、医院围墙上的几通石碑，虽因年深日久，碑文字迹漫漶，不易辨认，但还大致可诵可读。民国大总统的题匾还在，另一方题匾则在"文革"期间给人铲掉，用水泥糊上了。

1996年初夏到平湖访友，参观纪勅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拜读碑文，忽然想起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羊公碑之所以令孟浩然发此浩叹，是因为晋人羊祜镇守荆襄时，颇有政绩，暇余常登岘山，他曾对同游者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者胜士，登此望远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伤悲。"


1996年初夏，本书作者在平湖凤凰山清奇坑捡了一块陶片

那次平湖访友，还专程去了一趟刘铸伯的"牛眠地"凤凰山清奇坑，路上捡了块陶片；白花花的大日头下，捧着陶片，

一时间梦花缤纷。我把这块陶片带回家，放在书架上，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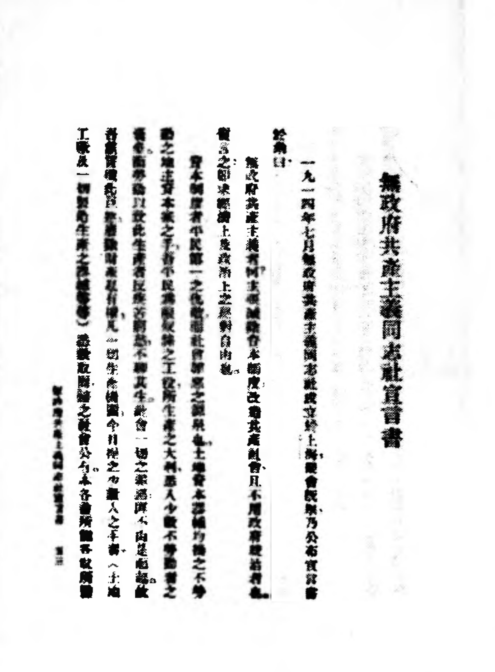
刘铸伯生长香港，幼习“旁行文”（英语），毕业于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学贯中西，对于西洋“政治、法律，覃精研思”，担任香港政府清净局（卫生局前身）、定例局（立法局前身）议员期间，“为华侨谋者，益复奋厉，遇事靡所阿附，崭然以风骨自见”“遇事剖析，毫芒曲折毕赴”。

刘铸伯的演讲、访谈、文告、信札等散见于当日的报刊；此外，他生前还出版了三部著作。据刘富宗等所撰《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刘铸伯）治事之暇，亦间事著述。以中西异礼，交涉恒衍，召侮取讥，衅隙斯伏，乃著《自治须知》一卷、《西礼须知》一卷、《社会主义平议》一卷……皆已刊行于世。”《西礼须知》一书出版年代久远，遍觅不获，我们只找到了《自治须知》《社会主义平议》这两种绝版近百年的图书。

需要说明的是，刘铸伯与清末民初名记者谭汝俭合著的《社会主义平议》出版于1919年，是较早出现的一部抨击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谭汝俭在序言中交代了该书写作缘起：“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入广州，余私心尝隐痛之。越丁巳（1917年），避地香江，间涉译本，知各种主义，流布渐广，浸淫不已，终酿祸变，颇思着论辩之，顾卒卒未暇也。越己未（1919年），应刘君铸伯之招，任《华商总会报》编辑撰述之役。……刘君幼通英文，博涉西籍，时刺取西国学者之说，相与往复讨论，于彼党谬义，多所辩正。余退而笔之于书，以付剞劂，载诸报纸者日凡千言，盖不复辨其为刘君语、为余语也……”

所谓“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入广州”，指的是1912年5月，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性人物刘师复与林君复、郑佩刚在广州组织“晦鸣学社”，该社“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其宗旨有八项：“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晦鸣学舍印刷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品。

刘师复《无政府浅说》一文宣称：“无政府则剷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1914 年7月，刘师复在上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发表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光明美善之主义，出汝等于地狱，使人正当愉快之社会者也”，“政府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蟊贼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权利，有个人自治之本能，无需乎强权之统治者也。故政府必废，将来之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无复一切以人治人之强权，是之谓‘无政府’。行无政府于共产社会，是之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年6月，刘师复致书于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状况，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组织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联络；（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作于同年4月11日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一文说：“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


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宣言書

一九一四年七月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成立於上海，發會既竣，乃公布宣言書於衆曰：

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何？主張滅除資本制度，改造共產社會，且不用政府統治者也。質言之，即求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絕對自由也。

資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敵，而社會罪惡之源泉也。土地資本器械均操之不勞動之地主資本家之手，令平民為奴隸之工役，所生產之大利，悉入少數不勞動者之囊橐，而勞動以致此生產者反疾苦顛連，不聊其生。社會一切之罪惡，[illegible]。吾黨[illegible]財產私有權，凡一切生產機關今日操之少數人之手者（土地、工廠及一切製造生產之器械等）悉數取回，歸之社會公有，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宣言書 三

刘师复1914年发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

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曰：‘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

刘师复出版印行过十几种无政府主义小册子，系统阐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了风靡一时的“师复主义”，奠定了其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觉”和导师地位。

刘铸伯、谭汝俭出版《社会主义平议》之际，科学社会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他们在书中批驳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当时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刘师复等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当时以“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大同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名目出现，他们宣称“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该书1919年8月出版于香港，直到1920年5月，陈独秀才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同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才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而且，中共党组织成立不久，就与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道：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曾占着优势。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强权，也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私有财产制度，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无政府主义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看起来又似乎十分激烈和彻底的主张，很适合那些不满社会现实的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些对旧社会不满、理论准备不足、正处在探索过程中的青年人也接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师复等人就在中国鼓吹无政府主义。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流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书籍多达七十余种，在广东的影响更大。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专播，他们便越来越多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黄凌霜等人写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揭露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小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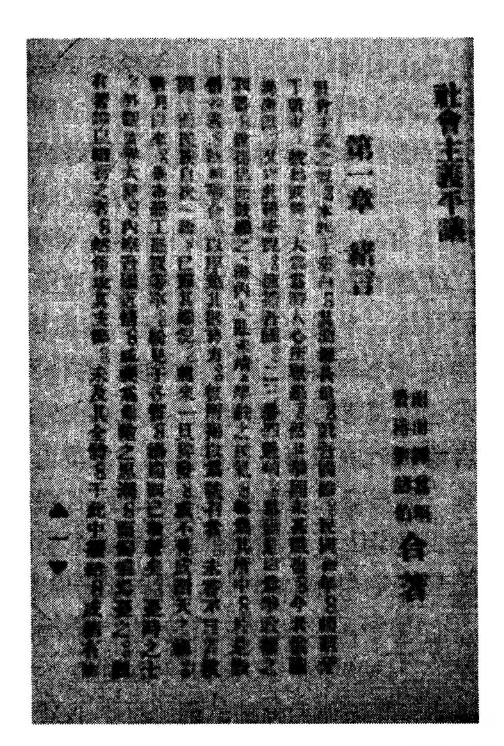
阶级思想派别的本质，便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强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并使国家走向消亡。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只能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战斗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显然，《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批驳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与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共产主义思潮没有丝毫关系。

刘师复等提倡的无政府主义，时常以“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大同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纷繁名目出现。或许是为了行文方便，刘铸伯、谭汝俭在书中统称为“社会主义”，他们说：“社会主义一名词，本起于中古，其初为经济学上用语，上古之谈共产主义、平等主义者，未尝有是名词也。厥后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者，悉以‘社会主义’名之。洎兹学者，家标一说，人发一义，其学说乃愈推而愈广。”对于清末民初“家标一说，人发一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刘铸伯、谭汝俭进行了一番归纳整理：

> 综而述之，约可以分为六大纲，其关于国家者，曰“均贫富”，曰“平阶级”，曰“废兵役”，曰“免死刑”；其关于家庭者，曰“解除夫妻名义”，曰“解除父子名义”。惟主张“均贫富”，故盛倡共产主义；惟主张“平阶级”，故盛倡无政府主义；惟主张“废兵役”，故盛倡大同主义；惟主张“免死刑”，故盛倡无法律主义。兹四者，事务虽万不可行，而立说尚依于人道，故趋新者犹多附之。


社會主義平議

第一章 緒言

合著

刘铸伯、谭荔垣（汝俭）合著《社会主义平议》第一章《绪言》（1919年出版）

刘铸伯认为，无政府主义学说不过东鳞西爪，散见于各译本之中，“然吾观于彼党之所主张，要义虽分为六大纲，而其主持最力，而

又能深入乎社会人人之心者，则莫如均贫富之一义，而无政府之一义次之。观于近日报载，自称《东方代治机关之宣言》，其纲领为共有财产，共同劳力，则其所注意者可知，其余各节，则虽同出一党，而各派之主张多不尽同，即同出一派，而亦视社会人心之顺逆向背，随时而变易其说者也。当国者苟畏此风潮之震撼，则所为消弭而防止之者，亦可知所从事矣。”

刘铸伯等在批驳无政府主义的同时，提出了改良社会的路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也说：“这以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有一些讲社会主义的人讲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空谈和现实生活有多少关联。有一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只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有现实意义，他们以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胡绳这段话只是笼统带过，并未指明具体人物。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刘铸伯、谭汝俭堪称呼吁“采用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表性人物。比如他们认为，为救济贫民计，最好将矿山、铁路、工厂等大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备价买入）。比如他们提出，要实行实业救济、征收租税、消弭罢工、施行劳动家保险制度，改造出一个没有贪污腐败的“好政府”，等等。

总而言之，无论对于研究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的学者来说，这本191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平议》，都不失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

事实已经证明，刘师复等民国初年宣扬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直接跳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阶段，而实行按需分配，属于彻头彻尾的“乌托邦”。为了实现这一理想，1912 年 4月，刘师复和丁湘田、郑彼岸曾经在杭州讨论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红荔山庄”，据文定《师复先生传》记载：“先生又以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到乡村居住，半耕半读，曾在新安的赤湾觅得一地，从香港航行约两小时可到，面临零丁洋，右傍宋帝陵，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

1912年新安的赤湾，就是现在的深圳市赤湾港（位于深圳经济特区西部的南头半岛顶端）。1912年，新安县定为二级县，由省府直辖，首任民政长知事何恩明。1913年1月，因新安县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而更名，复称宝安县。刘师复准备共约志同道合者到“红荔山庄”居住，拟在这里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建立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地的构想，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1919年，刘铸伯批驳过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刘铸伯长子刘德谱曾经收到毛泽东主席签名的照片、叶剑英元帅的信函（见本书第九章第四节）……“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1978年11月17日，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刘铸伯长孙刘镇国任小轮公司总裁、曾孙刘定中任总经理）开通港穗飞翔船，中断近30年的海上客运得以恢复。同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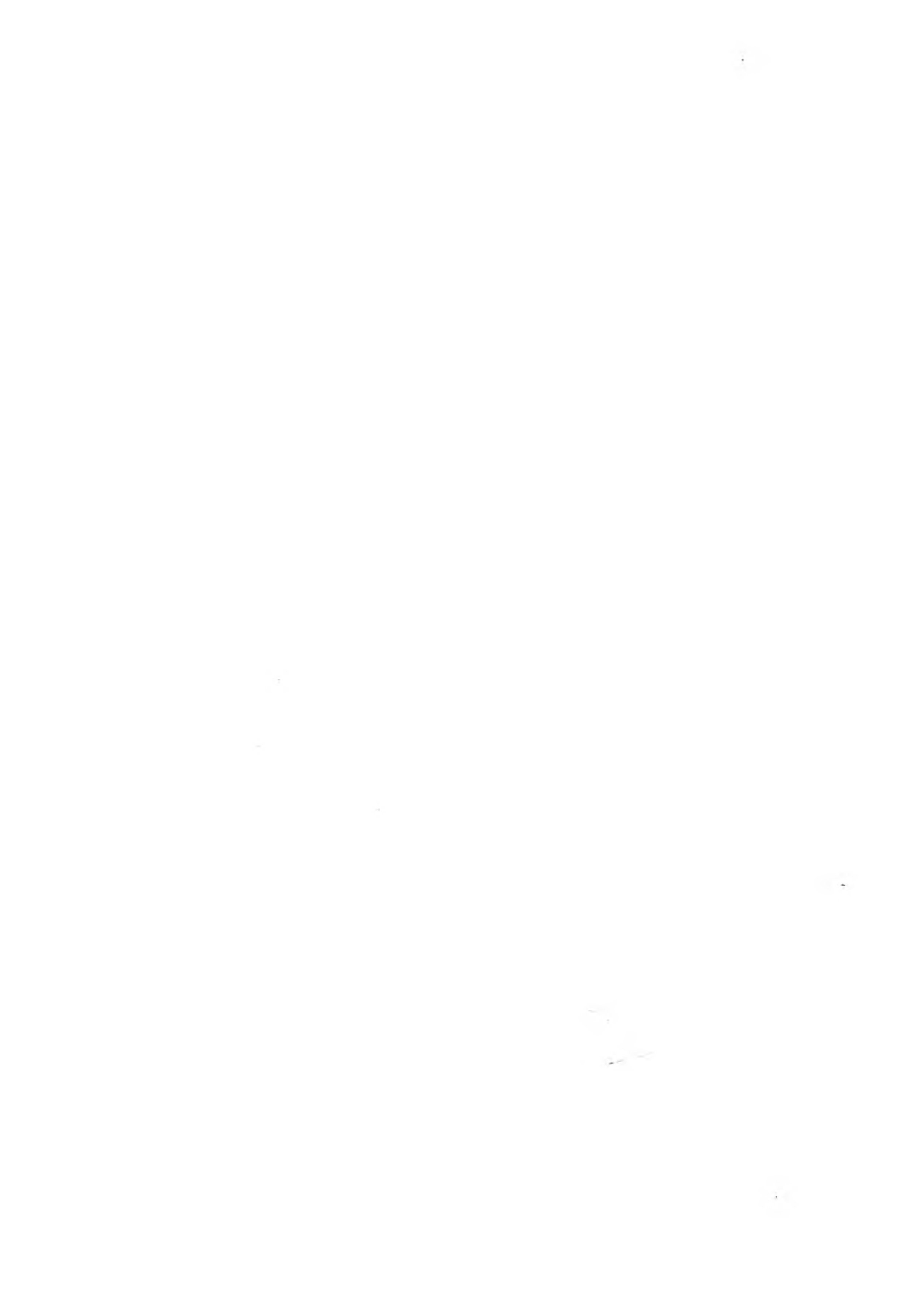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党和国家做出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前夕，刘镇国、刘定中父子堪称飞进内地的第一只春燕。

1979年初，凭借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的契机，招商局的一批创业者来到与赤湾“红荔山庄”相邻的蛇口，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蛇口”曾作为我国经济特区的“试管”，开启了中国的“希望之窗”。而在1981年11月20日，刘镇国、刘定中父子的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一艘60个客位的飞翔船，从九龙大角嘴码头首航蛇口，9时30分出发，10时15分抵达蛇口港，途中仅航行45分钟。从此，停航三十多年的香港——蛇口航线得以恢复。

历史的发展过程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巧合与吊诡。“师复主义”早已沦人忘川，“红荔山庄”已经无处可觅，刘铸伯、谭汝俭《社会主义平议》雪藏百年，但是每次在蛇口坐船，看那波涛起伏的大海，看那上下翻飞的鸥鸟，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100多年前，无政府主义的一代宗师刘师复，曾经在赤湾宋少帝陵附近觅得一处地方，“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幻想着在这里创建“红荔山庄”，作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既然刘铸伯、谭汝俭在考察欧洲社会主义起源时，上溯到“希腊古代之哲学家，如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已倡‘共产’之说，而基督教亦含有此种意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20世纪初期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同样包孕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科学社会主义里也一样孕育着无政府主义的萌蘖（可以“文革”为例）？或者正如钱钟书先生《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所言：“即使在满纸荒唐言的神怪故事里，真实事物感也是很需要的成分；‘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 toads in them），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相反相成，才添趣味。绝对唯心论也得假设客体的‘非我’，使主体的‘我’遭遇抗拒（Anstoss）而激发创造力，也得承认客观‘必然性’，使主动性‘自由’具有意义和价值。这是同样的道理。”

提到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红荔山庄”，我们这番话越说越远越离题，本想就此打住了。但是读报得知，2015年3月5日，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与龙岗区政府签署“深化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落实国家“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前海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战略，其中包括：将龙岗区平湖金融与现代服务业基地、平湖西部工业园区，打造为“前海后陆（平湖）拓展区”。据记者说平湖一夕间荣登“国家战略实施区域”，将是数年内最狂飙的片区。这就令人啧啧称奇：刘铸伯故里平湖，如今又与“红荔山庄”旧址（今属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辖）搭上了一层关系。



第一章 凯风至南

我国民族最富有进取心，亦最富有爱国心。世人诋之以守旧，目之以散沙，此未免一孔之见。盖在专制时代，内地人民一切行动，皆当受政治之支配，故耳目有所锢蔽，能力亦无由发展，惟交通处所与外人相接近者，则类能吸取世界文明以发扬其特性，于团体则务为结合，相与谋公共之治安，与国家则务为协助以为之后盾，不特其所营之各工商事业，足与世界相颉颃已也，盖于世界竞争之理，人类生存之故，知之较真，故行之尤力……

——朱庆澜在平湖纪劬劳医院、念妇贤医院开幕典礼上的致辞



刘铸伯（1867—1922）

深圳市平湖松柏围旧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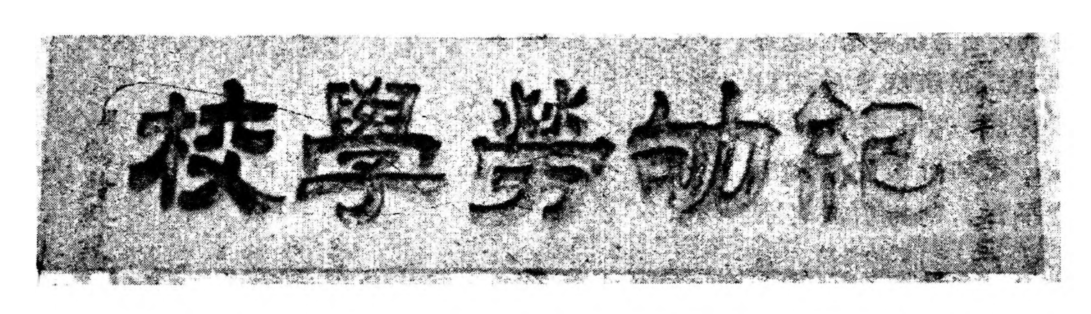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故里平湖

刘铸伯，原名刘鹤龄，字守真，号铸伯，又自称铸伯氏，譬如他1907年刊印的《自治须知》一书，封面题款就是“香江 铸伯 刘鹤龄”，至于他给两广总督陶模、张人骏、张鸣岐等人的禀札，署名则是“刘鹤龄”。他在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二十八日函复广州府礼乐局官员的一封公文里，则署名“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候选道、孔圣会会长刘”。1916年捐资创建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刘铸伯题写匾额“纪劬劳学校，丙辰年春月吉旦，男鹤龄敬设”“念妇贤医院，丙辰仲春，铸伯氏立”。

另据香港历史档案馆政府档案处档案主任刘善君女士2001年11月22日提供的几份档案显示，刘铸伯的英文署名是 Lau chu-pak。

刘铸伯的故里在新安县平湖墟元屋围（一说述昌围，今均属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母亲伍氏则是伍屋围人。

平湖建墟时间始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早期的平湖有3个村落——伍屋围村、大围村、松柏围村。据当地父老口头相传：平湖的伍屋围村地形颇像一只螃蟹，大围村地





刘铸伯题写的两方匾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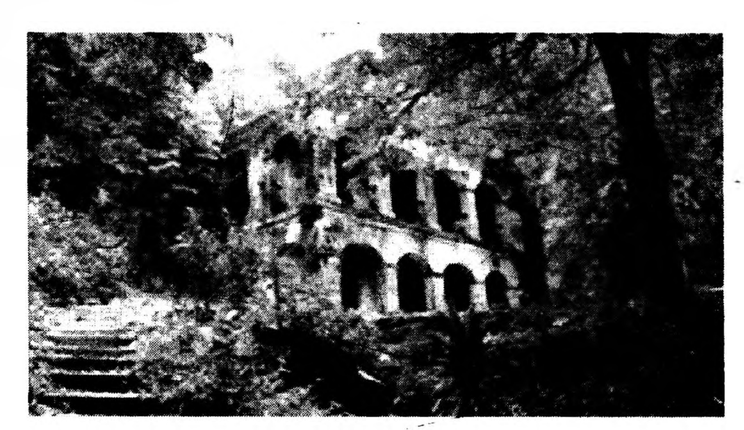
形像一只蚌，松柏围村地形则像一只虾，螃蟹、蚌、虾均是水生动物，必须有江河湖泊才能成活，而这里地势平坦，既无江河也无湖泊，水资源较为匮乏，出于对水的渴望，人们遂将此地称为“平湖”。

但还有另一种说法，平湖因为“瓢胡泉”而得名。“瓢胡泉”称为“新安百景”之一，也是平湖乡八景之一。据康熙本《新安县志·地理志》记载：“瓢胡石井，在七都平湖乡左；乡数百人食之，仅可汲一瓢，日夜汲之不竭。”嘉庆本《新安县志·山水略》所记大同小异：“瓢胡石井，在七都平湖乡左，汲之，仅容一瓢，日夜不竭。”平湖中学老校长刘仲德（1905—1993）晚年著文回忆：瓢胡泉离平湖乡不过咫尺之遥，四周都给天然的石块包拢着，剩有一个仅容一瓢勺的泉眼。但泉水却源源涌出，虽遇大旱之年也取之不尽，而且水味清洌，甘凉适口，相传可治疗痼疾。刘仲德说：至于“瓢胡泉”是不是“平湖泉”的讹读，那就有待于人们去考证了。

在20世纪70年代，瓢胡石井已失去了旧貌。居民用上了自来水，懒得再弯腰屈膝汲取井水，便用长长的花岗岩石条横搭过，把周围覆盖起来，再也看不到石井的涌泉了。刘仲德感叹说：我觉得社会上总有这些现象，新的事物出现了，旧的事物就给掩盖着，这是不足为奇的，比方特区建设起来，把旧的建筑物都拆去，让投资者建起了三四十层的楼房，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为了送旧迎新，把值得纪念的文物古迹一股脑儿都消灭了去，不给后人留个印象，这不是件可惜的事吗？

其实，这种破旧立新的举措到处都在发生。刘铸伯祖母、妻子归葬故里。最后，他也落叶归根：1922年5月3日（旧历四月七日）病逝于香港，享年五十有六，权厝灵柩于东华医院义庄，6月15日（旧历五月二十日）归葬平湖凤凰山青奇坑。刘铸伯仙逝时，84岁的母亲伍氏尚健在。老人去世后，也归葬故里。

但在战乱年月、动荡年代，青奇坑墓侧“追远阁”“娱亲庭”的陈设被洗劫一空，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数度沦为军营，刘铸伯的名字被亵渎，连墓地都被“掘金者”以“革命”的名义公然掘毁。刘铸伯祖母梁氏、母亲伍氏、妻子潘氏墓地上的石材，成了公社社员“学大寨”，建造“平湖天河”的现成材料。



凤凰山青奇坑的“娱亲庭”，或许是深圳目前保存较完好的唯一的一座享堂

时过境迁，人们才想起刘铸伯这位乡贤，想起他一生的功德事业，念起他绵绵不尽的恩泽（规划建设平湖新墟，设立学校、医院，等等），就像搬开冷冰冰的石条，人们

又听到瓢胡石井的泉水声，从遥远的岁月里汩汩然流淌过来。

伴随着汩汩泉水，从遥远的岁月里一闪而过的，还有一群群渐行渐远的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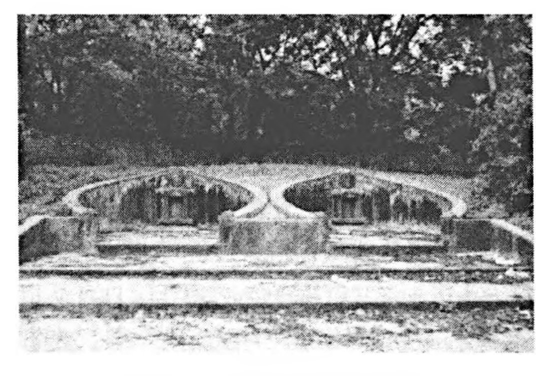
平湖街道办原居民的姓氏较复杂，有刘、严、王、伍、陈、任、邬、黄、宋、何、叶、邝、蔡、曾、李、林、邱、邓、罗、江、梁等 20多个姓氏，“刘”姓却是平湖第一大姓。据刘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最早迁到平湖的客家人，在平湖落地生根已经500多年了。

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声名显赫的“郡望”与“堂号”，“堂号”包括郡望总堂号和自立堂号。据有关史料记载，平湖刘姓郡望彭城，自立堂号“敦义堂”。彭城郡设立于西汉时期，当时将楚国改为彭城郡，后又改为彭城国，治所在彭城，平湖刘氏自认是汉高祖的后代。

堂号作为家族的徽号和别称，不仅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血缘内涵，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既是对某一姓氏家族特色的高度概括，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同时具有区分宗支族别、血缘亲疏的社会功能。它的产生、发展，多与修族谱、建宗祠、祭祀祖先、宗亲联谊活动同时进行。堂号不仅书写于宅院厅堂、宗祠祖庙、族谱封面，而且也题写于店铺、字号、书斋别墅、文集书画及日常生活用具（如车舆、灯笼、钱袋、家什）上面，用以区分姓氏族别，作为本族标记。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自从刘铸伯的父亲刘朝瑞等平湖刘姓人家19世纪五六十年代去香港开基立业，“平湖刘敦义堂”的堂号，也慢慢地在新土彰显起来。

平湖刘氏堂号“刘敦义堂”，刘氏祖墓在平湖军营围墙外，“文革”期间曾被捣毁，改革开放后族人出资重修，并在祖墓右侧建有享堂。享堂里供有祖宗牌位，还有一方“九万将军”墓碑，碑文如下：“公同宜人曾合葬盐田六十余载矣，□□不振□□玄孙□□赞圣恩日贞□寤寐不忘，投见此地龙昂水聚，局逆砂硃乃真回龙顾祖之吉壤也，故奉公与宜人以合葬，订作申□□坤向之源。皇清功授明威将军高祖考九万刘公妣陈氏宜人之墓，乾隆戊戌年仲冬月谷旦重修。”

平湖作家刘旦华、陈建平曾经根据父老口头传说，撰文介绍过这位“九万将军”的


刘敦义堂祖墓（叶自发摄影）


刘敦义堂祖墓右侧新修的享堂（叶自发摄影）

传奇故事。

在岭南客家人族谱中，通常会记载一首《迁流诗》（各版本文字略有差异）："骏马堂堂出异方，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处他乡是故乡。"有作："驿马匆匆过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日久他乡是故乡。"或作："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

此诗作于何人、出于何时，不得其详。平湖刘氏"迁流诗"不仅刻在族人的心板上，镌在族谱里，还以图文并茂的通俗方式展示在家族宗祠里。

位于平湖街道平湖社区的大围古村始建于明代，村中的刘氏宗祠亦建于同一时期。随着刘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后人在平湖建立了多个村落，同时建有3个刘氏宗祠，由于年久失修，宗祠破败不堪，平湖刘氏宗亲决定集资重修，并将3个刘氏宗祠合而为一。

2004年，重修后的平湖刘氏宗祠落成。每年正月初一，村民到祠堂舞刘氏纸龙拜祖，每月的农历初一、十五到祠堂敬香，刘氏宗亲络绎不绝，祠堂烟气缭绕。平湖刘氏族人不论走得多么远，都会回到刘氏宗祠，认祖归宗，如今它已成为联系海内外刘氏宗亲的精神纽带。




大围村刘氏祠堂（叶自发摄影）

修葺一新的刘氏宗祠，是一座典型的明清时代广府风格的仿古建筑，大门两侧是一副对联："德培兰桂，馨荐苹蘩。"厅内横梁和墙上雕梁画栋，描绘了刘氏人家古朴的家风和家族名人的故事。在一面墙上书写着《广传公教子诗》："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早晚勿忘亲命语，晨昏需顾祖炉香。苍天佑我卯金氏，二七男儿共炽昌。"

据族谱记载，刘广传是黄巢战事后迁居宁化石壁定居的客家刘氏始祖刘祥的第十四代孙，出生于宁化，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进士及第，授瑞金县令，后出任广东潮州都统，自宁化迁潮州，后迁梅州，二妻十四子。这首源于广东兴宁客家刘氏"迁流诗"所表达的文化意识，应该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结果，不仅代表刘广传的传统理念，也代表了客家人的文化意识。它既鼓励子孙到异地去开基立业，又叮嘱子孙必须延续自身从祖宗承传的文化因素、价值观与道德规范，并期望着有朝一日天下子孙昌盛团圆，光宗耀祖。

以刘铸伯为例，他虽然生长香港，在中央书院接受了比较完备的西式教育，但是该校虽然采取所谓殖民主义奴化教育，但不拒绝或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反而把《四书》《五经》乃至《圣谕广训》列为必修课或必读书目。譬如，刘铸伯1885年结业考试时的一道“汉译英”试题是：“书曰：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尧首以睦族示教也。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以睦族为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本源则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体，务使血脉相通而疴养相关。周礼本此意，以教民著为六行，曰孝曰友，而继曰睦，诚古今不易之常道也……”而该试题则摘自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二日颁布的《圣谕广训》第二款“笃宗族以昭雍睦”。也就是这次结业考试，刘铸伯成为中央书院首位考获“史钊域奖学金”（Steward Scholarship）的优秀毕业生。

后来，刘铸伯为自己的儿子依次取名富宗（德谱）、荣宗（昆谱）、耀宗、光宗，同样寓有希望后人大有作为、光宗耀祖的意思。而且，刘铸伯时刻不忘故里：1908年在香港创建孔圣会，担任主席（会长）一职，在广州、香山（今中山市）、香港广设孔圣会义学的同时，他在家乡平湖也设立一所孔圣会义学（纪劬劳学校前身）；广九铁路测量设计期间，他吁请当道把路轨改近平湖，并于家乡设平湖火车站，乡人称便。乡农贫苦无依，时以妻儿质钱而困于重息，最后子女多沦为奴婢，刘铸伯见状，怜悯太息，在平湖创设昌裕公司，储资出贷，取息甚微，农人称颂。20世纪初年，国内还谈不上现代市政规划，刘铸伯则吁请于省吏，尝试着在平湖开展市政规划与建设，创市场，设学校，立工厂，建医院，附以农林实业，规模粗具，平湖一时之间被人称颂为“模范村”。

刘铸伯的家族，自从他父亲刘朝瑞19世纪五六十年代移居香港，开支散叶，弹指间一百多年过去了，子孙后人，真可谓“年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他们或为官，或为商，成了香港望族。但是，子孙后人从未忘记根系之所在。

在漠漠时空中，客家人开支散叶，繁衍子孙，胼手胝足地劳作，诗书传家久，耕读继世长。但是，人类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过去不久，欧洲的飞鸟开始飞临中国的城镇乡村，被海水分割的地球逐渐成为一个整体。

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商人乘船来到中国广东沿海，开始和明朝交往、贸易，当时人即称之为佛朗机。发生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 年）的屯门之战实则是中西方的首次军事冲突，在巡海道副使汪鋐指挥下，广东军民打败葡萄牙海盗商人，泰西器物文明“佛朗机炮”为我所用。15、16世纪对大明帝国构成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频频犯疆，而不是来自外洋的欧洲海盗商人。汪鋐试制改造“佛朗机炮”用以御边，在中国兵器发展史上理应大书一笔。

关于葡萄牙海盗商人入侵屯门的具体时间，嘉庆本《新安县志》卷十三“防省志”有以下粗略记载：“宏（弘）治六年 （1493 年），番彝入寇东莞所（案：今南头古城），千户袁光捕剿于岑子澳，死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番彝佛朗机入寇，

占据屯门海澳。海道汪鋐讨之。”收录于该书卷二十三“艺文志”的《都宪汪公遗爱祠记》一文，则是时贤对屯门之战的详细记录。

明代的屯门，指北起今深圳南山区，南至香港九龙半岛沿海大部分，包括前海湾、后海湾、伶仃洋等在内的地区，明代属于广东东莞县管辖。屯门之战结束后，葡萄牙海盗商人频频骚扰岭南海疆。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朝廷析东莞县，置新安县，县治设在南头。

平湖所辖平湖围、白坭坑、良安田、辅城坳、新木及新南的一部分属新安县，鹅公岭、山厦和新南的部分自然村属东莞。明崇祯十六年（1643 年）的《新安县志》记载：其时新安县行政区划分为3 乡7都57图509村，平湖辖属7都。

鼎革之后，康熙元年至三年（1662年—1664年），清廷为防止民众接济退守台湾的明遗臣郑成功集团，两次下达“迁海令”。新安县自海岸内迁八十里，属地、人丁大减，民众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一度并入东莞县。康熙八年（1669年），广东巡抚王来任及两广总督周有德力陈迁界祸害，禁令稍宽。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平定台湾，迁界令才完全撤销。深港地区复界招垦初期，原住民迁返的很少，反而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客家人居多。

朝廷下令复界招垦，重置新安县，官府给以牛种，招徕客民垦荒，并出台了地方性的政策：“定疆界以绝争端，禁需索以宽民力，借籽种以助农工，累开科以示优恤，广招徕以尽地集，如此则民无观望不前之心，而报垦者自必接踵而至。”这一系列中央、地方的改革措施，有效地推动了新安县等地农业的发展，对迁界区的复界招垦起到了积极作用。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平湖归官富司管属。嘉庆本《新安县志》修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训典”部分收录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及“今上”嘉庆发布的32封“圣谕”，第二封就是圣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1679年）颁布的《上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

平湖刘氏耆老，曾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则当地广为流传的《广传公家训》：

敦孝弟睦亲族和乡邻明礼让务本业端士品隆师道
修坟墓戒犯讳戒争讼戒赌博戒淫恶戒犯上戒轻谱

这则《广传公家训》，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因为它完全称得上是康熙《上谕十六条》的“压缩版”！一纸皇皇上谕，最后以“家训”“祖训”的名头，载入族谱、家谱，这也足见清代的国家机器在教化宣传方面，的的确确达到了春风化雨、入脑入心的程度，而不存在如今常见的所谓“两张皮”现象、“狗扯羊”现象、“鸡对鸭讲”现

象，等等。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它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在此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人口大大增加。

寻译解读“康乾盛世”图景的密码，可以从深圳客家民居中找到钥匙。深圳的龙岗、平湖、坪山、坑梓等客家地区，乾隆、嘉庆年间，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客家围龙屋拔地而起，它既是客家人开发深圳的历史见证，也为研究“康乾盛世”时期深圳历史、文化、民俗和建筑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刘铸伯的母亲伍氏是平湖伍屋围人。伍屋围原名伍屋围平湖，现属于新南社区，人口1000余人，分别居住于深圳、香港、广州与海外。据说，始祖伍兆凤500年前从增城沙贝（现今群星村）迁居平湖，立围之初，建有氹围城，城内面积百余亩。伍兆凤曾经官授义烈武略将军，他的儿子伍南儒在伍屋围出生，被后人尊称为一世祖。

伍屋围伍氏宗祠建成距今有400多年历史，“文革”时期，宗祠遭到破坏，宗祠内的物品被洗劫一空，曾于2006年修葺，大门两侧挂有对联“祥开伍屋，胄衍平湖”。宗祠建筑面积不大，供有始祖伍兆凤及淑配王氏孺人、一世祖伍南儒及淑配刘氏孺人，以及伍黄信、伍鹤侣、伍彦洪、伍乐英、伍子英、伍传英祖先的肖像或牌位。谨录两副老对联：“越岭移南系出奇峰石碣，迎梧坐北安居梅萼平湖”；“祖德宗功开享百世，左书右穆而揭千秋”。墙两旁挂有牌匾“宗枝繁荣”及“伍屋系出楚郡，播迁吴齐湘闽，绵瓞羊城南粤，繁枝延茎，沙堤沿脉，我族万世其兴”。

伍氏宗祠东北方长着一棵树干约有两人合抱粗的鸡蛋花，据说已有500年树龄，伍屋围祠堂初建之时它就在这里扎下了根。老辈说当年的宗祠环绕在一片荔枝林中，这么多年过去了，荔枝林早被一栋栋房屋取代，唯独这棵鸡蛋花树还在陪伴着宗祠。2006年，这棵古树被龙岗区绿化委列入古树保护名录。

尽管“康乾盛世”图景密码，在平湖古村落建筑群里随处都可以找到，但有道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被盛世辉煌遮蔽的阴影（如康乾时代的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在鸦片战争之后，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鹏营参将赖恩爵（客家人）率领大鹏营水师抗击英军，打响九龙海战，重创侵略者，赖恩爵获道光皇帝赐“勇士”称号。

随着战争的扩大，清廷奉行投降政策。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7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香港岛被英国占领。1860年（咸丰十年）1月11日，九龙半岛因《北京条约》而被迫割让给英国。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21日，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给英国99年。至此，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以深圳河划境分治。

在一个西风东渐、坚船利炮的时代，平湖刘氏家族又开始为生计而四处迁徙，他们有

的漂洋过海“下南洋”，有的辞别“唐山”赴“金山”；刘铸伯的父母则选择了香港。

平湖父老说，刘铸伯是个遗腹子，他的家乡在如今的平湖人民医院附近的述昌围。平湖作家陈建平《民初平湖圩镇建设：斯地幸有刘铸伯》一文记载了当地口头传说：

> 1870年炎夏的一个上午，刘铸伯诞生。依据传说，刘铸伯原本并不姓刘，也不属于述昌围人氏。他的母亲伍氏是平湖伍屋围村的女儿，出嫁到东莞县的大坪村，新婚不久，便喜孕刘铸伯。但横祸飞来，丈夫竟意外身故。为了身上的这点骨血，伍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平湖伍屋围。然而按照当时的乡规习俗，伍氏夫亡，现在带着遗腹子回来，便是不好，村民们很不乐意，把她安顿到附近的述昌围。述昌围村中居民几乎都姓刘，父老乡亲很大度地接纳了她。
>
> 刘铸伯于1870年出生，伍氏请一位有学问的老先生为孩子起名，期望他长命百岁。老先生依伍氏的意思，为他取名“鹤龄”，还取了“金祥”“铸伯”等名号。为了感谢述昌围人的容留之恩，伍氏决定小鹤龄随刘姓。
>
> 1876年，刘铸伯到了该受教育的年龄。这时，伍氏做了一个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带上孩子，到香港去谋生。伍氏到了香港后，靠给人做杂工供子读书。

平湖作家李建国《述昌围古村：大度宽容　刘氏辉照》一文说：述昌围为平湖通族之祖刘本刚之四子刘武弼的后代所建，他们是明英宗年间从松柏围迁过来的。李建国也沿袭了刘铸伯是遗腹子的说法，他这样写道：

> 1870年炎夏的一个上午，后来香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政界人物、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也是当时新安县（后来的宝安县，今天的深圳市）著名爱国侨领刘铸伯诞生在述昌围。他的母亲伍氏，是平湖伍屋围人，出嫁到东莞县的大坪村，那条村的大姓是叶，但她的夫婿姓何则未曾考究。伍氏新婚不久，便喜孕刘铸伯，但横祸飞来，丈夫未曾享受当父亲的天伦之乐，就意外身亡，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她肚里的孩子。
>
> 丧事办过之后，伍氏家中已经一贫如洗，而且年轻守寡，又有身孕，生活自然十分艰难。夫家翁婆亲属以及大坪村的一些村民还认为她是晦气之人，克死夫婿，明里背里对她窃窃议论甚至指桑骂槐，令她羞辱难当。



述昌围一角（叶自发摄影）

不久，她忍辱负重地离开大坪村，回到自己的娘家平湖伍屋围。按照千年的封建传统和当时伍屋围的乡规习俗，出嫁女怀孕之后再回娘家便是不好，更何况伍氏的丈夫意外身亡，现在带着遗腹子回来，村民们当然很不高兴。伍氏的父母虽然心疼女儿，却也不得不向封建的乡规俗例低头，仅让女儿在家中小住数日，便想方设法地把她安顿到附近的述昌围。述昌围的乡亲很大度地接纳了她，让她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平静的容身之所。为报答述昌围的收留之恩，伍氏让儿子跟述昌围的刘姓，让他做述昌围的儿子。

刘彭龄，字紫东，平湖松柏围人，清宣统己酉（1909年）科拔贡生，因其父是朝廷岁贡生，有“父子岁拔”之美誉。纪勋劳学校创办后，刘铸伯邀请刘彭龄担任校长。刘彭龄的孙辈刘旦华则告诉我们：祖父刘彭龄与刘铸伯同年岁，为刘铸伯取名“鹤龄”的，是自己的曾祖父，一个“彭龄”，一个“鹤龄”，都有预祝孩子长命百岁的意思。



纪勋劳学校首任校长刘彭龄的名片（刘彭龄长孙刘旦华提供）

平湖父老还说，刘铸伯幼小时在平湖发蒙。平湖有两所较著名的私塾：一为鹤轩书室，坐落在平湖红朱岭老围村西北角，由刘氏太祖刘晓阳创办于清嘉庆年间，书室正门两边的麻条石，刻有一副对联，左边为“鹤龄冠祖”，右边为“轩勉盈祠”，上方横额为“鹤轩书室”四个大字；一为松柏围“雕虫书室”，由刘彭龄的父亲创办。刘旦华听老辈传说：祖父刘彭龄少时与刘铸伯同砚，终身交好。

那么，刘铸伯真的是遗腹子吗？他在平湖读过书吗？历史的纵深处总是幽暗神秘，繁衍出诸多众说纷纭的细节。就人物传记的写作而言，传主的日记、手札、著作、照片、遗嘱、藏书，以及与友人来往的信件，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而同样具有研究价值的讣闻（又称讣告、哀启、家传、行述、行状、哀挽录、哀思录、荣哀录等。单张的讣闻一般只有逝者的生卒年月、简单事迹、祭葬时间地点等；成册的讣告所涵盖的内容就丰富得多——逝者行述、祭文、唁函、诔文、诔词、挽联、挽诗、挽幛等，要是考究的话，还有遗像、遗墨、遗嘱、生平照片、丧礼摄影、追悼照片、像赞、碑文、纪念文章、著作目录等。这样做既是对逝者的一个交代，也是对家族荣誉的一种彰显），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利用。因为，讣闻往往是第一手文献来源，当学界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出现了分歧，它可以提供权威的佐证或参考。但是，由于讣闻印刷量有限，仅限于戚友、同僚小圈子里赠送，此类藏品往往属于珍贵的等级品，即便有人具有浓厚兴趣，也常常被收藏机构或个人拒之门外。

刘铸伯逝世后，家人印制了一份《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所谓“不孝等苫块余生，昏迷失次，何敢有所觍缕？然失今不述，一旦溘先朝露，则先考之性行，不免有传闻异辞之惧，用敢腼然偷息，谨述梗概，用以告哀”。《行述》手书雕版印刷，共19

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
先考諱鶴齡字守真鑄伯其號也世為寶安縣
平湖鄉人 先王父朝瑞公服賈香港挈眷居
焉以丁卯年誕 先考於港寓 先考生而岐
嶷性聰穎甫七歲即慕學以家貧無力就傅
偶與群兒戲於衢觀群兒挾書赴塾心好之
歸而願 朝瑞公願就請 公乃命肄業於西
營盤馮富義塾遂苦學不輟試輒列前矛塾

刘富宗等撰《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1922年）

页，每页8行，每行17字。这是一篇十分可贵的小传，它不仅记载了刘铸伯的逝世、归葬日期，还点名了他的出生地与出生年份：

先考讳鹤龄，字守真，铸伯其号也，世为宝安县平湖乡人。先王父朝瑞公，服贾香港，挈眷居焉，以丁卯年（1867年）诞先考于港寓。

这则《行述》，由刘铸伯之子刘富宗、刘荣宗、刘耀宗、刘光宗“泣述”，叶兰泉“填讳”。所谓“填讳”，旧时指子孙为祖先撰写行状碑志等文字，请人代写祖先名号，称“填讳”，唐人称“题讳”，如贞元十五年《徐浩碑》，张式撰，浩次子岘书，碑尾有“表侄前河南府参军张平叔题”一行。宋人周必大《跋初寮王左丞赠曾祖诗》，末题“通直郎田橼填讳”；元人《麻衣子神字铭》有“南阳贡士李珩填讳”字样。叶兰泉是刘铸伯求学中央书院时的同窗密友，两人有几十年的交游，由他“填讳”的这则《行述》，可信度较高。

总之，《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廓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比如，关于刘铸伯的生卒年月，宝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的《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1版）说，刘铸伯生于1870年，卒于1926年；又说，刘铸伯之父是煤炭工人。还有的说，刘铸伯之父是香港海员。《行述》明确说，刘铸伯之父“服贾香港，挈眷居焉”，也就是说，他父亲刘朝瑞原在香港做小本生意，不久母亲也到香港团聚。

令人遗憾的是，《行述》未标明刘铸伯的具体出生日期。但据香港历史档案馆刘善君女士2001年11月22日提供的另一份档案显示，刘铸伯出生于1867年6月5日，病逝于1922年5月3日。

关于刘铸伯之殇，这份档案披露的史实，与《行述》所记“今年春（1922年），海员罢工事起，相持久不下，商民交困，群推先考出任调停。先考为华侨大局计，不惮趾疲舌敝，屡向所司力争，局外亦多有不及知者，众情不谅，疑谤交集。迨事获解，而先考之心力益瘁矣。夏历四月五日，饯世伯何绅棣生之行，归尚与众孙嬉，未几，登楼呼腹痛，家人扶之卧，则痛益剧。众医断为胃癌，谓初患可治，溃则不治，今登楼而痛，殆癌溃也。越二日，卒于港寓，时为壬戌四月七日，享年五十有六”，可谓两相吻合。

而且，我们由1922年5月4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中“惟刘君之母年八十四尚在堂”这个句子推断：刘铸伯之母伍氏，大约生于1838年。刘铸伯出生那年，母亲已经28岁了。

1919, Dec. 30 - SCMP. - Dinner given for advisers by Genl. Mo Yunghsin, Military Governor of Canton - among guests Lau Chu Pak

1922, May 6, SCMP. - died May 3, Honbl. Mr. Lau Chu Pak, aged 56 years.
1922, May 4, SCMP., Obituary of Lau Chu Pak, born June 5, 1867. Central School student, 1885 first clerk of Hong Kong Observatory, gave up 1888 to become compradore of West Point Godown Co. Following year appointed Senior Anglo-Chinese Master of Formosa Government School. But in 1890 started on business on his own as tea merchant. In 1903 became first Chinese assistant and compradore of A.S. Watson and Co. 1897 elected Tung Wah Committee. Condemnded by some for his alleged foreign leanings.
1922, May 8, SCMP, funteral Mr. Lau Chu Pak, residence [illegible]

香港档案馆历史档案处所藏刘铸伯档案

至于平湖本地父老口口相传的，刘铸伯之母伍氏嫁到东莞县的大坪村何家，喜孕刘铸伯不久，丈夫意外身亡，等等，如今在白纸黑字面前就站不住脚了。那么，平湖民间为何有刘铸伯是遗腹子的传说与附会？刘铸伯名满香江，恩泽故里，老少咸知。但是不管怎么说，“受人之恩”总是一件事后回味起来觉得不怎么光彩的事情。于是，自尊心使平湖父老在集体潜意识里进行了一场巧妙的挪移，衍生出一系列的传闻、佳话等。这么一来，“受恩”就变成了对方的“知恩图报”，这就有了述昌围父老“收留”刘铸伯母子的传说，颇具话本小说传奇色彩。

当然，述昌围父老“收留”刘铸伯母子这则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它也许透露了这么一个消息：刘铸伯之父赴香港做小生意之前，曾经在这里住过。“收留说”隐隐约约透露的另外一层消息是：刘朝瑞去世（1879年）后，刘铸伯母子把他安葬在平湖故里，按照传统丧葬礼仪，孤儿寡母办完丧事后守孝、服丧期间，或者日后回乡扫墓、祭祀，曾经在述昌围族人家里小住。

但是，据原纪劬劳学校校长刘仲德1981年5月20日为平湖公社开具的一份证明材料披露，刘铸伯的老家在元屋围而不是述昌围。

纪劬劳学校于1916年底竣工，刘铸伯聘请刘仲德之父刘彭龄（字紫东）担任校长，此后，刘仲德也担任过校长一职。刘仲德的证明材料说：“据新南大队元屋围刘绍球社员来函拟收回原有华侨房屋一间事：查该店铺子坐落在平湖站加工厂（碾米厂）左起第二间，原属刘彭年的产业，刘彭年有兄弟四人（刘彭年、刘泽年、刘鸿年、刘奕年），他与刘铸伯又份属兄弟，当时铸伯出资兴建作为分给他的产业。此铺解放后即由政府征用至今，文化大革命前，刘绍球家人一直每月都前往领取租金的。至于铺籍册记载‘刘泽全’的名字，显然是错误的，我在纪劬劳学校教学时，刘彭年是学校的董事，他是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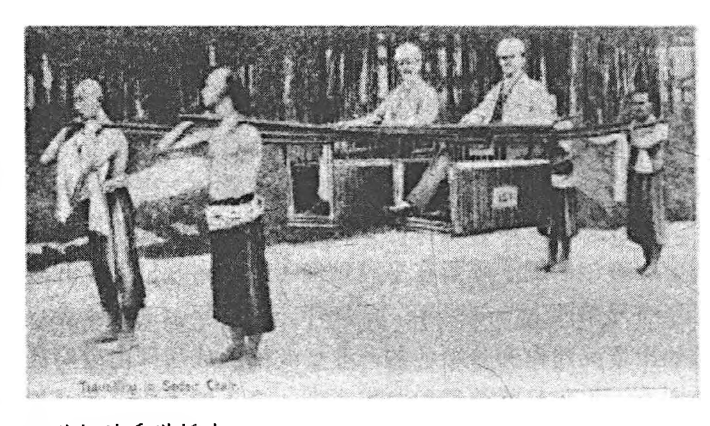
铸伯每月收集铺租交给学校和医院作为经费，根本没有‘泽全’这个名字。因此我熟识其中情况，特作出证明。”

刘仲德的这份证明材料，不仅厘清了“述昌围、元屋围之争”，而且告诉我们：学校医院建好后，刘铸伯指定份属兄弟的刘彭年，代为收取自己所建平湖新墟店铺租金，用来维持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正常运转。

刘铸伯故里以及出生地之争，令人想起诸葛亮故里之争（南阳、襄阳）。1959年春，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曾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大殿停留，念罢“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副对联，当场口拟联语：“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第二节　求学香江

香港开埠时原居民大约7000人，商业尚不发达，除了捕鱼、打石、开山、筑路、建屋及小买卖等苦力工作外，实在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也没有较理想的生活可过；加上治安状况恶劣，瘟疫和飓风等灾害时而侵扰，因而普通中上阶层人士对于这块“化外之地”，一直是裹足不前。尤其是上海、福州、宁波、厦门等在1843—1844 年间相继开埠后，成为欧美商人新的投资热点。所以，香港开埠最初10年虽不像一些史家所言，除了鸦片走私、苦力贸易外，几乎没有正当生意，但商业确实不振，处于困难阶段。香港英国商人感到前景黯淡。



19世纪的香港轿夫

正当香港陷入困境之际，广东地区局势发生剧变，为香港的发展带来了转机。1854年，广东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爆发了天地会起义。这场起义以东莞、佛山两地举旗最先，全省各州县纷纷响应，数月之内攻克府、州、县城40余座。华南一带战事连绵，社会动荡，沿海各地大批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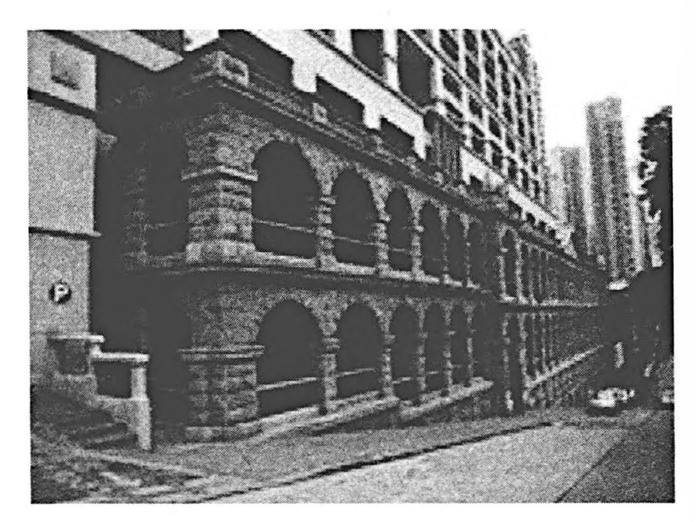
被迫迁往香港避乱，形成新的一轮移民高潮。香港的人口从1853年的39017人，增加至1866年（刘铸伯出生前一年）的115098人。各地迁居香港的居民，又以新安、东莞、惠阳、归善、梅县、潮州、四邑、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地为多。

“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并没有关系。但在“金田起义”爆发不久，广东“天地会”也假借太平天国之名起义，号称“洪兵”。新安县与东莞、惠州、归善县是“天地会”起义重灾区。“洪兵”所到之处烧杀、“打单”，官兵来了掠劫，百姓深受兵匪蹂躏，无法维生，于是原来生活在珠三角地区的富有人家便举家逃到香港来。这是移民大规模迁入香港的第一次，也是富裕人家第一次愿意迁徙香港，对香港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史料，我们只能推断，刘铸伯之父刘朝瑞，大约是19世纪60年代初赴香港做生意的。据《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刘铸伯生于1867年，出生地香港，少年时就读于西营盘冯富义学：

> 先考生而岐嶷，性聪颖，甫七岁即慕学，以家贫无力就傅。偶与群儿戏于衢，睹群儿挟书赴塾，心好之，归而吁朝瑞公，愿就读；公乃命肄业于西营盘冯富义塾，遂苦学不辍，试辄列前茅，塾师怜而嘉之。

由这段文字看来，刘朝瑞的小本生意盈利不多，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温饱，以至于刘铸伯到了7岁学龄（1874年），还没有财力送他进学堂发蒙。是在刘铸伯的苦苦央求之下，父母才送他到西营盘冯富义学读书。



西营盘一瞥

西营盘位于香港岛的西部，位置为上环以西，石塘咀以东，是香港最早期发展的地区之一。西营盘的“营盘”，是军营的意思，一说这里是当年海盗张宝仔安营扎寨之地，一说这里原是英军营地，1841年1月26日，英军便是从西营盘登陆的。太平天国、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大量难民拥入香港，港英政府为了安置他们，便开发西营盘一带，在原有东西走向的皇后大道西开始，向山上发展，划出了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和高街（原称第四街），成了华人聚居之地，有很多售卖海味和中药材的店铺，一直发展至今。

刘铸伯就近入读西营盘冯富义学，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他的父祖辈迁入香港谋生

的时间，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时局动乱大有关系。

香港岛上最早期的教育，除了教会学校以外，可以说，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学塾教育。西营盘冯富义塾为贫困家庭儿童所设，学童在入学的初期，只注重读和写的学习；即使有算术一科，也很少练习笔算。为了商业方面的需要，学童的家长，往往要求教授珠算以代替笔算。



北元魏 分東西
宇文周 與高齊
迨至隋 一土宇
不再傳 失統緒
唐高祖 起義師
除隋亂 創國基
二十傳 三百載
梁滅之 國乃改
梁唐晋 及漢周

《三字经》书影



愛育黎首 臣伏戎羌
遐邇壹體 率賓歸王
鳴鳳在竹 白駒食場
化被草木 賴及萬方
蓋此身髮 四大五常
恭惟鞠養 豈敢毀傷
女慕貞絜 男效才良
知過必改 得能莫忘
罔談彼短 靡恃己長
信使可覆 器欲難量

《千字文》书影

刘铸伯使用的教学用书，最初是《三字经》一类的书。有学者做过统计调查，认为明清时代甚至民初，私塾入蒙之课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四言杂志》等小册子。各个私塾还另加额外读物，有关文学的有《千家诗》《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古文释义》等书。有关历史的则有《鉴略妥注》《五言韵文》《纲鉴》；有关为人处世做文章的则有《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蒙求》《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进一步就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接下来就是五经，而以《诗经》《礼记》《春秋》《易经》《书经》等循次一一诵读。

这些书本，经过塾师的讲解，学童的重复背诵与抄写后，几乎都可以完全铭记于心，日后写起文章来得心应手。譬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初二日刘铸伯以育才书社驻港总司理人名义发布的“育才书社羊城办学劝捐小引”，文辞典雅剀切，“前月谒见省城列位绅商，幸均荷乐为将伯”一句中的“乐为将伯”，来自《诗经》，《诗・小雅・正月》：“将伯助予。”毛传：“将，请也；伯，长也。”孔颖达疏：“请长者助我。”后因以“将伯”称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或向人求助。

学塾上课时间，除了上午八时吃早餐和中午十二时用午饭的时间外，便一天到晚，由日出以至日落，整日不停地连续下来。学童每日的学习，是一种没有变化的重复背诵

与书写，那些程度稍高的上课时则有义理的解释。每一位学童，均须分别朗读、背诵自己所学习过的功课。学童每年缴纳脩金，由二元至六元不等，都是按年缴纳，极少按月的。

据《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刘铸伯在西营盘冯富义塾读书期间，苦学不辍，每次考试名列前茅，“塾师怜而嘉之”。但不幸的是，1879年他的父亲刘朝瑞染时疫去世，家道更加贫困，靠着祖母梁氏缩衣节食，母亲伍氏缝缝补补，缴纳学费，刘铸伯才得以继续学业，正如《行述》所说：“十二岁，先王父见背，家益贫，祖慈事女红，恒达旦不寐，始克具脩脯。”

关于刘铸伯艰难的求学生涯，《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也有简单记载：“刘铸伯君少丧父，其母极贫，操女红度日，教子读书于大华民义学，只穿木屐，旋入义学，校中小费，亦难支持，而其母仍竭力支持之，继由西营盘义学，考得首名，送中环大书馆，即今皇仁书院，免费。”只是这里提到，刘铸伯就读西营盘义学之前，还在大华民义学读过书。

香港早期所设立的教会学校，对香港后来的教育事业，影响很大，贡献也多。当时由教会或是外国人士设立的学校，除极少数专为欧洲学童开设的以外，差不多都是以中文为主，或是中、英文并重的双语学校。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就读的马礼逊书塾，1842年11月由澳门迁到香港来，继续办理，这是香港开埠以后，最早一所由外地迁来香港发展的教会学校。此后，美国浸信会、伦敦传道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会以及德国巴色会，陆续在香港办起各类学校。开初，没有中文讲授，或轻视中文的教会学校，往往不为中国人士所欢迎。到了后来，因为政治与商业的需要，英文教育有其实际的作用，才逐渐发展起来。

我们很快发现，刘铸伯12岁时，“诗云子曰”之外，开始兼习“旁行文”（英语）。一般而言，当时的义塾只有一两位塾师，他在西营盘冯富义塾“兼习旁行文”的可能性不大，或许是在邻近义塾周边的教会学校“兼习”的。

至于刘铸伯“兼习旁行文”的目的，可以说与容闳同出一辙。容闳《西学东渐记》说：“是时中国为纯粹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

師憐而嘉之十二歲 先王父見背家益貧
祖慈事女紅恒達旦不寐始克具脩脯未幾兼
習旁行文益自刻苦試亦恒冠其曹獲獎免費
生旋入皇仁書院所學益大進試輙獲獎金脩
脯衣履皆有以自給 祖慈乃稍紓十七歲畢
業歸自是而後 先考遂獻身社會中矣香港隸
英版圖而我華人之僑居於是者凡數十萬故
政治之良楛咸我華僑身受之中西政俗互異

刘富宗等撰《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类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

容闳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入读澳门马礼逊书塾，当时“旁行文”（英语）的作用尚不大，及至香港开埠，华洋杂处，“旁行文”的用途日益显得重要。刘铸伯的母亲含辛茹苦，达旦不寐事女红，送儿子兼习“旁行文”，她大约与容闳父母一样，“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据《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

> 未几，兼习旁行文，益自刻苦，试亦恒冠其曹，获奖免费生；旋入皇仁书院（按：当时名为“中央书院”），所学益大进，试辄获奖金，脩脯衣履，皆有以自给，祖慈乃稍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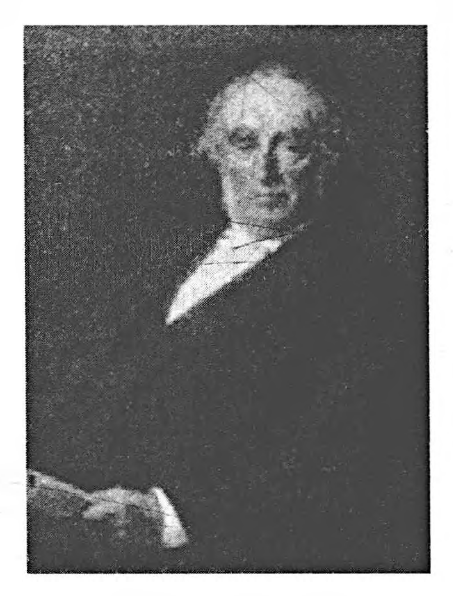
12岁丧父那一年（1879年），刘铸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书院（皇仁书院），命运之门从此对他打开。提起中央书院，我们不得不讲起它的倡办人理雅各（James Legge）与首任校长史钊域（Frederick Stewart）。

理雅各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1958年，理雅各参观广东贡院后曾经说：“诚然中国之文化与英土迥异，然彼之文明与野蛮相去甚远。在吾人心目中，一民族苟能卓然独立斯世，绵延接传达四千余年，当必有其民族之特质也。若亚述、波斯、希腊及罗马诸文明古国，迭经兴替，卒趋灭亡，而中华帝国拥有四亿子民，依然存在，其故安在哉？盖其百姓之中，必寓有伟大之道德与社会力量也……没有国家之学术特质若中国之发达，亦无国家若中国之敬重知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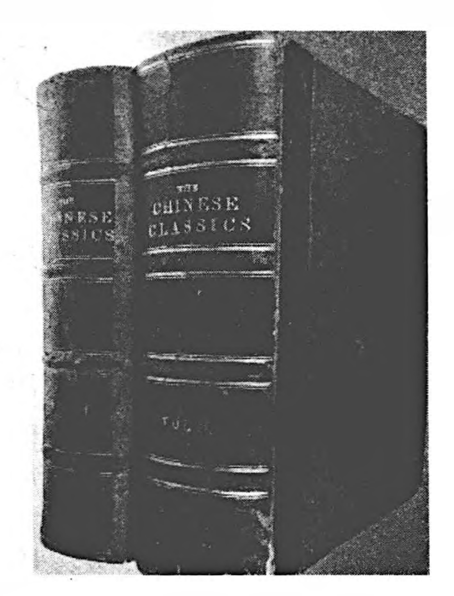
理雅各深知要想明了中国民族的特质，必须钻研中国经典。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理雅各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首位获得者。

香港开埠后传教士陆续开办了一系列书馆。至于政府书馆方面，理雅各1860年开始提出的一个革新计划，对香港的整个教育制度，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整个革新计划，概括来说，是将所有位于维多利亚城的皇家书馆停办，把全部学童集中于一间新的中央书院，由一位欧籍人士担任掌院。理雅各还希望有一所大型的特别设计的书馆建筑物，去代替那些经常受到各方责难的、设备简陋的学舍，好让那位受过训练的掌院，实际从事教育工作，以便提高教育水平。他认为这所新的中央书院，应该用英语教学。

1861年，香港总督罗便臣批准了理雅各提出的这项革新计划。1862年2月，中央书院开始招生。同年，在理雅各的力荐之下，一位年方24岁、名叫史钊域的英国人，由英伦应征来到香港，担任中央书院的首任校长（掌院）兼政府监督学院的职位。



理雅各（1815—1897）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典籍（部分）

史钊域（1836年10月17日—1889年9月29日）被誉为“香港公立教育之父”，生于苏格兰鸭巴甸（又译阿伯丁，香港有鸭巴甸街，即香港中西区的一条街道，被视为香港岛上环与中环的分界线），毕业于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英皇学院（King's College）。理雅各也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



史钊域（1836—1889）

20世纪初期，中国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章士钊，以及伦理学家、教育家杨昌济，均毕业于阿伯丁大学。

杨昌济1909年春进入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夏获得文学士学位。1913年后任教于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宣传《新青年》的主张。1918年6月，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其间，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

中央书院（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中文校训是“勤有功”，而拉丁文校训则是“Labor Omnia Vincit”。办学宗旨是为学生提供各方面的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均有卓越的发展，借此让他们在人生各方面都有成就感和能成为未来的领袖。该校的五大核心价值则为：负责任（Responsibility）、正直（Integrity）、兄弟情

（Brotherhood）、勤奋（Diligence）及追求卓越（Pursuit of Excellence）。

在中央书院开办以前，香港的书馆，除了特别为西方儿童而开设的以外，差不多都是以中文为主，只有极少数在适当情形之下，加授一点英文罢了。中央书院是当时全港最大的书院，故此也称为“大书院”；又因为它是政府所设立的，所以又称为“国家大书院”。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学好英语，一定要到中、英文兼授的“大书院”读书。

中央书院开办初期，并不收费，甚至学生用的课本，连同字典在内，也是由学校免费派发的。在最初的几年，并不强迫学童学习英文。此外，中央书院提倡世俗教育，从未将《圣经》当作课本学习；几年后，在家长的同意下，才在翻译科中教授过《圣经》。

学童在参加入学考试中，中文及格即可进入预备班。读完预备班以后，每日上午便学习中文四小时，愿意的话，下午又学习英文四小时。全日上课，由上午六时直至下午四时，中间休息的时间，便是早餐及午膳的时候。虽然下午学习英文，是出于自愿，但差不多全部都是参加的。

中央书院附近当时还是个农村，四周皆为竹树丛林。校舍有左右两翼，均为单层楼宇，每翼有课室一间，中部由一座大堂连接起来。几班学童同时在这些课室里分班上课。全部学童共分做三班，由于地方不够应用，每间课室平均约有一百人，其中挤迫情形可想而知。此外，似乎没有多余的地方，以供课外活动之用。学童们每日步行回校，身穿长衫，头戴黑色小帽，穿着一对黑色的或刺绣的唐装布鞋；夏天的时候，手上还拿着一把纸扇扮斯文。居住在各个地区的学童，均需早起步行回校，因为那时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轿子，而能够坐得起轿子回校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没有几人。

由于香港社会对英文人才需求日增，有些学童只懂得极有限的英语知识，便离开了书院，经过几年拼打，已经在商场上很有名气了。这是由于早期得风气之先与碰上幸运机会所致。于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弟进入中央书院的日多，但从1863年开始，凡就读英文班的学童，每月均须缴交学费五角。刘铸伯就读中央书院时，早就没有了“免费的午餐”，他进校初期自然也要缴纳学费。

1873年4月24日，香港立法局批准了史钊域的《补助书馆计划》。补助的标准与办法包括：一所书馆，在管理上，要成为一所公众的初级程度的书馆，应该以不牟利为目的；学生人数不少于20人；经过监督学院的视察，认为组织和秩序都属满意；每天有不少于4小时的世俗教育，便有接受政府补助的资格了。同时，政府应允不干预宗教方面的教学。至于教师的聘用，则由书馆做主，只要资格上为政府所认可，这教师便可获得政府补助费的四分之一，以作为私人应得的薪酬。

《补助书馆计划》把书馆分为五类，将各科课程依照学生程度分成六级。根据教育部监督学院或政府任命的考试官主持的学年考试成绩，每位合格的学童，均可获得如下的政府奖金：在第一、二类的书馆中，考取第一级的可得二元，第六级可得八元；第三、四、五类书馆中，最高可得十元；在第二及第五类书馆中，附有第二种语文的，可另加五毫。每位得奖学童上课天数，不得少过二百次。

这项计划的主要办法，是根据学童考试成绩颁给奖学金，乃仿效当时英国的教育条

例办理。不过，史钊域避免了宗教色彩的争论，而以世俗教育为其主要内容。

《补助书馆计划》实行几年后，在刘铸伯考入中央书院这一年（1879年）又有了新的修订。为了引导学童在学业上达到较高水平，进一步将学童学年考试奖赏额予以提高，新修订的《补助书馆计划》规定：第一、二类书馆增加五至十元，第三类增加六至十二元，第四类增加六至十六元，第五类增加六至十六元五毫；并且还准许学童修习更多的世俗科目，以便得到更多奖金。新计划的实施，颇能激发香港教育事业的发展，教会方面也和政府一样，致力教育的扩展工作。事实证明，这项补助计划推动了香港教育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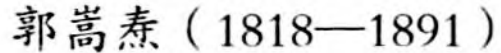
当时由政府负责管理的书馆，分为皇家书馆或称为国家义学（Government Schools）与补助书馆或称辅翼义学两种。对于皇家书馆方面，政府为了鼓励学童的勤奋学习，和教师的认真教导，也施行这种学年考试奖赏的办法。同时，这也是一种“稽查教师职守”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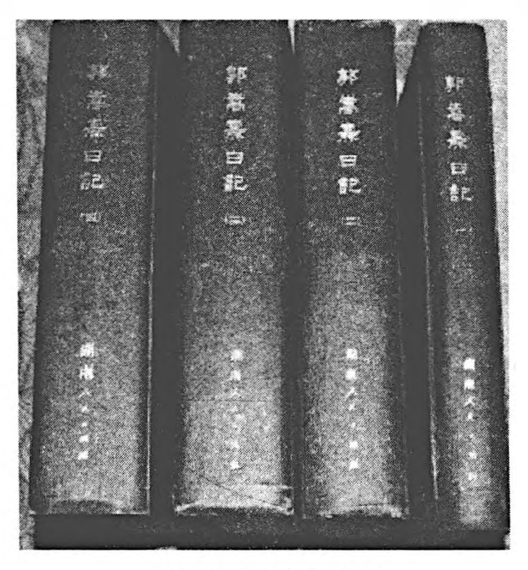
1876年，中国外交家郭嵩焘（1818—1891）奉命出使英、法，途中曾经短暂停留香港，由当时的港督坚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1809—1883）接待参观中央书院，见到了中央书院首任校长史钊域（郭嵩焘译为斯爵尔得）。他在日记中写道：

> 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廿一日。早，至香港。港总督铿尔狄（按：即坚尼地）遣其中军阿克那亨来迎，且请至署相见。……坚总督述及学馆训课凡四百余人，因请一往视之。斯按察又述及化学馆之盛。酒罢，遂诣学馆。总教习斯爵尔得（按：即史钊域），副教习法那、铿尔陪同周历学堂五处。每堂可坐百人，一教习主之。课中国“五经”“四书”及时文者三堂，课洋文者一堂，洋人子弟课“五经”“四书”者一堂。课“五经”“四书”者，中国教习也，课洋文者，西洋教习也。其课诗文，则名为小课，皆限有期日。规模固宏远矣。以江次列队相候已久，不及一赴化学馆。中军阿克那亨又陪送至舟次。

郭嵩焘参观中央书院，是刘铸伯考取该校三年前的事情，估计他入学时学生数目也就是四五百人，课程变化也不大。

郭嵩焘这次参观中央书院，他的《使西纪程》一书原稿比日记所记较为详细：“光绪二年十月廿一日，至香港……遂乘舆至总督署，文武官集者二十余人，通名姓者：水师提督赖得、副提督阔伦布、按察司斯美尔斯。询及学询及学馆，适其地大学馆总教习斯爵尔得在坐，约陪同一游。酒罢，遂适学馆，并见其副教习法那、铿尔两君，皆总司学事者也。凡分五堂：课中国‘五经’‘四书’及时文三堂，课洋文一堂，洋人子弟课‘五经’‘四书’者一堂。每堂人，一教习主之。课‘五经’‘四书’者，中国教习也，课洋文者，西洋教习也。堂分十列而空其前，每列设长案，容坐十许人，以次向后，层累而高，其前则教习正坐相对。亦有教习中坐而左右各分五列者，要使耳目所及无一能遁饰。其课‘五经’‘四书’，皆有期限，而于诗文五日一课，谓之小课，犹曰此求艺之小者，五日一及之可也。……闻别有一化学馆，方拟往视，而阿克那亨告言：



郭嵩焘（1818—1891）


《郭嵩焘日记》书影

‘岸欢列队相送，已候久矣。’”

郭嵩焘对于中央书院的教学设置十分赞赏，诚如他所说：“其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中国师儒之失教，有愧多矣。为之慨然。”郭嵩焘留心西学，从按察司斯美尔斯口中得知中央书院所设“化学馆之盛”，颇想前往参观，终因时间关系作罢。但是，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刘铸伯等在中央书院学过物理、化学等中国传统私塾没有开设的西洋科目。

郭嵩焘感叹，香港开埠，也不过十数年间，发展如此之快，“街衢纵横，楼阁相望，遂成西洋一大都会。居民十三万余人，西洋人户六千”，但他所乘的船只，当晚为英商轮船入泊时撞了船艄，以修船耽延一日。次日，“香港总督铿尔狄及罗伯逊来报见。语及学馆规模之盛，叹曰：‘是皆贫人子弟，学习二三年，粗能有得，往往自出谋生，所以能有成者少也。’因论西洋法度，务在公平，无所歧视……”郭嵩焘盛赞中央书院“规模之盛”，坚尼地总督“因语及学馆云皆国家经费也”，指明这是一所国家提供办学经费，专门招收穷孩子的学校，他们在这里学习几年，就要外出谋生，但恐怕在学业上很难有大的作为。坚尼地总督还谈起了英国教育体制，所谓“因论西洋法度，务在公平，无所歧视”，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香港开埠后，香港政府在教育方面不断完善以“务在公平，无所歧视”为目标的“西洋法度”，《补助书馆计划》也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家贫好学的孩子得到奖励资助，刘铸伯在中央书院学业大进，每次考试均获得奖金。中央书院夏季的上课时间为早上6时正，冬季则为早上6时半，放学时间则为下午4时正，课程十分紧凑，对学生的要求也极为严格。由于刘铸伯是优等生，他的学费、衣食全部由学校供给，他的母亲不再像以往那样辛劳。

刘铸伯求学于中央书院时期的老师，目前我们只知道有个冯华川。冯华川，又名冯

德祥、冯穗，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1874年开始在该校任教，1876年升任副校长。1881年离开教职经商，成为香港早期金融业巨子、华人社会领袖，曾创办中华银号，又经营地产致富。1894年与宝隆金山庄的古辉山、聚昌号布匹绸缎庄的黄尧卿等几十名华人富商倡议组织中华会馆，1896年会馆成立。1900年又与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陈庚虞、何泽生等提议，将中华会馆扩大为香港华商公局，并被推为主席。刘铸伯后来也担任过华商公局主席一职。

刘铸伯的求学时代，英国政府与香港政府时常为治理香港采取何种政策发生冲突。1877年，轩尼诗出任第8任港督。现在香港岛湾仔区的轩尼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轩尼诗总督在任期间（1877—1882），意识到华人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废除了禁止华人在中环购买土地、建造楼宇及经营业务的法令，使得中环地区开始急剧发展。此外，轩尼诗宣布废除笞刑，同意华人创设慈善机构保良局，收留保护被逼为娼的良家妇女，准许香港华人归化英籍，成为英国公民，并于1880年委任伍廷芳出任定例局（立法局前身）首位华人议员并打破自1842年以来华人不准参政的局面。由于轩尼诗总督任内大大提升华人的地位和开明，使英人不满，更被英商向伦敦反映，最后连他命名的道路也要离任后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出现。

轩尼诗总督任内提高了香港华人的地位，但他在教育政策上主张强化英语教学，包括把当时的中央书院原来各四小时的中英文教学制度，改为五小时英文教学、二小时半中文教学，同时又把英语列为必修课。他还规定，新设立的学校如果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便不能获得政府资助 。

1881年1月，中央书院举行“额外甄别”考试时，轩尼诗总督在其督宪批语中说：“按大书院每年岁暮甄别奖赏，该事本亦稽查教师职守若何。”为此，轩尼诗请署理辅



伍廷芳（1842—1922）



王韬（1828—1897）

政司史钊域（当时史钊域博士已转任署理辅政司）提出一份考试官员名单，以司理国家大书院（中央书院）岁暮甄别奖赏事宜。史钊域开列的名单包括：参赞官欧德理，副按察司士挪顿，牧师湛约翰、黎立基，还有一位在湛约翰家里做客的印度著名教育家。

我们在这里顺便补充一句：欧德理与黎立基，曾经一度在巴色会设于新安县李朗（今属于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的乐育神学院（又名李朗神科大学、存真书院）担任教师。乐育神学院也是深圳历史上第一所大学。

轩尼诗总督对史钊域的提议照准之外，考虑到中央书院华童居多，兼以甄别题目，汉语也是一科，他提议邀请绅士伍叙（伍廷芳）与王韬二人也担任考试官，并指明甄别的方法，要遵守补助书馆计划中的规定；而中央书院是归入“西式教育的任何欧洲语文而附有中文科书馆”一类处理。

1881年1月18日，考试局成立，督学欧德理担任主席。经过会议决定后，欧德理当即与中央书院谈妥，首先甄别英语，其次是汉语与其他科目。这项工作由1月18日开始，至25日结束，曾经举行过一个由轩尼诗总督主持的颁奖仪式。刘铸伯在这次大考中，中英文功课俱佳，获得轩尼诗总督嘉奖。

1882年，牛津大学神学博士胡礼（英国人）接任中央书院监院（校长）一职，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一份呈送香港立法局复核的《年报》中写道：“当我在1882 年到中央书院任校长时，第一级的学生只须考八科。本年他们却必须考十五科。就是说，取得八科及格的人，在1882 年以前是成绩优秀的学生。现在取得八科及格的人，只不过是个成绩普通的学生。我又规定，在本校的校内考试，考生要及格的话，必须取得五十分以上。若某学生及格科目的数目不及全年修读科目一半的话，就全年不及格而不能升级。校内考试的试题，完全按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传统，以启发思考为主导。”“每一门课，无论是高深艰难之如几何、代数、拉丁文、自然地理或商业地理，凡是在哪一级讲授，哪一级的全部学生都必须修读。……尽管是中文根底极差的洋学生，也必须修读汉译英、英译汉的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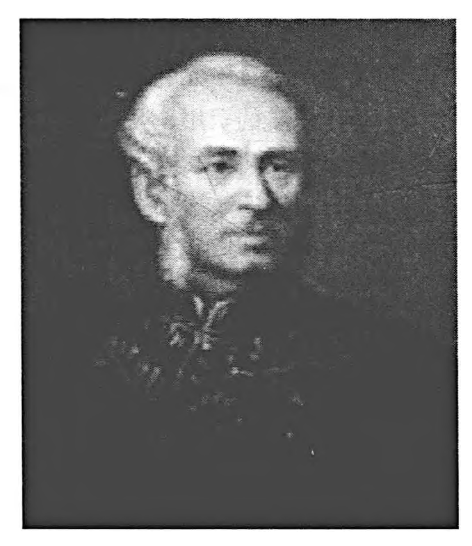
由下面这份图表看来，胡礼担任校长直至刘铸伯1885年毕业，中央书院招收学生数目、上课时间以及每天上课基本上是稳定的。

1882—1885年中央书院注册入学人数

年份	1882	1883	1884	1885
每年注册入学人数	572	556	558	596
每年供上课日子总数	241	236	236	238
每月最多注册入学人数	443	460	462	499
每月最少注册入学人数	372	378	362	382
平均每日上课人数	390	394	411	437

（参考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图表编制）

轩尼诗总督任内，曾经有过把中央书院提升为高等学院的试想，并任命了一个包括伍廷芳在内的教育委员会。但是，教育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香港目前设立高等学院条件尚不成熟，最重要的是发展基本教育，扩充书院。而早在1876年中国外交家郭嵩焘奉命出使英、法路过香港时，坚尼地总督与他交谈时，"因语及学馆（中央书院），云皆国家经费也，嫌其规模尚小，尚欲另立一馆，扩而大之，此皆为各人读书识字自赡身家之计，学习一二年，粗能有得，往往自出谋生，所以能有成立者少也"。坚尼地告诉郭嵩焘，"英国学馆通计所教课者三百余万人"，言下之意，中央书院这所只能容纳四五百学生的学校，对于香港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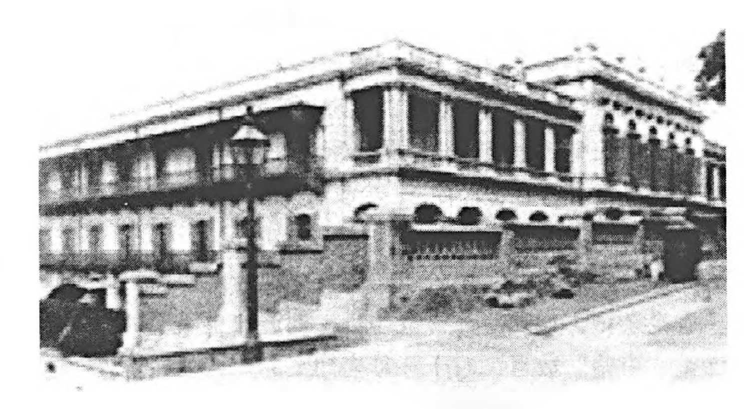


香港第九任总督宝云（1821—1899）

但是，直到轩尼诗总督的继任者宝云（Sir George Bowen）莅任，中央书院的扩展才提到正式日程。宝云于1883年3月被委任为香港第九任总督，他到任后即扩大立法局，建议将立法局5名官守议员增加至7名，非官守议员从4名增至5名，华人社会至少保留1席，使全港中西居民获得更大的代表权。

为了方便中央书院的扩充与发展，香港政府觅地另外再建新校舍，最终选择了荷里活道、鸭巴甸街、史丹顿街和城隍街之间的地方。1884年4月26日，由宝云总督奠基兴建。同时，宝云总督认为新书院应该改名"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College），表示它比其他书馆更为高级。而当时的英国正是维多利亚女皇（Queen Victoria，1837—1901）的统治时代，宝云总督的这番改名堪称越洋拍马，炙手可热。但是，越洋拍马的人太多了，当时的香港一夜之间出现了几家"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College），这所学校遂于1894年改定今名"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以示区别。

那么，刘铸伯在中央书院缴纳学费情况如何？关于学费方面，从胡礼校长的片言只字中可以推论出来。他说："去年（1882年）8月，当我作为教育署代理监督时，在巡检过程中发觉西营盘、湾仔等地方官校有些男生



19世纪末的中央书院（皇仁书院）校舍

的英语水平之高，若到中央书院来学习可能收获更大，但他们没有来。查询之下，发觉他们付不起一个月一元的学费。”由此可以推论出当时中央书院的学费是一个月一银元港币。至于课本的费用，则该校历来有一个制度，学生向校方租用教科书，每本每年租金港币十银元，升班或毕业时交还校方。但在1884 年胡礼校长取得香港总督的同意后，把租用教科书制度改为卖书。校方向学生售卖教科书，每本售价港币十二银元，如此这般，学生既可保留其用过的心爱课本，校方又有进账，皆大欢喜。

下面把1882年胡礼校长到任那一年起，到 1885年刘铸伯毕业离校为止，中央书院每年注册入学人数、每年共上课日子总数、每月最多注册入学人数、每月最少注册入学人数、平均每日上课人数，以及每年考生人数、每年及格率、每年学费总收入、每年总开支、为每名学生每日上课的支出等情列表，以观全豹，并备分析。

1882年—1885年中央书院考生人数、学费、支出表

年份	1882	1883	1884	1885
考生人数	363	365	379	412
及格率（%）	91.18	96.98	95.58	95.38
每年学费总收入（元）	4084	4121	4981	5273
每年实际总支出（元）	10995.35	13409.51	13378.62	12885
为每名学生每日上课的支出（元）	28.2	38.22	32.48	29.45

（参考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图表编制）

由上表可知，该校为每名学生每天上课所支出的费用相当庞大。考虑到每名学生每月只交1元学费，而当时香港厨师的月薪才只有8元左右，为每名学生每天上课的支出如图表中最低的28.2元，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目。由此可见，英国在香港殖民地的政府对教育投资之庞大，同时也可知刘铸伯受惠之深。

广东南海人陈鏸勋（？—1906年）所撰《香港杂记》也说："英廷不惜巨帑养育人才，无分畛域，原为华民而设计，通港以皇后书院（中央书院）为最。”据该书记载："教习华、英文字，生徒约有千余，大半多属华人。英文功课分为八班，每班又分三等。第一班束脩每月三元，第二、三班束脩每月二元，第四班至第八班束脩每月一元。唐文亦分八班。院中所有费项，俱属皇家支结，院地建在荷李活道上，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号进院，其始名中央大书院，今改名为皇后大书院。”

陈鏸勋又名陈晓云，做过济安洋酒保险有限公司司理人，又是万益置业公司、广运轮船公司、咸北轮船公司司理人。他与刘铸伯一样担任过东华医院总理（1904年）。《香港杂记》1894年在香港印行，刘铸伯早已于1885年毕业。但是，该书记载的学生所缴纳“束脩”数目，对于寡母当佣工的刘铸伯而言，堪称是个天文数字。好在，由于中央书院实施学年考试奖赏的办法，而且免除优秀学生的学费。

刘铸伯年年获得奖学金，免缴学费、膳食费、教材费用。由于学业优秀，他于1883

年获得庇理罗士（Belilios）奖学金。庇理罗士（1837—1905），著名英籍犹太裔慈善家，1868年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董事，并于1876年担任主席。

那么，刘铸伯究竟在中央书院学了哪些课程？据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廿一日郭嵩焘参观中央书院所记："总教习斯爵尔得（按：即史钊域），副教习法那、铿尔陪同周历学堂五处。每堂可坐百人，一教习主之。课中国'五经''四书'及时文者三堂，课洋文者一堂，洋人子弟课'五经''四书'者一堂。课'五经''四书'者，中国教习也，课洋文者，西洋教习也。其课诗文，则名为小课，皆限有期日。"这是刘铸伯入学前三年，郭嵩焘听到或看到的中央书院课程设置情况。囿于视听关系，他肯定在日记里忽略了其他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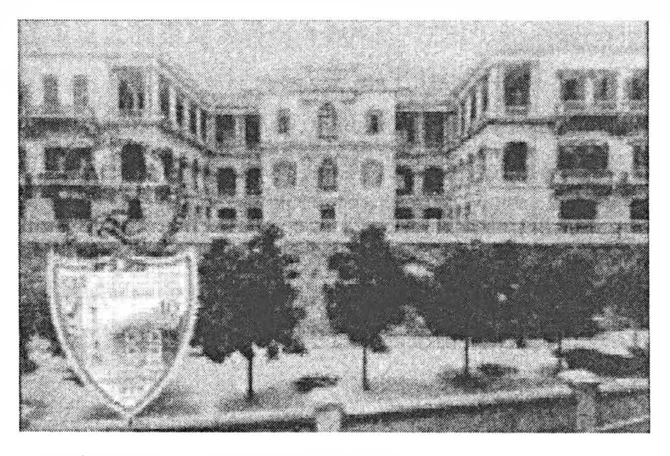
其实，中央书院所讲授的科目非常完备，酷似当时英国本土的中学。而且，无论华人子弟、洋人子弟，一律要学习中国典籍。所以，从多元化教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该校开设的课程比英国本土中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884年该校学生参加香港教育署举办的公开考试的情况来看，用英语讲授的课程包括阅读、算术、听写、中译英、英译中、英文文法、地理、绘地图、作文、历史、几何、代数、测量等。

1884年中央书院用英语讲授的课程表

	班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考生总人数	25	20	30	42	32	27	37	40	59	51	16
及总人数	23	20	28	40	30	25	37	37	58	49	15
阅读	21	19	25	41	32	25	35	37	51	44	16
算术	17	20	24	26	25	10	21	21	47	37	13
听写	11	16	23	34	29	24	37	38	58	34	15
中译英	23	15	26	40	26	22	27	32	53	41	7
英译中	23	15	22	35	28	25	35	38	58	39	14
英文文法	23	20	23	38	27	27	22	14	46		
地理	20	19	27	40	24	19	37	33			
绘地图	23	18	25	33	25	22	33	36			
作文	22	20	30	39							
历史	22	18	25								
几何	13	16	21								
代数	21	19	25								
测量	17										

（参考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图表编制）

从1884年开始，中央书院在最高年班中增设了一些新课程，诸如文学、拉丁文、英国历史和数学。这些增设的课程完全是为了应付一种特殊考试，因为1884年香港总督建议成立一个奖学金，价值200英镑一年，由香港政府支付，用来保送香港青年精英到英国念大学。奖学金由公开考试决定，首届得奖者甚至由香港总督亲自颁奖，可谓隆重其事。而该公开考试的科目就包括上述四项额外课程。于是中央书院就决定增设该四项


香港中央书院（皇仁书院）老照片

课程，但由于事起仓促，难于马上聘到专才充当教师，于是其中的文学与拉丁文由胡礼校长亲自讲授，英国历史则由香港域多利监狱代理总监讲授。该代理总监本来是中央书院的教师，由于被任命为域多利监狱代理总监才临时转行。但当新总监于1885年到达香港履新后，他又回到中央书院重执教鞭，以至于英国历史的授课从未间断。不单如此，由于英国历史似乎深受欢迎，所以在1884 年设科后就在当年从最高年级往下增设到中学第三级。

1885年中央书院考生曾参加的英国历史公开试，试题共有五道，其中第五题是这样的："把克伦威尔合众政府任内诸大事道来（Describe the chief events of the Commonweal under Cromwell）。"按：克伦威尔因为不满英王查理士一世（1600—1649）的专横（其中当然也有新教与旧教之争）而带兵造反，终于大胜，并在1649年1月30日把英王查理士一世审判后杀头，建立合众政府。克伦威尔去世后，君主复辟，英国诸侯拥立查理士一世的儿子为王，1686年4月23日加冕，是为詹姆士二世（1633—1701）。可惜詹姆士二世之专制一如其父，诸侯再次造反，1689 年迎立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1650—1702）为王，是为威廉士三世。詹姆士二世不敌逃亡。整段历史，都是英国著名的争取自由内战史。所以，这道关于克伦威尔的试题，归根结底都是测试学生对英国那段争取自由内战史的认识。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无法找到刘铸伯的试卷，但他对英国历史、世界历史科目似乎兴趣盎然。譬如，他在191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曾经阐述印度等级制度、英国议会制、法国大革命等，以此抨击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宣传的"平阶级"理论：

> 吾今次言"平阶级"。夫同此人类，在造物视之，莫不平等，此为天经地义，不可移易也。故儒家言"民吾同胞""物与同兴"，墨家言"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此义由来旧矣。然所谓"平等"云者，非谓取天然之不平者而尽平之也，往者印度分民为四等，谓之"硌私德"。凡民族之列第一等者，则其子若孙永居第一等，第二等一，罔得而干焉：推之第二、第三、第四等，莫不如是，婚姻庆吊，各不相通。上焉者肆骄横，下焉者受窘辱，违悖人道，莫此为甚。佛氏悲之，于是倡平等之说，故曰"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此"平等"二字所由起也。
>
> 欧洲中古，虽无强分等级之习，然君主之国，有世爵，有贵族，有僧侣，罔不

拥踞田宅，以奴视其国民，而有国亦列为特殊阶级，故宪法上所规定且设为上议院，选举议员，以代表止一部分之公意，而与国民全体之代表相对峙，其不平亦甚矣。欧洲人久愤之，故法国大革命，于“博爱”“自由”二义之外，以“平等”二字为揭橥，及变国体为民主，则阶级固已破矣，何也？盖世爵、贵族之制，则一国之人，有朝为平民夕为公卿者，亦有朝为公卿夕为平民者，是之谓平等，非谓举一国之人，无官民上下之别，然后谓之平等也。而吾心则以平等视之无丝毫势位富厚之见，以吾一身处群伦之中，虽帝王不能屈，虽乞丐不敢慢，是谓心理上之平等，佛氏所谓作平等观是也。法治之国，苟犯法律，则无论官民上下，皆与以相当之裁制，虽以帝皇之尊而莫能恕，虽乞丐之贱而无可加，粤谚有言，“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谓法律上之平等，法律家所谓受法律上平等之保护是也。破去民族之阶级，而复兼此两义，则平等之理，已尽于此矣，若犹以为未足，欲取天然之不可平者，亦从而平之，举凡一切官民上下之制，靡不摧陷廓清，而无复丝毫之存在，然后谓之平等，则非吾之所敢知矣。



刘铸伯《社会主义平议》第三章《论平阶级》（1919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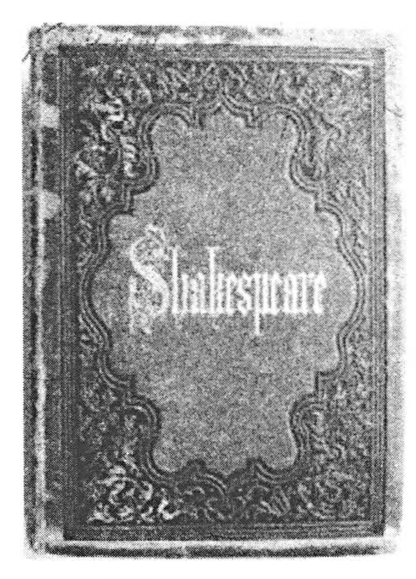
夫官之压制其民，上之压制其下，古来专制之祸，吾亦深恶之。然恶之而排去专制可也，恶之而并欲排去官民上下之制则不可也。人有病噎者，则当延医治噎，若困恶噎而先废食，宁非天下之大愚耶？吾恐噎终不治，而且身已先死矣。彼因恶专制，而并欲排及官民上下之制者，其何以异于是？虽然，彼倡之者，既怀挟此伟大之理想，则必思有以达此理想上之目的，吾人研究学理，不惮词费，请于均贫富之外，复一讨论此问题，可乎？

在中央书院求学时期，刘铸伯还学过古希腊史和古罗马史等课程，并且留意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这在其著述《社会主义平议》中有以下折射：“社会主义之说，本起于泰西，其渊源甚远。……考欧洲社会主义之起原（源），实起于上古。希腊古代之哲学家，如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已倡‘共产’之说，而基督教亦含有此种意义，其言曰‘求尔者，尔宜许之：贷尔者，尔勿吝之’，即其义也，然其旨趣，纯属诸道德范围，只有劝导而无干涉，与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不同，顾其根源已伏于此矣。”“西籍所记，若虚无党，若无政府，皆与社会主义有渊源。”“‘社会主义’一

名词，本起于中古，其初为经济学上用语，上古之谈共产主义、平等主义者，未尝有是名词也。厥后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者，悉以‘社会主义’名之。治兹学者，家标一说，人发一义，其学说乃愈推而愈广。”

而且，刘铸伯仔细研读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傅里叶（刘铸伯译作“富利埃”）的作品，他在《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写道：

惟曩者法国富利埃，尝以其理想而虚拟一共产团体，此团体由千五百人，乃至二千人之团员而成，相聚而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而其中仍有劳动、资本、技能三者之分，其盈余之所分配，劳动者得十二分之五，资本者得十二分之四，技能者得十二分之二，夫余之分配既有多寡，则岁月之所积，得赢余多者渐以富，得赢余寡者渐以贫，是贫富之阶级终不可免，固与均贫富之旨相背驰矣。且组织之法，有管理员役，有长官，有世界最高之官吏，是阶级之制，又依然存在，更与平阶级之旨相背驰矣。然富利埃之意，犹欲以是为模范，由一团而推之一国，由一国而推之一全世界。持是空想，竟欲举千古立国之法，而以其说易之，以是为模范，何异使人弃九华之宫，而退居于圭窦，乘百丈之舟，而藉杭（航）于一苇也？彼既知宫与舟之必不可弃，而乃舍广博而就卑狭，舍安乐而就危殆，是岂人之情也哉？既非人情，而欲全世界之人，皆来取法，吾又有以知其必不能也。



《莎士比亚》书影

中央书院在历史课程以外，还有文学、拉丁文、常识、数学、汉译英。参考其他文献，可知文学课讲授的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莎翁的作品风趣幽默，充满人生哲理，刘铸伯上这门课可谓获益不浅。1908年，刘铸伯创建孔圣会，次年在大坑孔圣义学开幕典礼上致贺词，他的“开场白”就极富英国式的风趣：“今日欣逢列位承邀弟到此学堂行开幕之盛典，曷胜感谢？！并蒙赠以高帽及银匙，为此盛典之纪念；现届暑天，高帽不合戴，而弟才德微薄，又不敢领受，银匙则受落为纪念，多多拜谢。”

英文课程汉译英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由1885年刘铸伯毕业时的两道考试题，可以看得出考试难度：

一、书曰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尧首以睦族示教也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以睦族为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本源则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体务使血脉相通而疴养相关周礼

本此意以教民著为六行曰孝曰友而继曰睦诚古今不易之常道也

二、父老子弟联为一体安乐忧患视同一家农商相资工贾相让则民与民和训练相习泛守相助则兵与兵和兵出力以卫民民务养其力民出财以赡兵兵务恤其财则兵与民交相和由是而箪食豆羹争端不起鼠牙雀角诉讼无因岂至结怨耗财废时失业甚且破产流离以身殉法而不悟也哉

这两道试题均无标点符号。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最早披露这两道试题，但他无法断定上述文字的具体出处，于是向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请教，后者认为，很可能是采自某教科书而非某某著名古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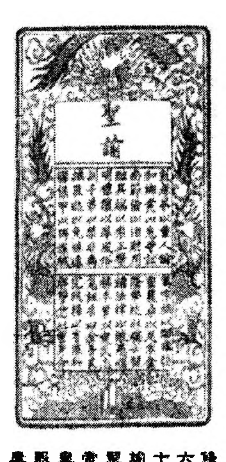
我们发现，这两道试题的确出自当时的"著名典籍"，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典籍"——第一道试题，节录自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初二日颁布的《圣谕广训》第二款"笃宗族以昭雍睦"：原文是"书曰：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是帝尧首以睦族示教也。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明人道必以睦族为重也。夫家之有宗族，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本源则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体，务使血脉相通而疴养相关。周礼本此意，以教民著为六行，曰孝曰友，而继曰睦，诚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我圣祖仁皇帝既谕尔等敦孝弟以重人伦，即继之曰笃宗族以昭雍睦。盖宗族由人伦而推雍睦，未昭即孝弟有所未尽，朕为尔兵民详训之，大抵宗族所以不笃者，或富者多吝而无解推之德，或贫者多求而生缺望之思，或以贵凌贱而势利汩其天亲，或以贱骄人而忿傲施于骨肉，或货财相竞不念袒免之情，或意见偶乖顿失宗亲之义，或偏听妻孥之浅识，或误中谗慝之虚词，因而诟谇倾排无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为宗族矣。尔兵民独不思子姓之众，皆出祖宗一人之身。奈何以一人之身份为子姓，遽相视为途人而不顾哉？昔张公艺九世同居，江州陈氏七百口共食，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勿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即单姓寒门，或有未逮，亦各随其力所能为以自笃其亲属。诚使一姓之中，秩然蔼然。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雍睦昭而孝弟之行愈敦，有司表为仁里，君子称为义门，天下推为望族，岂不美哉。若以小故而隳宗支，以微嫌而伤亲爱，以侮慢而违逊让之风，以偷薄而亏敦睦之谊，古道之不存，即为国典所不恕尔。兵民其交相劝励，共体祖宗慈爱之心，常切水木本源之念，将见亲睦之俗成于一乡一邑，雍和之气达于薄海内外，诸福咸臻，太平有象，胥在是矣，可不勖欤？"

第二道试题，则节录自《圣谕广训》第三款"和乡党以息争讼"："古者五族为党，五州为乡，睦姻任恤之教由来尚矣。顾乡党中生齿日繁，比闾相接，睚眦小失，狎昵微嫌，一或不诫，凌竞以起，遂至屈辱公庭，委身法吏。负者自觉无颜，胜者人皆侧目。以里巷之近而举动相猜，报复相寻，何以为安生业、长子孙之计哉？圣祖仁皇帝悯人心之好，竞思化理之贵淳，特布训于乡党曰：和所以息争讼于未萌也。朕欲咸和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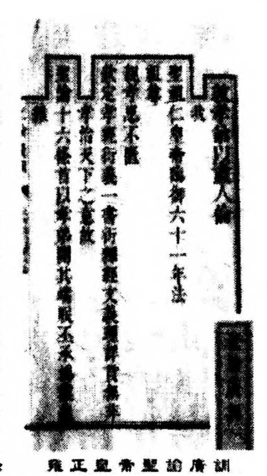
民，用是申告尔等以敦和之道焉。诗曰：民之失德，乾候以愆。言不和之渐，起于细微也。易讼之象曰：君子以作事谋始，言息讼贵绝其端也。是故人有亲疏，概接之以温厚；事无大小，皆处之以谦冲。毋恃富以侮贫，毋挟贵以凌贱，毋饰智以欺愚，毋倚强以凌弱，谈言可以解纷，施德不必望报。人有不及，当以情恕。非意相干，当以理遣。此既有包容之度，彼必生愧悔之心。一朝能忍，乡里称为善良，小忿不争，闾党推其长厚。乡党之和，其益大矣。古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缓急可恃者，莫如乡党。务使一乡之中父老子弟联为一体，安乐忧患，视同一家，农商相资，工贾相让，则民与民和。训练相习，泛守相助，则兵与兵和。兵出力以卫民，民务养其力，民出财以赡兵，兵务恤其财，则兵与民交相和。由是而箪食豆羹争端不起，鼠牙雀角速讼无因。岂至结怨耗财废时失业甚且破产流离，以身殉法而不悟也哉。若夫巨室耆年乡党之望，胶庠髦士乡党之英，宜以和辑之风为一方表率，而奸顽好事之徒，或诡计挑唆，或横行吓诈，或貌为洽比以煽诱，或假托公言而把持，有一于此，里閈靡宁，乡论不容，国法具在。尔兵民所当谨凛者也。夫天下者乡党之积也，尔等诚遵圣祖之懿训，尚亲睦之淳风，孝弟因此而益敦，宗族因此而益笃，里仁为美，比户可封，讼息人安，延及世世协和，遍于万邦，太和烝于宇宙，朕与尔兵民永是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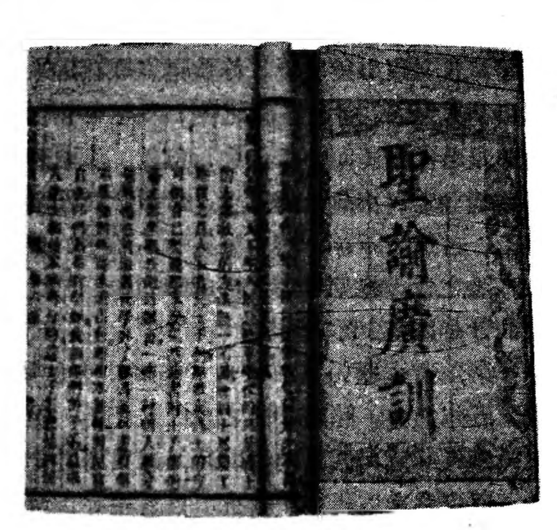
我们甚至由此联想到：1885年，中央书院考试官确定这两节文字为“汉译英”科目试题那会儿，手头上备有一册《圣谕广训》之外，还有一册英国传教士米怜翻译的《圣谕广训衍》。

《圣谕广训》是由清朝官方颁布，并运用国家权力广为刊行的官样书籍。它的内文，基本上分为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广训”两个架构。“圣谕十六条”乃摘录自康熙九年（1670年）所颁上谕，每条七字，结构工整，嘉庆本《新安县志》曾予收录（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而“广训”部分，则完成于雍正即位次年（1724年）。雍正自云，期望其子民“俾服诵圣训者，咸得晓然于圣祖牖民觉世之旨，勿徒视为条教、号



康熙皇帝聖諭十六條


雍正皇帝聖諭廣訓



《圣谕广训》书影

令之虚文”，因此就康熙“圣谕十六条”各条目，逐一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共创作了十六篇短文，及一篇序言。所谓“创作”，当然是一帮臣子的功劳。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作为这一经典论断的最好注脚就是，《广训》出现后，不仅被颁发于各地，清朝政府还一再发挥其政治力，命令及诱导官民阅读该书。《大清会典》记载：“雍正二年，御制《圣谕广训》万言，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暨教职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还要求士子凡求取科甲功名者，需熟读该书，无论县考、府考或科考，其中必有默写《圣谕广训》考试，非但不可有错，亦不得误写或添改。

不仅如此，《圣谕广训》同样受到西洋传教士的高度重视。

中国留美作家、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苏炜教授告诉笔者：前几年，耶鲁大学图书馆“卫三畏家族档案”（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发现了十多种有关清代《圣谕广训》的方言直解手抄本。卫三畏于1833年由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任至广州传教，1876年离开北京返回美国，他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身兼印刷工、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等数职，一生著述颇丰，1877年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也是美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



苏炜《走进耶鲁》书影

卫三畏1847年完成的《中国总论》（1848年初版，1885年修订版）一书，曾专辟章节对《圣谕广训》的文本性质、宣讲形式等条分缕析。他说：“由统治者印发的诸多训导百姓的文件中，最具影响的无过于《圣谕广训》，由米



米怜（1785—1822）、拉结（1783—1819）夫妇

怜博士翻译了这篇政治道德论文，而为英国所知”，“为了使《圣谕广训》做到家喻户晓，不许漏掉一人不知，制定法律要求全国地方官员于每月初一、十五在公众场合进行宣读，……虽然设想可嘉，但实际上除了大城镇之外并未得到重视”。在将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逐一译成英文并对雍正时期的《广训》做了基本引介之后，卫三畏还专门引用了米怜翻译的原由王又朴所作《圣谕广训衍》中的第七条“黜异端以崇正学”。

卫三畏提到的米怜博士（William Milne，1785—1822），1812年被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按立为牧师，同年偕同新婚妻子登船赴华，1813年7月4日抵澳门，他是继马礼逊之后第二位来华传教的宣教士，也是翻译《圣谕广训衍》第一人。《圣谕广训直解》的英译本则是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鲍康宁（F. W. Baller）于1892年翻译的，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此时刘铸伯已经毕业多年。

郭嵩焘1876年参观中央书院时发现，该校“课中国‘五经’‘四书’及时文者三堂，课洋文者一堂，洋人子弟课‘五经’‘四书’者一堂。课‘五经’‘四书’者，中国教习也，课洋文者，西洋教习也。其课诗文，则名为小课，皆限有期日”，感叹中央书院“规模固宏远矣”。估计1879年刘铸伯入学后的一段时间里，至少汉语教学内容没有大的变化。

1882年胡礼担任校长后，进行了一番课程改革，但由这两道“汉译英”试题，我们还可以大致推断，刘铸伯求学时应该是中英文兼修，反复精读了校内图书馆收藏的米怜中英文对照本《圣谕广训衍》、理雅各英汉合璧四书五经等。他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不仅来自大华民义学、西营盘冯富义学的私塾先生，还直接受惠于米怜、理雅各等英国汉学家不浅。

也就是这样，刘铸伯虽然学兼中西，但是能够做到允执厥中、不偏不倚，始终不渝地拥护儒家学说。譬如，他1909年在大坑孔圣义学开幕典礼上所致贺词说：“此学堂为‘孔教义学’，将必以孔圣伦理道德，教育一般之少年，可知诸君举办公益，善于择要，无任景仰。”继而话头一转，批评当时“兴西学、废儒学”的社会思潮：

查近年办学者，多以新学为根本，几视旧学为赘疣，不知旧学之中，自有诸多

好处包涵，盖孔圣伦理之学，最足以引正后学之心思，若举而弃之，必将中国数千年来历传之伦常道德，尽行泯灭，斯时必破坏大局，有家不成家、国不成国之惨象者。现当新旧交代之际，趁人心尚可挽救之时，诸君以孔圣之伦理学问，栽培后进，欲使人皆知有伦常道德之为范，免后辈目无尊长，混乱纲常，诚为中国人造无量之幸福，鄙人尤当愿为颂者也。夫新学不过步武他人，其有用之学固多，第不合于华俗者亦不少，故愿办学者只可将新旧之学分别优劣，择彼所长，补我所短斯可矣，不宜将旧学尽行禁弛也。且他人设学，靡不兼尊教门道理，盖欲免人心浇漓，世风日下耳，今日诸君有见及此，设学而兼以孔圣之道为德育，可谓知所从事矣，鄙人何吝一词以预贺乎？

中国的文化精英在五四运动中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之际，刘铸伯依然始终不渝地拥护儒家学说，陆续在香港创办了数十家“孔圣会义学”。这一举措并非逆潮流而动，恰恰表明了只有学贯中西，才能够做到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明不偏不倚、兼收并蓄。譬如，刘铸伯的“学弟”孙中山（1884年考入中央书院）在《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中也说：“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

1885年1月，中央书院举行毕业大考。刘铸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首位考获“史钊域奖学金”（Steward Scholarship）的优秀毕业生。

史钊域被誉为“香港公立教育之父”。自从1862年2月15日来到香港出任中央书院首任督院（校长），一直大力推动香港教育事业。1865年6月30日任香港教育司署首任首长。1879年任署理辅政司。1881年任警察裁判司。1883年任总登记官兼抚华道。1887年任辅政司兼核数总长。同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成立，史钊域出任香港西医书院首任院长。

1889年9月29日，史钊域在辅政司任内病逝，葬于香港坟场。香港圣约翰教堂里有一块彩绘玻璃就是为了纪念他而造。湾仔史钊域道（Stewart Road）和山顶十间（Stewart Terrace）也以他命名。



香港湾仔史钊域道路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占香港。皇仁书院于1941年底被逼停办，校舍初时成为日军总部，其后完全毁于战火，仅留下两尊大炮和中央书院第二任校长胡礼的半身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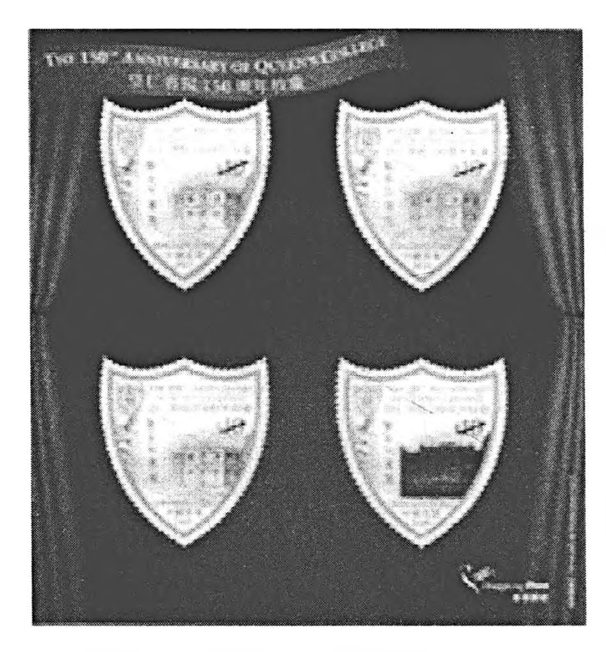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皇仁书院位于坚尼地道的临时校舍重开。1950年9月22日，位于铜锣湾邻近维多利亚公园的现址的校舍，由当时港督葛量洪揭幕，并于同日正式启用，沿用至今。1951年由于皇仁书院高中学位不足，皇仁书院四个班的初中毕业生被政府转送至英皇书院接受高中教育。

2012年，皇仁书院迎来150周年庆典，而在2010年10月，皇仁书院宣布将会在150周年校庆时发行纪念邮票。2011年9月，香港邮政公布发行“皇仁书院150周年校庆”邮票小型张，并首次采用盾形设计邮票，成为香港首套香港邮政官方为中学校庆发行的纪念邮票。

2012年3月9日，新华社发布《香港将发行“皇仁书院150周年校庆”邮票小型张》消息：

新华网香港3月9日电　香港邮政9日宣布，以“皇仁书院150周年校庆”为题的邮票小型张和小版张以及相关集邮品将于3月27日推出发售。

皇仁书院创立于1862年，是香港政府开办的第一所官立中学，也是本地最早开办师范教育的学府。多年来，该校人才辈出，其毕业生在不同领域各展所长，贡献社会。



“皇仁书院150周年校庆”邮票小版张

新华社消息称：邮票小型张以啡黄色为主调，营造怀旧效果。前景是荷李活道书院旧貌，背景则为高士威道目前的校舍，凸显该校走过历史悠久、诲人不倦的150年。右侧嵌有香港邮政首次推出的盾形邮票，取材自皇仁书院的校徽。另外，小版张嵌有四枚面值各十港元的邮票，分别以丝网闪粉墨、压印、亮漆和22 K镀金压印等不同方法印制。小型张的右下方印有皇仁书院的中文校训“勤有功”和拉丁文校训“LABOR OMNIA VINCIT”，阐明该校提倡的教育理念和求学之道。香港全线邮政局3月13日起发售正式首日封，每个售价一港元。

第三节　同学少年

早期的中央书院为中国的近代化培养、输送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大批人才。该校优秀毕业生，往往送到英国留学，何启（1859年—1914年）是其一，毕业后由史钊域校长推荐赴英国留学，人读其母校阿伯丁大学和林肯法律学院等学习。1882年回香港从事律师。1887年，何启为纪念英籍亡妻创办香港雅丽氏医院，并附设西医书院。1890年任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1895年参与筹划兴中会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在此前后，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改革维新。



何启爵士（1858—1914）

胡礼垣在中央书院读书的数年间有两大收获：一是他跨进了西洋文明的门槛，初步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基石；二是结识了同学何启，为19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何、胡合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现存六十卷本的《胡翼南先生全集》可以看出，胡礼垣在古文、诗词等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传统文化根基相当深厚。



胡礼垣（1847—19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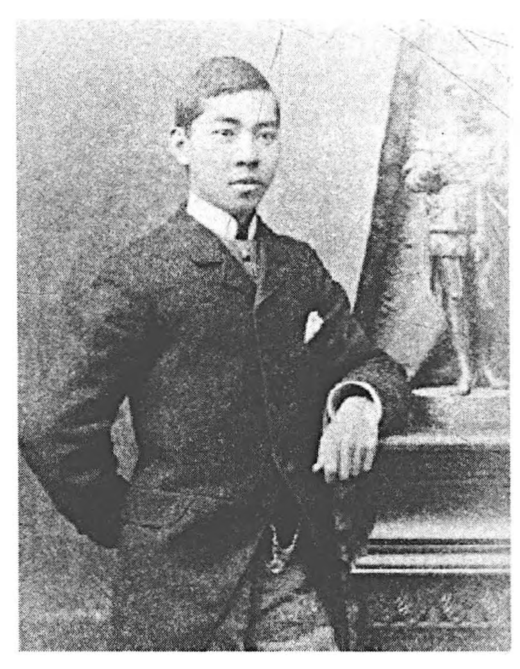
1870年，23岁的胡礼垣毕业。因学业成绩优异，留校任职，成为中央书院的中文教师。两年后辞职离校。此后，胡礼垣到父亲经营的航运公司兼职，并多次参加港府公务员考试，可惜均未被录取。胡礼垣还一度在清末著名变法思想家王韬经办的循环日报社工作，担任该报翻译，由此与王韬结识，成为知交。19世纪80年代，胡礼垣曾回到大陆，投奔广东老乡郑观应，担任上海电报局的翻译。任职期间，胡礼垣在工作之余，翻译了《万国电报通例》，为电报局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范式。

胡礼垣以著作闻世，是从《曾论书后》发表开始的。1887年2月，著名外交官曾纪泽在香港《德臣西报》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兜售其先军事后政治的治国理念。

胡礼垣准备著文反驳，校友何启却带着刚刚撰写完的英文批驳稿登门拜访，请求合作，他接受了邀请。6月，由何启起草，经胡礼垣翻译、加工润色的华文问世。这就是在海内外知识界、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又名《曾论书后》）。此后，他们合著的有《新政论议》《新政始基》《新政安行》等。1899年冬，胡礼垣又撰写了《新政变通》《前总序》，1900年冬撰写了《后总序》，全面系统地阐发了改良维新思想，并完成了编辑成册，整书发行的工作。1900年11月底12月初，《新政真诠》在香港出版发行，次年在上海印刷发行。时人对胡礼垣及《新政真诠》做了高度评价。《大公报》创始人、《新政真诠》上海版的策划者英敛之称道："全书之援古证今，旁讽曲喻，浩瀚数十万言，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掀翻跌宕，略无滞机。立言如此，足与日月争光，堪为中华生色矣。"

中央书院早期优秀学生不仅赴英国留学，赴美国留学的也大有人在，譬如，容闳的留美幼童周寿臣就是中央书院的学生。周寿臣1861年出生于香港岛黄竹坑新围，11岁便由父母送往中央书院，接受西方教育。由容闳倡议并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于1872年至1875年间，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以吸收西洋知识。由于内地风气未开，容闳只得来香港访寻学童。由于周寿臣在港已经接触西学，因此被容闳选为第三批大清留美幼童之一，同批被选中的还有唐绍仪（曾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梁如浩（交通大学创始人）、吴敬荣（曾任海军将领）等。

1874年，周寿臣等人到达美国并获安排进入温斯第小学（Winsted Local Grammer School）念书。一年后从温斯第小学毕业，并于同年9月入读菲立斯学院。留美幼童很快就融入当地社会，开始剪去辫子，部分幼童皈依基督教。这令当时清朝保守势力怒不可遏，并不断上书李鸿章，要求召回留美学童。虽然容闳力排众议，可是李鸿章仍然决定召回留美学童。对于当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菲立斯学院的周寿臣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周寿臣当时已得到美国著名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取录，准备入学。



周寿臣留学时期照片

1881年，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周寿臣只能无奈地放弃入学机会，回到中国，任朝鲜税务司助手，1903年任天津招商局总办、京奉铁路总办及清外交部大臣，官至二品。1905年7月，任唐山路矿学堂（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总办（校长）。辛亥革命后退隐香港，1907年起成为香港太平绅士。

周寿臣与刘铸伯关系密切，两人都担任

过香港洁净局局绅及香港定例局（后来的立法局）议员，热衷于公益事业，参加过香港大学募捐等。他虽然年长刘铸伯六岁，但是称刘铸伯为“我们尊敬的老前辈”。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周寿臣与刘铸伯等更是被公举为调停人，奔走游说于港府、资方与海员罢工代表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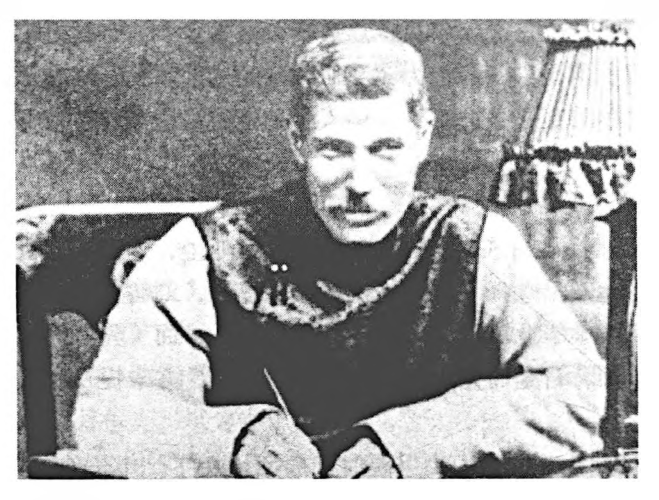
作为首位考获“史钊域奖学金”（Steward Scholarship）的优秀毕业生，刘铸伯有机会赴英国留学，但是由于家境贫寒，他及早选择了就业。一些文章里说，刘铸伯毕业不久“获资助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大学毕业后任山东烟台大学教授”，而《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说：“十七岁，毕业归，自是而先考遂献身社会中矣”，并未提及留学英伦、执教烟台之事。

1922年刘铸伯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关于求学中央书院时期的回忆文字。年长他5岁的香港著名买办、企业家、慈善家何东爵士（Robert HoTung Bosman），倒是有过片断回忆。1933年1月20日，71岁的何东爵士以校友身份在皇仁书院的毕业礼上发表演讲，曾经这样追述当年求学时期的生活：

> 六十年前（按：指1870年左右），皇仁书院原名为中央书院。位于今日庇理罗士女子中学的地点（按：这地点现为东华三院黄凤翎中学所在）。我在那里接受教育。当时的校长是史钊域博士，他后来成为本港的辅政司。我们上学的时间，夏季由上午六时至下午四时；冬季由上午六时半至下午四时，包括有早餐和午膳的时间在内，另外在上午十一时正，有十分钟的小息。
>
> 为了准时上学，我经常在早上四时半便起床了。我记得有些印度籍的朋友，他们惯常住在港岛的东区，须步行回校。因为在那时候，甚至没有人力车，更谈不到电车或汽车了，独有的交通工具便是山兜（肩舆）。然而，价钱方面，则非普通书馆学童所敢问津的。我们的学费，每月由五毫至一元。没有体育室，非但没有运动会的组织，连一般的体育练习，也从未受到鼓励。没有卫生科目，全部在校的时期，都是专心学习英文和中文。

何东（1862—1956）原名何启东，字晓生，生于香港，籍贯广东宝安（跟随母系），是香港开埠后的华人首富。何东的父亲是荷兰裔犹太人（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粤语音译何仕文），他母亲施娣是广东宝安人，所以何东本身是欧亚混血儿。童年时期的何东应该不会太快乐。因为混血儿一般会受到社会的排挤和歧视，精神及心理上会受到很大压力；兼之他父亲何仕文生意失败后不顾而去，令施氏母子等陷于经济困局之中，失去经济支持的施氏，曾经先后结识其他男子，与他们一起生活，因而给何东的生活添加烦恼。或者因为自幼遭受歧视，并在缺乏父爱和家境多变等颇为窘迫的环境下成长，何东自小便养成懂事而倔强、自信又自卑的复杂且矛盾的个性。

在中央书院求学时期，由于资质聪颖、勤奋好学，何东一直深得老师的器重。1874


何东爵士（1862—1956）

年2月，中央书院学期考试结束后，曾经举行一个颁奖仪式，并由港督坚尼地亲自主持，何东在第六级中获奖。据他回忆，当时中央书院的校长史钊域博士对学生关爱有加，令自己很受启发，获益良多。

1878年何东毕业于中央书院，年方16岁，加入香港怡和洋行中国部任职初级助理员，专责翻译。1882年升任怡和洋行属下香港火险公司经理及广东水险公司经理。1894年升任怡和洋行华总经理。1897年已经成为身家过百万的富豪，并于同年辞去怡和洋行华总经理，由其弟何福接任。1906年，何东向香港总督会同行政局申请获准在中环半山居住，成为首位在太平山山顶居住的华人。

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何东与刘铸伯、周寿臣一起参加了调停。“沙田惨案”发生后劳资双方（包括广东政府代表）重启谈判，身为航运业巨子的何东，为免令各方努力因为港府及资方拒绝“支付罢工期间一半工资”而令整个谈判付诸流水，主动提出折中方法，表示自己可以捐款支付该笔工资，并且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签订条约，由何东签字担保。

何东花园被特区政府列作暂定古迹建筑，现主人何勉君女士是何东爵士孙女（何世礼将军的女儿）。有学者说：何东花园是香港最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文物之一，是民间最具代表性的太平山地标，民间唯一见证了英国维多利亚殖民地时代、日治沦陷、香港重建、经济成长、主权回归的珍贵大宅，是民间有着跨世代最多历史名流居住或做客的大宅，是民间最富深厚意义的中西文化结晶的地标。罕为人知的是，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曾应中央书院毕业生何东之邀，到位于太平山山顶的何东花园做客。


坐落于香港太平山顶的何东花园全貌

英国现代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从20世纪初驰骋西方剧

坛迄今，一直作为戏剧家、评论家、小说家、演说家、散文家为人评说。有人把他比作伏尔泰，有人把作比作约翰逊博士、托马斯·哈代、乔纳森·斯威夫特，等等。1932年，H.W.莱文森（Nevinson）在《观察者》（*Spectator*）上撰文称："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能发现人们在为萧伯纳而展开激烈的争论……在每一块文明之地，我都曾听见'萧！萧！萧'的呼声。他的名声的确是世界性的。"莱文森的文章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对萧伯纳的接受和赞誉。德国的评论家称萧伯纳为德国舞台上的君王，他的剧作在德国的演出场次超过了德国著名的剧作家霍普特曼。在萧伯纳作品风靡世界各地的同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胡适等，也早在1915年就开始向国人介绍萧伯纳。



1933年2月12日，何东爵士（前左二）与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夫妇于自家花园，后左一为何东之子何世礼。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左二）与宋庆龄（左三）、鲁迅（右一）等摄于上海宋宅

1933年，萧伯纳乘英国"皇后号"大船周游世界，2月12日到香港，与太太旅游观光。应何东之邀，到他位于太平山山顶的何东花园做客。

萧伯纳2月17日到达上海，鲁迅应邀参加了宋庆龄女士为萧伯纳举行的一个小范围的欢迎午宴会。当时在座的还有蔡元培、宋庆龄、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等。鲁迅与萧伯纳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下午两点钟左右，鲁迅、蔡元培、杨杏佛陪同萧伯纳参加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文人、记者借萧伯纳中国之行的机会，大发宏论，很快就形成了"颂萧""倒萧"两大阵营。鲁迅以左翼文坛盟主的身份写了四五篇关于萧伯纳的宏文，瞿秋白则编译出版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

但是，从何东邀请萧伯纳到自己家中做客一事可以看出，何东、何世礼（1906年—

1998年，早年毕业于英国胡烈芝〔Woolrich〕皇家军事学院、勒希尔炮兵学校及法国方丁布鲁炮兵专门学校，民国二级陆军上将，1949年任联勤代总司令）父子均是萧伯纳的“拥趸”。我们不妨就此大胆推论：刘铸伯等中央书院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毕业生，求学时除了认真读过莎士比亚，他们还阅读过弥尔顿、彭斯、勃朗宁、雪莱、拜伦等经典作家的作品。

何东的弟弟何福，原名何启福，字泽生，籍贯广东宝安县，亦为中央书院毕业生，而且是刘铸伯的同学。毕业后做过怡和洋行、沙宣洋行买办，在商场长袖善舞、富甲一方，是当时的华商五巨头之一。与刘铸伯一样，何福也担任过定例局（立法局）议员，在1921年香港婢女制度存废之争过程中，刘铸伯、何泽生感到此事“关系于我华人之习惯及华人之体面”，他们以定例局（立法局）议员身份发出《通告》，邀请各界人士7月30日到太平戏院商议研究婢制问题。何泽生发言说，中国内地贫苦人家，如有儿女数口，扶养艰难，将一女卖与人为婢，胜过在家挨饥抵饿，也有将女卖去得回银两，借以做小生意救活一家数口，如果不卖女为婢，恐难免有将女儿溺死或揸死等弊端发生，主张保留婢女制度。杨少泉医生、王爱棠牧师等基督教人士主张废除婢制，发挥自由博爱之说，但大多数华人绅商主张继续维持婢制，只是要“研究维持之法”。这次辩论会，取得刘铸伯、何泽生等人预期的效果，刘铸伯不无得意地说：

> 自有定例局以来，华人议员，因政府立例，而在公众之地开大叙会者，此实为创举也。盖在三十年前，中国人对于公众事业，尚少注意，今则与前不同，盖今日程度已大增进，良堪贺喜矣！但自此次以后，如英国行何种则例，我两华人议员不力争，诸君尚敢骂我溺职否？

我们在这里顺便八卦一下，何福（何泽生）是澳门“赌王”何鸿燊的祖父。

何东的同父异母弟弟何甘棠（1866年—1950年），本名何启棠、字棣生，籍贯广东宝安县，同样就读于中央书院，与刘铸伯是同窗密友。

何甘棠毕业后，初进渣打洋行，经营保险、糖业等。后于内地各大商埠及澳门，东南亚市场遍设商号，经营金融、糖业、花纱、煤炭、杂货等。1911年辞去渣打洋行职务，1921年结束各地商号。

何甘棠热心社会教育慈善事业，积极为在港华人谋求正当利益，曾多次出资襄助学校和医院建设。1904年香港流行疫症，他与冯华川、刘铸伯等创办公立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疗。1906年，出任东华医院理事会主席，创立广华医院。历任太平局绅、保良局绅、团防局绅等职，极力为华人争取自治自理权。

香港有个著名的“梅夫人妇女会”，主楼位于中环花园道35号，由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夫人（Lady Helena May）倡建，并由当时一众慈善家刘铸伯、何东、何甘棠与英国犹太籍富商嘉道理捐赠。该建筑物于1914年兴建，1916年9月12日正式落成启用，主楼外形属维多利亚及爱德华古典复兴式的建筑形式，楼高三层，设有地库，有24个单人及双



何甘棠（1866—1950）



甘棠第的正门刻有中英文“KOM TONG HALL”“甘棠第”和“1914”字样，修葺后改为“孙中山纪念馆”。

人房，可为28人提供住宿服务，并设有图书馆（藏书超过25000册）、阅读室、课室等设施。妇女会初时只为单身的欧籍女性提供宿舍，但自1985年起，住宿的女性已无分任何国籍。1993年10月，建筑物主楼于被政府列为法定古迹。

何甘棠一生曾四次获得国民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1924年，英国圣约翰救伤总会授予爵位奖章及慈善银奖章。1928年，英国政府授予OBE勋章。他育有三子五女，其中较为著名者有四子何世威，曾在政府供职，担任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秘书等职。此外，三女何爱瑜是李小龙生母。据说：当年何甘棠在家中开台看戏，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是粤剧名伶，在甘棠第邂逅何甘棠的女儿何爱瑜，及后李海泉与何爱瑜移居美国，生下李振藩，后称“李小龙”。

甘棠第为何甘棠住宅，始建于1914年。何甘棠去世后，何氏家族于1960年将甘棠第售予郑氏家族，其后郑氏又转售教会。2002年，该教会拟将之清拆，于原址建立一座宗教暨教育中心。2004年，政府以港币五千三百万元向教会收购甘棠第，并耗资九千一百万元作修葺，设立孙中山纪念馆，介绍孙中山的生平事迹、革命活动与及其香港的关系。纪念馆于2006年底启用，时值孙中山140周年诞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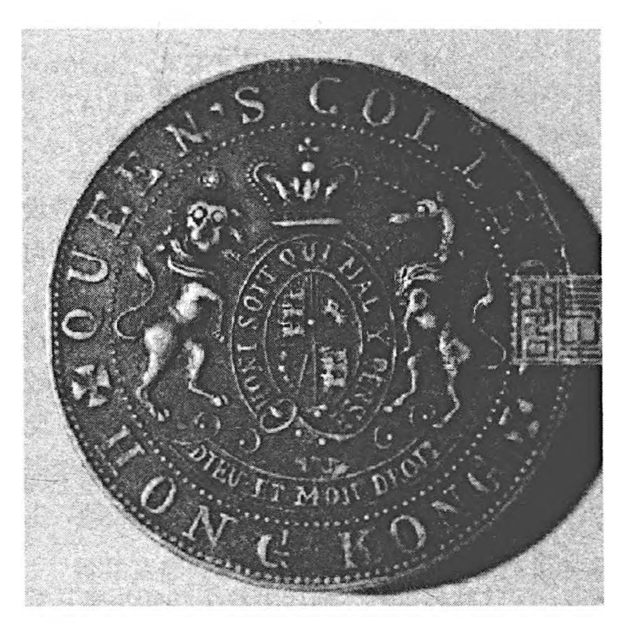
刘铸伯与何东、何福、何甘棠兄弟既是香港中央书院同窗密友，日后又是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何东曾经参加过平湖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开幕礼。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平湖父老有“刘铸伯父亲姓何”的说法。在消息闭塞的时代，任何一则传言、流言或谣言的背后，其实大多有着“臆想的真实”。



皇仁书院（中央书院）旧生会

中央书院学生毕业后，不仅有生意上的密切来往，还有“同窗联谊会”之类的组织。1921年，刘铸伯、何东、何甘棠、何福、陈启明、罗长肇、周少岐等与中央书院（皇仁书院）旧生聚首一堂，成立了“皇仁旧生会”，刘铸伯、何东答应出任该会的创会主席（1921年—1922年）、副主席，显示他们对皇仁书院的深情厚意。之后，由于刘铸伯去世，何东经常需奔走国内呼吁和平，主席一职才由金宝（George Grimble）接任。



香港皇仁书院毕业纪念章

此外，我们还找到了一张刘铸伯与何东、何甘棠、何福、陈启明、罗长肇的合影（见本书第五章）。这张照片里的罗长肇，也是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担任过怡和洋行买办，其妻施湘卿是何东家族成员。他的儿子罗文锦（1893—1959）1918年与何东长女何锦姿结婚。1921年，港府委任其为太平局绅。罗文锦是罗文锦家族的始创成员，担任过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

刘铸伯另一位密友周少岐，同样是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他毕业后锐意经营，先后创办保险公司、轮船公司、银号，还经营股票。1903年便被委为太平绅士，其后获为香港定例局议员，从他开始，周氏家族开始进入政界，其子孙都有在政经两界担当要务，是港澳两地无人不知的香港四大家族之一（其他家族为何东家族、利氏家族和李石朋家族）。

此外，周少岐热心社会公益，多次捐米粮赈济灾民，获清政府奖知府衔，晋援朝议

大夫。其后又两度获选为东华三院主席、香港大学堂董事等职务。1908年刘铸伯创建孔圣会，周少岐任孔圣会学校董事，并捐资创办少岐义学，资助平民子弟上学。20世纪20年代后，他将事业交接给儿子周埈年，逐渐退出商业帝国，专心从事社交和社会公益活动，为周氏家族带来巨大声誉。其子周埈年毕业于香港圣士提反书院，1911年至191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修读法律，1922年起获委任香港太平绅士，是香港20世纪初期著名企业家，1929年至1932年为香港洁净局局绅。1961年获得香港大学名誉法律博士学位、1938年获授大英帝司令勋章、1956年授封英国爵士。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刘铸伯唯一一次提到的中央书院同学，大概就是叶兰泉了。"鹤山信息网"对他的介绍是："叶兰泉（1868—1948），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古劳镇罗江村人，原名灏明，号瀚群。少时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出任海泊般鸟轮船办房，往来南洋、荷印、厦门等地。后驻印度尼西亚泗水埠办理糖务及任汉口分行买办等。任职达27年，救灾恤灾，不遗余力；后该商会又设'华商总会'，任司理18年。九一八事变后，与香港工业界倡组'中华厂商联会'，初任副主席，后为主席。香港沦陷时，所经营的工商业全部被毁，愤而入九龙庆佛堂，潜心钻研佛道。1945年，日寇投降，与鹤山同乡会同仁首先祝捷，并组织难民救济会，于港九设饭站14处，受救济达3万多人。"这则简介有诸多不确之处，如叶兰泉其实出生于1866年，"后该商会又设'华商总会'"一句，语焉不详。

刘铸伯与中央书院同学叶兰泉结为密友，或许因为两人有着共同的身世。1917年叶兰泉之母邵太夫人仙逝，安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2段36台东字。1918年农历四月初三日，时任香港定例局议员的刘铸伯、何福与香港清净局员现署定例局议员陈启明等联名拜撰《叶母邵太夫人墓表》，其中谈到叶兰泉之父叶亦宾为官清廉，卒于长沙任所，诰授清奉政大夫。

叶兰泉之父叶亦宾病逝于光绪元年（1875年），那时叶兰泉刚刚10岁，全靠母亲含辛茹苦，一手带大。刘铸伯等所作《叶母邵太夫人墓表》写道：

> ……未几，公患足疾，困顿床褥□□□，太夫人购药饵，供甘旨，服侍无倦容。及乙亥（1875年），公卒于长沙旅邸，太夫人恸哭擗踊，几绝。四月，偕诸子扶榇旋乡。
>
> 时太夫人年始三十有八。膝下子女六人，自十余岁至数岁，茕茕相依。太夫人含泪而乳，茹苦而哺，顾复提携，心力俱瘁。公服官清廉，宦囊羞涩，太夫人昼日再食，菽水仍甘，由是益加樽节而时虞不给。太夫人乃率二女，肆力女红，稍为资助，恒至夜深乃止。
>
> 诸子均在髫龄，太夫人不事姑息，悉使就外傅；暮归，一灯晄晄，伴读于侧。太夫人茹丸画荻，至夜分不暇，因此忧劳日深，遂染咯血之疾。然仍茹苦含辛，抚字诸子，严加训励，竭尽心力，以冀诸子成立。
>
> 迨诸子相继出外贸易，稍能自立者，皆赖太夫人陶成所致也。至是，家计稍

裕，而太夫人亦稍安。诸子由读书至婚嫁，各事悉自主之，亦可见其善持家政者矣。若戚里有称贷者，辄罄所有以与之，不少吝。

太夫人勇于应事，且有具识毅力，凡里族中有婚嫁事，必往助理，井井有条，无少紊。故人皆敬之，每事均向咨问焉。其生平绝有精心，凡一事之措置，虽间时久，稍思，素必获知其处。其心力有独过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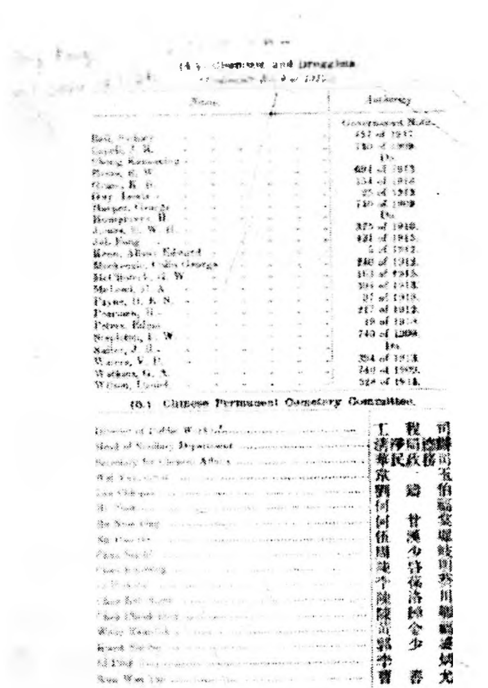
暮年，子有妇，妇有孙，皆遵太夫人之规则，门内肃然，绝无有嬉戏喧哗者。

太夫人享子孝养十数年，门户振兴，不失其旧。微太夫人之力，不及此。以丁酉年八月十一日卒，享寿六十有一岁。次子灏明授民国四等嘉禾章，赠二品夫人。所生子：翕明、灏明、令明、颋明；女二人，长适南海龙江蔡姓，次适绵村何族。其嗣子灏明君，号兰泉，与余等少小交游，数十年如一日。

因得稔闻其太夫人之淑德懿行，深恐泯没无闻，无以彰女德也，故特表而出之。

《墓表》里“其嗣子灏明君，号兰泉，与余等少小交游，数十年如一日”，说明叶兰泉与刘铸伯、何福、陈启明同为中央书院的同窗好友。

为了供养儿子读书，叶兰泉的寡母茹丸画荻，茹苦含辛，“肆力女红，稍为资助，恒至夜深乃止”。其实，这也正是刘铸伯的寡母供子读书的写实，诚如刘铸伯之子泣述、叶兰泉填讳《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所言：“先考生而岐嶷，性聪颖，甫七岁即慕学，以家贫无力就傅。……十二岁，先王父见背，家益贫，祖慈事女红，恒达旦不寐，始克具修脯。未几，兼习旁行文，益自刻苦，试亦恒冠其曹，获奖免费生；旋入皇仁书院，所学益大进，试辄获奖金，修脯衣履，皆有以自给，祖慈乃稍纾。”



Chinese Permanent Cemetery Committee.

刘铸伯是华人永久坟场的倡建者

香港史学会邓家笛编著的《香港华籍名人墓铭集（港岛篇）》，除了收录刘铸伯等撰写的《叶母邵太夫人墓表》之外，还附录了叶兰泉作于1923年的《叶氏坟场简志》：“旅港华侨向无永远坟场。岁甲寅，刘公铸伯联合各绅商请求政府，始有此坟场之设。余亦与于其事。比以粤局纷乱，因将本生先妣邵太夫人暨先兄少穆公、故弟若符、庶室陈氏迁葬于是，并预营寿穴，以为余与家人百岁之窀穸。庶几吾先母、兄弟亦不苦岑寂也。民国十有二年八月兰泉识，族人锡芬书。”

该书编者还说：“十九世纪末，叶氏与刘铸伯等港绅协合倡建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厥功甚伟，而叶氏一园由是造建，乃坟场内大型

氏族墓园之一，有墓茔十数。”这里提到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简称香港仔坟场，是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辖下的第一所成立的坟场，位于香港岛香港仔与田湾之间一带，总面积约为98542平方米，车路入口位于香港仔海旁道及石排湾道的东面交界处。



位于香港仔坟场“资”字号地段的蔡元培墓

辛亥革命后，刘铸伯、叶兰泉、伍汉墀、曹善允等华人绅商，要求港府拨出土地永久作华人坟场之用，以解决华人坟地不足的问题。1913年6月16日，港府批准在香港仔拨地一幅，用以兴建华人永远坟场，但要华人自行营办。在这种背景下，华人绅商在同年自行成立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以便监督坟场的兴建，作为华人永远坟场的倡建者，刘铸伯、叶兰泉、伍汉墀、曹善允等遂成为委员会创始委员。

1915年10月17日，坟场正式落成启用，是为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坟场落成后，委员会旋即邀请华民政务司出任委员会的当然主席，使委员会直接受到华民政务司署监管。

香港不少望族先人均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包括邓肇坚、冯秉芬、傅老榕以及周寿臣等。抗战期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因战乱未能安葬故里，也葬于此坟场“资”字号地段。

中央书院毕业生的一大特点是热爱公益事业，有鉴于此，曾经在新安县李朗（今属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传教的巴色会牧师欧德理说过：“中国人的公益精神，可从他们的行会与庙宇委员会等互助会议中表现出来。”刘铸伯一生从事了大量公益、慈善事业，以后各章将会陆续讲述。

第四节　淡水教习

19世纪60年代、70年代涌现的会说英语的香港华人精英，大部分都是在马礼逊学校、英华书院和圣保罗书院中接受教育的。而到了19世纪的后期，较多的精英则是在中央书院和拔萃男书院中接受教育的。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得风气之先，或从政，或经商，“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在中国政府为了应付西方科技带来的挑战而开办的许多学校中，有一批人才是从中央书院（皇仁书院）中招来的。这些学校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由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的那些学堂，以及广东黄埔水师学堂等，定期都有一批香港学生前去读书。大部分在政府学堂毕业的学生都为清政府工作，有些更当上了高官。

优秀学生从香港流失至中国大陆，引起了香港本地方面的批评。然而，香港总督宝云（George Ferguson Bowen）爵士觉得，香港虽然花费了金钱来教育男孩，而他们后来又为中国服务，但这种花费是值得的，因为这会培育出有利于英国的中国核心官员。姑且勿论这些精英是在中国接受英语教育，抑或在香港或国外接受英语教育，他们当中有些在毕业后到处活动。在香港受教育的一些人会往海外作传译员或商人，他们通常经一段时间后携款回港，用于支持按西方模式经营的工商业。其他一些则去当中国海关的职员，一般就这样做到退休或去世。

对于香港英文学校的学生离校后谋职的例子，他们的校长为此写过报告。施其乐《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引述了中央书院的一份报告：“1883年，180个学生离开了中央书院（皇仁书院），其中30人找到很好的工作职位：3人在律师行工作，3人任职于政府机关，2人在中国海关服务，22人在重要商号工作。据他统计。在1884 年和1890年间，中央书院有32个学生曾进入政府机关，150人进入欧籍人士开办的专业和商贸公司，89人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海关、医疗、外交或电报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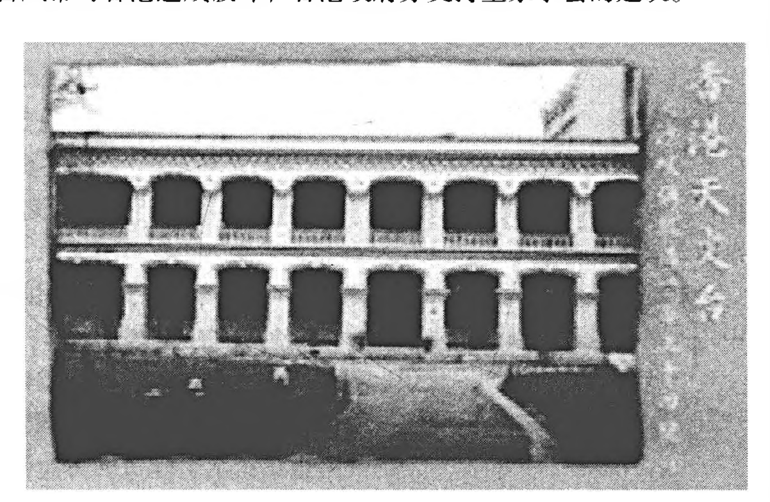
施其乐分析说：一般来讲，在香港班级里的高材生通常受聘为政府传译员、文员、书记或收账员。那些获任命为传译员的人最有可能最终达到最高的地位。能够担任传译员这个职务，表明他们说英语的能力或许是同学中的翘楚。在律师行里当上文员，则是另一条通向高位的道路。至于其他学生，若其家庭与洋行的买办部门有联系，则可以当上助理买办之职，开始向上爬升，这样就绕过了政府公务员这个作为踏脚石的梯级。

1885年1月，刘铸伯毕业于中央书院，成为该校首位“史钊域奖学金”获得者。在

老校长史钊域、新校长胡礼的极力推荐之下，他毕业后被香港天文台台长杜伯克博士（Dr.Doberck）聘任为翻译。《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一文则说，他毕业后“考得天文台书记”。

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后，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适合研究台风等气象，1879年英国皇家学会建议在香港设立气象观测台。当时在东亚，只有上海徐家汇、马尼拉、北京及荷属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四处有专业的气象观测台。前两者是由耶稣会修士运作，而香港正好位于二者之间。由于台风常对香港造成破坏，香港政府亦支持皇家学会的建议。

1883年夏季，香港天文台正式创办，杜伯克博士任天文台首任天文司。天文台坐落在尖沙咀的一个小山头上，它最初的职责包括：授时、气象、磁场及水文观察，与天文毫无关系，可是当时负责翻译的华人却错译为“天文台”，一直沿用至今。1912年，英皇乔治五世对香港天文台颁赐皇家香港天文台（Royal Observatory）的称号，直至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为止。天文台道亦因香港天文台的建造而得名。



香港天文台

刘铸伯在香港天文台工作三年，受到良好的行政训练。1888年开始，离开天文台经商，据说做茶叶生意赚了一大笔钱；同年，应台湾巡抚刘铭传邀请，担任淡水西学堂教员（后任总教员）兼洋务委员。

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在家中排行第六，因为脸上凹凸不平，被称为六麻子、刘麻子或刘六麻子。安徽合肥西乡人（今肥西县铭传乡），是中国清朝末期的一位将军和大臣，是淮军重要将领，台湾省首任巡抚。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以福建巡抚身份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到台后积极整备岸防，曾一度击退登陆基隆的法军；后坐镇台北府城，由于沪尾之役湘军孙开华等部挫败了法军攻占台北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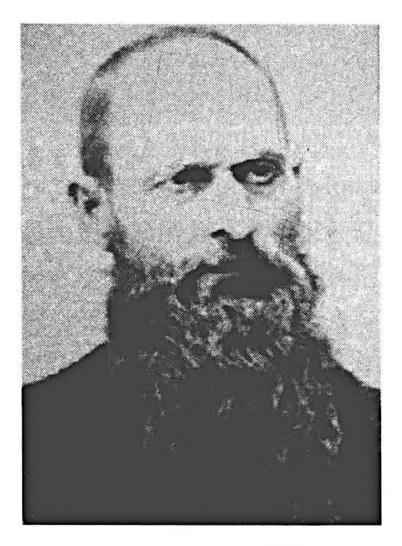

刘铭传（1836—1896），台湾省首任巡抚

动，加之基隆疫病流行，终使法军放弃攻占台湾的计划，撤往澎湖。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决定将原来隶属福建省的台湾改设行省。刘铭传受命为首任台湾巡抚，在任期间（1885年—1891年），他不辞劳怨，刚毅果断，以“办极大极难之事，必须有愈久愈坚之心”的信念，呕心沥血，力疾从公，实施他的“台湾近代产业开发计划”，把自己多年来“变法图强”的夙愿付诸实践，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重防务，严吏治，清财政，设电报，筑铁路，购轮船，通邮船，辟商场，制军器，振工艺，设学堂，“凡百新政，次第举行”。

史家称誉刘铭传为“台湾近代化之父”。他对台湾建设的规划，原以军事为先，除希望在岛上建立战时可以自给的军工产业外，同时亟陈在台湾建立海军力量的迫切性；但受限于财政条件，只能先从兴利的近代化实业及增加税收两处着手。除建设多处炮台、兵工厂等现代化军备外，他同时推行多项基础建设，包括铺设最初的台湾铁路（初期仅大稻埕到锡口段完工通车）、福州和沪尾（今新北市淡水区）间的海底电缆，办理电报、煤务、邮务等。

刘铭传在任上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在台湾各地开办了几十所书院、义学、官塾，其中一大举措是创设新式学堂。



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1844年—1901），理学堂大书院创办人

最早在台湾创办新式学堂的当属加拿大传教士马偕博士。1872年到1880年间，马偕以露天教育方式，于路边榕树下、溪边、海边传教，因感于创校之重要，便于光绪六年（1880年）返回加拿大度假之际，于故乡牛津郡募款美金6215元。马偕博士返台后，择定在淡水炮台埔红毛城东北边兴建此书院并由泥匠洪泉施做。“洪泉”或“洪泉司”，为淡水甚出名的泥水匠，一般称为“泉仔师”，其徒弟后来都是北部洋式建筑的师傅。他由厦门购入砖瓦，亲自绘图设计并监工，此校于1882年落成，当时取名“理学堂大书院”，英文名字为（Oxford College牛津学堂），是台湾第一间西学学堂。马偕为了纪念故乡人的支持，乃以故乡牛津郡来为该校命名，以示饮水思源之意。

湖南善化人唐赞衮，清光绪十七年调署台澎道，旋补台南府；迄二十一年正月，去任。他的《台阳见闻录》作于十七年，卷上分建置（疆域附）、通商、洋务、田赋、盐政、筹饷、刑政、政事、水利等九目，卷下分文教、防务（海防附）、山水、胜景、人物、庙宇（城池附）、器用、衣服、风俗、时令、食物、天文、谷米、竹木、蔬菜、花卉、果品、草部、鳞介、兽类、禽鸟、虫类、番部等二十三目，巨细包罗，颇有参考价值。“英义塾”条谈到马偕创办“理学堂大书院”一事：

光绪八年八月，英国教士偕士里（马偕），仿照中国义塾，延师在沪尾开设学堂，延中国之师，教中国之书；不可谓非义举。特是教学与游艺不同，此端一开，诚恐逐渐推广，将来该子弟等文字、科名，势必沿溯渊源，致歧趋向。且以中土之童，蒙费外人之培植，官斯土者，心甚歉然。商将所延塾师岁修百元，由台北府支还。每年遇有甄别，会同领事酌给奖赏，用存体制，而杜流弊。



理学堂大书院老照片

唐赞衮这里说的英国传教士马偕在台湾开办义学，“中土之童，蒙费外人之培植，官斯土者，心甚歉然”。最感到“心甚歉然”的，恐怕就是台湾巡抚刘铭传了。

1887年3月，刘铭传兴办了一座“西学堂”，延聘英国传教士布茂林担任英文教习。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初四日，刘铭传上台湾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折，认为：中国和外国通商，应互准学习研究对方的学术和技艺。自从京师同文馆选拔招收满汉子弟，聘请外国人作教师以来，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等地，凡是仿造枪炮、轮船、机械的地方，没有不兼设学堂的，风气一天天地打开了，人才也就一批批地涌现出来。不管是海防建设，还是办理洋务，依赖这些人收到的效益，确实是很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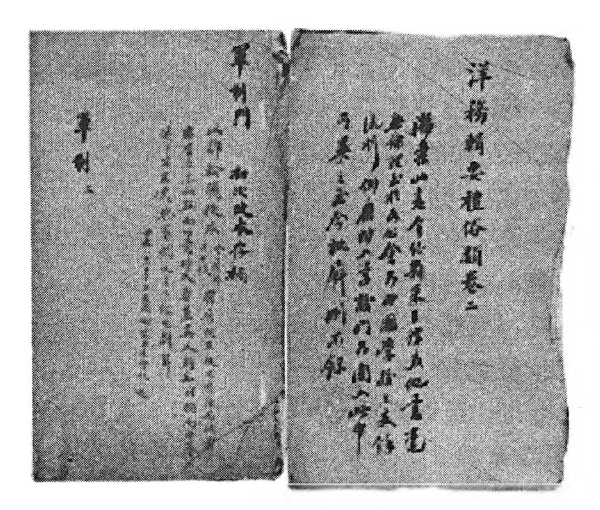
台湾为海疆冲要之区，通商筹防，动关交涉。只以一隅孤陋，各国语言文字，辄未知所讲求。臣初到台，翻译取才内地，重洋遥隔，要挟多端，月薪至百余金，尚非精通西学。因思聘延教习，就地育才，初拟官绅捐集微资，造就一二良才，以资任用，讵一时闻风兴起，胶庠俊秀，接踵而来，不得不开设学堂，以广朝廷教育人才之意。先后甄录年轻质美之士二十余人，延订英国人布茂林为教习，生童酌给膏火，厘定课程，并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余闲，兼课中国经史文字，即使内外通贯，亦以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致堕偏陂。日以巳、午、未、申四时，专心西学，早晚则由汉教习督课国文。遇西国星期，课试论策。每季委员会同洋教习考校一次，别其差等，分行奖戒。或有不堪造就者，随时撤退补更。计自光绪十三年三月起，迄今已逾一年，规模初立。

刘铭传还说，自己对他们所学的语言文字加以考察，确实都很有成效，准备逐渐增

设图算、测量、制造等课程，希望学生们能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一天比一天学识更丰富，将来成为有大用的人才。到那时，台湾地区现在兴办的机器制造、煤矿、铁路，也就不发愁没有可以任用的人选了。本年又添了学生十余名。现在计有外国教习一人，每月需支付工薪洋币三百五十元；中国教师二人，每月各需支付工薪洋币五十元；共合库银三百二十四两。学生们如果是由附生身分考入的，每月发给生活费八两银子，如果是由一般学生身分考入的，每月发给生活费五两七钱银子。年纪小的幼童学生，每月发给生活费三两八钱银子。至于每个学生使用的桌椅、床具，以及随时应用的外国图书等都需要经费。根据实际情况开支，大约教师薪金、学生生活费，以及其他杂项每年需要七千多两银子。现在先从盐务收入的项目下动用支取。将来需要建造学堂，用来解决师生的学习和住宿的地方，应用经费的情况，等将来竣工之后，再造详细清单报销。

光绪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刘铭传奉到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1888年，刘铸伯应台湾巡抚刘铭传邀请，担任淡水西学堂教员，与先期到达的英文教习布茂林有关。布茂林曾经应邀与王韬、叶瀚、傅兰雅等编译《洋务辑要》一书，选择西书，分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十二门。而王韬则是1881年中央书院大考的考试官之一，刘铸伯在这次大考中，中英文俱佳，脱颖而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经过辗转推荐，刘铸伯应台湾巡抚刘铭传邀请，担任淡水西学堂教员。





《洋务辑要》稿本

刘铭传在台湾创办的这所“西学堂”，开设英文、法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等课程。唐赞衮在其《台阳见闻录》一书“西学堂”条也记了一笔：

西学堂在台北，向设定额学生二十名，现加候补四名。凡经考定补入者，每名月给膏火洋四圆，并挑令在堂肄业日久之学生，作为教习。俟有正额缺出，再行推补。

窃惟中外通商，准彼此学习文艺。京师设立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人教授；而天津、上海、福建、广东等处，凡有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开，人才蔚起。海防洋务，利赖良多。



刘铸伯执教过的台湾淡水西学堂旧址

台湾为海疆冲要之区，通商筹防，□□皆关交涉。只以一隅孤陋，各国语言文字辄未知所讲求。初因翻译取材内地，重洋遥隔，往往要挟多端，月薪率至百余金，尚非精通西学者。因思聘延教习，就地育才。初拟官绅捐集微资，造就一二聪颖子弟，以资任用。讵一时闻风兴起，庠序俊秀接踵而来，情殷入学，不得不为开设学堂，以广朝廷教育人才之意。先后甄录年轻、质美之士十余，延订英国人布茂林为之教习生童。酌给膏伙，厘定课程，并派汉教习二人，于西学闲暇时，兼课中国经史文字；既使内外通贯，亦娴其礼法，不致尽蹈外洋习气。日以巳午未申四时，专心西学，早晚则由汉教习督课；遇西国礼拜日，课试策论。每届三个月，委员会同洋教习考校一次；第其优劣，分别奖励、戒饬。有不堪造就者，随时撤退。计自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起，迄今已逾一年，规模粗立。尝亲加查察，所习语言文字，均有成效。拟渐进以图算、测量、制造之学，冀各学生砥砺研磨，日臻有用。而台地现办机器、制造、煤矿、铁路，将来亦不患任使无才。

唐赞衮的这节文字，与刘铭传所上《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折》大同小异，免不了“公文改头换面充著述”之讥，但也可以从中看到，唐赞衮对刘铭传创建“西学堂”之举由衷地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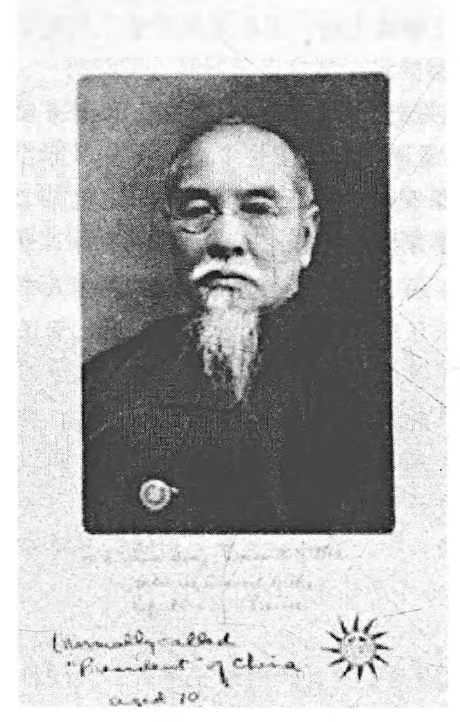
刘铭传创办台湾西学堂，开创了台湾近代科技教育的先河。据连横《台湾通史·教育志》记载：“光绪十一年，刘铭传任巡抚，析疆置吏，增设学额。……当是时，百事俱兴，农工路矿次第举办，而多借才异国。铭传乃为树人之计，十二年，先设电报学堂于大稻埕，以习其艺。十六年，又设西学堂于城内，聘西人为教习，择全台聪慧之子弟而教之，课以英、法之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之学。又以中国教习四名，分课汉文及各课程。学生皆给官费，每年约用一万余两。成效大著。台湾教育为之一新。”



台湾铭传大学

台湾西学堂创办之际，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林森（1868—1943），时在福州英华书院求学，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怀揣着青春的梦想，欣然渡海，前往台湾西学堂求学三年。

刘铸伯在西学堂期间，先是担任教习，后任总教习兼洋务委员，积累了丰富的行政、教学经验。这些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为台湾经济建设输送了人才，同时也促进了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国民党元老林森（1868—1943）亲笔题字照片

1890年，林森从西学堂毕业后，又考进当年新设立的台北电报学堂。次年被分派到台北电报总局工作。按理说，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与刘铸伯还有一份难得的师徒之谊。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期间，大力兴办和整顿各种实业。为了促进台湾的对外贸易，他聘请学兼中西且富有行政、经商经验的刘铸伯担任洋务委员。

基隆煤矿是我国近代较早使用机器生产的煤矿，中法战争期间，被迫自毁停产。刘铭传在着手恢复筹建过程中做了多次探索，先立足商办，后采取官商合办，但因客观原因，最终决定引进外资办矿。他委托刘铸伯与英商谈判，并草签了合同，计划将煤矿交由英商洋行承办，但被清廷否决。

1890年，刘铭传同意几位商人以“官商合办”方式承办基隆煤矿的要求，并应允“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这样一些锐意改革的方案，被后世史家誉为“近代中国最早引进外资建立经济特区”思想萌芽。

为了促进台湾的贸易，刘铭传在台北特设商务局，同年又在新加坡设分支机构招商局（通商局），招募华侨商股，并将所募股金定购10艘轮船，成立了轮船公司，与外国商轮展开竞争。据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志》记载：

天津之约，许开台湾互市。英、美、法、德相继而来，派领事、划租界、设商行、建栈房。轮船出入，次第渐兴，而交涉亦愈繁。咸丰九年，设通商总局于道署，由道办之。置提调官二员、委员四员、翻译官二员、稿案书二名、清书二名，以理租界商务、保护游历、领事往来、教堂传教以及华洋互讼之事。沪尾、鸡笼、安平、旗后各设分局，驻委员。光绪十三年（1887年），藩署亦设通商总局，归布政使，而台南仍归道。当是时，贸易虽少，而递年增加。洎光绪十九年，竟至一千一百十七万余两，可谓盛矣。盖自刘铭传巡抚以来，垦田治产，茶脑大兴，运至欧美各埠。居民既多，几至三百万人，所需洋货亦盛。出入足以相抵，且有溢过。故能百事俱举，民户殷庶。使长此以往，台湾之富未可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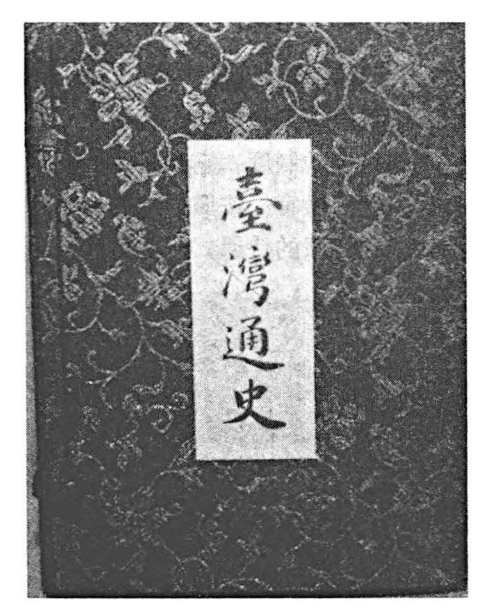
……

当是时，省会初建，冠盖云集，江浙闽粤之人，多来贸易。而糖、脑、茶、金，出产日盛，收厘愈多。其后遂改招商局为通商总局，以董其事，而台湾商务乃日进矣。



清季台湾洋务史料（台湾历史文献丛刊）

刘铭传行伍出身，性格豁达，不屑于清朝官场的阿谀奉迎、蝇营狗苟之风。他写诗说“为嫌仕官无胆肝，不受逢迎受折磨”，表明他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他在台湾的所作所为，“政府颇多掣肘，上论又讥其过激”。他效法西方、锐意改革、兴办洋务的一系列举措，尤为京师顽固派所不容。在朝议之中，屡遭词臣群相攻讦，正如连横所说“内外臣工多所妒忌，而台湾绅士亦肆为蜚语”，结果，受到朝廷冷遇。



连横《台湾通史》书影

1890年，刘铭传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与外商的交涉，以及基隆煤矿招商承办、引进外资，与外商共同开采基隆煤矿，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和清廷的严旨申饬，受到革职留任处分，忧病交加，被迫向朝廷提出辞呈。同年，刘铸伯也离开了宝岛台湾。

刘铸伯在台湾西学堂执教期间，还造访了马偕创办的“理学堂大书院”，对于马偕

从故乡募集经费前来台湾办学，深表敬佩。马偕募集经费办学的模式，为刘铸伯后来募集资金创办育才书社、孔圣会义学、东华义学等，提供了经验。

作为一个眼界开阔的封疆大吏，刘铭传创办台湾西学堂的目的，是“因思聘延教习，就地育才”，建设海防，办理洋务。若干年后，刘铸伯与嘉道理等创办“育才书社”，募集办学资金，在香港、广州、上海免费开设几所育才书社（学校）——“育才书社”这个名字，也许可以追溯到他担任淡水台湾西学堂总教习的岁月，甚至于可以追溯到刘铭传奏折里“就地育才”四个大字。

关于刘铸伯在台湾的业绩，《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有以下记载：

> 顾先考虽生长香港，自学成后，固未尝一日忘祖国。有清戊子，应台湾巡抚刘中丞之聘，任淡水西学堂教员，兼洋务委员。勤敏英轩，克称厥职，刘中丞称之。越二年，洊充总教员，未几以费绌辍办，乃返港。

《行述》又说：“先考素性恬淡，徒以荣亲故，纳票得同知，寻以刘中丞奏保加知府衔，赏戴蓝翎。”可知刘铸伯在台湾曾经出钱捐得一个六品的同知官衔，后因“勤敏英轩，克称厥职”，后由刘铭传奏保加知府衔，四品官阶。清人昭槤《啸亭续录·花翎蓝翎定制》记载：“凡领侍卫府员、护军营、前锋营、火器营、銮仪卫满员五品以上者，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鹖羽蓝翎，以为辨别。”

“捐官”又称捐纳，是指绅商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捐纳制度在清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按照捐纳制度，绅商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获得捐封典、捐虚衔以及穿官服的待遇。所有这些，当然属于“政府”行为，且收入都归国库，至于卖官鬻爵的“个体经营”，在此暂且不论。

对于“捐官”这一清季官场风尚，鲁迅《各种捐班》不无揶揄地写道：“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作‘捐班’的便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粒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满口官话……”至于刘铸伯“捐官”一事，《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有言“徒以荣亲故”，也就是说，他捐资纳粟获得这番“功名”，只是为了讨寡母伍氏的欢欣。

刘富宗等撰《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第二章　吾土吾民

香港隶英版图，而我华人之侨居于是者，凡数十万，故政治之良楛，咸我华侨身受之。中西政俗互异，港吏以为善音，我华侨或不乐受，先考深有见于此，即慨然思有以自效。自毕业后，浮沉于士商者十年，而学行言论，已翘然异于众，中西人士咸倚重之，每遇艰巨，皆引先考为助；前后历任地方要职以数十计，靡不竭其心力所能至，务使人蒙其福而后即安。……在局同人，皆仰之如泰斗，遇疑难事，咸乐就商榷，先考靡不竭诚相告，有不协者面折之，友邦人士咸敬惮焉。

——刘富宗等《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屈臣氏大药房的招贴广告

1906年6月4日至8日，《香港华字日报》连载《刘君铸伯致洁净局论办疫书译录》

第一节　香江买办（上）

1890年初，台湾淡水西学堂因经费不敷而结束，刘铸伯绝意仕进（此时，他已由刘铭传奏保加知府衔，赏戴蓝翎，属于四品），回到香港，再次投身商界，经营茶叶生意，旋即成为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

"屈臣氏大药房"的出现，与西风东渐、传教士施医传教密切相关。广东一地，虽然有黄中璜药店、保滋堂药店、马百良药店、广芝馆、集兰馆、刘贻斋等老字号药店，以及众多国手，但是无法解决劳苦民众的病痛，这就为西学东渐后，传教士施医传教创造了条件。

大约在1828年，有一位叫A.S.Watson的英国人在广州开了一家西药房，取名"广东大药房"，以为贫苦大众施药著称于世。鸦片战争结束后，这个药房向香港政府注册，于1842年迁到香港，注册使用Watson＆Co.A.S，并用广东方言将公司名译为"屈臣氏大药房"，这是"屈臣氏"名称的由来。直到1871年，屈臣氏大药房才成为正式的商业品牌。

大概在1886年，屈臣氏大药房进行改组，成为公众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年该公司在上海南京路设立分号，以后又相继在汉口、天津、福州、厦门等城市设立分号或代理处，除了经营西药外，还配制经销中成药丸散膏丹以及中西医结合的各种药品。

1884年孙中山考入中央书院，1886年肄业，同年秋入读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西医书院。1887年9月，孙中山从广州重返香港，到寓于雅丽氏医院内的西医书院报名入学，发觉该院就在港岛荷李活道与鸭巴甸街交界处，已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College）的中央书院新校舍就在斜对面，步行到原来的中央书院也只需要一分钟。由于成绩相当优异，1888年孙中山曾获颁屈臣氏奖学金。

买办商人是西风东渐的产物。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并撤销"行商"制，允许外商洋行任便与华商交易和自由雇佣买办。由于外商初到新开的中国口岸，语言不通，不了解商业行情和交易方式，兼之民众对洋人的仇视和反抗，他们难以建立自己的稳固据点，因而不得不找当地的中国商人充任洋行与华商之间的中间人。于是买办阶层便应运而生了。

而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中央书院毕业生大部分成为出色的买办商人。据美国学者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一书记载："一个买办通常得到


孙中山（1866—1925）

一笔固定的薪水，作为其服务和维持一个买办向的报酬，其年薪通常为600两到2000两不等，平均为1000两。1878年，一个普通买办月薪可得40两，而19世纪末一个银行买办的平均年薪为1200两。”

郝延平说：有利可图的买办职位并不是每一个中国商人都能企求的，他们必须是一个以自己名义经商或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洋行保持着联系的著名商人，因为买办雇用常常是外国合伙人主动寻找的。在19世纪90年代招聘买办的方法改变以前，很少有中国商人直接向洋行申请买办的职位。在被雇用为买办之前，他们必须具备某些特殊的条件，并能满足某些正常的要求。

刘铸伯被屈臣氏大药房聘为总买办，实在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央书院的六年训练，使他熟稔英语与西洋习俗，与洋人打交道绰绰有余；关于拓展业务方面的能力，他在台湾已经小试身手，而且曾经在香港经营茶叶生意致富。至于外国洋行对于买办特别关注的“可信程度”，刘铸伯中央书院师长、同窗均可以具名担保；兼之他有知府头衔，属于清朝的四品官，人脉关系广泛。

按照行规，刘铸伯被屈臣氏大药房聘为总买办时，双方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确定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他的职责主要是代表屈臣氏大药房执行购销任务，并在执行任务时负责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以及担保华商的信用等。

与此同时，刘铸伯大力拓展屈臣氏大药房的各项业务。为此，他拉来自己中央书院同窗好友叶兰泉，加盟屈臣氏大药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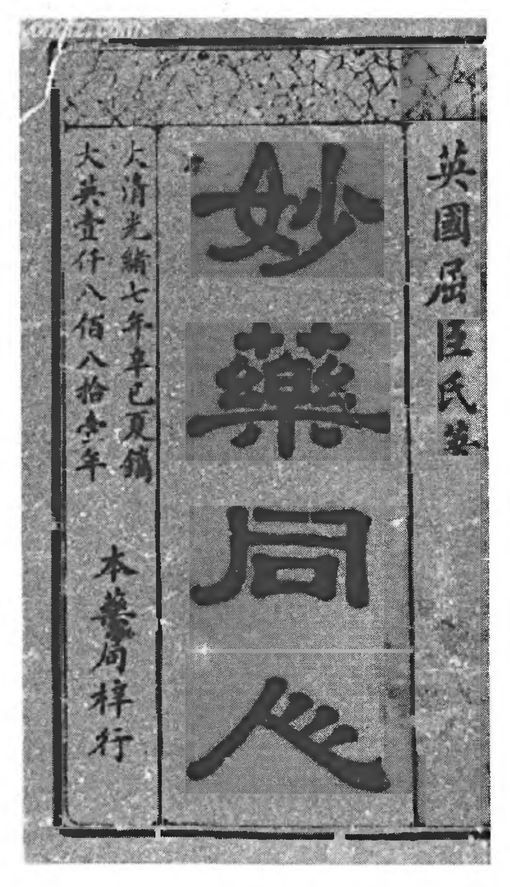
叶兰泉（1868—1946），原名灏明，号瀚群，原籍广东鹤山。叶少时就读皇仁书院，毕业后任海泊般乌轮船办房，往来南洋、荷属印度尼西亚、厦门等地。后受聘于何东，驻印度尼西亚泗水办理糖务。刘铸伯担任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后，屈臣氏公司聘任叶兰泉为该公司汉口分行买办。屈臣氏大药房卖的药五花八门，包括：“脱鸡眼药水”“光鲜嫩面水”“涂面花露水”“玫瑰甘水”等，以及各种治疗花柳病毒、宁神安眠、内外痔、牙痛耳聋、男女诸症的药水、药饼、药膏、药酒，应有尽有。但其主打产品是“戒烟精粉”，《循环日报》的一则广告这样写道：

> 屈臣氏大药房采选妙药精制各项膏丹散，另有泰西各种奇巧制药器皿、玩器、杂物发售。洋人在中华卖药者固以本药房为始创第一家，即中华向洋人购药者亦以本药房为最驰名，所制之戒烟精粉风行各省外埠，迭蒙列位大学士督宪抚宪各大人分验着效，陆续赏赐匾额，前经布告，谅邀洞鉴。

“戒烟精粉”药效妙用究竟如何？1881年印刷的《妙药同人》（英国屈臣氏著），该书“谨将本局所制屡验膏丹、丸散、药油、药水、酒药、冰药饼等项功用价银详列于后，以便仕商赐顾采择焉”。其中有《戒烟精粉功用说》一文，略谓：“戒烟精粉者，乃本局独得秘法，不惜工本，务期克制洋烟之瘾，无碍吸烟之人，令其自然而然戒断，永无后患，与别家所售戒烟诸药，迥不相同，历蒙中国列位大人奖誉，幸已京省驰名矣。惟近日妒忌者布散谣言，似谓服此戒烟虽断瘾而难保无虞等语，则大负本局立心与中国除害之意，况且服此不独断瘾，兼可令人健饭，身体日壮，请看卷首容君缉熙《辩惑论》，自当了然，幸勿为浮言所阻，致误有志戒烟者之大机会也，于本局实为厚望焉。”戒烟精粉当时的定价是每包价银七分二厘。

两次鸦片战争均以失败告终，清政府丧权辱国，创深痛巨，赔偿巨款，割地香港九龙，鸦片流入城乡，泛滥成灾，百姓深受荼毒，官家手足失措。就在这时，屈臣氏大药房居然研制出“戒烟精粉”这一灵丹妙药，“务期克制洋烟之瘾”，并且“无碍吸烟之人，令其自然而然戒断，永无后患”。封疆大吏得知这一消息，对屈臣氏的这一药物发明，无不褒奖有加。

这本《妙药同人》并非“药学宝典”，而是一册彻头彻尾的药物广告，它的特色之一是大量刊登达官显贵赠送的匾额，清一色的溢美之词。正文第一页是李鸿章为屈臣氏题赠“妙手回春”四个字，屈臣氏写道：“此乃钦差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世袭一等肃毅伯李少荃大人所赐，大人三次手书嘉奖，内有‘精粉戒烟甚为灵验’之语，并蒙由德税务司前后汇银九百元购取精粉九千包，分散吏民，特欲民间戒除烟瘾，不惜捐廉至再，且来书谆嘱本药房转致英国戒烟公会，函请议院力禁印度种植烟苗，业经遵谕妥办，将来或能如愿，庶不负大人所望焉。”


英國屈臣氏著

妙藥同人

大清光緒七年辛巳夏鐫
大英壹仟八佰八拾壹年

本藥局梓行

光绪七年（1881年）《妙药同人》书影

屈臣氏印刷《妙药同人》，也许是主打产品戒烟精粉的销售遇到了“瓶颈”，比如该书批驳“近日妒忌者布散谣言，似谓服此戒烟虽断瘾而难保无虞等语”，如今挂出那么多封疆大吏题写的匾额，无非是借此打压谣言。

此外，屈臣氏还为该书写了一篇谦恭到家的自序，论证戒烟精粉“专为中国芟除鸦片痼疾，大著功效”：

尝闻一病有一药之医，有是症必有是药，用药如用兵之法，知其法乃可知医。屈臣幼习卢扁之传，深究刀圭之术，凡于某药入某经，某方治某病，及人身之脏肺气血、筋骨脉络，药性之阴阳表里、补泻温寒，靡不考究精微如指掌，加以博览中外群书，采择前贤良法，互参已见，触类旁通，穷十余载之工夫，然后出而问世，既道行于西国，复税驾于中华，以期普济众生，俾海内咸登上寿。

自道光二十二年到港创局以来，荷蒙远近垂青，无日不臣门如市，于今几四十稔矣，阅历既深，学问愈进，研制戒烟精粉一项，专为中国芟除鸦片痼疾，大著功效，蒙李、左爵相暨各大人试验确效，陆续宠以手书，赏以匾额，昭然可据，非敢夸也。惟所制各药固堪自信，而精粉尤为见信于人，由是各省镇抚纷纷邮筒索购，日不暇给，遂不得已另派妥伴，分枝药局于闽之福州，苏之上海，外洋之小吕宋，仍在粤随棚施药，俱为畅销，将来或再择地分设，以便诸公购取，庶免路程隔涉之苦。

屈臣氏药房货真价实，诚信不欺也，虽所售诸药其值稍昂，而较之别家价贱而功少者，则为迥异，况本药房选料必精益求精，监制必慎而又慎，故能万发万中，即间有未尽全效者，或因本人饮食失调，或因本病变症者出所致，此皆自误，非尽能归咎于用药不灵，惟望俯鉴愚忱，细察药味，自能辨别真伪，与别家确有不同，是则愚之厚幸焉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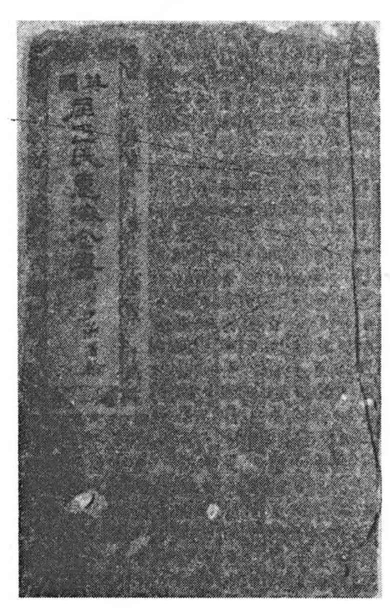
大清光绪七年季夏，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大英屈臣氏自序。





光绪七年（1881年）《妙药同人》（局部）

刘铸伯担任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后，利用各种关系开设分店，极力推进主打产品戒烟精粉的促销，促销办法之一就是打广告战。光绪十七年（1891年）印制《英国屈臣氏惠济全书》，大打主力产品“戒烟精粉”广告，宣称要斩断数百万人的烟瘾，并将戒烟药呈送给诸位总督、巡抚，请他们分送给瘾君子们除害。此举让政要们大有“深获我心”之慨，纷纷题赠匾额，以示嘉勉。刘铸伯在《英国屈臣氏惠济全书》一书中将匾额集中展出，宣传声势空前绝后，其行销造势、公关手腕，堪称商战中的创举与典范。





光绪十七年（1891年）《英国屈臣氏惠济全书》书影

为屈臣氏大药房题匾的封疆大吏，除大清头品顶戴、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湖广等处李鸿章题写“妙手回春”“西国扁卢”之外，尚有：

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兼管兵部事务世袭侯爵一等轻车都尉前任陕甘总督左宗棠题写的“仙术佛心”。

大清国两广总督刘坤一题写的“惠此中国”。

前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两江总督沈葆桢题写的“慧心仁术”。

太子少保、世袭一等威毅伯、两广总督曾国荃题写的“海西仙药”。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广东巡抚题写的“海上灵丹”。

大清军机大臣、礼部左侍郎、前湖南巡抚王夔石题写的“西来和缓”。

大清国江苏巡抚吴元炳题赠的“海国生春”。

大清国前任福建巡抚加总督衔、钦差总办海防事务大臣丁日昌题写的“海外还丹”。

大清湖北巡抚邵汴生题赠的“金丹换骨”。

……

详细开列题匾人官职外，该书编者还讲明题匾者对“戒烟精粉”的美赞之辞。譬如，李鸿章光绪四年戊寅三月吉日题写的“西国扁卢”匾额下面写道：“此乃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两湖总督李少荃大人所赐，并荷手书嘉奖，云及散给戒烟精粉，服之戒烟甚为灵验，兼蒙附寄洋银八百元，购取戒烟精粉，嘱由招商轮船递鄂，以广分送，想见大人为民除疾，不惜捐廉，具征痌瘝在抱之仁心实惠也。”

如果这类“广告”文字当真的话，那么李鸿章先后花了1700两银子，购买戒烟精粉17000包，分赠部属与亲朋好友中的瘾君子，命其服用戒烟。在法网严密的清代，香港虽属于“化外之地”，想来屈臣氏大药房断然不敢假冒李鸿章等封疆大吏的名字做生意吧？他们顶多打个如此这般十分漂亮的“擦边球”而已。

总之，这些封疆大吏的题匾，以及刘铸伯等编辑《英国屈臣氏惠济全书》时对题匾别具匠心的解读，将屈臣氏大药房的品牌产品“戒烟精粉”点缀得五彩缤纷，蔚为壮观。百年来商场上邀请名人政要题赠匾额之举，莫盛于此。



光绪十七年（1891年）《英国屈臣氏惠济全书》内页

屈臣氏大药房找政坛名人推荐产品，是“擒贼擒王”促销策略在近代商场运用的先驱。擒贼擒王的策略核心是“抓大头”，从关键人物下手，透过权威人士、专家或代言人，去影响大众的消费行为。而且，戒烟精粉价钱公道，维持原价不变，光绪七年（1881年）戒烟精粉每包价银七分二厘，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戒烟精粉同样是每包价银七分二厘，可谓十年间“不二价”。

光绪七年（1881年）印刷的《妙药同人》书后，附有截至1881年屈臣氏大药房开设的店铺10处：英国京城反出治大街、小吕宋第十四号桥头、香港中环臬宪署对门、粤东老城内惠爱七约、粤东省城西关沙基大街、佛山镇北胜大街、上海第二十四号南京路、汉口镇、福州府南台广东会馆隔邻、天津。

刘铸伯担任总买办后，屈臣氏大药房的生意急剧扩张，光绪十七年（1891年）印制的《英国屈臣氏惠济全书》首页，载有其开设分店所在地名录36处，具体地址如下：

福建省福州府南台、福建省城内南大街、福建厦门岛美大街、福建淡水埠厦新街、福建建镇府城后街、粤东省城内惠爱街、粤东城外沙基大街、粤东佛山镇富文里、粤东澳门康公庙街、粤东香港中环马路、粤东汕头升平大街、粤东北海东安大街、粤东海口北门大街、湖北沙市七里庙街、湖北汉口镇洋街内、湖北汉口镇流通巷、山东烟台广东大街、山东济南西门大街、安徽安庆城四牌楼、浙江杭州城保佑坊、浙江宁波东渡门内、广西省桂林后库街、广西梧州府五坊街、江西南昌磨子巷口、江西九江大牌楼街、江苏上海棋盘大街、江苏上海英大马路、江苏苏州阊门中市、江苏扬州府多子街、江苏镇江西门大街、江苏清江东门大街、湖南长沙端履大街、北京正阳门大栅栏、直隶天津府紫竹林、英国京城反出治大街、小吕宋第十四号桥头

老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指引着远行客回家的路。如今读读保留在一本旧书里的老街名，诸如：保佑坊、磨子巷、厦新街、后库街、惠爱街、沙基大街、富文里、升平大街、七里庙街、洋街、流通巷、广东大街、保佑坊、端履大街、棋盘大街，等等，人们会感到意味深长，思绪绵绵。但是，这些街名大多被后来的无数次运动"革"掉了。老地名的消失，实则是传统文化沦落的信号，预示着乡土文化的集体沦陷。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刘铸伯当年创建的平湖守珍街、述昌街，近百年间变化多多，老街名一直沿袭至今；被破坏的凤凰山清奇坑"守真园"，亦在修葺恢复中。

刘铸伯的同窗密友叶兰泉在汉口做过四年买办，屈臣氏大药房分号设在汉口镇的洋街、流通巷。流通巷这个地名还在，洋街这个地名早已消失，它大约在江汉关地段开辟的租界区里。汉口开埠后，汉口人的日常用语中，除了洋船之外，多了洋火、洋油、洋蜡、洋布、洋铁、洋油灯等一系列洋字号的名词。在洋街的影响下，汉口向近代城市迈进的脚步缓慢地移动了。

屈臣氏大药房推出的洋胭脂粉（每盒价银一毫五仙）、娇艳玫瑰宫粉（每盒价银七分二厘）、金鸡纳霜粉（每盒价银大七钱二分，中三钱六分，小一钱八分）、雪白清香干粉（每盒价银大三钱六分，中二钱一分六厘，小二毫）、玫瑰牙粉（每盒价银大七钱二分，中三钱六分，小一钱八分）、花露香粉（每盒价银四毫）等，慢慢进入武汉三镇市民的日常生活。

第二节　香江买办（下）

民间有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意思是说只要产品好，即使它处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人们（消费者）总会找到它。但是对近代经营者而言，这句老话就变得落伍不时髦了，买办不仅要知道市场需求，抓住市场需求欲望，而且要以最好的方案进行推广扩充，营造需求氛围，并进行目标销售，达到广告效应与品牌效应。营销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推广，提高曝光率。

19世纪末期，香港屈臣氏大药房曾经推出中成药“双料参茸卫生丸”，为此大打广告。屈臣氏大药房派发的“双料参茸卫生丸”说明书写道：“屈臣氏监制双料参茸卫生丸，拣选上等参茸药料，精制各项蜡丸发售。夫人生于天地之间，无论男女老幼，皆以气血为主，维秉质各不同，故有强弱之别，若身体稍有虚弱者再失调养，必至变生疾病，本局特制此卫生丸，其参茸贵重之药，夙挑上品，即寻常别药，亦务拣正地道，依法炮制后精工研炼而成，与别家所售者迥异，故能调和气血，滋长脾胃，兼有益精归子之功，固本培元之力，非寻常卫生丸可比也。请必请认龙麟伴塔商标，庶不至误。”


屈臣氏監製
雙料參茸衛生丸
香港屈臣氏大藥房謹識

屈臣氏大药房双料参茸卫生丸说明书

屈臣氏经过百年华丽转身，不复生产双料参茸卫生丸了。但市面上还可以买到参茸卫生丸，不过这是“同仁堂”（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的产品。同仁堂说这剂中成药的主要成分，包括人参、鹿茸、鹿角、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白术（麸炒）、党参、龙眼肉、熟地黄、香附（醋制）、木香、砂仁等51味。药效为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

腰疼腹痛。

沿街派发广告单的销售方法，迄今不绝。刘铸伯接手香港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一职后，在我国香港、国内、南洋各报刊登广告，促销产品。下面是他1901年在《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广告，促销“精制灵效膏丹丸散”等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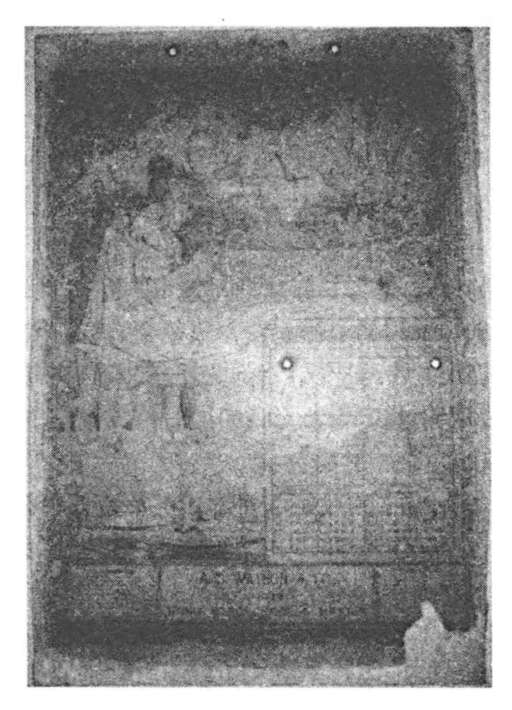


刘铸伯1901年在《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屈臣氏大药房广告

《妙药同人》《英国屈臣氏惠济全书》均有“精制灵效膏丹丸散”药效介绍。屈臣氏大药房的这剂中成药早就消停了，如今市场上有“九江灵效丹”出售。

月份牌画诞生于19世纪末的香港、上海，盛行于1896年至1945年间，其中20世纪30年代为鼎盛期。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洋商致力洋货于中国推销的广告宣传赠送品。它是西洋广告画本土化的结果，是高度商品化的产物，本土化、商业化、摩登化、通俗化、艺术化是其五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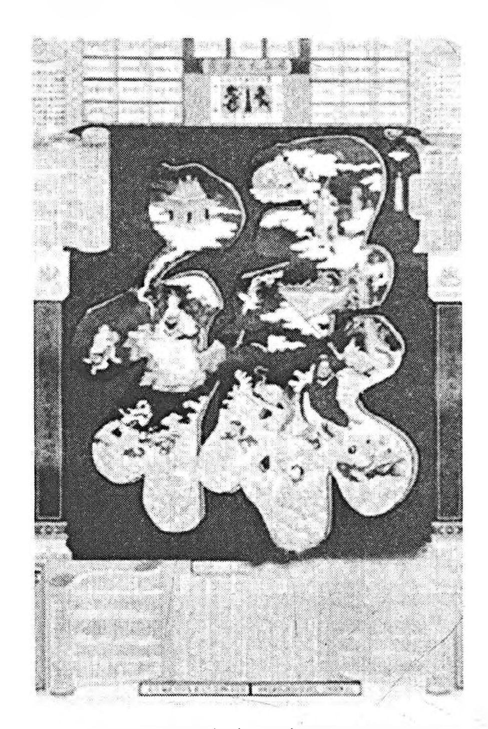
刘铸伯担任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期间，注意到运用月份牌宣传推销自己的产品。有人撰文说：目前所知最早的月份牌是1901年所制的宣传品，画作中央是以中国传统笔法所绘的历史人物故事，上有“屈臣氏大药房按年派送不收分文”字句。其实早在1898年岁末，刘铸伯就推出了一份宣传屈臣氏大药房产品的月份牌——



屈臣氏大药房1899年推出的西洋仕女“月份牌”

这张月份牌上画的是一位西洋妙龄女子，端坐桌前，正在伺弄提篮里的花草（她是占卜吗？因为某些欧美国家有用花草占卜的风俗），画面右下角是1899年的“月份牌”，最下面则是出品人屈臣氏大药房，写的是洋文（A.S . watson & co）。屈臣氏大药房总店设于香港，尽管在英国也开有分号，但各种药品的购买者还是以国人为主。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异质文化进人本土文化时，它在表

达中采用本土形式，较易得到受众的承认和接受。而月份牌的商业招贴广告的功能，主要作用是传达商业的信息，为了创造更大的空间利润，它必须迎合广大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所以，怎样把传统文化（中国元素）糅入月份牌，成了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刘铸伯必须考虑的问题。



屈臣氏大药房免费派发的“禄”字月份牌（冯润芝创作，1906年）

1906年旧历年底，屈臣氏大药房免费派发月份牌，这次月份牌上画的，不再是西洋美女，而是传统味十足的“禄”字。

这幅月份牌中间是镂空的大“禄”字，镂空处绘上与吉祥词相契合的图画，许人大吉大利，高官厚禄，图上方是屈臣氏大药房的商号、商标，图的正下方是月历，边框标明该药房国内各分销店及主要药品的名称。这份月历牌的作者冯润芝，初名甘露，又名砺石，晚号禺山老人。广东番禺人，晚清时期广东著名的人物画家和插图人物绘作名家。喜仿宋、元画，所绘人物，堪称一绝。香港当红女子组合Twins成员蔡卓妍，是冯润芝的外曾孙女。

冯润芝先习西画，后习国画，私淑钱慧安，人物、仕女，罗汉、佛像，无所不画。为生活计，每到年关，便为屈臣氏、两仪轩等商行绘制月份牌画。虽然香港是开放的城市，西方生活方式无孔不入，但冯氏选择入画的题材，绝没有西方的美女、骑士，也没有中国流行的林黛玉式的和搔首弄姿、撩人情欲的“美人”。他完全因应中国传统习俗和审美习惯，以年画的形式，采用福、禄、寿，荣、华、富、贵等吉祥文字作背景，以中国传统的笔墨绘上南山进士、十八罗汉、八仙过海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色彩金碧辉煌，极尽华丽，然后配以年历和广告，充满中国的传统特色，洋溢着贺岁的喜庆气氛，因而深受厂家和群众的欢迎。

以屈臣氏大药房1906年年关免费派发的“禄”字月份牌为例，冯润芝以吉祥文字“禄”作背景，用中国传统笔墨绘上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其中还嵌有一副对联：

屈井泉流酿成玉液金浆久擅灵丹施万国
臣门市集环顾香车宝马成钦妙药遍三珊

这副对联典雅而且谦恭，它把“屈臣氏”这西来的药房名称，十分巧妙地嵌入联语，与中国吉庆的画题内容结合，将屈臣氏西药房成功地转变至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

化之中。

另一份稍后制作派发的月份牌，画的是仕女伫立春江小景，图上方同样是屈臣氏大药房的商号、商标，图的正下方是月历，边框标明该药房各分销店及主要药品的名称，这张月份牌左右同样嵌有一副对联：

屈指初回大地春花开红华
臣门多种长生树采结青房


屈臣氏大药房免费派发的月份牌

这幅月份牌上的对联，远逊于“禄”字月份牌。我们曾经猜想：屈臣氏大药房1906年免费派发的“禄”字月份牌之外，是否还有以“福”“寿”“荣”“华”“富”“贵”等吉祥文字作背景的月份牌画？按理应该是批量制作系列发送才对，因为人们喜欢把“福”“禄”“寿”“荣”“华”“富”“贵”一并纳入囊中，但在“实物”出现之前，我们只好玄想一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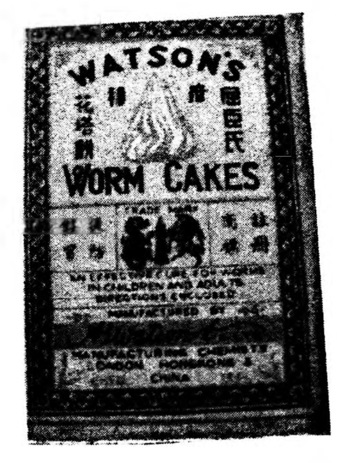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广东省博物馆2015年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展览”，“清末屈臣氏大药房月份牌”悄然亮相。据介绍，自1907年，屈臣氏大药房便开始印制月份牌，月份牌上注明“按年派送不取分文”，每年有不同的主题，分别为“荣”“华”“康”“宁”等吉利字。即便是香港历史博物馆，也仅藏有“益”字月份牌，而在这次展览”中，观众一次性看到了6幅，分别是“荣”“华”“贵”“寿”“康”“宁”，全部来自一家民办的博物馆。

无论如何，屈臣氏大药房的月份牌画如今已极具收藏价值，价格也不断攀升。据说，曾在香港拍卖会上创下十多万港元的纪录，并成为众多藏家的追捧对象，这是刘铸伯当年聘请冯润芝等岭南画家创作推销屈臣氏产品月份牌时，怎么也想不到的。

不仅如此，屈臣氏当年推出的许多产品，由于装潢精美，如疳积花塔饼铁筒等，如今也成了极具收藏价值的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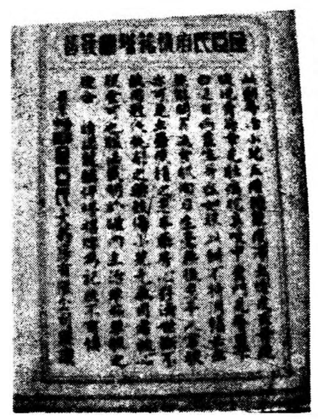
屈臣氏大药房不仅经营药品，它还经营汽水等商品。汽水在清朝同治年间输入我国，初称之“荷兰水”。1828年，广东大药房（屈臣氏大药房前身）开始生产这种饮料；由于汽水从西洋舶来，数量极其有限，只在个别沿海通商埠口才能见到，因而价格昂贵。1876年，清人葛元熙在《沪游杂记》里，曾提到晚清时上海卖汽水的情景：“夏令有荷兰水，柠檬水，系机器灌水与汽入于瓶中，开时，其塞爆出，慎防弹中面目。随到随饮，可解散暑气。”

刘铸伯出任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后，把“荷兰水”提升为大药房主打产品之一，后来又成立了屈臣氏汽水公司。





屈臣氏疳积花塔饼铁筒





屈臣氏疳积花塔饼铁筒广告文字

就像当时所有的买办商人一样，刘铸伯同时又是一个独立商人。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经营钱庄，贩卖鸦片，收购丝绸、茶叶以及经营其他业务。买办的独立经营，往往和洋行的业务直接联系起来，他们相互依存、互借声势，共同牟取厚利，能在短期积聚起巨额资产。由此，新生的买办商人变成了近代中国的暴发户。

买办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能凭各种不同的本领，以种种方法敛财。当外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买办时，他们就从外商身上获得巨大利益，除了向雇主“索取”薪水、佣金和其他合法收入外，买办还以商人的身份经商致富。而且，买办享有的特殊的优越条件，使他们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好地开拓其本人的生意。以刘铸伯的同窗好友叶兰泉为例，他在汉口屈臣氏大药房分店当了四年买办，积累了大笔财富，四年后返回香港经商，先后出任祥和栈秘鲁庄监督、中国国货公司董事及广万隆炮竹厂（当时香港唯一的炮竹厂）总经理等职。1919年，叶兰泉创立鹤山商会，前后任该会主席二十七年之久。叶氏还参与华商总会的重组，且任司理达十八年。不过叶氏生前死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要算是其高尚的爱国情操及救灾恤灾的善举。1914年，国民政府建立才两年，叶兰泉即代表国民政府在港劝募公债二十余万元。次年华北发生水灾，时任东华医院首总理的叶兰泉与香港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登高一呼，募得款项十万元赈灾。其后，国民政府分别颁授他们嘉禾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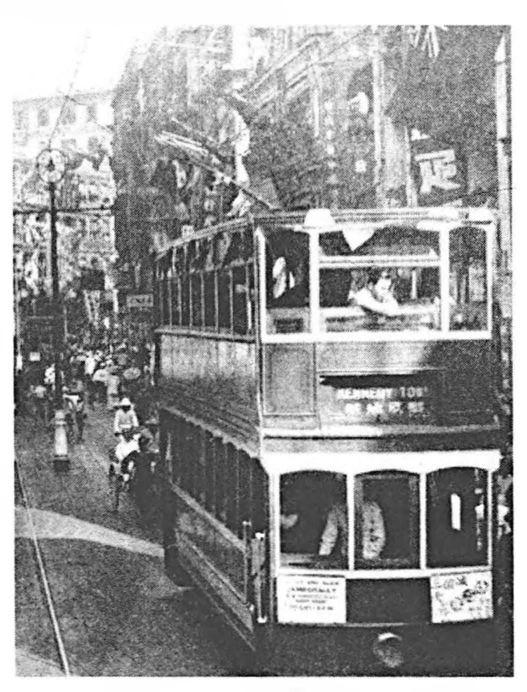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成功的买办商人，刘铸伯在其他领域还有大手笔投资。1902年成立香港电力牵引有限公司（1910年改名为“香港电车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但香港电车公司是以1904年（香港电车正式启用之年）作为公司的创办年份，刘铸伯则是香港电车有限公司的股东与经理。1912年香港政府宣布禁止外国铜币，一度引起华人的不便与不满。例如于1912年，香港电车响应政府政策而拒收中国铜币，结果引发华人罢搭电车，电车公司蒙受损失。最后，由刘铸伯等华人绅商出面斡旋，电车三天免费载客，事

件才得以平息。

又比如，刘铸伯还是香港第二大华资银行——大有银行的创办人，并与来自银行世家的简东浦（皇仁书院毕业生，其父简殿卿是正金银行香港分行的买办）开设过德信银号。此外，据《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食货者，国之大命，故先考虽致力群事，而究以货殖为本业，先后创设钜肆凡十有二，皆归先考主持。”

但是，同样作为一个买办商人，刘铸伯身上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譬如，一方面，他大力推广屈臣氏大药房的主打产品“戒烟精粉”；另一方面，他对于英国取消鸦片贸易则持反对态度，这就难免不使他时常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

英国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占香港之后，便把香港开辟成了鸦片贸易基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入鸦片，而香港当局也以香港与九龙的华人吸食鸦片为依托，把鸦片经营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1890年港府仅在港九地区收得鸦片牌照银47.76万元，而该年港府总税银为199万多元，鸦片税收占到1/4。其后港府设立专卖局，港九地区领牌照开设烟馆三十余家，零售鸦片处不计其数，政府派有专职人员负责零售鸦片处的事宜。至于俱乐部、酒楼、妓院、银行、米行、保险公司、南北行中，都设有鸦片烟床。1898年，中国九龙关税务司英人义理迩（H.M.Hillier）说：1886年中英鸦片协议签订以来的经验证明，香港当局“蓄意将其财政收入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建基于鸦片包商成功的走私活动之上。事实上，大英殖民政府主要是靠劫掠其邻居和朋友——中国的国库过活的”。这是港英当局不愿制止鸦片走私的根本原因。



电车经过德辅道中（20世纪初年的中环德辅道）



OK | Close | Help | Next | New Search

香港档案馆关于刘铸伯参与创建大有银行的记录

到了第十四任港督卢押时期（1907年7月上任），英国就禁烟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伦敦的禁烟总工会委员希利慈在陈述中强调了如不禁烟，便“不只可以丧身，并且可以亡国”的核心问题，同时尖锐指出“英国之罪将历万古而不磨”，表现了他对中国人民由鸦片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情。可是，当任总督卜力竟突出了两点不可禁烟的理由：一为如若禁烟，鸦片公司每年将损失40万元的利润；一为如若禁烟，政府当局将失去主要的税收，而准许并怂恿鸦片商的公开经营，港府将获得巨额利益。

主张禁烟的主流派，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坚持不禁烟的反对派，动机却是“税饷”与“财力”。这样鲜明的对照，禁烟的主张理应得到热烈的拥护，不禁烟的意见应当遭受激烈的抨击。可是，连声名显赫的太平绅士如何启、冯华川与刘铸伯等华人，都加入到英国人不禁烟的行列里，更何况英国人呢?

由于英商的一致极力反对禁烟，华人太平绅士也表示支持，香港商务局于1908年5月16日举行会议，决议反对禁烟，卢押亦同意缓禁，并将下述内容转达英国政府：香港公众意见，不赞成立即禁绝，以贬损香港之权利，但若果假以时日，逐渐推行，则为众人所赞许也。这个决议在5月29日的定例局会议上，获得议员士刁活的支持，华人太平绅士何启也立即附和。

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下院通过决议，要求卢押采取步骤，迅速废除香港等地实行的鸦片烟馆持照营业的制度。在殖民地部大臣的督促下，1909年3月1日，港府宣布废除熟泥出口的许可，同时关闭烟馆26家，作为正式禁烟的初步措施。与此同时，为弥补鸦片税收的损失，宣布开征烟草税、酒税和香水税。

也许就是这次反对禁烟，刘铸伯后来被人指责为“鸦片商人”，长期从事鸦片贸易。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他从事鸦片贸易的足够证据。

香港学者郑宏泰、黄绍伦合著的《香港大佬何东》一书，披露了一份殖民地部的内部通信，港府官员对以何世杰牵头的鸦片专营权投标商（虽出价占第二位，但却获港府授以专营权）做过一些介绍：

> 另一方面，落标第二高的人为何世杰，其差价只较最高者每月少150元，何世杰即前卫生局（Sanitary Board）成员何甘棠之子。我同时获得知会，何世杰只属该投标财团的代表，该财团的成员其实有他的父亲（何甘棠）——渣甸洋行的买办，刘铸伯——卫生局成员及屈臣氏公司（A. S. Watson & Co.）的买办。梁仁甫——劫比洋行（Gibb, LivinLsron& Co.）的买办，吴理卿——一位华人银行家，及陈启明——现时鸦片贸易商的秘书。这个财团极为富有，在本地的华人社会享有极大影响力，在鸦片经营方面拥有丰富知识。（CO129.358.40136，1909）

由这份文献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何甘棠、刘铸伯、梁仁甫、吴理卿、陈启明等买办出身的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当时均为香港的特许鸦片经营商，从事过鸦片专卖，而且“在鸦片经营方面拥有丰富知识”。

买办的特殊身份很容易形成所谓“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美国精神病大词典对于多重人格的定义是：“一个人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特的并相互分开的亚人格，是为多重人格。是一种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多重人格即具有超过一个人格存在（若只有两个则称为“双重人格”），就有如“在一个身体里住着好几个灵魂”。何甘棠、刘铸伯、梁仁甫、吴理卿、陈启明都是香港叱咤风云的商业巨子、大名鼎鼎的慈善家，而他们在“禁烟”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终于露出“皮袍下的小”来。

作为19世纪中西方交往的桥梁，买办阶层推动了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买办阶层与官僚、资本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但是，早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是旧中国‘三座大山’之一”政治话语出现之前，买办的“原罪”就屡屡被人攻击。譬如，刘铸伯与犹太殷商嘉道理20世纪初年捐巨资在香港、广州、上海办理育才书社，就受到了顽固派洪嘉与的大肆攻击，刘铸伯的买办身份尤其受到质疑。思想开通的两广总督陶模在批斥洪嘉与的札稿中说：“至谓刘鹤龄（刘铸伯）屈臣氏买办，疑为孙文徒党，亦近捕风捉影。香港之为买办者多矣，皆党于孙文者乎？且由此而拟为康党，则尤为牵扯。本部堂只就事办事，以息乱萌，不敢以成见私心株连蔓引。盖孙、康既皆粤人，一则行医，一则教馆，粤之士商为所识者多矣。苟于士商之有志时务、讲求新学者概疑为孙、康之党，善机阻塞，何以振兴？且疑惧万端，纷纷自扰，康衢坦途，尽成荆棘，将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为矣。”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在这里，毛泽东把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等量齐观，把买办阶级也当作中国近代最落后和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表。此后，研究中国近代买办和买办阶级的历史学家无一不应用这个观点。有的说：“买办资产阶级随着它的发展，其反动性质就更加暴露出来了。”有的说，买办阶级“千方百计保持着中国农村中落后的小生产”，“代表着最落后的生产关系”。总之，权威人物在对于买办的态度，几乎是“孩子洗澡水一齐泼”。那番见地，似乎还没有封疆大吏陶模来得高明。

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历史研究已经证明，在推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艰难过程中，刘铸伯等买办阶层并非“中国近代最落后和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也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之一。可惜的是，他们的历史作用被大大地低估了。

第三节　吾土吾民（上）

刘铸伯誉满香江，与他长期献身社会公益事业，为同胞服务，有着密切关系。19世纪90年代以后，他先后出任东华医院董事局成员、总理、主席，担任洁净局局员、育才书社司理、保良局总理、华商公局及香港华商总会（今名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广华医院倡建总理、定例局局员、香港第二大华资银行——大有银行创办人、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等职，参与创办华人足球队（今南华体育会）、香港华人核数研究会（今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香港大学、香港仔儿童工艺院（今香港仔工业学校）等。据《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

香港隶英版图，而我华人之侨居于是者，凡数十万，故政治之良楛，咸我华侨身受之。中西政俗互异，港吏以为善者，我华侨或不乐受。先考深有见于此，即慨然思有以自效，自毕业后，浮沉于士商者十年，而学行言论，已翘然异于众，中西人士咸倚重之，每遇艰巨，皆引先考为助。前后历任地方要职以数十计，靡不竭其心力所能至，务使人蒙其福而后即安。

……

先考前后历任治安局员、国防局员、公立医局副局长、保良局副局长、东华医院常年顾问、保良局总理、搜查稽审值理、卫生局则例审查员、粮食价值稽核员、征收轮船战务用品值理、战务恤款值理兼干事员、教育研究值理员研究值理、考查工程司局员、法例审查员、公项稽核局员、孤寡恤款干事值理、英国钦设工艺制造研究会会员、北般乌工艺制造会永远会员、华人永远坟场干事值理，皆能衡量事理，审查情势，调剂中外。而克协其平，故万端坌集而事无不济，要皆不及备述，谨述其荦荦大者，然责重事繁，心力交瘁……



香港保良局徽标

香港开埠后治安条件恶劣，警察往往有鞭长莫及之叹。1866年2月1日，五环坊众向政府正式提出成立“团防局”，以补警察之不足，港府考虑后允准成立了这个由街坊组成的自卫队组织。1891 年，身兼辅政司及总登记官两职的史超域·骆克有鉴于华人越来越富有，影响力日大，有必要建立一个由华人组成的咨询机构，反映华人民意，向港府提供意见。他建议由包括当时华人领袖何启、韦玉、何福、刘铸伯在内的12名华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使团防局能发挥更大的力量，而团防局局绅每月开会一次，商讨华人有关事项，可协助总登记官处理华人事务。得到官方支持的团防局，影响力速胜从前，团防局局绅都是华人社会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意见往往受到总登记官的重视，他们成为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的桥梁。



1903年的香港明信片（香港警察政府机构巡理府拿获犯人带枷示众）

团防局成立后，把原来各区的更练组织联合为一个的整体组织，维护社会治安，但是拐卖、盗窃之事依然层出不穷。1878年11月8日，东莞县侨商卢赓扬、冯普熙、施笙阶、谢达盛等联名上书当时的港督轩尼诗爵士，请准设立保良公局，以保赤安良为宗旨，筹集资金，缉拿拐匪。1880年5月获港督批准，1882年8月英国理藩院通过“保良局条”，并刊于宪报。后来为纪念创局的艰辛，遂将11月8日定为保良局创局纪念日。

保良局的“保良”二字，指保赤安良的意思。初期的工作为防止诱拐，保护无依妇孺，并协助华民政务司调解家庭与婚姻纠纷。随着香港社会的转变，现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机构，提供优质多元的服务。治安局则专责维持社会治安、打击盗窃等。刘铸伯先是任保良局局员，后担任保良局副局长一职。

刘铸伯担任保良局副局长、治安局员期间，改革完善有关制度，得到香港辅政司骆克（J.Steward Lockhat）的大力支持。1902年骆克被任命为威海卫领事，刘铸伯曾拟保良局绅赠骆公颂词：“泰西善政，保民保商；更保妇女，文教大昌。港地英属，并蒙获福；仁政所敷，妇孺同沐。峨峨骆公，奉命东来；政理华民，公局适开。华妇无知，每沦异域；察其去留，不虞悲戚。骆公乐善，拨款皇家，不分畛域，无间冬夏。妇女流难，赖公保存；完贞固节，岂非公恩？无怨无旷，歧西善政；公乃扩之，仁风益盛。桃源乐土，厥惟香江；虎皆渡河，户不吠龙。辅政所司，口碑载道；慈宇托庇，唯恐公去。英廷权贤，公得人心；坐镇威海，重寄斯任。大臣办事，曰明曰惠；旌旗所临，众情自慰。我公行矣，时届暮春；三佩得雨，四海无尘。留靴卧辙，昔人送别；望公再

来，瓣香同爇。九划苍苍，海水洋洋；思公德泽，与之俱长。”

骆克接受刘铸伯所献颂词后，发表即席讲话说，“余甚幸有此盛会，使余记念，更得诸君匡我不逮”，此次即将离开香港，但威海卫距离香港并不遥远，到了威海卫，还有机会与粤商朋友会面。他还说：“深知广东人雅善贸易，则他时在威海，尤乐与粤人聚首也。……颂词之赠，愧弗敢当，猥蒙厚意，尤为感谢。余到威海，即以此颂词纪念与诸君在港言笑时也，余尤愿与诸君他日相晤于威海。”

国人对于1894年的历史记忆，几乎全部让位给了“甲午战争”，殊不知该年也是中国乃至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1894年香港爆发的鼠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鼠疫第三次全球大流行中的一次重要爆发。1894年5至10月，在香港大流行的鼠疫导致两千人以上丧生，成为香港开埠甚至有记录至今最多人死亡的瘟疫，香港三分之一的人口逃离香港。

5月15日《申报》头版在《香港多疾》的题目下首次报道了香港鼠疫：“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说者谓天时亢旱，以致二竖为灾。若得屏翳惠临，此疾庶几可免乎。” 两天以后，又是《申报》头版在《西人言疫》题下，有报道如下：“昨日香港发来电信云，此间疫症益多，死亡枕藉。天时亢旱，物燥风干。港督登告示于官报云：本港为有疫之处，所有受病之华人须立时移至医病船中，目下每日死者多至三十人左右。”

港英政府对付鼠疫的措施，包括使用强制手段，将鼠疫患者隔离治疗；规定鼠疫死者尸体必须交政府处理；对曾有人染上疫症的民居进行清洗消毒。为接收众多隔离患者，将医院船“海之家”（Hygeia，即健康女神）从昂船洲移至西环对面维多利亚港做专门医院，又在坚尼地城警署成立临时医院。5月22日《申报》第5版全文刊载香港洁净局颁布的《香港治疫章程》，共计十二款，兹撮其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 其一，凡有患疫之人，无论轻重，都必须迁至医船或洁净局所指定的专门处所就医；凡有患者死亡，其尸骸须在洁净局所定之专处由洁净局饬专人埋葬。患疫之人如要迁徙，须经洁净局及奉有执照医士同意。
>
> 其二，洁净局委派人员对于疫区及指定区域进行逐户卫生检查，如屋内污秽不洁，由局方委托接揽洒扫人夫，洗扫洁净，并洒以解秽药水。凡患疫之人衣服、床铺等物，由洁净局委派人员负责搬运离屋清洗干净。无法洗净之物件，须由洁净局委员或有执照医士看过，方可毁化。对于疫者居住之屋，清洗干净后，无洁净局命令，凡人不得再入屋居住。
>
> 其三，凡公私厕所须每日洗洒二次，至洁净局满意为止。厕主或管厕之人须备有生灰，在厕应用，每粪具用后，须投以生灰少许。至厕内所有木料，均用水洗洁，本局另给解秽药水同洗。

其四，洁净局推举三人，一为国家大医士雅利士君，一为总辑捕梅君，一为绅员梅兰诗士君全权负责，并设专门办公机构处理相关事务。

6月6日报道称，洁净局官绅议定修改章程，规定凡染疫之屋及其附近住屋，都必须洒以灰水。凡街铺屋，医生认为其不合居住者，无论是否洒过灰水，都必须总管查疫之人命令关闭。显然，公共卫生理论是《香港治疫章程》制定的依据与出发点。洁净局据此而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卫生防疫措施，并严格执行。



上环太平山街华人聚居的房屋最终全部被拆掉，现时该处为卜公花园。（图片为卜公花园内记述鼠疫的纪念牌）

但是，当时多数华人对西医并不信任，亦不理解卫生当局的防疫方法，对这些措施不愿合作。很多贫穷的病患者留在家中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病死后尸体被人在黑夜中抛弃。政府出动军队及警察，前往疫情集中的地区逐户入屋搜查，隔离病患及进行消毒；但这样引来更多不满。华人通过东华医院向政府要求准许病患者离港返回内地。在香港及广州皆有出现针对西医以至英国人的传言，称西医隔离治疗有不可告人秘密。

为了控制疫病在市内蔓延，政府规定同屋有人染疫，而知情不报者会受罚。同时将卫生情况恶劣的民居封闭。其中疫病传染最为严重的太平山街一带，土地被政府通过紧急条例收回，约7000名居民全部被迁出，更增加华人的不满。此时有传言，称港府若清拆太平山街，将袭击广州的英人报复。香港总督罗便臣一方面要求两广总督李瀚章谕告辟谣及保护广州的外国人；于5月底又在坚尼地城玻璃厂增设临时隔离医院，代替医院船“海之家”，专门用来接收华人，并交由东华医院的华人管理及使用中医治疗。

华人多不认同西医，对于香港卫生当局搜查住宅，大多数华人也不能接受。港英当局与香港华人遂产生冲突，最后导致华人大批离港。5月28日《申报》头版在《港疫续述》的标题下，记载5月16日上午10时，香港绅商在东华医院集议港地病人调理之事，大批华人围聚院内院外，巡捕官和国家医生也到场。会议主席刘渭川对众宣布，当局已允在旧玻璃厂设东华医院分局，并由华人医生治疗。“又欲呈官场，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及求免入屋查搜。”巡捕官宣布：“已接省垣官宪电信，谓禁止病人回省。”

但是，香港的鼠疫患者离港迁回原籍的行为，最终得到了广东政府允许。6月21日《申报》对此事报道如下：“香港英官接粤宪来文，准将东华医院分局患病诸人载回省垣医理，业已纪诸报章。兹英官拟有条款，令医院绅董遵照办理。一凡欲将病人载回省



1894鼠疫大爆发为香港带来了香港病理研究所（现为医学博物馆）

垣调理，必须问明本人自愿前往方可。二凡病者须要医生允准方可前往。三凡病者必须报差知悉，方能往省。四凡船只将病者载往省垣，必须将病者坐卧之处，遮盖妥当。并预备食物及药料等件，以便病者需用。”

香港的鼠疫爆发之际，刘铸伯以香港洁净议员的身份，站在全体华人的立场上，对港府的卫生条例及政策提出多项改进意见，为香港市民争取到了诸多利益与权利。据《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

当其被选为东华医院总理也，同时被任为香港洁净局员，会疫甚，港吏防传染，听夕遣吏役，按户籍察。遇病者即舁入医院，疗与刁违，入者多死，华侨惮焉，欲迁入内地，又为法令所禁。且患疫之家，例须薰洗，辄连及十余户，家具摧残，不可以目。居民畏扰，至有弃尸不顾，伺隙逃去者，全市萧条如游墟墓。先考恻然伤之，具以闻于港吏，且与洁净局力争。当薰洗时，先考必亲往监视，其不应洗者禁勿洗，其应洗者禁勿扰。自旦达暮，奔走汗喘，略无倦容，吏役咸戢戢受约束，故民居市肆多获保全。且力请港吏将禁迁之例革除，民始安集，而市肆渐复旧观。先考在局凡十二年，凡局例之不便者，必据理辩争；争之不获则奋髯抵几，未尝少屈，务得当乃已，故华侨之阴受其赐者，不胜举，此则其较著者也。

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时人多称为“黑死病”），港府于当月制定卫生紧急附例，其中规定洁净局人员有权进入任何屋宇检查、消毒，甚至搬移、销毁屋内物品，禁止华人居住在不合卫生的屋宇等，这些措施对华人造成的不便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实施之始，华人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何在执行消毒措施的过程中减少对华人的侵扰，最为刘铸伯所关注。

为了消弭疫症，港府绞尽脑汁，包括将受疫屋宇收回拆毁和强制消毒洁净等，而消毒办法，也因应效果而时有改变。1898年，港府将原先以焚烧硫磺和以煤炭洗剂清洗地面的做法，改为以一比一千的水银高氯化物溶液喷洗墙壁及地面，然后尽开门窗，其间住客必须搬离，数日后方可返回。

1899年，卢冠廷担任东华医院主席，刘铸伯与区龙光、刘国华、陈瑞英、张以盛、黄曜华、李贤良、黎干阶、崔显由、陈廷超、许炳授等11人任首总理与总理。三四月间，疫症再度流行，主席及总理齐心协力，四月十四日（公历5月23日），将西环玻璃场

之分局修葺重开，命名为“东华医院西环分局”，收容传染病人，以中药治疗。为使患者周知，广发传单云：“港中时疫，日有数起。本院已在西环开办分局，专以华医华药调治病人。如有染此病者，切勿隐匿不报，致违宪令。倘来院报明，则听病者自主，其自愿往分局医治，抑或雇船返乡，本院均可发给凭据，即可放行，并无阻留。若果救治不及，染症身亡，来院报明，亦可代雇船只，运柩返乡，并无阻挠。至于搜查房舍，不过欲求洁净，以免传染，此乃政府爱民至意，并非惊挠，祈勿剧生疑虑。”由此可见，西环分局对来就医患者或医治或返乡，死者返乡等均有适合措施，足见东华的工作十分细致周密。


Tung Wa Hospital Advisory Board.
大英香港華民政務司

刘铸伯等是东华医院顾问委员会成员

刘铸伯担任东华医院总理期间，《东华医院百年史略》“大事记”写道：“……（二）据是年（1899年）本港志事录记载，有旧金山、新金山、日本、新加坡、印度各埠华侨之身故者遗体或骨殖，与及在外洋船上身故者之遗体共一百五十余具，运抵香港交由东华医院设法转运回原籍。（按：东华医院创办后即有将吉棺交给行走本港至海外各地轮船以备在航行中身故者盛殓，免死者葬身鱼腹。）（三）是年九月在大口环一五七二地段兴建‘东华义庄’，设有大小庄房一百二十间，堂座五间，骨殖仓四间，并有石牌坊及凉亭设置，而将西环义庄迁往新址。”

1901年，港府参照外国防治鼠疫的经验，制定薰洗章程，改用薰洗消毒的做法，但对于这一新法，局员出现不同意见。11月20日，洁净局举行额外聚会，讨论实施新例，预早薰洗屋宇一事，会议主席鸦健臣医生谈到：“日前商议未患疫时先行薰洗屋宇一节，本局已允准，此新例之设，因冬季无疫，故趁此时将患疫杜绝，疫气以免再发，虽然薰洗之后，来年无疫尚未敢，必惟尽力治疫，势当施行，如全港无疫，非赖神力不可，而洁净医生思此良法试办，在局员多以为是。薰洗此法，原是为港众起见，虽暂时于人稍为不便，洁局亦从中通融，果有可相就者，无不允肯。”他还说，香港总督在东华医院奠基时曾言及此事，“谓薰洗屋宇，非今创办，只是效法别处所办，已有成效”。鸦健臣医生还谈到，困难在于物色管理薰洗之人，等等。

在讨论过程中，漆工务司提出：“刘君铸伯于此办法，意尚未合，或刘君有言辩论，第如欲使疫清除或则减少，不得不照此新例办理，甚愿华人，将督宪奠基时所言薰洗之事，细细思之。”而在会议召开前十日，刘铸伯已经拟出书面辩询。11月22日，《香港华字日报》以《刘君铸伯辩询》为题，刊登他在洁净局额外聚会上的发言：

阁下拟来条陈六款，除第六款外，愚意各款不合。第一、二两款，拟在第二街及第三号差馆前空地，每处盖大茅寮一所，俾居留暂避，固不足用，亦不合宜，该两约居民远近不已，要彼等携男带女，搬迁贵重衣物，而穿街插巷至茅寮处，理所不能也；第三款沐浴房太少窄，只合乎口口工人之用，欲将各眷属同关在内，实不能也；第四款各家于八点及四点熏洗居多，口口设法由十点动工、四点似前完工方合；第五款认真洁净及欲不熏二句，究属何意？愚见务须说实，凡行不熏亦不洗方舍，何屋洁净否，须委中西有口口人各参口凭公断，免熏之货物，亦须着一说明，并觅妥式地方，俾各铺家安置货物为可。

以下，弟所问各件之复词，须详列在委员禀内，连前十月十一号弟与阁下之原文，一同递呈辅政司，缘阖港华民意见，均详在弟原文故也。

一问，何等行免熏只洗？行与店如何分别？

二问，凡熏洗行、店是否预先通知该东家，着设法往别处暂造生意？如系通知预先若干日，有何地方俾暂造生意？并失误生意赔偿否？

三问，准预先搬货物否？准搬货物工钱归谁支给？货又搬往何处暂贮？

四问，农熏洗各约之住眷屋是否尽行熏洗？

五问，倘有免熏洗者，当如何办理？

六问，办理免熏章程系何人？

七问，病人逐出街否？

八问，倘不逐出街，何人往验其人病否？

九问，洁净局照例有权逐居民离屋否？

十问，雨天着居民出街否？

十一问，如两天亦着出街，能否觅合宜地方，俾一出门便可到藏身，无碍乎安聚否？

十二问，每层屋之住眷准否携衣服、首饰出户？丝绸、皮革亦准携否？

十三问，倘丝绸、皮革不准携，倘有失去，为何人是问？

1906年6月4日至8日，《香港华字日报》刊载《刘君铸伯辩询》

十四问，每日四点钟前能否返回屋里，及要熏洗各约何时方能完工？

十五问，货仓免洗否？

十六问，凡铺户内有人居住买卖及贮货者，是否作货仓论？

十七问，如不免洗，将其货物何为？

十八问，据洁净局谓，凡毁坏什物确有凭据者方赔偿，此节归何人核理？是否由帮办决夺？

会议召开之前，刘铸伯与另一位华人洁净局议员、香港金融业巨子冯华川有过沟通，后者赞成他提出的疑问，并在11月20日举行的额外聚会上发言："兹有数言欲陈说，请各员听之。华人未悉薰洗之益，我们当详细解明，使人晓喻，又当薰洗之法，如何将就乃可。华人所议有数款，此数款亦甚易通融办理：一、西医所云，薰洗时将妇女幼童暂至附近棚厂驻足一语，似不可行，当在各屋前设有帷幕，若照该西医所言办理，将何以堪？二、如某处定期薰洗，当先三日通知该处，若该处已有定期，而居人欲迁居别埠，当准其徙居，惟由此约迁往别约则不准；三、商人之屋可展期薰洗；四、薰洗之期，由十点至四点，似胜于医生所定之期；五、雨水天不可薰洗，此等小事殊可将就办理。"

洁净局举行的这次额外聚会，充分考虑了刘铸伯、冯华川等华人议员提出的问题，最后议定，"薰洗之事，不免施行，然华人所开数款，当合众人商办，总之，能将就华人而无碍于办事则可矣"。会后，洁净局拟定《薰洗章程》，作为对刘铸伯所提各项问题的回应。11月22日，《香港华字日报》全文刊发《薰洗章程》文告：



宋寒松先生书法《法治宪纲》

一、凡薰洗某街屋宇，即在该街附近薰洗之屋宇门外，择地张盖帆布遮天，俾妇孺等有托足之所；

二、拟定薰洗之时刻，以每日九点至十二点，又两点至五点最为合宜

三、凡有屋宇业经整洁者，不用再洗，惟是否整洁须由洁净医师、副医师、洁净帮办三员定夺，该医师帮办五位有一许可，方为整洁之据；

四、当薰洗之期，须预先三日通知；

五、凡有货物，概免薰洗，至搬迁与否各随其便；

六、凡全间屋宇俱为一注册人用作贸易者，方得称之为行，此等行内独薰洗住人之处而已，如查得仍系不洁，就要将全间尽行洗洁，无有区分；

七、凡住居屋宇，当要一律薰洗，如有污糟者，更须加以洗涤；

八、如居住之人报有疾病，由洁净医师看过，委实有病，或自延之经领执照医生原出凭据纸，方可准信，如是则该屋宇可暂免薰洗者，不须移出门外；

九、每逢下雨时候，薰洗一概停止；

十、凡首饰、玩器、丝绸、皮草贵重物件，均准未薰屋先预为搬往别处；

十一、凡属货仓概免薰洗；

十二、凡屋宇内有用一层作货仓者，该层免薰洗；

十三、凡因毁坏什物请给赔款一节，须由法局秉公酌夺，徜以为未能允洽，可上控本署判断；

十四、凡有不妥抱怨之事，或欲求搬迁人情，可投知洁净医师，或刘绅铸伯代为转达；

十五、举行薰洗两约地段之际，凡住在界限内居民，除领有洁净医师人情纸外，不得擅将被铺衣物搬出；

十六、当薰洗屋宇两礼拜内，经历有何窒碍为难之事，可开明投知洁局，别筹善法办理。由下礼拜一即华历十月十五日起，从下环花园道东便一带，及西营盘新东街西便一带，先行薰洗。

《熏洗章程》特别明文规定，薰洗过程中，“凡有不妥抱怨之事，或欲求搬迁人情，可投知洁净医师，或刘绅铸伯代为转达”。这与上引《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所记，“当熏洗时，先考必亲往监视，其不应洗者禁勿洗，其应洗者禁勿扰。自旦达暮，奔走汗喘，略无倦容，吏役咸戢戢受约束，故民居市肆多获保全”，可谓两相吻合。

香港政府千方百计意图消除鼠疫，但是事与愿违，实行熏洗制度以来，鼠疫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几乎每年的春末夏初，香港依然疫症流行，港府唯有不断收紧防疫条例，华人所受侵扰，年逾一年，匿报病情者有之，弃尸道旁者有之，举家逃离香港者有之。

刘铸伯担任洁净局议员期间，极力为华人争取自治自理的权利，为此上书洁净局，提出修改扰民苛例的办法。1906年6月4日至8日，《香港华字日报》以《刘君铸伯致洁净局论办疫书译录》为题，刊登了这份禀札的中文译稿。刘铸伯说：“本局向日办理防疫章程所行之法，华民受苦多端，众心惶恐，遂至家有患疫者，虽多方劝助，仍有隐匿不报，甚至弃尸道旁，与其原人本国风俗相悖，此中苦窘情形，仍有未尽遍知者。前次本局会议，弟所询查各节，实有苦人之处，不能已于者，兹先就洁净局医师答复之语而论之。”

对于洁净局医师的三点答复，刘铸伯一一予以驳斥。譬如，洁净局医师说，在熏洗过程中，“局差勒令疫症同居者，穿着洁局衣服，系遵照防疫章程第四款办理”。刘铸

伯反驳道："照弟愚见，该章程只系因熏洗疫屋，准迁徙衣物等件，而并非授权医师迫勒同居者更换本局衣服，至若局差将箱内之衣物，当时未尝为病人穿着，或未染疫者，亦概行迁去熏洗，似亦出乎定例之外。当旧衣已脱去熏洗，同居之人若复自觉熏干洁衣物更换，本局何须强人着局之衣，使其人衣不蔽体，实多窒碍。"

香港华人抵制熏洗制度，一是因为疫症未流行时死者被局差疑为疫病患者，必须将尸体移往验所解剖，与华人丧葬风俗相乖；二是疫症流行时局差封闭患者居所，强制熏洗，态度恶劣。刘铸伯在禀札中写道：

> 平素无疫之时，华民之家，遇有死亡，除病者经领照医师诊视不计外，其余死者之尸，着洁局差看验，始能发给敛葬执照。如照局差之意，以该死者之病，有思疑之处，该尸即移往验所剖验，如此办法，实属有碍众情，华民洵以为，生时无辜，死后受罪。

1906月5月4日至8日，《香港华字日报》连载《刘君铸伯致洁净局论办疫书》

若遭疫症流行之时，则办法尤严，无论生死，皆扛往他处，甚至病危者，亦不问其患疫与否，但觉思□□□□□□□□□，如此惨状，于病者家人，固属切割，即其同居邻里见之，宁不生畏？况领照医师，华民未能深信，势必强使一律延治，及其一经验疫，由医生验其果是疫症，即派差看屋，禁止屋内各人，不得将物迁移他处，虽欲与屋外消息相通，亦概不准，必俟数时之后，或越日，帮办与黑人管工，带齐洗屋工役到来，于是迫令同居剥去身穿各衣，换着洁局之衣服，凡深锁于柜内之衣物，亦一体投入大筐，抬去熏蒸，拆毁天花楼板房屋，洗涤床铺家私，情状已属不雅，其夫役傲慢之态，因共目之，为老□□□□及拆毁之物，□□□，业尽抛掷无序，仓卒奔走，而患疫之家，又身穿局衣，俨如犯徒，形容凄惨，邻里看见者，固当生怜，乃夫役中竟有任意苛责者，良可慨也。且所行防疫章程，原意无非予以杜绝传染之患，以若所为，求若所欲，转足以速其患，华民见之已属心惊胆寒，乃更欲其守例而行，势必阳奉阴违，于是不得不冒险设计，使病者藏匿，及至死后，则弃尸道旁，与原人风俗相悖，在所不计。

19世纪70年代，香港华人绅商创建东华医院，为同胞提供免费医疗服务。鼠疫大肆流行之际，华人绅商筹集款项，在香港各约设立东华医院分局，“延医学堂毕业生，及通晓英语之书记，在该分局常年料理，以期教导华民贫乏无知之辈，使其明白洁净屋宇例款，无力之家，兼可集资饮助，以弭斯患”。创办以来，每年花费一万五千元，但是创办人的一番苦心未能如愿以偿，究竟是什么原因？刘铸伯说：“盖自前十二年起，疫症流行以来，防疫章程严厉颁行，人心惊悸之深，有以致之，亦未尝不因筹款施送善举，未能遍及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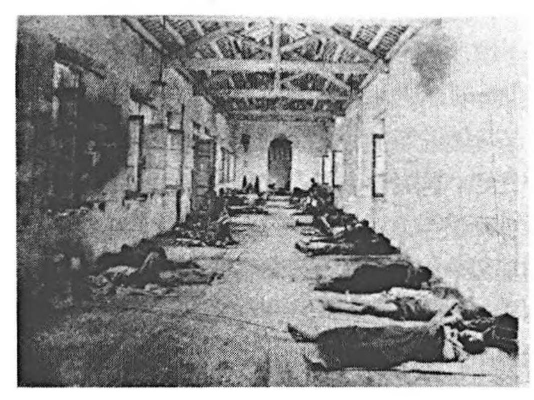
至于洁净局祈力医师说，香港出现患疫不报与弃尸之事，是因为“华民将以为此者，系因省却费用起见”。刘铸伯等洁净局华人议员反驳说：系因苛例使然，因为东华医院有赠医施药，病人身故埋葬费用亦由该院施给，贫民常可沾惠，绝对不是因省费用而致匿报、弃尸，兼之香港各约备设东华医院分局，殷商何棣生开办医院，捐款给以棺木葬费，以惠贫民，但是病人匿报疫病如故、丧家弃尸如故，可知华人议员“苛例使然”的说法，实确有据可凭。刘铸伯说：

愚以现在情形观之，苟非将历年防疫之法，再细致良，使民心安静，其患将永无平息之时。且华民何以至于斯？极（诘）其故，有自来矣，以弟所亲目睹者，特举一二，为我局员言之。盖本局近年办疫之地，比昔时宽恕，办事尚以抚字为怀，讵知熏洗之时，有如碍人安居、毁拆物业，与及未禀准额外人情，则母不能亲其子，夫不能会其妻等等苛例尚存，所谓宽恕者，亦纵有其名而无其实也。如病者有妻室眷属同居，其同居之人，必将惊惶无状，则力着有病之家，除隐匿不报外，任其操纵自如，倘劝谏不从，势必出于恐吓之，若是，二者俱不旨，则同居者弃而之他，遗下病者与其妻儿独居，倘病者不幸终亡，其妻儿亦随而弃之。当疫症未流

行之时，如有死亡，尚易由洁局领给人情殓殡，及随意求东华医院施赠，或向人求助埋葬，若既盛行之后则不然，因该医院均须禀报疑似之症，是以患病之家，恐防为人查知住址，必多端疑惑极至，不敢住报医院。至若资财丰裕之家，苟有一染病者，暗中迁港地，然所以为此者，亦因防洁净办疫之严，贫富华民受苦，若故暗中迁徙以避。

刘铸伯认为，香港居民中华人占大多数，今因防止鼠疫爆发，行熏洗之法（“作此残忍之举，本局自省未尝无内疚焉”）。解决匿病不报、弃尸道旁的最好办法是，由洁净局主席、华民政务司以及洁净局华人议员、英国议员合共四位，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彻底查究下开各节：“向日防疫定章与及办理之法；查弃尸之由并如何改良，使华人协力相助办理，务将刻下居民之艰苦认真减轻为是。”总之，“况苟将霸例悉除败，行温柔之法，其收效亦由是耳，本局何乐而不为哉？”

刘铸伯任职洁净局华人议员多年，对同胞所受之苦如同身受，力促港府革除弊端，诚如《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所言：“先考在（洁净）局凡十二年，凡局例之不便者，必据理辩争；争之不获则奋髯抵几，未尝少屈，务得当乃已，故华侨之阴受其赐者不胜举，此则其较著者也。”



医治鼠疫病患者的临时医院



英军在街头执行消毒工作

1907年7月，卢押获委任第十四任香港总督。他上任前一年，英国卫生部就香港卫生、建筑物条例和卫生部官员的贪污事件完成了一份报告。卢押上任后即着手处理这一问题，改组卫生局，由政府委派一位职业行政官负责，取消卫生督察，并招募职员，修订法例，还通过了一些新的法例。这样，香港的卫生环境才见改善。

卢押任内对公共卫生的改革措施，颇得刘铸伯等香港华人绅商的赞同。1910年4月卢押偕夫人回国休假，刘铸伯与周少岐、陈赓虞、韦玉、何启、曹善允、何福、容翼廷、冯华川、冼德芬、何甘棠、伍汉墀等绅商联名作《送卢制府序》，褒扬他在公共卫生改革方面的建树，其中写道：

惟公元一千九百一十年四月吉日，制府卢公遄返祖国，以六月为假期，我中华绅商士庶，以祖道仪文，为尊者之颂祷，典至隆也。

公下车香海，已数易星霜，德政仁恩，口碑载道。其所以抚循百姓，安集远人者，至为恳挚，而于我华人公益善举，尤为鼎力赞助，靡不令人称道，如港中弃尸之事，曩者屡见不鲜，公用殷尤，力谋洗革，乃与公立医局，妥筹办法，弃尸之陋习几绝迹焉。清净之例，原为公众卫生起见，然华人则向苦其严，公莅任后，于清净则例通融办理，而收效且较前尤著，四民便之。

《送卢制府序》中有诸多颂扬之词，诸如“清净之例，原为公众卫生起见，然华人则向苦其严，公莅任后，于清净则例通融办理，而收效且较前尤著，四民便之”，等等。但是，这又何尝不是身为洁净局议员的刘铸伯“据理辩争；争之不获则奋髯抵几，未尝少屈，务得当乃已”的结果？



1902年11月22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请助医费》

刘铸伯作为洁净局华人议员，为了保护同胞利益，不仅在律令制定方面与港府官员奋髯辩争，他在施医赠药、拯救同胞方面从来不甘人后。刘铸伯是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华人值理之一，据1902年11月22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请助医费》一文可知：十一日，雅丽氏医院举行华人值理聚会，商议筹集医药费问题，刘铸伯与何启、何福、刘渭川、蔡紫薇、冯华川等参加聚会，会上提出，“本医院急需五千元，本院专为华人之负病者而设，自当恤之”，刘铸伯与众值理当场提出，通知各行会商捐，很快就解决了雅丽氏医院燃眉之急。

另据《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一文记载，刘铸伯“任洁净局绅五年，曾办理局员受贿案。又当定例局员八年，为华人谋利益之事甚多，倡设公立医局，其最著者也，其关于不便人之则例，莫不力辩驳”。

在香港疫症大流行的1904年，刘铸伯与何甘棠（何福）、冯华川等创办公立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疗。他在处理香港鼠疫这一公共卫生事件中，敢于为华民代言，备受各方仰重，而此时的东华医院也成了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沟通的重要管道。1905 年12月30日，华民政务司致函东华医院，召集全港华商代表商议将医院赠医处改作“女栖地方”，信云：

日昨督宪亲临保良分局，体察局内一切情形，深羡办理妥善。惟所有留居难女，良歹不齐，倘任其同居共处，恐彼此互相师效，习染更深。惜局中房舍无多，势不能将顽愚之妇女另安置一所，且女栖地方，究竟湫隘，终日幽闭，此中别无舒散之处，未免有致病之由，在办事者定费踌躇矣。再四思维，独有贵院赠医处一所，与局毗邻，倘可将该处让也，展拓局地，庶不致有种种烦难，且更能将局后新院相通之路并归彼处同用，愈觉合宜。以上各节皆督宪所划之策也。经特委本司与贵院同人会商，以定可否。忖思退让医院物业，事体重大，不欲列位当年总理独专口任，故于本月二十八日邀集下列各绅董署聚会，宣明督宪之美意。旋蒙列绅答应，均谓尽可办理得到，但仍须取决于当年总理等话。兹将是日会商情节布达左右，并请贵院邀齐各位绅董，再为酌议，决定从速，据实函知本司，以便转详督宪察核。

获邀参加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历1906年1月22日）聚会的华商15人及其身份如下：梁培之（未到，1904年东华医院主席）、古辉山（未到，1895年东华医院主席）、阮荔邨（未到，1900年荣华医院主席）、陈紫垣（未到，1901年东华医院主席）、邓兰毅（1904年保良局总理）、周少歧（1903年东华医院主席）、刘铸伯（1899年东华医院总理）、卢冠廷（1899年东华医院主席）、胡海筹、叶霭山（华商公局值理）、何晓生（即何东，1898年东华医院主席）、李右泉（华商公局值理）、刘荫泉（华商公局值理）、何泽生（华商公局值理）、潘寅存（华商公局值理）、陈赓如（即陈赓虞，1905年署理华商公局主席），到场的还有两位定例局局员何启和韦玉。

19世纪末，油麻地人口以榕树头天后古庙为中心向外扩张，为了满足住屋需要，香港政府于1900年再次填海，海岸线伸展至今日的渡船街。1906年丙午风灾后，政府计划在海旁兴建避风塘，并觉得有需要在区内兴办一所为华人而设的医院，免使病人需要舟车劳顿到港岛求医。

1907年，刘铸伯与何启爵士等社会贤达，正式建议在油麻地设立中式医院，以应对九龙及新界居民的医疗需求。据《东华医院百年史略》“大事年表”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丁未（1907）年，……（二）当年总理鉴于九龙区未有华人医院，病者辄渡海至东华医院，留医咸感不便。值港绅何启、韦宝珊、刘铸伯等，发起在油麻地设立华人医院，一切制度，悉仿东华，当年总理襄赞其事，并响应募捐建费。”

同年，何启任广华医院倡建主席，刘铸伯与韦宝珊、冯华川、邓志昂、李右泉、陈启明、黄丽川、李凤珊、周少歧、潘寅存、何萼樱、周炽卿、何甘棠、古辉山，唐丽泉、招颂侯、胡海筹等任倡建总理。此外，尚有各界人士及各行商号支持创建计划，出任倡建协理、倡建值理。

院址选在油麻地，定名广华医院（Kwong Wah Hospital），与东华医院相呼应，“广华”之名意指服务广东华人为主。港府拨给三万元，不足之数均由官绅捐助。1908年，

"广华医院创院主席何启暨全体总理继续进行筹建医院，移山爆石，推进地基工程"。关于选址油麻地建广华医院一事，1911 年的"征信录"也有记述："油麻地居香港之背，相隔一水，其地为新安土股之极端，居民繁庶，不亚于香港，而是地向无医院。其有疾病，皆来港就医。时或疾风暴雨，惊涛骇浪，欲济无舟，严寒酷暑，中途阻滞者，不知凡几。故创院总理，均以是地医院之设置，较之港埠，尤刻不容缓。"

1909年（农历己酉年），刘铸伯当选为东华医院主席，罗文亮、陈应霖、李炳荣、梁汝成、潘惠猷、李贤耀、徐寅初、岑兆征、胡铉、卢德贤、陈云绣、曾衡、陈鸿泽、胡礼倬等14人担任总理，任内积极拓展院务，兴建广华医院，募款赈灾。据《东华医院百年史略》"大事年表"显示：在刘铸伯任内，"广华医院创院总理，以建院工程，尚需时日，为期使半岛居民，求医有所，乃先在地段内张搭茅棚，权充赠医之所"。又说："1909年，当年总理筹建之油麻地分局乃分担对九龙居民医药服务之唯一机构，其时，广华医院仍在筹建中。该分局址设在油麻地海旁，交通方便，每日门诊人数甚多。"广华医院创办时期，院务工作，千头万绪，事责之繁，由此可以想象。

广华医院最终耗资130000元，历时5年才告落成，于1911年10月9日由港督卢押爵士主持开幕。翌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推翻了清廷帝制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

广华医院竣工后，何启、刘铸伯等功成身退，将这所医院移交东华医院管理。广华医院第一任值理共6位，包括陈柏朋、方建初、崔秩山、梁植初、余植卿及香文。

同年，香港政府出台《在九龙半岛建设医院治疗华人病者法规》，略谓："查在九龙半岛兴建医院，疗治华人病者一案，业经捐有的款，并蒙英皇恩准拨捐官地一方，集资兴建该院，现因该院建筑不日蒇事，而捐款者，愿将该院移交东华医院接管，允宜特定章则管理之。"此外，还出台了《广华医院选举就近总理规条》《广华医院巡院及驻院医生章程》《广华医院司理人办公规条》。



1911年10月9日，港督卢押爵士（前排居中戴礼帽者）主持广华医院开幕礼，卢押身后穿白衣者为刘铸伯

建院初期，广华医院只能收容72名住院病人，广华医院运作初期经费不足，1914年华民政务司决定参照东华医院接收荷李活道文武庙

的模式，把榕树头天后古庙的管理权移交广华，其尝产收入拨作医院经费。其后水月宫和大角咀洪圣庙因政府开发土地而迁建时，广华医院支付有关费用，这两所庙宇亦交由广华管理。

1930年，香港政府将法例修订名为《东华三院条例》（*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Ordinance*）以包含东华辖下三间医院：1870年成立的东华医院、1911年成立的广华医院以及1929年成立的东华东院。1931年三间医院统一办理，由一个董事局施行决策。



东华三院博物馆

曾用作登记室和诊治室的广华医院大堂，是该院目前硕果仅存的早年建筑物。东华三院于1970年庆祝100周年纪念时，将大堂改为东华三院文物馆，收集和保存有关东华的档案文物。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物是来自荷李活道文武庙的化宝炉，年份为咸丰元年（1851年）。跟东华有关的最古老文物，则是1873年的东华医院征信录。

2011年6月29日，服务香港一百年的广华医院为庆祝百岁生辰，特别举行，东华三院主席暨广华医院医院管治委员会主席张佐华、医院管理局主席胡定旭及艺人汪明荃等一众嘉宾主持启动礼。广华医院举行系列庆祝活动包括：10月的慈善分步行和两岸四地中西医大型医学研讨会，次年3月的历史音乐剧等连串精彩纪念活动，共贺广华百周年。

而在亚洲电视主办的“2011感动香港年度人物/机构评选”中，广华医院荣膺“十大感动机构”，成为该评选自2010年设立以来首个成功以机构或团体名义获得有关奖项，足以证明社会各界对广华医院的认同。

次年2月份，广华医院百周年压轴庆祝活动《百载一心》音乐剧，在香港理工大学赛

马会综艺馆举行。这部音乐剧的所有歌曲均由广华乐队BandOne原创，并由医院一众医护人员演出，包括医院各级各部门员工及护士合唱团，以自身角度演绎对广华的认识与情怀，演活广华百年来的变迁。活动中，大会更举行时间锦囊封存仪式，将有关广华医院百年庆典的物品和珍贵片段存于时间锦囊内，在广华医院内存放，为广华医院100周年庆祝活动划上圆满句号。

参加纪念活动的嘉宾，自然不忘何启、刘铸伯等社会贤达当年创建广华之功德。他们深感有种与历史同行的感觉，高度评价广华创院以来对香港社会的贡献，冀望结集成书的历史集册令市民更加了解东华及香港，并更加重新认识华人世界的慈善事业发展史。

东华医院成立初期，已在院内收容伤残无依或逃避天灾战祸的同胞，但难民与病人同处院内，彼此均感不便。1909年刘铸伯在东华医院主席任内，除了大力推动筹建广华医院之外，还决定在医院右方医院道兴建安置难民、流民的专门机构“栖流所”。据《东华医院百年史略》“大事年表”记载：“（1909年），当年总理以医院老弱妇孺，久留不去，亦有流寓难民，待遣回籍，但杂处其中，不合卫生，及在院右方之医院道旷地，兴建‘栖流所’，以安置难民，工程费一万五千元，可容难民百人。”《东华三院百年史略》收录了刘铸伯当年拟定的《栖流所管理规则》：

（一）本院设栖流所，安置过境难民。

（二）本所设管理人员，专责管理，并办理有关过境难民之收容及遣送事宜，管理人员由慈善部指挥工作。

（三）本所内外地方，须经常打扫洗濯，以保持整洁及卫生。

（四）栖流所难民出入路线，须与医舍分开，以免与病人混合。

（五）开膳时间上午十一时下午四时，由管理人员监视分配饭菜与难民，届时须亲自到领，不得请他人代领。

（六）本所设置登记簿册及各种表格，及经过收容及遣返难民，每人登记并缴贴照片一张附贴表上，以资查考。

（七）难民留所时间之久暂，由董事局酌情决定。

（八）难民亲友不得在所内留宿。

（九）本所每年须修理及扫灰水1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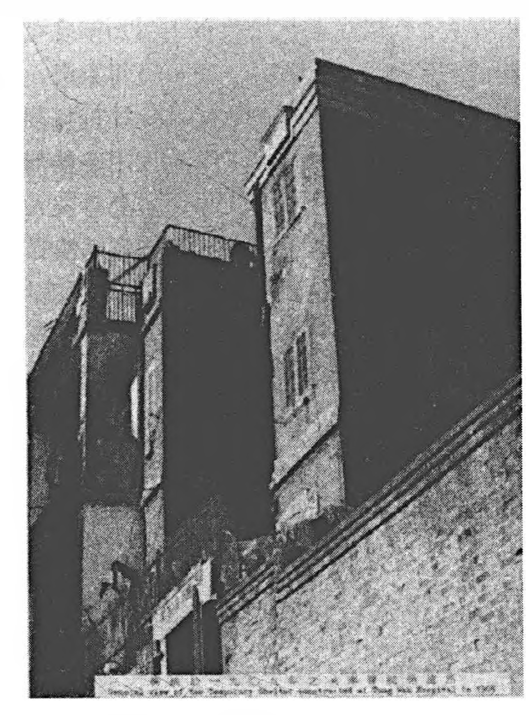
（十）本所规定晚上十时关锁，栖流难民须于十时前回所。

（十一）难民如不遵守规则，本院可随时着命其离所。

刘铸伯发起兴建的“栖流所”，设有专人管理，类似于今天的收容站。据《清会典事例·都察院·栖流所》记载：“顺治十年覆准，每城建造栖流所，交五城管理，俾穷民得所……如遇无依流民，及街衢病卧者，令总甲扶入所内，报明该司。”《清史

稿·食货志一》："外来流丐，保正督率丐头稽查，少壮者递回原籍安插，其余归入栖流等所管束。" 这也可见，"栖流所"、收容站之类专门的慈善机构古已有之。

东华医院的"栖流所"竣工后，为流落在港、无依无靠的难民提供暂时落脚之地，以待遣送回籍。在战乱、动荡年代，内地民众纷纷拥入香港，栖流所开始超负荷运转。据记载，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期，当时多达15000位广东难民抵港，由东华接济及收容，"栖流所"一时之间最为挤拥。1935年，东华医院一度关闭"栖流所"。至1937年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东华重开栖流所，并负责管理营地，为难民提供膳食。1946至1949年内战期间，东华不时派发白米、棉食、旧衣等物资赈济在山边搭建寮屋的难民。栖流所其后断续重开了几次，直至1960年才正式停用。



1909年，东华医院获政府拨出医院附近地段兴建栖流所，可收容300余人

1908年东华医院冼德芳主席任内，倡议将保良新街民房拆卸，改建痘局，以解决传染病人与普通病人杂处的问题。1909年，东华医院主席刘铸伯召开董事局会议，议决除兴建新街疫局及西环东华痘局外，计划筹建九龙油麻地痘局。当年7月发动募捐，集款达六万四千余元，其中有日本商人捐助三千一百元，声明拨归东华医院公款。同年8月，新街痘局（仁恩病房）竣工，西环坚尼地城分局改建，亦于翌年完成开幕，定名荣华痘局。

刘铸伯任内，还对东华医院义学规制进行了改革。1880年，东华接办文武庙让出的义学中华书院，并以文武庙的收入成立第一所文武庙义学，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至1903年已开办义学八间，众多贫苦子弟受惠深广。1908 香港政府订立《文武庙条例》，由东华医院管理文武庙，以文武庙的收入资助学校经费。

为了防止学位被成绩差劣的学生占用，1907年，东华医院规定学生留校年限，以五年为期，自入学之日起计算：在校学生年龄不能超过15岁，否则退学。刘铸伯认为两者互相矛盾，与实际情形不合，因为就读义学的贫苦子弟入学时已经超龄，学习期限未满即年届15岁，不得不退学，未能接受充分的教育，这违背了举办义学的初衷。有鉴于此，他在任内宣布：在学学童，无论成绩高下，不用抽签，均可留校；留校年期，由入学之日起计，以五年为期，期满则饬令退学。这两项改革既切合实情，也不违反政府则例，贫苦子弟尤为受益。从此，无论年龄、成绩，他们均可入学就读，较为充分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大大扩展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东华医院这个慈善机构于1870年成立，1885年因赈济广东水灾，获光绪皇御赐“万物咸利”牌匾。1970年，正值百年大庆，东华三院发行百年纪念邮票“苦海慈航”。所谓“苦海慈航”，意指人生难免挫折与苦痛，面对每一个偶在个体的哀伤，佛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至彼岸，不可不谓用心良苦。而东华三院创建以来，一直坚守着“苦海慈航”的使命。当然，度人者也难免有被人误解、责难的时候，比如刘铸伯担任东华医院主席这一年，“三月间有人指摘省港澳合办之救灾公所经年未公布数目。本院推出总理周少岐等十人赴穗调查，始悉征信录已在印刷中，可释众疑”。

此外，对于东华医院善款的使用时有争议。也是刘铸伯担任东华医院主席这一年，故乡新安县等地遭受旱灾，他排除异议，力主拯乡民于水火，据《东华三院百年史略》“大事年表”记载：“……（三）是年新安（宝安）、东莞各县大旱，救灾公所拟办平粜。本院昔日水灾赈款余存十余万元，虽有决案不能移作别用，但救济旱灾与救济水灾并无二致，因同意移款办理平粜。”

第四节　吾土吾民（下）

刘铸伯虽然以买办起家香港，但是，就像他的儿子们撰述的《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所言：“顾先考虽生长香港，自学成后，固未尝一日忘祖国”，“越乙巳（1905年），应北洋大臣杨制府之招，任渔业总办兼洋务会办，而卫生局、巡警局皆资佐理，然其时国是未定，财力亦绌，先考以大纲不具，徒从事一二节目，终未有能济者，遂决然引退。未几，农工商部某巨公屡电促入都，将任以要职，辞不就”。

这位北洋大臣杨制府，就是清末封疆大吏杨士骧。杨士骧为官“以干练称于时”，从翰林院外放直隶通永道，不久升为直隶按察使，又迁江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1907年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泽京在《千年古邑盱眙郡 举人进士泗州杨》一文中说，杨士骧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练兵筹饷，兴办实业，整饬财政，促进了晚清近代化进程。

此前，刘铸伯与杨士骧有过交集吗？无论如何，杨士骧聘任刘铸伯为渔业总办兼洋务会办，以及刘铸伯在为渔业总办兼洋务会办任上的作为，都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

刘铸伯与杨士骧的直接交集，也许是赈济顺直水灾，《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说：“……1909年乙卯，顺直赈捐出力，杨制府奏保以道员候选加盐运司衔，赏换花翎。”

“顺直”是一个历史地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和天津、北京两省一市的区域，清代在此设立直隶省和顺天府，此后人们一度就用“顺直”来称呼这一带地区。光绪33年（1907年），杨士骧代袁世凯为直隶总督，袁改任北洋大臣。



杨士骧（1860—1909）

1909年（己酉），地处直隶的永定河泛滥成灾，殃及京津地区。此时清政府积重难返，大厦将圮，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为了解民倒悬，清政府向香港等地富商劝捐，刘铸伯闻风而动，踊跃捐输。为此，杨士骧奏保刘铸伯以道员候选加盐运司衔（三品），赏换花翎。

我们目前看到的一封刘铸伯宣统元年（1909年）以孔圣会会长身份回复“钦加三品衔在任候补道调补广州府正堂礼乐局局长高”的函札中，特别署名“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候选道孔圣会会长刘”。

中国近代的买办商人，如徐润、唐廷枢等往往是亦官亦商，刘铸伯虽然有“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候选道”的头衔，似乎并没有全身心跨入官场。顺直赈捐后不久，农工商部某巨公屡次电邀刘铸伯，促其入都，将委以重任，被他婉言谢绝。民国成立后，广东方面拟请刘铸伯出任财政厅长，同样被他婉言谢辞。关于此事，《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有以下记载：

> 未几，农工商部某巨公屡电促入都，将任以要职，辞不就。民国之初，粤吏欲任以财政厅长，亦辞不就。先考语人曰：“吾性不乐仕进，但欲与国事有所补救耳，顾以格于时势，既一再试而不效，屡出亦复何补？故终不愿为冯妇，非敢以是鸣高也。”闻者韪其言。
>
> 先考无党见，顾盱衡时变，往往私忧窃叹，于兴革损益，多所主张，每有发抒，不曲徇时俗，亦不为过高之论，务求平实可行，一时士大夫多传述之。元首及疆吏闻其贤，屡以礼聘为顾问，先考以职在宾友，无官守，言责未当，不勉就焉，然事权不属，亦聊自效于万一而已。然先考之为祖国谋者，固不必规规于政途中也。

作为东华医院董事局成员、总理、主席，洁净局局员，保良局总理，华商公局及香港华商总会（今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广华医院倡建总理、定例局局员，刘铸伯一直心系同胞安危。

香港的地理位置特殊，天灾人祸不断，在没有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的情况下，东华医院责无旁贷地发挥了这一功能，为华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救济、丧葬等服务。1895年、

1906年台风相继肆虐香港，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特别是1906年，香港遭受了史上最严重的台风灾害之一。据统计，此次天灾，致使香港地区80%的船只被毁，房屋倒塌无数，仅从海中捞回的尸体就达1800多具。灾后的香港像一座死城，满目疮痍。救灾工作展开后，港英政府将全部工作都交由东华负责。收容灾民、打捞尸首、殓葬死者……东华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赈灾工作，海内外为赈灾所筹的款项也都转交东华处理。

清末，广东时时发生粮荒，广州商界多次举办平粜，因为从越南进口大米要经过香港，更需港商的合作。1907年，广州九大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联合香港东华医院建立了一个“省港善堂商会行商平粜总公所”，在广州及附近举办平粜。

1908年六七月份，广东连日大雨滂沱，广肇韶惠各属遭遇洪水之患，东西两江水暴涨，水势骤高数丈，冲毁屋宇基围甚多，米店全无米卖，饥民遍地，哭声震天，惨不忍闻。据香港筹办广东赈济所报告称：此次水灾田禾已损伤百分之八十，无家可归者二五八千四百人，无食者二十五万人，损失之数约值洋一千万元，修补其围之款，需银五万两，目下急需赈款洋百余万元。

广州九善堂、总商会、七十二行开会决定成立救灾公所，“省港合办筹款”，会后即致电香港东华医院，通告议决情况并要求东华医院“电外埠协助”。东华医院立即复电同意，并汇寄2万元，先施公司、真光公司也捐助了款项。刘铸伯等香港东华医院绅商紧急募捐救济灾民，同时以东华医院名义，在《申报》刊出致上海广肇公所告白：“粤西北江水骤涨，崩基数十处，人民财产损害无数，饥民百万，惨甚！省港筹赈，乞贵埠协助东华。”

此外，刘铸伯等还组织香港各界市民，发起大规模的义卖赈灾活动。他的密友胡礼垣作有《戊申年水灾香港女界售物赈灾诗歌十二首》，其一有云：

> 豪情侠骨任艰劬，如此英雄自古无。
> 世界欢娱望谁属，群仙原是上清珠。

该诗自序说：“戊申粤东水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而女界售物以赈灾，则中国数千年来所未闻，是不可以不志也，志之以诗，使家喻户诵咸兴感焉。或嫌售物规则，中有未合，不知事当创试，容有未周，苟志于仁，自然近道，他日民皆仁寿，路尽康庄，天下和亲，物我无间，皆由此始，此当日提倡办理售物诸士女， 正逍遥游客所愿铸金事之，馨香祝之者也。”

香港各界义卖赈灾款项，全部交东华医院转粤商自治会救灾公所。受此启示，广州也发起了义卖赈灾活动，据7月16日《申报》记载：“省垣卖物义赈会之组织：日昨自治会提议，在省仿照香港卖物赈灾会办法，举办广东卖物义赈会。经众赞成，宗教家尤热心担任。现已定期十三日通请绅商学报慈善宗教各同人集议，各举干事员，公同组织，择地开办。”

对于东华医院募集的善款如何使用，粤商自治会救灾公所曾经开会公议。据《申

报》7月11日报道："省救灾近状：一、救灾公所初五日议案：第一条宣布三十帮散赈情形，众公认；第二条宣布东华医院来函所陈事款，请公议，众议应即将散赈情形并将日前议定请各乡围赶筑秋栏，及请粤路公司招工筑路，另经禀请大吏派委会同本所会员前往查察缺围实情，函复东华医院，请其举员到所商同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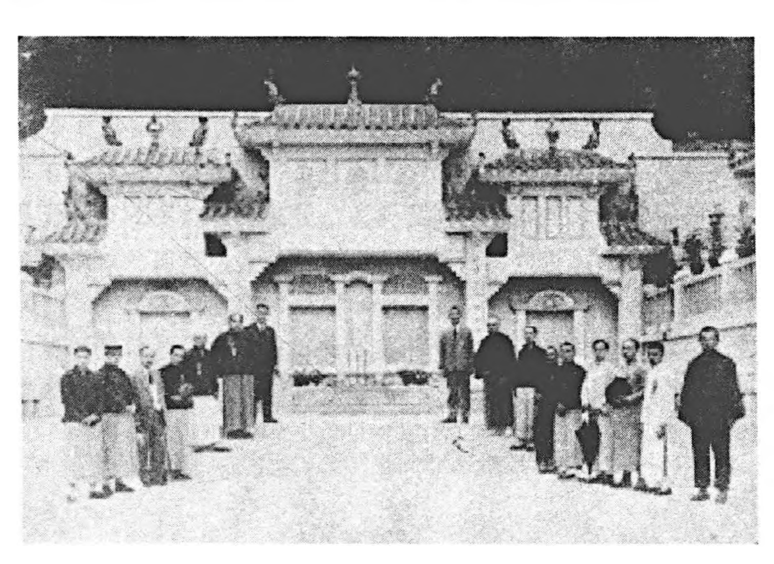
到8月初，东华医院已为救灾公所代收各埠捐款20多万元、香港捐款9.2万多元。如果考虑到当时香港正是瘟疫流行，东华医院对救灾公所的贡献就更加值得称道了。此后，东华医院派潘寅存、陈卓卿、李石泉、谢家复等同人赴省垣，"公推府宪为正主席，潘寅存为副主席，先议二十一日公定救灾善后事宜九条"，"众议由平粜公所定期邀集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香港东华医院，调查存款多少，可支时日若干，公定切实展限办法"。

1909年冬至1910年4月，广东全省发生旱灾，许多县份颗粒无收，新安（今深圳市）、东莞两县尤为严重。刘铸伯当即筹办平粜及散赈工作，并吁请各界支持，筹款二十余万元，与广州广仁善堂合作，在各州府举行平粜（用捐款收购粮食，再以平价卖出），对救灾赈济起了积极作用。（见本章第三节）

1915年广东再度遭受重大洪灾。7月13日，珠江上游堤围崩决，造成广州空前大水灾，西关、河南较低之地水深至门楣及没顶，死人塌屋，灾情惨重，史称乙卯年大水灾。刘铸伯再次挺身而出，发动香港绅商捐款赈济同胞。（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此外，作为东华三院总理、主席与永久顾问，刘铸伯协助东华三院同人妥善处理香港跑马场"戊午惨案"，颇值得大书一笔。

1918年2月26日，香港跑马地举行一年一度的周年跑马大赛，当时正是农历正月十六日，场内观众爆满，气氛热烈。其时马场设施简陋，观众席系用竹料、木板、葵叶等易燃物临时搭成多层简易看台。当赛事举行至第五场时，观众棚突然发生倒塌。是时风高物燥，棚下为烧卖熟食的摊档，炉火正旺，风乘火势，烈焰冲天，施救不及，酿成六百多人死亡，成为香港历史上死伤最严重的灾难之一。此次火灾发生之年是农历戊午年，故又称"戊午惨案"。



咖啡园"戊午马棚遇难中西士女之墓"落成

"戊午惨案"发生

后，港府医院以及东华医院等慈善机构全力搭救，捡拾残骸，又请牛池湾万佛堂的道侣为死难者建醮超度。事后，东华三院议决，请求政府拨地兴建马棚火难公墓，得政府拨出咖啡园山地，将遇难者遗骸约600具合葬于咖啡园坟场，即“戊午马棚遇难中西士女之墓”，并立碑文以志其难。

墓园牌坊上，刻有当年总理所题联语：“旅梦安归惊断离魂余劫烬；马蹄何处嘶残芳草剩烧痕。”此外又有东华医院所题挽联：“痛百年未有之奇灾死者难瞑目生者至伤心造物非不仁忍令断首残肢委诸芳草，合诸天无量三宝佛吹起大法螺摆起大法鼓游魂当来享尚翼联翩逐队证此菩提”“谁谓无苦海谁谓无火坑痛诸君断体焚身跑马场中成浩劫，那处是天堂那处是地狱仗我佛超生渡灭咖啡园畔有精魂”。三副对联对仗工整，语极凄切。

咖啡园墓园于1922年建成，除主碑外，尚有中英文墓铭及亭塔建设。每年秋时节，东华三院当年总理均前来拜祭。墓园业已被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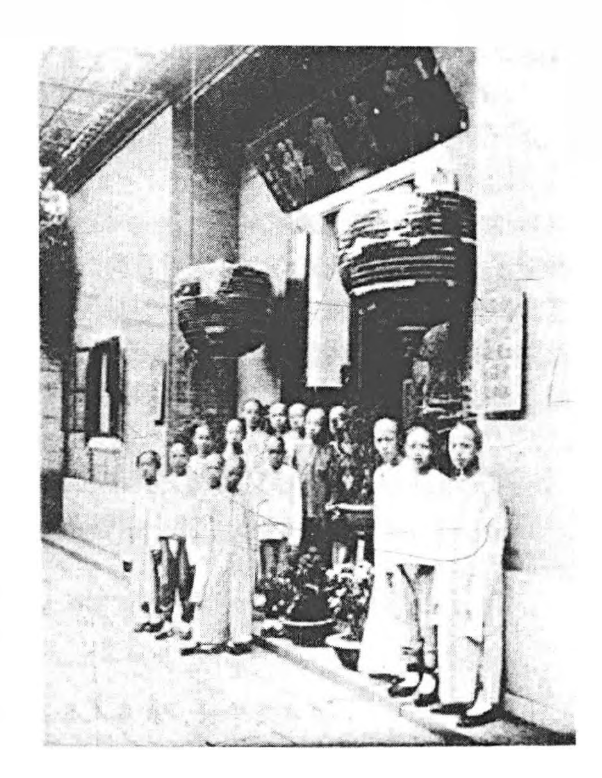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育才书社

当有清季世，我华人知立国之道，莫先于教育。其时各省，学校方始萌芽，先考乃与爵绅嘉道理先生，集资二十余万，设育才书社于香港，分设于广州、上海，以教华人子弟。广州之有公立学校，自先考始也；其后，港立大学集资至七十余万，亦先考赞助之力为多，华人子弟其英秀者，多就学焉。两校成绩，至今固彰彰也。

——刘富宗等《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该绅（刘铸伯）等联合同志，捐集经费，拟在广东省城河南及香港创设书塾三所，名为育才书社，招选聪颖少年肄习中英文学等情。查兴学造士，实今日第一要图。惟和局甫定，两宫犹未回銮，是以学校一事，国家虽有意振兴，尚未暇广为开办。今该绅等为开通民智、裨益人才起见，集资数万之多，竭志经营，成斯善举，苦心毅力，深堪嘉尚。依利士·嘉道理以外国商人，久居中土，独捐银至四万，尤为慷慨，性成不分畛域，本部堂不胜欣慰，应即准予立案，并俟省城河南两书社择定地址后，再行禀请札饬该地方官给示照料保护，其一切办理情形，仍着随时禀报察核。

——两广总督陶模



广州育才书社老照片，校舍门楣上方悬有陶模题写的“育才书社”匾额，大门两旁挂有“书社重地”“闲人免进”木牌。

育才書社勸捐小引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二日

刘铸伯在《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育才书社劝捐小引》（1901年11月13日）

第一节　作育英才

19世纪末期的中国，已经病人膏肓，积重难返。1900年，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盲目排外，打杀传教士与教民，一时间罡风席卷华北，其直接结果是导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而在香港，何启与陈少白密商，拟请孙中山帮助两广总督李鸿章组织广东“独立政府”。此事没有下文，孙中山遂与同志纠集兴中会党人，利用三合会的力量，在惠州府归善县三洲田（今属深圳市盐田区）发动武装起义，谋取华南独立。

1900年10月，孙中山坐镇台湾策划的惠州府归善县三洲田（今属深圳盐田区）起义，实则是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三洲田起义，史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等，香港兴中会骨干杨衢云、郑士良以及新安县会党领袖黄福、黄耀庭等，均参加了庚子之役。按照原订作战计划，义军占领深圳墟和新安县衙南头，直逼广州，孙中山由台湾内渡指挥，史坚如在省垣招集同志响应。

10月6日夜，郑士良、黄福等集合三合会党600余人在三洲田马栏头祭旗誓师，猛袭新安沙湾，清军溃逃；义军乘胜向深圳推进，直逼新安县城。但在日本的干涉下，郑士良率众改向惠州进军，准备打到厦门去迎接孙中山并领取他在日本订购的一批军火。15日，起义军与清军战于佛子坳，缴枪700余枝，继又在镇隆大败清军。其后，在永湖、崩岗墟又连挫清军，各路会党人物群起响应，队伍发展到2万余人。

郑士良在惠州率众苦战之际，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不得当，遂把地道挖到两广总督德寿的住宅下面，谋用炸药解决这颗“毒瘤”了事。但是，“炸发不中，而史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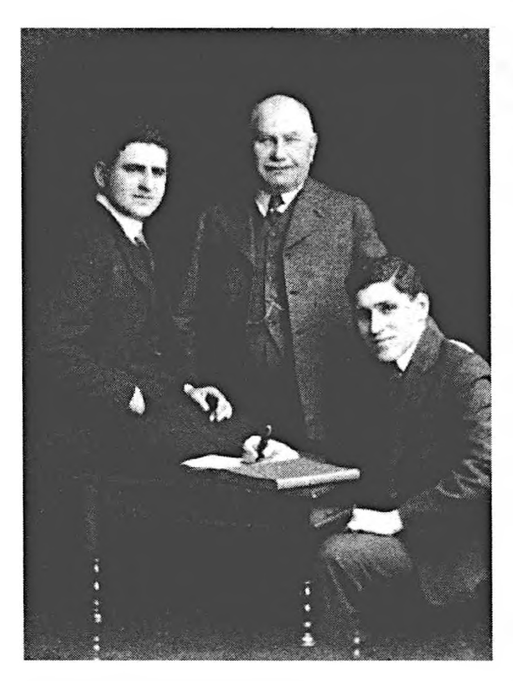


2001年10月，三洲田起义雕塑园在深圳市盐田区奠基

如被擒遇害，是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也”。而在台湾方面，因新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突然改变了对华政策，禁止日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帮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下令禁止军火出口，孙中山只得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传达其指示，请郑士良自决行止。郑士良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解散起义队伍，仅率少数骨干避往香港。1901年1月10日，三洲田起义组织者之一的杨衢云，被两广总督德寿派来的杀手刺杀于香港。

三洲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为兴中会日后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以及辛亥革命的成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孙中山给予高度评价，诚如他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一书中所言：“经此次（指三洲田起义）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指乙未广州起义）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义和团事件与庚子首义失败之后，中国更是面临着列强瓜分的空前危机。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下诏变法，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开始实行所谓“新政”。在“新政”推行的最初三年里，比较突出的有三件事：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命各级书院分别改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引进新式教育，并且提倡出国留学；三是改革政制与军制。其实，所谓“清末新政”，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是戊戌新政的继续，它是在不触动旧有的封建势力的基础上采取的防危补救措施。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清廷向西方列强讨好的一种表现。


老嘉道理与他的两个儿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弟子欧榘甲，1902年出版《新广东》一书，倡导广东独立，同时大肆抨击中国富商不知保国、麻木不仁：“外国之有富商，足以兴国强国，中国之有富商，足以亡国灭国，无他，知爱国与不知爱国而已。惟其知爱国也，故恐其国之不兴不强，而尽出其富有，以助能兴能强之人。彼岂不知致此富之艰难，而留以自享，并以遗娇妻美妾、骄子爱儿之用哉？岂其见识不如中国人，不知广置姬妾，置田宅，长子孙，朝歌夕舞，以乐余年，以偿昔时之辛苦哉？然而彼不

屑为之者，则以为国且不保，家于何有？己身易过，子孙奈何？与其无国而无家，不若破家以救国，国存则家存，国亡则家亡。”他举例说：

> 犹太之人，富甲地球矣，只因无国之故，到处为人所逐，等于无告之民。香港育才书社发起人之伊嘉理氏者，即犹太人也，其言曰：“我无国可归，虽多财无用。今中国危亡，众华商尚不早为之所，其将蹈吾犹太人之覆辙乎？”其言可悲，其事尤可鉴也。

欧榘甲这里所说的“香港育才书社发起人之伊嘉理氏”，就是20世纪初年大名鼎鼎的香港殷商、慈善家伊里士·嘉道理爵士（Sir Ellis Kadoorie）。

嘉道理家族是犹太人，祖先世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是当地知名的商业世家，18世纪时迁居至印度孟买。清朝同治年间（一说1880年），老嘉道理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怀揣着少得可怜的盘缠和发财梦，风尘仆仆地抵达当时尚不繁华的上海，投靠远房表亲伊利亚斯·大卫·沙逊。



位于广州沙面南街42的沙宣洋行旧址（建于1862年）

沙逊家族同样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商业世家，起源于中世纪从西班牙逃难到中东巴格达的犹太人家族。老沙逊（1750—1830）曾经是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他的儿子大卫·沙逊（1792—1864）受到持反犹态度的新任行政长官的迫害，1828年带领全家逃到波斯湾港口布什尔，1832年又逃到印度孟买，成立了经营国际贸易的沙逊洋行，把庞大的家族成员安置在印度、缅甸、马来亚和中国的各个分支机构，并在每处供养一位拉比（Rabbi音译，有时也写为辣彼，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

大卫·沙逊的8个儿子继续向四方扩展，他的首任妻子所生的儿子伊利亚斯·大卫·沙逊（1820—1880）1844年来到中国，19世纪60年代成立新沙逊洋行（E. D. Sassoon），办事处设在香港和上海。

嘉道理家族投靠远房表亲伊利亚斯·大卫·沙逊后，经过多年打拼，在上海发迹（一说从事鸦片贸易），后来成为香港富豪与著名慈善家。

生計者就一國之大而論貧富哲愚其數恒不相敵豈乏經術湛深文章炳蔚者足爲邦國之光而林林總總之流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偭規越矩率意妄行亦未始非白璧蒼蠅之一玷孔子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可知國人無論上下智愚皆不可不有以教之也竊思中國地大物博世家巨室富商大賈擁貲千百萬者指不勝屈苟各出其贏餘集成巨款由一鄉一邑推之一省一國何難處處皆立學人人皆讀書而與泰西諸國相抗衡哉惜無人爲之提倡耳今吾有積金四萬元擬舉而畀之諸君以爲中國所設學堂之起點諸君其有意成之否余等嘉其心之無分畛域而憫吾民之向多目不識丁也爰集同志商議卓見僉同因擬於省港等處先創設學堂名曰育才書社中西學義塾延請精於漢文西文者當師席妥立章程以教中國貧賤子弟之無力從師者但是工程甚大需用極繁所冀志士仁人淋漓落落慷慨解囊毋讓美於外人務襄成此舉尤冀有心世道者推而充之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鄉各爲之倡始以彰我中國聲名文物家詩書而戶絃誦之盛也是則余等所深爲企禱者爾是爲引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歷一千九百零壹年三月八號 育才書社謹啟

刘铸伯拟定的《倡建育才书社中西学义塾劝捐小引》

刘铸伯等香港绅商，数年前颇有广设学堂、开通民智之议，但是苦于办学经费无法筹措。清廷关于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广设新式学堂的“新政”改革措施，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支持。但是当时的情况，正如刘铸伯《自治须知》一书所言：“目下广设大学堂及中学堂……独是朝野交困，多设学校，似为无米之炊，此事煞费踌躇……”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第27期刊登《中国之慈善教育》也说：“今中国竞言教育矣，其最难者曰筹款，而问其款中之最巨者，则首推膏伙，教师器械之费又次之；夫学生而至求款作膏伙，则宜乎学堂之难办也。列国之兴国民教育，皆以义务迫民就学，取其学费，受其束脩，毫无假借，何论膏伙？中国则不然……”

就在这时，香港殷商、慈善家依利士·嘉道理爵士与刘铸伯等晤谈，愿意捐巨资办学。1901年3月8日，《香港华字日报》刊出刘铸伯拟定的《倡建育才书社中西学义塾劝捐小引》：

中国古称声名文物之邦，多有目不识丁，身不率教者，何哉？学堂之设，未遍于国，贫贱之子，无力从师。方今海禁大开，梯山航海，华洋杂处，中外通商，非尽吾民皆读中国之书以养其体，兼涉西国之学以广其用，何以人人能明道理、增见识、通语言、善交接，内以图一身之事业，外以彰一国之文明哉？则甚矣，中西学义塾之设，诚不容缓也。

西友伊利士·嘉导理君者，犹国人也，一日来谓余等曰：“国势之强弱，视乎民心，民心之聚，因乎教化，欲使教化无人不沾，必须学校无处不设。……生计者，就一国之大而论，贫富哲愚，其数恒不相敌，岂乏经术湛深、文章炳蔚者，足为邦国之光，而林林总总之流，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偭规越矩，率意

妄行，亦未始非白璧苍蝇之一玷。孔子云‘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孟子云‘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可知国人无论上智下愚，皆不可不有意教之也。窃思中国地大物博，世家巨室，富商大贾，拥资千百万者，指不胜屈，苟各出盈余，集成巨款，由一乡一邑，推之一省一国，何难处处皆立学，人人皆读书，而与泰西诸国相抗衡哉？今吾有积金四万元，愿举而畀之诸君，以为中国广设学堂之起点，诸君其有意成之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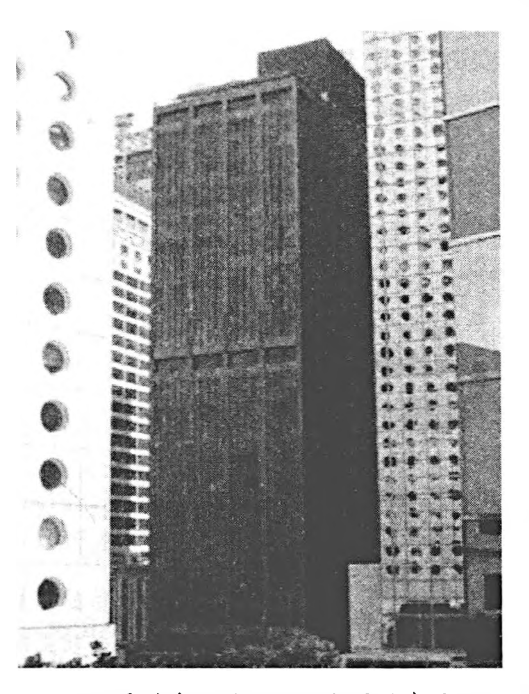
余等嘉其心无分轸域，而悯吾民之尚多无字碑也，爰集同志商议，卓见佥同，因拟于省港等处，先创建学堂，名曰“育才书社中西学义塾”，延请精于汉文、西文者当口师席，妥立章程，以教中国贫贱子弟之无力从师者。惟是工程甚大，费用极繁，所冀志士仁人，淋漓落笔，慷慨解囊，勿让美于外人，务襄成此举，尤冀有心世道者拓而充之，无论通都大邑，僻壤穷乡，各为之倡，始以彰我中国声名文物，家诗书而户弦诵之盛也，是即余等所深为祈祷者。因是为引。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西历一千九百零壹年三月八日

育才书社谨启

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香港育才书社办学劝捐启事。这则《劝捐小引》的签署日期，颇值得玩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本为西历1901年2月14日，《小引》发表时却加上“西历一千九百零壹年三月八日”字样。如果“西历一千九百零壹年三月八日”不是手民排版时，代为添加，这就说明，《倡建育才书社中西学义塾劝捐小引》拟定于1901年2月14日，正式发布之前经过反复修改，直到1901年3月8日定稿，也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篇文字。



位于香港中环的圣佐治大厦（嘉道理父子有限公司所在地）

1901年初，由依利士·嘉道理出巨资首倡，香港华人商绅冯华川、周东生、何泽生、刘铸伯等89人发起与鼎力支持，创办了一个颇为庞大的兴学育才团体——育才书社。嘉道理任主席，冯华川等10人任副主席，刘铸伯任司理。

香港育才书社管理机构的设置，可以参阅刘铸伯《自治须知》一书关于议员、局绅、董事、总理、值理等权限的规定：“凡办地方上公益善举，坐局及开设公司生意，必由同仁坊众或股友，立董事，局

绅等，以维持事务银两。而董事、值理，又自行推举一位为首，名曰主席，又一位为副主席，以备主席不暇，副主席代行其事。又一位为司理。”

嘉道理任香港育才书社主席，刘铸伯任司理。所谓“司理”，他在《自治须知》一书中说：“司理者，于公益善举中，有译名义务书记员，或宣布员。义务云者，系指其代记事，理文件，不受（辛）薪金之谓也。宣布云者，系指其代于议事时朗诵各议案，使众人周知之谓也。于生意中，则译名司理，又有等名为私家文案，此乃尊显官员或富贵之家，专聘为代理往来文件，及顾问所用。另设一位为司库，又名管理银两人，有不设，如不设，则由司理兼之，主席督之。”

育才书社成立伊始，嘉道理出资四万元作为开办经费，他的办学构想十分宏大。在他看来，中国地大物博，世家巨室，富商大贾，拥资千百万者指不胜屈，“苟各出盈余，集成巨款，由一邦一邑，推之一省一国，何难处处皆立学，人人皆读书，而与泰西诸国相抗衡哉”？果不其然，育才书社成立不久，很快募集到了六万五千余元善款。

1901年5月27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香港华字日报》刊载刘铸伯撰写的《育才书社告白》：

敬启者：本书社为培育人才，广开童智起见，特拟于本港及羊城诸处，择便逐渐推广，增创馆舍，务便就傅，毋使跋涉之劳；延聘中外通儒，专课中英文学，以其精益求精。荷蒙同志诸君子慨捐巨款，现惠助者六万五千余元，惟是经营浩繁，要须仍呼将伯，多得一分，即多做一分之事。伏念为善必有同心，总望大君子慷慨仗义，鼎力乐捐，助成美举，是所愿望焉。除另章程派送外，理合布闻，如蒙惠捐，请交本书社管理银项董事，立回收条，以杜假冒，实为公便。

管理本港及外埠捐款，同人公举：阮荔邨翁（万祥源南北行）、梁仁甫翁（行）、黄竹友翁（新沙宣洋行）。

管理外埠捐款，同人公举：冯华川翁（新旗昌洋行）、何泽生翁（渣甸洋行）、叶霭山翁（德盛南北行）、廖紫珊翁（招商港局）、刘铸伯翁（屈臣氏大药房）。

倡建本书社正副主席、司库、司理、总理等芳名列左：

主　席：依理士·嘉导理

副主席：冯华川　周东生　何泽生　冼德芬　廖紫珊　叶霭

1901年5月27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香港华字日报》刊载刘铸伯撰写的《育才书社告白》，拉开育才书社办学序幕

山　蔡子庄

古辉山　谭子刚　容兆谱

司　理：刘铸伯

司　库：阮荔邨　梁仁甫　黄竹友

总　理：招雨田　刘渭川　陈兰轩　李秀轩　陈春泉　陈敬亭　莫藻亭

周达堂　蔡子微　何棣生　温佐才　梁培之　李瑞廷　容翼廷

傅曦亭　何云裳　黄鸿达　蔡香圃　王旗三　李超凡　刘展廷

谢诗屏　余育之　刘小焯　周少岐　李礼和　罗秉石　马箣延

郁兰谷　薛棠谷　韦磷石　张舜臣　区见田　梁泽舟　莫梃生

刘协之　陈丽生　董瀛洲　吴理卿　李瑞石　张鉴四　李之照

彭勤生　张安澜　彭寿春　黄子裘　刘叶鸾　陈进祥　郭靖堂

冯曜东　陈硕臣　蔡子翼　曾汉初　蔡子裳　李纪堂　潘佩裳

郭耀垣　黄丽川　邓卓卿　巢庆旗　陈咏虞　陈焕鸣　叶湘云

源云翘　陈照南　关方谷　梁星垣　陈晓云　罗长肇　叶舜琴

麦雁云　罗持有　陈澧明　区嘉圃　林荷生　陈业堂　刘楚廷

冯寿珊　黎逊卿　蒋士楷　李竹如　郭少流　黄树棠　陈倬卿

罗礼泉　许顺村　张祥芝　钟纯暇　赵恒安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

香港育才书社同人谨启

由这份《育才书社告白》可知，嘉道理、刘铸伯登高一呼，万祥源南北行、新沙宣洋行、新旗昌洋行、渣甸洋行、德盛南北行、招商港局、屈臣氏大药房等香港与内地各大洋行的买办，群起相应，慨捐巨款。

有道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份“告白”公布了倡建育才书社的正副主席、司库、司理、总理名录。主席自然由依理士·嘉导理担任，担任副主席的冯华川、周东生、何泽生、冼德芬、廖紫珊、叶霭山、蔡子庄、古辉山、谭子刚、 容兆谱等人，同样是香江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担任司库的梁仁甫，1871年与王韬、黄胜、温清溪等人集股合办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又将中华印务总局改组为《循环日报》。梁仁甫的长子梁銮（LeungLuen Chiu）于1910年考取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是该校有史可查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香港育才书社这个清末民间教育机构，在刘铸伯等本地绅商全力支持下得以成立，很快就开始招聘教师。《香港华字日报》刊出的《育才书社告白》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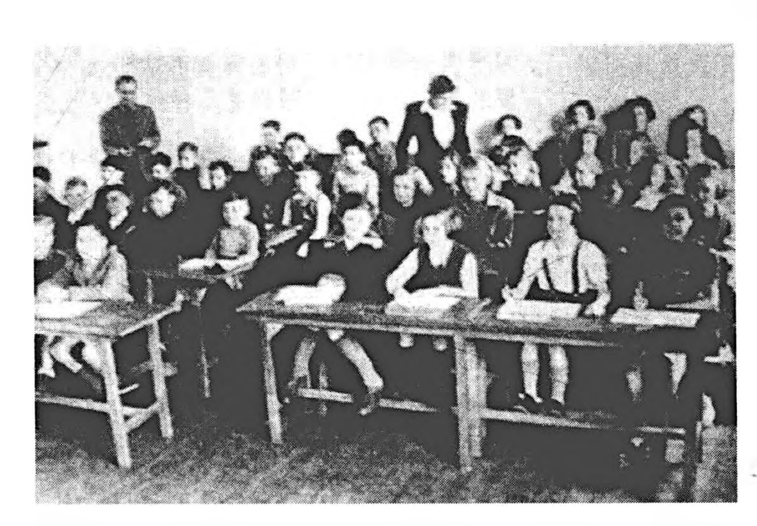
敬启者：本书社欲请华英文教习三名，每月佣金，英文正职伍拾元，副职叁拾元，教华文叁拾元，膳用等费在内。如欲试职者，请先将姓名、住址、经历函交香港中环屈臣氏大药房弟收，并于四月十五日礼拜六下午两点钟亲到中环旧海傍第四

号门牌本书社写字楼面试，勿误为荷。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育才书社司理人刘铸伯谨启

刘铸伯担任过淡水西学堂教习（后任总教习），深知选择教师的重要性，他在《自治须知》一书中说："目下广设大学堂及中学堂，不得不从外洋求师，以为各科教习。至国文一道，则不假外求矣……学中之蠹，每在于教习不得其人，故必严其选择。查从前之旧学家考至举人者，现多无用，盖将若辈招入师范学堂，学习既成，即以补用，是亦两得其宜之一法也。"又在《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指出："教员者学术之母，凡全校学生思想之倾向，教员之力，得从而左右之，稍一不慎，则偏陂之学说，其辗转流播于社会者，至速且钜，受其害者，不独一校之学生也，故慎选教员，实为教育上第一要义。"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这则招聘教师启示里，要求应聘者"亲到中环旧海傍第四号门牌本书社写字楼面试"一语。

聘请到合适的英文教习不久，刘铸伯又在《香港华字日报》发布招聘"英文帮教"的启事："本书社欲聘请英文帮教习二位，每月脩金先送三十员，如教有成效，陆续加。倘愿就职者，请函交屈臣氏办房弟手。"



嘉道理、刘铸伯在铜锣湾扫杆埔专为印籍儿童开办的育才书社

聘定中英文教员，刘铸伯开始发布招生启事。1901年9月12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香港华字日报》刊载《育才书社告白》，谈的是育才书社华英学塾即将开班招生事宜：

敬启者：本书社之华英学塾，不日即将启馆，如有子弟欲入学者，请将年貌、籍贯、住址并其父兄操何事业写明，送至屈臣氏药房弟处先行挂号，以便启馆时采择留堂。至启馆日期，俟择定后再行通知。此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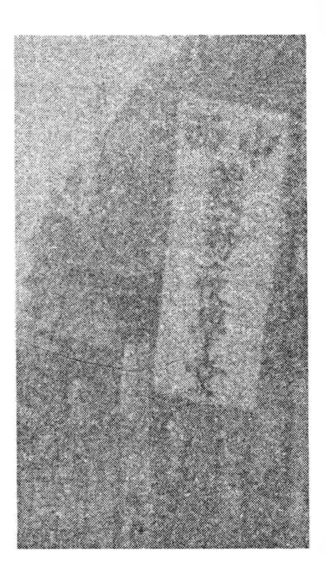
辛丑年七月三十日
育才书社司理刘铸伯谨启

发布这则招生启事之际，校舍问题尚未最后落实。1901年9月22日，刘铸伯当选为

中华会馆总董之一，遂联合其他总董与育才书社签订三十年租约，校舍问题终于迎刃而解，育才书杜得以顺利开学。9月24日，刘铸伯在《香港华字日报》公布华英学塾即将开学的消息：

> 本书社设在中华会馆之华英学塾，兹择定予英十月二号即蔡历八月二十日晨早九点钟启馆，已挂号诸生请于十九日早十点钟到堂，候教习采纳，及未挂号者亦望早日挂号，以免临时额满，不能收纳是荷。

顾名思义，育才书社开办的这所华英学塾（中西义务夜学堂）采用双语教学，它是现在的西营盘官立小学前身。所授科目，除汉文部开设的文学、经学、历史、修身等，英文部则开设有文法、会话、译解、算术、地理、卫生、救伤等，体现了刘铸伯在《社会主义平议》所提出的“对于教育者……须注重实业教育，以移易其前此之作官思想”的教育理念。



育才书社创办的中西义务夜学堂

育才书社在香港所开设的两间书馆，一在西营盘，即现在西营盘官立小学及西区育才小学的地方；一在铜锣湾扫杆埔，专为印籍儿童而设，均由育才书社司理刘铸伯负责经办。

育才书社注重英文教学的同时，对于国语并不放松。清末民初香港著名报人李不懈1906年发起创办《祖国文明报》，弘扬儒道，刘铸伯大为激赏，为育才书社师生订阅报纸。据李不懈《因纪念圣诞而追忆刘君铸伯》一文记载：“溯仆于光绪丙午与同志发起《祖国文明报》也，刘君一见，即赞成之，每期买数百份分增育才书社各生，复令教员讲解之。”这段文字还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香港的两家育才书社1901年开办，到了1906年已经招收几百名学生了。

据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记载，香港的这两间育才书社，“在1910年左右，由香港政府接办，将中学改为小学。这时候，育才书社的校长毕特（Mr. R.E.D.Bird），颇能接受他人的意见，从善如流。在1910年代的末期，该书社一位教师郑泽材，又名郑启贤，建议在书馆礼堂的一角，创立一个‘小型图书馆’，任由在校的学生借阅。这个图书馆，所藏书籍，多购自商务印书馆，以杂志、科学常识，文艺小说等最多；林琴南的翻译小说，当时最为流行，风靡一时，这图书馆全部采购，以供学生阅读。这时期，香港所有的公私立书馆，都还未有图害馆的设立，公开性图书馆，更加未有产生。虽然育才书社附设的图书馆，只是供应该校学生之用，但在香港图书馆历史方面来说，育才书社的郑泽材，实已开其先河。

王齐乐还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香港政府按时派发一份《诚报战事画

刊》，给每一位公私立书馆的学生参阅。育才书社的毕特校长，便利用这种战时画报，作为施教题材，并配合该校附设图书馆的各种书报，使学生的常识增加不少。这种与实际问题相配合的教学，即使以现在的新教学观点而论，仍是最值得称赞的。”

第二节　广州办学风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四，刘铸伯在《香港华字日报》上发布《育才书社告白》

育才书社在香港的两所书馆，办理比较顺畅，得到了当地绅商的支持。同年，刘铸伯陪同伊利士·嘉道理前往上海，推动申江办学事宜。1901年6月23日，刘铸伯在《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启事：“本书社主席伊利士·嘉道理先生，日前亲自赴沪，联合同志诸君，在申设立书社分局，各书塾今当开办伊始，理宜赶速，以观厥成为快。前蒙本港善士捐助各款，敢请早日送交万祥源阮荔邨翁，或隐行办房梁仁甫翁，或弟处代收，取回收条便妥。”

此次上海之行，收获颇巨。刘铸伯与伊利士·嘉道理拜访了徐润、唐杰臣等香山买办与粤籍官绅，设立育才书社上海分局，成立了董事会，公举名望卓著的官绅、殷商担任总董、襄总董、办事总董、司银钱董、管理董事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四，刘铸伯在《香港华字日报》上发布《育才书社告白》，全文如下：

敬启者：本书社主席伊利士·嘉导理先生，日前亲自赴沪，联合同志诸君，在申设立书社分局，兹将就地公举总理芳名列左。书局今当开办伊始，理宜赶速，以观厥成为快，前蒙本港诸善士捐助各款，早日送交万祥源阮荔邨翁，或□行办房梁仁甫翁，或弟处代收，取阅收条便妥，此布。

沪江总理芳名列左：

总　董：钦差出使日本大臣四品京堂蔡和甫观察、苏松太兵道袁海观观察、候选道严筱舫观察。

襄总董：徐雨之翁、唐杰臣翁、韦文圃翁、郑陶斋翁、

陈辉廷翁、朱葆一翁、何瑞京翁

办事总董：梁钰棠翁、李云书翁、郁屏翰翁、苏实森翁、祝兰舫翁。

司银钱董事：席正甫翁、沈吉成翁、叶明斋翁。

管理董事：惠亭雨翁、叶慎斋翁。

副　董：陈仁甫翁、周伟臣翁、王锡和翁、陆云逊翁、张叔和翁、何丹书翁、颜勉夫翁、顾敬斋翁、叶松卿翁、周舜卿翁、韦仲卿翁、唐翘卿翁、金绍堂翁、吴少卿翁、吴调卿翁、胡寄梅翁、袁丁庄翁、黄省三翁、周湘云翁、汤子庄翁、徐子元翁、徐叔屏翁、方叔涛翁、俞安德翁、赵馥畴翁、张麟魁翁、吴仁甫翁、费鸿生翁、陈炳谦翁、陈蔼庭翁、谭干臣翁、沈子华翁。

光绪廿七年六月廿三日

育才书社司理人　刘铸伯　谨启

育才书社沪江总理、总董、襄总董、办事总董、司银钱董事、管理董事、副董，这些人物非富即贵，徐雨之即徐润，大名鼎鼎的香山买办。唐杰臣是容闳同窗密友唐廷植的长子，13岁入选为中国第四批幼童留美学习，归国后接任其父怡和洋行总买办职。历任上海自来水公司总董、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董、广肇公所总董，开办新式医院和学堂，提倡科学技术活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1月，在上海与外国人公开辩论，捍卫民族权益，时人传为美谈。

出任总董的则是清一色的官吏，比如，蔡钧（生卒年不详）浙江仁和人，字和甫，1897年7月以后任上海道台。次年2月28日和3月4日，驻沪领事团和法国领事白藻泰分别提出扩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要求，均遭其拒绝。4月底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任，督办吴淞开端口工程总局。6月底，法国领事又向其交涉办理转移四明公所产权手续，以便起造学校和医院。因违背1878年协议，遭拒绝。法方单独采取行动，致发生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法方乘机提出酝酿已久的扩张租界要求。清廷因蔡对此事态度强硬，在公使团的压力下，于1899年将其撤职。1901年又以四品候补京堂任驻日本公使。1903年为防止知识界受民主思想的影响，电请清廷停派留日学生。当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赴内地参加拒俄运动时，蔡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请“饬各州县严密查拿”。7月，被清政府召回，在上海办《南方报》，为中英文合刊，1908年2月停刊。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有“雅谑与笑柄”一节，说到了“马格礼斯”的趣话：“蔡和甫为上海道时，与长江提督李占椿为亲家。和甫号通洋务，惧人言其不学，发言好用成语。偶闻客谈冯子材战功，谓此老时有马革裹尸之志，蔡意为谀词，因谓李曰：‘亲家将来必马革里尸。’李瞠目不知所对，退而叩人：‘马格礼斯，在英文作何解？’盖李固莫辩何言，而蔡又误裹为里也。”

育才书社在香港、上海开办的两所书馆，办理情况比较顺畅；而在广州方面，刘铸

伯等早已联名函禀两广总督陶模，说明育才书社开办原委。

陶模，字方之，浙江秀水人，同治七年进士，光绪十七年授新疆巡抚，光绪二十一年署陕甘总督，二十六年调补两广总督。戊戌前，他在督抚中较早向朝廷奏请变法。庚子新政诏令发布后，众多地方大员还在犹疑彷徨，揣测并打探朝廷的真实意图，他敢为天下先，倡言变政，其态度和主张相当激进。其建言多以制度兴革为内容，强调学习和模仿西法，这在同时期的朝臣疆吏中实属罕见。对于科举改革，他大胆主张由变而废，很快使之超越了戊戌年的改革力度。尤为重要的是，陶模的变法主张及其新政实践，有各派革新人士参与意见，不但显示戊戌与新政的历史渊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表达了社会革新势力的要求，在戊戌到新政的过渡交替中，起到促进与衔接的重要作用。

陶模是新政初期一位十分重要的封疆大吏。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壬寅初三日（1900年9月26日），上谕命两广总督鹿传霖开缺，以尚书候补，陕甘总督陶模调任两广总督，其时正值清廷被迫复行新政的前夕。

庚子事变后，清廷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对中央部院及各省督抚进行了大幅度人事调整，两广总督李鸿章调直隶总督，陶模也是被更调的九位督抚中的一员。据《德宗光绪实录》记载："二十六年闰八月乙卯十六日（1900年10月9日），调补两广总督陶模奏，旧疾未痊，请收回恩命，拟北上面奏下情。得旨：两广地方紧要，毋庸固辞。着俟驻跸西安后，听候召见。"陶模未到任之前，由两广巡抚德寿署理两广总督。

陶模抵达广东时，新政已经开始。此时全国的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甫经戊戌失败及庚子之乱，趋新不行，守旧亦不利，地方督抚对于朝廷是否诚心提倡新政心存疑虑，徘徊观望，私下互通信息，揣度和窥测朝廷的真实动向；二是社会舆论及趋新人士对新政的关注和期待甚为殷切。表面的沉寂之下，冷热反差相当强烈。

正当多数官员尚在犹豫观望之际，刚刚履新的两广总督陶模于1901年2月正式呈递了关于新政的第一份奏议《奏请变通科举折》（注：陶模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901年2月9日（见其《到粤任事日期折》，收入《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变革科举始终是陶模变法主张的重心，1898年6月8日，他曾与甘肃学政夏启瑜联衔上《请变通武科折》，提出仿西法改革武科，特别要求："无论新章能否通行，旧例武科应一律停止，以归画一。"

陶模在两广大力推行"新政"之际，收到刘铸伯等自行捐资，拟开办育才书社广州分校的禀札，深感嘉道理与香港殷商"能捐此巨资，以助成教育之盛举，且能声明不课传教等书，本部堂方佩之愧之不暇，且将奖之劝之，俾粤省绅商士民，捐资建学之事，接踵而起"。陶模对刘铸伯的禀札与所呈办学章程做了批示。批示文字，见1901 年8月6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添课育才》一文：

> 港中创建育才书舍，省港各报均详纪其事，现刘绅鹤龄等复以此事原委及所订章程，具禀督辕，陶制府阅悉，大为嘉许，即批示云：该绅等联合同志，捐集经费，拟在广东省城河南及香港创设书塾三所，名为育才书社，招选聪颖少年肄习

中英文学等情。查兴学造士，实今日第一要图。惟和局甫定，两宫犹未回銮，是以学校一事，国家虽有意振兴，尚未暇广为开办。今该绅等为开通民智、裨益人才起见，集资数万之多，竭志经营，成斯善举，苦心毅力，深堪嘉尚。依利士·嘉道理以外国商人，久居中土，独捐银至四万，尤为慷慨，性成不分畛域，本部堂不胜欣慰，应即准予立案，并俟省城河南两书社择定地址后，再行禀请札饬该地方官给示照料保护，其一切办理情形，仍着随时禀报察核。再，阅所定规条，章程既密，界限尤严，诚为毫无流弊，惟第一条“专课中英文字”及“别有何课程可教者，由总理人择善而从”等语，查中西各学，门类繁多，断非文字一门能尽其用，尚须明定课程，添课各种有用之学，分班肄习，庶几材士辈出，上备国家任使，本部堂有厚望焉。

《香港华字日报》刊登《添课育才》的同时，还在同一版面“选录京报”栏目转载《陶制军培养人才疏稿》。

奉到陶模允准在广州开办育才书社立案批示后，刘铸伯再次在香港倡议捐款，并于1901年10月16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三日）与嘉道理、冯华川赴广州，专程拜谒封疆大吏陶模。这位封疆大吏对刘铸伯、嘉道理等人办学义举，再次大加奖掖，并捐助白银500两。1901 年 11月1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育才书社劝捐小引》称：

《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育才书社劝捐小引》（1901年11月13日）

敬启者，本书社创办中西义学，实为作育人才，救时艰而开风气起见，在殷富者，延师课子，易于成材；惟贫窭之家，非无英俊，第已难谋俯蓄，奚暇筹及束脩？是纵有可造之才，亦将庸碌以没世，亦更虑聪明误用，流为邪匪，贻害国家，以可为世用之人而反为世害，究心时局者，当共惜之，此本书社义学之设所由刻不容缓也。同人正议集款创办，适西友嘉君导理亦深韪斯旨，不分畛域，慨然助以巨资，而港中诸君子声应气求，又复同襄义举，业经联禀省大宪，呈请分设书社于省城河南等处，蒙批示准办各在案。

弟复于九月初三日，约同冯君华川、嘉君导理赴省，禀谒陶制宪，叨承奖饰，并蒙俯允为本书杜粤省总主席，仰见大宪纡尊降贵、造士作人之至意，优渥逾恒，大雅扶轮，同深感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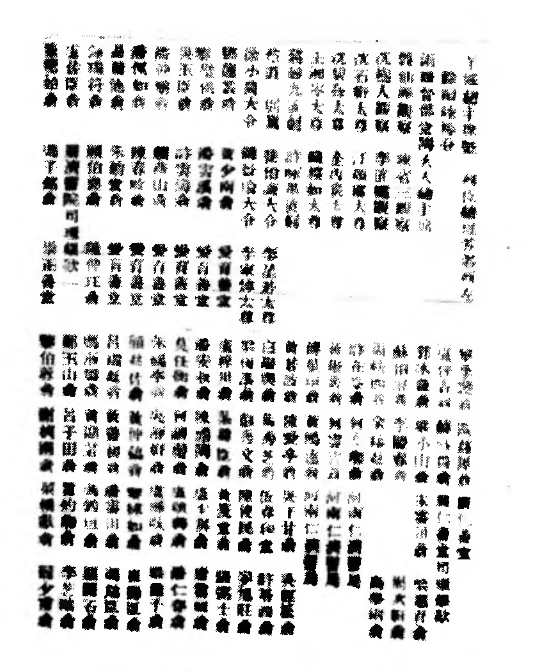
惟是本书社虽筹有巨款，而港中已择地开办，计续办省城河南两处经费，恐属未敷。前月谒见省城列位绅商，幸均荷乐为将伯。语曰：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同人等咸嘉赖之，唯愿诸君子分携绿簿，广为劝捐，以成此善举，他时办有成效，进可为国家佐富强之治，退可为习俗化顽固之风，皆诸君子栽培后起，鼎力玉成之大德也，伏望见义勇为，裘成集腋，毋吝惜悭囊而罔怀大局，毋鄙夷同种而贻笑友邦，是则同人等所心仪而顶祝耳。

再，创办伊始，各善长恐未周知，除弟等沿门求捐外，如有乐助巨资愿为本书社总理者，请函致屈臣氏药房弟处手收，或旗昌行冯华川翁、渣甸行何泽生翁、万祥源阮荔邨翁、裕德盛叶蔼山翁、口口行梁仁甫翁，以便汇交弟收，谨当续登同人册内，合并附陈。

省城代收款项处：省城爱育善堂黄少雨翁，省城广仁善堂苏械农翁，省城广济善堂卢佐臣翁，河南仁济医局何尧卿翁、黄鸿远翁。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二日

育才书社驻港总司理人弟刘铸伯顿首



《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羊城总主席暨列位总理芳名》（1901年11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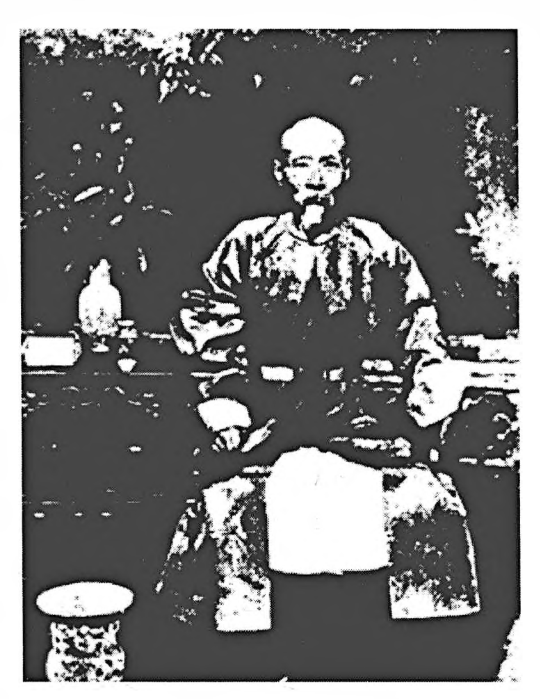
这份《劝捐小引》后面，刘铸伯开列了育才书社“羊城总主席暨列位总理芳名”，并申明其余名单“陆续接登”。两广督部堂陶大人总主席，即是两广总督陶模，接着是龚仙洲观察、陈省三观察、沈树人观察、李直绳观察、沈石轩太尊、汪颂虞太尊、沈碧孙太尊、全丙炎太尊、王湘岑太尊、钱朴如太尊、蒋龄九直刺、许咏愚直刺、蔡道一别驾、斐伯谦太令、李星若太尊、徐小农大令、钟景瑜大令、李家焯太尊，此外，尚有爱育善堂、广济医院、崇正善堂、广仁善堂、河南仁济医局各善长，以及广州黄若波、陈爱亭等善翁。

陶模虽然认为，育才书社设立总主席、副主席等名目，近于标榜，“且多列官士诸人，尤易蹈依附攀援之习”，但他对于嘉道理、刘铸伯这番联合同志，公襄义举之办学苦心，“奖励诫勉，未尝不具有深心”，并把刘铸伯办学禀札、育才书社规条，牌示南雄知州洪嘉与，嘱其协助办理。

洪嘉与（1863—1919），字贞一，号晓卿，江西省玉山县人，在科举考试中，县、府试均名列前茅。1885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次年任吏部主事。戊戌变法期

间，洪嘉与撰写《驳保国会章程》，逐条批驳保国会的 30 条章程，并对康有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1898年补吏部文选司主政，记名直隶州知州。八国联军入侵时，随慈禧太后和光绪出逃陕西。

在晚清时期，洪嘉与是个思想保守的官吏，其为人顽固，与后党官员一样，素以联俄为宗旨，而将“与英人交涉之事，无不目为阴谋，指为秘计”，庚子于行在上折，主张围攻使馆，触怒慈禧，要治其罪，光绪皇帝为其开脱说：“这个人是个傻子！”洪嘉与从此得“洪傻子”绰号。在兵部右侍郎的密折奏保下，洪嘉与又得光绪帝召见，分发广东委用。据《德宗光绪实录》（光绪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1901年1月1日）记载：当日“召见记名直隶州知州、吏部主事洪嘉与。得旨：着以直隶州知州发往广东，交陶模、德寿差遣委用”。



两广总督陶模（1835—1902）

对于刘铸伯所办育才书社欲在广州开设分校一事，洪嘉与向陶模呈文，竭力反对，指育才书社由英国商人嘉道理捐资，为英国包藏祸心，阴谋图粤；刘铸伯为屈臣氏买办，疑为孙中山、康有为余党潜谋不轨。陶模专札驳斥，认为“该牧迫于忠愤，为此思患预防之论，其心可嘉，然逆亿过甚，流于苛刻，足以滞志士之心，阻学堂之进步”，指其“阻碍学务，实非浅鲜”。

针对洪嘉与这份谬言满纸的呈文，陶模逐条痛批。他说，洪嘉与素以联俄为宗旨，对于英人交涉之事，无不目之为“阴谋”“秘计”。英国人办理的种种交涉，谁也不敢说其中不包含阴谋诡计，但是，如果中国能够自强，英国人的所有阴谋诡计皆无所用；如果中国不能自强，他们何止心怀阴谋秘计而已，而且早就明目张胆竞言瓜分，各国皆然，岂但英国？并且，“英人之在中国，商务独盛，势力本重，即以广东而论，香港、九龙亦既门户在握，何借一区区育才书社，为图粤地步？至谓借此为并吞扬子江及日豫之计，则尤愈说愈远。夫并吞扬子江及日豫，而先从一粤省之育才书社下手，英人当愚不至此”。

洪嘉与阻止育才书社在广州办学的一个理由是：嘉道理为自由党、无君党。这番瞎扣帽子的“指认”，实在令陶模哭笑不得，他说：“夫自由无君党，向为其政府之反对，政府无不恶之；而自由无君党，亦无不与政府为仇者，彼英政府岂肯以图华重任，付之其仇？而嘉道理既为自由无君党人，又安肯受其政府之指使，以来图我中国？”陶模举例说：按照洪嘉与的推理，现在孙文、康有为流亡英国，能够说是中国政府在指使

他们图谋英国吗？现在梁启超、徐勤流亡美国、日本，难道能够说是中国政府指使他们图谋美日吗？断然不会有这个道理，“揣该牧之意，或因嘉道理乃异国商人，忽捐资数万，以兴中国学堂，天下断无此慷慨好义之士，遂疑为包藏祸心，阴有主使，不知嘉道理特一好名之人耳。欧美各国捐资设学者，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在中国为绝无仅有之事，在泰西则视为寻常，况嘉道理为寓英之犹太国人，亡国馀民，素为英人所轻视，若以此数万金捐入英国学堂，曾不足动人耳目，惟捐于中国，乃可使远近称道，成此盛名”。

陶模认为嘉道理、刘铸伯出资兴学，或许出于名利之心驱使，他说，“至刘鹤龄等素业经商，忽思兴学，亦好名之念使然”，正所谓“无利不起早”是也。但是，他们办学此举虽然为名，却能捐出一笔巨资，以助成教育之盛举，并且声明学校里不讲授宗教课，“本部堂方佩之愧之不暇，且将奖之劝之，俾粤省绅商士民，捐资建学之事，接踵而起，乃该牧（洪嘉与）挟成心为兹苛论，一则曰英人主使，再则曰孙康余党，使有志兴学者见其如此，又谁肯解囊橐，以买恶名？阻碍学务，实非浅鲜”！

陶模说自己所担心的是，嘉道理、刘鹤龄等育才书社发起人都是商人出身，对于教育理法，平日未必专门细心考求，聘用的教师未知能否得人，他们所呈报的规条只谈到集款办事的办法，并未开列讲授怎样的课程。所以，他在此前批示刘铸伯等禀词中有“中西各学，门类繁多，断非文字一途，能尽其用，尚望严立课程，添课各门有用之学”等语。至于刘铸伯、嘉道理、冯君华川等专程赴穗谒见，推举陶模为广州育才书社总主席，一度被他婉拒。陶模说，设立总主席、副主席等名目，“近于标榜，且多列官士诸人，尤易蹈依附攀援之习。刘鹤龄等第二次来禀，欲推本部堂为总主席，即经批斥不准”。

陶模对于育才书社的建设，“奖励诫勉，未尝不具有深心”。洪嘉与对于《育才书社规条》各节的指责，实在令陶模百思而不得其解。如洪嘉与所称《规条》第一节“华人”“中国”等字全失华人语气等语，陶模批驳道：“刘鹤龄（刘铸伯）久在香港为商，该书社又从香港倡始，香港、上海等处学堂，向有中西人并教者，‘其资益华人起见’一语，乃为区别西人不入堂肄习而言，至于‘中国内地’四字，系与香港对举；且‘中国’字样，奏章公牍，亦所常用，有何关碍？”

洪嘉与对《育才书社规条》所言“专课英文”提出质疑，陶模反驳说：“今环球各国，惟英语最为通行，各种西学，亦以英文为详备。试观日本学校功课，皆首重英文，即北洋奏设之中西学堂，其头二等学堂功课，亦皆专教英文，不课别国语言文字。该书社专课英文，虽取径稍隘，究无不合之处。至国家前设同文馆，专为交涉储才，取四国语言文字并课，未尝以同文馆为国学，亦未尝谓建立学堂，必以同文馆为准则。即如前设之京师大学堂，其课程与同文馆迥异，今山东试办学堂章程，绝不仿照同文馆，而上谕颁令各省仿照，可见朝廷兴学，择善而从，并无成见。该牧谓初办学堂，不应与同文馆办理两歧，果何理耶？如谓专习英文，即求为印度、缅甸，夫一人精力有限，势不能兼通各国语言文字，是则习俄文者，求为西伯里亚，习法文者求为越南，习日文者求为

琉球，势必尽屏外国方言，无一学习而后可 。”

针对洪嘉与的“英国阴谋恐惧症”，陶模说，现在出任钦使、参赞领事的洋务人员，通晓英语者众多，难道他们“皆不忠国家而求为印度、缅甸者耶”？法国在城内领事署内新建学堂，专课法文，高楼耸峙，学生百余人，洪嘉与难道没有听说过么？为何独于育才书社讲授英文疑虑无穷？“诚使英人欲干我学校之政，则照法人之例，在沙面等处开设学堂，谁能禁之？于内地教堂之内设立义塾，又谁能禁之？而必托名于嘉道理、假手于刘鹤龄，行此迂远艰苦之策哉？”“至港报译载之英人《论英国在华商务》一篇，该牧谓为阴谋之确据。查此论为利华浦商务会董所作，全篇皆言推广商务之事，所云第一要图，莫重于创设中西学堂一所，使少年子弟得悉中国形势，以及方言俗尚等语。既云‘得悉中国形势方言俗尚’，则所谓少年子弟者，乃英人之子弟；所谓中西学堂者，乃英人学中语之学堂，而非华人学英语之学堂，语意甚明，该牧何致信口雌黄？”

《育才书社规条》第二节提出：“本社社友，俱有权用育才书社名字，及本社印戳，代本社置地及屋宇物业。”还说：“捐助经费不在百元以下，或每年认捐五十元，方为社友。”这本来是为了招徕捐项起见，该书社如有讼事，或准或驳，其决定权在官府，不能因其有“社友代质办理”一条，遂为枉断。但是，洪嘉与却说是“大侵利权”，陶模批驳说：“无乃太过？”

至于洪嘉与指斥《育才书社规条》用西历年月日“阴借传教”，批评育才书社设置主席、司理、总理等头衔，“全权办理书社诸事”用语失当等，陶模也一一予以驳斥：

> 香港商人在英属日久，皆习用西历年月，规条第二节所云“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廿五号”数语，系言公举总理之事，其时尚未来省，禀开学堂，则举此年日，自系告知在港诸人；第十二节“所有已捐之款，须于某年某月某号收讫”一语，亦系专为香港捐资诸人而言，必言西历年月者，取其习用易知而已。其序文及规条之末，并无西历若干年字样，谓为“用耶稣纪元，阴借传教”，亦殊失实。
>
> 至该书社主席等名，大抵以捐资多寡为轻重，嘉道理捐资独多，居该书社经费之半，故推为永远主席，其实社中办事，皆司理、总理等人主持，观其规条可见，即如总主席之名，本部堂虽辞而不受，亦可知该书社之推举主席，不过富贵之见未除，并非专举西人也。夫开办学堂，沾沾于捐数之多寡（募），诚非雅道，惟当此民智未开，创始非易，该书社为集款起见，委曲迁就，亦有苦心，当原谅之，不必责备之也。
>
> 至“全权”二字，本从西文译出，今议和之有“全权”，亦系改从西例。西人办事，最重权限，近译之公司章程等类，往往有“全权”字样，祇言其人管理此事之权，完全无缺，如总理有“全权”，分理无“全权”，是“全权”者别乎“不全之权”而言云尔。该书社规条，既据该牧谓从西文译出，则“全权”二字亦不足怪。况彼明明言“全权办理书社诸事”，是书社之外，即非彼权力所及。其第九节

新例诸语，亦专就书社言之，无所谓太无限制。该书社既在香港倡始，则总社设于港地，以及在港聚议，亦所应尔，遽目为潜谋不轨，收人都会之举动，过矣。

总之，刘鹤龄等久居香港，素习西文，书社规条系在香港所定，其词气字面，与中国章程文法，自不相同，此等处即不惬吾意，好言与之商改可矣，何遽盛气凌人，危言动众，甚至谓“二十行省之土地，政府之权力，不足供其篡夺”，毋乃拟于不（于）伦、立言过当乎？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收录《两广总督陶制军批斥洪牧嘉与札稿》

又，该牧谓此事与英人骗取日省路矿相似，且以戊戌之变、拳匪之祸，并归罪于胡中丞，此与该牧前在行在所上折稿所云“胶澳之割，咎由鄂督”，同一深文周纳（内），虽使汉唐酷吏断狱立谳，不至如此。夫有嘉道理在内辄疑该书社为英人阴谋，然则今之税务司，无一而非西人，该牧以为何如？又如俄国官吏，多以德人为之，日本变政无事，无欧人在内，使中国用人，照此办法，该牧又以为何如？

刘铸伯的屈臣氏买办身份，也成了洪嘉与攻击育才书社在广州开办分校“包藏祸心”的口实。他对刘铸伯进行了一番莫须有的指控，暗示刘铸伯可能是孙中山、康有为的党羽。陶模驳斥道：

至谓刘鹤龄（刘铸伯）屈臣氏买办，疑为孙文徒党，亦近捕风捉影。香港之为买办者多矣，皆党于孙文者乎？且由此而拟为康党，则尤为牵扯。本部堂只就事办事，以息乱萌，不敢以成见私心，株连蔓引，盖孙、康既皆粤人，一则行医，一则教馆，粤之士商为所识者多矣，苟于士商之有志时务，讲求新学者，概疑为孙、康之党，善机阻塞，何以振兴？且疑惧万端，纷纷自扰，康衢坦途，尽成荆棘，将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为矣！夫中国今日如久病者，然苟能振奋精神，调和营卫，正气既足，则日光空气，非特不为患害，且可为养生之助，如其不知保行口益就王羸（羸），徒日日恐寒暑燥湿之侵犯，虽闭户下帷，日卧床榻，疾弥甚耳。

总之，陶模以是否有利于变法自强为评判标准，高度评价刘铸伯等人的办学义举。

在他看来，新党各派均系有识之士，应当争取，顽固守旧派则为革新设置障碍，必须扫除。考虑到清廷直到1904年才解除党禁，将孙文和康有为、梁启超以外的戊戌分子开复启用，陶模则在1901年便具有这样的认识，并在职权范围内贯彻实行，的确难能可贵。

此外，陶模还翻出洪嘉与在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糗事，嬉笑怒骂了一通。最后说：洪嘉与“既以忠爱自期，务宜平心静气，以察事理，毋预存成见而遇事辄苛求，毋自视过高而谓人皆不肖。夫论有用人才，必曰‘通达时务、讲求时务’，而不通达，成事不足，败之有余矣”。这话等于直白地说，洪嘉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通批斥洪嘉与的札稿发出后，洪嘉与适逢父丧，回籍“丁忧”守制去了。开办育才书社广州分校的拦路石，总算搬开了。

洪嘉与回江西玉山县守制期间，恰逢全国废书院办学堂，或许当初受到两广总督陶模的棒喝，他以翰林身份领衔倡议，于1903年开办县城第一所高等小学，并任该校的堂长。还资助怀玉、端明两书院和信州中学办学，组建带有职业学校性质的亲民学堂，对儿童进行“课读教识”。因此，时贤赞誉他是“玉山新学第一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洪嘉与“北面涕泣，肝胆莫陈”，急电徐世昌代奏“终守臣节，愿效无二”之志。此后他携母隐居上饶鸡炉峰三年，自撰门联“多病一生常傍母，孤臣万里不忘君”，做了一段不食周粟的孤臣遗民。 后来，洪嘉与回到玉山，又着手兴办了各类初高等学校、明德学校、艺仁实业学社、洪氏教育会社。1921年病逝于老家松树窝，终年五十八岁。

但在育才书社筹办过程中，两广总督陶模病逝于任所。1902年10月21日，《申报》刊发《星陨南天》一文，略谓：“前任两广总督陶芷芳制军薨逝之信，本馆前已照西报译登。兹阅广州中西新报云，制军卸篆后，陡于九月初九日丑刻殁于城南运宪行辕，二公子随侍粤中，抢地呼天，擗踊泣血，一时督抚以下文武各官，咸具一束生刍前往吊奠。” 文内“一束生刍”典出《诗·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朱熹集注有云：“贤者必去而不可留矣，于是叹其乘白驹入空谷，束生刍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

陶模病重辞差前，与广东巡抚德寿联衔的最后一份奏章，仍是敦请朝廷关注科举妨碍兴学，主张采取果断措施改变现状。陶模的执着，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趋新人士的赞扬。1902年11月7日，《申报》刊发《陨天南天》一文，其中谈到：“自合肥李文忠、新宁刘忠诚二公相继薨逝，中兴名将相大半沦亡。谈时事者，慨叹国步之艰危，人才之消乏，欷嘘叹息，惄焉忧之。不意两广总督陶芷芳制军，又抱沉疴，骑箕而去，飞来籍隶儷电，坠陨大星，四海人民，无不同声感恸……”

第三节　育才书社师资

广州育才书社的开办，得到包括封疆大吏陶模、德寿在内的一批官绅的支持。《德宗光绪实录》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1901年12月4日）记载："谕内阁。政务处奏，遵旨妥议变通乡会试事宜等语。上年刘坤一等奏，请将辛丑、壬寅乡试恩正并行。会试归并壬寅年举行，业经允准。惟本年举行乡试，仅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省，若于明年举行会试，其未经乡试各省士子，未免向隅。且经济特科，前经谕令定于本届会试前考试，亦属办理不及。所有明年会试，着展至癸卯年举行，余着照礼部所议各条办理。"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是同一天，刘铸伯在广州敦请官绅聚会，商量育才书社具体开办事宜。1901年12月1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育才书社告白》："敬启者：敝书社昨廿四日在省敦请聚会，商议择地开办事宜。是日，官绅、各善长枉驾辱临，甚为踊跃，人才作育，具有同心。"据这份告白可知，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参加了这场聚会，并且各自捐出纹银500两作为办学费用。

参加聚会的多是热心教育的粤中大绅巨贾，有名可考者四十余人，他们或者是刘铸伯的商场伙伴，或者对其慕名已久，对育才书社开办章程倾力支持，譬如，富甲一方的张弼士，当场捐出纹银2000两。

张弼士不仅是万裕兴总公司创办者、张裕葡萄酒创始人，也是一位深受清廷赏识倚重的"红顶商人"，在晚清时期的国内政商两界声名赫赫，他先后担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此外，张弼士在海外倡导教育，弘扬中华文明更是不遗余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8所华文学校。1905年他获清朝皇帝光绪恩赐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在受匾典礼上，张弼士慷

育才書社告白

《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育才书社告白》（1901年12月13日）

慨陈词："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明乎此我们就知道张弼士为何慷慨解囊。



张弼士（1840—1916）

张弼士晚年十分关心家乡教育，希望在华南最高学府岭南大学（后称中山大学）捐资修建一座校舍，作为南洋华侨子弟补习汉语的学校。1916年，张弼士不幸逝世，他的夫人朱兰芝和儿子张秩捃遵其遗愿，捐资7万银元，邀请曾任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的埃得蒙茨设计，于1921年建成这座四层小楼，被中山大学命名为"张弼士堂"。现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所在地（曾为中山大学档案馆）。在中山大学的建筑文物中，"张弼士堂"是最早落成的一座以中国人个人名字命名的独资捐建建筑，现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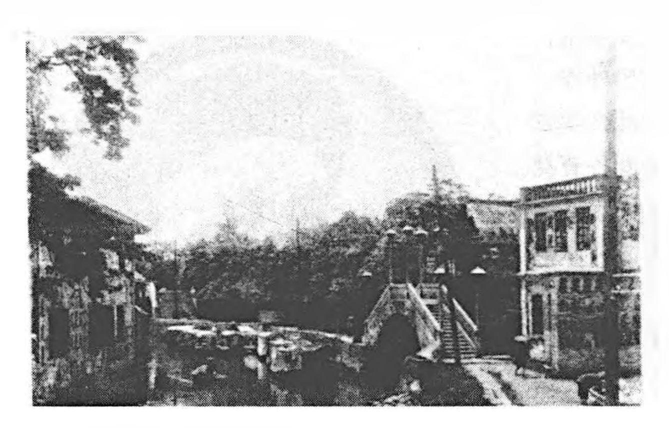
粤中巨绅黎季裴当场捐银1500两。黎六禾，名国廉，字季裴，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于昌教村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举，官至福建兴泉永道道台。民国初年，出任广东省议会议员，为广东力争粤汉铁路股权出力甚多，颇受粤人称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他赴肇庆参加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军政府，致力倒袁。其后，便不再过问政治，移居香港太平山半山别墅，读书填词，精研美食，以名士生涯终老。去世时年过八十。

限于篇幅，其他捐款者姓名、事迹与捐款数目，不复一一笔录。但据我们初步统计，这次聚会，刘铸伯收到大绅巨贾捐款一万一千三百两纹银，他与同人办理好育才书社的底气更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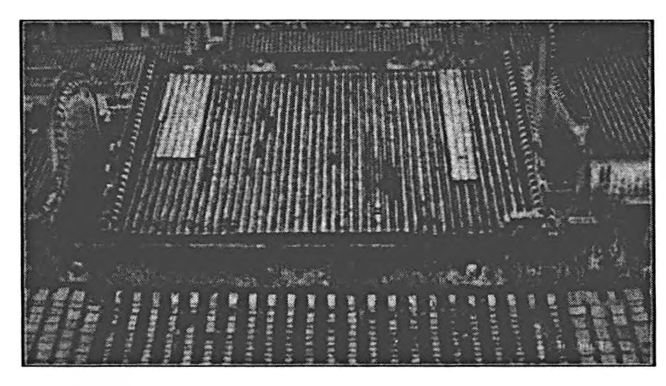
在两广总督陶模的大力襄助之下，育才书社（Ellis Kadoorie School）得以在广州落地生根。主校区设在珠江南岸的鳌洲外街。鳌洲旧名石鳌村，又名游鱼洲，鳌洲外街又名担杆巷。



张弼士堂



育才书社有所分校设在西关荔湾



广州粤秀街一角

育才书社最初还有两所分校，一处设在粤秀街（原德宣路之北），租赁杭嘉湖会馆作为校舍（遗址已并入中山纪念堂范围）；一处设在西关荔湾，租赁民房作为校舍。

分校设在西关及城北粤秀街，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当时西关及河南是大户人家居住的地方，绅商子弟众多，城北德宣街内的粤秀街、启秀坊、丛秀坊、福兴里等地，是落魄穷书生候补州县什佐赁居之所。在这两个地方设立分校，可以就近吸收学生。事实证明，学校地址的选定是有前瞻性的，以后河南鳌洲育才主校及西关分校学生，多为绅商子弟，城北粤秀街分校则多为官僚子弟。

租赁好校舍，教职员一一到位，育才书社开始招生，先在报章上刊登招生章程，说明报考学生一经录取，无论读主校、分校均不收学费，且所用的英文读本、英文文法、英文会话等书籍，均作赠与方式供给学生使用，不再另外收取费用，于是，报名应考入学者络绎不绝。

育才书社粤秀街分校于1902年5月27日招考学生，据5月29日《香港华字日报》报道："省垣育才书社四月二十日起，在粤秀街本书社内分日招考学生，挑选英俊入社肄业。是日开考，广州府暨南（海）、番（禺）两县宪及各员绅，均齐集书社内命题考试，一时沧沧济济，衣冠云集云。"

育才书社的招生考试比较简单，只作一篇中文论说而已，故投考者很多。首批考取广州育才书社的，有后来成为著名基督教领袖的吴耀宗、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博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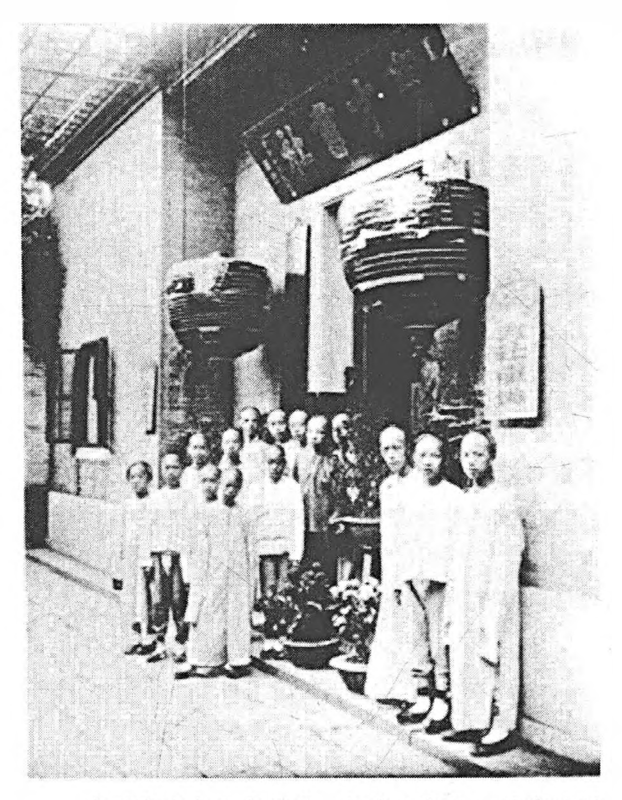
关于广州育才书社的办理情况，该校师生朱英和、沈琼楼写有《育才书社建校经过和办理的情况》一文。朱英和是育才书社开办时第一届学生，曾在该校肄业2年。沈琼楼早年就读于两广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批的大学生，民国元年（1912年）起即在育才书社任教，连续有7年之久。因此，他们对于育才书社的开办以及教学情

况所知甚详。该文作于20世纪60年代，自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但仍然不失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他们这样写道：

> 八国联军之役，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万万两，指定由海关税收分年抵纳，至清偿为止，于是海关主权，沦入帝国主义手中，继而邮政这一新兴事业，也都由英帝操纵。关、邮机构所用的簿记文牍账册一切均用英文，而中文只作为备报清廷的副本，因此，必须吸收大量娴习英文的华员做助手，称之为“洋文供事”，月薪纹银30两，比“汉文供事”高出2倍。当时在广州公开招考，应考者只有同文馆学过英文的旗丁，人数不多，且懂英文者更少，故起初招考的两三批关、邮高级洋文人员，广州方面取录常不足额。
>
> 那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加紧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沙面洋行，如雨后春笋，这些洋行大班，急切需要通英语的华员，帮其通译，作为“盲公竹”（广州话带路的意思），发展业务。英帝为了这些目的，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以开办训练洋文人员为幌子，特派苏格兰人谟亚和两个助手（一为符列斜，另一个似为士啤玲）到广州，设立学校，由香港华商总会会长刘铸伯拿出一笔款子，购买河南鳌洲一间货栈（这个地方不大，前后门贯通内外街，深约十余丈），把它略为修葺后，挂上黑板，摆设了一些学生坐的长条板凳，配上桌子，就算是教室，中西教员休息室也只有台椅数张而已。但这些简单购置费，还是向香港华商捐募得来的。
>
> 就这样，办起一间育才书社来，由谟亚任大先生（校长），并在西关荔湾及德宣路粤秀街租民房各设分校一所，由谟亚及另一助手分别任分校主教，谟亚则在鳌洲主校主持，并指挥这两间分校。
>
> 筹备就绪后，即行招生，先在报章上刊登招生章程，说明主校分校均不收学费，且所用之英文读本、文法、会话等书籍，均作赠与方式，供给学生，不另收费。考试只作一篇中文论说而已，故投考者甚众。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6月，广州育才书社正式开学，嘉道理等发起人、捐助人出席开学典礼，受邀的广州官绅济济一堂，烧香点烛，举行拜孔典礼，并且还拜关帝和文昌帝君。华人行跪拜礼时，嘉道理、谟亚等外籍人士也站在后边行鞠躬礼。以后每月朔日，还要师生一齐拜孔告朔。这种做法，被人认为不同于一般的教会学校。

据朱英和回忆：育才书社开学那天，刘铸伯柬请绅士江孔殷、潘宝珩等参加。这大约是因为当时省港之间交通不便，他希望这两位与自己熟稔的本地名绅，就近关心护持这所新创办的学校。

江孔殷（1864—1951），别名江虾，广东南海县塱边乡人，江家祖上是号称“江百万”的巨富茶商。少年时应童子试，青年应乡试，考取秀才和举人。清末甲辰恩科进士，江孔殷为翰林，授职庶吉士，官衔太史，世称江太史公。



广州育才书社老照片，校舍门楣上方悬有陶模题写的“育才书社”匾额，大门两旁挂有“书社重地”“闲人免进”木牌

江孔殷是清末、民国年间在省港地区最活跃的一位政客兼大富商。无论从社会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江孔殷及其家族在近代广州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孔殷利用地方名士的身份，广结各方朋友，从革命党人孙中山、廖仲恺、陈景华到绿林好汉出身的李福林，再到共产党人林伯渠，都是他的至交。在当时的政坛举足轻重，他还是广州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历史人物之一。

现在位于海珠区同德里的“太史第”，是江孔殷当年的府第。在“太史第”风光的年月里，除了孙中山、廖仲恺、刘铸伯等政界商界名人登门拜访外，更有不少文人雅士登门造访，罗瘿公、李凤建、陈树人、黄节、潘飞声、邓尔雅、冼玉清等，先后经常到“太史第”雅聚，或任教于“太史第”的“兰斋私塾”。

刘铸伯邀请参加育才书社开学典礼的潘宝珩，是广州十三行同文行的创始人潘振承的第五代传人。潘振承是十三行时期的粤东首富，为中外公认的洋行领袖。潘宝珩当年在粤垣电灯公司做经理。粤垣电灯公司也被广州人称为五仙门电厂，旧址位于潘氏大院对岸，现今的沿江西路。潘宝珩不仅是刘铸伯的故旧，也算是嘉道理的“同行”。育才书社开办过程中，他也予以捐助。

刘铸伯聘请苏格兰人谟亚担任育才书社的大先生（校长），按照《育才书社规条》学校里不开设宗教课程。谟亚也知道，当时中国民间还迷信神权，敬奉祖先，所以特别声明：“任从学生自由拜神，决不引诱学生信奉洋教，违背民间的传统习惯。”

育才的英文教师，没有什么定额，视其开班多少而有不同，学生多时，聘请的教师多；班数减少，教师却有一部分必须缩减下来。学校开办初期，育才学生未有毕业，许多洋行，急于需要懂英文人员，谟亚未有学生可以介绍，便从多余的英文教员中遴选充任，故每于缩班裁员时，被“裁减”的教师总是谟亚看得起的人，及时介绍他们到洋行中去。

育才开办到第三年，在外面招聘的英文教师，都陆续被介绍到洋行去了。班级不断增加时，师资便在学生中提拔愿意留校者充任，初期留校作教师的学生，读到中级的程

度便可充任，后来则非到高级班以上者不可。

谟亚教育学生，尽量使他们懂得“写字楼”（洋行办事处的广州通称）的规矩，叫他们知道如何贯彻洋行大班的意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面各洋行，不论什么国家的商人，多能娴熟英语，贸易收支均以沪港汇丰钞票为本位，账目簿记，都用英文。

谟亚还兼任一些洋行的职位，他日间在育才主持校务，晚上则在沙面交际。洋行如需用中国人做通译，便请谟亚介绍，谟亚便成为荐人的“老板”了。据该校师生朱英和、沈琼楼回忆：“由谟亚介绍到洋行去的人，多不胜记，由写字爬到买办的，也不乏人。如被谟亚荐到礼和洋行的何某（名忘），不久成为百万富翁。另外有一个黄锡彬，也是育才学生。在美国洋行油公司，由普通写字做到买办，到第二次大战后，掌握了美孚的代理权而成为大富翁，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

育才书社开办时，提倡中学西学并重，上午讲授英文，下午讲授中文，但中文属自由科，任由学生选修，不选者并不勉强。所招收的学生中，竟有些是秀才举人之类。最突出的是北闱举人如新宁（今台山）的黄嵩斐（后名嵩龄），也曾考入该书社，后来此人入北京交通系做过一任粤汉路协理，再由广东省长李耀汉提拔，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长。这些人当然不再选修中文了。

育才开办一年以后，取消城北及西关两间分校（原因未详），集中于鳌洲主校。三校合并后约，有学生四五百人，甄别一年来学生学业成绩，和新收的学生，分出初级（号J班），中级（号M班）。到第3年时，再设立高级（号S班）。教员除谟亚外，则为英文教员和中文教员，名额没有一定，此外，有校工3人司洒扫及看守门户之责，组织很简单。每班约30余人。唯中文则经常保持5班，150多人，没有很大变动。不论英文班或中文班，基本上每个教员负责一班的教课。上课时间，由午前9时起至中午1时止，兼修中文的则下午2时至4时半，讲课两个半钟头，选讲古文史地等科。

学校开办的第一年，鳌洲主校区均是河南（珠江南岸）的学生，三校合并后，居住河南、河北（珠江北岸）的学生约各占半数。河北学生到鳌洲受课，怕水流急湍有危险，因此由校方雇有长行艇两艘，每艘每次能渡40～50人，每船有船工4～5人，每天上午8时半到沙面接谟亚和另外两个英籍教师，再在西濠口接载河北师生赴鳌洲上课，两船往返3次才运送完毕。中午1时放学，师生云集金花庙码头（“金花庙”奉祀金花夫人。她是广州的送子女神。农历四月十七日是金花夫人的生日，这一天到金花庙烧香祭拜的



清末广州珠江一瞥

Lau Chu-pak

1905, Nov. 13 - SCMP - Marriage at Ardmore, house of Mr. Lau Chu-pak, compradore of Messrs A.S. Watson and Co., of his son Mr. Lau Wing-chung, to a daughter of the Ho family. Mr. Lau Chu-pak attired in gorgeous mandarin robes and crystal button with feather. Mr. Lau President of Ellis Kadoorie Schools in H.K. and Canton.

1909, Mar. 20, Weekly Press - Reappointment of Lau Chu Pak to Sanitary Board, 3 years form 6 Mar. 1909

1912, Jan. 17, Telegr - Groundless allegation against Lau Chu Pak of sending arms in boxes to certal China Famine Relief Committee Shanghai -- boxes of biscuits and garments.

1913, Oct. 11, SCMP., Meeting of Confucian Society, premises Des Voeux Road, Presided Mr. Lau Chu Pak -- meeting to raise funds for building a large Confucian Hall. He officer $50,000 (see details of offer under card general file: Confucian Society.

1917, Jan. 1, SCMP - Mr. Lau Chu Pak, presented a hospital and school to his native village Ping Wu. The Civil Governor of Canton officiated

1918, July 9 - SCMP. Eldest son inheritance share - Mr. Lau Chu Pak testified as to local custom, said he was born in N.T. - the matter had been referedd to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and they had agreed elder son entitled to larger share -- but not more than one and half share.

香港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处藏屈臣氏大药房总买办刘铸伯与嘉道理在香港、广州办理育才书社的档案

人络绎不绝。需要指出的是，“金花夫人”有别于我国传统公认的送子观音，堪称为广州以至广东一大地方特色），再由这两艘船送回珠江北岸。至于兼习中文的学生，则留在校内，下午上中文课，到放学时，仍由这2艘船来接，人数不多，不满两船，一次便可运送完毕。

在育才书社这个看似松散、实则严密的民间办学团体里，刘铸伯担任日常的管理事务，收集嘉道理及中国绅商捐款，高薪聘请中英文教师，备具操劳，深为海内人士敬重。《孔圣会旬报》第67册以《惠我同胞》为题，报道过嘉道理增加办学捐款一事：“日前育才书社主席嘉道理由港赴沪后，特自捐款二万五千两，在一上海租界扩充书社，俾华人子弟日多就学。上海字林西报因而论之曰：嘉君之热心公益，令人钦羡，罄笔难宣，彼夫兴学育才一节，人或视为无足重轻。而嘉君则竭力提倡，其乐善不倦，南北普及，求诸富而有力者，已难其人，况其惠济至洽，而思虑又至周，其德泽久远，将必遍及寰区，奕世不忘矣。夫善举莫重于慈幼，而慈幼之道，尤以教育为先，今嘉君捐资兴学，感佩不忘，所望继起有人，是则记者之所深深致祷也云。”

但是，育才书社在香港、广州、上海三地免费办学，最终由于筹集经费困难，于1904年取消了免收学费及书费的办法，改为每年收学费24元，分上下两学期缴交，书费则按照班级高下而有所不同，均一律收费。1904年2月25 日《香港华字日报》发布的《育才书社告白》称：

本书社自创设以来，数载于兹矣。溯创始之际，概不收学童修金，嗣因劝捐无多，书社之积项渐薄，加以开销日繁，迫得兴议，每学童每年收修金廿四元，聊资补助，窃匀计本，书社须费四十八元，方敷一学童之用，即使收回二十四无，亦仅敷半年之费项，不过借此弥补，本书社较易支持而已。惟各学童初因不需修金，其心未免轻视，故时有旷学、作辍等弊，即告假限期，多无定咎，转有负本书社作育

人才之初心。兹再议由本年起，本书社香港学堂仍照旧章，每年每学童收修金廿四元，到明年底核计，如学童到学堂上学足二百十五天者，即将所收该童生全年修金如数奉还。及年试大考，每班得列首名者，亦将全年修金送还；得列二名者，将半年之修金送还，此外另有赏物，以资鼓励，俾各学童勤奋，免荒功课，及符本书社创办人之初心，将来人才辈出，本书社有厚望焉。

育才书社取消免收学费及书费的办法，一则是募集资金越来越困难，一则也是一种改革。办学初期，学生以该校可以免费入学就读，蜂拥而至，但是迟到、早退、旷课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中途辍学，有违育才书社发起人办学初衷。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刘铸伯等学校创办人决定，书社由免费改为收费，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考核、奖励制度，如年底核计，学童到学堂上学满215天，学校会把所收该童生全年学杂费24元如数奉还。年试大考每班得列首名，亦将全年学杂费24元送还；得列二名者退还一半，此外还有奖励品，“以资鼓励，俾各学童勤奋，免荒功课，及符本书社创办人之初心”。

育才书社开办到第四个年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广州逐渐有公立、私立新式学堂出现。当时革命空气弥漫，学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对学校与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多有不满，鼓起学潮，成为当时普遍现象。育才这所为沙面洋行输送“洋奴”的学校，为爱国人士所不满，所以也掀起学潮，而且相当激烈。策动学潮的人则是刘铸伯聘请的英文教师谢英伯。

谢英伯，广东嘉应（今梅州市梅县区）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二十九日。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6岁开始学英语，翌年考进香港皇仁书院，接受西洋教育。他从小受其父亲的影响，爱自然，喜欢旅行，好历史，特别对新闻事业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皇仁书院就读三年之后，就回广州从事他喜欢的新闻事业，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政府与十一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激起爱国的仁人志士在国内和日本先后出版大批书报、杂志，宣传反清思想，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对谢英伯影响极大。1902年，他担任《亚洲日报》总编辑，奋笔评论时政，倡导女权。1904年又主办《开智日报》。此后，他先后在《中国日报》《东方报》《少年中国报》《拒约报》《国民党周刊》《民国日报》等20多间报刊社任职。

谢英伯除任报社编辑、记者之外，还从事教育工作。1901年，谢英伯与黄晦闻等人，在广州河南龙溪首约创办“群学书社”，搜集书籍及中外报刊，设立群众阅书报处，并设编辑、辩论、体育三部。后又增设教育部，转迁海幢寺，易名“南武公学会”，筹办学堂。当时广州读书风气日盛，政府的财力人力不足，奖励绅民捐资办学，于是，民办的私立学校应运而生。谢英伯等人筹办的学堂，初名南武两等学堂，经省学务处立案批准，于1905年3月3日开学。

与此同时，谢英伯还受皇仁书院前辈学长刘铸伯聘请，担任育才书社的英文教师。据朱英和、沈琼楼《育才书社建校经过和办理的情况》一文回忆：



谢英伯（1882—1939）

谢（英伯）在育才教英文，和文化界有联系，除教课外，兼任《时敏日报》记者，在报上用"大舞台中一少年"笔名写文章，并经常把传播革命思想的报刊，如《浙江潮》及香港的《中国日报》借给师生传阅。那时育才没有阅览室，更没有订任何书报，谢私人订阅许多书报，用以宣传革命。有一次，谢在学校中号召师生下午返校（因学生三分二以上习英文，下午不返校，英文教师亦然）听他演说。

他说，育才施行的是奴化教育，说学校应该是三育并重的，育才却少体育这一科。根据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不论高小或中学，智育方面还需设置理化、博物等科，更须要有图书仪器设备，以供实验，但育才什么也没有，是个不伦不类的英文书馆，因此必须把它改革成为一所正规的学堂。同时要育才财政公开，任教者要有略为平等的待遇。

他列举事实，说育才靠学费收入学生有六七百人，每生每月纳费2元计，总数在1200—1400元之间。华人英文教师，经常保持20人，中文教师历年只有5人，高材生留校者月支15元，一年后晋升，加薪5元，合计华人英文教师月薪支出，不足350元。5个中文教师，其中一位是中文主任月支35元，其余一个20元，一个18元，两个15元，5个合计每月也只支出103元而已。3个英籍教员的月薪，却与华籍教员距离太远，谟亚每月300多元，其余二手三手也在200元以上，3个外国人薪俸是每月800多元。待遇十分不公平。

谢英伯演讲后，学生便联合签名，要求育才当局改革校务，增加设备，提高全体华员教师待遇等等。谟亚当然不予接受。谢英伯又联合多人，向学校当局提出意见，如果不接受，教员辞职，学生退学。

教员辞职问题，谟亚心里有底，绝对不怕，但学生退学，则靠学费维持的学校那就糟糕了。而更怕西洋镜揭穿，训练洋奴的计划趋于失败，因此，也很惶急。签名准备退学的学生有半数以上，风浪颇大。但教员附和者不多，因为这些人中，多想谟亚介绍他们到洋行去的，教书是作为接近谟亚的机会，薪资多少，在他们来说却是次要的。

谢搞过这一次风潮后，便离开了。谢去后，学生人数约少四分之一，但不及两年，又回复了原来的班级人数。这次学潮，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使人们知道这间书社的本质，确实也是一件大事。

谢英伯离开育才书社之后，曾先后任教于梧州中华学堂、香港安怀女学校、圣约翰学校、保罗书院、檀香山华文学堂等校。1907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并任香港支部主盟人，负责吸收同盟会员入会的主盟事务，经他吸收的会员，不少后来成了民国要人。谢英伯论著颇丰，多散见于海内外报刊。专著有《人海航程》《中国古玉时代文化史纲》等。

可以说，谢英伯是在育才书社发起学潮第一人。此后，经过1906年抵制美货风潮、1908年抵制日货风潮，省港两地民众爱国热情高涨，自然也影响到了学校。育才学校师生罢教罢课、游行上街之事，时有发生。1919年7月15日，香港育才书社举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和平集会”，刘铸伯发表演说，批评学生干涉国家大事。他宣称维持和平之道，是“每个人各守自己的岗位”，“总督做总督该做的事，警察做警察的事，学生做父母与师长期望他们做的事……即求学与服从”；他呼吁学生“不要干涉公共事务”，否则“天下将会大乱”。

此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作为调停人的刘铸伯忙得焦头烂额，谢英伯则大力支持海员罢工。据第一届海员工会主席、海员大罢工领导人陈炳生《中华海员工会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回忆》一文记载，他到广州主持工作，“积极联络各方人士以厚吾人之援力。广州工人方面，有互助社社长谢英伯同志，襄助策划工作。国民党粤支部冯自由、邓泽如、谢良牧等同志及广东机器总工会会长黄焕廷同志呼吁筹款接济。政治方面，广东省长陈炯明，指定省长公署政务厅长古君应芬每晨七时与余接洽。经济方面，由杨君西岩源源接济……秘密情报部分，负责谍查香港政府及资方消息事宜，由海员会派员担任……先是，在港负责秘密情报之同志来省报告，谓资方组织暗杀团，即日派人到广州行刺陈炳生及谢英伯等语。各同志以情势严迫，纷论卫余之策”。

英语、汉语教师之外，刘铸伯还为育才书社聘请了一位汉文总教习，这就是香港有名的“樱花先生”何恭第。

何恭第（1879—1941），号樱庵，顺德人，约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19岁开始任教席。22岁参加府考，得案首；科考得一等第二名，而为优廪生。其后，再赴广州就学，从游于何泰交的门下，与海内文士相结纳，文名益噪。何恭第对于《左传》研究有素，他的文章素养得益于《左传》的地方也多。

据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记载：刘铸伯在其故里新安县平湖乡建筑祖墓，辟守真园，建追远阁。为了立碑纪念其事，便以重金征求海内外文士，为他撰写一篇《追远阁序》，还聘请赖际熙太史担任评阅。何恭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便应征撰写了一篇骈体文，洋洋大观。评选结果揭晓，香山黄慈博第一名，何恭第名列第二。赖太史批评他的文章说：“词旨丰蔚，风骨开张，庾信哀时之作，韩非孤愤之篇。虽出于疾俗愤时，洵可以发蒙振落。”刘铸伯对何恭第的那篇征文特别欣赏，乃将之勒石，竖于守真园梅花墓道。

刘铸伯与何恭第虽然生平邈不相识，因敬重他的文章，即立具关书，礼聘何氏来



何恭第（育才书社汉文总教习）

港，当他的家塾教师，使子孙姬媳等，一律跟着他读书。

何恭第受聘到港后，除担任刘家的家庭教师外，刘铸伯还聘请他兼任育才书社的汉文总教习。

何恭第后来在香港设学塾于中环大道中，永安街口相连的两层二楼上。当时从游的学子很多，二十余年内，门生达千人。他的学生都称之为"樱花先生"，而他的学生便称为"樱花弟子"，他的学塾则称为"樱花草堂"。

何恭第在香港教学之余从事写作，喜作哀感香艳的小说。他在小说的写作方面，文笔很像上海作家徐枕亚。徐氏以写作言情哀艳小说著称，是我国清末民初文坛上，所谓"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成名较恭第为早。何氏的小说，在港穗各报上发表《玉面狐狸》《十艳恋檀郎》《亲王下珠江》《猪宫宝石记》《三宝珠》及《宫粉红》等，都是鸳鸯蝴蝶派一类软性的趣味主义的小说，俱属轰动一时，吸引千万读者的著名作品。

1912年秋，沈琼楼进入育才学校教书，这正是学校鼎盛时期，有学生七八百人，分为二十五六班。大先生谟亚外，另有二手符列斜，三手金蒲。学校里这时搞了一点体育设备，在一小空地上辟一沙池，装有杠架，"据说是因谢英伯闹过学潮以后，学生说没有体育设备，才勉强装起来应付一下门面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1914年），"大先生"谟亚被征调回国服兵役，符列斜也走了，这个"大先生"职务落到金蒲身上。沈琼楼回忆说："这个金蒲，在表面上没有像谟亚和符列斜那样衣冠楚楚，教学也很低能，更没有像谟亚一样，出入于沙面洋行和关、邮机构的活跃。那时北京又有了税务毕业学生，源源送到海关、邮局中去，因此海关没有再在广州招考关员。育才学生不仅没有可能考进关、邮，也少被介绍到洋行中去，因此，他便把几个高级班停办。读完中级的学生，无班可升，金蒲叫他们到香港皇仁书院升学。学生人数从此大减。1918年，只剩下400余人，英文14班。数年后再减，不满200人，只开6个班，金蒲也离开了。这时初级学生，又逐年减少，毕业出来的育才学生，出路不多，有的在家中或在外租赁地方开英文书馆谋生。英文书馆已然遍地皆是，育才这招牌，再没有什么作用了。"

那么，广州的这所育才学校最后是怎么倒闭的呢？应该说首先与刘铸伯的英年早逝、办学经费匮乏有关。据该校教师沈琼楼回忆：

1925年间，香港华商总会会长刘铸伯已去世三年，商业倒闭，子孙穷困无聊，发现这个育才校址是刘生前买来供给育才的，便函知育才当局，要收回这业权拍卖。

当时育才局面已显萧条，学生又少，金蒲又早离去，留下的几个教员，便公推杜小朴为“大先生”，维持残局。杜因校舍发生问题，便想起一位港商莫某（名忘）在育才开办时，曾特来省参加开学典礼，听到他仍然健在，且发了更多的财，便亲自到港拜访，请其维持校舍。结果，由莫给刘铸伯后人一些费用，取过校舍业权契据，而稳定了校舍问题。

杜再与几个教员商量，以育才是制造“洋奴”的学校，声名不好，决定改名为“私立育才中学”，但校舍简陋，设备全无，估计难获教厅立案。适于是时，陈公博（原注：中共一大代表，抗战时投敌，是汪伪政权第二号人物，抗战胜利后正法）任广东省农工厅长，过去也在育才做过教员，和这些留校教员有过同事的关系，便请托陈公博关照教育厅，批准这间私立育才中学的立案，推杜小朴任校长。但育才改名后，学生仍然没有增加。不久，杜病死，由梁叠峰任校长。

当时大革命时期，省港大罢工，反帝浪潮高涨，学生均不愿入育才，因而经济拮据，不久，便停办了。

这篇回忆文章里，1925年“刘铸伯已去世三年，商业倒闭，子孙穷困无聊”句，与史实相悖。因为刘铸伯去世后，他的长子刘德谱承继产业，1924年与友人集资创办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经营港九两地及与离岛地区的航线。刘德谱担任总经理，此外还担任信德银号董事，焉有刘铸伯去世后“商业倒闭，子孙穷困无聊”之理?

广州的私立育才中学，因为时局动荡、经费匮乏等复杂因素，终于关门大吉。上海的育才书社（Ellis Kadoorie School）却坚持办了下来。

1900年上海租界工部局纳税人大会议通过了开办华人学校的决议。1904年工部局办理的第一所华童学校“华童公学”（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诞生了。租界当局设立该校的目的“只是不希望久居上海租界内的华童，还不及租界之外的（华童）所受的教育”。这种态度加剧了租界内外华洋教育的不平等和公共教育整体水平的落后。

嘉道理得知工部局有办理华童学校的计划，便积极与租界当局取得联系，希望把育才书社交与工部局办理，并表示他将继续捐资办学。1907 年他就表示愿意捐款 25000两白银以资建立华童学校，工部局以办理华童学校的计划还不成熟为由，没有接受这笔捐款。

1909年，上海工部局董事会议决议，开办华童学校。嘉道理写信给工部局总董Mr. D.Landale表示：“他将继续提供这笔捐款，只要满足三个条件：（1）工部局需要在Sinaz地区内购买一块12亩的土地，用于建设校舍；（2）要以Kadoorie 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来命名这所学校；（3）学校由华童公学教育委员会来管理，享受与其他公学同等的待遇。”嘉道理特别强调，“学校年度报告的副本，要寄到香港育才书社”。从长远来看，如果有扩大办学的需要，他还将尽力募集更多的资金。

1910年，公共租界纳税人大会通过了嘉道理的提议，由工部局出面购买土地建设校舍，在卡德路购地8亩，后又在周围购得小块土地，共计10亩左右，购地共花费45000两银子，大部分为嘉道理捐赠。

1911年，普通教育委员会年向工部局董事会提交调查报告，认为："工部局对界内华童教育不负完全责任，工部局的目的应该是为与租界有关的为数有限的青年提供专门训练，而不是超出其财力对华童进行普及教育。如果华人或其他有关人士有建立工部局华人学校的愿望，并且愿为建造校舍提供合适的校址或资金，只要预算和当地条件允许，工部局应从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款项来建造并维持此类学校。"

迫于现实教育需求的压力，同时为了降低租界内的犯罪率，这项关于华童教育的提案在1912年召开的纳税人会上得到批准。1912年9月2日，育才正式改归工部局办理，更名为"Kadoorie 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中文名字为"育才公学"。学校正式开学，注册的学生数达到140人以上。10月21日，学校迁入位于山海关路445号的新校舍。

新校配有足球场和风雨操场。嘉道理与育才书社同仁捐建的新校舍，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典型的西式教学大楼，风格典雅、装饰精美。楼高三层，坐北朝南，布局对称，平面呈"H"形。上部双坡屋顶，覆盖红色机平瓦，开双坡老虎窗，白色水泥砂浆外墙。一、二两层为教学区，原有教室十五间，两旁为办公区域，三楼设有大礼堂。育才以此为基础，展开了近三十年的办学历程。



上海育才公学教学楼

此后，学校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学校体制日渐完善，位列"工部局四大公学"。当时，社会上很多名流都将子女送入育才求学，如：文化名人王国维、名商巨贾杜月笙、军政要人宣铁吾都将儿子送入育才就读，甚至洋务运动倡导人李鸿章的后人也曾在此求学。可见，育才公学的社会影响和地位非同一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军开进租界，"孤岛"不复存在。1942年11月5日，汪伪政府接收育才，学校更名为"上海特别市立育才中学"。上海育才中学"大事记"简略写道：

>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英籍犹太人埃丽斯·嘉道理（Ellis Kaddoorie）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创办育才书社。
>
> 1910年，埃丽斯·嘉道理出资白银四万五千两在山海关路和卡德路（今石门二路）交界处购地十亩，建造三层教学楼一幢和一个操场，1912年竣工后，即将育才书社迁至新校址，并交工部局管理，取名工部局立育才公学（The Ellis Kadoorie PublicSchool for Chinese）。

1941年，更名为上海特别市立育才中学。1945年，更名为上海市立育才中学。

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学校，学校从只招男生改为男女生兼收，学制及课程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设置。1953年10月，育才中学被教育部列为上海市重点中学。

……

令人略感不足的是，这段“大事记”实在太过于惜墨如金，对于刘铸伯的建校劳苦，居然不着一字。

第四节　育才书社学生

广州育才书社创办初期，校舍租赁和设备、图书购买费用，均由刘铸伯等香港华商捐凑而来，那时学生不收学费，每月六七百元的薪金支出和办公费，都是刘铸伯等人募集而来的。

大先生谟亚本人经常出入沙面各国洋行，每晚均到沙面“广州俱乐部”（通常称“群英会”），和那些洋行大班十分厮熟。在书社开办后三年左右，每年海关邮政总局招考洋文人员，书社必有一批学生入选，这是育才毕业生最大的出路。

当时生活费用不高，海关、邮政机构的洋文人员，低薪者月得30～40两纹银，以后还按年资提升，有的人还可达200～300两之巨，且退休时又有养老金，有这优裕的收入，故为一般人所艳羡。不少家长叫子弟入育才，就是想求得较好的工薪收入，因而育才被人当作海关、邮政洋文人员养成所，被视为一间职业学校了。

以后电报总局招考报生，入选者亦多育才学生，其他英文书院（1903年以后各教会神父牧师所办的英文书院渐多）学生，却很少能够考得上这些机构的。

这样一来，就学育才的学生每年迭有增加，高年级的水平也逐年提高。1906年以后，关、邮两门，每届招考洋文职工，投考的人愈众。因此，录取也较严格，早年关、邮招考的高级洋文职工，读到中级M班的育才学生赴考，即可获选。1909年以后，即S班仅读一级二级的人赴考，亦未必有把握入选。M班学生更没有人敢前往应考的了。

在1902年至1925年间，这所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海关、邮政亟需的外语人才，而且毕业生中还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等知名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刘铸伯办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奇迹。



陈公博（1892—1946）

陈公博（1892年—1946年）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被陈公博写入他在美国读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论文附录里，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的中国史教授韦慕庭意外发现。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解职后居于广州，在漫游南洋时结识孙中山，参加兴中会。1906年，陈致美策划反清武装起义，让14岁的陈公博参与其事，并随同出巡湘、赣。翌年，陈致美起事未成被清军包围，令陈公博先行逃脱，自身就缚，被处永远监禁。

陈公博逃回广州不久，避居香港，在一家报馆任校对，饱尝世态炎凉。虽然如此，陈公博的求知欲望仍十分强烈。在求生计之余，坚持苦学。1908年，他考入广州育才书社，学了三年英语。由于家庭生活困难，陈公博在育才求学期间还当家庭教师，替人补习英语。

辛亥革命后广东独立，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出狱，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并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顾问。年仅19岁的陈公博刚从育才书社毕业，由于他积极参与过反清起义，也被誉为少年英雄，当上了乳源县议员，民军领袖黎萼一度想聘请陈公博担当军事参谋。其父因其学识不够，命其辞职，充当学兵（学生军）。陈公博在此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南北统一后，学生军解散，陈公博之父命其弃武习文。他遵父命返回广州育才书社任助教，一面从英美教师学习，等待学校招生继续求学。

1914年，广州政法专门学校招生，陈公博投考后被录取。但由于“那一条一条的条文，最令人感到头痛而不感兴趣”，因此，他对学法律毫无兴趣，只是待机再转求他种专业。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受到校长蔡元培和教授陈独秀等的影响。其间，他与毛泽东、罗章龙、区声白等参加“新闻研究会”。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该会于1919年10月16日举行了第一期结业仪式，《新闻学研究会发给证书纪事》报道说：“新闻学研究会于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业于本月十六日下午八时在文科事务室举行。”由会长蔡元培向参加听讲的会员颁发了证书，并具体记载了“得证书者之名单”。其中在“（甲）听讲一年之证书者”名单中，有“陈公博、何邦瑞，谭植棠、区声白、倪世积、谭鸣谦”等23人，在“（乙）听讲半年之证书”名单中，有“李吴桢、陈秉瀚、徐恭典……易道尊、毛泽东，罗璈阶”以及高尚德等 32人，共计55人。在这批会员中，有一些后来很出名的人物，包括不少中共早期领袖级的人物，其中谭鸣谦即谭平山，罗璈阶即罗章龙，高尚德就是高君宇，还有陈公

博、杨晦、谭植棠等。



陈公博与北京新闻学研究会部分会员合影

陈公博1920年毕业后被广东法政学校聘为教授，同时任广东教育会评议、宣讲员养成所所长。后又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此时的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1920年10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20日，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广东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共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任该会出版科长。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陈公博和谭平山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1年初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这时，汪精卫任广东教育会会长，对陈公博的文笔、才智颇为赏识，汪、陈接触日多。

1920年12月，陈独秀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革命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据陈公博回忆，尤其尤其令其不满

的是，当时的大会主席张国焘气焰嚣张，处处仰苏联鼻息。但陈公博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尽管如此，陈公博在“一大”后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组织委员，而且在工人运动，特别是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发挥过作用。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档案馆合编《“一大”前后广东的党组织》（广东档案史料丛刊，1981年5月印刷，内部发行）收录谭天度1964年2月—4月份所作《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一文说：“‘一大’广东的代表是陈公博，是推出来的，陈公博开会回来后牢骚很多，他最不满意的是张国焘，说张国焘专权、主观，个人主义严重。他比较佩服的是李汉俊、李达，说他们有学问。陈公博是乳源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每个人的一生，大概可分天堂、地狱两阶段，先上天堂的就后入地狱，先入地狱的就后登天堂，我个人宁愿先登天堂了。’这句话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了。”

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他与中共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此后，他不接受党组织劝告，决意要去美国留学研究经济学，并自行宣布脱离中共，而被中共开除党籍。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得到汪精卫的信任与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兼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归国短短几个月，陈公博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提携密切相关。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11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在汪伪政府历任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1944年汪精卫死后，陈公博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

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巨头，被判处死刑。他死前的绝笔，是应典狱长之请所写的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据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记："当他这副对联写得只留最后三个字时，他发现身后有几个法警立在那里，这情形是不寻常的，因为狱室中平时绝没有法警会进入。陈公博是够机警的，他已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了。他回头笑笑问法警：'是不是来提我执行了？'法警们竟然不好意思直认，还是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回答就是证实，于是公博又说：'那么请劳驾再等几分钟，让我先把这对联写完了吧。'他又继续写了'满为心'三个字，又加写了上下款。"

陈公博所书联语，词工而意远，其实并非他所能为。往前，林则徐也留有楹联手迹："大海有实能容之度，明月以常不满为心。"此联署"竢邨退叟林则徐"，与上述陈公博所写的版本又有小异。往后，郭沫若于1963年曾有写给秦皇岛海员俱乐部一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怀。"这与陈公博书小有差别，或许别有出处。

中共一大由于被法租界的特务发觉并搜捕而被迫中断。大家被迫转移，由于慌忙出走，又销毁了大部分文件，同时又因为对一大的纲领和文件有了激烈的争议，当时决定不能发表其文件，一切决定须经由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授权。据说陈独秀看了一大纲领和文献后亦决定不发表，于是中共一大的文件就只仅存手稿，而这份手稿也在动荡中不可思议地迷失了。

陈公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作为中共"一大"广东代表，他却留下了遗失多年的中共一大"秘密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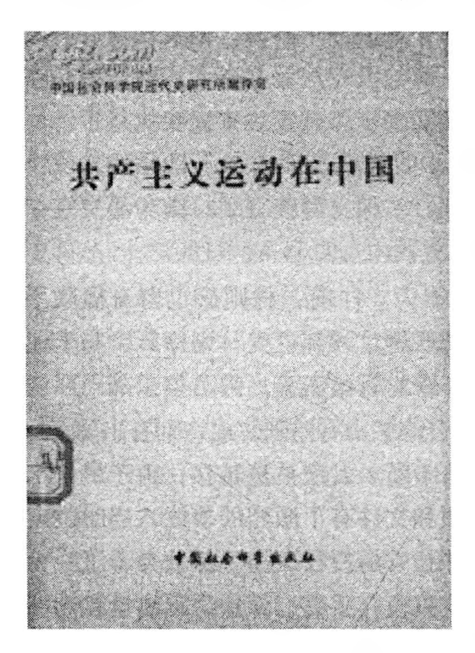
1921年7月21日，陈公博从广州经香港到达上海。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各自住在上海家中之外，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刘仁静等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进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唯有出身豪门的陈公博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流的大东旅社。尤为与众不同的是，陈公博携新婚之妻李励庄一起来沪。

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举行开幕式时，陈公博拿出陈独秀交给他的亲笔信，陈独秀在信中谈了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四点意见，即"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在李汉俊家举行闭幕式时，突然闯进一个侦探（现已查明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说是走错了门，旋即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即决定中断会议，代表们分头疏散，只有陈公博及屋主李汉俊留了下来。过了十几分钟，大批法国巡捕赶至李公馆。陈公博陪同李汉俊应对法国巡捕，直至夜深法国巡捕因搜不到可疑证据走了，陈公博才回到大东旅社。翌日，陈公博没有去嘉兴南湖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而是与李励庄前往杭州旅游。

就在中共一大结束之后十多天，陈公博刚刚回到广州，就写了一篇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文章。

陈公博对于中共一大的记述，不仅仅是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而且还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



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初版）

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得知，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韦慕庭曾和华裔美国学者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经过他与夏连荫的详细考证，得出结论：该论文作者就是陈公博。

这篇学位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共的早期历史文献。附录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共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下，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尽管陈公博后来成了汉奸、历史的罪人，但是他无意间为中共一大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尤其是他在这篇论文绪言结尾处预言：

> 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年轻，但它已非常迅速地风靡全国。它是否走和俄国同样的道路，是有疑问的。正如E.A.罗斯所说：“如果载着列宁和其他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火车在穿过德国向俄国奔驰的道路上在一座桥上跌落，而且他们全都牺牲，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也会采取差不多同样的行动。”人类能够改善自己的环境，但他们不能完全逃避开环境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所以不管中国的共产主义成就有多大，

最后中国还是中国，就像俄国是俄国一样，而且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采取与俄国不同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我的看法。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译本，该书译者林海指出："这本书所提供的，是党的早期活动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并不因陈公博后来所走的反革命道路而失去价值，从研究历史的角度看，也不能因人废言。"

中国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和活动家吴耀宗，也是育才书社的首批学生，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校会部主任干事、出版部主任干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


吴耀宗

吴耀宗，英文名Y.T.Wu，祖籍广东顺德。1893年11月4日，他出生于广州的一个非基督徒家庭中，父亲吴逢敬是一位木材商，在广州河南永兴街有个前铺后居的店铺，经营杉木生意。母亲谢氏由于子女众多，体弱多病，吴耀宗孩提时候寄住外婆家。他的妹妹吴柏庄《回忆少年时代的五哥》一文说：

我家兄弟姊妹共七人，耀宗排行第五，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妹妹，我是最小的一个。五哥沉静寡言，不大喜欢玩耍，很懂事，很听教，很得人喜爱。在外婆家时，他已经非常喜欢读书写字，那时已认识很多字，常以"香墓"（节烧香时烧余的竹枝）砌字，他竟砌到入神的地步。由此可见，他是很喜欢读书和写字的，故外婆十分喜爱他。后年龄稍长，回到家里。进学校后，既聪明又勤于学习，写字又快又好，大家都称赞他。他虽在稚年，作息都有时间，不用父母操心。

后来他进入一所中英文学校念书，校名"育才书舍"。该校除中国籍的老师外，还有外国人在校当教席。五哥进入该校后，上午读英文，下午读中文，勤奋向学，手不释卷，每试辄冠，英文成绩尤佳，为外籍英文老师及各老师所赞许。他年十五时考入北京税务学堂，民国初年毕业回广东，父亲至感高兴与欣慰。

吴耀宗是第一代基督徒。早年在广州私塾及育才书社求学，1908年毕业于育才书社，北上京城，考入北京税务专科学堂读书。

上学期间，因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而接触到基督教，开始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之途。1913年，吴耀宗毕业于北京税务专科学堂，他的妹妹吴柏庄说："他毕业时，父亲在店铺门前张贴一张'报条'，认为这是难得之举。毕业后，税务司即派他到粤海关工作。"

吴耀宗先后在广州、牛庄（今营口）等地的海关工作，1917年任职北京总税务司。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查经班中，读到《圣经》中的《登山宝训》篇章，被耶稣的道理所吸引；1918年6月，吴耀宗在北京基督教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

对当时的人来讲，任职海关是众人羡慕的"金饭碗"。1920年11月，吴耀宗不顾亲友的强烈反对，辞去待遇优厚的海关职务，来到比海关薪水低三倍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任校会部学生干事，负责基督教学生运动，从此开始了他服务基督教和基督教本土化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一生。1924年至1927年，在基督教青年会资助下，吴耀宗到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其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威廉·詹姆斯的宗教信仰的教义》。1927年，吴耀宗毕业回国，赴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校会部主任干事。因工作之便和职责要求，他经常与各地青年学生接触，其思想也与各种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潮动向和时代走向紧密结合。

吴耀宗服务青年会、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之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各种基督教团体活动。1914年，英国基督教贵格会传教士霍德进（H.T.Hodgkin）等和平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因他曾在四川传教，其组织于192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唯爱社。吴耀宗深受唯爱主义影响，亲自起草中文成立宣言书，协助主编《唯爱》杂志，倡导和平运动，并出任中国唯爱社主席。他还深受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及其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并将《甘地自传》译成中文，于1938赴印度玛德拉斯参加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会议之机，当面敬赠甘地，并就非暴力主义如何应用于国际问题进行请教。他曾多次表述，甘地是他最尊敬崇拜之人。

虽然吴耀宗一生都在青年会和基督教会里工作，尤其熟悉学校青年会工作，对青年学生格外重视，但他从来不以基督教会自限，生活思考在一个特殊阶层里。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参加了李公朴、阎宝航等组织的"东北社"，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宋庆龄等人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等抗日救亡团体，利用青年会与青年学生接触的机会，广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积极从事救亡活动。1936年底，吴耀宗先后在美国44所大学演讲123次，听众达25000人，呼吁美国及国际力量制裁日本侵华，为营救"七君子"组织国际支援。

1937年秋，他重返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翌年3月回国，改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从事读书与写作活动。期间曾羁留成都，两度拜会周恩来，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纲领甚表敬佩。吴耀宗还参加了许广平、胡愈之、郑振铎等民主人士在上海组织的"星二座谈会"，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出资组织了"复社"，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

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和《鲁迅全集》。

1946年，吴耀宗与马叙伦、胡厥文、阎宝航、雷洁琼等11位社会贤达，作为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出的代表成员，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呼吁和平，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还为代表团草拟了一份英文备忘录，并当面交给马歇尔。此后，吴耀宗继续支持和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运动。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吴耀宗受中共中央邀请赴京共商国是，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

吴耀宗一直高度关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的认识和远见，使他获得了“午夜钟”的名号。1950年7月28日，他与国内基督教领袖共40人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领导开展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吴耀宗起草的这个宣言，很快得到全国基督教界广泛响应。从此，中国基督教彻底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走向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赵晓阳先生认为：

> 吴耀宗及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从客观上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使基督教开始脱离“西方基督教”的历史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非西方教会即“第三教会”崛起的开启者，而非西方教会的崛起已经成为改变全球文化流向和宗教格局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教会的首创之功，实让处于“后进”的中国基督教会居于“领先地位”，这与吴耀宗是中西兼通的基督教学者，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深刻反省与思考、紧密联系中国本土社会和教会的基督教实践有着密切关系。同今天拉丁美洲天主教的解放神学相比，虽然他在某些观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有所欠缺，但在方向上，肯定是第三世界神学发展的前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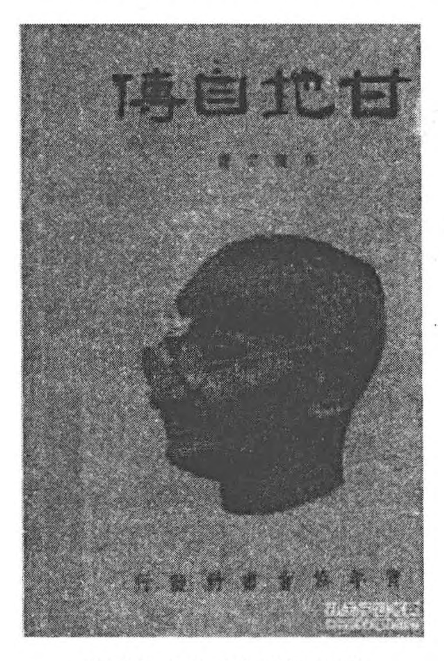
此后，吴耀宗还历任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董事局主席等职，是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委、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常委、委员。

“文革”期间，“三自爱国教会”未能幸免，吴耀宗受到极左势力的迫害，其子吴宗素《大时代的宗教信仰》一书写道：吴耀宗“当时73岁，以前上下班有车接送，现在每日要走一段路去挤公车。原有的工资停发，银行存款遭到冻结，每月只发生活费几十元。我在学校也是牛鬼蛇神，饱尝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每月生活费仅有12元，一家的生活非常困难。父亲的健康本来就欠佳，眼看天天恶化。1967年6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上下午写检查，久坐木凳，又要用脑，甚感疲劳。’两年多内，先是在隔离室昏厥，被训斥一顿后，勉强支持认罪，不久又一连昏倒两次”。

1979年9月17日，吴耀宗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86岁。追悼会于9月24日在上海举行。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张承宗在追悼会上说：“吴耀宗先生热爱祖国，一贯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社会。吴耀宗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



吴耀宗《黑暗与光明》书影



吴耀宗《甘地自传》书影

一生。几十年来，他始终不渝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长期的好朋友而深感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吴耀宗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追求进步，努力学习的精神，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统一祖国，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安息吧！吴耀宗先生！”

吴耀宗一生著述颇丰，据赵晓阳先生的初步估计：其中文著述约150万字，英文约20万字。英文文章主要发表在有百余年历史的基督教会《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和《中国基督教年鉴》（*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上，中文文章除在《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天风周刊》《消息》《青年进步》《唯爱》《华年》《微音》《中国学运》《基督教丛刊》《协进月刊》等基督教刊物上发表外，还在《民主周刊》《世界知识》等社会性刊物上发表，表达他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和对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与社会改造的各种思考和呼吁。他还将这些长短不一、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论著，结集成书出版，如《社会福音》（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出版）、《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1949年出版）、《基督教讲话》（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出版）等。其中部分曾多次再版，成为一时之名品和精品。

其中，《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曾在《基督教丛刊》上系列连载刊登，1943年合印单行本出版，1944年再版，1946年第3版，1946年10月第4版，1948年7月第5版，1948年10月第6版。该书是吴耀宗基督教思想的代表作，亦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神学著作，旨在通过探讨上帝信仰的存在，进而在理论层面上调和上帝信仰与唯物论之间的关系，它是吴耀宗唯一一本系统性的专著。此外，吴耀宗还出版了《中国青年出路问题》（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出版）、《大时代的宗教信仰》（青年协会书局1938年出版）、《大时代中的上帝观》（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出版）等，翻译了美国实用主义哲

学家杜威的《科学的宗教观》（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初版，1948年再版）。

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上为数极少的自立出版机构青年协会书局的当家人，吴耀宗还主持、策划、撰写、编译了多部系列书籍。20世纪30年代，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了“青年丛书”50种、“社会问题小丛书”20种、“宗教问题小丛书”20种及“基督教与中国改造丛书”10种等多达百本的系列丛书。今天看来，其中多本著述都已经成为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基督教本土化探讨的先驱之作。

20世纪40年代，他还顺应20世纪基督教会合一主流，促成了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超宗派联合——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战争特殊困难条件下，基督教文字出版的生存困难和相互沟通问题，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在更大范围的超宗派联合工作的方式，提供了样板。

赵晓阳主编的《吴耀宗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已于201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集包含了吴耀宗各个时期的基督教思想或社会思想，如唯爱主义、社会福音、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基督教与唯物主义、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现实、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改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的中国本土化、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基督教与政治等广泛主题。赵晓阳认为：“要探讨20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或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探讨中国基督教思想家或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对中国教会或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吴耀宗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人物。他以其富有远见和现实性的基督教思想，以其与中国政治和社会高度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

在广州育才书社首批招收的学生里面，黄嵩龄或许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了。黄嵩龄1871年8月5日（农历六月十九日）生于广东省台山县，原名黄嵩裴，又名藻甫、半池。1892年—1894年，台山南北坑文会第一名。童子试第一名。1894年广东省举人揽榜（第四名），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为筹款上京考进士，曾到南洋工作。在北京参与“公车上书”，是保国会成员。1898年，上书光绪请自带学生出洋留学，忽遇政变，不果行。

1902年，黄嵩龄考入育才书社，时年32岁。不久京师大学堂招生，广东省选派生员由巡抚主考，黄嵩龄获第一名。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黄嵩龄于1906年上万言书给宪政编查馆，请改革官制，变法图强。设交通部、农工商部，1907年，成为该校首届优等生毕业。同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黄嵩龄调入邮传部工作。1907年—1911年，为邮传部主事，邮传部电政司主事，补授员外。顶戴花翎，加封三品衔，诰授通议大夫。补郎中。

民国成立后，黄嵩龄建议邮传部改名交通部，历任交通部佥事、铁路总局路政司科长、补授中大夫。1914年调任广州粤汉铁路广东路段协理，兼交通部谘议，主持修筑铁路。1917年被选为广东省第二届议会议长。1918年离粤汉铁路前作《任满离职宣告股东书》，后任广东省第二届议会议长。其间，曾力主禁烟禁毒，改良政治，推进社会变革，但因军阀控制广东政局，议会难以有所作为。



少年沈从文

1920年，黄嵩龄举家北上北京，再次进入交通部，任交通部汉粤川督办处秘书，兼交通部佥事。1924年，他呈书北洋掌权派吴佩孚，提出将退还用来办学的庚款，先投资铁路，再用铁路收入支持办学。这个方案得到了吴佩孚的认可，经过多方协调，英方同意将部分退款用于修建粤汉铁路，但可惜，不久爆发的北伐战争使得修筑计划搁浅了。

在北京期间，黄嵩龄子女众多，入不敷出，为了贴补家用，他开了一家汉园公寓。由于他的惜才怜才，汉园公寓成为沈从文这样的“北漂”文学青年汇聚地，温暖了他们漂泊的灵魂。不过，也由于他的怜才惜才，这家公寓不久后也因为入不敷出而倒闭。1924年，“北漂”沈从文正处于一生中最困顿的时期。后来，他回忆起那段生活，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 在我走投无路时，总是得人相助。北河沿一个公寓，1924年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公寓的主人十分喜爱文学，知道不少文学知识，对弄文学的朋友有着十分古怪的同情。与他熟悉后，便拉你到他房间里去，看墙上挂着的许多著名中外文学家的照片或画像，如拜伦、高尔基、陶渊明、李长吉……
>
> 每到某位房客应交房租饭钱时，他就走到那人房间去。虽不说话，对方已经明白他的来意。只要你同他说起古今中外文学家遭受厄运，而后又在危难中如何遇到一位贤主人的轶事，他就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联想到眼前的事，总不免叹一口气，不仅不再启齿要钱，反倒在吃晚饭时，特意将菜开得丰富一些，尽你把账欠下去。他开公寓的本意，是要赚一点钱的。可是如此一来，到后终于折本倒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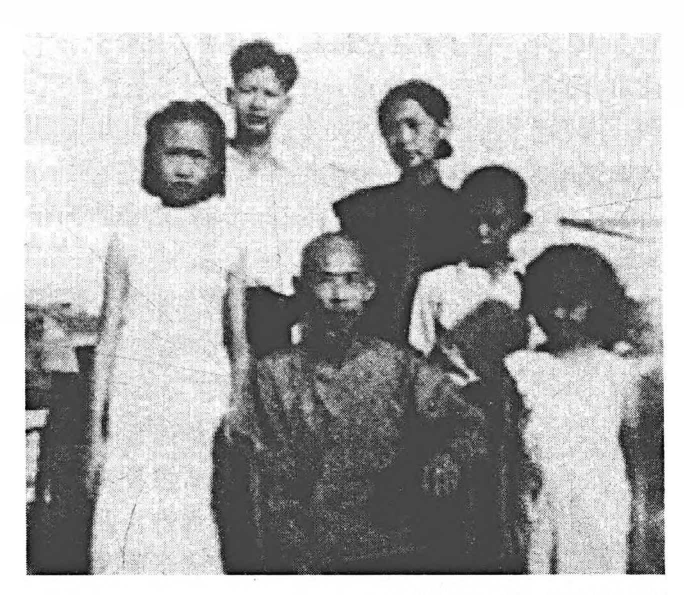
沈从文曾经住过的这个公寓叫汉园公寓，他笔下这位“古怪”又善良的公寓主人正是亲黄嵩龄。那时的沈从文，并不知道，这位靠开公寓补贴家用的老先生，竟然是一位北洋要员。

1928年，黄嵩龄自动离职，返回广州。开始退休生活，读书、写字、作诗、看风水，并任广东省黄氏公所及千顷书院董事长。对国家大计，常提出自己的主张。

抗战爆发后，黄嵩龄将家中成年的孩子送到抗战前线。1938年，日军进攻华南，黄嵩龄带着夫人和年幼的孩子们避居香港。居港期间，他对我国各地失守及世界大局写了不少感慨的诗，现在搜集的诗共有四百余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黄嵩龄返广州居住，在从香港返回广东的轮船上，年过七旬的老人头部被日本兵打得鲜血直流，不久后便双目失明，仍主持千顷书院

事，与强占书院的日本人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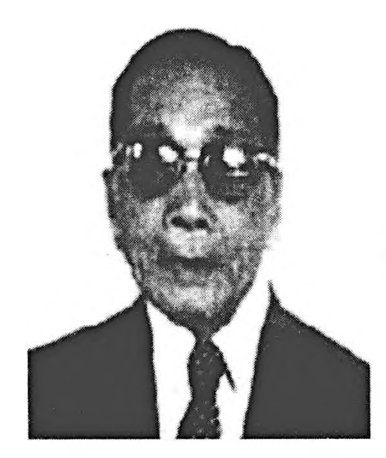
黄嵩龄晚年与子女的合影

1944年12月25日，黄嵩龄在悲愤中去世。他未能等到抗战胜利，也未能看到儿子凯旋、在广州作为盟军代表接受日军投降。在临终遗言里，这位一生不忘振兴中华的维新志士叮嘱儿女：“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若有一毫依赖之性，便是无志，便是无远大之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嵩龄有13个儿女，长大成人的10个子女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多名子女留学美、法、德等国，个个学有所成。子女及其配偶中，有荣获美国总统二战“自由勋章”的民国将军黄谦益，孙中山英文秘书、大本营金库库长黄建勋，中共创始人之一袁振英，民国妇女运动领袖人物、国民党中央委员伍智梅，从中山大学德语教授岗位投笔从戎的抗日将领黄震廷，耶鲁大学教授、北美著名诗人黄伯飞。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他们虽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都各自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11年8月18日—20日，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主办、民国春秋网协办的“纪念黄嵩龄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北京、上海、湖北、浙江、江苏、广东和台湾等地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以及黄嵩龄的亲属100多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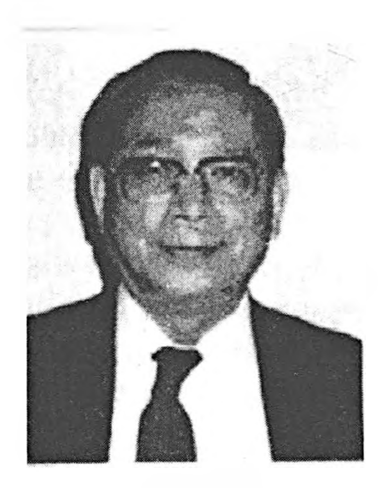
有道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香港育才书社首届毕业生岑维休，字颖元，号熙堂，1897年出生于恩平县圣堂区大江中安草葫村（今江洲镇中安管理区草葫村）。岑维休兄弟四人，长兄维和，二兄维聚，三兄维歌，维休排行第四。岑维休童年时不幸父母双亡，随兄长前往香港，靠兄长扶持，供其读书至香港育才书院毕业。岑维休生性聪颖，且勤学善思，英文成绩优异，受到校长毕特与老师们的赏识。他毕业后，17岁即被毕特校长荐到英国人主办的香港《南华早报》（英文报）当职员，不仅积累了办报经验，而且产生了办报的浓厚兴趣。



岑维休（1897—1985）

1922年，育才书社发起人、时任香港华商总会主席的刘铸伯去世。1925年，香港华商总会办的《香港华商总会报》拟停办。商会曾商请岑维休接办。岑维休与长兄岑维和、同事陈楷磋商，一致同意购下《香港华商总会报》的产权，并将该报的工作人员继续留用。1925年创办《华侨日报》，任总经理。后在香港联营《南中报》《南强日报》；1937年11月在澳门联营《华侨报》；在广州联营《大中报》《大华晚报》，形成华南报业集团。

岑维休乐善好施，曾参加香港的救童助学、防痨、红十字会等社会福利工作。历任香港太平绅士、四邑商工总会理事长、香港保护儿童会会长、香港报业工会主席、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董等。曾获英女王颁发的O.B.E.勋衔和C.B.E.勋衔。



岑才生（1922—2016）

岑维休有子女五人，长子岑才生于1922年在香港出生，在香港育才学校就读小学，此后毕业于英皇书院中学，继而进入香港华侨工商学院进修大学课程。1945年大学尚未毕业，就进入《华侨日报》营业部工作。1949年大学毕业后只身远赴英国，进行了历时9个月的报纸专业训练，获益匪浅。1952年1月又为美国纽约大学所录取，攻读该校研究所经济系硕士学位课程，一年半年后，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

经过多年的勤奋学习，努力拼搏，岑才生学识长进，业务娴熟，于1960年出任《华侨日报》经理，协助父亲工作。1985年12月，岑维休不幸病逝，岑才生接任《华侨日报》总经理。在报社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华侨日报》如日中天，蒸蒸日上，进入世界报业巨人行列。他分别任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主席和国际报业会香港区副主席。

岑才生从事报业工作40余年，是一位资深的行家，在同业中享有盛誉，连续三届被选为香港报业公会主席。此外，他还任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委员、柏立基爵士信托基金委员会委员。自中英两国首脑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声明后，岑才生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在众多公益事业中，岑才生对教育事业不遗余力，他深感社会要繁荣昌盛，必须开民智、育英才，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当推首要。因此，于1960年他率先举办“读者救童助学运动”，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响应，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资助贫苦儿童入学。由于他对教育事业作出极大的贡献，因而得以在多个的教育机构任职。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与树仁书院校董、孔圣堂中学校董、孔圣会英文小学校监，而这几所学校的创办，当年都与刘铸伯有关。关于育才书社的毕业生，我们仅仅简单开列求学于广州河南鳌洲外街的育才书社的陈公博、吴耀宗、黄嵩龄，以及香港育才书社的岑维休等4人，上海两地育才书社毕业生暂不计在内。但是，就这4个人的事工而言，已经像散落的秦砖汉瓦一样，足以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想起坍塌在岁月长河里的一座宫殿。

广州目前也有一所育才中学，但似乎和创建于1902年的育才书社没有直接关系。据介绍：广州市育才中学前身“广东省育才学校”，创办于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广州市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校址在越秀山镇南路。1953年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学校”合并，校名为“广东省育才学校”，校址迁往广州石牌（现华师附中校址）。1954年迁址至福今路。1959年学校更名为“梅花村中学”。1961年易名为“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1995年，学校更名为“广州市育才中学”。2001年，在二沙岛办起了国有民营性质的“广州市育才实验学校”。2002年与广州市第48中学合并，统一冠名为“广州市育才中学”，分东、西两个校区。



广州市育才中学



第四章　弘扬圣道

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香港绅商创设孔圣会，鄙人叨附骥末……大凡国家之盛衰，视乎文教之隆替。……举二十二行省，尽被欧西风化，中国文教安得不日趋堕落耶？今旅港华商刘君铸伯等戚焉忧之，故集合同志倡设孔圣会。

——彭叔焕1910年在汉口自治戒烟会演说孔道

外人诋吾华为无教国，识者引为大戚。清季升孔子为大祀，许庶民皆得祀孔子，使孔子德意，有以感被夫人人之心，先考乃倡设孔圣会于香港，附设义学校三十余所，以为传宣孔教之地，就学者逾千人。海外之有孔圣会，亦自先考始也。自时厥后，薄海内外，闻风回应。论者谓孔教不坠，先考与有力焉，盖敬教劝学，一以振兴祖国为主旨，先考之素志然也。

——刘富宗等《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Confucian Society of Hong Kong 孔聖會

~~From "The Journal of Confucianism", [illegible]~~ pp. 10–12

In 1909 Lau Chu Pak and others founded Confucian Society of Hong Kong. Mr. Lau had conducted Sunday lectures on Confucianism at the [illegible] Govt. School prior to formation of Society. He was elected 1st President by co-founders including

Wei Pao Shan	[illegible]	Li Ch'ing [illegible]	[illegible]
Yung Pi Ch'in	[illegible]	Liang Chao Nan	[illegible]
Li Poo K'ui	[illegible]	Tsen Ying Shan	[illegible]
Li Jui Ch'in	[illegible]		[illegible]

During earliest years had premises at [illegible] Road Centre offered two tutorials of free education for under privileged [illegible] primary schooling along modern educational methods. -- See Card: Confucian Society Schools in Hong Kong - under "Schools" [illegible] ~~under Society's [illegible]~~ a four storey building built at site of a previous tutorial at [illegible] Road - building still exists but not used as school, since in recent years H.K. Govt. introduced free primary educ. Among past presidents of Society were

Mr. Li Yi Mei 李亦梅

Li Pau Kwai

Mr. Young Shin 許讓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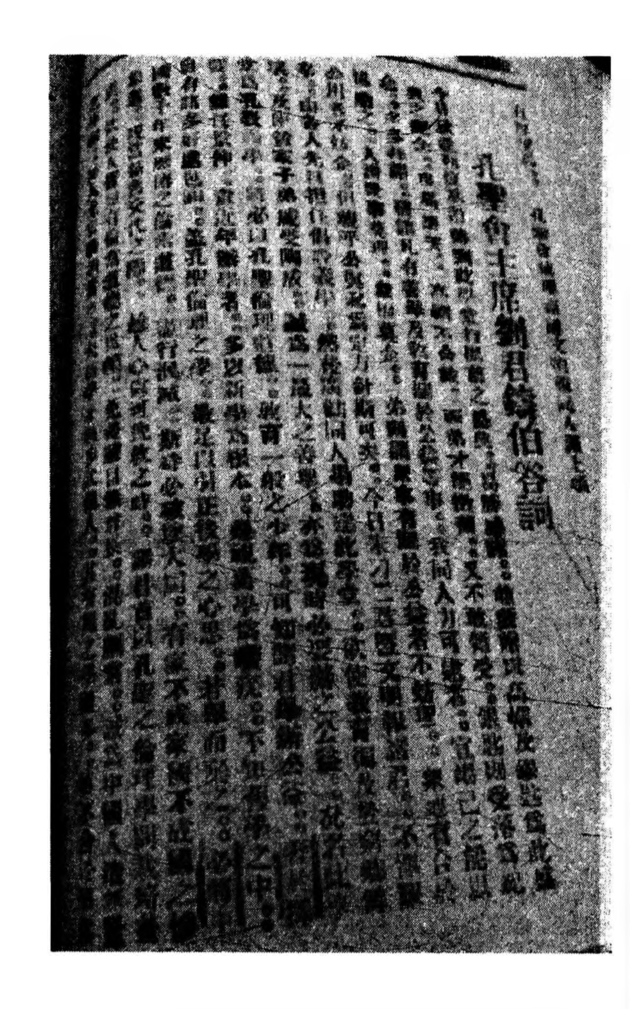
Census No. Card number 0017053

Confucian Society

Founded 1909 by Lau Chu Pak and Young Hee.

1921. Sept. 29. CM. - Confucious Birthday - ~~Local Celebrations~~ - Big meeting at Taiping Theatre, West Point. 3,000 attended, under auspices of H.K. Confucian Society, a charitable body founded by Hon. Mr. Lau Chu-pak and Mr. Young Hee, on latter's return from New Zealand some 20 years ago. Holding a celebration every year to raise funds for 32 free schools in the Colony, New Territories, and poor districts of Canton. Building Tai Ping Theatre decorated under direction of Mr. Chan Y Yue-cheun. Ceremony conducted by Li Po-kwai, Young H.w, Li Yik-mui, Tsui [illegible] and Chow Tung Sang.

香港历史档案馆所藏刘铸伯与孔圣会档案


孔聖會主席劉君鑄伯答詞

孔圣会主席刘铸伯在大坑孔圣义学典礼上的答词，载1909年（宣统元年）4月出版的《祖国文明报》第77册

第一节　创建孔圣会（上）

关于宗教，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有言：“宗教乃是文化教养振奋一切的世界之魂，是哲学、道德和诗之外的第四个看不见的元素，就像被控制住的火焰一样，在静穆中怡然自得，而且只有通过外来的暴力和刺激可怕地毁灭。”

明末西学东渐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儒耶之争的声音绵绵不绝，而在国人心里，无形中早已把儒学奉为宗教，把孔子奉为圣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语）。及至清末，国运维艰，内忧外患，朝野束手无策。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刘铸伯在香港发起成立的“孔圣会”这么一个宗教性民间团体，奉孔子为教主，倡导振兴孔圣之德行道艺，以期正人心、立风化；建立庙堂，以纪念孔圣之功德；倡设讲堂学校，俾得广传道、振兴教育，等等。

刘铸伯创立的孔圣会，在清末与民国前期影响巨大，《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一文，约略谈及他发起成立孔圣会缘起：

> 外人诋吾华为无教国，识者引为大戚。清季升孔子为大祀，许庶民皆得祀孔子，使孔子德意，有以感被夫人人之心，先考乃倡设孔圣会于香港，附设义学校三十余所，以为传宣孔教之地，就学者逾千人。海外之有孔圣会，亦自先考始也。自时厥后，薄海内外，闻风响应。论者谓孔教不坠，先考与有力焉。盖敬教劝学，一以振兴祖国为主旨，先考之素志然也。

追溯刘铸伯发起成立孔圣会根源，与“南海圣人”康有为清末鼓吹创立孔教颇有关系。早在1880年前后，康有为初次游历香港、上海等地，“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对西学及基督教发生了兴趣，创立孔教的设想也油然而生，但他明确提出组织孔教会却是在戊戌年（1898年）。是年，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力言变法，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复兴孔教：“首宜定制，令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以孔子配天，听人民男女，皆祀谒之，释菜奉花，必默诵圣经。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以七日休息，宣讲圣经，男女皆听。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乞明诏设立教部，令行省设立教会讲

生，令民间有庙，皆传祀孔子以配天、并行孔子祀年以崇国教……”提出“陈请废八股及开孔教会，以衍圣公为会长，听天下人入会，令天主、耶稣教各立会长与议定教律。凡有教案，归教会中按照议定之教律商办，国家不与闻”。按这个思路，孔教会成为与西方教会的主要对话机制，相对较民间化。在康有为的上折中，他对孔教会的组织设计并没有后来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完备。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第一站就是香港。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中，对康有为抵港情况有详细的描述：“八月十四日（9月29日），康抵香港，何东（晓生）即同英港督勃来克（Black，署理港督Xrdsone Black）所派之辅政司波君（J. Dyer Ball）及总巡捕梅君（梅轩利）来迎。勃来克对康有为建议说：‘如果你害怕被人暗杀，可以住在警察局的宿舍里。等到你的朋友为你安排好妥当的住处后再迁走。’康有为欣然接受，暂居警署内，至八月二十一日，始迁居何东家中，一切俱由何供给。”

何东冒险将康有为接到家中热情招待之外，还特地派出友人陈欣荣返回广东，秘密接出康有为的家眷，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写道：“何晓生于八日托陈欣荣至城迎吾家，梁铁君请于英广州领事用小输入乡迎吾母，虽皆先去，而侠士高义令人感泣，吾二十一移居何晓生家，港澳赁屋，薪水皆何穗田供给，周入隐微，何晓生复赠金数千以安羁旅，借以济宗族及供游资焉。二何君今之侠士，义高海内，何可复得哉！”


康有为（1858—1927）

康有为在何家大宅居住半月左右，离开香港之前，疾书《赠何晓生书》，作为报答：“何君晓生，夙怀慷慨，忧愤国事。畴昔抵掌，叹为寡俦。闻吾之难，慨然自任。遣陈君欣荣，以救吾家；先下吾舰，以接吾馆。以全家累君，为吾安族姻，为吾谋旅斧。君与夫人才识绝人，既忠且周，过于吾之自谋，迁来如归，忘其旅亡。呜呼，患难之际，至亲密友，亦多有远避却顾者，君乃独仗义相济恤，濡沫有如骨肉。其远怀旷识，古之义士如种成舍宅，鲁肃指囷，何以加兹。吾奉密诏，奔走海外，乞师求救。君高才远虑，为吾筹划，周切深至，岂惟救吾身，实以救中国也。漂母之一饭，犹思图报，若君之大惠，旷绝千古，反国何时未知，何以为报。于其别也，写此赠之，以寄相思，以告天下后世之义士云尔。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康有为九顿首。”

刘铸伯是何东密友，同情维新变法人士。康有为在何东家盘桓期间，他拜见过这位自称奉有“衣带诏”的“南海圣人”，在经济上予以支助。此后，刘铸伯与康有为一直保持联系。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藏有康有为的几封书札，其中一封谈到刘铸伯，该信写道：

久不得书，何也顷南北各地皆有第三党之望，而归心于我，北中国民稳健者，张继之流，欲戴我为魁，南中亦有拥戴者，觅抄李福基书可悉矣。多有请归国者，惟吾母甚思见我，吾甚欲归省，可与刘铸伯等商之，至要，且密之。《不忍》托谁售可复，已合二、三期，各一百寄吾家矣，此问，宪、砚二子近祉。四月十日。

该信是1913年康有为自日本东京须磨发出的。是时康有为因为患疡留东京割治而未能归港侍奉年迈的母亲，直到其母病逝，也未能及时回港奔丧。再结合信札具署日期，可推断写信时间为1913年5月12日。这封信真实地记录了康有为为了谋取国内政坛的一席之地，指示其门下弟子梁启超、麦孺博、徐勤、伍宪子等人在国内开展政治活动。信中“多有请归国者，惟吾母甚思见我，吾甚欲归省，可与刘铸伯等商之，至要，且密之”等句，可见他与刘铸伯关系不同寻常。

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对其孔教主张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他有过这么一番夫子自道：“鄙人于戊戌之年，开孔教之会，立大同学校于日本之横滨，与门人徐勤，实始创圣诞之纪念大典，祁祁学子，莘莘俎豆，吾华之群商及日本之元老大隈伯、与其大臣犬养毅等，咸来行礼。自是推行于海外，日盛而弥彰。”1899年，康有为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同时兴办义学，“怀故国，思孔教”“明保种保教之大义”。

20世纪初叶，康有为在南洋发起较成规模的孔教运动。但是，康有为及其门徒发起的这些孔教活动，不是区域性太小，就是远离中国，可以说在辛亥之前对国内几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倒是刘铸伯1908年在香港发起成立的孔圣会，一时间风生水起，在香江与内地产生了较大影响。孔教在今天仍被视为香港华人传统信仰之一，虽然它的影响实际已逊于与其并称的佛教、道教，主要的孔教团体，也由20世纪初期的六个仅余目前的三个，曾经是香港本地每年重要庆典的孔圣诞（孔子诞日），如今已几乎从香港市民的生活中消失，以至于今人难以想象清末民初，“孔圣诞”在香港曾达到过的辉煌。

刘铸伯在西营盘冯富义塾、大华民义学读的是“子曰诗云”，他虽然在中央书院里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并且，这时的香港教育在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的推动之下，已经完成了由宗教教育向世俗教育的转变。作为中央书院的掌舵人，理雅各、史钊域大张旗鼓地推崇世俗教育，刘铸伯求学期间，理雅各陆续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儒家典籍，1878年发表论文《中华帝国的儒教》、两小卷的《孔子生平及其学说》与《孟子生平及其学说》，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所有这些，必然对包括刘铸伯在内的历届学子产生大的影响。事实也证明，刘铸伯后来发起成立孔圣会，何东、何福、何甘棠、周少岐等功成名就的中央书院毕业生，几乎都成了孔圣会的骨干分子。

光绪末年香港出现了一批尊孔人士，其中核心人物包括凌其啱、杨碧池、陈文俊、李不懈（李乐余）、陈露泉、陈雨汤、秉正、李守正、源若俊、李不懈等，他们经常集合一起，研究孔孟之道；每逢星期日叙会于湾仔政府书馆，宣讲“四书”“五经”，互相讨论。

1906年3月25日，光绪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学堂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上谕说：自古庠序学校，皆以明伦德，行道艺，无非造士，政教之隆。未有不原于学术者；即东西各国之教育，亦以无人不学为归，实中外不易之理。朝廷锐意兴学，设专部以董理之，自应明示宗旨，俾定趋向，期于一道同风。兹据该部所陈忠君、尊孔与尚公、尚武、尚实五端，尚为扼要。总之，君民一体，爱国即以保家；正学昌明，翼教乃以抚世。人人有合群之心力，而公德以昭；人人有振武之精神，而自强可恃。务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物无弃材，地无遗利，期有益于国计民生，庶几风俗纯厚，人才众多，何患不日臻上理。着该部即照所议各节，通饬遵行。所有京师及各省学堂师长生徒，尤宜正本清源，辨明义利，不视为功名禄利之路，而以为修齐治平之规，于国家兴学育才之意，方为无负。该尚书、侍郎等惟当整躬率属，行必践言，切实提倡，认真查核。懔时局之艰难，思全国之关系，朕心惓惓，实有厚望焉。



《祖国文明报》创办人李不懈（？—1924），又名李乐余

同年，香港尊孔人士李不懈（李乐余）创办尊孔刊物《祖国文明报》，该报（刊）“月出两册，订装成书，系以宣扬孔子圣教，使人人知忠君爱国为宗旨”，派员在港九渡海轮上和省港澳各轮船上发送售卖，宣讲孔道，以发扬孔子的学说。

刘铸伯见到《祖国文明报》，大为激赏，斥资为香港、广州、上海三地育才书社师生订阅这份刊物。据李不懈《因纪念圣诞而追忆刘君铸伯》一文记载：“溯仆于光绪丙午（1906年）与同志发起《祖国文明报》也，刘君一见，即赞成之，每期买数百份分增育才书社各生，复令教员讲解之。”此后，刘铸伯发起成立了当时誉满香江的孔圣会。另据卢湘父《香港孔教团体史略》记载：



祖國文明報

孔子降生二千四百六十年

《祖国文明报》书影

> 孔圣会者，初创于前清宣统元年己酉，倡办者为刘铸伯，与杨碧池、李葆葵、李瑞琴、李乐余、黎晴轩等。先是，光绪末叶，凌岐偕、杨碧池、李乐余、陈文俊、陈露泉、陈雨泉、汤秉贞、李守正、源若俊等，研究孔教，每星期叙会于湾仔之官立书院，宣讲四书，互相讨论，并办《祖国文明报》，及派员在轮船宣讲。刘铸伯闻而善之，乃邀李乐余、杨碧池等，创设孔圣会。

有学者认为：孔圣会的前身是光绪末年的一个孔教

研究小组，刘铸伯闻知后，主动邀集其中成员，加上自己熟悉的华人领袖，如李葆葵（著名绅商，继刘铸伯后掌华商总会和孔圣会）、李瑞琴（李炳，著名建筑商人，创立崇正会馆）等，“因鉴于世风日下，礼教式微，孔道凌夷，邪说充塞，乃毅然纠合同志”，于1909年创设而成。其实，更准确地说，光绪末年香港的那个孔教研究小组名叫“孔教研究社”，因为《祖国文明报》第47册（1909年）发表“本报同人恭祖亚圣闰诞略记”，其中就包括《孔教研究社祝词》。


孔聖會發起值理芳名列

孔圣会发起值理芳名录

关于香港孔圣会成立的年份，不少著述与文章都说是成立于1909年。但是，我们查阅《孔圣会星期报》第117册所载《彭君叔焕演说辞》发现，它成立的时间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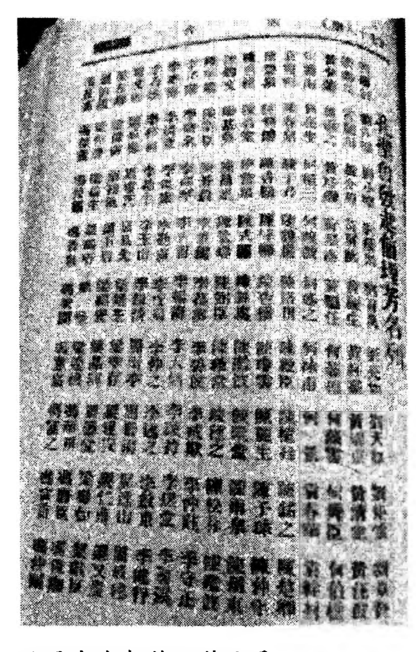
彭叔焕，广东番禺人，在香港设帐十余年，经商十余年，是孔圣会创始会员兼义务司理员。他1910年在汉口自治戒烟会演说孔道，并介绍香港孔圣会举办孔圣诞纪念会时说：“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香港绅商创设孔圣会，鄙人叨附骥末”，“大凡国家之盛衰，视乎文教之隆替。……举二十二行省，尽被欧西风化，中国文教安得不日趋堕落耶？今旅港华商刘君铸伯等慼焉忧之，故集合同志倡设孔圣会”。由此，我们把孔圣会成立日期断定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香港孔圣会成立，宣称：“同人均热心公益，无党派，无教界，从不干涉人事，维以爱世为心，求其实事求是，有益于世而已，其心之正大光明，殆如日月之皎洁……”同人公推刘铸伯任孔圣会主席（会长），公推吴理卿、杨碧池任副主席（副会长）。司库员由刘伴樵、梁建安、阮荔邨、胡鼎三、陈殿臣、罗赞朝、徐焕文担任，司理员由黄介眉、伍宪子、彭叔焕、陈露泉、陈昌运、李乐余担任。

孔圣会成立初期，会址设中区荷李活道124号，这是东华三院的产业，借给孔圣会作为办公场所，后来会址设于香港德辅道中47号二楼。

《祖国文明报》第58册（1909年）刊登了一份包括刘铸伯在内的“孔圣会发起值理芳名录”。

孔圣会成立初期约定，值理在孔圣会同人或捐赠友中选举，以舍寡从众之法决取，“值理分两等，一等为干事值理，一等为名誉值理。干事值理须担任义务，凡干事值理叙议，名誉值理可到场观议，但无投筹之权。干事值理，限以一百名为额。名誉值理之额则无限。干事值理之中，须举一名为会长，两名为副会长，三名为司库员，另聘一人为司理员，又一人为副司理。司理暨副司理，均无投筹之权”。“办事值理于办理本会之事有权可任合用之人，以资其力，薪水由本会之资籍放息支给。所用之人，须品望兼



孔圣会发起值理芳名录

优，而善于其职方合，至其薪水若干，亦听会长与干事值理定夺”。

孔圣会成立后，数月之间滚雪球一般壮大，孔圣会发起值理的名单也在快速增长，据《祖国文明报》第78册刊登的“孔圣会发起值理芳名录”可知，此时发起值理已有370人之多。个人入会之外，孔教公学社、强脑阅书社等还以团体名义加入孔圣会。

在刘铸伯、吴理卿、杨碧池的主持之下，孔圣会同人研究制定了《孔圣会章程》，确定孔圣会的宗旨，其中包括：“（甲）振兴孔圣之德行道艺，以期正人心，立风化。（乙）建立庙堂，以纪念孔圣之功德。（丙）倡设讲堂学校，俾得广传圣道，及振兴教育。（丁）研究圣道之精微，发明意义，辑书作歌。将所辑之书，及所作之歌，或自备器具印刷，或发交印字馆印刷，或送，或出售，均无不可。（戊）举凡一切以孔圣之道为表率而与人为善者，均可随时随事举行。（巳）凡关于政治及别教之事，本会概不干预。”

《孔圣会章程》规定，会费来自热心人捐赠，“凡捐银与本会者，一律欢迎无分畛域，无论其捐项多少，或属男或属女，或老或少，及其人操何事业，住址何处，均称为本会之捐赠友”。捐赠款项给孔圣会的热心朋友成为“捐赠友”，他们每逢孔圣会议事，可到场观议，但是没有无投筹选举之权。

同时，规定了孔圣会同人、值理、会长、副会长、司库员、司理员、副司理的责任与权限，“会长 ”一条写明：“为会长者，担任重大，系同人之表率，宜视会事为己事，各种事须认真办理，无偏无倚，方不负同人仰望。凡议事，必以会长为主席。凡本会所办事件，及本会章程，均由干事值理帮助，会长督率施行。凡会内所用之人员，统归会长节制。”

孔圣会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经费来自热衷阐扬孔子之道的会员捐赠，由会员选举产生设立了370人位孔圣会发起值理。担任值理不仅是一种荣誉，而且有具体的责任。

《孔圣会章程》第十一款“值理任事年限及办事权限”严格规定：“干事值理，以三年为一任，期满仍可举复任。如不愿被举复任者，可退为名誉值理。至名誉值理，则无限以年期，名誉值理中，如有欲补入干事值理额者，或举之。凡本会应办之事件，均由会长暨干事值理，舍寡从众之法，裁决办事。干事值理中，如有缺出，会长自可择人暂署其缺，然后由司理员通知同人另选别人，俟年终叙事时，当众投举。或设额外叙会投举，以补实斯缺。办事值理中，如有行为不端，败坏本会声名者．或有辜负本会委派之职守者，或欺骗藉端图利者，会长有权可将其人暂时革职，然后集同人叙议，

以决去留。凡事有须分辨者，会长有权可即于干事及名誉值理中，择数人为分任值理，专办其事。而被择之值理，又可商允会长，将其额数增多，凡被择者，均不可推辞。凡值理应办之事，未经叙议决许，而经持己见自办者，为经手是问，与本会无干涉。本会应办之事件，按年正月内，即由会长会同各值理，妥议分班，至所分定之值理，须各司其事，幸勿越界，倘有闻知不妥当，及作弊等事，可即报明，由会长集议查究。干事值事，如有中途辞职者，须函知司理员，俟年终叙议时，由同人次决去留，及另举别人补人。由司理以下各员，倘有办公不妥，或行为不合之处，为值理者，幸勿擅自执责，宜报知会长，由会长秉公办理，或集议查究。……干事值理，有权可以设立规条附章，俾本会各值理，及办事员役遵守，并可将该规条附章即归照行。但该规条附章，须俟年终叙议时，或特设额外叙议时，缮列清楚，呈阅同人，相与订允，即允之后，即与正章章程，并行作实，凡本会值员役人等，一体遵守。凡本会需用之地方屋宇等，办事值理有权代买受，或批或赁，均无不可。倘所买受之物业，日后不合用，亦有权代变卖。至本会有受屈之处，可代与讼控告，如本人被控于案，亦可代到公堂对质辩诉。无论刑案或钱债案等，所有费用，概由本会公项支给。”


茲將孔聖會章程照錄如下

孔圣会章程

刘铸伯在商场打拼多年，他借助办理育才书社的经验，对于孔圣会银两使用与管理做出严格规定：

> 本会之入息，倘不敷支经费，干事值理可于每年订定时候筹款，至钱银或物件，为本处或别处捐赠前来，以为本会之用者，干事值理有权可代收纳，由司库员及司理员给回收条，然此等捐赠，不拘其数若干，亦不论其为何项之物，捐赠之人，皆不能借此而得同人之权利。如欲为同人，仍要照第五六款章程捐资报册方可。
>
> 所有本会资借入息等项，须由会长签名；如会长他往，则由副会长一人签名，复以司库一人及司理签名旁侧，方能提取。总之提银须有三人，如正副会长中有一人，司库一人，司理员一人，合共三位方可。如置屋宇买物业各契约，亦要会长、司库、司理各人，共三人签名，另盖本会印信，以昭慎重。
>
> 一切费用支结等数，于年终叙议时，经值理同人等允许，方能作实。所有数目未呈交值理同人等阅者之先，须由值理中择两三位查考，校对无讹，方可呈交。
>
> 本会款项，除日用所需外，如有盈余，须由干事值理，放置生息，或置业求

利，务期稳当，并有利益，方可为之。放置之法，须照下列三法方可，仍听干事值理择善而行：（一）按照公道之价而算，贮在银行银号，乃殷实店行，或将银出售，或按屋宇物业，所典按之屋宇，其地契期限，由当日起计，至少须有六十年之久者方合。（二）或买受屋宇物业，其地契年限，如上节所云者，方可买受。（三）无论何时放出之息目，或买受之物业，干事值理，须列其详细，汇为一帙，使会内同人得知其情，查阅其事，方为妥当。

干事值理于放置本会之款项，应照其所得之权而行，如既经照上列三法办理，又复小心谨慎，而犹有意外折亏，如置物业而价减值，致息目过微，或因银号行店倒盘，以至所附款项，被其拖欠等事，干事值理皆不任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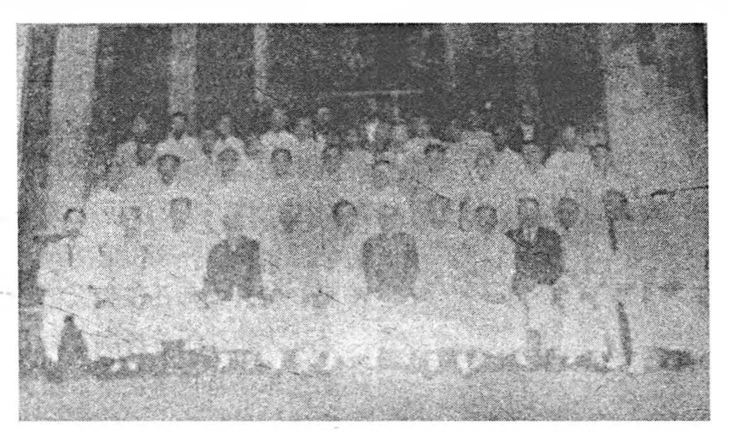
此外，《孔圣会章程》还对叙议做出如下规定：一是值理同人等每年年终叙议一次，看览数目，阅看本年办事的报章，公举值理及商议应办各事宜。赴会同人，其数至少亦须有八人，方为合额。如无八人，即须展期，另订日期叙议；二是本会干事值理，最少每月须叙议两次，商办各事，议事日期，既各会长商允及各值理订定后，即须依期到叙。赴叙者最少有五人，方为合额；三是如有要事，会长可订期设额外叙议，通知值理同人到议。或值理有十人签名函请，亦可设额外叙议。至同人欲设额外叙议，必须于同人数中，有三分之二，同签名函请方可；四是设额外叙议，必须将议案详明，预期至少十四天，或登告白，或印传单派送，俾同人到知议何事；五是值理同人，按照第十四款请设额外叙议，亦须将欲议何事详列，函交司理员。该员接函后，即报知会长，限七天内，即要订期叙议；六是设额外叙议，如同人赴会者，不足十人之额，此叙议即作罢论，不得仍以原议再请设；七是无论年终叙议，值理叙议，或额外叙议，均以会长为主席，如会长不到场，即以副会长之一人为主席，如副会长无一到场。则由到场之干事值理中，择一代之。如干事值理无一到场，即由名誉值理到场者择一人。如名誉值理亦无一到场，即从同人中自择一人为主席开议，被择之人即于此叙议，有权投筹及择善决夺。



孔圣会部分值理

孔圣会于1908年成立后，开始筹备同年的祭孔之礼，即所谓“丁祭”。顺治二年（1645年）定制，每年阴历二月、八月第一个丁日祭祀孔子，故称“丁祭”，又称“祭丁”。香港则把祭孔活动称为孔诞庆祝，1905年9月25日（农历八月二十七

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庆祝孔诞的文字——《圣诞停工》启事："廿七日乃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五十六年圣诞。谨于是日停工一天，以伸庆庆祝。廿八日停派报章，惟行情纸仍照常送阅。此布。"这则启事，宣告了香港孔教运动的正式掀起，堪称香港近代孔教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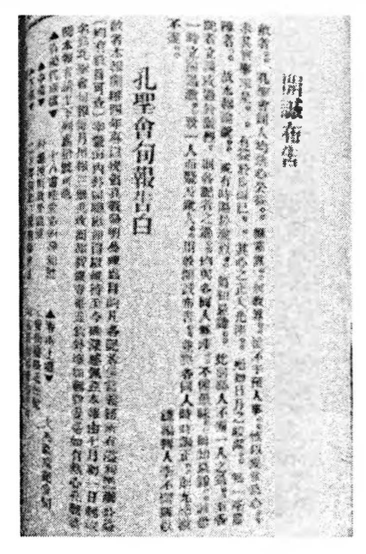


孔圣会部分职员

孔圣会成立这一年（1908年），香港南北行的华商领袖已决定开展孔诞的庆祝，据《香港华字日报》1908年9月28日刊载《南北行拟改建醮为祝孔诞》记载："八月廿七日，南北行街坊华光值理八家开签醮款。坊众多以为耗于无意识之举动，何不将此款移作恭祝孔子圣诞……现值理八家拟择期集议停止公举华光诞值理，添举孔子诞值理。"华光大帝，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常奉的火神，特别是商业发达的佛山，华光神诞更是传统庆典。南北行是香港从事转口贸易的华资商行，1868年南北行商号成立的南北行公所，是香港第一个华人商会，具有相当的影响。南北行商号奉拜华光，一方面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以为防患火灾的寄愿；另方面也应有借着年度的庆典活动，促进行内从业人员团结之意。

《南北行拟改建醮为祝孔诞》这则报道，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孔圣会此时已经成立，南北行的华商领袖乐于停止举办华光诞，转而赞成支持孔圣会举办的孔圣诞。有感于此，《祖国文明报》刊文说："呜呼！以中国四万万人所共有之孔子，亦倚赖政府尊之，而国民不知尊，又不乌知中国为四万万人之中国，而安危与共哉？兹闻我国街坊众有议将往日之建醮酬神，改为八月二十七以纪念孔子者。此在香港之南北行街则已实行云，此殆民智之进步欤？然而鄙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何？喜中国四万万人所共有之孔子，向惟政界少数人尊之，今商民竟知孔子为己之孔子，而忽尊之也。知孔子为己之孔子，则知中国为己之中国。知中国为己之中国，则必思合君力以爱中国，兴中国，强中国，荣中国，而断不肯嵊类以辱中国，背中国，自残同胞，为虎作伥，以亡中国，而中国将一洗其黑暗之气，而光明于世界之上矣。盖孔子以救国为宗旨，知尊孔子，亦必以救国为义务也。昔范文正为诸生时，以救国为己任。故曰'不为良相。愿作良医'。夫文正因深知孔子而欲学之者也。今举国商民皆知尊孔子，则是举国商民皆知救国，而举国商民昔不啻为范文焉，虽欲不喜，吾焉得而不喜？"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发布尊孔上谕，从上到下成立了专司祭孔的礼乐局。1909年，得知香港孔圣会成立及其筹备本年度孔圣诞庆祝活动，刚成



開誠佈告

孔聖會旬報告白

孔圣会旬报告白

立不久的广州府礼乐局高度重视，捐助经费一百元，并于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二十四日致函香港孔圣会，由礼乐局教习沈厚慈、吕某等专程赴港，当面递交刘铸伯，信札写道：“窃照祭祀大典，中外所重。日本凡遇大祭，合君臣士庶，男妇大小，无不恪恭动致敬尽礼而行之，其国之强，此其一端也。朝廷为全国教育，明示尊孔宗旨起见，特升先师孔子为大祀，典制增崇。迭奉大宪札行筹办圣庙大祀礼乐佾舞事宜，当经复设礼乐局，以便陆续将修明礼乐恪将祀事各举，切实奉行，庶上以宣扬圣法，下以振厉儒风。”

这封信札谈到，广州府举办的祭孔，“官吏独任，绅商均不与闻，振作难期”，希望能够与香港绅商一道推动。对于香港孔圣会拟定的办学传道章程，广州府礼乐局予以高度评价：

> 素仰贵会，眷怀祖国，实行尊孔宗旨，组织周密，办事精详，其办学传道章程，尤为钦佩。现值修明孔教之秋，敝局正筹拟联络绅商，会同襄办学官、礼乐、祭品一切事宜，尚望贵会特举专员，不分畛域，来省切实赞襄，以匡不逮，并由敝局捐助贵会经费一百元，聊表赞成之微意，即派敝局书记员沈厚慈等，赴贵会代达倾慕之忱，并顺带该捐款赍呈归回查收。除札该员外，礼宜照会。为此照会贵会，烦为查照，迅举专员来省，襄理一切，庶冀官绅商民，日就联络，共襄祀事，以隆孔教，为粤民福，为首郡光，勿任翘跂。

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钟，孔圣会值理叙会，到者七十余人，刘铸伯在会上说：“前有礼乐局教习吕君到港，言现下礼乐局佾生，礼仪已娴熟，如孔圣会此次纪念圣诞，请至助祭，亦属未有之盛举。此事已由弟转达该局龙明府，亦甚赞成，故请贵会集议云。此事经前次集议，众议不知合否，当请教于梁节庵（按：即梁鼎芬，晚清学者、藏书家。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曾因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诗词多慷慨愤世之作，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大家’）先生，业由司理员缮函寄去，刻下尚未回音。惟昨日礼乐局书记沈君厚慈，奉广府命赍送公文及助款前来本会，弟曾问及此事，沈君言并不知情，则请佾生来港助祭一事，或者尚非礼乐局本意也。”

李乐余发言说：“请佾生助祭一事，经众位研究，有以八佾为商界所不宜用；有以孔圣升大礼，则祭孔圣或亦可用，曾辩论纷纷。今姑勿论礼乐局有此意与否，亦必须梁节庵先生覆函，再行研究。”他还说：“有同人献议，谓本会已有办学部、传道部，可否再添礼乐部一份，与礼乐局合办，当仍请广府宪为局长，本会主席为副局长，专任办

事云云，此议未知合否？”

刘铸伯说：“宗旨则甚合，唯恐未易办到，当请各位酌议。”大家认为“此事重大，刻下断难办到”“此事体极重，界限尤易分明”。酌议的结果是“此事缓议”。

宣布员李乐余再次读广府照会公文，刘铸伯倡议请宣布员拟稿，照复道谢助款，李葆葵合议，大家均表赞成。刘铸伯还倡议派值理李佐周、彭叔焕、徐焕文，暨司理员一位，前往礼乐局参观礼仪。但是因为司理员李乐余、陈昌连二人有事不能离港，遂议由副司理员胡鼎南同往。刘铸伯回信如下：

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候选道、孔圣会会长刘 照复事：

现接贵局长七月二十四日来文，均已敬悉，并蒙捐助经费一百元，仰见贵局振兴孔教，赞成本会，同人感谢莫名，业即如数拜领。至来文着速举专员来省襄理一切，足见贵不分畛域，使绅商士庶，得瞻盛典，经即集议，迅派本会值理徐焕文、李佐周、彭叔焕，暨副司理员胡鼎南，虔赴贵局，听候指示礼宜，不胜厚幸，顾候勋安，须至照复者。

右照复 钦加三品衔、在任候补道、调补广州府正堂礼乐局局长高

宣统元年七月廿八日照复

孔圣会派值理徐焕文、李佐周、彭叔焕暨副司理员胡鼎南赴广州府乐局，听候指示礼宜的同时，大张旗鼓地开展孔圣诞纪念会筹备宣传工作。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廿二日，刘铸伯等拟出“孔圣诞纪念会广告”，以“孔圣诞纪念会同人”的名义在《祖国文明报》《华字日报》等香港报刊刊出：

八月廿七日，为中国人之宗教主孔圣岳降之辰，凡中国人，均当于是日一体恭祝，乃足尽吾人尊崇圣教之心。虽至孔圣诞生以来，中国历代帝王，靡不尊崇惟谨，惟民间直有不知孔圣为何人者，此世道所以日衰，人心所以日坏也。同人等戚焉忧之，故去年对于孔圣诞辰，联集港中绅商以恭祝，此虽形式上之作用，而精神即于是乎存，盖必须人人知有孔教，而后知崇孔教，守孔教也。今者孔圣降生二千四百六十周岁之纪念又届矣，我孔圣会同人，固当联集以恭祝，惟是会中诸务，虽颇就绪，然同人之额数，犹觉参差，盖发出绿簿，仍未收齐，孰为同人，尚未尽悉，所以未能一律举办兹拟由会中选举干事值理，分任其事，所有章程，略如往年办法，复名为孔圣诞，纪念会，所有收入之入场费，及捐助费，除开支费用外，仍拨入孔圣会，以举办办学、传道等义举。此圣诞之纪念，即为他日大同之起点，凡中国人，当亦表同情乎？

此外，孔圣会还拟定了“孔圣诞纪念会简章”，其中包括视参会人捐款多寡，赠送孔圣像、大会入场券、八角灯笼、徽章、雨伞等，并派送圣诞大祝典。

由于这次纪念会发动面广泛，得到了南北行等华人商户的积极响应，孔诞庆祝活动开始变得有声有色，一跃成为团结全港各界的重要节日。庆典当日，各界在太平戏院举行纪念大会，刘铸伯负责主祭，“是日场中，遍悬生花及各国旗帜。入场者数千人，济济衣冠，座为之满。孔圣像之上，用花结成一个大团字”。

商界庆祝更是非常投入，据1909年10月12日《香港华字日报》所载《恭祝孔圣诞纪盛》可知：“廿七日孔圣诞，本港上、中、下环大马路，大道中，文咸、永乐等街，均悬旗恭祝，晚间多悬圣诞纪念之灯笼。而大马路一带之洋货、匹头各店，均于午间闭门休业，又有于门首贴‘孔子圣诞休业’字样。永安街闸口悬旗、扎横额、摆设生花。各匹头店均休业。南北行则以聚德隆陈设最为热闹；洋行则汇丰银行□也。洋行、大酒店、各外馆均悬旗帜，满挂灯笼，鼓乐喧闹，夜半始已。比去岁更为兴高采烈也。”

由于参与庆典市民众多，市面气氛亦为之活跃起来，“廿七日，各行休业假日，又值星期，故多往太平戏园。观礼毕，顺往酒楼燕集。三点后钟，纷至沓来，比于中秋节更为热闹”。

以推行孔教关心国家前途，打造本阶层的社会领导地位，在这次孔诞纪念大会上所安排的演说，也可见一斑，据1909 年 10月12日《香港华字日报》所载《演说员名单》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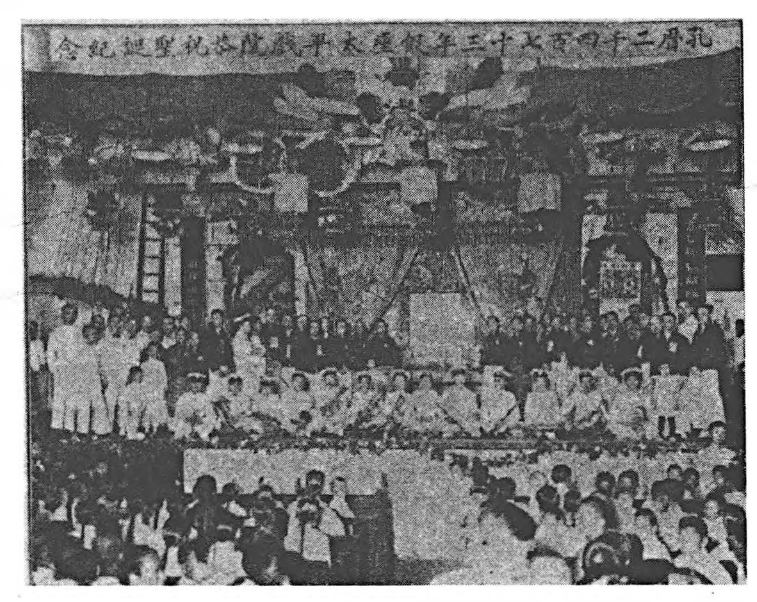
> 郑君管铭：《发明孔教》；郭君翼之：《敬孔子者非迷信神权》；李君守正：《孔子所教乃大同公理，然不外忠恕，人人可行》；曾君千臣：《劝学》；邓君振武：（一）孔子之教注重修身，今日立宪发源；（二）孔子并无轻视农工商及妇孺人等。（三）历代及本朝尊孔子之大略；李君乐余：（一）孔教之方针，（二）孔教实行当驾乎今日立宪共和政体之上；（三）遵孔教在择其精义实行〉；小童陈兰孙：《孔子与时势之关系》。何君兆熊：《尊孔教以首重教育，多设义学，广劝捐助为宗旨》；梁君家彬：《德育、智育、体育》；何君亮生：（一）孔教与近日时局之关系。（二）信孔教者须知三大主义。（三）吾人所以当奉孔教之理由。（四）欲强中国不可不信奉孔教其道有五〉；伍君宪子：（一）孔教与中国立宪之关系，（二）孔教与世界进化之关系……

从这些演说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内地时局及其前途，是香港尊孔人士首要关心的课题，这是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今天却体现在平民世界，显示出权力正在递遭，故讲者拥护立宪之余，也不忘强调孔子并无轻视农工商及妇孺人等；其次是孔教的发展方式，演讲者强调必须重视义务教育和慈善，并因应世界进化同步，表达出与传统官办孔教不同的另外一种思路。

关于1909年举行的“孔圣诞纪念会”盛况，孔圣会值理彭叔焕次年赴汉口演讲时说：“经于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五十九年八月廿七日，假太平戏院为纪念场，以躬行祀典，是日男女闻风而至者七八千人，惜院地狭隘，不能容足，多作门外汉者，固有倡建

圣庙之议，而拟会堂并附入其内，惟创建之功未兴。”

1910年，孔圣会发起举办的“孔圣诞纪念会”，更是盛况空前，据《彭叔焕演说辞》记载：“本年八月廿七日又逢圣诞，故仍假座太平戏院为纪念场，发同人入场券以节制之，而是日男女到者仍五千人有奇。会长刘君铸伯于祀事之余，发言曰：‘会场太隘，年年假地祝圣，倘无地假借，岂非有废大典？请诸君趁此盛会，各解囊金，以为建筑会堂之费，则他年祝圣，不至假地于人，岂不善哉？’刘君首先认捐一千元，于是在座诸君慷慨认捐争先恐后，仅一小时久，而捐款已达一万四千元有奇，此足见孔教入人之深，并近年民智之发达也。是日复接各埠来电恭祝，极表同情。”



在太平戏院举办的“孔圣诞”纪念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薄西山的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封建帝制宣告结束，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得以成立，孔子开始走下坡路了。根据香港孔圣会的一则“启事”揭示：“一般学子……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诋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实则若曹少不更事，鲁莽灭裂，不惜假新学说以便其私图，而古人之大义微言，俨如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诞之可言？”

随着民初共和政体的建立，南京临时政府着手在教育领域进行改革，推行教育改革措施、颁布新的教育方针，以适应新政体的建设。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普遍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同年2月8日，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宣称“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并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美育”的新教育方针。

《普遍教育暂行办法》的颁布，意味着南京临时政府对在教育领域历行两千年之久的尊孔读经的否定，亦标志着近代中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次巨大变革。但引起社会层面的强烈反弹，尊孔组织纷纷涌现，“各省之宗孔、尊孔、孔教、孔道诸团体，见之报章者，鳞次栉比”。这些组织均以尊孔为志，如宗圣会声称“宗礼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孔道会“以讲明圣学为宗旨”；上海昌明礼教社以昌明“礼教”为宗

Confucian Society of Hong Kong 孔聖會

From "The Journal of Confucius", Vol. 2 Oct. 1909 pp. 10-13

In 1909 Lau Chu Pak and other founded Confucian Society of Hong Kong. Mr. Lau had conducted Sunday lectures on Confucianism at the Wanchai Govt. School prior to formation of Society. He was elected 1st President by co-founders including [illegible] Li Ch'ing Hsuan [illegible] Wei Pao Shan [illegible] Liang Chao Nan [illegible] Yang Pi Ch'ih [illegible] Yuen Ting Shan [illegible] Li Pan K'un [illegible] Li Jui Ch'in [illegible]

During earliest years had premises at Des Voeux Road Central offered two tutorials of free education for under privileged [illegible] gradually tutorials extended to include primary schooling along modern educational methods. -- See Card: Confucian Society Schools in Hong Kong - under "Schools" In 1952 under Society's [illegible] a four storey building built at site of a previous tutorial at Tai Hang Road - building still exists but not used as school, since in recent years H.K. Govt. introduced free primary educ.

Among past presidents of Society were Mr. Li Yi Mei [illegible] Li Pao Kui [illegible] Hui Yeung Shing 許讓成

Previous Next Card number [illegible]

Confucian Society

Founded 1909 by Lau Chu Pak and Young Hee.

1921, Sept. 28. CM. - Confucious Birthday - Local celebration. Big meeting at Taiping Theatre, West Point. 3,000 attended, under auspices of H.K. Confucian Soicety, a charitable body founded by Hon. Mr. Lau Chu-pak and Mr. Young Hee, on latter's return from New Zealand some 20 years ago. Holding a celebration every year to raise funds for 32 free schools in [illegible] Colony, New Territories, and poor districts of Canton. Building Tai Ping Theatre decorated under direction of Mr. Chan Yue-cheun. Ceremony conducted by Li Po-kwai, Young Hee, Li Yik-mui, Tsui Wan-man and Chow Tung Sang.

香港历史档案馆所藏刘铸伯与孔圣会档案

旨，等等。而与临时教育会议推行《办法》步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2 年 9月北京教育部通电各省，全国各校于公历10月7日孔子诞辰日举行纪念会，却立即得到较为广泛的响应，“全国各地教育界及工商各界，港、澳侨胞，纷纷举行庆祝活动，极为踊跃”。

以广东为例，“自中央通电来粤，举行孔圣诞纪念，广东学界，极形踊跃”，据《广州学界工商界之祝圣》（《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1913 年2月）记载：“城内广州中学已捐集得五百金，女子第一二师范，及西关坤维女学，亦由学生集捐，预备物品，各学校堂员学生，均预先筹集多资，铺陈一切，又纷纷征集学生成绩，预备至时陈列，甚觉冗忙，并闻各校多于是晨在校内祝圣后，再率队往学宫行礼，或更于是晚在校内演说，开演影画，务尽庆祝之欢云。”工界“多停工庆祝，至商场各街多定于诞日在街上灯彩”。商团也“举行圣诞大纪念”，圣诞之日，“商团召集行商恭祝圣诞。七点钟时各团军及军乐队、公安会员、七十二行、九大善堂、总商会、孔圣会共数千人各集商团操场，联赴广学府谒圣”，开会讲演保存孔教。

在孔圣会的发动之下，香港1913年举办的孔诞庆祝活动更加热闹，参与阶层更为普遍：“……即横街小户，亦高悬旗灯志庆，入街更可想见。以致家家楼头国旗飘拂，天日为蔽。兼之休业者十而八九，兵头花园、愉园等处，游客顿增，入夜后则笙歌沸天，万灯齐发，俨如繁星万点。道上则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且各户均皆设筵庆叙，种种热闹，虽元旦亦无如是态度也……石塘嘴各娼寮此亦同伸庆祝，殊为闹热，如群玉、咏觞、欢□等寮，均绿叶绕户，楼头高悬旗帜云。”

也就是说，1913年的孔圣诞庆祝，绅商市民参与面更加广泛，连妓寮都参加了孔圣诞庆祝活动。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参加大型庆典、国事并不奇怪。据著名学者张鸣《商女也知亡国泪：五四时妓女发起的爱国运动》一文记载：五四运动期间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

龟”之辈，都动了起来，“九成同义会（乌师帮所组织者）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还组织“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乎’。见者多触目惊心”。是激励嫖客爱国，还是借以自我表白？也许两者都有。据报道，上海的花界，跟学生和商人一样，也组织了救国团，即名“青楼救国团”。据美国学者贺萧（Gail B. Hershatter）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二十一条签订日）停业一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

1913年的香港孔圣诞庆祝活动，有的商户更视孔诞作耶诞，直把尼山当伯利恒。据当时报道：“大新公司顶楼上更以电灯数千火，砌成‘孔教光明’四字，三楼则缀以五色绉纱，中嵌‘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等字，另‘孔圣降生纪念’六大字，俱用电灯环绕。又在货柜内以绸绉结成一山，以禾秆结成一茅屋，中有一像，生妇人手抱一孩，又在屋旁置一麟吐玉书，景取尼山孔子之意。观者极众。”大新公司为香港有名的大百货公司，创办人蔡兴是从澳大利亚回港定居的归侨，笃信基督，曾出任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值理。时大新公司开业刚刚一年，为广招徕，直接运用耶稣降世的画面演绎孔子诞生，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是年香港孔诞的盛况，自诩为始创者的康有为，亦与有荣焉，他说：“近在香港、新加坡举行圣诞之典，全港商店停市，乃至各国银行亦停市一日，衢道人家，莫不张灯结彩，饮酒欢呼，于是典礼大盛矣。”康有为的这篇文字，写于1914年10月，距《香港华字日报》发表《圣诞停工》启事不过10年。而不到10年之间，香港孔诞从个别机构的假日，变成全市华人的共同节日，的确令人赞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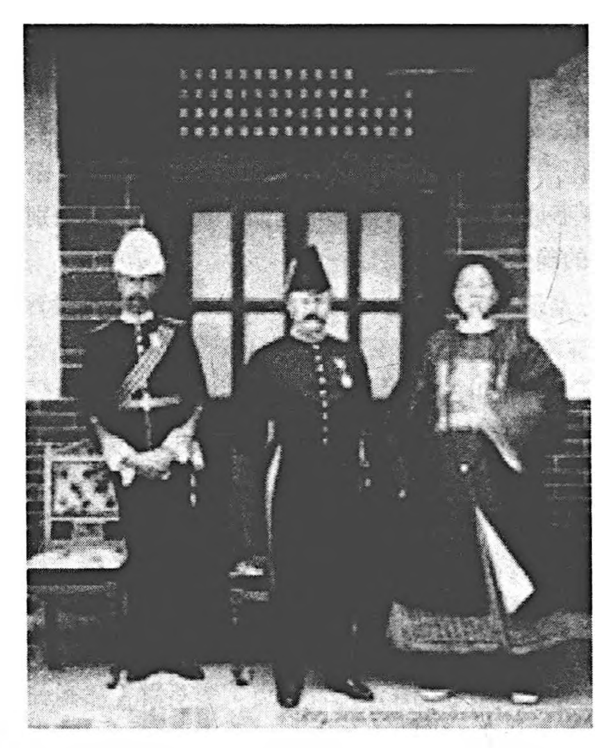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创建孔圣会（下）

孔圣会成立之前两年，李不懈（李乐余）与同道在香江阐发儒道。李不懈《一喜一惧》文尝言：“孔子固汉族大圣人，而主中国之教育者也。呜呼！以中国四万万人所共有之孔子，亦倚赖政府尊之，而国民不知尊，又不乌知中国为四万万人之中国，而安危

与共哉？”1906年，李不懈创办《祖国文明报》，“月出两册，订装成书，系以宣扬孔子圣教，使人人知忠君爱国为宗旨”。孔圣会创立后，《祖国文明报》易名《孔圣会旬报》，作为香港孔圣会的机关报，编辑人兼发行人仍为李不懈，以加强宣传儒学经义和尊孔传统为办报宗旨，开设有经术、历史、传记、政治、教育等栏目。

孔圣会创立后，香港绅商纷纷入会，宣扬孔道。韦宝珊（韦玉）爵士是香港银行家、商人及政治家，曾参与创立保良局。自1896年至1917年期间出任定例局（后改称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是香港1842年开埠以来第四位担任该局议员的华人。他是近代历史上首位被送到西欧留学的留学生之一，也是历来第三位获勋爵士的华人，同时也是孔圣会荣誉值理。1909年，韦宝珊曾经寄赠英国驻威海卫领事洛克孔子圣像数幅，不久接到回信，希望香港孔圣会能够重印其亡友的一册遗著。

《祖国文明报》以《大英威海卫钦差大臣骆檄致香港韦绅宝珊书》为题，刊登了这封书信：“宝珊先生大人阁下：接拾月十九日惠书，附孔子圣像数幅，拜领拜领，十月初十日发时之信，未审十六来书夹有圣像，一寄再寄，感与歉并，但貌似释家，必系伪作，其或来自东洋乎？鄙意宜登华字各报，劝人勿购，免其以伪乱真。兹寄上照像一包，内有大成宝殿孔圣王陵，及今衍圣公孔令贻等像，而曲阜县大成殿内之孔子圣像，亦在其中。该县为孔圣发祥之地，今衍圣公之府第在焉，两相比较，便与香港供奉之像，大相悬殊矣。日前山东袁中丞到署晤会，允为代求孔圣既门人各像，俟有所获，再行函报。鄙意以为孔门各像宜刊成书，并以华英合璧解释，乃与尊意适同，欣甚欣甚。惟各值理意见如何，尚祈示慰及之。昔故友倭领事讳妥玛者，亦罗廉访之莫逆也，曾著一书，名曰《文庙祀位指南》，惜今书板无存，诸值理似宜添附各像，重印其书，所费无多，异日发售行世……”


山东巡抚周馥（右）与骆克（中）合影（1903年）

骆克1902年4月出任英国驻威海卫领事，4月11日，香港华商同集大会堂为其壮行。据《香港华字日报》4月21日《致送颂词述略》（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骆克在答谢时说：“颂词之赠，愧弗敢当，猥蒙厚意，尤为感谢。余到威海、即以此颂词纪念与诸君在港言笑时也，余尤愿与诸君他日相晤于威海。”刘铸伯这番接到韦宝珊转来的骆克书信，当即作答，该信以《孔圣会复大英驻威海卫钦差大臣

骆檄君书》为题，发表于《祖国文明报》：


孔聖會復大英駐威海衛欽差大臣駱檄君書

迷信雖未成災，良足戒也

刘铸伯给英国驻威海卫领事骆克的信件

大英驻威海卫钦差大臣骆大人台下：

敬启者，日前由韦绅宝珊交到钧谕一道，并孔子圣像等，仰见热心孔圣，嘉惠于我华人者殊非浅鲜，本会同人，诚五内感激。至本会所照圣像，系由同人绘书前来，其为伪否，尚未细辨。兹蒙惠寄圣容，得仰尼山真面，万为感谢不尽。惟孔圣降生及升遐日期，言人人殊，未审何者为的，然孔门圣徒，当无不知祖宗之忌辰者。素知台下热心圣道，合无仰恳大德，代致意于衍圣君令昭，请将大圣之人之降生及升遐日期明白指示，俾同人遵守纪念，实为德便。至余之发起斯会，正如台下所云，世风不古，四维不张，故欲我华人不忘圣德，俾知忠信为不移之公理，子臣弟友，不易之常经，廉耻道德，为不磨之大节，庶登吾民，跻中国于大同，然后贯以新理，习以新学，乃可立完全之人格，亦庶足使孔圣之道义，目的在于实行，人人皆可遵守者，固非为文人学士之文章一途。区区愚诚，如是而已。谨并会章一册呈正，希为指教一切，是所感戴。至《文庙祀位指南》一书，台下未审有无存置，请寄一本前来，俾酌刊印，以资研究，幸甚。书此敬请勋安。

在《祖国文明报》（稍后易名《孔圣会旬报》）上，孔圣会成员以各种形式阐扬宣传孔教，我们这里摘录两篇“粤讴”（文人雅士用广东方言拟写的民歌），一篇是《孔圣诞》：“孔圣诞，问吓汝知无？记得旧年贺诞个日，万众欢呼，旗帜灯笼赶呈切造，乐于签助，不误码青蚨。孔教不兴，人心不固，所以提倡纪念会，那怕独立无徒，纵使有人反对，我地亦要诚心做。用地过一般迷信，只愿住宝烛香炉，圣像高悬，佾生歌舞，一翻高庆，并祝中国前途，世界几甘文明，人君须要进步。唉，花艳吐，孔教昌明路，但得大家齐心助力，便好似《论语》开篇所讲，不亦乐乎？”一篇是《倡孔教》：“孔教两字，大众要提倡，切莫迟疑观望当作寻常，呢阵大陆沉悲板荡，中原危岌救区无方。只有提倡孔教使人专向，等巨各明公理国自能强，所以吾侪奋起把先声创，集合同魂结社肩当。学报两门期遍广，育婴养老复设院和堂，逐渐举行非系白讲。吾侪不逮尚望大众相匡，国民责任愿你各位毋轻放，慷慨捐输各解义囊。”

对于刘铸伯等创办孔圣会，佛教界人士表示欢迎，比如太虚法师就在《整理僧伽制

度论》一文中谈到："尝论儒宗，审其名实，当舍儒名而尊孔圣，盖儒名之涵义，或则过宽，或则过狭。语其过宽，则儒为学术士之称，九能百艺，众学群教，凡百学者，皆得称儒。虽僧中之学者，亦可谓儒，则无宗义可守。语其过狭，则周官保氏以六艺教民者之谓儒，揆之时制，仅师范生充教员者得称儒耳。而一以孔圣为师法，则有宗义可守，而又该罗三科。曷谓三科？教育、文史、政治是也。……以此三科，师法孔圣，建立为孔圣会，则全国中坚之人物，必尽属乎孔圣之徒。僧伽本以宗教自居方外，但宣扬其教义，坊进民德，辅益国治；与学孔者相成而不相妨，奚用奋心为嫉忌乎！"

在太虚法师看来，孔圣会的壮大发展，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他说："抑孔学昌明，则佛教必兴，征之前史，非无成例。其理譬泥多佛大，水涨船高也。故奉佛教者必希望孔学之昌，然修孔学者亦当相资于佛教也。布佛教之戒善，足以化人民辅刑政，其理固灿如者。抑就大儒居士论之，功业既立，名誉既修，退养林泉，游神禅悦，足以悬解忧虑，洒落尘累，娱老怡情，安心乐性，其为益亦非浅鲜也。"

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刘铸伯等学富中西、具有全球视野的香港绅商创建孔圣会，他们竭尽全力，希望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并以之作为维系海内外华人认同和团结的纽带，共同争取香港华人应有权益和合理地位。与此同时，希望通过教育及其他不同方式，培育出适合近代社会实际需要的儒魂商才。

《孔圣会章程》明言："凡关于政治及别教之事，本会概不干预。"但是，刘铸伯创建孔圣会以及香港举办"孔圣诞"，一开始就引起了香港教会人士的恐慌。1909年，香港传教士马林医生在上海《中西教会报》发表《祭孔子说》，对孔圣会举办"孔圣诞"大肆贬斥，认为神道设教以愚民，"借敬孔子之名粉饰之以为美观，盖欲使人之畏权位，自不得不使之敬鬼神，尤不得不使之首敬孔子"，"盖在高尚明理之士，其于各种神道，或有所未信；至于不敬孔子，则为士人之所不齿，名教之所不容矣，何敢然哉？然则以敬鬼神之道敬孔子者，正所以保其神道，亦正所以保其权位，不过借孔子以为之盾耳。若我耶稣教会，自得政教之释放，即有生人之自由，故一切所行，皆尊救主之训言，不取仪文之末节，如设医院以治人之身，立学塾以治人之心，开讲堂以治人灵性，皆救主之所曾行者也。焉有圣人，而受人之谄媚者乎"？

1910年7月，刘铸伯之妻潘氏病逝于香港，7月24日（农历六月十八日）以传统方式出殡，灵柩暂厝东华医院义庄，择日安葬平湖故里。但是，上海《中西教会报》发表了麦聘臣《孔圣会监督丧妻之闹热》一文："近来港中之孔圣会刘君铸伯，议会事则位居主席，操会政则权属总理，行礼拜则推为主祭，为皇仁书院之高足，为屈臣洋行之买办，为香港之局绅，为书社之值事，资财甚富，交游甚广，谓非为孔圣会之头目不可得也。乃不料六月十八日，刘君之夫人潘氏出殡，所陈列之倚仗于街衢，如彩亭金牌，连旗引采等物，五光十色，不知者疑为出游会景，及见孝服，方知出丧。而最特色者，硬架灯笼四对，大书特书，一曰'福胜庵'，二曰'海僮禅林'，三曰'六祖道院'，四曰'孔圣会'。其宅内则法鼓灵璈，喃喃不已，送丧者僧道尼念经之外，有孔圣会同人，有育才书社教员学生，观礼者中有中西男女，挤拥于途。刘宅本在港半山之西，以

上海《中西教会报》发表麦聘臣《圣会监督丧妻之闹热》

上海《中西教会报》发表麦聘臣《论尊孔之界线》

人众之故，因取道自西至东之山畔马路，至雪厂直落至海旁上之大马路，自东至西，而往大口环，其行几运遍香港，务使观者无向隅之憾。"

该文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文末这样写道："其讥刘君者则曰：不守孔教宗旨，迷信神权，非圣人之徒也，焉得为会督？其护刘君者则曰：刘乃和平之人，何妨三教共和？如纯守孔道，则尼姑、和尚、道士及纸扎店，从何觅食乎？此亦假丧事而为施主之道也。吾则曰：孔圣会首领，名则尊孔，实则污孔，同人中不闻有规正者，诚非刘君之直友。盖刘君固深于英文，而浅于孔道，未尝不欲有人指正者，其不肯指正不敢指正者，过在会中之同人，是直谗谄面谀之所为而已。呜呼，孔子在天有灵，能勿喟然叹曰：若辈以我为傀儡，吾道其衰矣乎！"

同年，麦聘臣又在上海《中西教会报》发表《论尊孔之界线》一文，认为："孔子之道人道也，孔子之圣人圣也，孔子死后如何，虽不可知，而律以耶稣之天道，则孔子固如古圣先知，一俟耶稣战胜死亡之权，启既逝之圣墓，其身多复起者（太二十七章五十二节），此固不容讳者也。虽然吾人不得以待救之圣，而蔑视之也，且不可不尊敬其为人，而发明其与耶稣相合之道，以为尊之之实也，纵有迎傩旗疾等事，耶教人不屑为者，亦不得以此短孔子，因时有不用也。然则吾人可不尊崇孔子，为上帝有意挺生之先圣耶，虽然尊之为义，有虚实之区别，其界线不可不审察也。"

麦聘臣认为，真正的尊孔，在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修德、讲学、依

仁、游艺之功，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理，“不可不身体力行，以期无负圣训，而怪力乱神，异端左道，尤宜切实攻辟”。他批评刘铸伯及其孔圣会“虚尊孔子”，理由是刘铸伯等“号召众人提倡捐款，以立尊孔之会，每逢孔子生日死日，插龙旌，设孔像，读颂祝之文，行叩头之礼，孔子灯笼，无分人家商户，燃烛辉煌，甚而娼寮酒馆，亦祝圣诞而笙歌达旦。拇战方浓之际，孰不云其尊孔之热度，达至极点乎？乃不谓尊孔之声浪未散，迷信之故智仍在，其仅捐一元，而贪得灯笼者，平日固未尝梦见孔子，无足论矣，而身为尊孔之领袖者，在他处吾不可知，而知港中所亲见者而论，虽俨然以会长自居，送殡依然用僧尼道士，苟非有孔子灯笼参列于丧仪之中，孰敢谓其为孔子会之人乎？噫，七十丧后，吾不知儒者何在矣？若夫今之所谓儒者，实混于释道术数，而成为儒不儒、释不释、道不道，安有所谓真儒者乎”？

麦聘臣大肆抨击孔圣会，还有一段夫子自道，那就是他看出了成立孔圣会的用意：“……然而其中之机械，耶教人不可不知也，彼之所谓尊孔者，乃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谓余不信，请试购阅港中《孔圣会报》，可知其旨矣，余甚欲汇录其报中关于耶教者，表而出之，特以各教会报篇幅无多，姑俟教会日报出现后，必有以表之，以告我同人。然细阅《画图报》（庚戌六月）《噫嘻排彗星之可笑》一题，及本报《尊攘论》（六月）则可知其大概矣，吾读邝君节爱之稿（本报七月），恐教中人不辨界线，而蹈港中教会之杨董何等，自与若辈表同情之后，而遂绝迹于会堂，且贻未信者之口实，以为有孔教不须有耶教之佐证，故不得已言之耳，非敢学安石执拗，与邝君意见背驰也。”也就是说，如果基督教华人信徒一旦对孔圣会“表同情”，“试问与若辈同尊孔子，于我教会有阻障乎？抑无阻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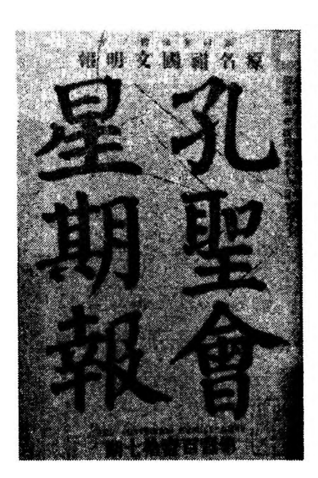
针对基督教人士的责难，孔圣会在自己的报刊上进行了一系列反击。

宣统二年（1910年），刘铸伯与同道建议《祖国文明报》《孔圣会旬报》合并，迁往广州河南新办《孔圣会星期报》。为此，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十三日，两广总督袁树勋为广东《孔圣会星期报》请准立案事致民政部咨文，原件如下：

头品顶戴·革职留任署理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粤海、太平两关事务袁为咨送事。据广东巡警道刘永滇详称；窃据孔圣会报编辑人兼发行人李不懈等呈称，窃敝报创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原名《祖国文明报》，月出两册，订装成书，系以宣扬孔子圣教，使人人知忠君爱国为宗旨。开办之初，原志在启发海外华侨，故报馆设于香江，而销流多在香港及南洋群岛暨金山、檀香山等各埠，内地销售者寥寥。自本年七月以来，迁入内地河南，改名《孔圣会旬报》，增订体例，月出三期，遂迩销行内地，日益增盛。窃念铸造国民德性，以提倡教育为要图，而教育之适宜尤以孔子为纯正，况现在既迁入内地，须在中国邮政局认为新闻纸类，俾寄费轻廉乃能畅销，而邮局认可，又须先蒙承认注册，乃生效力，是以叩恳宪台批准立案，以后敝报遵照报律办理，并求按照报律第四条豁免担保费用，实为德便，等情。当经高前署道批该商在省城河南开设《孔圣会旬报》，呈请立案，并免缴保

押费，等情。检阅所呈报纸，载有各国、各省、本省要闻三项，涉及政治时事，核与报律第四条免缴保押费之例不符，碍难照准。如欲免缴保押费，应将前项要闻删去，并赴本公所领取报告表式，填报核办等词批揭示在案。兹复据该编辑人兼发行人李不懈等呈称，遵批改正续呈立案，并将各国、各省、本省要闻三项之涉及政治时事者概从拣出，不敢有违，乞批准立案，并援照报律第四条免缴保押费，并将《孔圣会星期报》一册，呈报表一纸呈缴前来。职道查阅该报，尚与报律第四条专载学术免缴保押费之例相符，自应准予印刷行销，除批揭示并遵照报律第三十七条知照邮政司递送外，理合具文详请察核，转咨民政部立案等由，同报表到本署督部堂。据此，除详批回外，相应咨送。为此，合咨贵部，请烦察照立案施行，须至咨者，右咨民政部。计送报表一纸。

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民政部为《孔圣会星期报》准予立案事致两广总督袁树勋咨文称："为咨行事，呈报表一纸，请立案前来。准咨据广东巡警道刘永滇详报：李不懈等呈称创办《孔圣会星期报》，等因，并送该报馆查阅原咨，既据声称业经该道查阅该报尚与报律第四条相符，自应准其立案，仍由该道随时稽查，相应咨行贵督查照转饬可也。"





孔圣会星期报

由原《祖国文明报》和《孔圣会旬报》合并而成的《孔圣会星期报》，得以顺利出版，继续以宣传儒学经义和尊孔传统为办报宗旨，设有经术、历史、传记、政治、教育等栏目。《孔圣会星期报》出版发行后，重申办报宗旨：保宗教、挽颓风、醒国魂、开民智等。广东光复后停刊，共出版180期。其间，与反对孔圣会人士展开论辩。

《祖国文明报》《孔圣会旬报》《孔圣会星期报》创办期间的功绩之一，就是推动在广州与香港两地创办孔圣会义学，从娃娃抓起，弘扬儒家文化学说（见本章第三、四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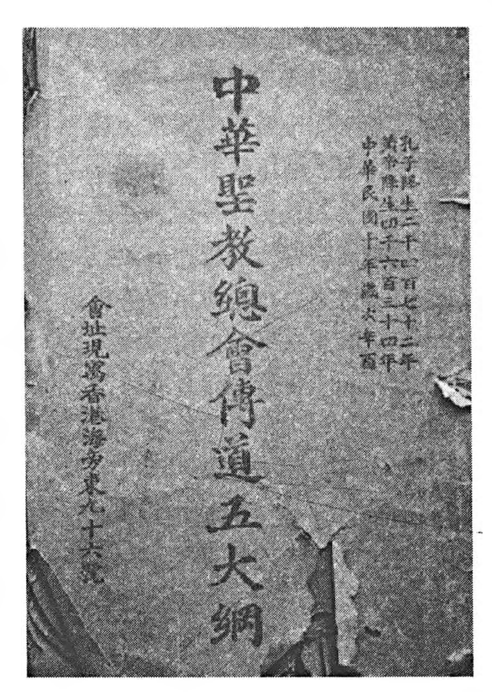
广州光复后，《孔圣会星期报》停刊，由刘铸伯担任永远名誉会长的香港中华圣教总会出版《乐天报》。中华圣教总会创办人为香港殷商冯其焯、梁树棠、莫达煊、何华堂、周雨亭、陈碧泉等。他们于1920年捐集数万，又得新加坡商会会长康研秋捐款，梁树棠捐铺一间，用这些租款筹办五间义学，社置讲堂及传习所。此后，又得到殷商郭春秧与刘铸伯的捐助。

中华圣教总会会址设于湾仔杜老志道九号至十一号，刘铸伯、郭春秧开初担任会

长，后来担任永远名誉会长。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孔圣会与中华圣教会，分别在太平戏院与湾仔大戏院祭圣。这一带有浓郁文娱色彩的祭圣活动，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孔诞祝圣言感》一文保留了香港孔圣会日在太平戏院日夜演大尧天班的广告：

> 祝大成之圣节，乐奏钧天，彰正教于人群，欢腾大地。我国数千年来，崇奉孔教，诚以圣道足以维持风化，挽救人心者也。本会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尧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游龙戏凤》。夜通宵先演《六国大封相》及《风流皇后》新剧。查《风流皇后》一剧，情节新奇，结构巧妙。惟此剧非演通宵，不能结局，故是晚经港政府给发数特别执照。演至通宵。……预日沽票处在荷李活道中华书院孔圣会办事所。
>
>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香港孔圣会谨启

此外，孔圣会与中华圣教总会联手，经常派讲员于来往船中宣讲孔子之道，又在新界作露天演讲，同时还在茗园举行讲座，“衢歌巷舞，全港胪欢”。中华圣教总出版发行《乐天报》的“例言”称：“（一）命名：本报同人以近世人多好立邪说，不顾天理，遂使大众陷于苦境而不自知，故命名《乐天》，冀天理复明，人皆出苦境而登乐地也；（二）宗旨：本报以孔教为中国一脉相传之国教，故提倡孔圣道德，务祈正人伦、维风化、扶持世道、挽救人心为目的，至于别人之宗教及国家之政治，概不干涉；（三）义务：本报编辑撰述皆当义务，凡有热心救世者来稿，无不欢迎，如合于本报宗旨及不犯报律者，自当敬刊，惟不送回笔金，原稿刊否，亦恕不奉还；（四）报费：本报为正人心而发，实非营业性质，初议不收报费，惟为持久起见，恐绵力有限，故众议收回纸张印费，每本五仙；（五）出版：本报每逢朔望出版，嗣有力时然后增进扩充。”



《中华圣教总会传道五大纲》书影（刘铸伯题写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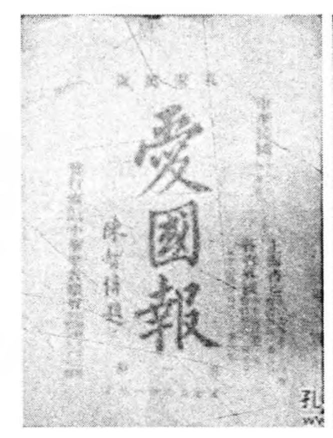
《乐天报》总发行所设在香港湾仔海旁东96号中华圣教总会，全年出版24册，办报经费由香港中华圣教总会成员捐助，捐款者芳名与捐款数目一一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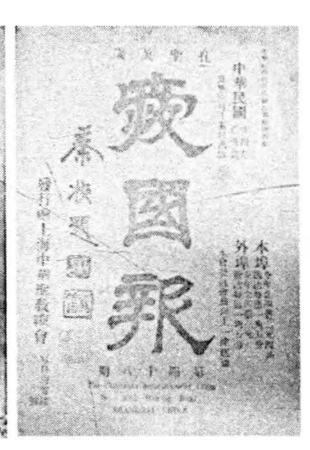
为了弘扬孔子之道，《乐天报》编辑主任（亦是中华圣教总会主任）李不懈编撰《中华圣教总会传道五大纲》一书，刘铸伯题为之写书名。该书由孔圣会、香港中华圣

教总会同仁捐资，印刷派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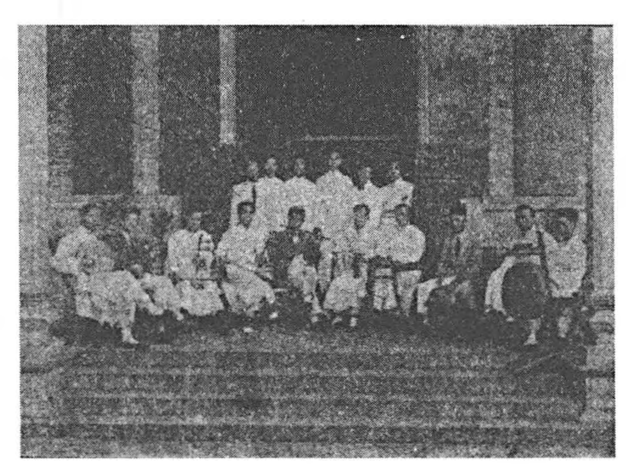
1922年2月1日出版的第21期《乐天报》上，还刊登了中华圣教总会名誉会长刘铸伯、郭春秧，正会长冯其焯，副会长何华堂联名推介该书的启示《看看看！中华圣教总会之传道书现已出世》：“启者：本会主任李君不懈所撰之传道书，现已出世，颜其名曰《中华圣教总会传道五大纲》，同人等以是书于孔圣之伦理发挥，颇觉尽致，故捐资印送，互相传播，庶几圣道昌明，邪说止息，人心日复归于正，则不独本会同人之厚幸也，世之君子，不嫌鄙陋，有欲赐观是书者乎？请函本会当即呈览。”

此外，香港中华圣教总会与上海中华圣教总会还联手创办了一份《爱国报》。该报封面同样有“孔圣万岁”字样。文娱与体育，虽是中国古已有之，但真正被赋予国民素质培育的意义，却是清末西风东渐之后的事。英国的殖民统治，一方面很早就为香港带来了西方的体育观念，使人们懂得身心健康发展对个人乃至社会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亦产生了以种族为标志的运动竞争，从而使到项目的胜败，远远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甚至成为牵动社会的头等大事。但是，孔圣会当仁不让，李不懈在《孔圣会星期报》刊文《孔教之注重体育》：“日昔今通之教育者何？曰德育、智育、体育者。德育者，增其德也；智育者，开其智也；体育者，强其体也。”他对于新学家批评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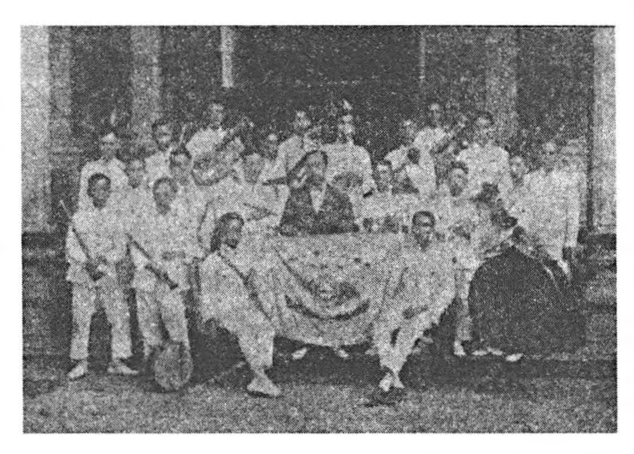

愛國報


愛國報

《爱国报》



孔圣会成立俱乐部中乐部



孔圣会成立俱乐部西乐部





孔圣会乒乓球队与兄弟队举行友谊赛，孔圣会代表队均着“香港孔圣会”球衣

子重德行、政事与语文学，不重视体育，以至于“雄奇伟岸之支那国，所以垂而为奄奄一息之东方病夫”的说法大为不满，指出孔子不仅重视德育、智育，而且十分重视体育。

孔圣会不仅为此在报纸上打“笔墨官司”，为孔夫子辩诬，而且投身于体育运动。

1910年香港华人足球队改组，成立南华足球会，刘铸伯出任会长。刘铸伯之后，则由孔圣会另一核心人物杨碧池继任会长一职。该会宣言中指出：“本会提倡运动，欲以体育之要道，灌输于国民，故合足球、排球、绒球、篮球、垒球、田径赛及技击、游泳游戏等类，聚一炉而共冶之，技术之操练也，以互勘而益精，程度之增进也，以相摩而益尚……况我南华会提倡体育，素以强国健种，济弱扶倾为责任。苟能各尽一分子，则一人介绍一会友，则多一强健之国民。千百人各介绍一会友，则多千百强健之国民……推及全国，将征特南华体育会之幸，抑亦中华民国之幸也。” 由此可见，南华足球会与孔圣会实在渊源颇深，而孔圣会亦自非人们印象中的腐儒冬烘。

1910年，南华足球会往南京参加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此次活动于辛亥革命后被追认为首届全国运动会），夺足球冠军。自南京回港后，因会友太少，经费不足，南华足球会停办。1913年，前南华足球会队员被邀组成的中国足球队，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以1：2负于菲律宾。回港后，各会友分别加入琳琅幻境社和孔圣会，成立会属足球队。1914年，孔圣会与琳琅幻境社两支足球队加入香港乙组联赛，使有关赛事深受华人关注。1915年，孔圣会和琳琅幻境两支足球队，集合代表中国赴上海参加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夺得足球冠军。回港复合组为一会，名南华游乐会。

1913年，香港孔圣会成立俱乐部，“俱乐部之设，所以谋德智体育之发达，无教种

党界之区分”，足见此俱乐部是专为推动广大市民文娱体育活动而设。俱乐部“以杨碧池、黎晴轩为正副主席，始设中乐、国语、玻楼、足球、技击、阅书等部，规模粗具”，又有棋类等项。及后，陆续增设速记、游泳、游艺、乒乓等类。

除了教授相关技术，提供场地，孔圣会俱乐部还为各类体育运动组织比赛，甚至参加全市联赛。如乒乓球，孔圣会乒乓球队曾是本地联赛劲旅，多次获取冠军，与南华会、青年会、东方会等体会齐名，为市民注目。此后，孔圣会与热心象棋推动的穗港棋手，成立华南象棋会，设于孔圣会会址内，使会址自此成香港象棋比赛的核心场地。除此之外，孔圣会还会利用会址，举行技击表演、魔术表演、放映电影等活动，又或者组织郊游，以丰富市民文娱生活。

孔圣会在文娱体育方面的开拓和建设，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主要发展方向颇为相似。基督教青年会订立的《巴黎本旨》包括：本会之旨趣，“在联合同道青年，即凡愿按照圣经，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心信躬行为其门徒，更愿协力推广天国于青年之间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于1895年，并存在至今，其努力目标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不但注意个人的灵德，而且还看重体、智、群三方面的提练。《孔圣会章程》则提出：“振兴孔圣之德行道艺，以期正人心，立风化，建立庙堂，以纪念孔圣之功德。”明显带有分庭抗礼的意思。

鸦片战争后，来华各教派纷纷建立教堂，传播福音，而早在孔圣会创建伊始，刘铸伯便倡议及早建造孔圣会大会堂，他说：“建大会堂一座，可容万余人，后座安立孔圣像，两廊分立七十二贤。俟后可在大会堂恭祝，免年年商借地方，大费踌躇。除圣诞外，或逢初一、十五，在大会堂宣讲圣人道理，劝人为善。现香港未有一间完备中文学堂，倡建之后，附设义学，收育后生小子，前途之益，正属无涯。趁此机缘，倡建大会堂较胜于建庙多矣。”

刘铸伯并非倡议建立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孔庙，而是希望兴建涵括祭祀、传道、教育等在内的多功能大会堂。他的倡议得到一定的和议，并获孔圣会同人捐资助建，不过仍然经费不足，举步维艰。而在此过程中，关于建成以后之大会堂的功能也一直在修订中。1913年10月，孔圣会召开专门会议，叙议此事。刘铸伯对大会堂的性质和作用，做了更新和诠释：

> 窃查各国人居留地，类有一所以维持道德而联络感情如礼拜堂者，然我华侨旅是者以数十万计，而竟无有焉，宁非憾事？……难者曰：“为推尊孔教起见，盖建庙以祀，不尤愈于大会堂乎？”是又不然。原夫庙宇之设，所以安神灵，踵而行之，不特有类于迷信神权，且虑入教界。仆之主旨，在得一冠冕堂皇之地以宣传圣道，俾一般男女，于人伦日用之间，知所取法，不致为邪说所中而陷溺其心，所谓维持道德者……

按照刘铸伯的说法，孔圣会大会堂之设，除了让市民可在日用生活中知取圣道，也

可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以联络感情。他还呼吁港内商会、社团等，“有事时于焉叙会，既不费号召之烦，尤足以表舆论之真相，法至善也”。刘铸伯甚至提议，所有香港华人团体可干脆“悉数迁入，如守望之相助焉”，由此，大会堂亦可为海外华侨归国提供住宿服务，“外埠华侨，有乌倦知还者，恒苦于政俗不谙，有违例而罹罚者，有被骗而丧资者，谁非同胞，胡能忍置，设立宿舍焉，以安集之”。史家评说道，刘铸伯倡建孔圣会大会堂之举，“大有把孔圣会作为最大的公约数，打造一个跨越地缘、行业和信仰等各种纽带超级华人团体之势……显然亦是以作为香港最具代表资格的华人团体自命”。

1913年10月的叙会，孔圣会做出如下决议：“壹、设孔圣堂，凡讲道及教育事均附焉；弍、设各商会叙议所；三、设外埠华侨寄宿舍附设俱乐部。”为推动上述设想的实现，刘铸伯甚至表示，“仆请与诸君约，此次如募捐得五十万元，仆当自捐五万；如得百万元，则虽罄吾家所有，亦捐十万元，以表附骥之诚”。



位于香港铜锣湾加路连山道七十七号的孔圣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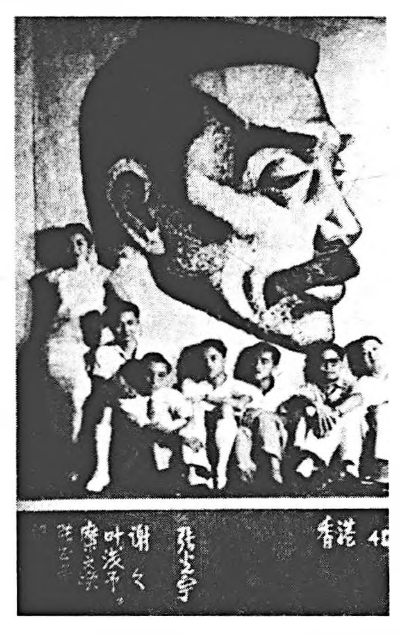
但是，在香港建设一座“孔教大会堂的”设想，当时实在是过于超前，脱离了香港的客观情况，所以一直迟迟未能实现，倒是末项设立俱乐部一议，于决议同年即能施行。

待到五四时期呼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刘铸伯及其创办的孔圣会以及香港的其他孔教团体，更是时运不济。刘铸伯一直未等到孔圣会大会堂奠基那一天，恰恰相反，奚落之词倒是滚滚而来。其中之一，就是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先生。

尽管刘铸伯生前未能看到“孔圣会大会堂”竣工，但是踵起者并不乏人。譬如，1935年简朗山在香港铜锣湾加路连山道七十七号捐建孔圣堂，尊崇孔子为万世师表，由杨永康任主席，其后有许让成（孔圣会成员）、张威麟、岑才生（育才书社毕业生）等担任主席，致力传统文化的推广，扩建孔圣堂中学和小学校舍，作育英才，成为一处宣传儒家精神、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固定场地。

鲁迅平生三次路过香港，停留时间并不长，但是感到这里弥漫着尊孔复古的氤氲。他在两次讲演中，都尖锐揭露了殖民者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僵死的文言文来禁锢人们思想以强化其统治的政治企图。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鲁迅指出：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

音都是过去的，大多数的人们不懂得，结果等于无声。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在以《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的讲演中，鲁迅特意提起蒙古人征服宋朝后，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现在听说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他们哪里是真正尊重中国的旧文化呢？不过是利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来统治我们这个民族。



1940年在孔圣堂举办的鲁迅六十诞辰大型纪念活动

抗战爆发后，国内大批文化界人士避居香港，宣传抗日救国，多次在孔圣堂举办大型新文学讲座及纪念活动。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1940年8月3日，香港文化界人士还在这里举办了鲁迅六十诞辰大型纪念活动，不知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天之灵是何种表情？

1948年，孔圣堂内还举办过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郭沫若在此进行演讲。可见孔圣堂内不独举办研读传统四书的研习班及讲座，也举办有关新文学的活动，达到传播新旧文化的目的。

第三节　创办孔圣会义学（上）

孔圣会同人认为，“国之兴替在于民，国之荣辱在于民，国之能巍然独立，确乎不拔，不为强国所摧灭也，亦均在于民，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民众尤其是儿童的教育则是固本安邦之要图。

刘铸伯从自身经历中，深感教育的重要性，毕其一生对办教育情有独钟。早在1901年3月8日，他就在《香港华字日报》刊出《倡建育才书社中西学义塾劝捐小引》：“中国古称声名文物之邦，多有目不识丁，身不率教者，何哉？学堂之设，未遍于国，贫贱之子，

无力从师。方今海禁大开，梯山航海，华洋杂处，中外通商，非尽吾民皆读中国之书以固其体，兼涉西国之学以广其用，何以人人能明道理、增见识、通语言、善交接，内以图一身之事业，外以彰一国之文明哉？则甚矣。中西学义塾之设，诚不容缓也。”

由英国犹太籍富商嘉道理捐资发起，香港华商群起相应，刘铸伯具体筹办的香港育才书社，很快就在香港、上海、广州创建了四所名为“育才书社”的中西学义塾，“以教中国贫贱子弟之无力从师者”，获得极大反响。四所名为“育才书社”的学馆具体经办事宜，均由刘铸伯负责。但他公务、商务繁忙，对上海、广州的两所学校的管理只能“遥领”而已。香港的两间一在西营盘，为一所中文学校；一在铜锣湾扫杆埔，为一所印童学校。由于校址较近，刘铸伯经常前去巡视办理情况。育才书社的成功办学经验，为他后来拓展孔圣会的义务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孔圣会的前身所创办的《祖国文明报》，本来就分别在香港和内地办有义校。孔圣会创立后，把办学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孔圣会章程》明文规定：“倡设讲堂学校，俾得广传圣道，及振兴教育。”这一构想得到了孔圣会同人的大力支持。

1908年冬，孔圣会同人刁振云、朱沃鎏倡议在大坑建一所孔圣义学，得到了刘铸伯与孔圣会的支助。


孔聖會主席劉君鑄伯答詞

孔圣会主席刘铸伯在大坑孔圣义学典礼上的答词，载1909年（宣统元年）4月出版的《祖国文明报》第77册

1909年5月9日（农历三月二十日），大坑孔圣义学落成，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开幕仪式，“是日同人及来宾到者约五百余人，校内悬圣像，焚檀香，悬花球，竖旗帜”，刘铸伯以孔圣会主席的身份致辞。他很幽默地说：“今日欣逢列位承邀弟到此学堂行开幕之盛典，曷胜感谢？！并蒙赠以高帽及银匙，为此盛典之纪念；现届暑天，高帽不合戴，而弟才德微薄，又不敢领受，银匙则受落为纪念，多多拜谢。”接下来讲到办教育、办公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窃谓凡有善举及教育关于公益等事，我同人力可逮者，宜竭己之能以协助之。人谓“众事莫理，众地莫企”，弟则谓“众事”有关于公益者不妨“理”，“众地”有合于公用者不妨“企”，但视乎公与私为定方针斯可矣。今日朱、刁二君暨文明报诸君，不惮艰辛，由各人先自担任倡设义学，然后广劝同人捐助建此学堂，欲使教育遍及于穷乡僻壤，及使贫家子弟咸受陶成，诚为一最大之善举，亦为现时

必要办之公益，况名此学堂为“孔教义学”，将必以孔圣伦理道德，教育一般之少年，可知诸君举办公益，善于择要，无任景仰。

查近年办学者，多以新学为根本，几视旧学为赘疣，不知旧学之中，自有诸多好处包涵，盖孔圣伦理之学，最足以引正后学之心思，若举而弃之，必将中国数千年来历传之伦常道德，尽行泯灭，斯时必破坏大局，有家不成家、国不成国之惨象者。现当新旧交代之际，趁人心尚可挽救之时，诸君以孔圣之伦理学问，栽培后进，欲使人皆知有伦常道德之为范，免后辈目无尊长，混乱纲常，诚为中国人造无量之幸福，鄙人尤当愿为颂者也。夫新学不过步武他人，其有用之学固多，第不合于华俗者亦不少，故愿办学者只可将新旧之学分别优劣，择彼所长，补我所短斯可矣，不宜将旧学尽行禁弛也。且他人设学，靡不兼尊教门道理，盖欲免人心浇漓，世风日下耳，今日诸君有见及此，设学而兼以孔圣之道为德育，可谓知所从事矣，鄙人何可一词以预贺乎?

现孔圣会时近成立，该会章程内有办学一条，而此学堂之倡设值理，亦是倡设孔圣人之同人，将来此学堂不无附入孔圣会之学堂内，今日在座诸君，以此学堂为孔圣会学堂之基础可也。弟爰进数言曰：堂门大启，劝学开来；茅茹连拔，棫朴成材；愿英流之辈出，守伦理而道该。是为颂。

刘铸伯致辞里提到的“众事莫理（读作lei），众地莫企（读作kei，站立的意思）”，是一句地道的平湖土话，因“理”“企”押韵，读起来很顺口。头一句很容易理解，就是公众的事不要去理，第二句“众地”就是人多聚集的地方，“众地莫企”就是不要在人多聚集的地方站立，意思是说这种地方龙蛇混杂，极容易发生群体事件或其他突发事件，还是远离它为好，以免给自己带来不测。整个意思就是叫人明哲保身，莫管闲事，莫招惹是非。

很显然，刘铸伯颇不认同这句老话，认为“众事”有关于公益者不妨“理”，“众地”有合于公用者不妨“企”，创办孔圣会义学，使得学校遍布穷乡僻壤，无数贫家子弟咸受陶成，是一件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同时，他也对清末提倡新学之后，人们视旧学为赘疣，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认为旧学之中自有诸多好处包涵，如果将中国数千年的伦常道德扫荡一空，“斯时必破坏大局，有家不成家、国不成国之惨象者”。所以，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要趁人心尚可挽救之时，讲授孔夫子的伦理学问，栽培后进，“使人皆知有伦常道德之为范，免后辈目无尊长，混乱纲常，诚为中国人造无量之幸福”。

大坑孔圣义学开幕仪式上，还宣读了羊城河南孔圣会义学、香山石岐孔圣会义学等学校的祝词。

孔圣会把办学部、传道部合二为一，为了陆续开办更多的义学，刘铸伯还借鉴自己办理育才书社的经验，在孔圣会成立伊始，就与同人拟定了一份《孔圣会办理学务章程》：

值理

一、由办事值理中选举十位，令专任其事，名为办学会分任值理。由值理中自择一位为主席。

二、该值理须每月叙会两次，商办各学堂事务。凡叙会，司理或副司理员，须在场记录文件。至以某日叙为合宜，由该值理从众自订。每次叙会，须有值理四名在场，方能开议。

三、凡值理决办之事，及聘用之人，当未举行之先，须由司事呈明会长，后由会长商允，方可举行。此章程内各款，均要按此办法，不得违误。

四、凡有办学事务，及文件等，概归该部责任。

五、凡值理叙会，如主席不到场，当自择一位为临时主席。

学章

六、本会所设之学堂，宜分两等，一小学，二中学，专教国文。

七（小学）每间学堂，限收学生四十名，以教员一名管理，工人一名打扫地方。如学童浮额，须详由值理另酌。（中学）每间学堂，限收学生由一百名至三百名止，以总教员一名管理，副教员两名至八名助之，及工人两名至四名打扫地方。

八、凡打扫学堂工人，概归总教员自行择用。每名工金，每月不得多过九元，膳费在内。


孔聖會辦理學務附章

孔圣会办理学务附章

九、无论小学中学，每名教员所教学生，不得多过五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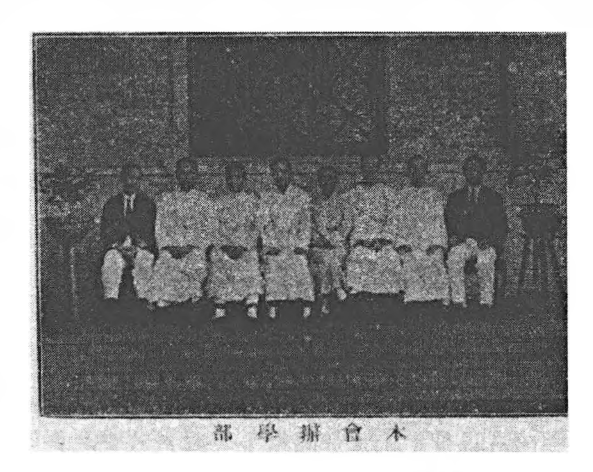
十、各学堂功课时表，须由教员会商值理妥订，彼此一律，须勿参差，方为合式。该功课时表妥订后，须录出二纸，以一纸挂在学堂内，以一纸存在本会办事处作底稿。

十一、各堂功课，首重孔圣道理，及普通历史。其余有用之学，如格致、卫生等学，须择其最合宜者教授，切勿乱订。

十二、各学堂须按学生程度，分班教授。

十三、每学堂须设上学策一本，及功课部一本，详细登记，每日某生到学，某生未到学，某生犯某事被责。

这份章程，对于孔圣会办学值理的选定、职能、权限进行了具体规定，学章部分规定，各堂功课首重孔圣道理，及普通历史，并不排斥新学如格致、卫生等学科，但要“择其最合宜者教授”。此外，选出办学部、传道部分任值理：杨碧池、李葆葵、黄屏荪、黄介眉、彭叔焕、伍宪子、陈露泉、关蕙晨、陈雨泉、陈楚卿、李乐余、陈昌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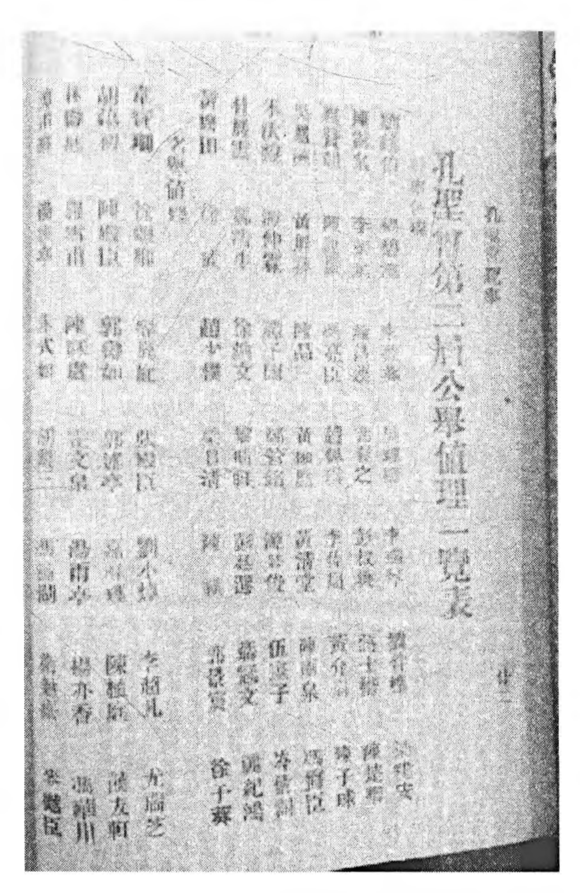


孔圣会办学部同人合影

刘铸伯在大坑孔圣义学落成典礼上宣布，将来俟条件成熟，这所学堂要附入孔圣会之学堂内。1909年12月25日，孔圣会假座育才书社叙会，“一宣布，由十月初一起接办《文明报》义学四所：一在羊城河南，一在香山石歧，一在对海九龙，一在本港大坑”。孔圣会办学历程，由是拉开序幕。

这次叙会之后，孔圣会马上派出原组织成员之一的杨碧池，率会众21人前赴广州，集议接办学校有关事宜。

杨碧池是孔圣会的中坚分子，在香港教育界颇有声名。据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记载：“香港湾仔官立学堂杨大先生碧池，幼精中学，渊乎其文，游学英美，屡冠侪群辈。迨律学毕业后，在澳洲充法律经历十余年，复兼臬司、翻译、通事等缺……其时洋烟流毒甚烈，而华人沉迷不悟。先生慨然首倡禁除。入禀当道，请为立例禁绝，政府允准。至今鸟丝仑（今译新西兰——引者注）岛毒烟轰散，复睹青天者，先生之力也。既而大英政府复聘先生为香港华英学堂监理，旋授本学堂校长，而先生复考获英京御立卫生学部及英国南


孔聖會第二屆公舉值理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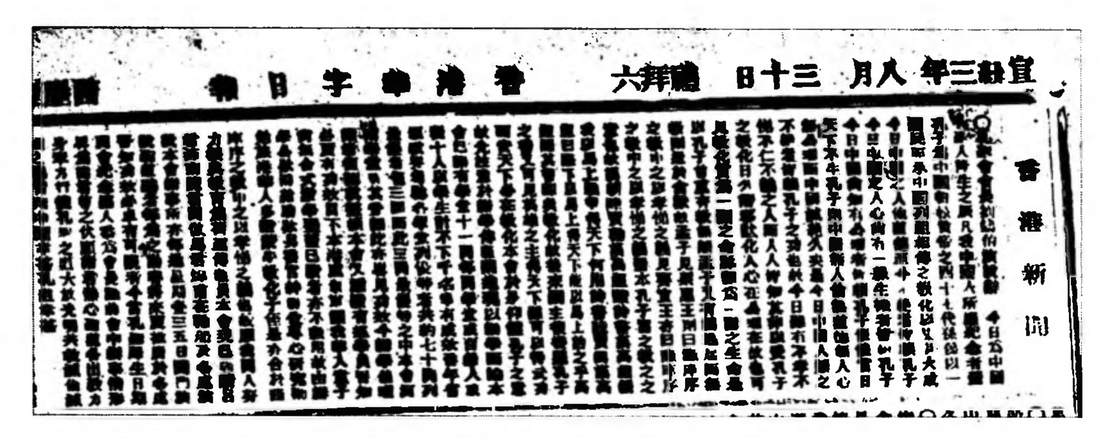
孔圣会第二届值理一览表

坚胜顿卫生学部一等执照，学贯中外，名盛一时……越六载庚戌（1910年），政府复升先生为皇仁书院诵译及汉文科监理……”

孔圣会办学注意将爱国主义（忠君爱国）与维护传统礼教道统结合，在文化上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在宣布接办义学的当天，该会同时宣布了其推广孔教的举措，“一宣布，由十一月初一日起，在德辅道中四十七号本会办事所附设传道练习所，现聘李君乐余主讲席，系当义务。现学员立约练习约二十人，每晚由七点半至九点钟止。凡本会同人均可入听”。（《孔圣会聚会议案》，载1910年1月1日《香港华字日报》）以训练传道员，日后在轮船及其他场合演说圣道。

宣统三年（1911年）夏历八月廿七日，香港孔圣会租借太平戏院场地举办孔圣诞辰纪念会，刘铸伯即席发表演讲，重申纪念孔子意义之何在。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1911年10月21日），《香港华字日报》“香港新闻”栏目头条刊登《孔圣会会长刘铸伯演说词》，略谓：

> 今日为中国孔圣人降生之辰，凡我中国人所应纪念者。盖孔子为中国轩辕黄帝之四十七代孙，系以一国民而承中国列祖相传之教化，以总其大成。今日中国之人伦道德至今不绝者，皆赖孔子；今日中国之人心尚有一线生机者，皆赖孔子。假使当日天下不生孔子，则中国无人伦，无道德，无人心，无公理，而中国灭绝久矣！是今日中国人类之不绝者，皆仰孔子之功也。故今日虽有不孝不弟、不仁不义之人，而人人皆知其非，以受孔子之教化日久，潜移默化，人心在，公理在，故也。可见教化实为一国之命脉，即为一国之生命，是以孔子首重“有教无类”，孟子又有谓“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故孟子见梁惠王则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见齐宣王亦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盖本孔子富之教之之意也。故汉朝陆贾劝汉高祖读诗书，汉高祖谓：我以马上战争得天下，何用诗书？陆贾谓汉高祖曰：陛下以马上得天下，能以马上治天下乎？汉高祖闻其言，即兴教化，故后来嗣主，复收罗孔子之书，又可见英雄之主得天下，虽可以恃武功，


宣統三年八月三十日 禮拜六 香港華字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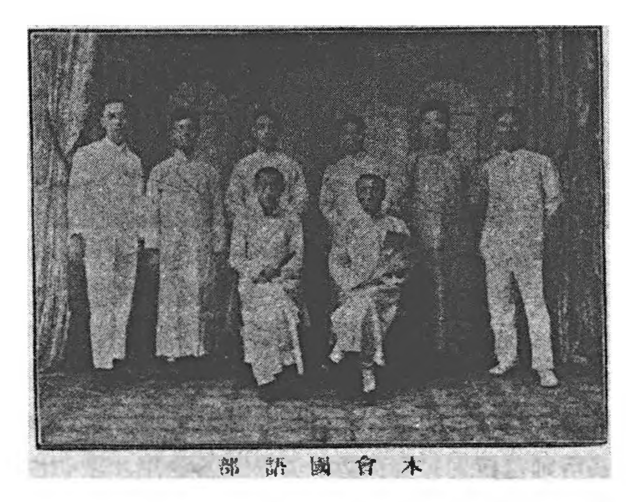
香港新聞

《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0月21日刊登《孔圣会会长刘铸伯演说词》

而安天下必在教化。本会于是仰体孔子之意，故先注意于办学、传道两途。

刘铸伯说："现以办学而喻，本会已办有学堂十一间，每间学堂或百余人，或数十人，以学生计不下千名，幸有成效。旧年省垣政界考验各学堂，列优等者共约七十间，列最优等者仅三间，而此三间最优等者之中，本会河南学堂居其一，即此亦略见功效。今办学值理诸君复认真整顿，本会又添设有巡学员，吾知必更有功效。目下本港卢制军闻我华人童子，尚无合式蒙学塾，盖已设者亦不敷用，故由办学公款拨给助款，另委官绅数位专心研究，劝勉旅港华人多设蒙学，教化子侄，是亦合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也，故愿我同人努力振兴教育为荷。"演说词里提到的"本港卢制军"，即时任香港第14任总督卢押，他在发起创办香港大学的同时，热心推动华人教育。（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香港孔圣会成立后，开办学堂与宣传儒道并重，并在位于德辅道中四十七号的孔圣会办事所开设了传道练习所，陆续训练了一批传道员。所以，刘铸伯在这次演讲中说："至（于）传道员，本会现已聘请吕君沛南、陈君同仿、马君炜甫，在轮船及各处演说。本会办事所，亦每逢星期一、三、五日，开门演说圣道，听者每为之动容，将来更推广于各处，吾知功效必卓有可观者。""伏愿诸君热心圣道，各出毅力，身奉力行，使孔圣之道，大放光明、共救灭伦灭理之恶习，则中国幸甚！孔道幸甚！"



孔圣会义学国语部教师

但是，刘铸伯并没有把办学与传道简单等同起来，孔圣会义学讲授的课程，亦非全然是旧式学塾内容，反而相当讲究实学。如孔圣会开办的"中西义务夜学堂"所授科目，除汉文部开设的文学、经学、历史、修身等，英文部则开设有文法、会话、译解、算术、地理、卫生、救伤等，体现了刘铸伯所提出的，"对于教育者……须注重实业教育，以移易其前此之做官思想"的教育理念。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宗教和教育往往难以分拆，这也许正是香港孔圣会所以积极从事教育事业的原因之一。不过孔圣会义学的教育目的，显然并非传统的士人培育，服务对象更只限于社会上的贫民子弟，希望在传统蒙学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对学员读写算的训练和传统道德的熏陶，为华人社会的发展供应人才。

孔圣会以其在本地首倡孔教的威望，办学强调道德教育与实学并重，客观上推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其中虽不无矛盾的地方，却正是刘铸伯等香港华商所具有的注重实际



广州孔教义学学童考试积分表

的理性精神的反映。

孔圣会创办的义学，短短几年间成绩斐然，佛教界人士大表赞赏，譬如太虚法师就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中指出：“更推论之，使中国不即灭亡而能岿然于大地，将来国体无论为君主为民主，其政体必采立宪可无疑。立宪则必教育普及，试拟四万万人平均之寿六十四岁，其受教育平均之学龄为八年，则四百兆八分之一，即有五千万是学生。以四十学生需一教师论，已有二百五十万人。但使国民道德教育，必采孔圣学为宗旨，教师必出于师范校，师范生必深明孔学，为教员必入孔圣会，则孔圣会已有此纯粹士君子教二百五十万人矣。然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今世诚为欺人语：其农学、工学、商学、军学、法学、医学等专科大学校，固应出乎孔学之外，此犹周官保氏，以六艺教，而九流学则在王官，出乎六艺外也。故孔学为国民道德之普通基本，而非国民才术之特殊技能也。此则各专科大学之教师，势必出之各专门家；然其总教师犹必出之高等师范校生，为孔圣会员深明圣学者。盖才术技能之知识，仍须范于孔学之道德也。而专科大学校之别教师，其可不究孔学不入孔圣会者，全国至多数万人耳。此执教育权为昌明孔学之第一步。其次则在执文史权：若国史馆、国学苑，及专务着书译文、营办印书馆、新闻馆、杂志社等文业，掌朝野之清议。其次则政体既立宪，无论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其选举势必有政党，其执政首领之负责任者，势必出于政党。孔学既以执国政为行道，则应以孔学而组织政党。法吏、军人不预政党，农、工、商、医虽在政党，势必以孔学之教育家、文史家，政治家、为中坚人物及魁渠首领，亦可无疑。然则必执政治权在孔圣之门也。其农、工、商、医、军、法等事业，诚与孔圣宗旨稍远，真学孔者必不事也。然但须有五百万人真学孔者，行此三事，以师法孔，全国重心势力、已尽在孔门，而无能动摇之矣。五百万人较之四万万人，虽仅八十分之一哉，而有此五百万真孔学徒，既较八十万僧伽六倍有余矣。设若违己所长，不此之务，嫥嫥以宗教之义争佛教，吾未见为得也。抑此五百万人，亦论其纯粹为孔学者耳。若就国民普通道德教育论之，固四万万人皆出于孔学者也。虽此八十万之僧伽，亦以孔学为基本者，特其增上戒定慧学，则必高出孔学上耳。”

第四节　创办孔圣会义学（下）

在刘铸伯的大力推动之下，孔圣会开办的义学发展很快，诚如刘铸伯所言，创办短短三年间，“已办有学堂十一间，每间学堂或百余人，或数十人，以学生计不下千名。幸有成效，旧年省垣考验各学堂列优等者共约七十间，列最优等者仅三间。而此三间最优等之中，本会河南学堂居其一”。

此外，刘铸伯有感于故里“平湖村居僻壤，风气固塞，学务不兴，地复瘠贫，人多失学，处此生活程度日高之时代，以智识不开之贫民，夫将何以自立？仆情关故里，言念之下，用是矜怜，爰解私囊，倡办小学堂一所”。这所孔圣会义学，就是纪劬劳学校的前身，办学目的正如他所说：教育贫民，俾资自立。

孔圣会义学虽然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但因经费问题，刘铸伯从一开始办学就不敢掉以轻心。对于会中有人提议，应将所有捐款，尽行举办善举的说法，他回应说：“为公益起见，多办善举自是初心，而尤须图其久远。在弟之意，对于善举，必须竭力，亦须量力，盖恐再而衰三而竭，无余勇可贾，必至有始无终。”

1910年，孔圣会会议上，刘铸伯又对力主扩充孔圣会义学的说法进行答复：“部分值理之意，极力主扩充，以为一经扩充，则捐款可骤增也。殊不知劝捐之难。若某书社，初办时固未可谓不扩充，而今日之捐款则又何如？……盖旧年年结，计会款虽有二万七千余元，然除却大会堂捐款约四千余元，置河南校舍四千元外，约存现银仅一万八千余元。现下办事所员役酬金，学堂员役酬金及学堂租项，只此三项每月需支五百元，什项尚不计在内。准此以观，岂不是仅敷两年支销。是则经费一节，若非力加撙节，断难持久也。”

刘铸伯这里谈到的“某书社”，即育才书社，1901年初办时，募集的经费较充足，后来募集资金就比较困难。他以此为例，建议孔圣会义学的开办要从长计议，不可一时兴起，遍地开花。

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刘铸伯多次在《孔圣会旬报》以及香港其他报刊刊登《孔圣会劝捐启》：

孔子之道，伟矣大矣，磅礴天地，尔绘六合，炳耀日星，语其用则过化存神。语其体则莫破莫载。人以为孔子必瑰异奇特，为斯世不可思议者，乃夷考其行，

要不过仁义忠孝，克尽人伦道德之常。世之好奇者，又以孔子只言人道而无甚高尚，不知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试问天下有不仁不义，而可以立于世者乎？爱国之谓忠，尊亲之谓孝，试问天下有不忠不教，而可以立于世者乎？故孔子隆生于兹二千四百六十年。其间一统者，曰秦曰汉，曰晋曰隋，曰唐曰宋，曰元曰明。偏安者，曰蜀汉，曰东晋，曰宋，曰齐，曰梁，曰陈，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曰南宋，凡中国君民上下，从未有能离乎孔子之道者，虽自秦始皇首灭王道，倡帝政，肆威福，主专制，有孔氏书，虑有反抗，焚其书，坑其儒，而不数十年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公理究不可没，人道终不可弃敌。后之君主，尊孔子，究未能实行其道以法孔子，故议有庶民不得祀孔子之说。不知孔子者中国天下人人之孔子，非君相士夫少数人之孔子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是可知普天下男女老幼，牧盐贩夫，皆孔子所兴也，宁独君相士夫为然哉？且孔子时列国之君多不道，孔子乃自卫反鲁，作《春秋》以正王化，洙泗施教，以道传之天下之民。是孔子固为万世 民而发，其所注意者尤在国民也。



香山（今中山市）孔教义学捐款鸣谢文告

方今朝廷议速行立宪，其殆实行孔子之道，而注重于国民欤？呜呼！天下有易代，无易民，果能培植其民，则民为有道之民，而国为永存之国，又何忧为犹太、为波澜（兰）乎？同人等用是创设此会，欲使人人皆明人道，守公理，以享隆盛之幸福，故无论上中下社会士示工商男女老少，凡热心于孔教者，均可入会，此固礼孔圣大公无我之心，亦所以进国民于文明之基础也。

惟是，本会既以建孔之力不可，伏愿诸君阐扬圣道，各尽厥心，为本会植不拔之基，即为祖国种无穷之福。魏刺氏（欧西人）尚知尊孔，冲在主人；东氏（日本人）力劝崇儒。矧为华族，是宜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众志可以成城，为山何忧一篑，将见宫墙共筑，是之衣冠，道义同肩，妇孺亦孔门之甲胄，圣听之汪洋，大同之教化，将复见于今矣。立宪之资格，富强之基址，皆造端于此矣。（按今人皆知富强为急务，然使无道德以养其心，无公理以范其志，则人皆以利己为富，凌人为强，交征利矣，东关嗜杀，而同种自相残矣，无道德，无公理，国果能富？国果能强？故教育崇圣道，实为富强之基址）仁人君子，其亦有志于斯乎？

《孔圣会旬报》《孔圣会星期报》每期公布捐款人名单，并免费赠送报刊。至于孔圣会义学办理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也在报纸上一一开列，譬如下面这期杂志登载“羊城河南孔教义学上学期考试五级功课续录”，其中，五年级学童梁业基在《学生之高尚人格论》中写道：“学堂为育才之本，学生为强国之源。故国家之强弱，视乎学堂之多寡以为衡；国家发达之迟速，亦视乎学生人格高尚与否以为断。大哉学生人格之高尚，哀哉学生人格之卑下者。推其原因，由于教育不善，于道德伦常之道不守，且徒习西人教育之皮毛，而不求实学，自以为高尚之人格也，于是于西人之新理想即无所得，而欲与我国固有隆盛之旧道德而唾弃之，倡离奇怪诞之说，先自欺欺人，于是一般之腐败青年，奉为新教育，新道德，此风一长，其祸之烈，有甚于洪水猛兽。其甚者藉学生之名以傲父母，骄兄长，残同胞，辱乡民，此即学生人格之卑下也。而高尚者则不然，日斤斤注重于人伦道德，一举一动，不出公理人伦之范围，此即学生人格之高尚。故国人见学生之高尚人格者，咸以上等待之，其卑下人格者，亦咸以下等待之，为荣为辱。视乎学生自取而已。”

这位五年级学童，还把中西教育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在西人教育之文明，要不出孔教之真义，善法之，遵守之，而于纲常名教，略无缺陷，故外国富强之因，实在学生人格高尚有以致之也。而我国虽大，反瞠乎其后，无他，教育少而学生之卑下者多也。呜呼！植强国之基础者在学生，享太平之幸福者亦赖学生，故学生于国家大有关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这番见识，无论观点如何幼稚，却也实在难得可贵。

辛亥革命后广州光复，刘铸伯创办的孔圣会、孔圣会义学以及慈善事业受到冲击。广州民军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致函刘铸伯等，要求把孔圣会存款与学校等产业全部交付政府，遭到刘铸伯的拒绝。据李不懈《因纪念圣诞而追忆刘君铸伯》一文记载：

民国初起，有人倡议将所有财产尽拨入民军也，此唱彼和，风起云涌，同人畏其激烈，不敢与争，怕事者且有少数从而附和之。惟刘君坚持不肯，仆亦同意，杨君及三数同志亦不愿，盖此公款，乃提倡孔教者，不敢移易也。

未几，仆接有函（署名则统称民国某人）言：汝若仍把持会款，不出与刘某提议拨借，则须自缴五百元，



孔圣会义学沿门劝捐值理出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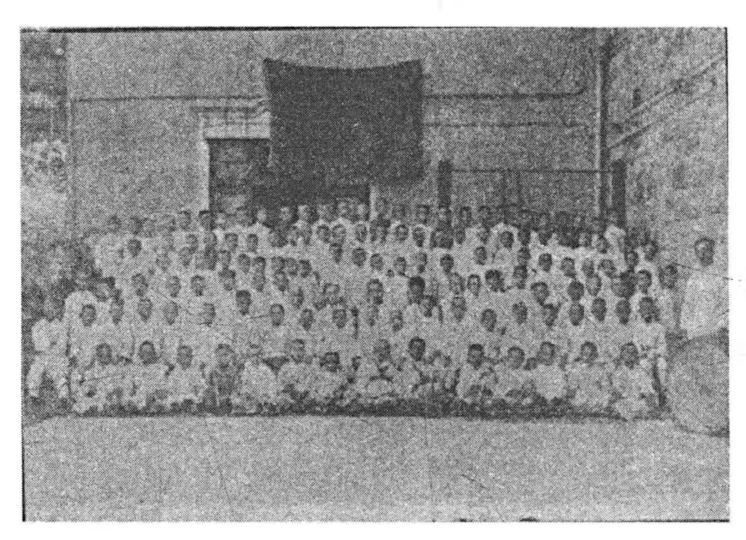
方免汝罪云云。谅刘君亦必接有此等函件。然仆虽不为惧，究无拳无勇，无力坚持也，其能有力坚持者，惟刘君一人耳。倘刘君当日立足不定，或畏势焰，则今日香港之孔圣会，已风流云散矣，尚能今日合群而纪念圣诞乎？

也许，就是因为刘铸伯、李不懈拒绝了广东方面的要求，设在广州龙溪首约的《孔圣会星期报》被迫停刊，广州的两家孔圣会义学后来也被官府停办。但是，香港属于“化外之地”，新政权遥望香江，鞭长莫及，也只能叹息而已。

民国肇始，兵连祸结，直接影响到香港。经费问题，一直是制约着孔圣会义务教育进一步开展的瓶颈，为此，孔圣会组织会中人士“沿门劝捐”。《圣诞特刊》第四期保存了一幅“沿门劝捐值理出发图”（见下）。

另一方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战争从欧洲逐渐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三十多个国家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英国是参战国之一，香港是英国占领的地区，很自然地就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且必须支持英国的战费。据元建邦编著的《香港史略》记载：香港立法局通过法例，在差饷项目中，另增加征收“特别战务差饷”7%，即每百元租值，再加收七元特别战务经费，用来支持英国战争费用。香港的华人在战争期间，约有十万人害怕战争波及香港，陆续离港返回中国内地乡下。由于战争的影响，香港的转口贸易不仅停滞，而且大幅下降，进出口船只吨位数从1914年的二千二百零六万九千八百七十九吨，到了1915和1916年降至一千九百万吨， 1918年再度降至一千三百万吨。

但是，善于经营的香港华人利用欧美各国因战争船只减少的空当，积极兴建商船，把造船业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很多船舶公司，过去一向依赖英国制造船只，战争影响了英国本土造船业，迫使这些船舶公司转向香港建造轮船。外商在香港投资造船业也大大增加。这一时期被称为香港造船业的“黄金时代”。



孔圣会高初两等全体师生合影（1921年）

随着战后香港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孔圣会义学办理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文献记载：“至丁巳年（1917年），刘公铸伯联合同志十余人，倡办学园。（孔圣会）办义学至十七间。第全部办学经费年需万金，诚恐后难为继，乃招揽同志百人，各认捐巨款，冀

以捐款存诸。登高一呼，如响斯应。”

此外，刘铸伯还借鉴了与嘉道理一起开办“育才书社”的经验，和孔圣会同仁创造了一套兴办义校的办法，就是：以学校冠名的方式吸引华商开办义学并寻求长期支持，“（孔圣会）所办义学，向系由一般富值理出名，款项费用，该值理与会各担任一半，而义学则以出资之值理之名名之”。刘铸伯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出资兴办了铸伯义学。此后，李葆葵、何泽生、冯平山等热心孔教及努力倡办义学的人士捐资支持，也创办了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孔圣会义学。

1917年，孔圣会义学已扩大到了21所。所有义学，均冠以捐资人的名字，以示提倡。例如：

铸伯义学（由刘铸伯捐资办理）
葆葵义学（由李葆葵捐资办理）
亦梅义学（由亦梅李捐资办理）
泽生义学（由何泽生捐资办理）
平山义学（由冯平山捐资办理）
冠廷义学（由卢冠廷捐资办理）
棣生义学（由何棣生捐资办理）
启明义学（由陈启明捐资办理）
秀之义学（由叶秀之捐资办理）
仁甫义学（由梁仁甫捐资办理）
瑞芝义学（由尤瑞芝捐资办理）
伟廷义学（由庞伟廷捐资办理）
雨亭义学（由周雨亭捐资办理）
育德义学（由育德捐资办理）
荫墀义学（由谢荫墀捐资办理）
丽泉义学（由谢丽泉捐资办理）
周东生夫人义学　（由周东生夫人捐资办理）
马氏义学（不详）
……

当然，也有一些义学继续冠以街区的名字，譬如：湾仔孔圣会女义学、高街孔圣会女义学、大坑义学、九龙义学、香山石岐孔圣会义学，等等。那么，刘铸伯在平湖出资创办的那所义学，究竟是命名“新安平湖孔圣会义学”，还是命名“铸伯义学”？待考。

此外，孔圣会还办有孔圣会高初两等小学，并与文武庙合办一所“孔圣会文武庙合办义学”。

对于出资兴学的孔圣会成员，孔圣会以各种形式予以表彰，下图是对孔圣会葆葵义学捐资办理人李葆葵的简介："李君葆葵，现任孔圣会正会长、正司库干事、办学两部正主席、俱乐部协理，十余年竭力会务，始终罔懈。中华民国晋给二等大绶嘉禾章，香港太平局绅，华商总会正会长，东华医院顾问，公立医局总理，又注意平民教育，尝与会合义学一所，在皇后大道西，嘉惠华侨，裁成有众，举凡社会善团，李君皆乐于服务，未尝告劳，同人等无以名之，爰赠数语云：睹君行事，汇多成绩，见义勇为，热心公益。"



李葆葵（1870年—？）

孔圣会在香港与内地办了几十所义学，成绩卓著，为人称誉，扩大办学规模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这与当时失学儿童的众多有关。社会上的失学儿童，亟待义务教育团体的救济和服务。

刘铸伯热衷于办学，先后发起成立育才书社、香港孔圣会两家民间慈善团体，办理了一系列义学，力图解决寒门子弟入学难问题。东华医院历任总理、主席在办学方面亦不落人后，但是依然无法解决香港儿童"入学难"问题。

庙宇是华人奉行民间信仰和习俗的重要场所，地位等同宗族供奉祖先的祠堂。位于上环荷李活道的文武庙，估计在1847至1862年间，由谭亚才、卢亚贵等华人领袖及富商倡建，是早期华人的活动中心。拜神祭祖、排难解纷、仲裁审判、推广教育以至接待清廷官员，均属文武庙的功能。东华医院于1870年成立后，文武庙以民间信仰联系华人的角色虽然不变，但它作为华人议事及仲裁的功能就被东华医院渐渐取代。1880年，东华接办文武庙让出的中华书院，并以文武庙的收入成立第一所义学，开平民教育之先河。1908年，政府颁布《文武庙条例》，东华医院正式接管文武庙及其尝产，庙宇收入用作资助东华的免费医疗服务及兴办教育。



位于上环荷李活道的文武庙群由文武庙、列圣宫和公所3座毗连的建筑物组成（相片约摄于20世纪50年代）

1919年，东华医院己未年主席何世光任内，报名入学者有1364名，而学额仅有243名，遂有1120多名清贫学生，额满见遗。因此，有多数学生执筹不中，无从就学者，痛哭流涕，由父母携同来院，哀求收容入学，至涕泪俱下。是以

当年总理又策动增设义学五间，计划由广福祠余款筹设二间，由洪圣庙余款筹设一间，文武庙余款又添设一间，油麻地亦添设一间，以期尽量收容失学儿童。同时，以文武庙后面空地，最合办学之用，议决将该地兴建义校。

在此期间，中华书院又引起一项业权问题。因为1919年建议兴建新校舍时，东华医院接孔圣会来函：要求将文武庙右邻中华书院后之余地，拨与该会兴建孔圣会会所、孔圣会义校及运动场之用。

东华接函后，即召开董事局会议。身为东华医院永远顾问的刘铸伯在会议席上发言，认为东华办理教育工作，经有数十年历史，且目前学位不足，而有余地空置，不加利用，实至可惜。倘文武庙有余款，自建校舍，固然甚善。否则，送与孔圣会发展教育工作，并将文武庙义学一并交托孔圣会办理，亦未尝不可。李亦梅亦谓孔圣会所设之义学，有专员巡视，办理甚为完善，堪以委托。

东华医院主席何世光，不希望东华医院历届总理苦心经营之义学，交托他人管理，力加反对。谓本院经理义学，亦设有专员，代表总理巡校考勤，如嫌不足，亦可增聘。空地增建校舍，可由本院自行筹建，何劳代庖？

董事局会议无结果。定于4月11日下午二时，在东华医院大堂召开街坊会议，再行商议。出席会议者有当年总理，历届总理。计为：当年主席何世光，首总理杜四端、招锡康，总理谢家宝、李承祷、林翰屏、李茂祺、梁树棠、姚秀昆、曾耀廷等外，并有刘铸伯、何泽生、李葆葵、李亦梅、周东生、张叔平、黄桂芬、郭桂芬、孔澄波、杜冕围、廖朗如、颜殿雄、汤锡铭、陈超辉、李荣光、袁荨芬、何世荣、李幼泉等。而到场列席者尚有五环坊众及各报记者。

董事局事前会在各大报章刊登广告，召集是日会议。各界人士，至为重视。首先宣布开会理由，略谓："文武庙所设义学，虽有十二间，仍属不敷所用，致清贫子弟失学者，人数众多，情殊可悯！拟将文武庙右旁直通后进之余地，增建学堂，究由文武庙自行建设办理，或送与孔圣会建设办理？又或由文武庙自行建设，连现有之本院义学一同交托孔圣舍办理？如何之处？请公定。"

坊众大会主席何世光继即起立发言称："本日请街坊各位会议，因孔圣会来函，欲得文武庙之余地，以为办学之用。查东华医院所办理之义学，原有十三间，计文武庙所设者十二间，油麻地天后庙一间，今年已定增多五间，由广福祠余款设二间，洪圣庙余款设一间，文武庙添设一间，油麻地天后庙添设一间，现在正物色地点。又因各总理未有时常巡馆，故自行捐资聘请视学员一名，再由弟处派一代表，日巡各校，以匡不逮。计是年来院挂号入学者，一千三百六十四名，而学额仅二百四十三个，其不得入学者有一千一百二十一名，甚至有多数学生，因执筹不中，而痛哭者；又有为父母携子来院，恳求收学而至泪下者，似此情形，殊属可悯。本院当年总理遂沥情恳求政府，多多义学，以免清贫子弟，有养而无教，他日长成，谋生困难；或至习染下流，为害社会。此事亦由定倒局（按：即今立法局）两绅刘君铸伯，及家父暨陈君启明，提倡于前，想政府当有处置也。兹查得文武庙后面有空地一段，该地最合建筑学校之用，如能办到，则

多收学生，不致有目前之缺憾。至于将来建筑之法，将文武庙右边起建，直至后街，其文武庙正座之后，不建上盖，用为学童运动场。如此办法，乃系化无用为有用，既不碍于文武庙参拜礼典，又得良好校地以教育贫童。本院当年总理，陋见如此，未审诸君之意如何？尚望赐教。”

东华医院永远顾问刘铸伯接着发言，谈到“处今时代，多办义学，寅为当务之急”，请与会人员就“应否以文武庙余地为办学之用”表决。刘铸伯发言原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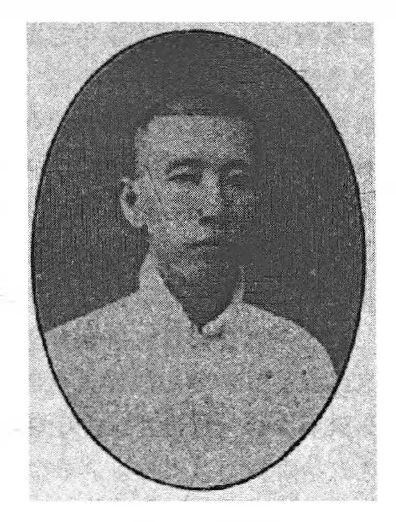
> 文武庙后面，应否建筑学堂问题，前次会议，已决定办法。佥谓办学为当务之急，查近年学费增加，读书大非容易。且贫者一家数口，自给为难，纵缩食短衣，恐无余力以供子弟学费。观历年文武庙挂号及孔圣会挂号求学者，每因额满见返，不下三四千之众，可见一斑。故处今时代，多办义学，寅为当务之急。
>
> 鄙见以为，各位应先行决定今日所议之第一问题：即应否以文武庙余地为办学之用？一经取决，方继续议第二、三提案（按：第二项提案为“该地建校，应由东华医院自建，抑或送与孔圣会建设？”第三项提案为“该校或由文武庙自行建设，连现有之本院义学一同交托孔圣舍办理？”），从容磋商为妙。至应否交与孔圣会担任办理一层，为最闲无关重要之点，弟乃孔圣会会长，深知肩责极重，且会员无不有自己之事业，孔圣会固系公众街坊之团体，而文武庙亦系公众街坊之物业，如文武庙欲得孔圣会之帮助，鄙人等当欣然为之帮忙，若全将各学务交与孔圣会办理，则孔圣会责任更重，孔圣会非有余资，所赖者同寅中之热心家捐助而已。且孔圣会现时所办之义学，不下廿余间，麻地方面，现又要从事增加，故我同人，只对于巡学一层，已防有鞭长莫及，奚能再担任别项义务，以加重其负担乎？
>
> 今年（东华医院）新任总理，办事如此认真，办学尤称毅力，其热心公益，不独本会同人欣喜，想各街坊亦为之鼓舞不置也，弟今日倡议，应以文武庙之余地，建置学校。

刘铸伯发言毕，何世光主席即以刘铸伯的建议，提付在座坊众及局内同人表决。由总理杜四端和议，全体赞成通过将文武庙地余地兴建新校舍。

此后会议争论的焦点，转入东华医院办理学务工作，是否移交与孔圣会代办之问题。主席何世光将第二项议程：“该地建校，应由东华医院自建，抑或送与孔圣会建设？”提付表决。刘铸伯建议：“应以医院自建为原则。”何世光和议，并称：“现时虽系民国，惟华人习俗，仍未尽泯，若予孔圣会办理，恐筹备工作，不如理想之顺利。”并由主席何世光建议：“陈启明、何世荣、周东生、李亦梅、袁尊芬、李荣光为教育分任值理。”但是，陈启明发言称：“弟见得孔圣会所办之义学，极有把握，大有蒸蒸日上之势，如交与孔圣会办理，必大有可观。因东华医院，年年瓜代，非年年有老学究为之主持，而孔圣会则有之，故倡议由孔圣会办理为合。”郭桂芬合议。

据《东华三院百年史》记载：“当时产生两种极端意见，当年总理在何世光主席领

导之下，为维护护东华主权，据理力争，无论如何，亦坚持东华教育工作，不容中途而废。其争持之力，情见乎词。盖东华医院创办文武庙义学，已达三十九年，作育英才，成效可睹，何能以一二人之私见，即置历届前贤艰苦创下之神圣职责于不愿，今日东华三院教育事业能发扬光大，若非前贤热心维护，恐无此可观成就也。东华医院永远顾问李葆葵先生，在此次街坊会议中，始终支持当年总理之立场，认为东华善业，必须合力担当，不应拱手让人，因而在陈启明发言之后，即起立致词谓：'孔圣会建校已有廿余间，沿门劝捐经费，困难已极，而视学员亦只由李亦梅、李幼泉巡视各校，一日两遍，其劳苦可知，若再加多十余间，奚能担任！'孔圣会创自1909年，李永远顾问葆葵，且为创办人之一，并曾充任会长，其致诚虽然简单，但执正不偏，德高望重，对与会坊众有极大之影响。由是表决结果，东华总理获得护校胜列。而教育工作，维持至今而不堕，且能光大发扬，微李公葆葵一言九鼎之功不及此。”



孔圣会义学视学员俞述尧（1922年）

刘铸伯关于文武庙地余地兴建新校舍的提议，获得全体赞成通过，很是满意，就像他先前说的，“至应否交与孔圣会担任办理一层，为最闲无关重要之点”。东华医院当年总理在何世光主席领导下，为维护东华主权，据理力争，无论如何，亦坚持东华教育工作，不容中途而废。刘铸伯表示：“待建筑学堂落成后，如东华要人帮忙，吾等方可为之。”他还倡议将第三款提案（该校或由文武庙自行建设，连现有之本院义学一同交托孔圣舍办理？）及陈启明之议取消。当年总理谢家宝和议，全体与会坊众，一至鼓掌赞成通遇。

刘铸伯最后建议：“未散会之先，弟有一言敬告，望各位总理，赶速去办，以明年能开学为佳。”首总理杜四端和议，通过即进行建筑。一场轩然大波，遂告平息。

从刘铸伯、何世光等人在会议上的发言，可概见当时香港儿童失学众多，慈善团体多办义学，收容贫家儿童入学，实乃当务之急。东华医院和孔圣会对于办理义学，鼎力支持，值得后人敬佩仿效。

到了1921年底，香港孔圣会“现在有孔教义学三十处，崇拜孔圣，诵读‘四书’‘五经’”，以至于香港政府每年拨万金，为读经学校之费，委托孔圣会办理。不仅如此，香港的私塾也没有像内地一样，受到新教育体制的冲击，依旧持续着老路，“盖港中华侨教育子女无不以注重读经为第一义，其私塾之注重读经者如新会卢湘父、南海叶茗孙诸君学塾，皆异常发达，乃至全港学塾几无一不读经者”。

受香港孔圣会的影响，澳门也于1913年创建孔教学校，至1921年，澳门孔教支会“所办会务以孔教学校为最著，举全埠华侨子弟皆收入于孔教学校之中，分为两等小学

以教授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澳门孔教学校“校舍建筑，校内布置，教授成绩，卓著于时”。

孔圣会办理的义学，遍布香港、广州、香山（今中山市）、新安（今深圳市），工作认真，成绩卓著，极为街坊所称誉，这当然与他们有完善的组织有关。譬如，孔圣会设有专人经常巡视义学，以协助推进学务，1919年香港视学员由李亦梅、李幼泉两位担任，每人月薪及车马费32元，一日两遍巡视各校，对于学务督导方面相当严密。1922年，孔圣会聘请俞述尧担任视学员。

为了弘扬儒道，扩大办学影响，孔圣会还多次发起面对孔圣会义学与社会各界的征文活动。1922年出版的《圣诞特刊》第四期刊登了部分孔圣会义学学生的作文，且把学生姓名、作文题目、校名开列如下：

卢普济　吴三桂论　孔圣会高初两等小学校第六年级生
陈广维　游名园记　孔圣会高初两等小学校第四年级生
岑渠馨　说煤　孔圣会平山义学三年级生
李文康　说兵　亦梅义学三年级生
李沛成　尊孔论　亦梅学校四年级生
徐瑞珠　留侯论　湾仔孔圣会女义学三年级生
梁阿兰　管叔以殷叛论　高街孔圣会女义学第三年级生
郭励能　说学　棣生义学五年级生
邝　耀　劝友圣诞宜恭祝书　伟廷义学学生
罗　迪　爱国论　孔圣会铸伯义学生
梁念聪　烛之武退秦师论　秀之义学三年级生
李炳元　善战者服上刑论　孔圣会文武庙合办义学五年级生
秦夔佳　商秧论　初两等小学校第五年级生
谭春淋　于忠肃论　高初两等小学校第六年级生
胡　唐　阅报可广见闻论　平山义学三年级生
余镜清　爱国说　亦梅义学四年级生
廖秀英　孔道古今适宜说　湾仔孔圣会女义学三年级生
陈瑞祥　汉高祖论　仁甫义学四年级生
罗佩兰　淡庄饰以为女范说　高街孔圣会女义学第三年级生
高　容　勤学论　大坑义学三年级生
伍炳暖　说蠹　棣生义学三年级生
梁善计　举贤才论　启明义学四年级生
梁金题　外债足以祸国论　葆葵义学学生
张灿锦　生财有大道论　孔圣会文武庙合办义学五年级生
罗玉来　观钓鱼记　九龙孔圣会义学三年级

1922年刘铸伯溘然仙逝，孔圣会同人无比哀痛。同年，假借太平戏院举办照常孔圣诞。《纪念圣诞》专号刊发李不懈《因纪念圣诞而追忆刘君铸伯》一文，缕述刘铸伯创会、办学之劳苦：

事有隔世而相感者，匹夫慕义，往往思前代而激昂，此太史公所以思晏子而愿为之执鞭也；夫前代之哲人，尚令人纪念不置，况前代之圣人乎？况圣如孔子，为前代生民所未有者乎，间尝静思，我今日何以尚知仁义礼智者，谁使之？孔子也。我今日何以尚知伦常道德者，谁使之？孔子也。我今日处此乱世，邪说横行，而我尚知道义，不至为禽为兽为妖物为畜类者，谁使之？孔子也。孔子于我，实无异生我之父母也，既无异生我之父母矣，而儿犹不纪念之，非人也。此仆所以每年八月廿七，必纪念圣诞也，亦无异于十月初二、十二月十二，纪念我之父母也。虽然，孔子千百世以上之圣人也，千百世以上之圣人，吾拳拳纪念之，则与吾同时发起纪念孔子之故人，吾独能不追忆之乎？斯何人？斯何人？则刘君铸伯也。

仆与刘君居近桑梓，日睹衣冠，臭挹芝兰，躬亲几席，迄今刘君虽往，而音容不宛在乎？溯仆于光绪丙午，与同志发起《祖国文明报》也，刘君一见，即赞成之，每期买数百卷，分赠育才书社各生，复令教员讲解之，仆一窭人子，文字陋劣，其时与刘君亦无半面之识，而刘君见许若者，得不谓之知己乎？及孔圣会成立，仆以赋性顽固，不晓圆通，毁谤者交至，而刘君始终不信，得不为之知己乎？而尤足追忆者，则民国初起，有人倡议将所有财产尽拨人民军也，此唱彼和，风起云涌，同人畏其激烈，不敢与争，怕事者且有少数从而附和之，惟刘君坚持不肯，仆亦同意（杨君及数同志亦不愿），盖此公款，乃提倡孔教者，不敢移易也。未几仆接有函（署名则统称民国某人）言，汝若仍把持会款，不出与刘某提议拨借，则须自缴五百元，方免汝罪云云。谅刘君亦必接有此等函件。然仆虽不为惧，究无拳无勇，无力坚持也，其能有力坚持者，惟刘君一人耳。尚刘君当日立足不定，或畏势焰，则今日香港孔圣人会，已风流云散矣，尚能今日合群而纪念圣诞乎？此仆所以因纪念圣诞而愈追忆刘君不置也。

刘铸伯去世后，李葆葵担任孔圣会主席，孔圣会成员办学热忱并未稍减。1925年，孔圣会增设下列七所，合高初两等小学，共计有三十五所：

右尔义学（由李右泉捐资办理）、殿臣义学（由陈殿臣捐资办理）、学庭义学（由唐学庭捐资办理）、耀东义学（由黄耀东捐资办理）、顺帆义学（由李顺帆捐资办理）、志昂义学（由邓志昂捐资办理）、民伟义学（由黎民伟捐资办理）。

1926年又增设下列五所：

学炯义学（由伍学炯捐资办理）、锡臣义学（由陈锡臣捐资办理）、滔公义学（由岑滔公捐资办理）、公民义学（不详）、雨农义学（由周雨农捐资办理）。

为提供义校毕业生对口升学的机会，1924年，孔圣会还在冯平山等的支持下，创办孔圣会中学。该校课程中英并重，教授现代科学，所聘师资都是两广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教学设备亦不错，办学成绩因而十分可观。1925年12月，港府应本地华人贤达要求，创办首间官立汉文中学；该校于翌年3月1日宣告成立。此前，港府已决定接受孔圣会中学合办建议，于是将孔圣会中学全部学生转入新办的汉文中学。1927年，香港大学中文系创办，汉文中学毕业生可直接报考。

孔圣会中学虽只存在两年便结束，实际上却是为香港的华人教育，初步拼凑出一幅完整的蓝图，意义重大。

当年孔圣会名下所办理的义学，不下四十所，其规模比东华医院义学还大，每年所需经费当自浩大，而其经费的来源，是单靠向各方面的劝捐得来。东华医院义学，有文武庙的经常收入以支持；而孔圣会则没有这么一笔固定资金。可见当时对这工作的维持不易，困难必多。后来，孔圣会之不能像东华医院一样，将这种规模庞大的社会教育事业继续保持下来，这自然与孔圣会义学发起人刘铸伯的英年早逝有关，同时每年筹措经费维持办学亦大不易。

随着时局的动荡与捐资办理人的去世，孔圣会义学陆续关门，但毕竟有几间得以保存下来。有位曾经就读于孔圣会义学名叫郭魂的老人，2005年在《良都侨刊》撰文《香港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

我是个八十四岁的老头了，出生于香港。日军占领东北时，当年我就读于油麻地西贡街的孔圣会小学。任教国文课的尹士谔老师，讲授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时，并以日军侵华为例，强调中国必胜，因为日军侵华，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处在反面。强调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同学们听得十分用心。

尹士钊老师教地理课，他自己制作了日军侵占东北的地图，还展出了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日军抢掠



1941年12月25日，日本占领香港

烧杀，强奸妇女，奸后刺死，曝死街头的等等照片。

他讲了东北的地理资源，人民风俗，还详细说了日军的种种野兽暴行。说呀说呀，他也抑制不住，泣不成声。我们全班同学，亦随之饮泣。后来，尹老师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誓死收复国土！"我们全体同学站起来，响应高呼口号！尹老师还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

两位老师对我的教育，至今不忘，奠定了我一生为人的方向。

直到垂暮之年，郭魂老人还记得孔圣会小学老师张贴在榕树头冷饮排档、童装大排档上了两副抗日的对联："烈日逼人，试问同胞思雪否；强邻犯境，敢教暴敌献头来。""何堪上国衣冠，沦于敌手；誓把恶邻盗匪，逐出家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剩下的几家孔圣会义学要么关门，要么被日军焚毁。日军侵港期间，位于铜锣湾大坑的书馆街十二号孔圣会义学遭到毁坏。1949年，时任大坑坊众福利会理事长的"中国足球球王"李惠堂发起重建，获胡文虎等人捐助，兴建现今所见的三层高房屋。外墙嵌有李惠堂手书的《重建题记》，室内可见《倡建大坑孔圣义学碑记》和《大坑坊众福利会重建孔圣义学碑记》。

但是，随着时势的推移，香港孔圣会大伤元气，再也无力一一恢复所办的几十所义学，只能与孔圣堂合办一所孔圣会小学。1974年12月，著名学者、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应孔圣堂中小学、孔圣会小学之邀，在毕业典礼上发表题为"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如何形成"演讲，其中谈到："直到今天，孔子仍是如日月之长明，为任何一时之阴霾所不能蔽。大家可由此以深信：学术思想与教育文化之力量，是必然超于任何现实政治之力量的，而沿孔子与历代儒家之思想之包涵性，开放性所形成之正见，是任何封闭于一家一曲之思想的偏见，所不能比对的。这即见人类学术思想之尊严所在，教育文化之尊严所在，亦是诸位孔圣堂的董事先生，诸位教师及诸位同学之尊严所在。希望大家加以珍重。"

当然，热心孔教或借用孔圣会这块牌子的，还大有人在。据我们所知，1984年，维多利亚教育机构在书馆街成立孔圣会维多利亚英文小学，后于1996年在太古城成立维多利亚英文小学（太古城）。1999年，孔圣会维多利亚英文小学迁往铜锣湾东院道，易名为维多利亚英文小学（铜锣湾）。2003年起，维多利亚英文小学试行国际文凭课程，翌年获得国际文凭初步认证，2005年正式成为国际文凭世界学校。同年，维多利亚英文小学高小迁往湾仔临时校舍，并开设中学部，提供国际文凭中学及预科课程。2006年及2007年，中学部分别通过中学课程及预科课程国际文凭认证，成为香港首间提供全部三个课程的国际文凭世界学校。2007年，小学部各个校舍合并，和中学部一同迁往深湾校舍。该校舍并于翌年5月举行开幕典礼暨开放日。

进入21世纪，为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

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2007年4月9日挂牌）。

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截至2009年11月，全球已建立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共计554所，分布在88个国家（地区）。孔子学院，即孔子学堂（Confucius Institute），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一般都是下设在国外的大学和研究院之类的教育机构里。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

孔子学院走向世界，中华文化流布海外，这当然是件大好事。它再次令人想起清朝末年，刘铸伯在香港发起成立“孔圣会”，尊孔子为教主，以“仁”为中心教义，以“四书”“五经”为教典，在香港这块孤悬海外的英国殖民地传播与发扬光大孔子文化理念。

孔教在今天虽仍被视为香港华人传统信仰之一，但是，其影响实际已逊于与其并称的佛道两教。主要的孔教团体，由二战前的六个，仅余目前的三个。而曾是香港本地每年重要庆典的孔圣诞（孔子诞日），今天已几乎从香港市民的生活中消失，以至令人难以想象，在20世初至中叶，“孔圣诞”在香港其所曾达到过的辉煌。

孔子学院正在走向世界，但是，香港孔圣会却面临解散的尴尬。2010年4月香港《太阳报》的一篇报道《孔圣会物业转交孔圣堂》，读来令人心里不是滋味：

> 【本报讯】创立于晚清宣统元年的孔圣会，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以倡办人兼前会长刘铸伯名义，持有铜锣湾大坑书馆街十二号孔圣会维多亚英文小学原址业权，但近年活跃会员愈来愈少，该会于去年向高院提出申请，要求将该处业权转给孔圣堂持有。法官原则上批准申请，但担心孔圣堂会变卖该地筹款，故限制孔圣堂只能把该地作教育用途。
>
> 刘铸伯为香港早期著名华商、“南华足球会”创会会长。孔圣会有意解散及将资产转给较具规模的香港孔圣堂有限公司（孔圣堂）。孔圣会原打算自行开会解散，但担心会籍问题可能有争议而无法顺利开会，故去年透过数名负责人兴讼时，额外要求法官直接下令解散该会。

刘铸伯是香港孔圣会创会会长，香港报纸报道解散孔圣会时多有提及他的创会劳积，《东方日报》2010年4月21日以《孔圣会校址限教育用途》为题报道称：

> 【本报讯】创立于晚清宣统元年的孔圣会，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以倡办人兼前会长刘铸伯名义，持有铜锣湾大坑书馆街孔圣会维多利亚英文小学原址业权，但近年活跃会员愈来愈少，该会于去年向高院提出申请，要求将该处业权转给孔圣堂持有。法官原则上批准申请，但担心孔圣堂会变卖该地筹款，故限制孔圣堂只能把该地作教育用途，并下令孔圣会七日内草拟一份命令交法庭审批。

刘铸伯为香港早期著名华商，曾任立法局议员、“南华足球会”创会会长，亦是香港中华总商会创办人。刘氏自上世纪初起，以孔圣会会长及前会长身份持有书馆街十二号业权至今，一直没有引起争议。不过，自六十年代起，愈来愈少人参与组织孔圣会。

孔圣会现时主要的两项资产包括书馆街十二号及约一百万元现金存款。孔圣会有见近年负责人只有寥寥数人，有意解散孔圣会及将资产转给较具规模的香港孔圣堂有限公司（孔圣堂）。

孔圣会原打算自行开会解散该会，但担心会籍问题可能有争议而无法顺利开会，故去年透过数名负责人兴讼时，额外要求法官直接下令解散该会。由于孔圣会属慈善组织，律政司也获邀出席聆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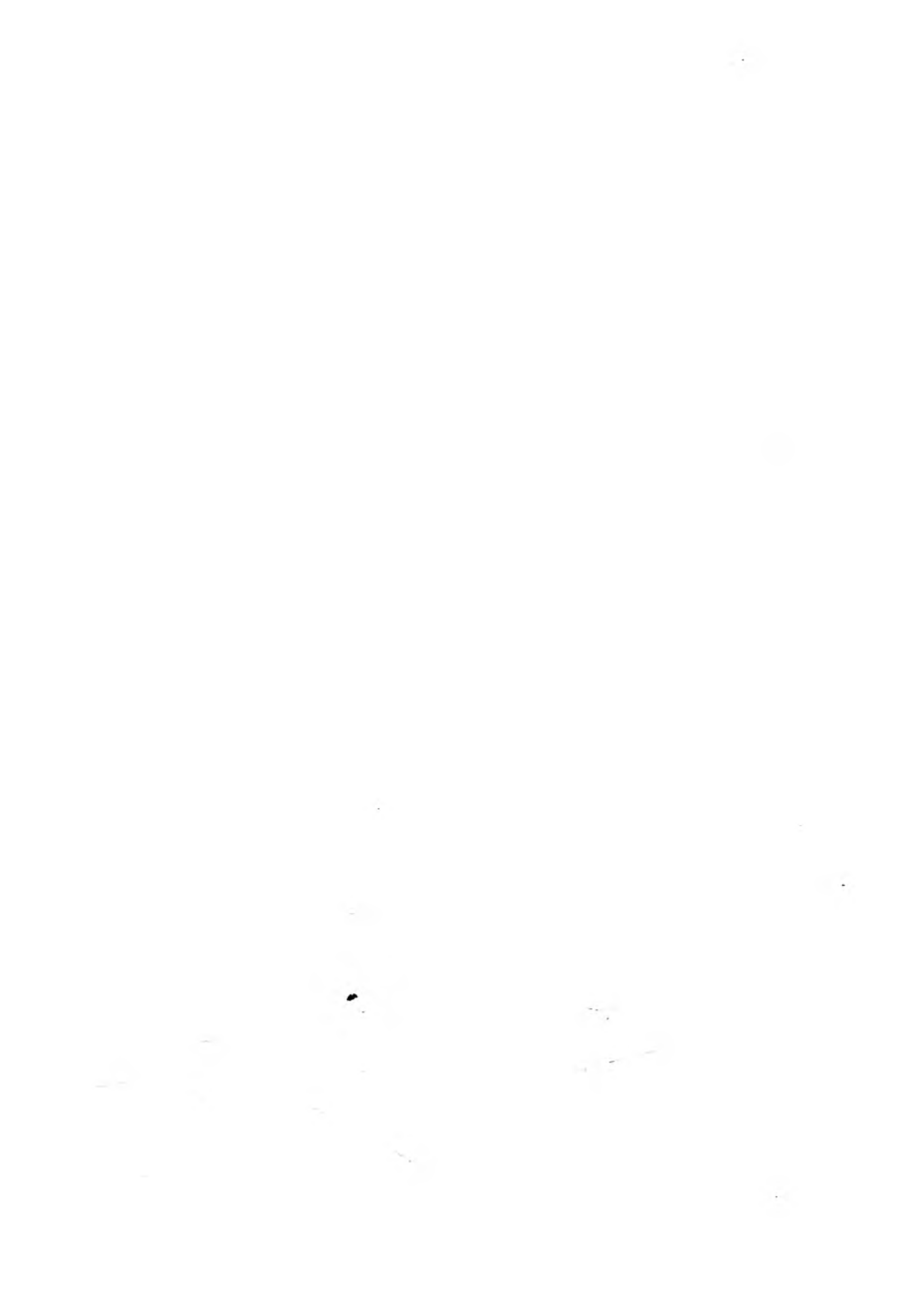
香港《新报》的消息《孔圣会资产获准有条件转移》则称：“由南华会创办人之一刘铸伯任会长，创会近百年的孔圣会的其中3名负责人入禀高院，申请将该会拥有的大坑书馆道物业及百多万现金，转到孔圣堂名下，并解散孔圣会。法官昨接纳转移资产申请，但希望该会先召集所有会员开会，才决定解散孔圣会一事。”

香港对位于铜锣湾大坑的书馆街十二号孔圣会义学旧址的处理是慎重的。据香港《大公报》2013年12月17日报道：“发展局昨日公布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大坑书馆街12号、薄扶林道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上水古洞何东夫人医局新纳入活化计划，今年初流标的司徒拔道景贤里亦再次招标。当局预料市区项目申请踊跃，大坑众坊福利会已表明有兴趣活化书馆街12号为大坑舞火龙博物馆。”

书馆街12号过去多年一直用作孔圣会义学学堂，原校舍在日占时期前曾遭严重破坏，现址是街坊在1949年合资重建，楼高三层，总楼面面积约338平方米，前身是“孔圣义学”，获评为三级历史建筑。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邀请非牟利机构递交活化建议。现活化后可用作康体文娱场所、教育或培训机构，或文化艺术设施。大坑众坊福利会总务主任陈德辉介绍说，他自己亦是早年的学生之一。大坑众坊福利会有意活化上址作大坑舞火龙博物馆，发扬传统舞火龙文化，有关建议初步获得旅游发展局支持，认为有助传承文化、推动旅游发展。



大坑书馆街12号前身是“孔圣会义学”，现获评为三级历史建筑



第五章　华商社团

1900年，香港华商公局成立，与西商争利（“商战”），刘铸伯是创始人之一，曾任华商公局主席，任内修该完善章程，保护华商华人利益。其间，参与香港大学劝捐，香港大学创立之后，刘铸伯一直担任香港大学校董会（Cour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董事、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委员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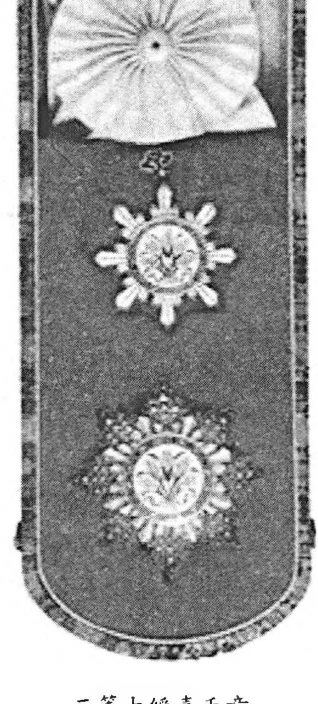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胜利后，刘铸伯曾经欢宴莅临香港的孙中山先生。据陈锡祺先生《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1912年）5月21日晚，赴刘铸伯等于华商公所之宴会；9 时至洞天酒楼赴香邑华侨之宴。连日先生接见友好多人，又与孖剌西报访员纵谈民生主义、铁路国有政策。”

1912年1月，刘铸伯发起成立“华人总商团”；次年组建“香港华商总会”，担任主席，发展会务，捐款赈济广东乙卯年（1915年）水灾等，不一而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作为协约参战，刘铸伯联合华商总会成员单位大有银号（他是该银号创办人之一），捐赠联军一架飞机。据刘富宗等撰《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联军战起，吾国参焉。先考援国民外交之义，协大有银号，赠联军以飞机一乘，己则赠以红十字摩托车一辆，而中英邦交益加亲睦，论者咸以为识大体云。”

1922年5月刘铸伯去世，继任者李葆葵在评价他时说：“刘君以华商公局为华侨领袖机关，非扩大之不足以提挈华侨、振兴商务，于是发大愿力，联合同人，改组华商公局而成华商总会，自是而后，刘君致力会务，到底不懈，主席十年，为有会事鞠躬尽瘁之概……以今日本会成绩之优美、名誉之隆大，下而至于局面之堂皇言之，弟意为非得到刘主席之提挈，未克臻此。”



四等嘉禾勋章



二等大绶嘉禾章





二等宝光嘉禾章

刘铸伯担任华商公局主席、华商总会主席期间获得的勋章、纪念章（部分）

第一节　创建华商公局（上）

中国数千年间主要是一个农耕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传统根深蒂固，逐渐内化成了国人的心理定式。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却始终伴随着引人注目的商业文明。尤其是明清以来，以商帮为核心的商业文明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风景，著名的有徽商、晋商、粤商等，这些商帮是中国商业文明史的典型代表，见证了中国商业文明的发展和变迁。

粤商是近代以来中国商业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1907年，广州出版了一册《小学适用广东乡土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人为岭南著名学者黄节。他在第35课《粤人经商之特长》中写道：

> 广州旧称富饶，蚝房破山，鱼花出峡，筒布越葛，橙柚蒲葵，龙眼荔枝，天然之物，素称优胜。且广人尤善经商，清之季年，省中商务尤畅，其营业内地者，市肆林立，货物云臻。近年所设之大公司，采办寰球货品，归而应市，五光十色，令人应接不暇。若侨居海外之豪商，尤为长袖善舞，往往以匹夫起家，不数年间，财雄百万，捆载而回，其发达之速，有令人惊叹者，此广人之特长也。惜工艺仍未振兴，触目皆舶来品耳。

这节课文，大致概括了广东人经商特点，他们不仅开拓国内市场，还远赴海外打拼，“采办寰球货品，归而应市”，这是当时的徽商、晋商等内地商人远所不及的。

1900年香港华商公局成立，刘铸伯是创始人之一，担任过香港华商公局主席。华商公局是香港唯一的华商总机构，为维护中国商人的权益、参与社会福利、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联系。经过交涉，该局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即得到了香港政府的承认。

民国成立后，香港各业纷纷成立商会。1912年1月，刘铸伯发起成立“华人总商团”。次年，刘铸伯提出将华商公局改为总商会性质的团体。1913年11月22日，由华商公局改组的香港华商总会成立，刘铸伯担任香港华商总会主席。

关于华商总会成立的目的，刘铸伯曾指出：即如章程内宗旨有云，凡生意事务，间有争执，求本会调处者，均可随时代为设法，持平解释。他还说：“凡政府定立则例，筹办公务，有关及华人者，则以舆情入告，献可替否，或以笔札陈明，或以谒见剖诉，

俾得为政府之助……本总会成立以来，凡内地长官，经过香港，均以为华人在港既设有总团体，其洞悉商场及社会情形之人必在其内，故其到港时不耻下问，特到本总会拜会。”

“香港华商总会”诞生不久，会员发展到千名，成为港地华商各大公司、行号及行业商会的总代表。至1952年，总商会实行会董制，改名“香港中华总商会”，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香港中国居民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华商总代表机构。



民国时期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个人会员银质、铜质证章

刘铸伯等在香港创建华商公局（华商总会），还与鸦片战争后华商逐渐崛起，要与西商争利（“商战”）大有关系。与刘铸伯一样同是买办出身的郑观应，曾经在《盛世危言》中阐述富强救国的梦想，认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了，不仅能致富，不仅军队有自造的新式装备，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的廉价商品相竞争。要达到真正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列强。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捂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所以，郑观应把自强的基点放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放在“商战”上，主张“商战重于兵战”，强调“有工以翼商”。

戊戌变法巨子欧榘甲也认为，当今处于商战的年代，呼吁设立商会与外商一争雌雄。他说：“一埠中人类不齐，业各有异，然必以商为首者，盖今商战之世界，商权为重，一切政治上，社会上，学术上，莫不须财，而财必出于商；商者，埠中之枢纽，商有团体，即一埠有团体，商会者，为一埠团体之骨干也。”

外间常把“香港总商会”与刘铸伯等人发起成立的“香港华商总会”混而为一，其实大谬不然。19世纪60年代初期，以英资为主的洋商主宰了香港商贸，华商在香港尚未成气候，但已出现崛起之势。有鉴于此，原本各自为战的洋商，感到有必要组织起来，为促进香港共同的商业利益而努力。

1861年5月29日，包括62家公司及银行在内的香港总商会创会会员，举行首次全体会议，订明宗旨是：“监察及捍卫商界权益；收集与商贸界有关的信息；在赋予的权限内竭尽所能、消除弊病、处理申诉、造福社群；与政府及其他有关人士沟通，制订守则，简化商贸程序，以利营商；接受投诉，仲裁纠纷，并记录有关裁决，以供日后参考。”

香港总商会成立后，成了香港会仍是英商活动的重要场所，连港督和驻港英军司令，都曾是其成员。最初，香港总商会会员都是洋商中的头面人物，故又称西商会。直到1881年，才有第一家获准入会的华资企业，即由早期香港华商首富李升创办的安泰保

险公司。但该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怡和、颠地、仁记、太古等英资大洋行手中，如1861年—1900年之间，每年选出一届主席，由怡和洋行大班当选的就多达14届。正因该商会地位特殊，自成立之日起，它就向港英政府陈述有关本地财政经济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并深受官方重视。

“香港华商总会”出现的时间，则要比“香港总商会”晚得多。1868年，南北行公所成立，这是香港第一个较具规模的华商团体，在旧式商人行会向近代商会过渡期间，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可它毕竟只是一个同业组织，未能代表全体香港华商利益，每逢港英政府出台对华人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时，华人始终缺乏一个表达自身意见的有力团体。

19世纪70年代，以宝隆金山庄行商古辉山为首的十多位在港华商，曾联名提出建立香港中华会馆，以“联乡谊而通商情”。那是香港华商第一次跨越行业界限联合的动议。

1880年2月，“香港第一代华人船王”香山籍买办郭甘章、英资有利银行（曾为香港三大发钞行之一）买办东莞人冯明珊、南北行行商南海人招雨田以及知名报人王韬等，一共24位华人名流，上书港英政府，要求拨款拨地，兴建华商会馆，既为华商集会场所，兼作中西商品陈列馆，使中外商人一同受益。同年9月，曾任英资和记洋行（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厂）买办的顺德人梁安、华商首富李升、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新会人伍廷芳，以及另一位有利银行买办香山人韦玉，一共780余位华人商绅名流，再次联名要求港府拨地建立华商会馆。

当时的港督轩尼诗，已意识到华人对香港经济发展日益重要，采取相对开明的政策，同意拨款4万元助建会馆，并批示拨地。但一年多后轩尼诗离任，代理港督马殊担心华商会馆一旦成立，将成为有能力与港府分庭抗礼的华人团体，于是借口馆址难定，将此事搁置。

曾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的中国近代报人王韬，1880年参与了为兴办华商会馆上书港督的活动。当时，他在自己一手创办的香港《循环日报》（近代第一份华人资本中文报纸）上发表《西人渐忌华商》一文，声称“然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溥（意为广大），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自外而自足……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七年之后（1887年），华商“卷土重来”。除李升、韦玉外，还有知名商人何亚美（曾与李升合办安泰保险公司）、大律师何启等加盟，趁英政府筹备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典礼之际，重提华商会馆一事。他们甚至成立了筹建华商会馆委员会，以何亚美为主席，何启为书记，还向港府提出筹建备忘录及章程共十九条，以“保护商利、搜集商情、排难解纷、增进公益”为主旨。但港府同意拨地的诺言又一次未能兑现，筹建工作再度搁浅。

直到1894年，香港爆发大规模瘟疫，港府颁布的许多应对措施，如禁止染病人士离港、发现病症即强制隔离、病死者不能自行收葬等，无不与华人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虽

有慈善机构东华医院出面反映华人诉求，却不为港府所重视，华商们再度深切感受到，筹组强有力的商会组织，已是刻不容缓之事。

香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华人商会，是1895年春，由华人殷商巨贾集资在般含道兴建的中华会馆（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该会主要由买办和金山庄商人发起，所定章程以香港总商会为蓝本，但会员限于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商号、商人，因此又带有同业公会的色彩，尚不能算是近代商会。因会馆偏离商业区，活动不便，成立不久会务便陷于停顿。

1899年，买办何东等为联络感情，促进商业，发起成立华商会所（The Chinese Club），以中华会馆馆舍为会址。1900年，买办冯华川、陈赓如、何泽生、何棣生、罗少铠、卢冠庭、刘铸伯等，以同胞在港经商日众，为利于团结，促进商务，理应恢复商会组织，乃号召捐资购置会所，响应者四百余人，购入德辅道中三十及三十二号楼宇两幢，组成"香港华商公局"（The Chinese Commercial Union），公推冯华川为首任主席，领导局务。中华会馆、华商会所两大团体相继成立，为香港华商在20世纪初年的大联合，最终铺平了道路。

华商公局成立的前两三年，是香港近代历史，尤其香港华人社会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期。1897年，香港立法局通过议案，废除自1842年开埠以来实施超过半个世纪的"宵禁"，至此，华人夜行才不受限制。这是香港华人争取自身权益的初步胜利，也是华人地位提高的一大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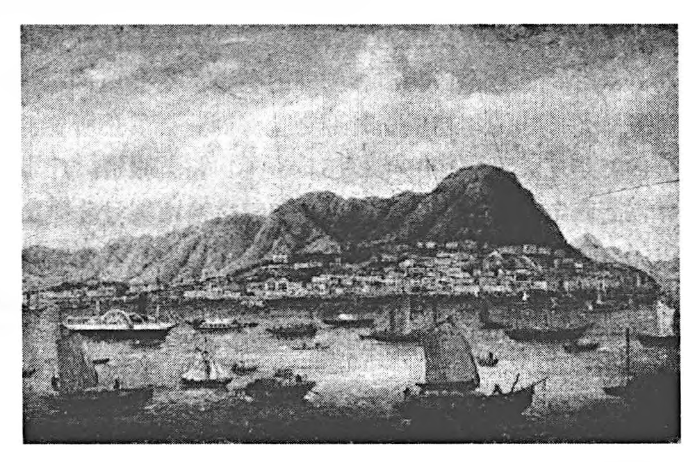
1898年，被不少历史学家定义为香港确立"远东贸易转口港"地位，跨入新发展时期的"元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1898年6月，英国政府强迫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西、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及附近200多个岛屿，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新界"地区，租期99年。面积约970平方公里、居民约10万人的新界纳入香港版图，对当年的中国而言，当然有丧权辱国之耻，但对香港而言，土地增加11倍、人口增加三分之一，无疑为这个新兴的商贸港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更丰富的人力资源，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贯通香港与广东的铁路动脉——广九铁路，在这一年动议兴建。1911年10月广九铁路全线贯通，大大便利了香港与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之间的客货运输，并接入陆续兴建的中国内地铁路网，香港作为内地与海外贸易转口港的地位，因此更加牢固。

随着转口贸易的发展，香港的金融业迅速崛起，外资及中国内地资本的银行，纷纷进驻香港，香港本地华商创办的银行也相继成立。在此前后，越来越多的香港华商崭露头角，财力日渐雄厚，成为可与洋商争一日之长短的重要经济力量，同时，他们也构成了香港第一个近代华人商会组织的中坚力量，试图以较为温和的方式，积聚力量，宣示主张。

1900年香港华商公局成立，刘铸伯是创始人之一，一度担任过港华商公局主席。华商公局是当时香港唯一的华商总机构，其宗旨是维护华商的权益、参与社会福利、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其中包括："看顾及保护华人商务并各项利益"，"凡有关切于华

人之事，皆广咨博采，且尽力帮商合例善法，以除弊端而兴众利”，“凡局内之人，心有未能齐者，则提倡而使之齐，力有未能合者，亦提倡而使之合”，“于各生意之行规，向来通用者，则为之酌夺罗列，使贸易场中明白晓畅，易于行事”，等等。



20世纪初的香港

这年3月9日，《香港华字日报》刊出一则告白：“本港同人倡建华商公局之举，经已商妥，即日开捐……祈踊跃乐捐，速成美举，是所厚望。”

牵头发布华商公局第一份筹款告白的三人，分别为总司理冯华川、司库陈赓虞及司理叶蔼山，冯氏抓全面工作，陈、叶二人分管财权和实务。在20世纪初的香港华商界，这三位都是颇有来头的人物。冯华川为香港首家华资银行——中华汇理银行的买办兼地产商，陈赓虞乃旅居夏威夷的香山籍著名侨商领袖陈芳之子，叶蔼山则是专做南洋贸易的南北行裕德盛号东主。

冯华川等人倡议成立华商公局的初衷，是鉴于居港华商“为数日多，岛中商业，亦以华侨所占为多，非藉团结力量，无由促进华侨之商业，不有完善机构，无由联络华侨之感情”。筹款告白刊出后，各业行商踊跃响应，最初一批认捐者四百余人，每人最少20元，不出一个月已筹得5万多元。他们用其中的44000元在港岛中心商业区购置一处物业，余下万元装修及购置家具。于是，近代香港华商的唯一总代表机构华商公局，即日后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前身，正式挂牌办公。

参与捐资的华商行号各派代表共襄局务，称为值理（相当于内地商会的会董），约有七十余人，他们集会公推冯华川为华商公局首任会长。刘铸伯为值理之一。

据留存下来的资料，香港华商公局首届值理的阵容，可谓相当强大。比如广东台山籍商人李煜堂在国内首创华资人寿保险，业务遍布国内及南洋各埠，人称“保险大王”，在近代史上留下的最重要篇章是举家加入同盟会，重金资助历次反清起义。李煜堂在港设立的金利源商号，为革命党秘密联络机关，一直到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革命党人海内外军需之出纳、军械之储存，都由金利源负责。他的女婿冯自由为孙中山挚友，是同盟会创会元老之一，据说，“三民主义”的简称即为冯自由首创。

另一重量级人物，是广东南海籍人士何启。他早年负笈英国，攻读医学及法律，回港后当上大律师，并创办一所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1892年，26岁的孙中山成为该书院第一届毕业生。他也曾与香港地产及建筑业先驱区德等富商联手，合组“启德公司”在九龙半岛进行填海工程，这才有了后来使用达大半个世纪之久的香港启德机场（1998年为

新机场取代）。何启又是香港首位获英国政府颁授爵士勋衔的华人。

从时间上看，1900年春创办的香港华商公局，比号称中国内地“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1902年初成立时称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还要早上两年。而广州总商会迟至1905年才面世。1905年1月3日，《申报》报道“广东总商会暂设城西广仁善堂内，连日各商商定简明章程十八条，其集款之法由各号公摊，计每股洋银十元。现各银行已允担任二千股矣”——与香港华商公局相比就更是相形见绌了。

香港华商公局既具近代新式商会功能，兼有联络海内外华商的特色，在清末各大商埠新兴商人社团中，可谓开风气之先。1904年12月5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粤省商会章程书后》一文谈到：“粤东绅商为振兴商务起见，倡立商会，始于省城而渐及于各都会，观其章程，不禁为我粤东祝。何祝乎尔？祝乎粤东风气大开，文明之进步，商业之发达，粤东人之名誉将为全国先也。吾言至此，吾敬绅商，吾爱志士，愿洒一腔之热血，为绅商鼓其雄心，吾愿决大海之洪流，为绅商助其浩气……”

早在1900年华商公局成立之初，即出资聘请外籍建筑师，专门处理香港岛维多利亚城（今湾仔及铜锣湾一带）华人住宅的改建事宜，并登报声明，凡是港府洁净局（卫生局及市政局前身）查明要求拆建或改造者，由建筑师实地勘察提出方案，“所有酬金系由本局支付，不费分文，我华人幸勿延迟观望，免犯宪例”。

就像百年之后内地很多大城市大张旗鼓的推进“城中村”改造一样，港英政府要求华人住宅改建，初衷是为了让他们有相对较好的生活环境，降低疾病传播概率，但也直接增加了贫苦居民的生活成本，使其难以在都市中立足。有见及此，1902年，华商公局将港府颁布的“房屋改建新法例”共百余款摘要译出，并指出其中若干内容对居港华人有所不便。公局还开会议决，聘请知名大律师何启（华商公局值理之一）等人，秉请香港政府“顺应舆情，变通条例”。

1901年春夏之际，困扰香港多时的疫症卷土重来，全港人心惶惶，缺医少药的下层华人更无力自保。刘铸伯则以洁净局议员、华商公局总理等多重身份据理力争，成立刚满一年的华商公局，特地延请颇有名气的西医关心焉，每日坐堂，凡华人患病前来应诊，分文不取。如查明不是疫症，由医生出具证明，若不幸染疫，亦由公局统一上报，设法救治，以安定民心。此时的华商公局，已被港英当局视为代表大多数华商的团体，在港华人商民，亦认可公局在商界的实际领导地位。对抗瘟疫，救死扶伤，只是其诸多善行之一。（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华商公局代表在港华人利益，向港英政府交涉成功的另外一个例子，是1902年前后反对额外征收水费之争。

香港的自来水供应始于1890年，房屋业主如愿支付安装水龙头的费用，即可将自来水引入室内使用，如不安装，则要在街上的水龙头（俗称街喉）担水入屋。当时没有水表计算水费，因此在征收差饷（土地及物业税）时加收百分之二作为水费。

1901年，香港大旱，出现水荒，有水务专家认为，定额收水费的方式，等于变相鼓励居民浪费食水，建议屋内安装水表，用水超过一定免费额后，按表收费。

本来，在人口日多导致供水压力渐大的香港，这位专家的意见颇具建设性和长远眼光。但香港华人社区住屋情况相当复杂，水费既已包含在差饷之内，额外加收必然会引起业主与住客之间谁应交水费的纠纷，而且同一楼层里通常要住几户人家，一旦有人欠交，业主和其他住户也受牵连，可能会被截断供水。

1902年6月，华商公局召集同人开会，商讨对策。他们拟定了“上访状”，派人征集全港绅商、行店、住户签名，向港督及英国政府殖民地部递交。同年11月，华商公局又建议当局敷设“旁喉”，即不装水表的华人房屋使用的一套辅助供水系统。

几经交涉，1903年3月，英政府殖民地部终于做出让步，指示港督批准华商公局提交的“旁喉”方案，扰攘经年的加水费事件，才算告一段落。“旁喉”工程自1904年开建，1906年完成，全长14公里，近7300栋房屋受惠，超过21万元的工程费用，由华人业主负担。一直到1932年港英政府为市民免费安装水表，这套特殊的供水系统，才告停用。

第二节　创建华商公局（下）

华商公局成立后，广泛联络感情、促进商务的同时，公局同人对20世纪初期国内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亦不曾袖手旁观，比如，积极参与上海商务总会牵头发起的对美国华工禁约的抵制美货运动。

19世纪后期，曾为修建第一条横跨北美大陆铁路（1869年通车），以及开发太平洋沿岸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数以十万计华工与旅美华侨，变成了美国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替罪羊，排华风潮愈演愈烈。1894年，在美方软硬兼施之下，清政府驻美公使不得不同意签订《中美会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即所谓《华工禁约》，条约10年为期，至1904年届满。

这一条约让旅美华人备受不公平待遇，激发其一连串抗争行动，而华工和



20世纪初美国报刊上丑化华人的漫画

侨商对改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出口贸易，又有重要作用，因此中方早就声明，一旦条约期满"立即停止，不再展期"，并要求与美方"和衷妥商，另立约章"。但美方拒绝做出实质性让步，修约谈判陷入僵局。

1905年5月初起，有关中美修约谈判的报道和评论，在康梁维新派创办的喉舌上海《时报》连篇累牍刊发，警告若新约签成，势必"辱国病商，损我甚巨"，"深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所以对付之"呼吁各界发起抵制。5月10日，众望所归的上海商务总会各帮会董，齐集靶子路（今虹口区武进路四川北路）会所，召开特别大会，商讨对美抵制办法。

会上，福建商帮领袖曾铸登台演说，力主以两月为限，若到期"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暂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他的发言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得到在座绅商热烈拥护。随即公议起草电报稿，分发清政府外务部、商部及南北洋通商大臣，要求坚拒签约，并拟通电全国21个重要商埠的商会，号召通力合作，共同抵制。一场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由此发端。

5月12日，寓沪粤商在广肇公所议抵制美禁华工事，据《申报》5月13日发表的《纪粤人在广肇公所议抵制美禁华工事》记载：

> 昨日（12日）午后一点钟，寓沪粤人会议抵制美禁华工苛例，计千余人，先由郑君报告集议缘由，继由凌君潜夫（君寓美十一年）将寓美时目击美人苛待华人实情，并言对待美人之法，以各公司等不用美人及华人不受在中国美人所雇，并绝用美国各货，所言极为痛切。次为方君守六（君安徽人茶磁公司付总办法、去年曾赴美赛会）将去年赴美时种种留难情形，并陈对付办法：（一）华官不发表美人入内地护照，（二）电美各报馆主持公论；（三）由沪上同人告美领事以华人对付此约实情，托转美政府。其演说者四人，其大意均主不用美货，并急电政府及梁使（驻美公使梁诚）、岑督（两广总督岑春煊）、香港中华医院、广东各善堂等，至四点钟而散，电文俟探明再录。

后人曾评价说，以上海《时报》呼吁及上海商务总会、广肇公所通电为标志，当时中国这两家最大的资本家工商团体倡导和发起的空前规模的反美爱国运动，意味着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上海商务总会、广肇公所"抵制美货通电"一出，不仅沪上商界、学界群起响应，北京、天津、广州、香港及各埠商民也纷纷声援。一时间，全国160多个城市的工商界人士及各界市民纷纷仿效，汉口、苏州、杭州、营口、长沙等重要商埠，声势尤盛，而赴美华工华侨最多的广东省，在抵制高潮期间，省城广州积存的美国面粉达2000万包，美孚洋行的煤油销售量比上年剧减142万箱。

从5月起，广东72 行商和九大善堂即连日集会，讨论抵制办法。7月份，各地掀起反美拒约运动，相继组织反美团体。7月3日，抵制美货总公所在广东召开成大会，到会数

万人。会议决定印发章程及美货图表，推举专员，分赴各行业商店盖章签押，拒绝销售美货。接着，南海、新宁、佛山、顺德、东莞、香山、石歧、江门、肇庆、潮州、汕头、韶关等地都成立了拒约分会。广州工人也相戒不买美货，不吸美烟。食品工人相约不用美国面粉，如店主不从则实行罢工，以示抵御运输美货。



驻美公使梁诚（1864—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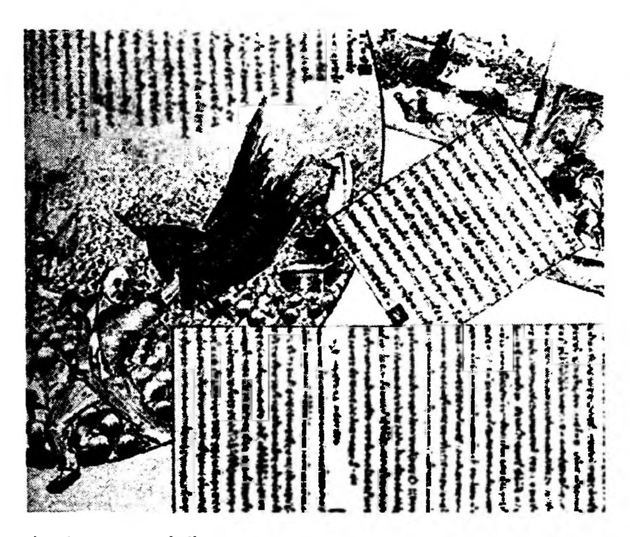
知识分子创作了《苦社会》《黄金世界》等作品，暴露旅美华侨所受的种种虐待。《有所谓报》《拒约报》等大量报道了各地拒约消息，刊文抨击清政府“惧外媚外的特性”，鼓动人民抵制美货，使“民权发达，专制堕落”。

《拒约报》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1905年8月21日）创刊。《拒约报》是广东爱国人士为揭露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暴行和推动抵制美货运动而创办的，是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有力的宣传武器。编辑所设在广州河南南武公学内，总发行所在城西高基进取学堂。总编辑黄晦闻，督印员胡子晋，社员有谢英伯、王君衍、黎起卓、陈树仁、何子陶、卢谔謍、欧拍鸣、卢蔚起、邓子彭、袁莹磋。其中谢英伯是嘉道理、刘铸伯创办的广州育才书社英语教师。

《拒约报》32开21页，每月3期，版心印“广州旬报”四字。内容包括社说、短评、要闻（刊登省内外各地抵制美货运动的消息）、专件（刊登反美运动公告、函件、章程等）、舆论一斑（转载中外各报所登对拒约运动的评论）、白话、歌谣、粤讴、侨民受虐汇记等。

反美运动当中，香港新闻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报纸，争先恐后，鼓动抵制美货，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待废除苛待华人法例。香港成为报纸媒体鼓动杯葛之中心。保皇会维新派人员（如徐勤），在港主办《商报》《时报》和《香江日报》。而同盟会革命党人如陈少白则主办《中国日报》和《广东日报》，郑贯公主编《有所谓》和《世界公益报》。甚至保守的报纸如《华字日报》也同情抵制美货，多方报道各地抵制美货新闻。

接到上海方面呼吁“抵制美货”的电文后，香港华商界立即响应，一些商界人士还致电上海总商会，表明抵制美货之决心。皇仁书院学生呼吁全港华人一致行动，共同抵制美货。5月16日，香港华商公局主席冯华川、司库（财务总监）陈赓虞等即召集各值理开会商讨。会上，不少人同意促请清廷暂缓续签不合理的新约，但冯华川认为，“至于不用美货，暗相抵制一节，惜与英例未尽相符，未便开议”。也就是说，他顾虑到美英之间的关系，担心抵制美货不能为港府所容忍。



拒约，不用美货

而在香港政府方面，一直严禁这场抵制运动在本港发酵，不准华商公会聚众讨论。另一方面，香港绅商对抵制一事意见分歧。因此，香港的反美抵制运动，只能在无整体组织之状态下，零散进行。但香港华人商民已率先行动起来。美资背景的香港花旗火柴公司中的华人，宣布7月1日起全厂停工，各华人米行经理亦集会宣誓，绝不购买美货。在没有整体组织的情况下，香港商界、报界与学界知识分子，鼓吹排拒美货。

8月12日，华商公局举行聚会，主旨是讨论抵制美货事宜，到会者三百余人，为公局成立五年来最为踊跃的一次。此事惊动港府，专门指令华民政务司去函劝阻，要求公局不可“非法集会”。冯华川见状，唯有宣布聚会推迟两天，且只限值理以上领导层参加。这当场引起一些会众不满，与主席针锋相对，诘问为何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均为英国领地，当地华人可抵制美货，香港反而连开会讨论都不行？

当两广总督为压制运动而逮捕了广州拒约会中最得力的办事人员马达臣、潘信明、夏仲文3人后，情势急转直下。港澳同胞为援救马达臣等做了大量工作，香港《有所谓报》发表郑贯公题《禀保马、潘、夏与拒约前途之关系》的短评，称“盖马等一日不释放，则拒约前途一日不可问”。《香港中外通商报》也抨击广东官府之腐败及一些华商之退缩。后马达臣等 3人愤然自杀以示抗议，香港、澳门各团体纷纷召开追悼会。11月15日，省港商界同人订立了“谋破美禁工例议案”，“欲为破禁例之症结，为政府订约之后盾，以收交通实益”。议案共15条，主要内容为要求美国政府撤除对一切有技术及商店上下伙记人移民的禁令，并与美国人一律相待；删除美国华人注册之例；华人出入美境不得无故留难；删去以勃铁伦验身尺验度华人身材之侮辱性法例；在美华人可自由来往等。然而对于这样内容并不激烈之条款，最终也未能实现，在清廷压力和港府干预的背景下，更由于对于自己切身利益的考虑，粤港商界终于妥协。

与此同时，香港华商乘抵制美货的机会，企望建造本土企业、推销国货，以抵制外国资本对华之经济控制。因此，拒用美货、提倡国货与挽回国家利权，三个运动同时进行，结合而为一，华商实业家认为谋求自身利益（美其名曰“发展民族资本”），是替国家挽回利权的最佳途径，于是纷纷创立“民族企业”。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朱昌兰烟草公司、挽利（挽回利权）烟厂、华洋织造公司、广生行（制造香水、面霜）等，均于1905年创立。商人营利心切，商业广告，诉诸爱国主义。譬如，双龙公司广告：“抵制

美约之上等花露水出现，好极好灵……本公司之双龙伴珠嚜花露水，系由华人陈氏发明，向中东采取材料自制，其芬芳处，与美货比例，有过之无不及。”

中国各大城市反美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一些在华的美国商人感到事态严重，担心自身在华利益受损，急忙致电本国政府，要求尽快解决修约纠纷。这次运动，最终以美国政府做出若干让步，如承认中国商人等非劳工华人赴美权利等，得以逐渐平息。香港华商与内地商会、商人互相呼应，可说初次体现了爱国爱港的新时代精神。

香港转口贸易中，拥有既得利益的华人绅商，在社会政治方面，形成一个保守势力。他们对社会动乱特别敏感，强调维持社会秩序。华商公局首任主席冯华川在此次运动中所持的保守态度，颇为华人商民乃至部分公局同人诟病，他本人也公开表示“报纸之嘲骂、揭帖之恐吓，加以巷议街谈”，无不与他为难，因而萌生去意，决定辞职。1905年9月19日，华商公局开会表决，接纳冯华川的辞职。同时，有146位绅商、店户联名推举公局最早发起人之一、南北行商人叶蔼山接任主席，陈赓虞为副主席。

也许是眼见在香港商界极富声望的冯华川，在群情汹涌之下，都难免背负骂名，叶蔼山不愿步其后尘，遂以“才力不逮，有负委任，且不谙西文，万不敢谬膺斯席”为由，辞不就任，只好由陈赓虞暂代主席一职。直到1906年7月，华商公局才又选出刘铸伯为第三任主席，陈赓虞、周少岐副之。与陈赓虞一样，刘铸伯、周少岐二人，都是华商公局创会核心成员之一，且先后担任过香港东华三院总理和主席，均为20世纪初期香港知名华人领袖。起初，刘铸伯亦以生意缠身、无暇他顾，以及公局缺乏经费、参会人数太少等原因，几次推辞，终于在各值理游说下，答应主持局务。

刘铸伯在任期间，大刀阔斧推动华商公局事务改革，修改完善原有章程。1906年8月10日，《香港华字日报》刊出《丙午年六月十五日同人额外聚会议定增改章程列左》。新章程规定：公局的职责，在于“设法保护华人商务并各项利益”，“凡有关切于华人之事，皆广咨博采，且尽力筹商合例善法，以除弊端”；翻译解释本港律法条例之要者，使局人明白；设法持平解释生意事务的争执。

其次，新章程规定：值理负责处理公局的事务和银项，公举正、副主席；值理人由公局同人若干充当，由金山、故衣、入口洋货、客栈、当押等二十八行商推举；值理每两年一任，期满可再举复任，如有缺出，其余值理可择人暂补，公局下期聚会时再定实；从值理中择立分任值理，由主席选举确定，以分办各事，被选举人不得推辞；值理等有权设立规条附章，经公局会议订允后，局内人一律遵守；值理可以随时筹款，以应经费之不敷；值理每月聚会及随时聚会，称为“平常聚会”，其余所有别项众会，称为“额外聚会”。

最后，会员资格，凡华商行店及华人在香港有商务生理或屋宇物业者，均可加入，入局规银为五元或以上，每年捐费二元或以上；凡在公局初创时已捐银五元或以上，则视为同人，无须再捐局银；如欲入局，须先有局内一人倡举，复有一人和举，由值理当堂投筹，以得筹多少而定去取。

这份新章程凸显值理的中心作用，对公局职能做了较之前明晰得多的规定，放宽了

会员资格及交纳局银数目，如规定华商行店，或华人在港有商务生意及楼房物业者，只要缴纳五元或以上“入局费”，每年再捐二元或以上会费，均可成为“同人”，大大扩充了公局在中下层商户中的“群众基础”，对提升公局的社会认同、扩增会员无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改公局经费“劝捐”为“筹款”，每年农历二月、十月定期筹资，从制度设计上缓解了公局运营经费不足的难题。同时，公局的重要事务与财政收支，一概交由各行商定期选举的值理人（任期两到三年）处置，尽可能做到民主、公开和公平。

他又针对港府严厉执行房屋整改条例，令居住成本大增，导致离港华人一度达五万之多的实际情形，召开同人大会，呼吁居民向政府委派的调查组尽情申诉，以纾民怨。求政府不要随街搜烟，引致不便等，使华商公局的代表性日益增强。

1905年到1908年间，中国各地纷纷创建华资工厂，如雨后春笋，其中包括矿业、水电、纺织、面粉、食品、火柴、肥皂制造等轻工业。在这短短四年间，也同时展开挽回利权运动与两次抵制美货、日货运动。民族工业之勃兴、提倡国货运动、挽回利权运动与抵制运动，这四个互相关联的经济社会运动同时发生，绝非偶然。民族主义的抵制运动，与华商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相互结合，商业广告往往诉诸爱国主义。



1908年抵制日货期间漫画



屈臣氏大药房在抵制日货期间刊登的“上等国货”广告

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再次反映华商试图发展本土工业，以抗拒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控制。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与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之后，日本国力大振，跃居东亚强权地位。1906年日本对华贸易，已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14.19%。此后与日俱增。在国内外市场，日本是中国的贸易劲敌。日本产品如茶、糖、丝与陶瓷，在质量与销售数量方面，都凌驾于中国产品之上。日本更大量对中国倾销棉纱。1905年日本销售到中国大陆的棉纱，占其总产量的87%。这个数字在1909年更增加到91.2%。因此，日本资本的侵入，与日本货品在中国和海外市场之强势竞争，对福建与广东一带民众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经济萧条，失业人口剧增。

随着对华贸易之增长，日本航运业务，也迅速扩张。日本货物由其本国船只，直接开往中国沿岸与东南亚各阜，而不再经由香港转运，导致1905年后两三年间，香港经济不景气。就在日资入侵、贸易竞争与广东香港经济不振之际，“二辰丸”事件发生，于是引发抵制日货运动。广东商人迅速承担领导地位。

1908年2月5日，发生日本货轮“二辰丸”案件。一名姓柯的商人购买日本军械，用日本轮船“二辰丸”运抵澳门海面，被清军舰只缉获。日本人对清军扣船事件提出抗议，两广总督张人骏惧怕日本人，竟赔偿其所谓“损失”，并鸣炮谢罪。

日本政府的蛮横态度，及中国政府的羞辱屈从，激起人民的愤怒。上海两广同乡会、政闻社等团体致电广东表示反对，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粤商自治会在广州召集两万人的公众聚会，议决抵制日货，以示抵抗。抵制运动迅速展开，并蔓延到香港、新加坡、马尼拉、雪犁（悉尼）、夏威夷及其他粤商集聚的城市。香港同胞更是积极响应，组织了“振兴国货会”，大力抵制日货。凡出售日货的商人都受到了群众制裁。出售日货的商店，橱窗被石块击毁，囤积的日货被搜出焚烧，有的店主与店员甚至受到割耳惩治。

香港爱国同胞还组织了“敢死会”等组织。西环海旁有两座货仓，存放着大量日货。“敢死会”将货仓包围，准备冲到里面将货仓捣毁。正在这时，港府竟派出大队警察赶到现场镇压群众，开枪打伤数人。香港总督卢押甚至调动陆军进入市区协助警察镇压爱国民众。

但是，爱国同胞群情激愤，“敢死会”依然四处活动。日本领事不断找港英当局交涉，要求有效地镇压。根据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总督卢押依照1886年《维持治安条例》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太平绅士的职责，颁布了以下限制中国人抵制日货行动的规定：“（一）凡本港太平绅士见有扰乱之事出现，可饬令附近之人协同平乱，拘拿犯人，以保治安，倘无故而不允助力者，监禁三月。（二）太平绅士见有聚众扰乱之事须先晓以禁例，着其即行解散，不听则拘之于禁，监禁三月。（三）除日用手做器具外，凡一切军械刀剑等类均不准携带收藏，倘有违犯者，监禁六月。（四）滋扰治安携藏军械之人除处以别种刑罚之外，兼可判以鞭笞之刑。（五）太平绅士可以自己或饬令差役人等入屋拘捕嫌疑滋事之人，并搜查军械。（六）倘有联同罢市或禁吓铺户贸易阻碍搬运货物，或阻人购买货物，则拘控罚银五十元，或监禁三月，或监禁罚款兼行。（七）倘缉捕查出犯例扰乱治安之人，报由督宪会同议政局不分其曾否入英籍，将其递解出境。”

港英政府禁止群众聚会讨论抵制日货，根据上述规定，太平绅士完全站到了香港居民的敌对面去了。然而，香港的主要商业行会（南北行、金山庄、米行、丝行、布疋行、瓷器行等），都支持抵制日货。许多华商乘机创立本土工商企业，推行国货运动，以排拒日货。抵制运动成为对日“商战”策略。马应彪（先施公司东主）与多位港商组织“商业研究社”，推进爱用国货运动。

在抵制日货期间，刘铸伯担任总买办的屈臣氏大药房，也在报纸上刊登本公司产品属于“上等国货”的广告。

1908年6月，多位港商集资开创“利民兴国织造公司”，登报招股，发表宣言，表明热爱中国的意图：“居今日而欲为同胞谋生活，舍振兴实业，诚无以为功。然欲振兴实业，则舍仿办织造又无以为急务。……而挽利权，兴国家，亦端在乎是。则谓为营利之商业也可，即谓为博济之善举也，亦无不可。……”“利民兴国织造公司”由多位四邑旅港华商发起，招集其他地邑港商，总共108位，共同倡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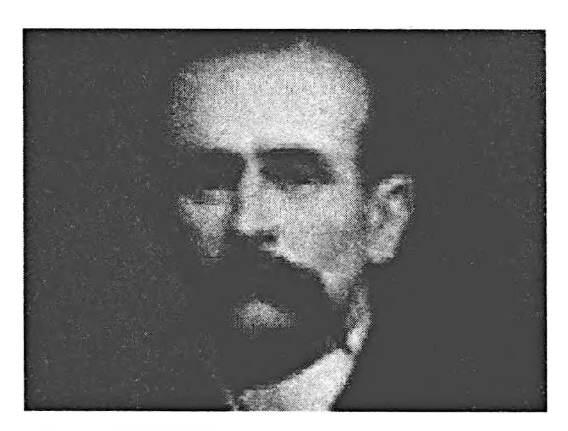
省港各地华商，也利用反日时机，纷纷建立民族工业，提倡国货，至少有八家纺织公司与八家火柴工厂于1908年创立。火柴盒上左右两边，都写上“振兴国货、挽回利权”字样，并以“舞龙牌”为商标。另外，粤商自治会在领导抵制运动同时，也创设“两广邮船会社”和“七十二行渔业公司”。

广东与香港密切配合，排拒日货，发展民族工商企业，推销国货，以挽回国家利权，同时进行，多管齐下。商界、报界与学界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部分华商热衷抵制洋货，因为领导反帝爱国运动，既可增进商人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势力，又可促进其经济利益，可谓“一箭双雕”。

刘铸伯领导香港华商与西商“争利”之余，还参与发起创建香港大学募捐活动，募集款项之多达70万元，而且，刘铸伯是香港大学董事会董事、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进行教育改革，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引起了国内及香港华人对西方新学科和知识的追求，出国留学人员与日俱增。美、法、德等国传教士也加强了他们在华的教育活动，如兴办教会大学、设立奖学金等，而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新安县（今深圳），巴色会早于1864年就在李朗设立了李朗神科大学（又名存真书院）。随着香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本地的教育事业越来越显得滞后于时代了。因此，香港当地各界人士开始积极筹划兴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

1907年7月，卢押爵士获委第14任香港总督（1907年7月至1912年3月）。卢押任港督时期，正是中国民族运动高涨时期，香港受孙中山革命活动影响，民众思想也十分活跃。另外，当时西方列强争相在中国成立大学，卢押认为英国也应该在香港设立一所大学，一来与其他列强竞争，二来让香港华人认同英国的价值观，抗衡其他列强文化理念，便于英国向华南拓展势力，巩固其在整个香港的统辖管治。



第十四任香港总督卢押（1858—1945）

卢押莅任后，很快便将兴办大学一事提上了日程。同年12月，卢押在圣士提反中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指出，香港已是一个大城市，却没有一所大学，实属美中不足。他希望社会人士热心教育，致力

创办一间大学，为社会培育人才，建设香港。他的这一讲话，第二天就刊登在当地报纸上。消息传出后，印度商人么地爵士前往港督府表示支持，愿捐助15万元作为建设大学经费，另捐3万元作为大学基金。这是第一位响应卢押创办大学的外国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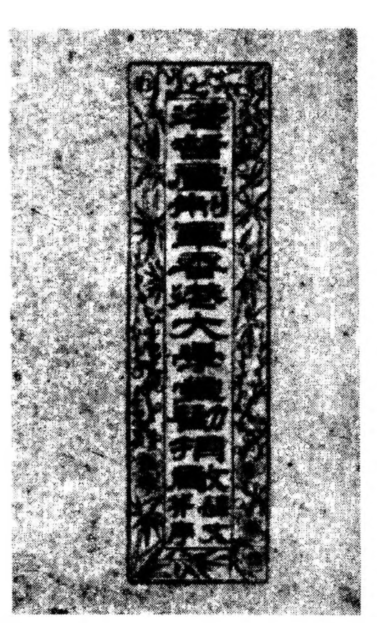
卢押在提出建校的备忘录中指出：“欲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能在此（建议中的大学）获得接受英国高等教育的机会，无须远赴海外。”这个为中国训练人才的目标亦获中国官员的响应。卢押向英国政府及商人提出的建校动机，则特别强调大学训练出来的人才，会有助于增进中英了解和友好，亦有利英国在中国的活动；并且一方面贯彻了多年来政府在香港公共教育所推行的英语及精英教育政策，亦显示了大学将为英帝国服务的目标。不过，从当时在港的英语教育发展，建校的各方支持者，及大学初期的规模来看，对新大学可以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为中国现代化训练人才的意见，曾获不少中外人士的认同。

然而，区区18万元是不能够建成一所大学的。1908年3月18日，卢押又召集全港的富商，他在发表谈话时呼吁：创设一所大学需要巨额资金，政府除了能拨给土地之外别无办法。他表示税收只能负担行政费，无法负担学校的经常性支出，估计经常性支出需要100万元作为基金，另外还需要一笔建筑设备费。为了实现计划，卢押下令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研究全部计划以及计算各项开支。筹备委员会计委员8人，主席1人（遮打勋爵），委员计有：律师兼医生何启（华人），总医官爱建臣，工务司翟咸，状师普乐，皇仁中学监督胡礼，医生谭臣，西方商人端纳和保利氏。9月，筹备委员会向卢押提交了一份计划报告书，认为所需经费庞大，无法筹措，因此不主张设立香港大学。但何启认为，创立大学的经费不足忧虑，因为只要大学设有中文科目，海外华侨及国内绅商、香港华人，会全力支持。

本来，卢押准备在不需华人捐款的情况下，办一所只有医科和工科的大学，但由于得不到支持，不得不改变初衷。最终，港英政府决定办一所有文科和理科的大学。卢押亲自邀请全港中西绅商参加募款委员会，发动华人捐款。

1909年，大律师何启出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刘铸伯、吴礼卿等华人绅商担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总理，全力支持香港大学开办。与此同时，卢押发出《港督卢制军香港大学堂劝捐启译文并序》，其中写道：“（本大学）文科则兼包万国公法各国条约、地理、万国历史、中国古今文学等有用之学，皆为学优而仕者之所必需。中国文字一门尤不可少。昔人尝讥印度英国学校卒业诸生，不能通祖国文字者十居其九，吾人所为雅不欲蹈此覆辙也。”

这份劝捐启示业经发出，立即得到广大绅商的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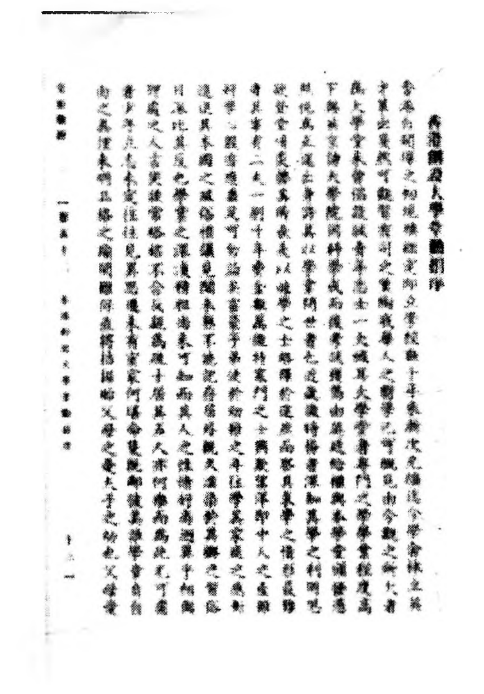
港督卢制军香港大学堂劝捐启译文并序



《孔圣会旬报》发表的《港督大学堂劝捐启书后》

应。刘铸伯创建的孔圣会机关报《孔圣会旬报》发表《港督大学堂劝捐启书后》一文，以为响应："仆于课余时，过访大律师何君启，袖出《港督卢制军香港大学堂劝捐启》以示余。余披览之余，不禁神为之动，意为怡者久之，因而有感曰：大哉洋洋乎！香港学界之规模已达极点也；美哉奂奂乎！香港文人之荟萃渐臻完美也。以香港一孤岛，盈盈衣带水耳，今日文澜学海，映带左右，学会林立，人才辈出，猗欤休哉！"刘铸伯的同学胡礼垣在《香港创设大学堂劝捐启》中也写道："港督卢制军不惮详寺言，挺身提倡，为我华民谋长久之幸福，胞与之怀，仁吉利溥，闻其伟幸论，咸宜额手欢迎，凡我同情当因是而愈为踊跃也。"香港富商吴礼卿捐款5万元，两广总督张人骏也捐款20万港元支持该大学的兴建。

在何启、刘铸伯等助捐董事会主席、总理、值理四处游说之下，各方响应者众，纷纷向大学捐款。由于有了华人的支持，不到半年就募得了127万多元。么地原以为自己捐出的18万元是最大的一笔捐款，后来获知捐款最多的却是两广总督张人骏的20万元。么地不甘示弱，增加捐款至28万元，保持捐款首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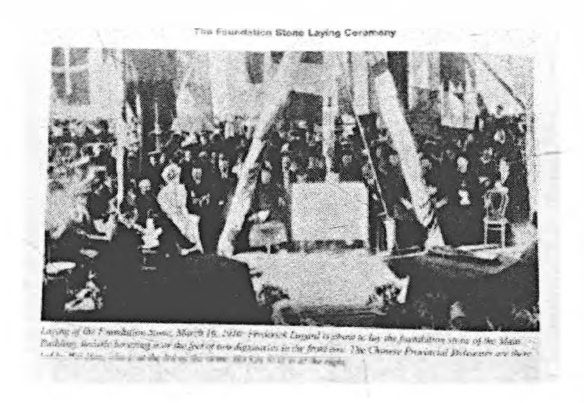


胡礼垣香港创设大学堂劝捐启

刘铸伯担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总理期间，大力推动香港大学募捐活动，有说两广总督张人骏捐款20万港元支持该大学的兴建，也是刘铸伯与何启促成的。他的刘德谱等则在《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中写道：

当有清季世，我华人知立国之道，莫先于教育。其时各省，学校方始萌芽，先考乃与爵绅嘉道理先生，集资二十余万，设育才书社于香港，分设于广州、上海，以教华人子弟。广州之有公立学校，自先考始也；其后，港立大学集资至七十余万，亦先考赞助之力为多，华人子弟其英秀者，多就学焉。两校成绩，至今固彰彰也。

1910年3月16日，香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在港岛般含道校址举行建校奠基礼，由卢押亲自主持。



1910年3月16日，卢押主持香港大学建校奠基礼

卢押在1910年3月20日撰写的《港督卢制军香港大学第二次劝捐启》中，再次强调香港大学兴建的迫切性，中国内地崇尚西方教育，香港应该为此做出贡献等，“约而言之，香港大学之旨，在于教授生徒，不分种类，不拘宗教。其进学与毕业考试之程度，均与英国各大学同。教授科学则用英文而兼及汉文经史，尤必慎选教习。至于学生寄寓，则限于本大学所设或认可之寄宿舍，欲有以养成学生之品行也。本大学于各教教会，一律招纳，亦不限令各学生听信何教。即各种科学，仍听学生之父母或监理人自择，不相强也”。



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总理、值理合影

1911年3月30日，香港大学依法例（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dinance）正式成立，规定大学校监为香港行政长官（殖民地时期为香港总督）。本部大楼于1912年3月11日开幕，港督卢押亲自主持开幕礼，同年9月开学，卢押兼任首任校长。

香港大学的创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成立伊始，仅设有医学和工学两院。翌年始增设包括多项理科科目的文学院，中文则为一年级的选修科目，是一所英式大学，并且注重宿舍群体生活和学生品格的培养。在第一批学生中，除本地学生外，尚有来自海峡三埠（马六甲、槟城及新加坡），广州和其他中国沿海商埠，已实现了大学不单只为香港而设的目标。

卢押在任上做了几件有利于港人的大事，如改善卫生环境、减少鸦片贸易、建设九龙水塘等，其中以创办香港大学最受关注，这是他的前任们从来没做过的事。对于港督



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于1912年3月11日落成使用



香港大学的校徽

卢押发起创建香港大学之功，刘铸伯、周少岐、陈赓虞、韦玉、何启、曹善允、何福等华人绅商感铭在心。

1910年4月，卢押归国休假，刘铸伯与华商公局同人发起隆重聚会，为之送别。他当场朗诵《送卢制府序》，其中特别提到香港大学之设："教育者，所以陶铸人才者也。中国现方励志维新，讲学尤为当务之急，唯现在各省，多未有大学之设，青年有志之士，锐意求学者，多担簦负笈，以就傅于重洋，或非父兄长者之所愿也。公来抚是邦，虽庶政均已具举，而尤以学育才为唯一之首务，殚精会神，筹设大学，今奠基礼成，伟业就绪，他日得英才而教育之，收效定臻美满也。我华绅商等，感公盛德，永矢弗谖，故于公之行也，词以送之……"

香港大学创立初期，以英国曼彻斯特、列兹、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的新城市大学作模式，制定法例。根据《1911年大学条例》（1911年第10号）设立了校董会、校务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刘铸伯荣膺香港大学校董会校董、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他一起荣膺校董会董事的华人官绅有：陈赓虞、张鸣岐（两广总督）、招雨田、何福、何甘棠、何光、何东、伍汉墀、曹允善、陈启明等；和他一起荣膺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华人委员的则有何福、韦玉等。

《1911年大学条例》规定：大学设有校董会、校务委员会及教务委员会，其各别的章程、权力及职责由本条例及规程订明。在符合本条例及规程的规定下，校董会为大学的最高管治团体；校务委员会为大学的行政团体，须订立有关保管和使用大学印章的规定，并在符合本条例及规程的规定下，管理大学的财产与处理大学的事务；教务委员会得规管大学的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事宜，但须符合本条例及规程的规定及校务委员会在

财务方面的管制。校董会、校务委员会或教务委员会的任何作为或决议，不得纯粹因该团体出现空缺，其中任何成员欠缺资格或任何成员的选举或委任无效而致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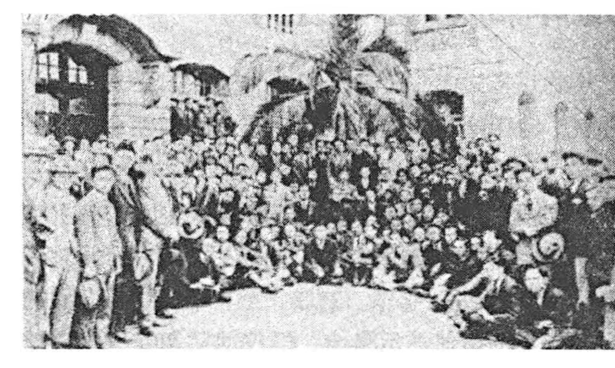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Cour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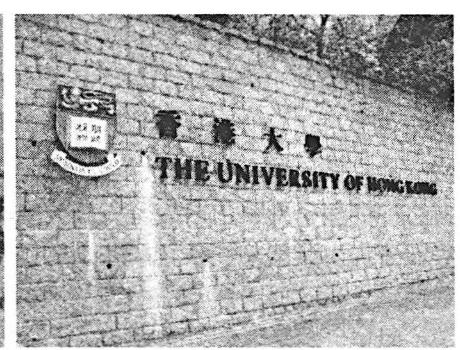
刘铸伯是香港大学校董会董事、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香港大学创立之后，刘铸伯一直担任香港大学校董会（Cour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董事、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委员职务。香港大学开办之初，只有医科、文科、理科和工科等四个学院。当时工学院学生有31人，医学院学生21人，文学院学生20人。全校只有72名学生。1916年12月，学校举行了第一届毕业礼，有23名毕业生及5个荣誉毕业生毕业。此后，香港大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香港政府为进一步沟通中西文化，遂召集本港绅商，磋商在香港大学增设中文学系，让汉文中学毕业生入读。富商邓志昂捐款建立中文学院，冯平山捐款建立中文图书馆等，涌起了一股重视中文教育的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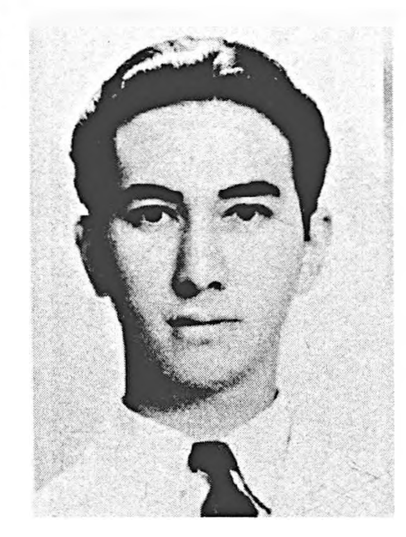
1922年，港大校董会董事、校务委员会委员刘铸伯不幸去世，校方为其隆重送葬。次年2月20日，孙中山应香港大学学生会的邀请，造访母校，并在香港大学大礼堂（今陆佑堂）发表历史性演说——《革命思想的诞生》。孙中山一开始便用英语说：“我有如游子归家，因为香港与香港大学是我知识诞生之地。”香港大学的创立，把香港高等教育带进了新时代；辛亥革命的爆发，孙中山把中国带进了新的世代。



孙中山在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



何鸿燊（1921—　）



张爱玲（1920—1995）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有不少香港大学创校董事的后人入读港大，澳门赌王何鸿燊乃其一，他的祖父何福与伯祖父何东、何甘棠都是香港大学校董会校董或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何鸿燊的祖父何福曾在香港大学设立“何福奖学金”，张爱玲是这个奖学金的获得者之一。据香港大学博物馆关于张爱玲的文字介绍：“1939 年，张爱玲入读香港大学文学院，选修中文及英文科，成绩优异，获颁何福奖学金及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足以应付学费负担。唯完成首两年课程后，1941 年日军入侵香港被迫停学，翌年返回上海。”而那位为香港大学捐款20万元的两广总督张人骏，是张爱玲之父张志沂（1896—1953，字廷量）的叔伯兄弟，张爱玲则是张人骏的堂侄女。

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前，港大为香港唯一一所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5位司长及局长中，有11位出身自香港大学，可见香港大学学生在政府内部占有一定地位，甚至有“港大帮”之说。根据港大年报，2009年政府新聘用的学位职系公务员当中有34.1%是香港大学应届毕业生，自2006年起为全港各大专院校中最高者，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教授更称香港大学是香港的“公务员培训所”。

第三节　创建华商总会（上）

1908年，刘铸伯因为公务商务繁忙请辞华商公局主席一职，陈赓虞以主席身份主持华商公局，其间继续推行局务改革，并努力承担华人商民与港英政府之间日常沟通对话之责。

同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龙驭上宾，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溥仪的父亲载沣成为摄政王。载沣上任后，为加强皇权，任用少壮派贵胄掌控军队。他委派自己的亲弟弟载洵

（1886—1949）掌管海军，年仅22岁的载洵成为大清国最后一位筹办海军大臣。此外，载沣还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负责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在萨镇冰的指点下，载洵首先巡查了大清国海军现状，根据考察结果，向清廷提交了一份雄心勃勃的中国海军七年发展规划。



海军大臣载洵统领海军将官萨镇冰、陈璧光等出洋考察途中路过香港

为加快海军重建工作，清政府决定派载洵和萨镇冰赴欧洲考察各国海军发展情况，同时选派23名年轻的海军军官和海军学生随队前往英国留学，学习制造军舰和炮械。1909年10月16日，载洵一行从上海出发赴欧洲考察，途中路过香港，受到香港总督与香港华商公局的欢迎。粤商自治会与香港华商公局绅商一再主张中国大办海军，并表示商界愿意承担“海军捐”。

有必要对上面这幅历史照片做些说明：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香港总督卢押，前排右起第四人为载洵；第四排左一为何启，左三为刘铸伯。

载洵这次出访欧洲历时三月余，一路上考察德、法、英海军，参观了英国著名的皇家海军学院，并在英国定造了巡洋舰。最后一站造访俄国，最后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这位少壮派贵胄，似乎开罢“洋荤”上了瘾，1910年7月又奏请前往美国、日本考察。在美国期间，载洵一行乘车抵达某车站时，华侨厨工邝佐治混在人群中欲刺杀载洵。载洵受到惊吓，不敢在美国久留，即刻启程去日本。在日本，载洵一行又向长崎三菱造船所定造了炮舰“永丰号”，向川崎造船所定造炮舰“永翔号”。炮舰正在建造之际，爆发了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血色大幕。武昌起义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来响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在香港华人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1月6日，香港《循环报》收到“京陷帝崩”这则后来证实并不真实的消息，声称北京已经易帜，满人已经逃遁。这则骇人听闻的消息一经刊登，香港顿时沸腾起来，香港华人拥上街头举行庆祝活动，鞭炮声震耳欲聋，欢呼声经久不息，革命党人的旗帜到处挥舞，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英国警察止都止不住。港督卢押在向伦敦汇报中指出：

所有的华人突然欢欣若狂，情绪之高涨在这个殖民地的历史上前前所未见，也从未听闻，爆竹声此起彼落，伴着从未间歇的欢呼声，民众不停地动着旗帜，华人这种举动非比寻常。

11月9日，广东宣布共和独立，两广总督张鸣岐躲入沙面英使馆避难。10日，著名革命党人胡汉民由香港抵达广州，就任广东都督。得知广东宣布共和的消息后，香港华人于11月12日（星期日）再次关闭店铺，拥上街头举行庆祝活动，香港全市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商店被抢掠，警察企图拘捕滋事者而被人投石，西人在街上受到袭击，华人群众甚至喊出"杀死洋人""赶走英人"的口号。

香港华人对武昌起义成功和广东光复的强烈反响，使得香港英国当局坐卧不安。面对大多数香港华人同情和支持革命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对华人举行庆祝活动的要求做出某些让步。同时，他们又采取种种措施控制局面，并公开出面干涉，以防止革命形势的发展影响到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1911年11月6日香港华人首次庆祝"京陷帝崩"之际，港督卢押即命令警察巡逻队严阵以待、加紧巡视。11月19日，他又在督宪府召集何启、韦玉、刘铸伯、谢缵泰等12名华人领袖开会，解释了港府的立场：英国政府目前只承认清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香港的华人在政治取向上可以自由选择，但香港社会的繁荣安定不容破坏。卢押声称，他并不敌视这场运动，但华人领袖应事前将他们拟采取的行动通知港督，看是否超越了香港政府指定的界限。他还表示反对关心所谓"纯粹的中国涉治事务"，不允许放置标语，不允许广州政府派遣正式代表来港，或公开认捐支持革命。

香港市民庆祝辛亥革命成功而激发的骚乱，虽然很快就告一段落，但华人的反英仇外情绪仍然高涨，以至于接替卢押的新港督梅轩利（又译作梅含理）莅任履新那天，在卜公码头登岸时遭人开枪射击，他的座驾后来更遭人投石。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21日船抵香港，受到革命党人与香港绅商的欢迎。旋赴沪宁，被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16票赞成，1票反对）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2月12日，隆裕

太后替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了逊位诏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自此告终，共和国得以建立。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刘铸伯的老友胡礼垣赋诗遣兴："今当贞下起元辰，公是公非说论伸。共主太平斯有道，由民自立始能仁。帝王三五谟嫌旧，议院千夫法爱新。万国咸宁从此起，民权发达太和臻。"

孙中山自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致力继续推进革命。然而，阻力重重：一是帝国主义国家拒绝承认临时政府，宣称"袁世凯拥有列强信任"，迫使临时政府对袁世凯妥协；二是袁世凯诱胁兼施，在清廷和临时政府之间居中渔利，隐居于操纵整个局势的地位；三是临时政府内部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与袁世凯相呼应，从内部破坏革命；四是革命党人本身涣散无力，对帝国主义列强乃至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坚持进行革命的孙中山等人反而处于少数地位，结果是南京临时政府以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为条件，同意推袁世凯为总统。



孙中山（1866—1924）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提出辞职五项条件，经各省代表会议通过。2月4日，孙中山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讲话：俟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辞临时总统职。12日，清帝下诏退位。13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声明赞成共和。1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他还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一职，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

1912年5月18日，孙中山由广州乘船抵香港，入住英皇大酒店。当天与《南清早报》记者路威臣谈话，告以三数星期后将北上与袁世凯会晤，对广东及全国局势表示乐观。谈及取消通商口岸问题，孙中山表示："然此乃华人之志愿，谓吾人必要独立者，更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也。然吾人将必开放中国各方，以为酬偿。目下洋人只可于通商口岸，若果裁去各口岸，则洋人可到通国各地，由太平洋以至西陲。"

孙中山抵达香港次日，在接受《士蔑西报》记者访谈时表示，此行将劝导商人了解借外款之目的；否认关于将隐居澳门之传闻；表示将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促进教育普及等等。

孙中山此行，还接受了自己在中央书院求学时的学长、华商公局前主席刘铸伯的宴请。据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

> （1912年）5月21日 晚，赴刘铸伯等于华商公所之宴会；9 时至洞天酒楼赴香邑华侨之宴。连日先生接见友好多人，又与孖刺西报访员纵谈民生主义、铁路国有政策。（《民生日报》1912 年5月23日）

这大约是刘铸伯1885年毕业后，首次见到校友孙中山。参加晚宴的尚有何启、何东、袁英山、李葆葵、周少岐、叶兰泉、何福、罗长肇、陈赓虞等人，他们既是中央书院校友，又是华商公局核心成员。在德辅道中华商公局会所内举行的这次特殊的宴会上，校友们把盏言欢之余，最关注的民国建设蓝图。

孙中山在广州时，力言粤路关系民国建设前途极大，第三期股本应速开收，并通电各埠粤路股东，提倡速收第三期股本。估计在刘铸伯召集的这次宴会上，孙中山还会旧话重提，因为他在广州曾经演说发展广东交通及借外债发展实业问题，抵港次日对《士蔑西报》说过："此行将劝导商人了解借外款之目的。"

关于刘铸伯在民国初年的功绩，他的后人在《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中简略写道：

> 民国之初，粤吏欲任以财政厅长，亦辞不就。先考语人曰："吾性不乐仕进，但欲于国事有所补救耳，顾以格于时势，既一再试而不效，屡出亦复何补？故终不愿为冯妇，非敢以是鸣高也。"闻者韪其言。
>
> 先考无党见，顾盱衡时变，往往私忧窃叹，于兴革损益，多所主张。每有发抒，不曲徇时俗，亦不为过高之论，务求平实可行，一时士大夫多传述之。元首及疆吏闻其贤，屡以礼聘为顾问，先考以职在宾友，无官守言责，未尝不勉就焉，然事权不属，亦聊自效于万一而已。然先考之为祖国谋者，固不必规规于政途中也。

或许就是因为刘铸伯不愿担任广州政府财政厅长一职，该职位后来由李煜堂担任。但是正如刘铸伯的后人所言，"先考之为祖国谋者，固不必规规于政途中也"，他在香港创建华商总会就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期间，以同乡地域与方言为基础的香港各邑商会与公所，纷纷成立，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革命期间，军事动乱与新旧政权的更替，影响内地治安；广东与其他华南地区社会处于无序状态、造成大批难民拥入香港。广东和华南各地发生自然灾难，以及流离火所的难民，有待旅港各邑同乡救济与支持。于是香港各邑会所应运而生。

另一个主要原因，则与广东政治有密切之关系。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统称四邑，清宣统元年（1909年），旅港邑彦伍耀廷、陈少白、李煜堂、余斌臣等倡议，组织成立一个以团结四邑商工团体人士、维护乡梓公益、互助同乡福利、沟通海外侨情、发展经济为目的之社会团体，初名为"香港四邑商工总局"（1951年12月注册为"香港四邑商工总会"）。

在老同盟会会员李煜堂的领导下，"香港四邑商工总局"一直与同盟会紧密合作，支持革命。事实上，大多数四邑商工总局会成员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清政府而奋斗。辛亥革命成功后，1911年11月10日，李煜堂和多位香港四邑人士，陪同胡汉民前赴广州

主持广东革命政府。胡汉民就任广东都督。多位四邑人士充当政府要职：李煜堂（新宁人）为财政部长，陈少白（新会人）为外交部副部长，李树芬（新宁人）为卫生部长，李纪堂（新会人）任交通部长。另外，李煜堂的外甥黎国廉（顺德人）任民政部长。不仅如此，李煜堂还推荐陈景华（香山人）出任广州市警察局长。而且，与四邑人士保持密切关系的港绅何启与韦玉，则任广东政府的总顾问官。可见李煜堂在广东政府的影响势力，盛极一时。港督梅轩利向伦敦报告：四邑人士“实际上统治广东”，占据“几乎全部重要职位”。



香港四邑商工总会创建的图书馆

旅港四邑商工总局在广东的政治势力急剧扩大，引起香港其他各邑人士关注。为了阻止四邑人士垄断广东政治与经济，他们也纷纷组织同乡会所，以保护、促进各邑人士在省港的利益。到1913年1月，香港已成立了代表内地各邑利益的十六个同乡会所。

新任港督梅轩利疾视香港绅商组织各类会所，认为除了一二例外，其余多系“政治阴谋的温床”，尤其是四邑商工总会，恣意“干预中国的政治”。港府乃于1911年，制订《社同法令》，规定所有社团，必须向政府注册，以便控制；禁止所有非法活动、或危害香港社会治安、或导引大陆动乱之社团。然而，各邑会所向港英政府注册，均表示以服务乡人为目的，赈济国内灾难，从事乡里建设、推进公益与确保治安。事实上，在服务乡人的同时，各邑帮派之间也互相竞争，试图保护各自省港的利益。

1900年春华商公局成立，是数以万计逐渐崛起的香港华商第一次跨行业、跨地域的大联合。此后十余年间，香港华商更多参与新兴行业，自治意识进一步觉醒，又受内地各埠普遍成立商会风气之影响，各种中小规模的近代新式商会与公会，相继出现。20世纪初，粤港两地商人往往跨界经营，像后来那么壁垒分明，部分华商团体在华南地区也很活跃，积极参与各地商业、社会乃至时政事务，影响力不容小觑。但是反观华商公局，它虽是香港华人商界唯一代表性团体，却面临诸多尴尬。一则该局成立以来，一直未获港英当局同意正式注册为法团，换言之，它只是一家私人机构，不受香港相关法例保护，这让其部分热心支持者感到失望。二则“公局”之名，颇具官方色彩，在思想新潮的香港华商看来，不免过于陈旧和保守。以经营爆竹业闻名香江的鹤山商会首任会长叶兰泉，于各行、各邑商会纷纷冒起后，曾担心“若无一总商会以总其成，则究属涣散”“于商务前途殊多窒碍”，且在港众多华人“下情不能忧之”。于是，刘铸伯于

1912年2月另外成立了“华商总商团”。

华商总会成立的背景，很值得一提。民国成立以后，北京政府于1912年冬通告全国各省以及海外各地华侨商会，敦促派代表赴北京组成选团，选举国会议员。这是华侨参与祖国政治的良机。香港的华商都非常踊跃。香港四邑人士与其他地邑帮派之政治势力竞争，在此次选派代表之事件中，表露无遗。1913年1月3日，广东都督胡汉民授意，由四邑人士召集香港各邑商会聚会，讨论募捐以及选派代表赴京二事，希望香港华商选派国民党员为赴京代表。当时大多数港人，对选派代表参与选举国会参议员一事颇感兴趣，华商更是反应踊跃，但他们不愿被四邑籍国民党人士所操纵。

1913年初，为了要选派华商代表赴京、以抑制四邑人士政治势力，在刘铸伯、叶兰泉、袁英山（东莞人）等人的领导下，拟重新组织“华商总会”。叶兰泉邀请刘铸伯等几位有意改革的华商首脑，数次到鹤山商会茶叙探讨。稍后，由刘铸伯做东宴请商界同仁，公开提出：民国成立后，香港各业纷纷成立商会，鉴于各商会都加入该局，根据北京政府工商部的规条，拟筹设香港总商会。刘铸伯的提议得到多数人赞成。

刘铸伯拟另起炉灶筹建香港华商总会的构想，得到港督梅轩利的支持。他一面以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的官方身份，吁请港英当局批准总商会立案，一面约请时任华商公局主席陈赓虞，商议将该局并入新的总商会之事宜。据文献记载，同年7月19日，陈赓虞召集华商公局管理层叙会，大吐苦水说“同人不照纳年捐，值理不照两年为一任，俱违本局章程”，以致“同人责公局办事不周”。言下之意是再不改变现状，他也支撑不下去了。

11月12日，华商公局值理公推刘铸伯为主席，袁英山（时任香港最大华人慈善组织东华医院主席）为副主席，李葆葵（南北行及轮船业商人、新会商会会长）与周少岐（东莞籍商人，涉足保险、航运、地产、银号等多个行业）为掌管财权的正、副司库。

“香港华商总会”最初的英文名字是“A Principal Society of Chinese Residents in Hong Kong”，十分累赘。但取这个名字的主要目的，是强调它代表香港的华商，有资格参加国会选举。新商会组织完备后，征求华商公局当事人同意，合并统一办理，由华商公局将产业移交总会，还决定曾在华商公局创立时入会已缴付基金者，不须另缴入会基金与总会。合并后，华商总会按港府1911年颁布的社团法案，正式注册，且沿用华商公局的英文名字“Chinese Commercial Union”，名义上，华商总会是从华商公局改组出来的，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华商总会纪念章

次年，周少岐详谈总会成立经过时说：“原夫华商公局之设，为联络我在港华人商情，恪守居留地公法，以维持大局者也。数年来，风气日开，各邑商会与各行商团陆续继起，究竟难免散

沙之诮，同人有见及此，联合同志奋兴，将公局整顿，戮力进行，于去年癸丑十月廿五日，由陈赓虞君交盘……自接盘后，经将前时章程集众修改妥善，并公决将华商公局名号改为华商总会。经改定后，行头、商会、行店、公司，个人等踊跃入为本总会同人者固多，而尚未入者亦不少。现计进入基本金约有累百盈千之数，务望我华商幸勿观望如故，正宜早日入会，以助进行。屈指进行至今，虽为日无多，而办理成绩亦觉规模就绪，气象焕然。”

这次改组，刘铸伯注意团结同人，顾全大局，对不同意见者持开放态度，他在一次聚会中说：“今日请诸君到来叙会，有决定宗旨、整顿公局进行，以补前时所未办到之事，借此公局结一团体。初时原拟如此辩法，嗣因各有意见，以致不果，如日后倘或有生意见，尽可合群商量，调停解释。若因生意见破坏大局，料各人意亦不想。”

香港华商总会的宗旨最初为“联合各侨港行会及社团，为华商启智，推广贸易”。此后，又有了更详细的表述：“设法保护华人商务各项利益。凡有关切于华人商务之事皆广咨博采，且尽力酬商，合例善法以求除弊而兴利。凡本港制法律条例，随时择其要者翻译解释，俾同人得以明白。凡政府订立则例，筹办公务，有关及华人者，则将舆情如告献可替否，或以笔札陈明，或以谒见剖诉，俾得为政府之助。凡生意事务，间有争执，求本会调处者，均可随时代为设法，持平解释。”总而言之，华商总会的宗旨，是要全面的为香港华商服务。

香港华商总会创立不久，其会员数目剧增至1500，包括各邑商会、各种行会与商行，俨然成为一个广泛代表香港华商利益的组织，取得社会领导地位。1920年12月，刘铸伯、何福、罗长肇、李葆葵四人为代表，购入新会址。到了1952年，总商会实行会董制，改名“香港中华总商会”，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香港中国居民中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华商总代表机构。

香港华商总会取代华商公局，当然不只是改个名字、换块招牌，乃至接收资产那么简单，在改组过程中，内部管理体制上确实动了真格。比如原来华商公局值理（各行商及地域商人推举的代表）人数虽多，遇事议论者众，担责者少，会费又屡屡拖欠，弄得几任主席心力交瘁。刘铸伯力主在值理之中，再投票选出干事值理，作为骨干，切实推行各种会务，干事值理制自此成为定制，相当于华商总会的“责任内阁”。

于是，包括叶兰泉、陈赓虞、周少岐在内，最初支持刘铸伯发起改组活动的陈启明、何泽生，以及号称“开埠商人”的冼德芬（“赌王”何鸿燊的外祖父）等十四人，名列华商总会首届干事值理。同时，为适应华商总会须时常与中外各方接洽的需要，特由两名干事值理叶兰泉、胡炯堂，分别兼任中文及西文司理。

经过一番锐意改革，香港华商总会冲破华商公局备受非议的困局，不仅获港英当局官方承认，数年之间，会员人数也由百余名，迅速增至过千，在港华商开办的各大企业、行号及各行业、各地域商会，纷纷加盟。此后，刘铸伯得以连选连任香港华商总会主席。

此外，刘铸伯还以华商总会主席身份，促成“香港华人核数研究会”的建立。



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徽标

据“香港华人会计师公会”网站介绍，该组织1913年在香港注册成立，最初名称为香港华人核数研究会，1933年易名为香港华人核数学会，1946年改为现名。在1913年前，在香港注册的华资公司，可聘用任何人士为核数员或查账员。当时香港设有规定会计师资格，但没有会计师之名称。自1913年，政府以华资有限公司增加日多，其中记账方式，多采用中文及上进下支账部，进支存欠结账。政府想修订当时有效的1911年香港公司法例时，曾拟令各华资有限公司必须用英文记账。唯各有关人士，以此项措施，非常困难执行。因当时能够以英文记账人员不多，并且待遇要求高昂，以致多数公司力有不逮。遂由刘铸伯领导的华商总会向港府交涉取消这项拟通过的法例。

香港政府经考虑后，亦俯顺舆论民情，允予接纳，将公司法例有关章节，略事修订。以后所有有限公司，若用中文记帐，必须加设英文之现金收支部。同时更规定凡欲担任华人核数员者，须经考试合格，方准执业。港府随即委出刘铸伯、何福、周少岐、袁英山四人，为第一任考试委员，又以华民政务司为当然主席。

1913年香港政府举行第一次华人核数员考试，合格者有十七或十八人。其中以冯乐君最热心，于政府公布合格核数员名单后，召集合格核数员举行第一次座谈会，商讨组织同业公会，获得一致赞同，即席推举冯乐君负责起草会章，并定名为“香港华人核数研究会”。第一届会员有刘铸伯、冯乐君、黄茂林、张才、胡尔栋等。

香港华商总会成立后，刘铸伯领导香港绅商，襄募民国发行的公债，组织国内的救灾活动，深受当道好评。据《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鼎革后，以有功民国，奖给四等嘉禾章，寻晋给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以襄募内国公债，传令嘉奖，赏给‘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匾额。”

民国政府颁给刘铸伯的四等嘉禾章、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如今成了他后人的传家宝；大总统颁给他的“乐善好施”“急公好义”匾额，如今悬挂在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的门楣上方。

刘铸伯担任香港华商总会主席期间所从事的救灾工作，以乙卯年广东水灾救济为最大。在191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他谈到救灾一事：

灾害之来，多出于天然，语其最著者，曰水灾，曰旱灾，曰风灾，曰蝗灾，曰病疫，曰地震，六端尽之。然六者之中，中国无火山，故纵有地震，其害亦不甚

烈，可置勿论，其余五项，则中国常见之，而于民生有绝大之关系者也。

以水灾而言，如黄河堤防，有千数百里为墟；珠江堤决，有百数十里为墟者矣，田园墟墓，扫地以尽，及水退复业，家产荡然，而贫民失业者增其一。

以言旱灾，月不雨则无麦，而种麦者苦饥矣；逾月不雨则无禾，而种稻者又苦饥矣，百般焦枯，赤地千里，及得雨复时，损失已多，而贫民失业者又增其一。

自若暴风为灾，禾木斯拔，庐舍为摧，而贫民之失业者又能增其一。

蝗虫为灾，禾麻豆麦，顷刻都尽，而贫民失业者又增其一。

凡兹四者，偶遭其一，或属偏灾，在交通窒塞之区，接济易穷，往往有人类相食者矣。呜呼，易子析骸之惨状，是岂仁人君子所忍闻哉？

若夫疠疫之灾，其害尤惨，省会之地，几死恒以十万计，郡邑之地，岁死恒以数千计。夫死者已矣，而生者块然，尝有劳力之家，死者一人，而家绝其生计者矣；尝有商贾之家，死者一人，而全肆输其生业者矣。况当其病也，医药有费；及其死也，丧葬有费；故疠疫盛行之际，死亡枕藉，则贫民之失业日益以多，此亦必至之势也。

昔之谋国者，关心民瘼，当灾害之未至，思有以预防之，此河防水利诸要政所由起也；迨灾害之既至，思有以补救之，此救荒检疫诸要政所由起也。乃民国以还，内而枢府，外而省吏，日惟汲汲焉以争权夺利为务，绝未闻有以民间疾苦，一撄其心者。故山东有河务局之设，而修理河工之事无闻焉；全国有水利局之设，而整顿水利之事无闻焉；吾粤有治河督办之特设，而清河道之事亦无闻焉。若是者何也？以争权夺利之故，连年用兵之费，不啻以万万计，各党运动之费，不啻以数千万计，遂无复余力以从事于此故也。

刘铸伯上述文字是有感而发的，那就是：民国肇建后，内地军阀混战，政局瞬息多变，各路“猛人”置民众生死不顾，“以争权夺利为务”，他与香港绅商竭尽绵力，推动了汉阳兵灾、广东水灾等多项赈济工作，并且希望“今之谋国者，关心民瘼，当灾害之未至，思有以预防之”。但是，封疆大吏从来置民生疾苦如儿戏，依然“日惟汲汲焉以争权夺利为务，绝未闻有以民间疾苦，一撄其心者”，一场大暴雨，人或为鱼鳖。

1915年即民国4年，按干支纪年为乙卯年。是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四日（公历7月12日—15日），连降暴雨，尤以粤北山区和西江四会、广宁、怀集，还有广西梧州等地区降雨量为大。三江（东、西、北）水暴涨，北江与西江两水“争道”，再加上洪水“受海潮顶托”，北江水“被迫停留”，改道经三水县芦苞、南海县官窑、大坦尾注入广州。同时小北江水经赤白坭过石门，注入荔枝湾，形成泮塘、恩洲、荷溪以至广州市下西关地区（多宝、逢源、宝华等街）尽成泽国。毁坏房屋3.7780万间，受灾人数35.6019万，被淹田地达31万亩。

佛山、三水等地官府在《循环日报》等报纸向东华医院发出赈灾告示：“东华院（按：即东华医院）鉴：哀启者，佛山此次崩缺大富围，所受巨灾为历史上所未有。全





1915年7月广东水灾照片

镇街道尽皆淹没，其浸剩者只有居仁里、东华里、突岐里、福庆里等三四街而已。其最惨者栅下、铺山、紫村。大基尾村尾一带屋宇冲塌八九，而分水、富民、祖庙、大墟、弼头、舍人、四沙等亦封楣过瓦，百万灾民瓦面树丫风栖露宿。负亲挈子，待哺嗷嗷。本镇善院以灾广力微，绠短汲深，施赈亦难普遍。用特函恳贵院善长仁翁速施巨赈，胞与为怀，则我佛（山）百万生灵同颂再生之德。”

7月15日，刘铸伯等联合香港绅商，紧急成立东华医院赈济会，以东华医院名义在《循环日报》发出告白：“启者。敝院连接到省救灾公所及内地各属函电，详述近日淫雨连旬，东、西、北三江同时涨发，其水势远过去年……昨经敝院大集会议，先行垫支办米二千包，即为寄省举行急赈以救燃眉。但灾区广阔，仍需源源接济，故不得不为将伯之呼，为民请命。除函电中外侨商协助急赈外，并在本港沿门劝捐以资接济。……乙卯年六月初三日　东华医院启。”

同日，刘铸伯主持华商总会开会募捐，据《申报》报道：“……中国商会（华商总会）开会研究广东将军与巡按使之电文，内谓华兵至今日止，已救起二万人。今粮食缺乏，请即预备米面糇粮饼干以资接济。……东华医院昨晚与会之人认捐八千元。中国商会（华商总会）认捐七千元，又续认三千六百元。英美烟公司认捐千元，太古洋行等合助二千元，怡和洋行买办商议，英商西江船公司拟装运粮食前往广州。……香港救济会今夜设法装出第一批粮米三百袋。中国商会（华商总会）总董已由香港政府许可，将去年水灾赈济款提拨两万元以救灾民。”为此，广东巡按使李国筠致电文刘铸伯等深表谢忱，《循环日报》刊登了李国筠的电报：

华商总会、东华医院鉴：

来牍敬悉，诸安。笃念梓乡热诚急难，公举义绅来省办赈，并得港政府援助，感佩万分。已饬筹赈处水陆警厅预备照料，何日到省乞先电示。谨先电谢，以表欢迎。

广东水灾造成数万人无家可归，刘铸伯的母校皇仁中学堂演剧筹赈，“皇仁学堂学生以此次三江水灾如此惨剧，非筹巨款不足以拯救难民于万一。特组织白话新剧数出，

拟俟东华医院演完后，即在太平戏院开演，连演四晚。并有各白话剧社著名剧员多名助演。闻各值理为：教育司雅额君、夜学堂监督罗富士君及江少荃君等云”。

刘铸伯担任主席的香港孔圣会，这时也组织筹赈队，“竟日疲劳至下午十时，乃在香江晚饭。该项全由李瑞琴君报效。又是次公举黎晴轩君为督队长云”。《循环日报》按：“尚有港闻，如孔圣会筹款赈灾之热心、孔圣会今晚演说灾区详情、广华医院劝捐赈灾第二次告白、第二批捐款列、来函照录、域多利戏院、石矿嘴新环球戏院助赈等报道，不一一细录。”

作为香港定例局议员，刘铸伯还与韦玉（韦宝珊）等华人议员一道，推动香港政府协助救灾。香港政府拨商船维多利亚号、斯丹里号，并向海军当局借拖船两披，以供赈济会应用，办理分散粮食事宜。另据《循环日报》刊登7月17日定例局额外叙会的消息，略谓：

> 定例局前日额外叙会，各局员均出席。港督为主席，且曰：……余今所请本局拨助之款，其数细小，不过稍为表示吾人与邻省政府及其居民，共表不安之忱而已。现目该处之人，所需要者殊非多数之食物因可用钱银购买，惟最要者，则系将粮食运与饥民之方法也。吾人今之所能者，只系稍为帮助输运而已。惟适因战务时候，故未能如太平时尽吾人所欲以帮助船只也。幸而得水师分统拨出拖船两艘，甚为有用，以拖带货艇载运粮食往省。而河内轮船现日未能泊在原日湾泊之处。本港政府又加派灯塔小轮士丹利号，并水巡水轮一艘，以分派赈品与西江一带难民。而域多利小轮则往救赈羊城一带。此次省城请救，本港华人响应甚力。东华医院现已尽力协助慈善各会办理，至于华民政务司则尽其所能代表政府以协助东华医院之人员。现请政府所拨之款，而西人亦当捐助者。将由东华医院总理，会同华民政务司管理。余意除用吾名宣读该决议外，现无别事可言。余深信本局各员之心与本港居民者，共表同情也云。该决议如下：广东省水火为灾，为向来未有之惨象。本局又倡请拨银五万元为捐款，以作赈灾之用。韦宝珊君和议，遂全体通过。

7月18日的《申报》也刊登了定例局额外叙会的消息：“7月17日香港电：今日午后，香港议会提议，从殖民地经费拨洋五万元，以赈粤灾。亨利梅爵士于提出此议时谓，粤灾如是之重，欲施有效力之赈济，颇非易事。兹请议会所赞助之数寥寥无几，不过聊表香港政府怜惜邻省人民受难之意而已。香港政府今已竭其在运送事业上所能襄助之绵力，但因香港刻在战事戒严时代，以致未能遣派多船，如其所欲，殊为憾事云。”

香港绅商赈灾期间，中国电报局托词寻常电报不能迅速递送，以至于香港发往粤省关于赈济电报费按照急电计算。7月17日，华商总会集议反对此事，刘铸伯还以华商总会主席与东华医院总理身份致电香港电局，恳请赈务电报免费。香港电政监督复电：“香港电局送华商总会东华医院鉴：椋电敬悉。查交通部核定赈务电报免费章程，须领有执照方得作准。专处未领执照，敝局未便擅专。惟亘古奇灾，赈急电多，亟宜通融办理。

现拟一面代达大部，请示办法；一面电饬港局先行记账，除候得有部复，再行电告外，即惟查照。至港局索打急电一节，系为灾后寻常通候，商报积压，借图传递迅速起见，并望见原。"

电政监督致港局电云："香港电局：据华商总会、东华医院电，请将此次急赈电报免费。查大部原定赈务电报免费章程，需领大部执照方可作准。该总会医院未领执照，自未便准其豁免。惟千年奇变，诚若原电所言。悭一分电费即多救一人生命，亦不能不稍予通融。刻一面电部请示，一面仰该局遇有前项电报，先行记账，俟得有部复再行遵照。至现时仍需查照大部颁发账务电报免费章程办理为要。"

在乙卯年广东赈灾过程中，刘铸伯发挥了重要作用。据7月28日《申报》报道："急赈已筹备三水有食米二千袋，广州有食米三千袋，以备不虞。东华赈济会已于星期日在三水、肇庆散赈，刻拟与广州赈济会合力办理，以免重复。……东华医院赈济会共募集洋三十万元，加以汤将军之捐洋三十万元，合成六十万元急赈之后，如有盈余，则拟拨充修理各工程之经费。"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广东巡按使李国筠曾经致电刘铸伯：

华商总会刘铸伯先生鉴：

谏电敬悉。赈事赖公及东华医院竭力维持。登高一呼，中西人士闻风响应，非常感激。晤时希代致谢。尤君瑞芝及吴、刘两君到省，自当接洽商办。

龙济光、李国筠叩

刘铸伯所关心的是同胞的救济与生存，诚如他在《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所言："且民国八年之中，水灾见告者屡矣，而执政者漠然；数月以来，米荒见告者又屡次矣，而执政者亦漠然。若是者又何也？则以若辈心目中祇知有权利，而于斯民之疾苦，久不啻秦越人之视肥瘠故也。苟谋国者哀念民生之多艰，而怵然于政柄不可幸窃，移其连年用兵运动之费以谋人群之公益，当灾害之未至，而思为之预防，及灾害之既至，而思为之挽救，则斯民困苦之状，断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夫以数万万之用兵运动费，不能已乱，而适以召乱，今乃于一转移之间，既有以自尽其为政之责……"

其实，刘铸伯等绅商关心的是广东政局安危与人民福祉，希望省港商业繁荣，对龙济光这样一位横征暴敛、惨无人道的军阀并无好感。据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一书记载：1916年4月到7月间，刘铸伯三次向港督梅轩利报告说，广东商人忧虑龙济光无法维持广州治安，因此他们请求英国干预广东政局，



龙济光（1868—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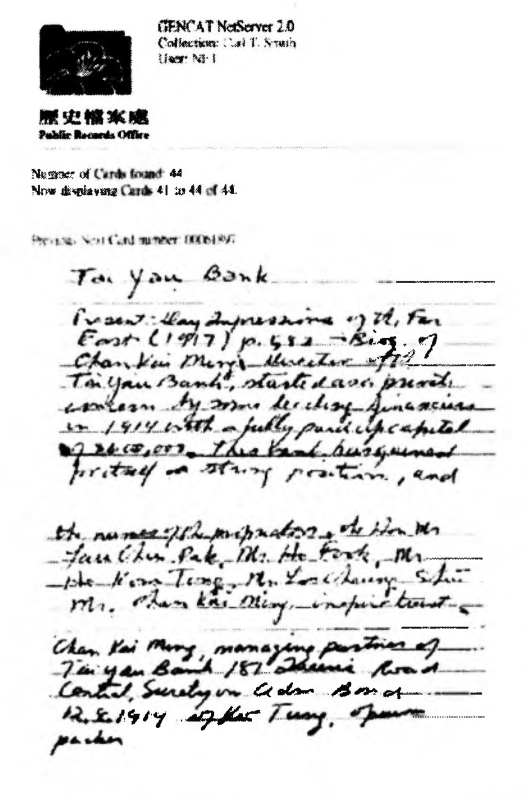
以保护粤民生命财产，恢复商业。港督解释说：欧战期间英国无暇干预粤政。然而，沙面英国领事则顺应粤商的请求，通电驻粤全部“客军”头目，“劝告”他们暂时按兵不动，让龙济光的部队退出广州，以免流血破坏治安。7月末，龙济光再次大肆盘剥之后，将在粤三年收刮的上千万元财产运走，这才施施然离穗，率部前赴海南岛。

第四节　创建华商总会（下）

民国初年，政治腐败，地方军阀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怨声鼎沸。以广东一地而言，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袁世凯为分化广东方面的国民党力量，于1913 年6月14日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于16日另任陈炯明继任广东都督。7月18日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讨袁，7月26日袁世凯下令免去陈炯明之职，改以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掌握广东军政大权，自此至1916年10月被革去粤省督军职位离开省城止，龙济光督粤三年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粤人评判道：“龙济光督粤三年，穷极万恶。”龙济光督粤，亦标志着广东开始沦为封建军阀轮流割据的黑暗年代。

由于内地战乱频仍，许多殷实之家迁往香港避难，带来了大批资金，从客观上来说促进了香港金融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一直以来，香港经济与货币及金融之关系尤为密切。开埠后最初几十年间，香港主要依存于转口贸易，不耕不织，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其对货币金融依赖，不言而喻。

香港开埠未久，总部设于印度


GENCAT NetServer 2.0
Collection: Carl T. Smith
User: NF-1

歷史檔案處
Public Records Office

Number of Cards found: 44
Now displaying Cards 41 to 44 of 44.

Previous Next Card number: 0006189?

Tai Yau Ba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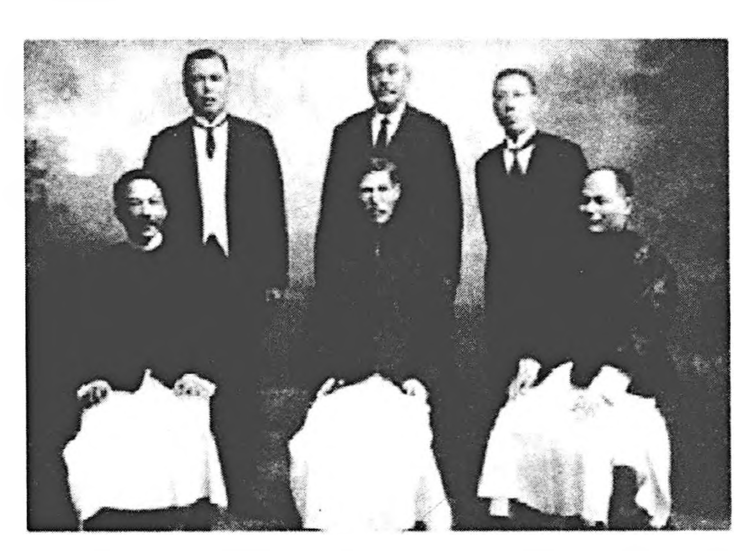
Present-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1917) p. 582 [illegible]
Chan Kai Ming [illegible] Tai Yau Bank [illegible] in 1914 with a fully paid-up capital of [illegible] [illegible] position, and

the names of the [illegible] Mr. [illegible] Chun Pak, Mr. Ho Fook, Mr. Ho Kom Tong, Mr. Lo Cheung Shiu, Mr. Chan Kai Ming [illegible]

Chan Kai Ming, managing partner of Tai Yau Bank 182 [illegible] Road Central, [illegible] 1914 [illegible] Tung, [illegible]

香港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处所收藏大有银号档案

孟买之东藩汇理银行即来港开业。其后二十年，随着香港贸易的扩张，又陆续有多家以英国或印度为基础的英资银行，来港开设分行。1865年，由本港外籍商人创立之汇丰银行开业，成为首家总部设于香港之银行。当时市面上之英资银行已有十家之多。次年，英国及印度发生金融危机，本港亦出现经济不景，引致6家在港经营的银行倒闭。后来，东藩汇理银行亦于1884年歇业。与此同时，其他外资银行亦相继来港开业。开先河的是1884年开设分行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到1900年止，又先后出现了日资、美资及荷资银行的分行。



前排左起：刘铸伯、何东、何甘棠，后排左起：何福、陈启明、罗长肇

至于华资银行的成立，则要等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第一家是由美国归侨1912年创立的广东银行，第二家则是刘铸伯1914年发起成立的大有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共出现了八家在香港注册的华商银行，而在国内或南洋注册的华商银行亦纷纷来港开业。

刘铸伯1914年发起创立的大有银行（Tai Yau Bank Limited），可说是各种关系网结合在一起的升华。刘铸伯与该银行的创办人何福、何甘棠、罗长肇、陈启明等，同属买办出身的原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又是香港华商总会领袖人物、东华三院骨干成员，何东曾经在1898年出任东华三院主席，何甘棠则在1906年出任主席，二人均对该院的建设做出过贡献。至于冼德芬（1908）、刘铸伯（1909）、陈启明（1910）、罗长肇（1915）、何世光（1919）及罗文锦（1929）等，同样曾经担任过主席，也曾做出过重大贡献。其他如谢家宝、黄金福及罗长业等则曾经担任总理职务，并参与了东华三院的院务管理。

总而言之，大有银行大发起人、创办人，既是在中央书院度过美好岁月的旧同窗，又属同僚、同胞、兄弟或姻亲，实在是旧雨新知、戚情深厚。他们一起做生意，正好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所强调的“自己人、信得过”原则，一方面可以减少内部冲突，另一方面又可增加企业的凝聚力。

大有银行筹备创立之际，刘铸伯刚获委任为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刘铸伯卸任后，其立法局华人议员职位由何福继任；何福之后，又由罗长肇之子罗文锦及罗文惠接任，可见该银行的主要股东一直与港府关系紧密。

刘铸伯联同其他华人绅商如何福、何甘棠、罗长肇及陈启明等人，在1914年宣布集

资60万元，创立大有银行，这是继广东银行之后，第二家由香港华人集资创立的银行。可能是因为筹备期间，何东大病未愈，也可能是何福和何甘棠已充分代表了家族利益，何东本人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银行的股东名册之上。虽则如此，何东家族将投资网络拓展至银行金融业的情况，则显得清楚易见。并且，上页这张照片，或许就是大有银行时刘铸伯与何东等股东的合影。

大有银行创办两年后，刘铸伯还与另一位中央书院毕业生简东浦开设德信银号。简东浦毕业后前往神户，就职该埠之正金银行，继而在国际银行（万国宝通银行的前身）工作了几年。回港后，于1916年与刘铸伯开设德信银号，而现代化银行的构思就是创立德信后不久形成的。

稍后，刘铸伯又与简东浦参与创办了香港历史上第三家中资银行——东亚银行（1919年）。创办人主要是和发成船务公司老板李冠春、李子方兄弟及德信银行号东主简东浦。此外，尚有和隆庄的庞伟廷、殷商周寿臣、昌盛行的黄润棠、有恒银号的莫晴江、晋昌号的陈澄石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英甫等。

香港华商总会成立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国庆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在得到德国的支援后，于1914年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一战爆发时，中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政府宣布保持中立。1914年9月2日，日本宣布对德宣战，派兵在山东龙口登陆。11月7日占领青岛。日德在山东的冲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唯一波及中国的战事。1917年8月14日，北洋军阀冯国璋政府宣布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但是，中国并没有向主战场欧洲派出军队，而是向法国和俄国派出大量民工执行战场勤务工作。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中国民工做出了重大牺牲。

在欧洲的战场上，英、法、比军队同德军对抗的西线，俄国军队同奥匈、德国军队对抗的东线，是主要战线，其中西线的战争具有决定作用。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的英国，很快以防止物资流入敌国为由，宣布限制其殖民地的进出口业务。禁运实施后，香港各行业大受打击，主营转口贸易的南北行、金山庄更是首当其冲，华商叫苦不迭。

而在香港，港英当局也进行了战争总动员，成立了国防局、征收轮船战务用品局、战务恤款局、粮食价值稽局等战时机构。刘铸伯先后担任国防局员、粮食价值稽核员、征收轮船战务用品值理、战务恤款值理兼干事员，“皆能衡量事理，审查情势，调剂中外，而克协其平，故万端坌集而事无不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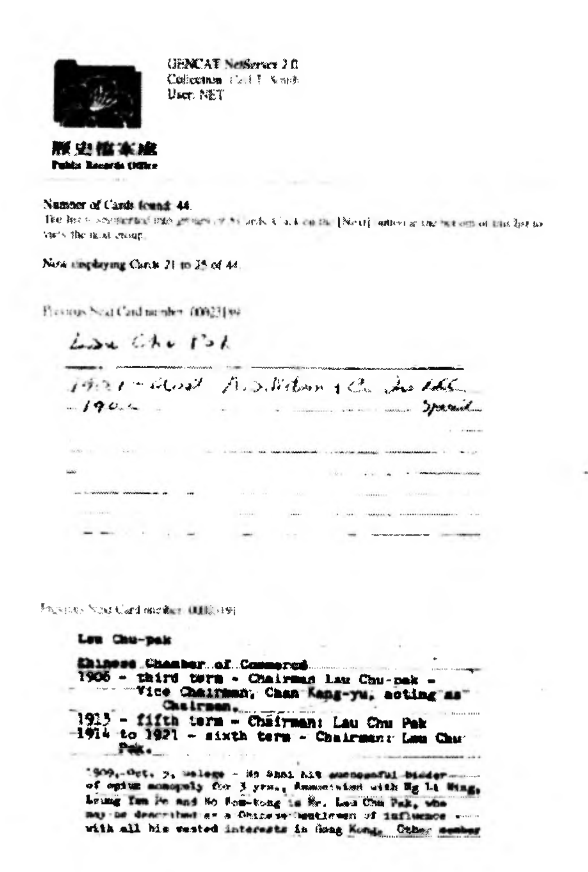
1914年初前后，西方列强备战备荒，斥巨款囤粮，南洋等传统产粮地被搜刮殆尽，米行无粮可进，导致香港米价突涨，最高时竟达每担30元，打破有史以来的纪录。战火燃起后，香港商务受到冲击，人心不稳，储户在银行前大排长龙挤兑，物价急涨，米价更高，米行周转之难可想而知。

眼见全港华商情势险恶，刘铸伯委派叶兰泉主持与港府的交涉活动，力求自保，渡

过难关。多年以后，叶兰泉忆述了两次事关重大的谈判：其一，香港华商历来由星洲（今新加坡）大量转运椰油，1917年存货总值约40多万元（当时币值），某日忽接港英海关监督指令，称英国政府来电禁止货物再出口，“以防资敌”云云。华商彷徨无计，只有向总会求助。叶兰泉陪同受累众商家一起拜访海关监督，费尽口舌，解释一切，不外乎是椰油只是转售中国内地人民食用，与战事无关之类。最终说动海关高抬贵手，华商们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其二，同年6月，英国驻印度总督又来电要求禁止自星洲经香港转运的花生入口，当时此项货物在港存货共80余万担，主要由南北行经手，“噩耗”传来，众商束手无策。叶兰泉又亲身去找海关监督，前后交涉两周之久，才由对方与英印当局商议，获得通融放行，华商始侥幸逃过一劫。

一战期间，香港华商受累于远在万里之遥的战火之外，中日两国关系的再度紧张也给香港华商带来麻烦。日本趁对德宣战之机，出兵强占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袁世凯北洋政府抗议无效，反而迫于压力，在1915年5月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发国内反日浪潮，海外华商亦愤而响应“抵制日货、振兴国货”运动。

但是，香港及东南亚一些华商，也被无辜卷入这场风潮中，譬如，香港米商福泰号从仰光（缅甸第一大城市）购入白米，市场传闻其为日本米，遭到市民抵制。华商总会派专员调查单据后，还其清白。不料这批白米运到广州，又因同样理由受抗日团体扣押，最终华商总会出面担保才告了结。又譬如，近代工商业史上大名鼎鼎的广东南海籍商人简照南兄弟，因早年赴日本经商并入籍，其在香港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此时被指受日本资金操纵，产品广受国内外华人抵制，以致几乎倒闭。他们唯有向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求助，总会派人调查后，公开发出“并无日本资本在内”的证明文件，“南洋兄弟”这才起死回生。


GENCAT NetServer 2.0
User: NET

Public Records Office

Number of Cards found: 44

Now displaying Cards 21 to 25 of 44

Lau Chu Pak

Lau Chu-pak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906 - third term - Chairman Lau Chu-pak - Vice Chairman, Chan Kang-yu, acting as Chairman.
1913 - fifth term - Chairman: Lau Chu Pak
1914 to 1921 - sixth term - Chairman: Lau Chu Pak.

香港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处所藏刘铸伯与“香港华商总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ed）文献

1919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首先是“粤地歉收，米价奇涨，人心疑虑，大局岌岌”，加以日本“米骚动”运动引发东亚米荒，这对长期依赖粮食进口的粤港地区冲击尤烈，东南亚米及中国安徽米迅即成

为日本和粤港争购对象。此时广东政府已无暇自顾，遑论全省粮食救济，刘铸伯等粤港商人只得再次力肩此任。为与强势日商竞争，刘铸伯与陈廉伯、简琴石、简照南等人发起组织“广东粮食救济会”，他们除个人捐赠5万港币外，还设法担保贷款10万港币用于赈灾。

为从日商手中挤出50万担安徽粮，救济会几使尽浑身解数。刘铸伯以香港华商总会的名义致电北京，要求下令制止安徽将稻米售与日人。他与香港华商还曾求助于交通系魁首梁士诒，敦促他说服安徽省政府允许粮食入粤。为保证米价公道，救济会还想方设法说服沿海各省豁免税收，甚至动员各省粤人社团向当地政府施压。刘铸伯等省港商人“力任艰巨，劳瘁不辞，卒能挽回米荒惨剧”，为此，香港总督特致函刘铸伯等表示感谢。

刘铸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件惊人之举是，为了表示对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联合华商总会成员单位大有银号，捐赠联军一架飞机。据刘富宗等撰《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

> 联军战起，吾国参焉。先考援国民外交之义，协大有银号，赠联军以飞机一乘，已则赠以红十字摩托车一辆，而中英邦交益加亲睦，论者咸以为识大体云。

关于华商总会捐款购买飞机一事，有关史料记载，刘铸伯与何东、何福、何甘棠、陈启明、罗长肇等捐出一架飞机给英国政府之后，再捐出港币50000元，作为港府的战争基金（War Fund），该款折合为4908英镑，港督将该款项的3000英镑购入二架飞机赠予战争部，余下的1908英镑则用以购买多部救伤车，转送英国红十字会。刘铸伯还为英国红十字会（British Red CrossSociety）捐赠救护车，支持该会在战场上拯救伤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章（19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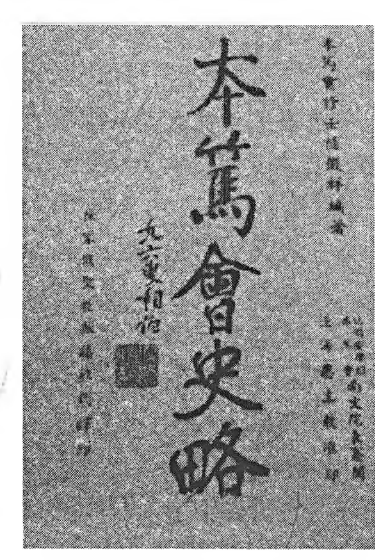
从当年的香港辅政司（Coloruai ecretary）施勋（Claud Severn）在1916 年立法局会议的一项澄清中，还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当时拿出9000英镑购入三架飞机，其中的一半（4500英镑）来自刘铸伯、何东及一众大有银行董事，余下的4500英镑，则由香港市民捐出。无论具体的数字如何，刘铸伯、何东等香港绅商捐出巨款支持英国的行为，赢得港英政府的欣赏。日后，何东、刘铸伯等先后被英廷封为爵士，而且在一战胜利后，获得英国政府以及香港政府颁发的多枚胜利纪念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8月开始，到1918年11月结束，历时4年3个月，战火席卷欧、亚、非三大洲，参战国家地区达34个，受战祸波及的人口达15亿以上，约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75%。双方动员的兵力达889个师，共计7400万人，共有840万人阵亡，另有2100万人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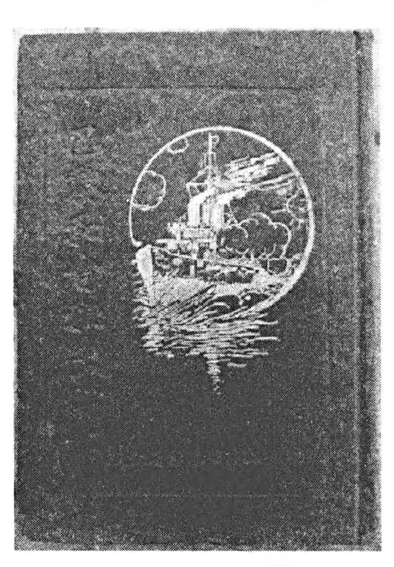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共27国参加，苏俄未被邀请。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也成为战胜国之一。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有五个全权代表，其中有担任团长的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祖。巴黎和会竟然将德国在山东权益交给日本。

巴黎和会戳穿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铁律。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掀起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这场爱国运动的结果，是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陆征祥《本笃会史略》，1935年出版


《巴黎和会秘史》（狄隆著、秦翰才译），上海世界书局1921年出版

1919年6月28日，“三巨头”美国威尔逊、英国劳合·乔治、法国克里孟梭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了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中国因巴黎和会对于中日青岛问题无法解决，进而爆发全国反日的五四运动，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但与德国另外签订和约。

《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得到国际联盟的承认后，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1919年，香港庆祝世界大战结束得以天下太平，到处张灯结彩，庆祝日那几天，每天放两次烟花，各个社会团体举办盛大花车游行。香港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的花车前面，饰以繁体的“刘”字。



1919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香港举办盛大花车游行，这是香港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的花车（选自《一十年代香港民生——街景》）

1920年1月18日，参加巴黎和谈的中国代表陆征祥、王正廷、魏宸祖乘法国波打士船抵港，各界登船欢迎。当天晚上，王正廷应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邀请，赴华商总会发表演说。1月21日，《申报》节录王正廷演讲大意：

> 我国未得良果，因宣战不派兵，虽有华工效力，然国无实力，致处三等国地位。鲁案不签字，各国谓我无此胆大，实乃我生死问题，签固死，不签亦死，宁持不签。今各国已能谅此苦衷，美参院保留，英法有表示，乃国际好机遇。然外交变幻，结果难料。但信各国此后对我必有特别真诚，乃全国一致之效。外人每诘目下南北问题如何，心极难过，甚愿要人消权利、除意见，一致对外，中国方有望。迩来地方文牍报纸言中国腐败，实自灰心耽误。欲保国不亡，惟有铁煤两事。我国如许矿产，望政府切实保护，人民自奋，急速开采，敢言十年后国必强。

1921年，在华盛顿举行了九国会议。会议决定日本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

1918年11月11日，欧战结束。香港华商利用战火蹂躏后的欧洲工业衰疲的空当，大量拓展国际市场，经济渐趋复苏。1919年，英国货在中国市场上卷土重来，尤其是内地各埠大量订购洋布，使香港布匹业全年火爆。同一年，“五四”运动爆发，海内外华人再度掀起抵制日货、购买国货的热潮，从事转口贸易的香港华商接单量大增。直到震动



王正廷（1882—1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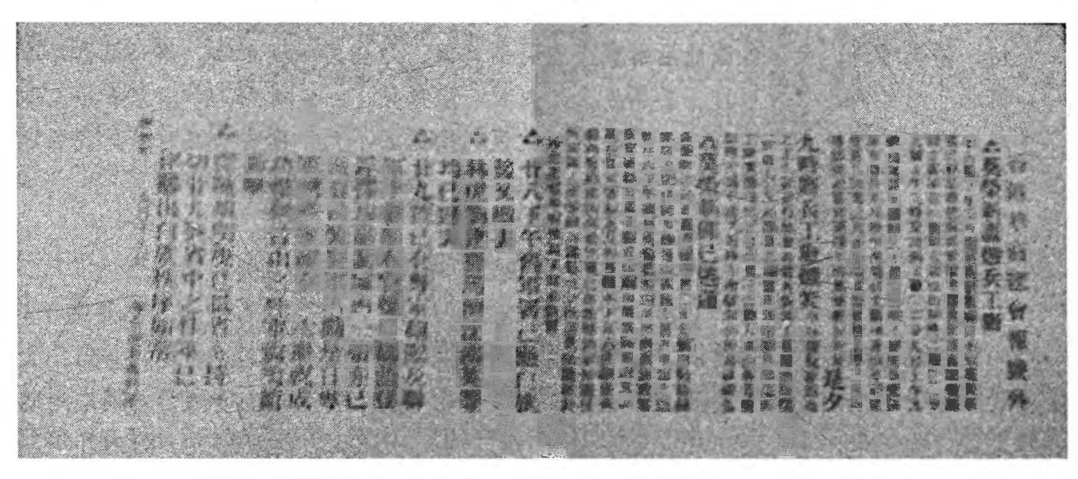
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发生前夕的1924年，香港航运总量攀升至3500万吨以上，比战前最高的1913年，增长近55%。

商务信息，瞬息变幻。1919年初，刘铸伯提议创办一份替香港华商总会传播商业消息的机关报，这时《中外新报》（香港及全中国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面临停刊，刘铸伯接手后改组为《香港华商总会报》，作为全港商人喉舌，专门报道商务消息。

《华商总会报》创刊后，由冯焕如任督印人，内容有商务、论说、时事、本省商务要闻、京外商务要闻、外国商务要闻、本港要闻等。刘铸伯聘请清末民初著名报人谭汝俭担任编辑撰述之役，两人时常一起讨论战后国际国内局势，对于民国初年大行其道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尤为痛心疾首。据谭汝俭说："其时适俄国过激党，来华阴相勾煽，我国暴烈魁硕，群起而应之；南北各省，罢市罢工课之事遂纷纷而起。刘君尤引以为忧，谓：'后生小子，中于邪说，势必害于而（尔）家，凶于而（尔）国，其究竟归于自贼。'相与欷歔太息久之。"

同年，谭汝俭把自己与刘铸伯切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陆续整理成文，在《华商总会报》连载两月，反响强烈。此后，华商总会报社出版单行本，以就正海内，是为《社会主义平议》（见本书第六章第三、四节）。

刘伯1922年去世后，华商总会无意继续办理《华商总会报》，后由岑维休（育才书社毕业生）、陈楷等承购，易名《华侨日报》。《华侨日报》后来几度易主，于1995年1



《香港华商总会报》1920年9月出版的一张"号外"

月12日停刊。

刘铸伯对华商总会贡献奇多，之后数度连任，迄至逝世，连续十年担任主席，奠定华商总会的规模。《香港中华总商会史略》说："刘铸伯君自1913年至1922年连任主席，在任十年期间，会同值理同人，锐意发展会务，致力公众福利事业。如申请在香港仔开辟华人永远坟场，1914及1915年赈济西北江大水灾，1917年赈济华北水灾，1918年马场大火，罹难千人，申请于咖啡园建筑罹难者公墓，1919年为宣传会务，联络商情，与《孖刺西报》合办《华商总会报》等。由于会务发展，于1920年购得干诺道中六十四号楼宇一幢，1922年迁入新址，是年9月又购入毗邻六十五号楼宇，扩充会所。"

作为华商总会的创始人和资深的华商领袖，刘铸伯的地位与声望无人能望其项背，就连容闳的留美幼童周寿臣也尊称他为"老前辈"。1922年5月刘铸伯去世，接任主席之职的李葆葵在评价他时说："刘君以华商公局为华侨领袖机关，非扩大之不足以提挈华侨、振兴商务，于是发大愿力，联合同人，改组华商公局而成华商总会，自是而后，刘君致力会务，到底不懈，主席十年，为有会事鞠躬尽瘁之慨……以今日本会成绩之优美、名誉之隆大，下而至于局面之堂皇言之，弟意为非得到刘主席之提挈，未克臻此。"

香港华商总会成立后，秉承联络感情、拓展商务，与外商竞争的宗旨，一时间拥有上千家成员单位。刘铸伯深感"本港商号，星罗棋布，中西互市，轮泊之繁多，渡船之鳞比，路轨之接连，万商潮涌，百货云盈，实为我南方商场之一大枢纽，其中有谋莫达、问道无从者，实居大多数。况近日中外商号，多欲直接购买我国货物，因未悉本港商行名号住址，故年来之函请本会代查及介绍者，日见其多，烦于应付"，因此，香港华商总会有关于编撰香港华商名录之议。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旋即爆发，香港百业凋零，此议只能搁置。而在一战结束后，香港劳资纠纷风潮不断港，华商总会屡屡出面调停，疲于应付，编撰香港华商名录之议一再搁置。

省港大罢工结束后，香港华商总会重提编撰香港华商名录之事，"提议调查全港商店，举办人名录以利推广我华人商业，讨论再四，均公认本港商店人名录之编刊，为发展商务至为重要之书，无论如何应当速办"。于是，从丙寅年（1926年）四月开始，派人着手广为调查，历十余月之久，始克告成。

《香港商业人名录》厚达1600个页码，1927年出版，是香港出版的第一部商业指南，正如编者弁言所云："举凡香港各湾及九龙、油麻地、红磡、尖沙咀、旺角等处所有中西商号住址，及营业种类、店东司事之姓名，商号无论大小均一一刊载，务求详尽，即本港之衙署及中西之社，亦旁及无遗，以备随时检查。至本商会之同人录，亦为附入，更于各号之广告加以美术，以企动目而广招徕，于推广本港商务大有裨益焉，本港商店固应手执一编，即国各埠商店亦须置一册，将见无远弗届，重洋宛在目前，素昧平生，开卷便同面识，其利变中外行商为何如耶？"

刘铸伯是香港宝安商会创始人。《香港商业人名录》出版时，他已经去世5年，其长子刘德谱此时担任宝安商会副主席。该书第52页收录"宝安商会"简介，据此可知商会

香港華商總會舉辦全港商店人名錄書成弁言

本港商號星羅棋布中西互市輪舶之繁多設船之埠以路航之接連萬商瀾湧百貨雲壘實為我南方商場之一大樞紐其中有謀異途問道無從者當居大多數況近日中外商號多欲直接購辦我國貨物因未悉本港商行名號住址故年來之函請本會代查及介紹者日見其多頻於應付則本港商店人名錄之舉殆實不容議然各處之人名錄亦有登載本港商號惟均略登載未能詳悉亦等於無本商會有見及此亟為提議調查全港商店纂輯人名錄以利推廣我華人商業討論再四均公認本港商店人名錄之編刊為發展商務至為重要之事無論如何應

香港华商总会编的《香港商业人名录书成弁言》


各邑商會

FOREIGN AND CHINESE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香港华商总会编的《香港商业人名录》中的“宝安商会”

办公地点为四楼，电话为1538，宝安商会主席为容闳留美幼童周寿臣，副主席林国香、刘德谱，司理陈鉴坡、王少南，司库陈楚卿、陈如山，书记刘翼臣。

1935年，香港华商总会申请注册为有限公司，同时把英文名字改为“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到了1950年，再改为“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1952年，中文名字又相应改作“香港中华总商会”。中英文名字遂沿用至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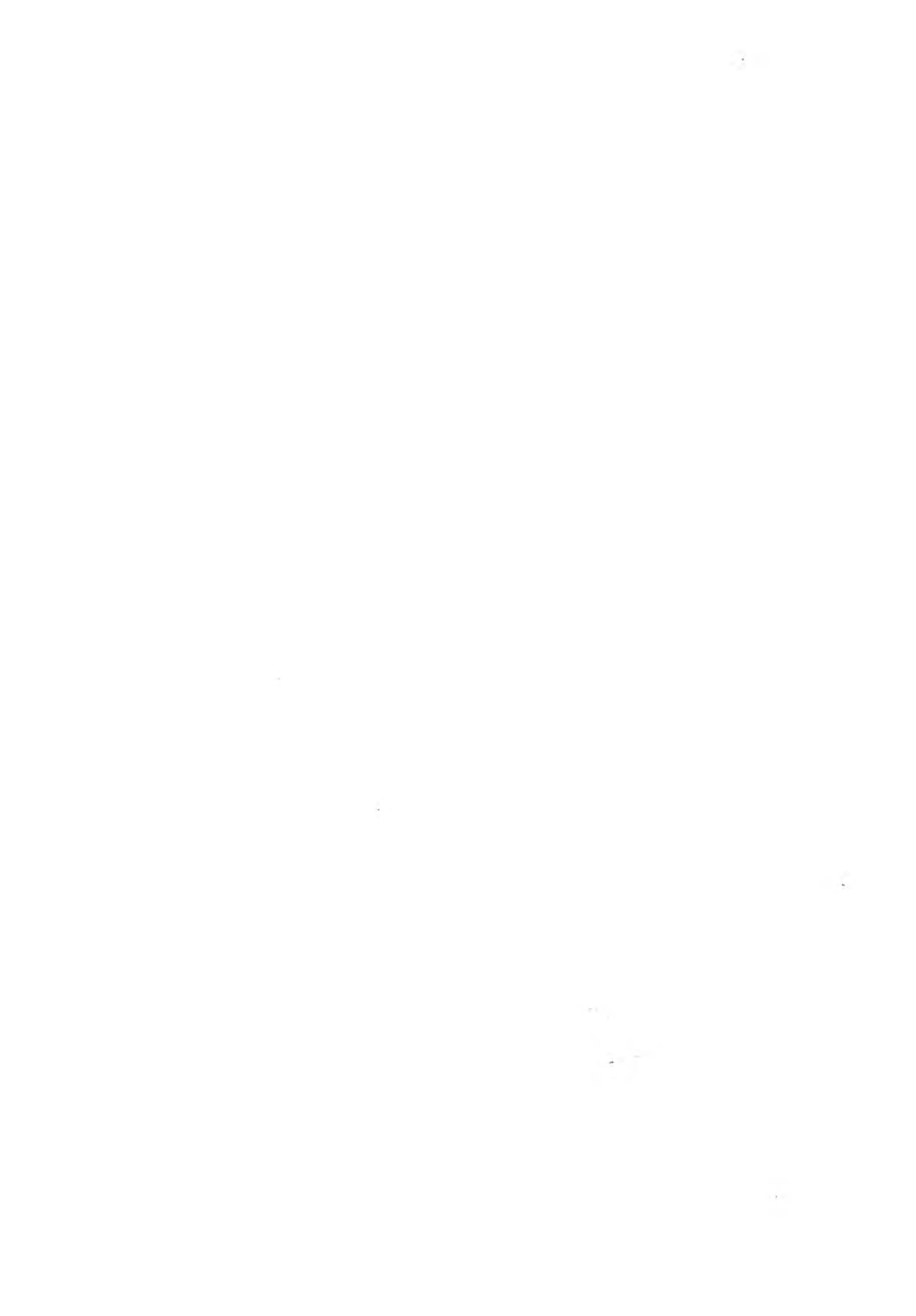
香港华商总会办公地点今位于香港中环干诺道中24-25号4字楼。作为一个非牟利华商团体，它目前会员人数逾6000名，其中包括团体会员、商号会员及个人会员，会员遍及香港各行各业。商会宗旨和目标：促进工商业发展、繁荣香港；维护香港工商界权益；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工商界意见；加强地区和国际间的沟通和联系，促进经济合作。该会创立以来，致力为商界提供工商业资讯交流的机会，促进国际间的沟通和推广工商贸易。与世界各地的商会，特别是海外华人工商社团保持密切联系，其中与内地商会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推动内地对外贸易及促进国际对华投资方面，一直扮演活跃的角色。

香港中华总商会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表达香港商界意见，该会在立法会、金融管理局、信息科技及广播局、教育统筹局，以至众多公共和工商团体均有代表，例如香港贸易发展局、廉政公署、香港食品委员会、香港付货人委员会，以及特区政府辖下之人力发展委员会、劳工顾问委员会等。此外，政府各部门与亦经常保持联络，特别是涉及工商范畴的政策，均征询本会意见。该会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工作，致力保持香港稳定繁荣，实践“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2000年，香港中华总商会举行成立100周

年庆祝活动，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惠赐墨宝题字，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临香港致贺，中央政府多个部门、各省市政府负责人，以及内地、澳门、台湾及世界各地40多个华商代表团体逾400人莅港祝贺。

跨入21世纪，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全球经济发展迈向一体化。香港中华总商会秉承与时俱进的宗旨，与会员携手，开拓商机，推动香港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效率的、与国际市场有紧密联系的现代化大都会。当然，人们忘不了华商公局主席、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等人，当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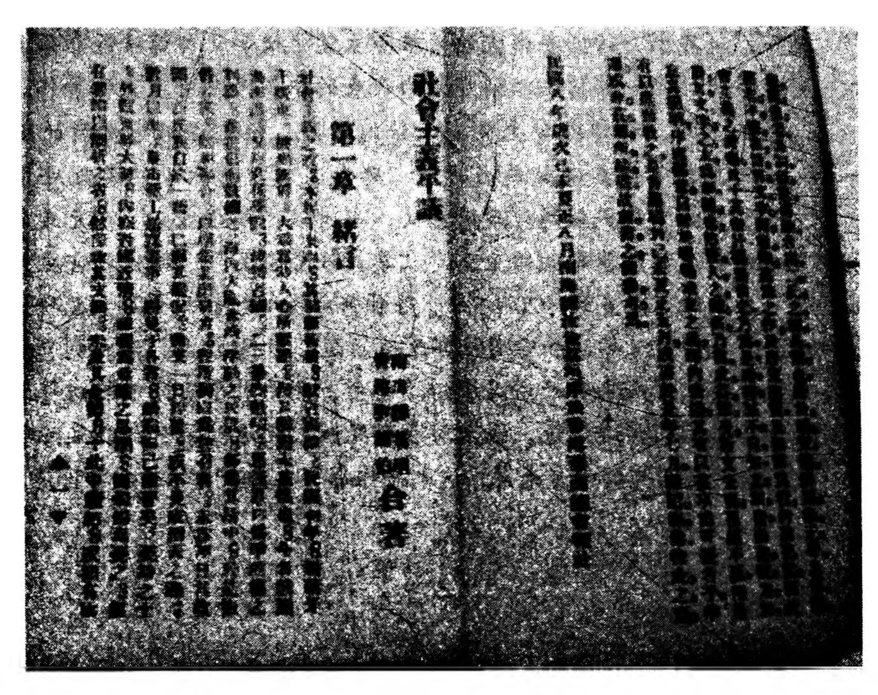
第六章　今我来思

刘铸伯生长于香港，幼习“旁行文”（英文），博涉西籍，对于西洋政治、法律覃精研思，遇事剖析，毫芒曲折毕赴，闻者称为辩才。他的演讲、访谈、书信、文告等文字，散见于当日的报刊；此外，他还出版了《自治须知》《西礼须知》《社会主义平议》等三部当时较有影响的著作。

其中，191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平议》（与谭汝俭合著），是较早出现的一部抨击以刘师复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该书出版之际，科学社会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他们在书中批驳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当时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刘师复等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当时以“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大同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名目出现）。直到1920年5月，陈独秀才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同年 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才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总之，无论对于研究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研究新文化运动前夕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历史的学者来说，这本著作都不失其珍贵的文献学价值。



刘铸伯《自治须知》（1907年出版）书影


社會主義平議

第一章 緒言

刘铸伯《社会主义平议》第一章《绪言》（1909年出版）

第一节　西礼须知

刘铸伯生长于香港，幼通英文，博涉西籍，闳中肆外。据《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记载："香港隶英版图，而我华人之侨居于是者，凡数十万，故政治之良楛，咸我华侨身受之。中西政俗互异，港吏以为善者，我华侨或不乐受。先考深有见于此，即慨然思有以自效，自毕业后，浮沉于士商者十年，而学行言论，已翘然异于众，中西人士咸倚重之，每遇艰巨，皆引先考为助。"

他的演讲、访谈、书信、文告等文字，散见于当日的报刊；此外，他还出版了三部当时较有影响的著作，据《行述》记载："……（刘铸伯）治事之暇，亦间事著述。以中西异礼，交涉恒衍，召侮取讥，衅隙斯伏，乃著《自治须知》一卷、《西礼须知》一卷、《社会主义平议》一卷……皆已刊行于世。"

近代以降，中西接触渐多，西方礼俗渐为国人所知，关于西方礼俗的介绍、评论日渐增多。斌椿、郭嵩焘等使西或西游的人，对西方的礼俗见之更多，晓之更深，多有介绍。晚清介绍西洋礼俗最为详备的有三本书，前两本为《西礼须知》《戒礼须知》，均由传教士傅兰雅译编，第三本是刘式训译编的《泰西礼俗新编》。

《西礼须知》《戒礼须知》均于1886年翻译出版，傅兰雅称此二书原为英国名人所著，1866年出版，略论英俗之得失，民仪之是非，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

刘铸伯所著《西礼须知》一书出版年代久远，遍觅不获，但从《行述》"以中西异礼，交涉恒衍，召侮取讥，衅隙斯伏，乃著《西礼须知》一卷"这段文字看来，它同样是一部译介西方礼仪习俗的著作。尤为难得可贵的是，五四运动前夕，《西礼须知》成了赴法勤工俭学人员了解西方礼仪习俗的入门书。

五四运动前夕，赴法勤工俭学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热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大批有志青年毅然漂洋过海远赴异邦，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当时，毛泽东等也积极动员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8月，毛泽东率领一批学生来到北京，在打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中，湘籍人士最多，经杨昌济的协调，获准首先为之举办一期预备班。何长工的《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的建立》回忆，毛泽东在杨怀中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存在俄国道胜银行的利息提取出来，用做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

据朱少伟《毛泽东对赴法勤工俭学的贡献》（《人民政协报》2011年4月14日）介

绍：1919年春，中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启程。著名进步团体“寰球中国学生会”热忱为聚集申城的各地青年办理出洋手续，还赠送《西礼须知》等书，并提供种种服务。3月14日，毛泽东为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第一次来到上海。3月15日，《申报》报道：“出洋学生办事处即设在静安寺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闻此次所派留法学生多至八十九人，兹已陆续到沪，定于17日上午乘‘因幡丸’出发，并闻今日下午开一欢送会。”翌日，《申报》接着记述欢送会的情形。毛泽东参加了这个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今上海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附近）举行的欢送会，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刘铸伯的《西礼须知》，成了蔡和森、萧子升、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萧三、蔡畅等赴法勤工俭学人员了解西方礼仪习俗的入门书，这是一件令人啧啧称奇的事情。

第二节　自治须知

刘铸伯的第二本著作《自治须知》，与清末的“立宪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所谓“立宪运动”是指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时间跨度从1905年至1911年，目的在于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派载泽等分东西洋考察政治”，直陈朝廷的难局：“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1906年8月26日，出洋考察大臣载泽等上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该折阐述了最重要的立宪之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其中写道“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今州县辖境，大逾千里，小亦数百里，以异省之人，任牧民之职，庶务丛集，更调频仍，欲臻上理，戛乎其难。各国郡邑辖境，以户口计，其大者亦仅当小县之半，乡官恒数十人，必由郡邑会议公举，如周官乡大夫之制，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捍格不入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丛。宜取各国地方自治制度，择其尤便者，酌订专书，著为令典，克日颁发，各省督抚分别照行，限期蒇事。”

就在载泽等上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的同一天，端方亦上奏“请定国

是以安大计折”，以俄国为例，鼓励清朝当局不光要积极立宪，而且还得积极脱离专制政体，“取任人而不任法者，一变为任法而不任人”。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名为《宣示预备立宪谕》的诏书。这道诏书里赫然指出，“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宣布要“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1907年，清政府提出要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各地主张立宪的政治团体陆续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提出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诉求。

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十年后实行立宪”。9月，各督、抚次第奏报举行各省咨议局选举。

清政府实行宪政的姿态，在统治阶级中引发了一场议论宪政的热潮。清政府多数官僚认为，欲仿行宪政，应以实行地方自治为基础。正是这种国人共同的要求，使地方自治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形成一股社会思潮，“于是地方自治之说，随为吾人视线之所集，而群谋之所同”。

在全国上下实行地方自治的呼声中，清政府决定将地方自治作为筹备立宪的重要事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随即发布上谕，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清末的地方自治分为两级，城镇乡级自治为下级自治，限五年内初具规模；府厅州县级自治为上级自治，限七年内一律成立。规定先行在城区进行自治实验，嗣后再推至乡镇。但因各地情形不一，也有变通办理者。

为了推动地方自治运动的开展，清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十六日颁布《自治研究所章程》，责令于各省省城及各府厅州县设立自治研究所，以“讲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此外，还将“城镇乡应办自治各事，演为白话，刊布宣讲，以资劝导”。这就为地方自治做好了人员和思想的准备。次年，清政府又颁布《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及其选举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使自治政策更趋完善。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的制定，使地方自治成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有力地推动了方兴未艾的地方自治运动，从而在全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风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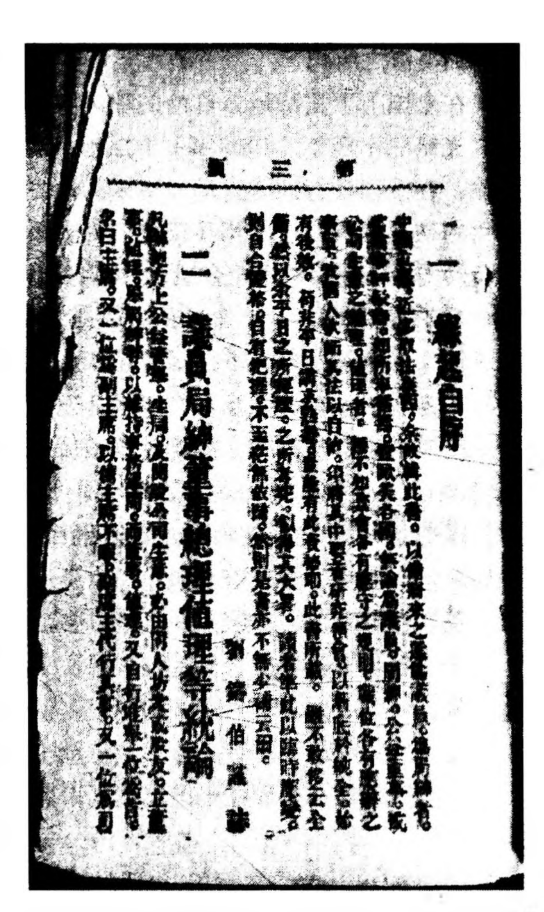
就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之下，刘铸伯出版了《自治须知》一书。



刘铸伯《自治须知》（1907年）书影

《自治须知》封面作者署名“香港铸伯刘鹤龄订”，此外尚有“丁未年菊月”“经已注册，复印必究”字样。作者署名“香港铸伯刘鹤龄订”不难理解，“铸伯”是他的“号”，刘鹤龄是他的名。“丁未年菊月”则指的是1907年农历九月，农历九月菊花始放，古人以故称为“菊月”。“经已注册，复印必究”八个字却令人啧啧称奇——刘铸伯那时就具有了版权意识！

陆子初为该书所作《序言》说：“于情理中有一定之主宰者，曰‘例’；于情理中有肆应之神化者，曰‘权’；利与权固相辅而行者也。然惟熟例，乃能用权，否则涉于游移，了无把握，自谋且不济，何有于办理公益哉？即如近日之言爱国者，组织自治会，以为立宪之基础，而于此中之规则，容有未知，容又未尽，似是而非之处，所不免焉。夫本身之资格，尚苦未深，应守之章程，尚苦未熟，而欲其彼此融洽，相助为理也，抑亦难哉！刘君铸伯，深知其然，爰将其所经历，及所研究有得者，笔之于书，一标其准，阅者奉次以为圭臬，则所有应尽之规矩，应办之事宜，无不措之俗如，各尽其职，宁止得其仪文已哉？仆见乎世之竞言团结者矣，歃血未干，全体已痿，此无他，不知守例，并不知从权耳。刘君此书，两者俱括，其足为自治之津梁者，不诚伟欤？此书既成，仆得就读，劝其梓行以问世，而刘君恐以贤智先人。仆曰：‘非是之谓也，有开必先，其勿自秘，如不公之于世，如平日之热心义务何？’刘君曰：‘诺。’乃发梓，仆亦不揣庸陋，弁以数语。”


第三頁

一 緣起自序

二 議員局紳董事總理值理等統論

劉鑄伯識

刘铸伯《自治须知》（1907年）“缘起自序”

序言作者陆子初事迹不详，他或许是刘铸伯的密友，对于清廷主导的“立宪运动”抱有幻想，而且对一些地方组织的自治会，以及开始推行的地方自治利弊有所了解，所以才有“夫本身之资格，尚苦未深，应守之章程，尚苦未熟，而欲其彼此融洽，相助为理也，抑亦难哉”的议论。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具体的、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所有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决定了人的本质，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其中之一就是他的政治属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政治的产物，

商人尤其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更何况刘铸伯学富中西，留意政局时事，并且他当时的官方头衔为“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候选道”，对于清政府将地方自治作为筹备立宪的重头戏这一举措，岂能等闲视之？于是，他根据自身平日的研读与经验，写成这本操作性很强的小册子。

阅过《自治须知》书稿的人，将其奉为圭臬，陆子初就是其中之一，认为“堪称自治之津梁”，劝说刘铸伯早日出版。于是，《自治须知》付梓前夕，刘铸伯写了篇“缘起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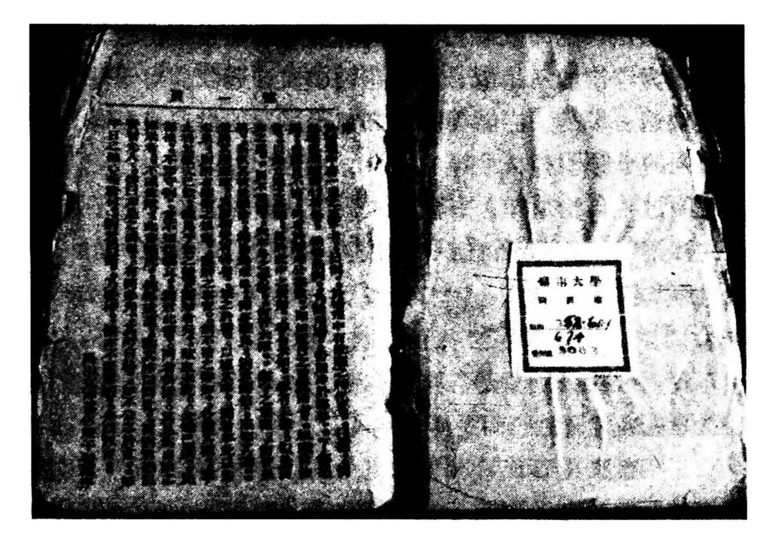
> 中国立宪，近多取法泰西，余故辑成此书，以备将来之选为议员、为局绅者，当论事评驳时，知所率循焉。
>
> 查欧美各国，无论为议员、局绅、公益董事，或公司生意之总理、值理者，无不知聚会各有应守之规则，职位各有应办之事宜。我国人欲师其法以自治，须将其中要着研究领会，以渐底于纯全，始有后效。苟非平日讲求熟悉，岂能有此资格耶?
>
> 此书所载，虽不敢侈云全备，然以余平日之所经历，之所考究，似得其大略，读者准次以临时应变，则自合体格，自由把握，不至茫无依归。然则，是书亦不无少补云尔。

《自治须知》分为议员、局绅、董事、总理、值理等统论，主席之职守及辩论次序，议事应遵守之规则，决议各案记事格式拟稿等十章，全书体现出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该书第十一章《公举议员局绅规则》规定，议员由选民自由公举：“政府先立定选举之规则，晓论民间，以何等人格，方合投举，其格则以民之产业厚薄，及手艺事业之高低而定。遇有议员局绅缺出，如其人确系才品兼优，平日能孚众望，且办事坚定果决者，即可预选。至举之之法，由众人相知有素，同般勤驾者，固属甚善，即人未周知，而其本人好义勇为。自请于合格投举者，以为吸引，亦不得谓之干进，盖为众事，不容自诿，而当仁不让也。比至投举之期，政府预先出示，定于某日某处公举，又详谕以投举之格式，俾众知遵，其时坊众报纸，必有议论，采以为的，自有定评，庶免偏好偏恶之弊。届期则由政府派有司赴会，司理弹压等事，将到场投举之人，姓名住址，详为录出，每人给以一票，为投举之用。”

《自治须知》规定，议员议决问题取决于多数，同样不失民主精神，为此，第五章《议事应遵守之规则》列明条款27条：

> 一、叙会日期，多是每月两次（或多次，或少次，届时自订可也），此等叙会，名曰“平常叙会”，议院及公局叙会，均听报馆记事人，暨街众人听。
>
> 二、每次叙会，须发布告纸，预早三两天，送给同人。
>
> 三、每次叙会，于未开议之先，宣布员即将上次所议决各案，对众宣读，看有

无错记。如无错记，主席即签名作实。当宣读时，同人不得辩论，只可将其错处指出，请为更正。如或所记之案，有不应记而记者，有辞意不妥者，可准同人倡拟与和拟，将其删去，或另行更录，仍由众议决。如上次之决案，已有列出送给同人，宣布员则毋庸宣读，主席只问合否，如合即签名。



刘铸伯《自治须知》（1907年）序

四、上次决案签名后，宣布员即将是会议案之布告宣读，依布告所列之次序，先读一案，俟此案议决后，再读第二案。余仿此。

五、凡遇有紧要事件，须同人裁决者，如主席不暇或他往，则副主席可随时随事，邀集同人叙议，名曰“额外叙会”。同人有三位，或五位，用名邀请，亦可设此等叙会（额外叙会，不将上次平常叙会之记案宣读），但额外叙会之议案，亦须预早列送同人。

六、主席须照规则，以便弹压争执，遵引利赖。至同人中谁应先言，谁应后言，则在于临时偏观形色，自行裁决可也。凡遇倡拟或改拟，须有和拟后，方准辩论（上文已将主席之职守处详述）。

七、倘或同人喧闹，主席弹压不遵，尽可展期再议。主席离位，便算完场。

八、凡同人争断事件，如两造相对，人数平等，主席可择加一筹，以决取舍。

九、凡于平常叙会时，同人自己另有题目倡拟，不列在议案布告者，须于叙会前，迟不得逾期两天，将其题目书明，函知宣布员，俾遍送同人，方准列入议案同拟。

十、有时因有事不能即决，必须考查究问者。主席或同人，可倡拟委三几位同人查办，名曰“分任值理”，该值理于复报时，其自举之主席，自可在场倡拟，请将值理所呈之报章，作实。

十一、凡委分任值理，代查究事件者，主席自可择委，同人亦可拟加入某位。

十二、凡改订规则，须预早，迟不可过七天，将如何改法，先为录出，函交宣布员，使其布告同人，俟叙会时，照章倡拟，改拟及和拟，从众决断。

十三、凡倡拟或改拟，须当场录出，以免决会。一经录出，当众宣读后，不能

收回及更改，或更改，须众允许方可。

十四、无论原拟、改拟或加拟，须依次序，请众决断。决定后，即议别案，刻不容延。

十五、各拟之次序，原拟要和拟后，别人方得改拟，改拟亦要和拟，如无各拟，均应作罢。倘原拟及改拟，均有和拟，则主席先将原拟，问众允许否。

十六、凡倡拟、和拟、改拟及抗拟之人，例准演说，但要切题，每人只准演说一次，如原拟人仍有辩论，则准其和衷评际，惟同人不得掺乱哄驳，只可将已所未明之处，向众伸说，以释疑团。

十七、如于同人辩论时，有特别起立，谓其有犯规则者，则该本人，须将所犯某条规则，言辩明白，论者即要坐下，俟主席定夺是否犯规后，方能续论。

十八、凡议案经在场同人，从众决断后，各人不准辩论。

十九、同人欲知事故，可随时列入问题。凡问题不须先期三二日，函交宣布员，俾其照列入议案，送呈同人。

二十、凡问题不准演说辩论，主席只照题复答而已，倘所答未善，问者要众人合辩，则由彼提倡，然必有同人和议，及经在场三份二同人，允许将规则暂搁勿行，方得辩论。辩论毕，规则仍照旧施行。

二十一、凡同人演说辩论，不准先行打底稿，携到场上宣读，惟将议由笔记，以便临辩时记忆之者，则准。

二十二、同人辩论之时，必须起立，不得坐谈。

二十三、凡遇有烦琐事件，各须细酌者，主席或同人，可倡拟将规则暂搁，准于斯时，各依本位坐谈。

二十四、分任值理之报章，须送交宣布员，转呈主席，以及同人，不准自行直接。

二十五、同人远出，或因事不能到叙者，如系过三两个月内，（时候照公议也），须函知宣布员（如属局绅、议员，须禀知政府）。

二十六、议院、公局于闭门叙会时（闭门者，即私家密议），主席须届时倡议，请局外人离坐（报馆记者，与及街众，即要退出）。

二十七、凡议案与同人私益有关碍者，本人只准在场言辩，不准决许投筒，于决许时，彼须退出，俟决后，方能坐回原位，再议别案。

以上乃议事常规，为议员、局绅者，必须熟职。

至于议员、局绅的权限，刘铸伯认为："政府为主宰，议员、局绅不过为顾问协理，故行法之权，仍操在政府，为议员、局绅者，只有议法、改法，及或驳或诉之权限而已。"他还特别强调："立宪之意，原使君民上下，痛痒相关，免至朝野隔膜，任各官擅权，自饱其利耳；至民间私益，各怀所欲，各有所见，公私每殊，若轻徇其言，直与政府争执，则流于挟制矣，故设议员、局绅其间，谓为代表人可，谓为秉公人亦可，

谓为依附人则不可。此中最宜分别者也，总期遇事秉公办理，一利一害，审慎明确，以保大局为宗旨，尽除偏此袒彼，恃众抗官，及任官压民之弊，则佳矣。"

朝廷1906年宣布开始预备立宪，1907年底，广州成立了两大立宪团体——粤商自治会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粤商自治会主要由广东的商人，即商业和金融业的资本家组成，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则是由广州地区一些热衷于宪政的新派士绅及省法政学堂的教习共同发起的。20世纪初年，广东出现粤商自治会、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这样的组织，是广东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家与士绅阶层"政治觉醒"的表现。

清末的广州得风气之先，是国内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之一，而商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活动，乃广州的一大特色。很多商人都抱着一种使命感去参与公共活动，提高自身以及整个商界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增强商界的凝聚力和改善商人团体的社会形象。

香港华商的商业同广东内地，尤其是广州的商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香港创办的企业，广州商人往往有股份，而在广州创办的企业，特别是创办较大的近代企业，少不了香港华商的投资。广州商人的组织广州总商会、粤商自治会，商人控制的九大善堂，俨然是包括香港商人在内的所有广东商人的代表。因此，广州商人团体的创立与运作，少不了香港商人的参与。1904年初，广东商界在广仁善堂讨论筹办总商会，香港东华医院也推举邓鉴之、冯华川、何晓生、叶蔼山、刘荫泉等5人参加。而在"倡建两粤广仁善堂总理芳名录"中，刘铸伯与香港殷商李玉衡、冯华川、阮荔邨等亦榜上有名。香港保良公局作为一个机构也名列其中。

粤商自治会成立之后，为提高商人参政意识、培养人才，创办了一个自治研究所，学员除来自广州及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镇外，还有来自香港自治研究所的冯爵臣等78人。刘铸伯曾将自己的著作《自治须知》送给粤商自治会，据粤商自治会1908年编印的《粤商自治会函件初编》记载，刘铸伯和冯华川等港商曾参加粤商自治会举行的会议。（参见邱捷《清末的广州商人与香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

立宪运动大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商海信息，瞬息万变，广州商业与香港息息相关，报刊往往为他们提供了大好商机。在广州出版的报纸，香港通常有"代理"或"代派"处（如《广州总商会报》《广东七十二行商报》），而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更是广州商人获取商业信息的重要来源。清朝官吏为了防止革命党的宣传（有一段时间也因为禁止传播有关铁路风潮的新闻），曾下令禁止香港中文报纸进口，此举受到商界的激烈反对。1910年，广州咨议局向粤督转呈广州总商会收到的香港华商公局刘铸伯等人来电，要求废除这个政策，理由是"省城商务与香港华文报纸息息相关，且经港商全体电陈"。粤商自治会集会讨论此事时形成共识："香港华文各报凡十余家，商务机关，瞬息变幻，实以华文报为耳目，今概禁入口，自闭塞国民耳目，于粤省七十二行商业，尤多阻碍。"可见，香港报纸也是广州商人获得新知识的重要来源。

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表现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有利于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产生。地方自治

以当地居民参与、举办公益事务为特征，这种活动必然有助于公民意识和团体观念的萌生；其次是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广度；再次是绅商力量的兴起与中央权力的衰微。而在经济发达的香港，地方自治运动有助于培植市民社会的发育，华人精英日益卷入公共事务，日具实力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公共领域中不断声张其地方或成员的利益，各种地方势力业已呈现出某种独立于港英政府而维护社会的自主性，其影响一直波及民国年间，也为当今的村民自治和地方政治改革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第三节 批驳无政府主义（上）

《社会主义平议》出版于1919年，刘铸伯、谭汝俭（《华商总会报》编辑）合著，这是较早出现的一部抨击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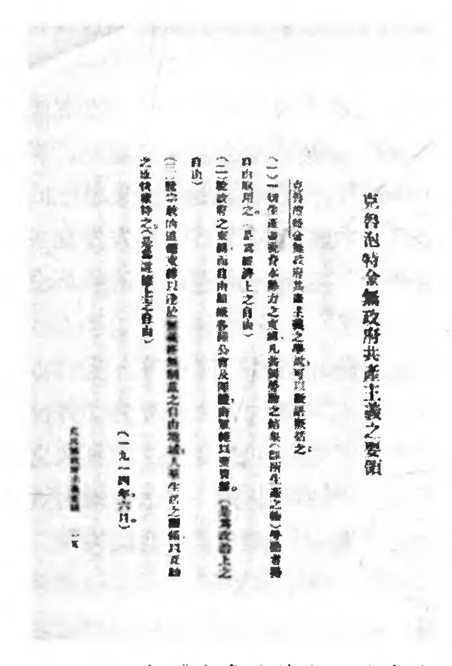
1907年6月，中国留日学生刘师培、何震夫妇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6月22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周刊《新世纪》杂志创刊于巴黎，由中国留法学生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发起主办。主要介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译载其主要著述并加按语，也进行反清的革命宣传。

1907年8月，中国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刘师培、章太炎、张继、何震等，受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在日本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 （后改为“齐民社”），以《天义报》和《衡报》作为宣传阵地，以无政府主义为宣传宗旨：“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天义报》编辑兼发行者何震为刘师培之妻，该报实系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编辑，该报“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平等”为宗旨，并以 “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相号召，鼓吹“无政府革命”，反对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但张继和刘师培宣扬的“社会主义”实为无政府主义。刘师培称颠覆满洲之后就要实行无政府，决不让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

“社会主义讲习会”每星期集会一次。该会机关刊物是《天义报》。该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片断，称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是“不易”之说。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要求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人类社会。刘师培疾呼不要政府，不要



刘师复（1884—1915）



克魯泡特金無政府共產主義之要領

（一九一四年六月）

刘师复《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要领》（1914年6月）

团体，不要任何“在上之人”，说“侈说合群真放屁”。并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不合公理之最甚者”，斥共和政体是“不共不和”，斥平均地权为王莽改制一般的愚民政策。

中国无政府主义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刘师复。刘师复（1884—1915），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民国初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被称为“中国的普鲁东”。刘师复曾经使用过三个名字：刘绍彬、刘思复、（刘）师复，名字的变化折射出他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旧式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其间，他与俄国的虚无党人有所接触，并受到幸德秋水的影响。1907年初，为配合同盟会的潮、惠起义，回广州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失败入狱。在狱中，他阅读了一些关于佛学和无政府主义的书，此时刘师复对无政府主义心已仰慕。1909年刘师复出狱，潜心研究《新世纪》鼓吹的无政府主义。不久到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这时，刘师复自称其活动与同盟会无关：“出狱后组织暗杀团，章程为余所起草，以反抗强权为宗旨，取单纯破坏之手段。自是之后，余虽未尝标揭无政府之主张，然自信确为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且此后皆独立运动，与同盟会亦几无关系矣。”

辛亥革命后，刘师复在广州创立“心社”“晦鸣学社”，正式皈依并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1912—1914年间，刘师复主持编印了《新世纪丛书》《无政府主义粹言》和《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等，发行量达数万册。这些书刊的主要内容是传播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和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鼓吹绝对平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提倡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反对一切政治和法律，对此后的无政府主义者产生过很大影响。1915年3月，刘师复积劳成疾，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主要著述有《伏虎集》《师复文存》等。五四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分子，大多是刘师复的同伴或受其思想影响的人，黄凌霜、区声白成为刘师复之后影响较大的中国无政

府主义的正统派代表。

黄凌霜，又名黄文山，笔名兼胜、兼生、超海，广东新宁人。早年曾在香港皇仁书院（其前身即刘铸伯就读的中央书院）学习英语，后人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五四前后，参与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进化”等，参加编辑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刊物《实社自由录》《进化》《新生命》《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民风》《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1921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同年作为孙中山的代表赴苏联出席远东人民大会。1922年留学美国，后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区声白（1892—？），广东南海佛山镇（今佛山）人，早年人广州世界语夜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接受世界语的启蒙教育，曾参加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广州）。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在中国现代史上，他因1921与陈独秀之间的一场无政府主义论战而著称，以至于任何一本论述现代思想史、社会思潮的论著，都会提到他的名字。

刘铸伯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缘于他以华商总会主席的身份，邀请清末民初著名报人谭汝俭担任华商总会机关报《华商总会报》编辑。谭汝俭（1848—1938）字荔垣。南海人。廪生出身。1897年任广州《岭学报》主笔，介绍新学，倡导维新。1900年后，历任《安雅记局世说编》《商务日报》《养城日报》等报主笔和编辑，力主立宪。民国建立后，任广州《华国报》和《国报》主编。1938年广州沦陷，避居乡间而饿死。

谭汝俭在序言中交代了《社会主义平议》一书写作缘起：“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入广州，余私心尝隐痛之。越丁巳（1917年），避地香江，间涉译本，知各种主义，流布渐广，浸淫不已，终酿祸变，颇思着论辩之，顾卒卒未暇也。越己未（1919年），应刘君铸伯之招，任《华商总会报》编辑撰述之役。其时适俄国过激党，来华阴相勾煽，我国暴烈魁硕，群起而应之；南北各省，罢市罢工课之事遂纷纷而起。刘君尤引以为忧，谓：‘后生小子，中于邪说，势必害于而（尔）家，凶于而（尔）国，其究竟归于自贼。’相与欷歔太息久之。刘君幼通英文，博涉西籍，时刺取西国学者之说，相与往复讨论，于彼党谬义，多所辩正。余退而笔之于书，以付剞劂，载诸报纸者日凡千言，盖不复辨其为刘君语、为余语也。阅两月余，得四万余言，积成卷帙，未忍弃置。刘君属余略为编定，出资重付剞劂，以就正海内……”

所谓“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入广州”，指的就是1912年5月，刘师复、林君复、郑佩刚等人在广州西关组织“晦鸣学舍”，该社“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其宗旨有八项：“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晦鸣学舍印刷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品。7月，刘师复与郑彼岸、林直勉、莫纪彭等创立“心社”，制定了属于“个人进德”性质的十二条社约，包括：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乘轿及人力车；不用仆役；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心社”侧重对内活动，促成社员精神上的一致，主张以道德救世，并身体力行。

1913年8月，晦鸣学舍在广州创办《晦鸣录》周刊，宣传无政府主义。《晦鸣录》出



民国初年的广州西关

版两期后被广东都督龙济光查禁，于是刘师复亡命澳门，《晦鸣录》改名《民声》继续出版。由于葡萄牙当局接受了袁世凯和广东省方面的要求，《民声》出版两期后，再度被禁。1914年，刘师复被迫赴沪。《民声》迁上海继续印行。同年7月，刘师复在上海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旨在“传播主义，联络同志”，为实行社会革命运动做准备，并发表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他还在《无政府浅说》一文中宣称：“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14年8月，刘师复致书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传播主义的过去及其进行状况，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组织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联络；（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于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始和世界发生关系。1914年8月，上海发生漆业工人大罢工，刘师复撰《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开始把领导工团（工会）的问题提上日程，为后来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工人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刘师复出版印行过十几种无政府主义小册子，系统阐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了“师复主义”，奠定了其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觉”和导师地位。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香港的传播，几乎与广州同步，大本营就在刘铸伯的母校香港皇仁书院（原中央书院），代表人物则是该校学生袁振英（1894—1979）。据《袁振英回忆录》说：“当时（1912年），我在香港皇仁书院，与同学杜彬庆、钟达民（钟子晋之弟）等组织‘大同社’，同广州‘心社’相呼应，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主义等；‘大同社’的主张大致和‘心社’相同。”（参见“广东

档案史料丛刊”《“一大”前后广东的党组织》）1915年，袁振英毕业于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曾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特别是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主张人类应该“互助生存”“和平共处”，反对达尔文的“竞争生存”的学说。


晦鳴錄

《晦鸣录》周刊

正如袁振英所言，“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早于马克思主义”，刘铸伯、谭汝俭出版《社会主义平议》之际，科学社会主义尚未传入中国。他们在书中批驳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当时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刘师复等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当时以“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大同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名目出现；1914 年 5月2日刘师复《答嵩任》称：“吾人所主张之宗旨以用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名为最明晰，然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者，一方面为言辞上之便利，而又一方面则从世界之通称。”

《社会主义平议》一书1919年8月出版于香港，直到1920年5月，陈独秀才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同年 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才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据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英勇奋斗的十五年》（1938年版）记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计13人，“大会代表不全系共产主义者，其中也有无政府主义分子，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基督教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暂时和偶然混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路人。提交大会讨论的纲领，本来是很温和的，可是有几个代表则尚认为太激进，因而发生很大的争论（特别是关于纪律，集

米夫《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书影

中主义与共产党最终目的问题）。但经过长时间讨论以后，大会终于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以组织工人夺取政权为其最终的目的”。

米夫继续写道：“自中国共产党最初成立之日起，在党内就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立刻就分裂出去了，北京原有的共产主义小组仅余二人，而在广州方面，整个党的小组，都完全操在无政府主义派手中了，只是经过一些时间以后，广州方面的共产主义小组才又建立起来。同时，为清洗本身队伍起见，党又开除了暂时附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陈公博及戴季陶（不久以后，戴季陶便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家）。思想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深受苏联胜利斗争的鼓励，坚决为有纪律的集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而奋斗，为革命的阶级的工会运动而奋斗。”

米夫《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初版本于1936年印刷，副标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该书首次披露中共党组织成立后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争与分化。1991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胡绳主编的权威读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更加详细地阐述了中共党组织成立不久与无政府主义展开的这场论战。胡绳这样写道：

> 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曾占着优势。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强权，也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私有财产制度，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无政府主义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看起来又似乎十分激烈和彻底的主张，很适合那些不满社会现实的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些对旧社会不满、理论准备不足、正处在探索过程中的青年人也接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师复等人就在中国鼓吹无政府主义。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流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书籍多达七十余种，在广东的影响更大。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专播，他们便越来越多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黄凌霜等人写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揭露这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派别的本质，便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
> 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强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不能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并使国家走向消亡。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只能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战斗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但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外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清晰，比如，莱德勒在其著作《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社会主义》中说：“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建立

于1911年。”针对此说，广州育才书社早期毕业生、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指出：“就我所知，1911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乌托邦计划，与今天的实际运动无关。那时有两个团体：一个提倡社会主义；一个提倡无政府主义。前者无纲领，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俱乐部，与工会没有任何联系，它的成员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劳工问题。有些社会主义者曾被选入国会，但他们加入了国民党，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政党。后者什么都不主张，只提倡‘公产和自由恋爱的原则’。他们曾申请广东政府给他们一个岛屿，让他们在岛上实现他们‘新社会’的理想。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的思想，我们最好还是把他们看成乌托邦主义者，而不要看成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们在追溯共产党的起源时，对我们来说比较实际的还是描绘1919年的‘五四’运动，即大学生运动的序幕。”

《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批驳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与五四运动后出现的共产主义思潮没有丝毫关系。但是，由于刘师复等提倡的无政府主义，以“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大同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纷繁名目出现，譬如，他1914年4月所作《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说：“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曰‘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或许是为了行文方便，刘铸伯、谭汝俭在书中统称为“社会主义”，他们说：“‘社会主义’一名词，本起于中古，其初为经济学上用语，上古之谈共产主义、平等主义者，未尝有是名词也。厥后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者，悉以‘社会主义’名之。治兹学者，家标一说，人发一义，其学说乃愈推而愈广。”

刘铸伯、谭汝俭在《社会主义平议》一书“绪言”中，谈到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在广州的传播：

社会主义之说，本起于泰西，其渊源甚远。就吾国论，民国初年颇萌芽于广东，披猖陂僻，大为当时人心所厌恶，然其焰固未甚炽也。

今者俄国过激派，又以此种学说，流播吾国，二三暴烈魁硕，思藉是以为争政权之利器，遂提倡而鼓煽之。海内大乱未靖，浮动之民气，每为其所中，于是假借名义，阴相联合，以厚集其潜势力。彼所揭以为号召者，未尝不日言“救国”，而“民族自决”一语，已露其端倪，将来一旦猝发，或不免成滔天之祸，数月以来，罢市、罢工、罢课等事，纷见于各省，祸端固已渐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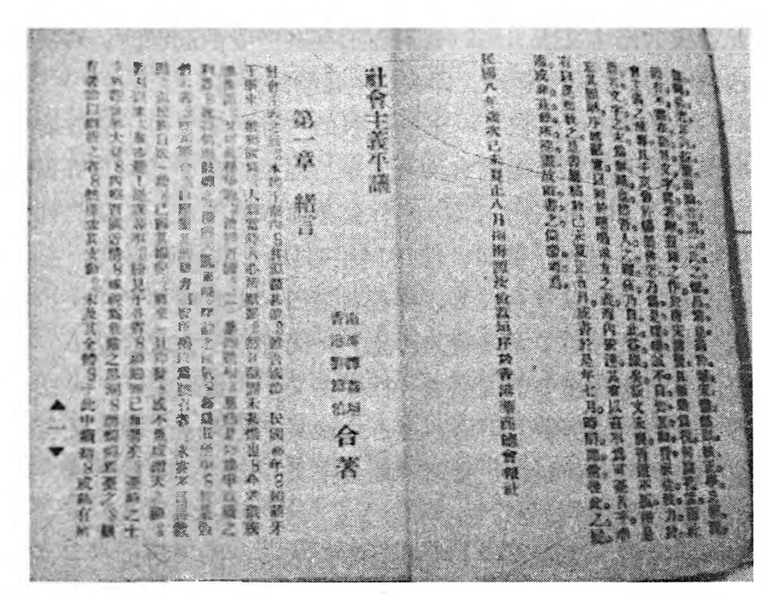
忧时之士，外观世界大势，内察吾国近情，咸视为危险之思潮，而惴惴焉忧之。颇有着论以辩折之者，然仅攻其枝节，未及其全体，于此中症结，或犹有所未尽；而执政诸公，惧国家之覆亡，亦思力遏其流，然于源头疏导之功，或亦漫不加察，则其祸终不可止。用是忘其固陋，仅竭一得，以贡献于我国人，此《平议》一书所由作也。

吾辈夙所主张，窃以为极端的社会主义，实万不可行，而国家的社会政策，则

必当采用，盖匪是则社会主义，必伺间抵隙，以图爆发，屡仆屡起，防不胜防，而生民终无宁息之一日，抑平民抑郁愁苦之气，亦未由使之底于平，殆亦仁人君子所恻然不忍者乎？故兹篇之作，于极端社会主义之说，则词而辟之；于国家社会政策，则窃有取焉，虽云妄逆潮流，而自信于社会主义之本旨，仍未大悖。

然则，区区之论，固当为国人之所不弃，即彼走极端者，相持既久，或亦自知其宏廓之理想，为终不可行，不得已而思其次，则于兹篇或亦有取焉者也。斯义既明，则彼欲托之以争政权者，亦自无可假借矣。

与此同时，刘铸伯也考察了欧洲社会主义的起源，认为“希腊古代之哲学家，如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已倡‘共产’之说，而基督教亦含有此种意义，其言曰‘求尔者，尔宜许之；贷尔者，尔勿吝之’，即其义也，然其旨趣，纯属诸道德范围，只有劝导而无干涉，与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不同，顾其根源已伏于此矣。我国孔子不言‘共产’，然《论语》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均无贫’。至孟子告时君，则屡言井田之制，盖亦均贫富之义，但其均之之法，纯以政府之力为之支配，与近世趋于无政府一派，尤判然不同。且就国有余田之时代言之，于贫富之间，未尝有所予夺，甚未可与近世之社会主义混而一之也。”


社會主義平議

第一章 緒言

合著

《社会主义平议》第一章《绪言》

对于河上肇、赫胥黎的理论，刘铸伯、谭汝俭也有所剖析。总之，“盖社会主义之学说，彼倡之者，其根源本出于仁爱，而其人大率勇于自信，忽于察物；果于立异，锐于进行。迹其持论，往往主张牺牲少数，以谋多数之利益；牺牲现在，以谋将来之利益，故凡醉心于此主义者，其性质举动，靡不流于暴烈，趋于破坏。西籍所记，若虚无党，若无政府，皆与社会主义有渊源。为党人者，无日不从事于秘密结社，秘密运动，纷纷以暗杀暴举为事，盖不独俄、匈之过激派所为然，其所由来者远矣。而俄、匈党人之爆发，则其祸事尤酷，殆亦关乎（于）党性者然耶？盖党性之为物也，其初主张过当者，其后必变本而加厉，盖以目的屡不得达，则世界一切阻力，必思尽全力以排除之，鲜有由暴烈而骤变为温和者”。他们担心的是，“在贤人君子，亦有过激而横决，况聚

血脉贲张之徒，承偏倚之学说，而谋必不可得之事实者乎？递传益烈，于势宜然。吾恐将来祸事之酷，更千百倍于今日之俄匈而未有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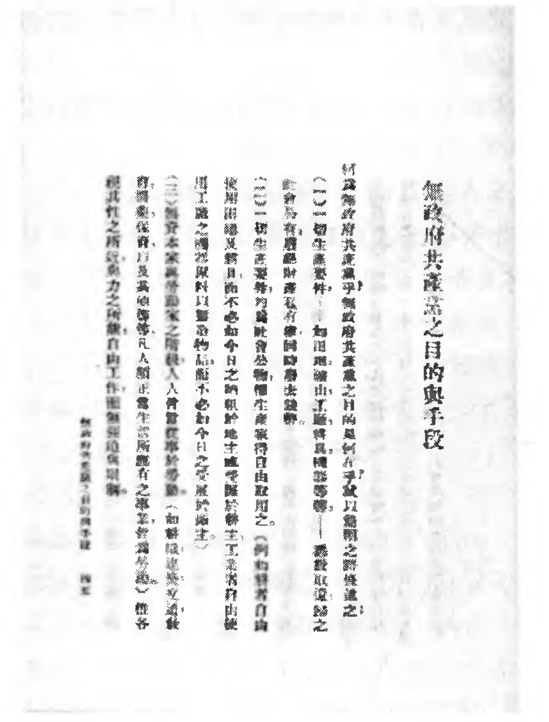
对于清末民初“家标一说，人发一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刘铸伯、谭汝俭进行了一番归纳整理：

> 综而述之，约可以分为六大纲，其关于国家者，曰“均贫富”，曰“平阶级”，曰“废兵役”，曰“免死刑”；其关于家庭者，曰“解除夫妻名义”，曰“解除父子名义”。惟主张“均贫富”，故盛倡共产主义；惟主张“平阶级”，故盛倡无政府主义；惟主张“废兵役”，故盛倡大同主义；惟主张“免死刑”，故盛倡无法律主义。兹四者，事务虽万不可行，而立说尚依于人道，故趋新者犹多附之。

刘铸伯、谭汝俭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提倡“解除夫妻名义”，以实行其所谓“妇女国有”（“公妻”）；“解除父子名义”，以实行其所谓“儿童国有”，完全是等同人道于禽兽，甚且连禽兽都不如，“固大悖吾国之习惯，大拂吾民之心理，闻其说者，殆未有不发指眦裂，而目之为大不祥者也”。“综此六要义，彼党虽未尽一致主张，然苟实行其一义，要皆足以祸天下，故不得不统括之而为具体之商榷，使其说无地以自存，而终济之以吾夙所主张之国家的社会政策。”

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厘清——有人或许会问：刘铸伯“吾夙所主张之国家的社会政策”，是不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大家知道，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代表人物有拉萨尔和罗贝尔图斯。在马克思主义刚诞生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刚出现的时候，拉萨尔主张实行普选制和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罗贝尔图斯认为工资应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主张由国家制定工资标准，实行社会改革，以解决由资本和土地垄断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和工资下降问题。他们回避国家的阶级性，打着社会主义招牌，鼓吹社会改良，实际上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思潮在刚刚形成的社会主义各流派中有相当的影响。后来希特勒则利用国家社会主义，推行法西斯统治和对外侵略。但是，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传入中国，而刘铸伯的《社会主义平议》出版于1919年，他所主张的“国家的社会政策”，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刘师复宣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归公的“高度共产制”，反对只讲生产资料归公的“集产主义”，并讥之为“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反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大衣服店之衣服，均吾人之衣服也，可往取之。大粮食店之粮食，均吾人之粮食，可纵食之”。1914 年7月4日，刘师复《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宣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敌，而社会罪恶之



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

刘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之目的与手段》（1914年8月）

源泉也。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之囊橐。而劳动以致此生产者反疾苦穷愁，不聊其生。社会一切之罪恶，匪不由是而起。故吾党誓歼此巨憝，废除财产私有权，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土地、工厂及一切制造生产之器械等），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

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也把“反对贫富悬殊”简单地理解为“绝对平均主义”。刘师培提倡：“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公利不能背驰”，“推己及人，扩私为公”。李石曾云，“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蔽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褚民谊主张废除财产和资本制度，这样才能实现“共产社会”：“吾辈所抱主义，为至公无私”，“财产废而为公共，无食人与食于人之分，而贫富之别，饥寒之忧绝矣，同作周游，其为将来共产社会之现象乎？”

对于“均贫富”这个古已有之、来头颇大的口号，刘铸伯从欧美各国工人罢工现象入手分析，认为：“欧美各国，劳动家为资本家所压制，抑郁愁苦，几无复生人之乐，故恒与资本家冲突，屡发生联盟罢工之大风潮，贫富不均之，于此可见矣。”资本家多财善贾，又有托拉斯为之垄断，以致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吸集。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一国富源，几乎全部操纵在铁路大王、煤油大王、矿山大王等少数人手里，劳动人民皆隶于资本家势力范围之下，遂以养成资本家的专制，“有识者愍焉忧之，欲为之救济而苦于无其术”，“顾欲均贫富，则必须共产，于是采古代哲学家‘共产’之说，而欲实行之”——这就是刘师复等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均贫富之说”的起源。

刘铸伯、谭汝俭认为欲均贫富，必须研究三个问题：“（一）人类贫富，皆所自致，其致此者，各有原因。欲均贫富者，亦知人类贫富之所由来乎？（二）贫富不均，为现在不能移易之事实，欲从而均之，果以何种手段为适宜乎？（三）贫富不均，乃适以演成现代人类之种种事业，苦贫富既均以后，试问人类社会之状况为何乎？”

刘铸伯、谭汝俭把人类所以致富的原因归纳为三点：一是继承先代的遗产；一是靠自身的能力；一是抓住了商场上的时机，“综是三者，惟第三项容有幸致。若夫第一

项，则固有其先人勤俭居积，艰难汗血以成之者也；其第二项，则亦由其本人勤俭居积，艰难汗血以成之者也。不宁惟是，大抵以农致富者，必须有农学之道德知识技能；以商致富者，必须有商学之道德知识技能”。

刘铸伯少时家贫，靠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认为贫苦人艳羡富人并无过错，但也应该想想自己贫苦的原因，不用说，断然不能归而自咎其祖父父亲。但是就自身而言，缺乏实业知识，缺乏实业道德，没有实业技能，“且人勤而己独惰，人俭而己独奢，即骤与之以陶朱猗顿之资，其涸亦可立而待，况欲赤手致富耶？乃倡言共产者，欲夺富者之有余，以补贫者之不足，是无异使勤者为惰者效劳，使俭者为奢者蓄资，使有道德、知识、技能之人，为无道德、知识、技能之人供牺牲也。天下不平之事，孰有过此者矣？”这且不说，如果实行这样的“均贫富”，他担心：“势必人人相习懒惰，相习为奢，相习不学而无行。彼诚见夫惰而且奢，不学无行之人，竟可安坐而致富，则亦何惮而不为耶？吾恐人类之堕落，有非笔墨所能罄者。本欲进化，适成退化，毋乃不可乎？”

刘铸伯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实现“均贫富”手段，不外乎两端：一是所谓“支配”；一是所谓“攘夺”。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想，前者是设立一总机关之力，调查没收一国或全世界富者全部财产，取得其所有权，然后统计人口与财产之比例率，按人口平均分配；后者则是通过暴力革命攘夺富人财产，进行重新分配。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这种“均贫富”手段，刘铸伯、谭汝俭从人性与法律层面上提出了质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倡导通过暴力手段达到“均贫富”的目的，刘铸伯以清末民初的几次“革命”为例证明其不可行：

> 中国自前清之末，第一次为辛亥革命，而元气经一度之损伤；第二次为癸丑（1913年）革命，而元气又经一度之损伤；第三次为丙辰（1916年）革命，而元气又经一度之损伤；迨西南独立，复启兵端，和战余纷，至今未已，是八年之中，经革命者四次。试问人民之生命财产，其损失几何？吾恐更历百年而不能复，然犹谓为种族计，为政治计，故不得不尔也。乃今者政治革命之恶潮，犹汹涌而未已，又复倡社会革命之说，以冀达其均贫富之目的，是以此之摧残为未足，又从而重之也。此种革命事业，虽更历千百年而不能收其效，吾恐贫富未均，而斯民已无噍类矣。

刘师复无政府主义提出了初步的阶级论：“阶级制度者，平等自由之大敌也，有政治则有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阶级，有私产则有富人与平民之阶级。”他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就是“劳动阶级”和“富贵阶级”战斗的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对象是劳动阶级，只有实行共产，除去贫富阶级，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幸福。工程师等亦属此类。在《社会主义平议》第三章“论平阶级”中，刘铸伯、谭汝俭对此说进行了剖析与批判。

刘铸伯关心平民疾苦，四处施医兴学，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他说："同此人类，在造物视之，莫不平等，此为天经地义，不可移易也，故儒家言'民吾同胞''物与同兴'，墨家言'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此义由来旧矣'。"对于印度实行种族制度，"上焉者肆骄横，下焉者受窘辱"，刘铸伯说"违悖人道，莫此为甚"。他还以法国大革命为例，阐释自己所理解的"人人平等"：

欧洲中古，虽无强分等级之习，然君主之国，有世爵，有贵族，有僧侣，罔不拥踞田宅，以奴视其国民，而有国亦列为特殊阶级，故宪法上所规定且设为上议院，选举议员，以代表此一部分之公意，而与国民全体之代表相对峙，其不平亦甚矣。欧洲人久愤之，故法国大革命，于"博爱"、"自由"二义之外，以"平等"二字为揭橥，及变国体为民主，则阶级固已破矣，何也？盖世爵、贵族之制既去，则一国之人，有朝为平民夕为公卿者，亦有朝为公卿夕为平民者，是之谓真平等，非谓举一国之人，无官民上下之别，然后谓之平等也。而吾心则以平等视之无丝毫势位富厚之见，以吾一身处群伦之中，虽帝王不能屈，虽乞丐不敢慢，是谓心理上之平等，佛氏所谓作平等观是也。法治之国，苟犯法律，则无论官民上下，皆与以相当之裁制，虽以帝皇之尊而莫能恕，虽乞丐之贱而无可加，粤谚有言，"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谓法律上之平等，法律家所谓受法律上平等之保护是也。破去民族之阶级，而复兼此两义，则平等之理，已尽于此矣，若犹以为未足，欲取天然之不可平者，亦从而平之，举凡一切官民上下之制，靡不摧陷廓清，而无复丝毫之存在，然后谓之平等，则非吾之所敢知矣。

刘铸伯进而指出："夫官之压制其民，上之压制其下，古来专制之祸，吾亦深恶之。然恶之而排去专制可也，恶之而并欲排去官民上下之制则不可也。"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仇恨专制，进而鼓吹所谓"实行平阶级"，"怀挟此伟大之理想，则必思有以达此理想上之目的"，无异于因噎而先废食，因为："（一）人类之有阶级，大率由其本身能力之所自致，其阶级之高下，恒与其本身之能力作正比例率，欲平之者，亦知其至此之原因乎？（二）人类之有阶级，在世界上几成为固定性，向下者自安，向上者自奋，亦非他人所代为抑抑，欲从而平之，果以何种手段为适宜乎？（三）人类之有阶级，乃得组织而成国家，组织而成社会，以演成今日之种种文化，若阶级既平以后，试思人类之社会为何如乎？"

接着，刘铸伯缕析了阶级形成的原因，批判了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的"平阶级之手段"（暴力手段、教育手段、淘汰手段），认为暴力手段尤为不可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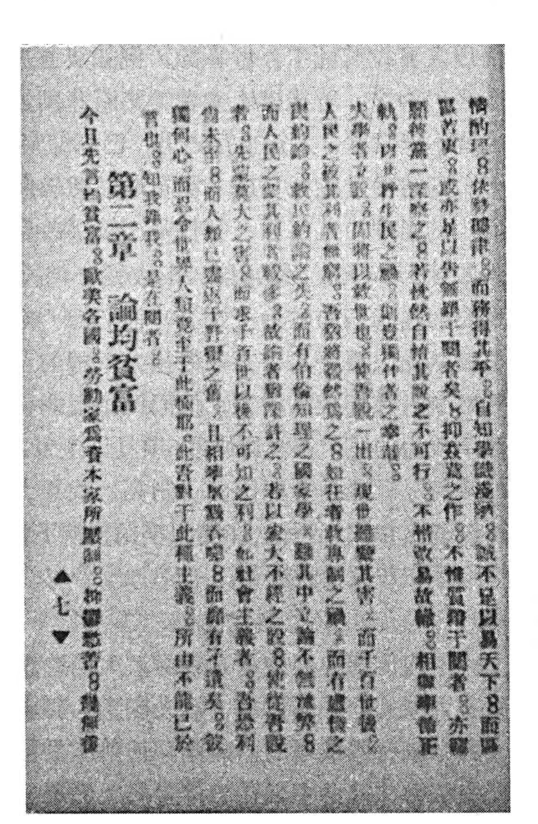
顾当今社会主义萌芽伊始，所谓教育的与淘汰的，不过彼党之一种理论，尚未有见诸实行者。近观译本及各报所载，其实行之手段，只从事于暴力之一端而已。窃谓暴力一派，约可分为两种：其一以各个而为单独之行动者，如心醉此种主义之

人，以孑然一身，向势要之人抛作弹，从事暗杀者是也；其一则合群而为协同之行动者，如纠合同志，联结秘密社会，同谋革命事业者是也。

夫以提倡人道主义之人，欲仁及若力，下至仁及禽兽，而乃日事暗杀，日言革命，使举国上下，同被流血之惨痛，至令人群之安宁秩序，历千百年而不能复。彼居高位握重权者，在社会主义既认为罪人，则虽尽而屠之，在彼或不自以为忍。然一般平民，何辜于天，而亦忍令遭此家室仳离，骨肉死亡之痛，人道主义之谓何？殆亦仁人君子，所闻之而恻然心动者乎然使目的得达，则牺牲现在少数人之利益，以谋将来大多数之利益，犹可言也。顾以吾所见，则此种手段，虽使行之千百年，亦断不能收其效。何也？

由前之一种，为各个之单独行动，所暗杀者几何？彼抛掷炸弹，往往一击不中，即惧亡命，或击而误中，而等于博浪之椎者，可无论矣。即或击而幸中，然去一君主，即则立一君主；去一总统，即别选一总统；去一总理，即别任一总理，推之阁员省吏，莫不皆然，于阶级制度，固丝毫莫之能破也。

刘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提出了“无一切法律规条”，他在《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中宣称：无政府党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所以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的恶制度，无政府党一概排斥、扫除之，要达到“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的理想社会，在理想社会“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


第二章　論均貧富

▲七▼

《社会主义平议》第二章《论均贫富》

刘铸伯说，即使“平阶级”之后实现了这样的“理想”社会，人群的生存现状会怎样呢？他以驾驶海舰、学校教育为例，说明其不可行：“今夫一海舰也，有舰长，有大副，有二副，有司机，有水手，其阶级秩然也。一学校也，有校长，有教员，有监学，有司阍，有杂役，其阶级亦秩然也。夫惟其阶级秩然，故舰长之命令，能行于一舰，以尽其驾驭之责。亦惟其阶级秩然，故校长之命令，能行于一校，以尽教育之责。若倡平阶级之说，以一舰论，则必人人尽为舰长，而舰长以下之职务，将谁人任之乎？抑人人尽为水手，而水手以上之职务，又谁人任之

乎？亦惟有举一舰之事，尽行旷废而已矣。夫以一校论，则势必人人尽为校长，而校长以下职务，将谁人任之乎？抑人人尽为杂役，而杂役夫以上职务，又将谁人任之乎？亦惟有举一校之事，尽行旷废而已矣。一舰一校之小，其阶级尚不可平，平则诸事同归于旷废，而况社会国家之大者乎？”

刘铸伯读过霍布斯（1588—1679）的著作《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该书倡导“社会契约论”，提出人为了生存和安全，通过契约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一个人或一群人，由这个人或这群人代理行使权利，以保障契约参加者的生命和利益。众多同意转让权利的人是被统治者，接受契约的代理权利者是统治者。主张“一个最坏的政府也胜过没有政府”，用“利维坦”（圣经中说的一种硕大无比、骇人听闻的海兽）比喻君主专制政体的无上权威。

刘铸伯说：“自有倡平阶级者，于是乎有无政府之说，则之甚矣，西哲有言：恶政府犹愈无政府。……20世纪以来，环球各国，多由专制而变为立宪，由君主而变为民主，虽未足称完全善良之政府，然所谓恶政府者，其势已不能不力趋于善良。夫恶政府不可无，况力趋于善良之政府耶？又奈之何以平阶级之故，乃欲将善良之政府而亦去之也？是亦惑之甚矣。”他继而写道：“夫国所由立，人类所由生存也。……政府者，国家主权之所寄也，故号称为国者，于土地人民之外，尤必有主权，然后国家得以成立，然后人类得以生存。若无政府，是之谓无国家；既无国家，则人民无所借以保护，无所借以发育，其能生存者寡矣。例如实业也，教育也，交通也，其规模狭小者，犹得以各个之力为之，若规模宏大者，则断非国力不办，苟无政府，处无人为之提挈整理，而数者皆不能发达，人知生存之道，已郁抑窒塞而不得伸，试一思其现状为何如乎？”

刘铸伯赞成托马斯·霍布斯“恶政府犹愈无政府”的说法，期盼一个“完全善良政府”的出现。几年后，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其代表作就是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王宠惠等15名北京大学教授联合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他们把“好人自命清高”“袖手看中国分裂”看成社会病根。认为只要好人有奋斗精神，中国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中国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在实践活动上，他们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政府的第一步，并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6项具体主张。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在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六个条件下实行南北议和。1922年9月，在吴佩孚的支持下，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的“好人政府”成立，可惜只存在72天就夭折了。

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有着对“大同”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为了实现“大同社会”，康有为《大同书》开出“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这一药方。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着浓厚的“大同”情节，吴稚晖自称“是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者”。褚民谊认为“社会主义”“排强权、去恶习、平等级”最终导致“大同主义”“无政府，则无国界；无国界，则世界大同矣”。“大同”是他们理想中无政府主义的最后阶段或

最高境界。李石曾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至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自由、平等、博爱、大同。"

刘师复把"万国大同"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他在《答凡夫书》一文中回答"心社"与"晦鸣学舍"的关系时指出，"晦鸣学舍"是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团体，而"心社"的目的在于"个人进德"。最后总结道："吾辈对于个人'相戒勿为违背真理之事'，对于社会则主张废绝私有财产倾覆一切强权以成共产大同之社会。"他在《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里，"又宣言于世界各国之同志曰：'万国联合'已为吾党今日一致之趋，吾人虽不敏，窃愿互相携手，向此同一之途径而行"。刘师复把无政府、共产、万国联合、世界大同相提并论，也反映出他实际上把无政府共产主义美好的社会理想等同于大同社会。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废除国界、兵役，万国联合共驱"大同"的想法，刘铸伯、谭汝俭颇不以为然。他们在评说"废兵役"一章写道：

> 乃自有社会主义出，挟其过高之理想，遂有主张废兵役者，夫使兵役而果可废，则岂惟吾所乐闻，抑亦全球人类之所甚愿也，无如按诸现在时势，其说固万不可行，何哉？倡之者曰：现在国别之世，废兵役之说诚不可行矣，若世界进至于大同，又乌在其不可行耶？则谨应之曰：吾闻"大同"二字，神往者亦已有年，然吾对于此义，亦有一问题焉，必就此三问题而先为解决，然后"大同"可得而几；大同可得而几，然后兵役可得而免也。兹三问题者，与前两章大至略同，而事实亦各别，谨列举如左：
>
> （一）万国并立，此疆彼界，遂不得不有战争。故战争之大者，其原因皆起于国别，彼欲致"大同"者，要亦知国别之所由来乎？
>
> （二）万国并立，其势本各不相下，若使之同戴一尊，或同为群龙之无首，其事甚或难，彼欲致大同者，又果以何种手段为适宜乎？
>
> （三）历观古今，一国之内，亦不免时呈分合之象；若合全球为大一统，则必一合而永不复分，然后可免于战祸。然试问彼欲致"大同"者，果能于统一之后，保其永不分裂否乎？

他们提出，首先国别难破，"夫国别之起原，其初由于山川之界划，当时舟事之制未备，彼此不能相通，遂划然而各成为小部落。其后交通渐备，知识亦渐开，于是乎能辨种族，于是能立宗教，既有种族之别，于是乎有种界。既有宗教之别，于是乎有教界，大凡一国之立，其人民大率同种族，同宗教者也。盖同种族，则语言同，文字同，嗜欲同，风俗同。惟语言、文字同，然后意谊融焉，感情洽焉；惟嗜欲、风俗同，然后群居便焉，习处安焉，此国之所由立者一也。同一宗教，则宗仰同，信条同，伦纪同，仪节同，惟宗仰、信条同，然后奉戴专焉，趋向齐焉。惟伦纪仪节同，然后道德一焉，文则协焉，此国之所由立者又一也"。

刘铸伯认为，就是因为“同种族、同宗教”构成了国家共同体，虽然屡有改革，也不过是政体上的变化，其国力苟足以自立，断非外力所能征服。如果主张免去兵役，虚构一个理想大同社会，那么，“就种界论，将使我国之种族，而混合于他种欤？则固非我种之所愿，抑使他国之种族，而混合于我种欤？亦非他种之所愿也，种界既不能破，则国别亦不能破，是乌在其能大同也？就教界论，将使我国之宗教，而同化于他教欤？亦非我教所愿也，抑使他国之宗教，而同化于我教欤？则亦非他教之所愿，教界既不能破，是乌在其能大同也？大同既不可致，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利害冲突，即生战祸，则兵役又乌能免哉”？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大同”理念，现在尚属于理想，很快就会流为过激，“事事皆含有强致之意，今当着手伊始，天下已嚣然其不靖，循是不变，人类其宁有幸耶？以是而求‘大同’，非屈我从人，则强人从我，适以促成种界、教界之争耳”。

刘铸伯、谭汝俭把无政府主义提出的实现“大同”的手段，归纳为三种：征服的，协约的，类化的，指出“近日过激派之举动，无事不凭借暴力，以从事于第一步之破坏，而入其中者，又大半皆暴烈分子，咸以破坏为至乐，故语其性质，吾意以主张适用征服者为至多。顾欲免兵役，乃求大同，欲求大同，仍借兵力，是手段与主义相冲突，自身已成一矛盾律矣”。“试问环球万国，吾欲从而征服之，则为之主动者谁乎？其使一国之政府任之耶？是又与无政府之主义相冲突，可无论矣。即曰以政府攻政府，是犹以毒攻毒，俟其扫荡万国之政府，然后取统一之政府而推翻之，则大同可致，而兵役可免，此其说岂不甚辩？然试问一国之政府，我果操何术而能使之从我，以轻与万国启衅耶？”

他们认为，以战争的手段达到“大同”的目标等于痴人说梦，“以一党而有左右政府之力，即可以为所欲为，然以一国之兵力，而欲扫荡万国之政府，虽使恺撒、亚力山大、拿破仑诸人，一时复生，亦断难保其不败。迨一经失败，则所谓以兵力致大同者，不尽成泡影耶”？即使枭雄之辈侥幸取得胜利，全球而共戴一尊，但是“全球之大，怀挟野心者何限？一人踞位，群雄已眈眈于其旁，久思取而代之，况其自行退位耶？吾知一枭雄去，众枭雄复来，其势必召纷争之祸，自古中原无主，群雄逐鹿，干戈扰攘，经历百数千年而不能定者，盖屡见于史册矣。及其功成事定，制礼作乐，设官分职，而政府遂依然存在，彼倡社会主义者，其许之耶？是推翻万国之政府，而承认全球之政府，其得失相去几何？其不许之耶？则势必举行二次之革命，务排去此政府而后快；而为政府者，亦必思以兵力征服之。一方以革命为揭，一方以平乱为标志，双方各挟一说以求胜，无论其孰为曲直，而战争之祸，遂不可胜穷”。

那么，通过协约的方式实现“大同”又如何？刘铸伯认为与征伐之说相比，这是一大渐近于和平的进化。但是问题在于：“协约云者，将由各国君主，自为之主动欤？抑由各国之民，协同运动，强迫其君主而为之欤？由前之说，是谓与羊谋皮，事未右能济者也。盖各国君主，怙于权势之见，平日纵非专制，而所处地位，于一国为至尊，一旦欲其遁荒逊位，下处于平民之列，其势必有所不愿，斯已难矣。”他们举例说：“民国以还，革命巨子之成绩，亦大略可观矣，试问彼以伟人自命者，何一非知有本党而不知

有国家者哉？夫施之一国如是，施之天下亦始是。今者倡社会革命之人，昔日倡种族革命，洽革命之人，使此种人而主持协约，吾知人群之必无幸也，协约不公，则争端竞起，而所谓大同者亦卒不可至，兵役究终不可免，以是知协约以求大同，其说为必不可行也。”

通过征伐、协约的手段无法实现世界大同终极目的，刘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提出，“书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完善”，此外，还有设立无政府共产主义模范示范，等等。刘铸伯、谭汝俭为其撮要说：“传播云者，谓专事社会文化，以养成人类高尚之道德，一方面则发展其个性，一方面则培育其群性，依人群进化公例，改造社会，便之进至于最高之一级是也；模范云者，谓以社会主义而行之一村，以为模范村，或以社会主义而行之一省，以为模范省，有此渐推渐广，咸以此模范之组织，以遍及干一国，且遍及于世界是也。”

他们在《社会主义平议》中写道，采用这两种方式兼以求大同，而不复济之以卤莽灭裂之手段，使大同而可致，“吾辈及其子孙，皆得身为大同之民，何幸如之？即大同不可致，而传播之所及，及模范之所示，事事皆不悖于道德，亦未尝不有助于人群之文化，吾固罔敢而訾焉。抑岂惟不敢訾，且将投身于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而为彼一走卒”。

但是，人类的发展史却是，古来之大宗教家、大教育家，无日不以道德之说谆谆教导其国人，经典教科书汗牛充栋，“更复托诸神道，以为无形之监督，设为刑政，以辅化导之所不逮，而世界人类，犹且为善者少，而为恶者多，故赫胥黎有言：泰西近百余年，物质上之文明，几于绝影而过，而道德上绝无可指之进步。以吾所见，则岂惟绝无进步，彼中之作奸犯科科者，且借科学作用，而遁出于法律之外，故盗窃谋杀之案，倍于中古而未有已，然则欲以道德之说感人，其收效固大不易易，亦既为世界学者所公认矣”。刘铸伯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仅仅提出不完不备之学说，或刊布小册，或登诸报章，朝立一宗，暮发一义，既无系统，又无学级，而欲养成人类高尚道德，发展其个性，培育其群性，改造社会，使进至于最高之一级，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

就刘师复等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通过“模范示范”的途径，可以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大同”的构想与做法，刘铸伯、谭汝俭并不表示苟同，认为同样无法实现大同，他们说：“就模范论，吾闻彼派中实行之者矣，昔民党纳政，尝自称广东为模范省，近年又尝闻大沙头附近某地，建筑村落，亦自称为模范村，其中组织，别无何等成绩，吾靡得而言焉。”

他们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傅里叶（刘铸伯译为富利埃）的实验为例，证明“模范示范”是一种空想，“惟曩者法国富利埃，尝以其理想而虚拟一共产团体，此团体由千五百人，乃至二千人之团员而成，相聚而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而其中仍有劳动、资本、技能三者之分，其盈余之所分配，劳动者得十二分之五，资本者得十二分之四，技能者得十二分之二，夫余分配既有多寡，则岁月之所积，得赢余多者渐以富，得赢余寡者渐以贫，是贫富之阶级终不可免，固与均贫富之旨相背驰矣。且组织之法，有

管理员役，有长官，有世界最高之官吏，是阶级之制，又依然存在，更与平阶级之旨相背驰矣。然富利埃之意，犹欲以是为模范，由一团而推之一国，由一国而推之全世界。持是空想，竟欲举千古立国之法，而以其说易之，以是为模范，何异使人弃九华之宫，而退居于圭窦，乘百丈之舟，而借杭（航）于一苇也？彼既知宫与舟之必不可弃，而乃舍广博而就卑狭，舍安乐而就危殆，是岂人之情也哉？既非人情，而欲全世界之人，皆来取法，吾又有以知其必不能也。”

以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事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实验（主张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建立社会平等），无不以失败告终。刘铸伯说，由于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凭借武力尚不能统一世界，“而谓以区区模范，能吸集全世界之人而致大同，宁非妄想之尤者耶”？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婚姻与家庭是导致人类不幸的根本原因之一，必须废除。早在1912年5月，刘师复就在《废婚姻主义》一文中历数婚姻制度之罪恶，“吾人于是宣言曰：欲社会之美善，必自废绝婚姻制度，实行自由恋爱始。而有为之梗者则伪道德之迷信是也。故欲废婚姻，又必自破迷信始”。《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宣称：“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育院之保养。”而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是一个坚定的“男女平等”论者，反对“男尊女卑”，谴责封建礼教，认为自由恋爱最根本在于去束缚、取自由；所谓“自由”是男女双方的自由，而不是男方压迫女方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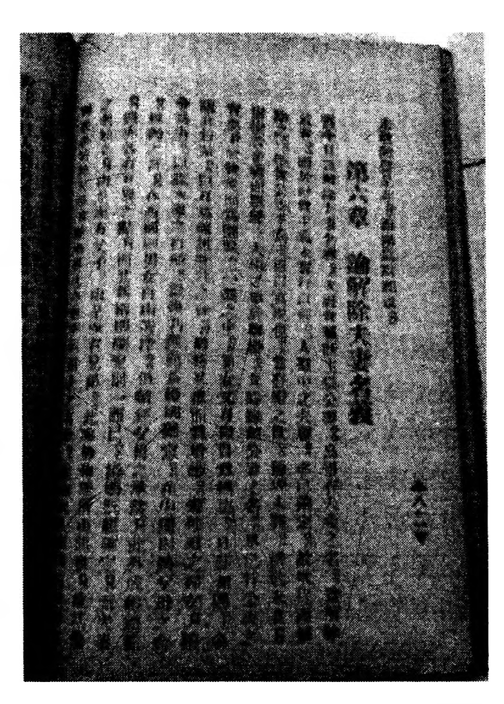
刘师复《废婚姻主义》（1912年5月）

而在1908年，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理论已经提出：“罢婚姻以行自由结合，废家庭以行人类之生长自由。”刘思复则断言，结婚是女子不能与男子平等之根源，婚姻制度的实质是强者压迫弱者的道具。男子乘势制定婚姻制度，并设置种种礼法和伪道德来迷惑和束缚女子，视女子为玩物。男子可以别有所爱、娶妾宿娼、妻死再娶；而女子则不能。一夫一妻制表面上好像胜于一夫多妻，事实上也是不平等的。“证之欧美女子，事实上终不脱‘男子之玩物’之范围。种种法律，亦男子是利”。男女恋爱不必考虑短暂还是长久，相反，男女之间即使没有结婚，只要两情相悦，出于自由真实的情感，虽无夫妻之名，也可相共白首，成为男女间之美谈，不需要婚姻制度来维系。男女恋爱，只要体力年龄性格智识相互适合就可以。一旦这些方面发生了变化，随时分离是非常正常的。离开之后，有遇到相互适合的异性，进行交

往，也是正常的，所谓“男女交合，由于生理作用之不得不然，自宜纯任自由，而不容有所拘制”。刘师复还提出：“欲社会之善美，必自废绝婚姻制度实行自由恋爱始。而有为之梗者，则伪道德之迷信是也。故欲废婚姻，又必自破迷信始。”

无政府主义者提倡“解除夫妻名义”，以实行其所谓“妇女国有”（“公妻”），这与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共产党宣言》写道：

>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
>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
>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
>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第六章　論解除夫妻名義

《社会主义平议》第六章《论解除夫妻名义》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提倡解除夫妻名义、解除父子名义的说法，刘铸伯在《社会主义平议》中分章予以驳斥。他们写道：

> 吾今日言解除夫妻之名义。夫社会党既主张公妻，乌得有夫妻之名？盖解除云者，谓于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人群中之夫妻，多已确定，故欲从而解除之，然后“公妻主义”，得以实现也。当野蛮之世，伦理礼教未立，蚩蚩者食处而歇爱，大多从事于杂婚，其时虽无“公妻”之名，早已行“公妻”之实矣。厥后进而为图腾，一群之中，男女文身以自为标志，日暮相遇，各认其行，以互为雌雄牝牡之

> 合。厥后又进而为“抢婚”，夺他群之妇女，……今为，以谋本群之自殖，厥后乃进而为婚姻确定。
>
> 在中国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西国则男女自由选择，仍须经父母之承诺。此外成婚礼节，虽亦各有互异之点，而其为婚姻确定则一而已。
>
> 婚姻确定，而“夫妻”之名始立，由是而有父子，由是而有兄弟，此家族伦理所由起也。故谈伦理者必始从夫妻，中外古今数千年……社会主义平而夫之有效，夫由杂婚以进至婚姻确定，不知经历若干阶级，然后成此伦理，成此礼数，今日人类乃得以享家庭之幸福，故谈天演者，咸以是为人群进化之大端。
>
> 今忽欲从而破之，果使目的得达，吾不知其为进化耶？为退化耶？如以是为进化，则野蛮时代之人类，早已优为之矣，又宁待彼党之哓哓哉？如认为退化，则亦何忍而相率为此也？虽然，与彼辈而谈伦理，与彼而谈礼教，彼且认为束缚人类之器械，使人类尽失其自由，则吾言必格格不能入，无已，吾且与之言事实，可乎？

刘铸伯认为，从人类健康角度考虑，不能废除婚姻制度。如果解除夫妻名义，实行所谓“公妻主义”，难道人群中能永保身体健康吗？“平康北里之卖淫也，其事于‘公妻’为近，然吾闻冶游彼中者，有一度而得染杨梅，永成痼疾者矣，有一度而传染麻风，永成残疾者矣。果使人人公妻，吾恐杨梅、麻风等毒，不待其年而已遍于大地。何也？以现在人群中，或以遗传，或以传染，含此隐疾，而终身不能愈者，盖比比也，其将检查之乎，则必发生大骚伤，且将尽聘天下之医生以从事兹役，亦恐不能毕乃事。且得贿满隐挟嫌诬陷之事，其流弊亦多，抑执行检查之权，亦必属诸政府，不又与无政府主义相冲突耶？”

其次，从种族的繁殖考虑，刘铸伯认为同样不能废除婚姻制度。因为，“人类普通之根性，又无不顾其种族之繁殖，故古者勾践败于吴，注重十年生聚。近者法国人口锐减，亦奖励生殖政策，即彼倡社会主义者，亦断未有以种族凋零灭绝而自以为快者也。今使解除夫妻之后，即实行其所谓公妻主义，试问人群中可望种族之繁殖否乎”？一旦婚姻制度不复存在，人口出生率“必有远逊于今日者，于无形之中，而自杀其种族，诚非仁人君子所忍为也”。并且，当时已有女权主义者倡极端自由主义，“畏保育儿童之苦，且有无端而避妊者矣，有无端而堕胎者矣”。如果实行公妻主义，男女皆日以纵情淫乐为事，避妊堕胎之事必然日益增多，人口生殖必然日益寡减少，“彼倡社会主义，将干涉之欤？则其事本于秘密，非同外人所能侦查，而于绝对自由之义亦悖。将放任之欤？则环球人类，其不驯至于灭种者几何也？即不避妊堕胎，而妇人之有身者，仍常负公有之义务，即常不能戒其容止，且放荡成性，于情亦莫能自禁，芽胚初茁，而风雨飘摇，固多有陨而不育者矣。循是为之，继不灭种，而生殖锐减之患，又乌能免”？

第三，从社会的安宁看来，他们认为同样不能废除婚姻制度。“人类之根性，又莫不深愿其社会之安宁，故环球万国，百凡政治，百凡法律，皆以维持社会之安宁秩序为唯一之目的，即彼倡社会主义者，亦未有使社会之人，日从事于仇杀欺诈而自以为乐者

也。”解除夫妻名义之后，实行其所谓公妻主义，试问人群中能保其安宁秩序吗？因为人类之妒情来源于天性，而男女之间为尤甚，情杀、奸杀之事屡屡发生，“其事虽不尽同，而其妨害社会之安宁秩序则一，甚未可以一念之微而忽之也。夫以婚姻确定之世，而又处于有法律、有礼教之国家，对于人群，咸有拘束之效力，其相争相杀之祸尚至于如此，况实行公妻之世，而又处于无法律、无礼教之社会，对于人群全失其拘束之效力者乎？”“妒则相争，甚则相杀，吾知相争相杀，必有千百倍于今日者。”

第四，从家政主理的角度考虑，同样不能废除婚姻制度。刘铸伯赞成“男女平等”的说法，但认为“以体质论，则男强而女弱；以性质论，则男刚女柔，此为天赋上不可掩之事实。故男子治外，女子治内，于义为至适”。他举例说：近代欧洲女子学校特别开设家政学一门，男校不开这门课，“盖以国家社会之事，责诸男子，家庭之事，责诸女子，各事其事，而不悖于平等之真义，亦既为古今中外学者所公认矣。夫唯以内事属诸女子，然后为男子者，得萃其全力，以担任国家社会之事，而无所牵系，此实社会之所由成，而亦国家之所由治也”。

那么，解除夫妻名义实行所谓“公妻主义”之后，今后国家社会还能够条理秩然吗？刘铸伯说，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无国家，对于国家方面，暂且姑置勿论，“若夫社会方面，则百凡事业，固有因之坐废者矣。人类之生存也，无论挟持何等主义，而农、工、商、矿等业，皆不容或缺，然后有以供人生之用。今既公妻矣，则凡属于家庭以内之事，如烹饪、缝纫以及一切琐琐细故，果将属诸谁人耶？将使所谓‘公妻’者任之乎？则彼身既属诸‘公有’，平日爱情甚泛，又无专责，断不肯专为一人任劳，其势固不能不自行任之矣”。

刘师复认为，家族是进化的障碍物，废除婚姻和废族姓、废家族是相互联系的。他在《废家族主义》一文中宣称：“家族之起源，由于婚姻，家族之界域，成于族姓。故废婚姻，所以去家族之根源，废族姓，所以泯家族之界域。二者相为表里者也。”家族的起源是由于婚姻，而家族的体现是一族的姓，所以通过废止婚姻制度而断绝家族的起源，并通过废止族姓而解体家族的界限。为了解决儿童、老人、女子等家族问题的矛盾，他提出设立“公共产育院”“公共养老院”“女子习艺院”，“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纪革命，所以助人道进化者也”。

对此，刘铸伯在《社会主义平议》中》专辟《论解除父子名义》一章予以反驳。他们写道：

> 夫倡社会主义者，既主张“公妻”，则凡为人子者，其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乌得复有父子之名？解除云者，谓当社会主义未实行以前，而父子之名义，早已确定，故必从而解除之，而后实行其谓儿童国有也。
>
> 然吾闻寰球立宪各国，无论为君主，为民主，其国莫不有公民之名，其人亦莫不能自保其公民之资格，自尽其公民之责任。公民者即国有之义，而考其国俗，则父子之名义如故也，察其家庭，则父子之恩谊如故也，又何尝必待解除父子名

义，然后可进而为“公民”哉？且儿童未及年，例不得为“公民”，而必推诸“国有”，果奚为者耶？

《礼运》之言大同也，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夫既曰其亲，既曰其子，是父子之名义，显然有所专属，而曰“不独亲”之子之云者，不过由己亲而推之他人之亲，由己子而推之他人之子，如孟子所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意云耳，岂有自弃其亲，而爱他人之亲，自弃其子，而爱他人之子者哉？

夫父子之爱，根于天性。人既忍于自弃其亲，断未有能爱他人之亲；既忍于自弃其子，断未有能爱他人之子者，曾子不云乎：“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有也。”斯言可深长思矣。今乃欲解除父子名义，而进之为“公民”，夫父子之爱，非其所厚者耶，途人之爱，非其所薄者耶？

若父子之爱既绝，则其爱根之薄弱可知，而欲其爱及途人也，不亦难乎？且欲其爱及天下国家也，不尤难之难乎？天性之亲，爱情之感者至切，爱情之所推也至近。夫切且近者且不能爱，而欲其爱及天下国家，吾是以知其必不能也。即曰能之，亦必出于伪而不可以久。何也？盖爱情者，如果之有仁，故称曰仁爱，果仁之中，有生气焉，含此生气，及春而发，越时而胚胎，越进而枝叶，越时而拱把，又越时而拔地参天，人见其拔地参天也，知为生气之所弥漫，而知其初固自一果仁中之生气来也。使于为果仁之时，剥之斫之以绝其生气，则拔地参天之巨木，早已枯萎于一那刹间矣。彼解除父子名义者，是欲于为果仁之时，剥之斫之以绝其生气者也，生气既绝，则后此之根于生气者，皆无自而发生，从而强之，是直宋人拔苗助长之故智，不崇朝而已槁矣，吾故曰伪而不可以久也。

观于彼党，日言仁爱，而适以养成激烈凶暴性质，未始非解除父子名义之一念有以致之，是岂非其明效大为哉？虽然，彼辈尽有词矣，谓父子之名义不去，适以养成为子者倚赖之劣根性。及其既长，必不能独立自营。其说似矣，然试问父子名义，既经解除之后，将以其子属谁人乎？其将效斯巴达之制，归诸公民局欤？则各国公民同未设，芸芸者将无所归，可无论矣。即曰有之，在未成年之子，则以抚以育，以养以教，在公民局亦必不能免，其与父母之抚育教养相去几何？岂抚育教养之责，属诸父母，即能养成其依赖之劣根性，属诸公民局，即能远拔去其依赖之劣根性耶？及其子成年以后，则为父母者，亦未尝不使之独立自营。姑息之习，即中国亦居少数，而欧美男子，凡成年以后，大率人人皆有以自立，固全不出于公民局也，故斯巴达之旧制，亦不久撤废。夫已设者且废，而未设者欲设，违弃家庭之习惯，而自取多事，宁非愚妄之甚者耶？虽然，与彼党而谈儒先学说，及家庭习惯，彼将目为迂阔顽固而不任受也，无已，更与之言事实。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免除死刑说法，刘铸伯也在书中进行了探讨与辩驳。

第四节　批驳无政府主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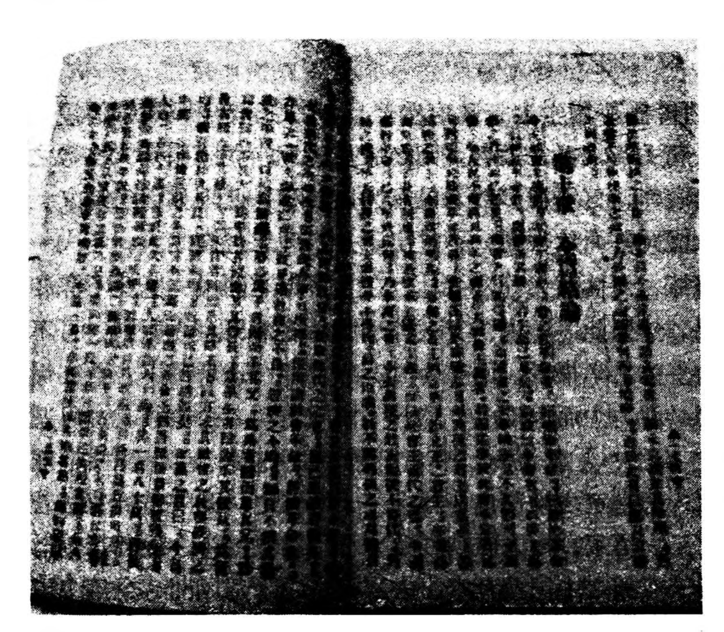
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传播甚嚣尘上，政府曾经反复打压取缔。刘铸伯说："大凡圣豪举事，其利害得失，苟关于人群之大者，则必服从民意，尤须服从大多数之民意。无论主张是何学派，是何政体，莫不视多数之民意为以转移，此理如天经地义，不可移易。今倡社会主义者，欲废元首而致大同，不过出于一二理想过高之人，与夫一部分之暴烈派，思藉是以行其破坏，而偿其无等之欲耳，在大多数之国民，既莫不深相厌恶，虑其贻人群以莫大之惨祸。然则此等学说，实大悖乎服从多数民意之原则，吾不意日言扩张民权，日言谋国民大多数之幸福者，而亦为此态也，即曰违反民意，吾亦悍然为之，然既为民意所不愿，则必助力少而反动多，欲其与协同运动，强迫其君主以遁荒逊位，而从事于协约也，不亦难乎？"又说："今者此种学说传播，几于震撼全球矣。俄之革命也，社会主义革之；德皇室之倾覆也，社会主义倾覆之。此外若英若法若意若匈，莫不受此主义之震撼，工人罢工，市人骚动之事，早已胜载报章，近者其传播之力，且西及于美洲大陆，东及于亚洲之中国及日本，去岁日本之米荒风潮，今年中国之拒约风潮，何一而非社会党之鼓吹耶？循是不变，吾不知国前途之所届也。噫，彼党之潜势力，亦可畏矣。"

刘铸伯认为，无政府主义学说不过东邻西爪，散见于各译本之中，"然吾观于彼党之所主张，要义虽分为六大纲，而其主持最力，而又能深入乎社会人人之心者，则莫如均贫富之一义，而无政府之一义次之。观于近日报载，自称《东方代治机关之宣言》，其纲领为共有财产，共同劳力，则其所注意者可知，其余各节，则虽同出一党，而各派之主张多不尽同，即同出一派，而亦视社会人心之顺逆向背，随时而变易其说者也。当国者苟畏此风潮之震撼，则所为消弭而防止之者，亦可知所从事矣"。

一般而言，一种学说无论正确与否，一旦在传播过程中蔚成一种风气，深入社会人心，"则虽有大力，莫之也敢逆"。眼见无政府主义思潮传播如是其广且速，刘铸伯认为无政府主义固不可行，而其说则足以祸天下者也，"欲从而消弭防止之，则莫如持国家的社会政策……夫国家社会政策者，谓以国家之权势，施行其平均政策，凡属经济上之设施，皆含有裒多益寡，抑强扶弱之意味，限制豪富，保护贫民，斯贫富虽未能平均，而不至令富者长富，贫者长贫，且能令富者杀（去声）其有余，贫者弥其不足，则与均贫富之主义已相接近，抑以国力为支配，制其势顺，其事易集，与彼当挟其暴力横

加迫，至天下黯然其不情者，判然不同，吾所称为国家的社会政策者，盖以此也，胪而举之，有两大义，其一为对于世界言之者，其一为对于中国言之者”。

刘铸伯把欧美各国防止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办法，归纳为实业救济、征收租税、消弭罢工、施行劳动家保险制度四种，指出以上四端，西国有已行之者，亦间有未行之者，当今处于无政府主义运动最剧烈之时代，“苟非四者同时并举，恐无以息此风潮，即非各国同时并举，则此种剧烈之手段，或集注于一国，一时秩序大乱，非经历多年而不能复，观于俄罗斯受过激党之破坏，领土至分为十四国，非其前车耶”？



《社会主义平议》第十章《全书结论》

我们在前面说过，《社会主义平议》出版之际，科学社会主义尚未传入中国，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也说：“这以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有一些讲社会主义的人讲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空谈和现实生活有多少关联。有一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只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有现实意义，他们以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胡绳这段话只是笼统带过，并未指明具体人物。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刘铸伯、谭汝俭堪称呼吁“采用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表性人物。比如他们认为，为救济贫民计，最好将矿山、铁路、工厂等大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备价而买入之）：

价买之后，则一国之富权，渐操诸政府，而国民贫富之程度，自不至过于相悬殊，斯有以平贫苦小民之气，且政府凭借此富权而为之支配，虽无取乎发财散粟，而能事事注重贫民计，则贫民之生活，其程度亦日以高，此后虽有倡共产主义者，人民安生乐业之既久，雅不愿无故自扰，其说自无由而入。盖此事由社会自身行之，则能力必有所不逮，且不免于妨害治安，若以国家之力行之，则集事固易，且足以助成一国之良好政治，此吾所谓国家的社会政府者一也。

至于中国防范无政府主义的办法，刘铸伯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并不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大，“谋国者对于资本家、实业家，正宜资奖励之，保护之，俾得储其富力，以与外商竞，而有以自存于商战剧烈之时代”，所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很难找到发育的土壤。但是，他也清醒地看到：“自比年以来，内乱频仍，四民失业，迨欧战终止，更患米荒，米价之昂，为千百年来所未有，一时壮者为盗贼，弱者填满壑，执政者又无术以济之，哀彼小民，辛苦昏垫，几无复以有生为乐。俄国过激党主义之传播，遂乘虚而入，一般党人之失志者，久已伺隙思动，乃群焉假借其学说，以为攻夺政权之利器。彼非必认其说为可行也，然以是为揭橥，则适有以入乎社会人人之心，而得多数愚昧鲁莽之国民，以为之援助，此各省罢课、罢市、罢工之事，所以一再发而未有止也。谋国诸公不深察其致此之由，亟为根本上之救济，而唯通电各省，严密查拿，夫天下固有禁之不止，而激之愈厉者，以其所为，是岂唯扬汤止沸，直不啻增薪而助之燃耳，宁不为彼党所窃笑矣耶？”

刘铸伯说，尽管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较难，但是如果不采取有效手段消弭防止，“一任彼辈遗布疫菌，将来滋生延蔓，势必贻国家前途以无穷之惨祸，此识者所以引为莫大之隐尤也”。为此，他开出包括实业教育、移风易俗、改良政治、救灾恤贫等消弭防止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办法。而对于“改良政治”一法，尤其三致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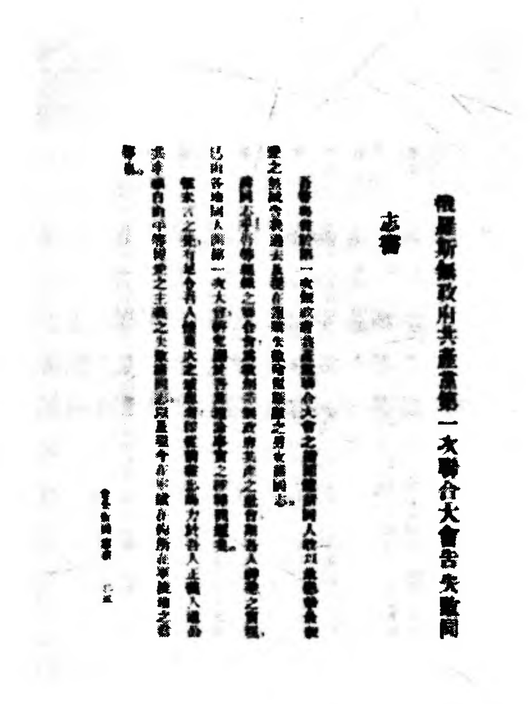
> 故为今日挽救时局计，莫如早谋统一，以良好之法律，良好之政治，求恢复全国之秩序。谋国者以廉静淡泊自矢，首以其身为之倡，然后颁发条教禁令，凡侵蚀公款者有刑，收受贿赂者有刑，搜刮民财者有刑，劫掠闾市者有刑，而犹虑其壅于上闻也。知事有犯此者，县会得请愿于省会而弹劾之；吏有犯此者，省会得请愿于国会而弹劾之；中央部吏有犯此者，国会得直接弹劾之。一经弹劾，则付之司法，而处以相当之法律，而平民对于各官吏，亦得向平政院而为行政之诉讼，如是则一般贪墨之吏，或不敢盗国剥民以自肥矣。宫室、衣服、车马、器用之制，复按其品秩而为之规定，有违僭者罪之，而官吏奢侈之风，亦或可少戢矣。
>
> 前清之季，纪纲废除，而秩序仍未大紊，故虽方面大吏，鲜有积资逾百万者，而等威之制，尤相率恪守而莫之敢皆僭，是岂非历代整饬秩序之明效哉？抑吾尤有进，凡若辈之所拥积，皆赃款也。既属赃款，则揆诸法律，自应没收；若于弹劾惩处之后，并没收其财产，用以创设各种大工厂，大农业场，以为收纳贫民之用，斯民得所养，而实业以兴，一举而两善备焉。兹举也，于均贫富之说为最近，然手段之正与不正，则判然殊矣，信能行此数者，则斯民之愤懑日以平，民生之艰苦日以减，虽诱之以无政府主义，当不至如今日之易动矣。

对于恤贫救灾（水灾、旱灾、风灾、蝗灾、病疫），刘铸伯从来是不甘人后，我们在其他章节有过讲述。讲到消弭无政府主义思潮蔓延，刘铸伯认为，恤贫救灾首先是政府的责任。他说：“昔之谋国者，关心民瘼，当灾害之未至，思有以预防之，此河防水

利诸要政所由起也；迨灾害之既至，思有以补救之，此救荒检疫诸要政所由起也。乃民国以还，内而枢府，外而省吏，日惟汲汲焉以争权夺利为务，绝未闻有以民间疾苦，一撄其心者。故山东有河务局之设，而修理河工之事无闻焉；全国有水利局之设，而整顿水利之事无闻焉；吾粤有治河督办之特设，而清河道之事亦无闻焉。若是者何也？以争权夺利之故，连年用兵之费，不啻以万万计，各党运动之费，不啻以数千万计，遂无复余力以从事于此故也。且民国八年之中，水灾见告者屡矣，而执政者漠然；数月以来，米荒见告者又屡次矣，而执政者亦漠然。"

执政者对民生疾苦漠然视之，刘铸伯说那是因为，"若辈心目中只知有权利，而于斯民之疾苦，久不啻秦越人之视肥瘠故也。苟谋国者哀念民生之多艰，而怵然于政柄不可幸窃，移其连年用兵运动之费以谋人群之公益，当灾害之未至，而思为之预防，及灾害之既至，而思为之挽救，则斯民困苦之状，断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继不为防弭社会主义计，要亦为政者所应尔也。夫以数万万之用兵运动费，不能已乱，而适以召乱，今乃于一转移之间，既有以自尽其为政之责任，而社会主义输入，应附之者亦稀，用以防弭前途无穷之祸，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刘铸伯认为，推行实业教育、移风易俗、改良政治、救灾恤贫，可以防弭无政府主义的传播，而对于欧美国家实施实业救济、征收租税、消弭罢工、施行劳动家保险制度这四种防范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办法，中国也可以择其适宜者而采用之。"虽然，天下之学理无穷，事变亦无穷，况彼党所主张者，尤宏廓窈冥，如河汉之无无极，欲详究其说，诚非吾之寡薄所得而尽也。故谋国者，苟欲取国家的社会政策，以移易极端的社会主义，则莫如取社会主义诸学说，遍观而尽识之，然后知何者与吾之政策相接近，何者与吾之政策相乖忤，何者为现在人心所陷溺，何者为现在人心所格拒，乃徐以吾之政策，移易之而适相应，斯其祸或可消灭于无形耳。"


俄羅斯無政府共產黨第一次聯合大會告失敗同志書

刘师复《俄罗斯无政府共产党第一次联合大会告失败同志书》（1914）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刘铸伯并不一概排斥，他说："夫彼党不欲实行社会主义则亦已耳，若果认此为救济人类不可免之要义，而必欲见诸事实，则国家的社会政策，与彼所怀挟之主旨，相去固不甚远也，语其究竟，虽未克尽如其所期，而未尝不可收得半之效，乃必加之诱谤者何哉？呜呼，吾于此以窥见彼辈之用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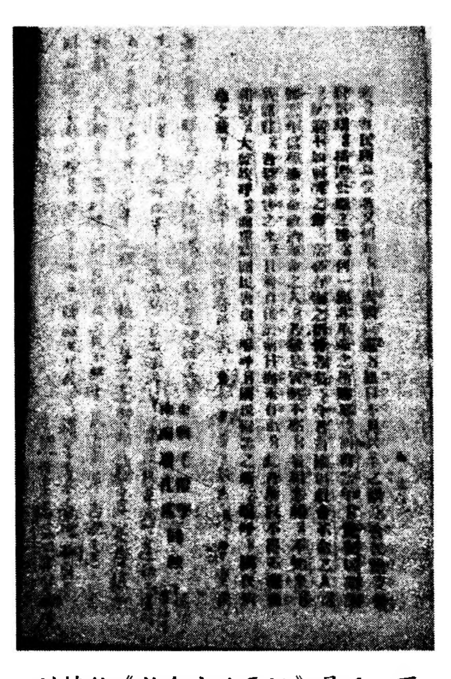
刘铸伯生当清季，虽然长期生活在香港，但是目睹了晚清、民国以来的种种"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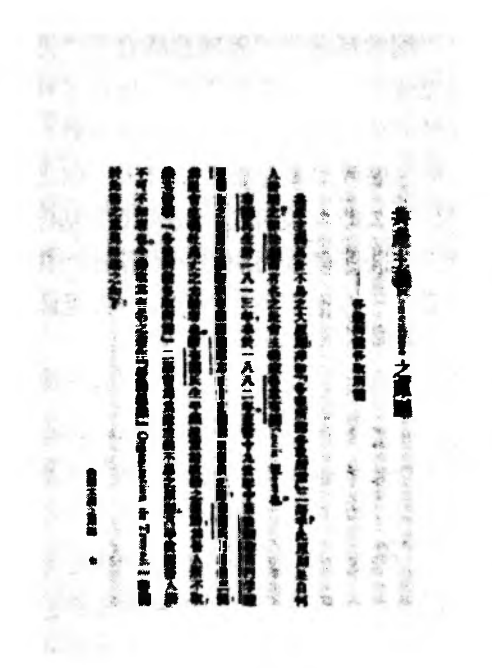
命”，针对刘师复提出的“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万国总联合”“万国大罢工”（平民大革命）、“万国大革命”等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手段，他在《社会主义平议》一书结论中写道：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号称革命主义，“昔之言革命者，曰种族革命。倡种族革命者，则去异种之君主而已足矣；倡政治革命者，则排夫专制之君主而已足矣。两者之目的得达，而国家之安宁秩序，不久即可望出复，而人民不复再见兵革之祸。”但是无政府主义从经济入手从事革命，“彼即以是为职志，则异种之君主固当革，即同种之君王，亦靡得而免焉”。这样一来，他们将革去“国家”，以无政府主义取而代之。在本书篇末，刘铸伯大声疾呼：

中国举行革命，已八年于兹矣！乃辛亥之役，革去异种之君主而彼不得代；丙辰之役，革去同种之君主而彼亦不得代。前之两义，即不能再挟之以为号召，于是不得不借社会主义，以为惑众倡乱之资。

观于彼党刊布小册，自称为“东方代治机关”，则其对于政府，欲取而代之之意，固已昭然若揭矣，若彼果代之而能治，则吾民亦宁有所择？但所谓社会革命，经济革命者，岂革去一君主而遂已也？彼见为社会之不良，经济之不均，无日不挟其偏陂之学说，以相为鼓煽，势必为子者归而革其父，为弟者归而革其兄，为妇者归而革其夫，为卑幼者归而革其尊长，为学生者归而革其校长，为庸役者归而革其厂主，为火伴者归而革其肆主，以力求其社会之良与经济之均，顾吾恐社会未良，经济未均，而斯民已无噍类矣。

中国无政府主义宗师刘师复逝世不几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误认为这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胜利”，纷纷呼吁中国也要走俄国的道路，就像刘铸伯所说：“彼党之言曰：今日中国，当为俄罗斯革命，不当为法兰西之革命。”但他根据当时对于苏俄革命的负面新闻报道，拒斥俄国革命，显然带有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譬如，刘铸伯指出：“吾闻俄京以圣彼得堡，夫人口二百四十万，自经此次革命，人口仅存六十万，其一百八十万，皆被过激党焚杀奸淫以死者也。呜呼，彼辈欲自为政府，则径自为政府可耳，何必倡此种学说，而坚欲步俄国之后尘哉？呜呼，当前清之末，吾民亦尝顶礼尸视，以望革命之成功矣，顾辛亥一役，非所谓改建共和者耶？而八年之中，吾民所身受者何如？丙辰一役，非所谓恢复共和者耶？而四载以来，


刘铸伯《社会主义平议》最后一页



刘师复《共产主义之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914年5月）

吾民所身受者又何如？计民国以还，无日不见兵革之祸，吾民饱受焚杀屠劫，播迁仳离之惨，何一而非革命之所赐耶？回首当年，觉安居乐业，反远不如前清之日，当必悔之析骨者矣。今者吾国倡社会革命之人，即当年倡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之人，若犹是贸然不察，妄相应和，不知来，视诸往，吾恐祸害之来，且将百倍于前日而未众止，此吾所以不得不沥血和泪，大声疾呼，而重为国民告也。呜呼，国民尚念之哉？呜呼，国民尚念之哉？"

总而言之，无论对于研究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研究共运史的学者来说，这本191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平议》，都不失其文献学价值。

事实已经证明，刘师复等人民国初年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属于彻头彻尾的"乌托邦"。1914年7月，刘师复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并发表宣言："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他还在《无政府浅说》一文中宣称："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刘师复主张直接跳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阶段，而实行按需分配。为了实现这一理想，1912年4月，刘师复和丁湘田、郑彼岸曾经在杭州讨论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红荔山庄"，据文定《师复先生传》记载："先生又以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到乡村居住，半耕半读，曾在新安的赤湾觅得一地，从香港航行约两小时可到，面临零丁洋，右傍宋帝陵，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刘师复约志同道合的人至红荔山庄居住，拟在这里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建立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地，结果以失败告终。

1912年新安县的赤湾，就是现在的深圳市赤湾港（处于深圳经济特区西部的南头半岛顶端，位于珠江口东岸，距香港20海里）。1912年，新安县定为二级县，由省府直辖，首任民政长知事何恩明。刘师复在新安县赤湾觅地，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红荔山庄"的计划流产了。1913年1月，因新安县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而更名，复称宝安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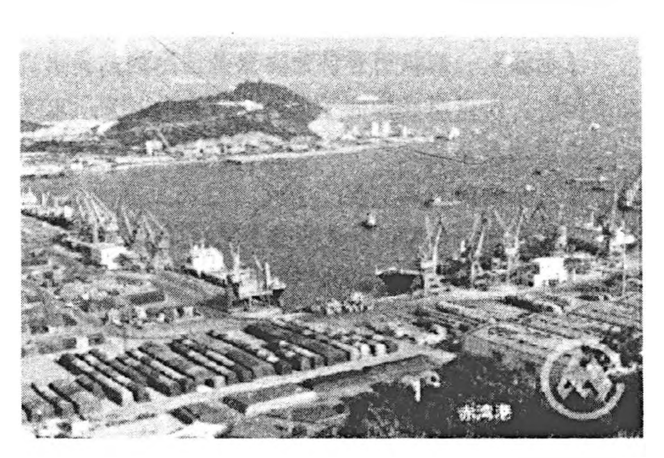
1979年初，凭借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的契机，招商局的一批创业者来到与赤湾相邻的蛇口，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蛇口"曾作为我国经济特区的"试管"，最早按照国际惯例与初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

的机制，开启了中国的“希望之窗”。

历史的发展过程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巧合与吊诡。作为一种激进主义思潮，刘师复等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对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就是扮演了一个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崛起的“助产婆”角色，而且，无政府主义对早期共产主义者产生过影响。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曾坦言自己1918年后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深圳赤湾宋少帝陵



深圳赤湾港

以前读《西行漫记》，从未怀疑过这段文字记载的准确性。直到邬国义2006年1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从〈西行漫记〉的一处误译谈起》，我们才知道：“朱谦之”原来是“区声白”的误译。现在尚不清楚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后期代表人物区声白之间具体的交往细节，但从毛泽东回忆所说，区声白“常常”“来看我”并和他“讨论”无政府主义前景的情况来看，尽管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其间显然流露出两人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

但是，毛泽东最终选择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意见分歧很大。蔡和森等会员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表示不同意后一种主张，而对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新会，热烈讨论了这个问题。

与会十八人，何叔衡、毛泽东等十二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通报了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共产党，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书影

1921年夏长沙编印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节录了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可视为他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

>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
>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一月一日）

>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
> 1. 社会政策。
> 2. 社会民主主义。
>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
>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 5. 无政府主义。
> 6.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
>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一月二日）

刘师复等提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及其从事的种种“实验”，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列宁早在1901年就说过：“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师复主义”早已沦入忘川，“红荔山庄”已经无处可觅，刘铸伯、谭汝俭《社会主义平议》雪藏百年，乏人问津，但是每次

在蛇口坐船，看那波浪起伏的大海，看那上下翻飞的鸥鸟，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100多年前，无政府主义的一代宗师刘师复，曾经在赤湾宋少帝陵附近觅得一处地方，“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幻想着在这里创建“红荔山庄”，作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圣经》中有处记载耶稣曾提到恺撒，耶稣说出这条原则，是要回答犹太人应否缴纳“人头税”给罗马政府这个问题。“恺撒”一词，指的是政府或国家。既然刘铸伯、谭汝俭所著《社会主义平议》一书，在考察欧洲无政府主义起源时，上溯到“希腊古代之哲学家，如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已倡‘共产’之说，而基督教亦含有此种意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20世纪初的以“师复主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同样包孕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科学社会主义里，也一样孕育着无政府主义的萌蘖（可以“文革”为例）？或者正如钱钟书先生《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所言：“即使在满纸荒唐言的神怪故事里，真实事物感也是很需要的成分；‘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imaginary gardens with real toads in them），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相反相成，才添趣味。绝对唯心论也得假设客体的‘非我’，使主体的‘我’遭遇抗拒（Anstoss）而激发创造力，也得承认客观‘必然性’，使主动性‘自由’具有意义和价值。这是同样的道理。”

提到无政府共产主义试验基地“红荔山庄”，我们这番话越说越远越离题，本想就此打住了。但是，2015年3月5日，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与龙岗区政府签署“深化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落实国家“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前海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战略，其中包括：将龙岗区平湖金融与现代服务业基地、平湖西部工业园区，打造为“前海后陆（平湖）拓展区”。据记者说，平湖一夕间荣登“国家战略实施区域”，将是数年内最狂飙的片区，没有之一……这就令人啧啧稀奇：刘铸伯故里平湖，如今又与“红荔山庄”旧址搭上一层关系。



第七章 回报故里

先考讳鹤龄，字守真，铸伯其号也，世为宝安县平湖乡人。……平湖者，先人之庐墓在焉。先考既为国人谋，尤笃爱其乡。广九铁路方建设时，先考请于省吏，将原定路轨改近平湖，并于其地设车站，乡人称便，而路亦不纡。乡农贫苦，时以子妇质钱，而困于重息，子女多没为奴婢，先考悯之，乃创设昌裕公司，储资出贷，取息甚微，农人贤称颂不置。吾国无市政，先考乃请于省吏，小试于其乡，创市场，设学校，立工厂，建医院，附以农林实业，规模粗具，于时人所称模范村者，庶几近之，其施于乡有如此者。

——刘富宗《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世谓“有家族观念者，不必有国家之思想”，想如刘君铸伯此举，于慈母贤妇之德，既永矢不忘，于利人济物之功，且交相为用。人特患不爱国耳，岂以家族之故，遂足为国家之障碍物哉？今当纪劬劳学校及念妇贤医院开幕礼，鄙人以刘君热心社会事业，深嘉其见义勇为，欲举是为当世之爱国者劝焉。

——朱庆澜在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开幕典礼上的致辞



平湖火车站老照片（约摄于1911年10月—1914年），原照片藏美国南加州大学



纪勋劳学校旧址



念妇贤医院旧址

第一节 创建平湖新墟

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诞生于英国。大约十年后，有关铁路、火车的知识陆续传入中国，但铁路在中国的命运远比在英国曲折艰难得多。1880年，刘铭传奏请效法西洋，修筑铁路，但此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派反对。1881年，李鸿章请求在唐山至胥各庄建一条运煤铁路，在答应不用机车改用骡马拖拽等条件下，清廷同意修建。1882年，经过反复疏通才允许改用机车牵引。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台湾首次单独设省，首任巡抚为刘铭传。1887年初，刘铭传再次以加强防务、开展商务为由，上奏朝廷请求重建台湾铁路并很快获得批准。刘铸伯在担任台湾淡水西学堂教习、总教习、洋务委员期间，目睹了台湾铁路修建的整个过程。

建设一条从广州到九龙连接粤港两地的铁路，国内早在1888年已有人提出，据1890年香港《孖剌西报》报道："约两年前，九龙有些资本家筹划一条从广州到九龙的铁路，并请求官方批准。"1890年，曾随节出使外洋的湖北候补知府易学灏再次提出筹集商股，创办铁路。而在英国方面，从争夺华南利权出发，对修建这条铁路也抱有极大的兴趣，早在"租借新界"之前，英人已进行了该路线的若干勘测工作。在强租"新界"时，英方已有意将租借新界与修筑铁路联系起来。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写入了"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的条款。

1898年，英国开始向清政府提出九龙——广州的铁路修筑计划，以方便英国将货物和人员运往内地市场。次年3月28日，即新界界址划定后的第九天，英方便强迫当时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由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组成的中英公司签订了《广九铁路草签合同》。按这份草约，广九铁路计划修筑121英里，中间以深圳罗湖桥为界，分为英、华两段。其中英段铁路由英国政府负责修建，资金由英国政府在香港发行公债筹集；华段铁路由清政府负责修建。

清政府对于打通香港与广东通道的想法颇为复杂：一方面，修建铁路有利于堵截走私、加强关税征收；但另一方面，这条铁路一旦修建好，势必会让英国的野心加大，在便利交通支持下，英军开进广州将会更加快速。但在英军的枪炮压力下，清政府并没有多大的选择空间，清政府铁路大臣盛宣怀签了草约。

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忙于应付列强的庚子赔款压力，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铁路修



詹天佑（1861—1919）

自 先考始也自時厥後薄海內外聞風響應
論者謂孔教不墜 先考與有力焉蓋敦勸
學一以振興祖國為主旨 先考之素志然也
平湖者先人之廬墓在焉 先考既為國人謀
尤篤愛其鄉廣九鐵路方建議時 先考請於
省吏將原定路軌改近平湖并於其地設車站
鄉人稱便而路亦不紆鄉農貧苦時以子女質
錢而困於重息子女多沒為奴婢 先考憫之

六

《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筑费用，无奈之下向英政府伸手借款。1907年，中英政府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的总额为150万英镑，这笔钱规定只能用于建造广九铁路。但是所附加的条件极其苛刻，如：借款的年息为5厘；每向英国借贷100万英镑，中国只能实收94万英镑；借款以建成的广九铁路作为抵押；重金聘用参与建造铁路的英国技术人员，每人的年薪为3.5万英镑。同年7月，英国修筑九龙至深圳段35.78公里率先开工，而广深段则在1909年动工。中英商定以罗湖桥中孔第二节为界，分为华、英两段。当时华段全长142.77公里，即今之广深铁路。

广九铁路的修建，由容闳的幼童、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华人铁路建筑工程师詹天佑担任顾问；广九铁路由石龙到深圳一段的测量、绘图和建筑工程，则由毕业于耶鲁大学工程系的凌善芳（深圳布吉人）完成。

广九铁路最初设计的行经线路，远离平湖。刘铸伯意识到，这是促进平湖发展的机会，如果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平湖的发展将大为落后。于是，他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力排众议，据理力争，最终促使广九铁路修改路线，在平湖设站，并由他负责出资修建火车站。关于此事，《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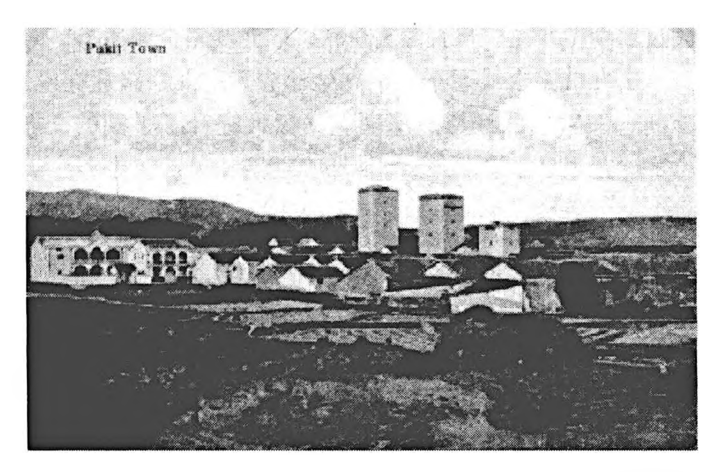
> 平湖者，先人之庐墓在焉。先考既为国人谋，尤笃爱其乡。广九铁路方建设时，先考请于省吏，将原之路轨改近平湖，并于其地设车站，乡人称便，而路亦不纡。乡农贫苦，时以子妇质钱而困于重息，子女多没为奴婢，先考悯之，乃创设昌裕公司，储资出贷，取息甚微，农人咸称颂不置。

凌道扬（1888—1993），广东省宝安县布吉人（今深圳）人。中国近代著名林学家、农

学家、教育家、水土保持专家。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林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解放前夕移居香港，担任崇基书院院长，参与推动创办香港中文大学。据凌道扬回忆，他的叔叔凌善芳（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赴耶鲁大学进修工程学）参与了广九铁路华段的测量绘图。凌道扬在《片断回忆》一文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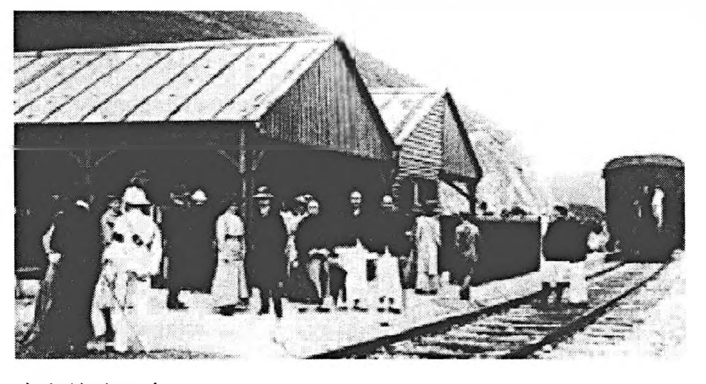
> 芳叔于完成了广九铁路，由石龙到深圳一段的测量、绘图和建筑工程……我清楚记得，芳叔在我的家乡布吉村准备建筑火车站的时候，所遭受的艰苦，甚至几乎被人暗算，当时那里的村民，是最迷信和最激动的，他们认为火车站的建造，会破坏整个乡村的风水。不过，现在布吉的居民，已经很开通了，对于芳叔的远见，和他对本村的贡献，有着深切的感戴。
>
> 当由石龙起点的一段广九铁路完成之后，那位耶鲁大学出身的工程师，通晓两个国家语言的学者——芳叔，对开发粉岭地区的可能性，及移殖需求土地殷切的布吉村农民到该地的计划，送交给了家父。
>
> 芳叔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但是先进铁路工程师，和他同时的那位建筑北方京张铁路的朋友詹天佑先生一样，而且更是一位精通两国语言的学者。当他在便往耶鲁大学进修工程学。

我们据此可以想象，刘铸伯在修建广九铁路时，“请于省吏，将原之路轨改近平湖，并于其地设车站”，即使这番吁请难度不大，他还要苦口婆心地说服迷信风水的平湖父老。凌善芳在家乡布吉村准备建筑火车站时，险遭受迷信风水的乡亲暗算；那么刘铸伯呢？他倡议在故里兴建火车站时，平湖村的耆老乡绅们，会一下子接受“火车”这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庞然大物？他们不担心火车站的建造，会破坏当地的风水吗？在旧传统、旧风俗牢不可破的时代，移动一张桌子都随时可能引发一场革命，刘铸伯说服乡亲在平湖修建火车站，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至于广九铁路开通，“乡人称便，而路亦不纡”，那当然是后来的事情。



广九铁路修建时的布吉老墟村

广九铁路的华段是从广州大沙头到深圳罗湖桥，于1907年8月工程开始动工。英段铁路从罗湖桥到尖沙咀，1909年开始动工兴建，铁路虽短，筑路费用却是当时世界筑路史上最昂贵的。据统计，每公里的建造费用高达120万英镑。因为全线要开凿6个山洞，修



广九铁路通车

筑38条桥梁，还要填补数不清的海边鸿沟。其中，狮子山隧道的开凿最为艰难，所挖泥土的堆积量，相当于中环新填地的一倍多。铁路于1911年建成通车。

广九铁路的通车谈判，中英之间颇费周折。原定通车大典由两广总督和英国总督一同主持以示隆重。但由于双方官员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于是双方都改为次一级的官员主持。香港以辅政司为代表，广东方面则以广州官员为代表，火车原计划是从九龙尖沙咀直接通往广州，也改为各自通车。

1911年8月14日，通车典礼仪式如期分段举行。港方辅政司在尖沙咀火车站主持通车典礼，然后从嘉宾门登上火车，直接开到深圳的罗湖。广州方面则从大沙头火车站乘坐第一列火车，开至罗湖。然后，粤港双方官员步行至罗湖桥上，主持接轨典礼。当晚，两段铁路路轨接通。第二天，广州的火车驶过罗湖桥直抵尖沙咀总站。而香港的火车，驶过罗湖桥开往广州大沙头总站。广九铁路全线通车。

广九铁路全线通车，平湖站建成为广九铁路深圳段五个车站之一（其余四个车站为李朗、布吉、深圳墟、深圳），极大提升了平湖的交通运输能量，平湖成为新安、惠



平湖火车站（约摄于1911年10月—1914年）。这可能是目前已发现广深铁路上最早的深圳车站影像（原照片藏美国南加州大学）

阳、东莞三县的交通枢纽，地位与作用骤然提升。

刘铸伯以广九铁路为依托，在平湖火车站附近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程，建造新墟镇。他亲任设计师，完成平湖新墟的设计。新墟成“田”字形格局，设有上、下六条街道，其中的守真街，向北延伸一公里，至青奇坑刘家花园“守真园”。深圳学者蔡惠尧说：“1916 年，新墟建设基本完工。从‘平湖人民公社老墟镇房屋四至图’不难看出，新墟规模庞大，店铺鳞次栉比，街道宽阔规整。在此后岁月里，新墟历经时代风云的洗涤，至今仍存基干部分，当年风貌，依稀可见，依然发挥相当大的商业、物流中心作用。”

新墟建设涉及众多具体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当属刘铸伯出资开设商场，以及建设念妇贤医院、纪劬劳学校等。关于此事，《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写道：

乃創設昌裕公司儲貲出貸取息甚微農人咸稱頌不置吾國無市政 先考乃請於省吏小試於其鄉創市場設學校立工廠建醫院附以農林實業規模粗具於時人所稱模範村者庶幾近之其施於鄉有如此者其開在香港設華人永遠墳場設恤孤寡局設楊流所設種痘局設公立醫局設華商總會設東莞商會設寶安商會在油麻地設廣華醫院凡所以為華僑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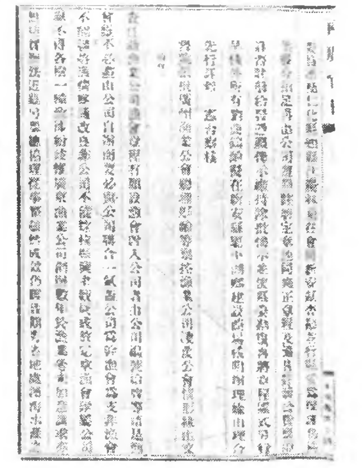
《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 食货者，国之大命，故先考虽致力群事，而究以货殖为本业，先后创设钜肆凡十有二，皆归先考主持。……吾国无市政，先考乃请于省吏，小试于其乡，创市场，设学校，立工厂，建医院，附以农林实业，规模粗具，于时人所称模范村者，庶几近之，其施于乡有如此者。

刘铸伯在平湖创市场、设学校、立工厂、建医院，种种善行，刻在石碑上，而且百余年来口碑相传。此外，在当时的报章、公文上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1911年，因应广九铁路即将通车，刘铸伯牵头招集资金成立平湖商业振兴公司，自任总董事，拟在平湖火车站开设商场等。关于这个设想的由来、经过、好处及难处，刘铸伯在给广东劝业道的开办报告中所言颇详：

> 窃商等招集资本，拟在新安县属平湖乡附近，于广九铁路车站之处创设一有限公司，建立商场，经营种种生意，并及种植果木。推原此举，实为近处土人与资本家两有裨益，且可借以开通民智，使地方人民多得一谋生之路。有此商场而车站异常兴旺，并可预定。兹将所拟章程及择定地段界至，绘成形图，一并呈览。图内各地，有已经买售者，有未经买售者，均详细录明。其未经买售之地，现正与土人议价，不日便可陆续交易清楚。恳援照公司商例准予注册立案，将来房舍成立、商店开设，尚祈准给凭照，出示保护。



《两广官报》（1911年）第十四期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后，因推行新政、振兴实业，清廷在各省陆续设置劝业道，下设劝业公所，掌管全省农工商业及交通事务。此即辛亥革命后各省实业厅的前身。劝业道及劝业公所的事务，涉及农、工、商、矿、交通诸多方面，主要有举办社会救济事业、兴办改良实业的场所、举办实业教育、创办实业报纸、举办商品展销活动、管理官办事务、管辖商办企业、裁定商业纠纷等。



张人骏（1946—1927）

而在广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广东巡抚张人骏奏请由二品顶戴军机处存记广东候补道陈望曾试署广东劝业道。张人骏是张爱玲的堂伯父，晚清历史上的重要政治家，历官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实授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由于他在担任两广总督时派水师数次巡视南海诸岛，宣示主权，在当时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南海诸岛中有一块岛礁被命名为“人骏滩”，以作纪念。1907年卢押就任香港港督后，号召社会人士热心教育，集资捐建香港大学。在捐献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两广总督张人骏慨然捐出20万元，成为第二大捐款个人。刘铸伯等华人绅商，则为香港大学捐款70余万元。（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陈望曾在劝业道任内，创建了广东蚕业学堂、广东农林试验场及其附设的农林讲习所。刘铸伯等平湖商业振兴公司绅商拟在平湖乡建设商场之际，张人骏已经调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先是由袁树勋代理（1909年6月28日至1910年10月29日），后是由广州将军增祺代张鸣岐兼署。

数千年来，官家与商家一直保持着互动，刘铸伯及其华商公局同人亦然。1911年1月3日，新任署粤督张鸣岐赴任路过香港，香港华商公局举办欢迎茶会，刘铸伯、陈赓虞等上的颂词自称“旅港华人”“旅港华商”，仍以“粤人”的身份对张提出希望。1911年1月4日，《香港华字日报》以《华商公所上张督颂词》《华商上张督颂词》为题进行了报道。

1911年（宣统三年）4月，署理广州将军孚琦被刺身亡，清廷命张鸣岐为两广总督兼任广州将军。此时他获得同盟会即将在广州举行起义的情报，立即与水师提督李准等会商，派出大批侦探，抽调防营人城，实行戒严。4月12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队攻破督署，张鸣岐丢下老父妻妾，翻墙越屋逃至水师公所，指挥清军反扑镇压。

镇压黄花岗起义之后，张鸣岐才腾得出手从事各项事业建设。广东劝业道接到刘铸伯拟在平湖墟开办商场的报告，认为，“建设商场，为地方畅商务，即为贫民广生计”，尤其是广九铁路开通在即，刘铸伯这样一位“素具热心，尤称殷实”的香港商人，在故里投资兴办商业，兼及种植业等，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劝业道道尹陈望曾先准立案，派员赴平湖会同新安县查勘，把刘铸伯所拟开办章程、图式等上报两广总督张鸣岐，并在处理意见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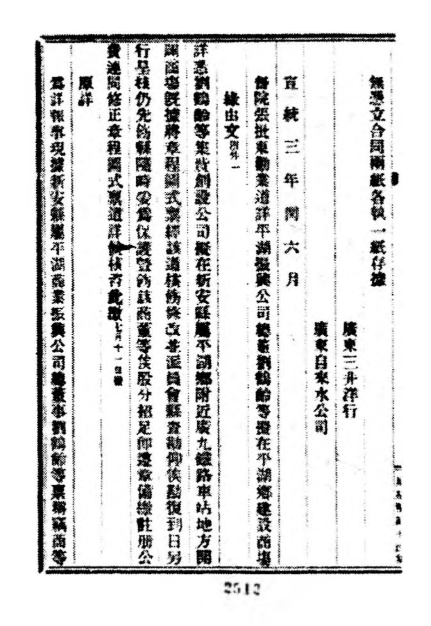
> 新安县属平湖乡附近广九铁路车站转瞬车路通行，辐辏往来，自臻繁盛。该公司拟在该处地方择地开辟商场，经营种种生理，并及种植，洵属至计。公司总董刘鹤龄向在香港经商办事，素具热心，尤称殷实。察阅所缴章程、图式，开载办法，尚属详明。章程内间有与公司定章不甚符合，现已核饬修改，一面由道先准立案，遴派委员，准补仁化县知县沈庆林前往，会同新安县查勘，并行县妥为保护。仍饬俟股份招足，再由公司遵照注册定章，连同修正章程及备具注册公费禀道，详咨注册，给发凭照，俾示维持。除批揭示，并俟县委勘复，再将章程、图式另行呈核外，所有刘商鹤龄拟在新安县属平湖乡建设商场核明办理缘由，理合先行详报宪台查核。

对于刘铸伯拟在家乡平湖墟开办商场的构想，两广总督张鸣岐亦乐于支持，并于9月3日批复曰：

> 详悉刘鹤龄等集资创设公司，拟在新安县属平湖乡附近广九铁路车站地方开辟商场，既据将章程、图式禀经该道核饬修改，并派员会县查勘，仰俟勘复到日，另行呈核，仍先饬县随时妥为保护，暨饬该商董等，俟股份招足，即遵章备缴注册公费，连同修正章程、图式，禀道详候核咨此缴。（七月十一日）

刘铸伯以平湖商业振兴公司总董事身份，上书广东劝业道尹陈望曾，拟在平湖开设商场等事，《两广官报》第十四期有过简略记载，原文为《督院张批柬劝业道详平湖振兴公司总董刘鹤龄等拟在平湖乡建设商场缘由文》。但是，两广总督张鸣岐的批复纸墨未干，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广东革命党人闻风而起，张鸣岐眼见军心动摇，危局难挽，被迫于11月5日宣布广东独立。经绅士提议，推举张鸣岐为临时都督。他避而不就，潜逃至沙面租界，不久经香港又逃往日本。

张鸣岐任广西巡抚时曾办《广西官报》，升任两广总督后即依原法饬令设立《两广


無憑立合同兩紙各執一紙存據
廣東三井洋行
廣東自來水公司

宣統三年閏六月

督院張批東勸業道詳平湖振興公司總董劉鑄伯等擬在平湖鄉建設商場
錄出文附件一
詳悉劉鑄伯等集股創設公司擬在新安縣屬平湖鄉附近廣九鐵路車站地方開
闢商場既據將章程圖式禀経該道核飭條改并派員會縣查勘俟勘復到日另
行呈核仍先飭縣隨時妥爲保護暨飭該商董等依股分招足即遵章備繳註册公
費逓同修正章程圖式禀道詳候核奪此繳七月十一日
原詳
爲詳報事現據新安縣屬平湖商業振興公司總董事劉鑄伯等禀稱竊商等

2512

《两广官报》（1911年）第十四期

官报》，“举凡中央及地方之一切法令切于是为公，一经公布以后，该项法令效力缘此而生，嗣后官民察腆准其征引官报以代文书”。实际上，它所刊载的内容除“电传谕旨”及当时由清朝贵族把持的所谓“内阁”的各项指令、文件，两广总督衙门发出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谕令外，还包括不少文牍调查材料，价值范围远远超出“法令”两字以外。官报刊发后，张鸣岐强令所有文武官员均应购买此报，其他如学堂，教育会、劝学会、工会、农会、地方团体也应购买，目的是“庶几人手一卷，治迹灿然”。但是，随着清政府的倒台，我们就很难从《两广官报》上觅得平湖商业振兴公司开辟商场的下文了。

大清帝国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红顶子”的声音戛然而止。但在刚刚落成不久的平湖火车站，各项建设并没有终止，当年修建的上大街、下大街、正大街、守珍街、昌平街、述昌街、碉楼，陆续完工，这些地名沿袭至今。不仅如此，民国初年，刘铸伯还在平湖独资兴建学校、医院。平湖商业振兴公司也没有随着清政府的覆灭而告终结，而且，刘铸伯长子刘德谱在平湖成立了昌裕公司（后改名为益民公司）从事矿业开发（见本章第四节）

刘铸伯“先后创设巨肆凡十有二”，平湖新墟的商场，最终还是得以开设成功，铺面租金则用于维持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日常开销。深圳学者蔡惠尧在《深港闻人刘铸伯：生平、志业与意义》一文中说：“刘铸伯投资建设平湖新墟，无疑是深港交流合作的明证，是香港华商首次投资深圳的成功案例，推进深圳近代化事业的发展，不仅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平湖新墟无论整体布局还是内在细节，建筑形式还是实质功能，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堪称近代深堋城市建设的典范，奠定平湖作为中心城镇的基础，为平湖的发展插上一双坚强有力的翅膀。”

新中国成立后，宝安县也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刘铸伯在平湖的产业全部收归国有（“代管”）。由刘仲德1983年10月13日给刘镇国（刘铸伯长孙）、刘定中（刘铸伯曾孙）的一封信中可知：“原铸伯公在平湖站兴建之店铺（坐落上大街，一连五间），因日久失修，墙倾屋漏，成为危房。我等目睹如此情况，乃雇人代为重新修建，现已竣工，特定于公历10月23日落成进伙，届时务希台等拨冗回来参加盛会，不胜翘企！”原信用的是宝安县平湖供销社的信笺，刘仲德之子刘旦华告诉笔者，这几间房子解放后当了平湖供销社的仓库。

那么，刘铸伯在平湖新墟上大街只兴建了这么多房子吗？1985年，宝安县平湖中学筹建委员会致函刘镇国、刘定中，其中写道：

敬禀者，本筹委会谨代表乡亲恭祝两位大人万事如意，健康长寿！阔别三十余载乡亲无不怀念刘铸伯家族，在此，特向两位大人述谈家乡情。

爱国爱乡前辈刘铸伯先生德高望重，其艰辛创建的平湖墟镇，经重修扩建，正沿老墟镇至青奇坑规划动土兴建。繁荣昌盛之平湖，前程似锦！

侨务政策之落实，已将刘铸伯先生兴建在平湖墟之三十三间店铺退回继承人——你们两位大人，现暂由平湖侨联会代管并代收房租……

也就是说，纪勧劳学校、念妇贤医院之外，刘铸伯当年在平湖至少兴建了店铺三十三间。店铺退返的时间大约是1984年，因为这年4月9日，刘镇国的总角之交冯振声从上海写信给他说："今天阅读《深圳特区报》得悉，吾兄在宝安县平湖墟被代管的房屋已退还，真是可喜之事！……"

刘铸伯昔年规划创设的平湖火车站，是广九铁路（华段）首批建成的车站之一，拥有百余年历史。广九线为标准轨距单线铁路，是我国早期建成通车的几条铁路主干线之一。1984年2月广深铁路复线工程开工，1987年1月竣工。2000年9月，广深铁路第三线电气化工程建成，广深铁路全线实现电气化。平湖火车站如今是广深铁路、京九铁路、平南铁路及平盐铁路的四等站，由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管辖。

此外，另有两条铁路线也通过平湖火车站延伸到深圳各地。平南铁路东起平湖火车站，途经深圳市宝安区东南部，西至深圳市南山区赤湾港区，全长50.2 公里。平南铁路1991 年 2月立项，当年 9月破土动工，1994 年3月全线贯通并纳入全国铁路路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由中外企业合资建设并按股份制方式经营管理的铁路。

平盐铁路南起深圳市盐田区的盐田站，北至平湖南编组站，全长22.69公里。平盐铁路于1990年1月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兴建，1993年11月全线铺轨完毕，并与广深铁路实现接轨。由此可见，100多年以来，平湖火车站一直都是惠东宝乃至深圳市最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

随着广深铁路历次提速，停靠平湖站的旅客列车数量越来越少，至21世纪初，广深线只剩下N651/N652次和一对慢车停靠，长途列车也有前往岳阳的N722次在这站停靠；但随着广深铁路最后一对普快列车N651/N652次于2006年停运及N722次取消停靠平湖站后，平湖火车站再没有旅客列车停靠。目前平湖火车站已不办理办理旅客乘降，行李、包裹托运，仅办理整车货物发到，也有一些慢车在本站待避高速列车。

从此，这座有着沧桑历史的百年老站，繁华不再，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平湖火车站的客运功能取消之后，不仅给平湖及周边观澜、横岗、东莞凤岗等地100多万人口的出行带来不便，也给平湖今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制约。

有识之士认为，平湖是深圳市规划的唯一一个综合性物流基地所在地和深圳金融产业后台基地所在地，服务深港乃至华南地区的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也落户平湖，同

时从地理位置看，平湖也是深莞一体化的桥头堡。

2011年在省“两会”上，广东省人大代表林慧就呼吁尽快开展平湖客运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研究，在平湖设立广深铁路半硼城际客运站，以期通过铁路部门与深圳市政府及龙岗区政府联手规划建设，在平湖实现公路交通客流向铁路城际和市政轨道交通客流的转移，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公路资源用于货物运输，真正实现南北通达，东西交融，人便其行，货畅其流，从根本上改善平湖片区公共交通服务功能。2013年初在深圳“两会”上，黄翔、严锡培等5位市人大代表建议在平湖增加动车停靠营运站点。

2014年11月20日，平湖火车站综合改造工程正式启动，火车站售票厅、候车室和台阶等撤除重建。平湖火车站客运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火车站站内改造与火车站周边城市更新及周边路网建设、公交接驳等诸多方面。目前整体改造工程完工在即，预计2016年可重开客运列车，恢复办理客运业务。

第二节　兴学施医（上）

新安县由于毗邻香港，成了西洋传教士进入内地的第一站，清末民初已经出现了一批新式学堂。1864年，巴色会贝德明牧师在李朗创办存真书院，1876年改称传道书院，后称李朗神学院。1925年，因崇真会传教和发展重心移到粤东客属地，学生大都来自当地山区，李朗神学院迁移兴宁坪塘，遂改称为兴宁坪塘神学院。作为教会大学级学校，为教会养传道人才，促进教会在客属地区发展，当时李朗神学院以客家话教授神学，先后开设希腊文和德文课程。中国近代林业科学之父凌道扬就是该院的毕业生。神学院在李朗时间长达61年，无疑是深圳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

1878年，巴色会在浪口创建虔贞女校，这是深圳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虔贞女校鼎盛时期，学生达数百人之多，因场地有限，校方实行“复式教学”，即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教学楼左侧，是一座同样古老的基督教堂；右侧是一座稍小的两层小楼，是老师的宿舍区和办公区。

清末民初，宝安县出现了一股民间办学的新气象。1906年，南洋坑梓籍华侨捐资，在故里创办光祖学堂，这是一所仿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中院规划兴建的新式学堂，开南粤近代教育之先河。学堂首任校长是康有为嫡系弟子欧榘甲，他提出“家国之光”的办学理念，矢志兴学育才，为国争光，传承至今已届百年。

《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说：“刘铸伯君少丧父，其母极贫，操女红度日，教子

读书于大华民义学，只穿木屐，旋入义学，校中小费，亦难支持，而其母仍竭力支持之，继由西营盘义学，考得首名，送中环大书馆，即今皇仁书院……为华人谋利益之事甚多，倡设公立医局，其最著者也……又，创设华商总会并孔圣义学、育才书社及各义学，刘君因自己少年家穷，无钱读书，故乐设义学，以栽培贫民子弟之计。刘君在港办理义学，垂三十余所，无不尽力，闻者惜之。”他与嘉道理1901年在香港、广州、上海创办育才书社；1908年余同人创建孔圣会，在香港、广州、香山（中山）创办了几十所孔圣会义学，同时在家乡平湖也创办了一所孔圣会义学。

1916年，刘铸伯出资扩建的平湖孔圣会义学正式竣工，命名为“纪劬劳学校”（全名“宝安县平湖纪劬劳国民学校”），以此铭记自己时年77岁的老母亲伍氏一生教养恩情。他在给广东督军陆荣廷的信中写道：

> 窃以敝乡平湖村居僻壤，风气固塞，学务不兴，地复瘠贫，人多失学，处此生活程度日高之时代，以智识不开之贫民，夫将何以自立？仆情关故里，言念之下，用是矜怜，爰解私囊，倡办小学堂一所，名曰“纪劬劳学校”，一则藉以教育贫民，俾资自立；一则念家慈扶养育之劳，底仆于成，乃有今日，爰命是名，以留纪念，永志不谖。

“纪劬劳学校”校名取自《诗经·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睆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该诗大意是：飘飘和风自南来，吹拂酸枣小树心。树心还细太娇嫩，母亲实在很辛勤。飘飘和风自南来，吹拂酸枣粗枝条。母亲明理有美德，我不成器难回报。寒泉寒泉水清凉，源头就在那浚土。儿子纵然有七个，母亲仍是很劳苦。小小黄雀宛转鸣，声音悠扬真动听。儿子纵然有七个，不能宽慰慈母心。

刘铸伯的老母亲伍氏，在儿孙簇拥下回乡参加这座报答母爱建筑物的开幕典礼。或许，她会想起自己39岁（1879年）丧夫，家境平寒，昼夜操女红度日，含辛茹苦教子读书，大冬天里，孩子只能穿木屐上学……如今，儿子捐建这所学校，故里子弟不复有失学之虞。

纪劬劳学校位于平湖墟的南面，广九铁路东侧，平湖车站的南面。学校占地南北长42米，东西宽20米，内有教学楼一座，前面是二层楼房，后面是平房，建筑面积为464平方米，为砖木及钢筋混凝土结构，再后面是厨房及运动场地，学校周围砌以围墙。现在除后面平房有所变动外，均保存完好。大门向北，门额上有两块麻石横匾，下匾为2米×0.5米，上刻“纪劬劳学校，丙辰年春月吉旦，男鹤龄敬设”；上匾1.8米×0.6米，上刻“急公好义，大总统题褒绅士刘铸伯，中华民国四年十月”，周边雕以花边。

有说，这位“大总统”就是当时的黎元洪。其实，1915年10月题匾褒扬刘铸伯的那位大总统，也许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他就职时间为1913年10月10日，卸任



袁世凯

时间为1915年12月12日（1915年12月12日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复称大总统）。“急公好义，大总统题褒绅士刘铸伯，中华民国四年十月”，正好在袁世凯任内。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次日，黎元洪才宣誓就职大总统。

学校、医院竣工前夕，刘铸伯曾经致函广东督军陆荣廷，请求政府出示保护。陆荣廷《平湖墟纪劬劳学校广东省督军署布告碑记》（广东督军署布告第26号），全文引用该信函，并对刘铸伯捐资兴学、建医院一事大力表彰：“查该绅独力捐资，在平湖乡倡设学校、医院各一所，具见热心公益，殊甚敬佩。所请出示保护，自可照准。仰该乡各界人士等知悉，尔等须知设立学校、医院，系为嘉惠贫民，拯救疾苦起见，务各勤勉维持，以成善举，毋得藉端阻挠为要，特此布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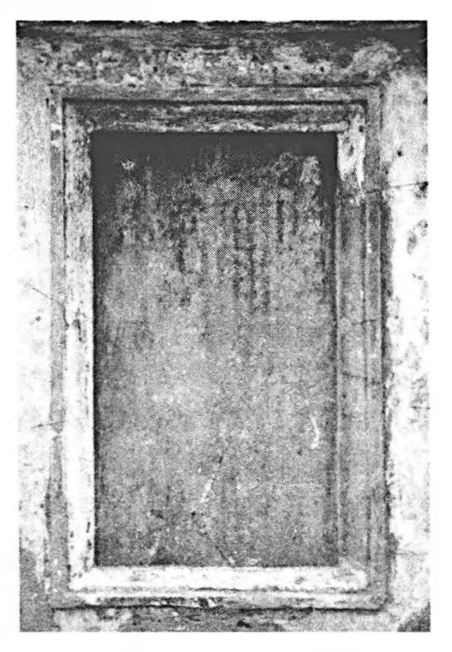
广东省督军署布告碑

陆荣廷（1859年9月9日—1928年11月6日），原名亚宋，字干卿，广西省思恩府武缘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壮族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军事将领，旧桂系首领。1916年10月，就任广东督军。1917年4月，陆荣廷赴北京访问，获黎元洪任命为两广巡阅使，确认了其对广东、广西两省的管辖权。《平湖墟纪劬劳学校广东省督军署布告碑记》撰于中华民国5年十一月十七日。据此可以推断，刘铸伯信函当作于1916年10月—11月之间。

刘铸伯的办学精神，同样受到当时的广东省长朱庆澜的表彰。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子樵、紫桥。山东济南市历城人，祖籍浙江绍兴钱清镇秦望村。清宣统元年（1909年）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旋升陆军第十七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与同盟会员程潜等编练新军，成为西南主要军事力量。辛亥武昌起义，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1912年，被袁世凯聘任为临时

总统军事顾问。1913年10月后改任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1916年7月，受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长。1917年7月，任广东新军司令。

朱庆澜虽然出身行伍，只不过五年私塾文化程度，但靠自学成才，后又深造于将校研究所，官至陆军上将。任广东省长时（1916年12月）撰写颂辞赠予香港大学首届毕业生。据香港大学图书档案材料显示：朱庆澜在收到香港总督梅含理爵士以及香港大学校长查理爵士的邀请函参加观礼，另有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约同赴香港参加观礼，盛情难却，不得不赴港一行，借以联络感情。此外，朱庆澜还于1917年的植树节（清明节），应邀赴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校园，参加植树活动。他在广东省长任内还撰写了《家庭教育》一书。



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德馨布告碑

刘铸伯是香港大学捐款人之一，自然受邀参加香港大学首届毕业生典礼，不排除他与朱庆澜在典礼上相识的可能性。总之，在香港晤谈或者回广州接到刘铸伯的信函后，朱庆澜于1916年12月24日发布“广东省长公署布告第73号”，文曰：

为布告事，照得刘绅铸伯，独自捐资于宝安县平湖乡创立纪劬劳学校，原为不忘母氏劬劳，启迪后人智慧而设。刘绅之孝思不匮，即乡人之受益无穷，凡属乡人，自应体念刘绅之热诚，保兹学校于勿替，合行布告军民人等，一体知悉。须知此校原为教育乡人而设，务宜合力保护，俾垂久远。倘敢肆行骚扰，定当重惩不贷，其各凛遵勿违。

对于刘铸伯出资办学义举，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德馨也予以高度评价，并于1916年12月29日“出示保护”，文曰：

五等金质单鹤章、一等银色嘉祥章，署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为出示保护事：

教善分财，古风未泯；训劳诫逸，母范堪钦。贤俊扬名，常秉获书之；教思锡类，永推鞠育之恩。

平湖纪劬劳学校，为邑绅刘君鹤龄所经营，表其母伍太夫人之慈惠。念童年之树立，由母道之裁成。以四民失学之堪忧，仿两等分班而设教，有蒿目时艰之慨，

知教育之当兴：诵棘心圣善之诗，怅劬劳之未报。集苞杞而思将母，歌棫樸而慕作人。学修期蛾术之勤，校舍筑蠹房之密。礼隆释菜，书读燃藜。凡时雨之滋培，悉春晖之煦育。溯母仪于苹藻，胥咸芹藻之香；兴才俊于菁莪，无废蓼莪之什。缅善则称亲之举，当推孝子为师：讥食而不教为偏，绝胜众人之母。从此 树皀堂舍，定知爱护而无忧；愿教敬梓乡间，共切瞻依而永保。本知事特为示论，尔民人其各凛遵。

据平湖耆老回忆，纪劬劳学校规模较大，主教学楼后面是两排单层教室，建筑面积464平方米，可容纳数百名学生上课学习。后面还有运动场、花园、草坪、厨房等，学校四周全部用围墙围住，占地面积1500 平方米。

学校建成后，由刘铸伯长子刘德谱担任平湖纪劬劳学校董事长。刘铸伯礼聘本乡学者、诗人刘彭龄担任校长。刘彭龄，字紫东，平湖松柏围人，清宣统己酉科拔贡生，因其父是朝廷岁贡生，有“父子岁拔”之美誉。

我们发现，刘彭龄还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政治团体保国会成员之一，这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是康有为和御史李盛铎。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事起，瓜分危机严重，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立会，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遂决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国闻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发表第一次与会人员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刊出《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开列第二次会议 “入会列名之人”，共有185人。这份名单里的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张一麐、刘鹗、陈涛、林旭、杨锐、傅增湘等，可谓大名鼎鼎，邹凌沅、刘彭龄等也在这份名单里。

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彭龄回故里设塾育人，工书法，尤善隶楷，精于文章词赋，清末民初之间与胡翼南（礼垣）、王运焕（乐则）、田浦源（邵邨）、叶梦松（石朋）、叶溥霖（济川）、邓君益（子谦恒）、李肇焘（小郯）等十多名省港文化名人创立“桐山诗社”，并“首为之唱”，著有《雕龙诗集怀古》，1915年出版。该诗集由早年毕业于中央书院的香港著名维新人士胡礼垣作序，梧桐山人田邵村校正。胡翼南评紫东氏次韵桐山诗有云：“扬之高华，按之沉实，达之亹亹，息之深深；是经师文，是才人笔，是放达士，是大雅音，诗律得此，夫何间然？”

入民国后，刘彭龄文名远播省港地区，他思想开明进步，反对专制，倡导共和、民主，曾与胡翼南等人商讨，就国民革命事宜向孙中山建言。此外，刘彭龄曾为《胡翼南文集》作序，重辑鄂西台湾刘氏宗亲会《刘氏族谱》并作序，受邀为香港《刘氏总族谱》（1918年版）作序并作注。刘彭龄夫人庄凤笙，出身于福田皇岗一个诗书礼仪之家，有“民国才女，无冠博士”之誉，济川居士蝂甫氏《题赠庄凤笙女史》有云：“小妹才高嫁少游，闺房幸福几生修。帐薰兰蕙法香妙，诗写梧桐山景幽。深致雅人超道韫，南华秋水嗣庄周。茂陵纳妾浑闲事，肯效文君永白头。” 胡翼南评其《次韵桐山

诗》有云："仿先正之典型，警后来之学术，于忠字见其豪雄，于孝字见其沉挚，于廉字见其清矫，于节字见其坚刚，于道字见其圆融，于德字见其雅正，于文字见其蕴藉，于章字见其辉光，于经字见其胸襟，于史字见其感慨，于子字见其议论，于集字见其眞灵，而皆彻玉磬之声声，圆金铃之箇箇，至其咏'文'字：'学富青莲游上苑，才高道蕴处深闺'一联，是自道语，足使苏慧仰其声华，薛媛慕其福慧，尤令人艳羡不置。"

刘铸伯1908年发起成立孔圣会，刘彭龄是会员之一，并且主持刘铸伯在平湖创办的一所孔圣会义学（该校原名是否"铸伯义学"？待考）。1916 年应刘铸伯之聘，刘彭龄出任平湖纪劬劳学校首任校长，教书育人，直至1927年去世。此后，刘彭龄之子刘仲德长期担任该校校长；平湖乡绅刘耆卿也曾经担任过纪劬劳学校校长一职。

民国时期，纪劬劳学校全名为"宝安县平湖纪劬劳国民学校（高小学校）"，招收本地子弟就学。1913 年，民国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诞生，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宗旨。学制规定初等小学校4年毕业，适学年龄为7至10岁；高等小学校3年毕业，适学年龄为11至13岁。

民国初期学校系统的设置，大致为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仅三年）、大学四级。小学初、高等学校教育的年限虽时有变动，但一直维持着这样的两级设置。初、高等小学课程包括了修身、国文、算数、体操等。而历史课程则从高等小学校开始设置，授课时数仅次于国文一科（每周10课时），每周5课时。

民国的义务教育仅限于初等小学校，它是基础的国民教育。而高等小学校则因"国民教育之程度递引而生"，除了完成国民教育之外，高等小学校还兼有"预备升学"之用。除单独设立之外，其他的高等小学校均为"中学校之预备学校"，与中学校的联系更为紧密。从其地位和作用，以及教学年限、课程内容设置来看，可把将民国初年平湖纪劬劳国民学校（高小学校）校教育程度，与今天的初中教学程度等同起来。

纪劬劳国民学校采用的语文课本，是由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全6册，1912年6月出版，此后多次再版）。该教科书由武进庄俞、沈颐编写，校订者为长乐高凤谦、海盐张元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共有6册，为高等小学校通用，课文"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之人格""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等。这套小学教材1912年6月初版，第1册共收文章37篇，收入《铁达尼邮轮遇险记》（一、二）课文，介绍了两个月前泰坦尼克号邮轮遇险事件，反映出教材编撰者关注国际时事。

关于宝安县平湖纪劬劳国民学校的办学情况，2001年11月22日，香港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处刘善君女士，为我们提供了施其乐牧师资料集里的一份英文文献："学校开办于1916年，部分课程采用英语教学。学校初期招收学生70人，有中文教师4人。"该文献还谈到念妇贤医院的办理情况。（图片见本章第三节）

平湖纪劬劳国民学校是深圳较早创办的新式学校之一，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也是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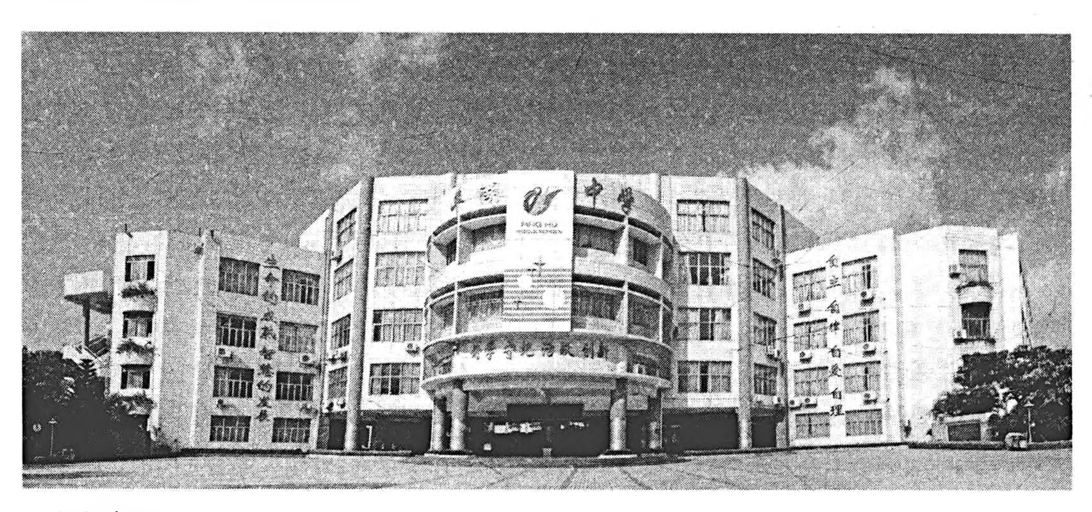
2014年5月，纪勋劳学校首任校长刘彭龄长孙刘旦华家人在学校旧址前拍摄了一张四世同堂全家福（刘旦华提供）

湖文风迄今盛于深圳其他乡镇的原因之一。

但在战乱年代，平湖是交战双方必争之地，邻近平湖火车站的纪勋劳国民学校，时常因为沦为军营。1925年，这里成了陈炯明叛军的兵营，周恩来等率领的东征军黄埔军校教导团攻下平湖，也曾经在纪勋劳国民学校住宿。1938年10月10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开始进攻广州，深圳、平湖等铁路沿线很快落入敌手，纪勋劳国民学校成了日寇的军营。解放战争末期，纪勋劳国民学校又成了国民党溃军的军营。

解放后一段时间里，纪勋劳国民学校又成为解放军的营房，学校搬到朱红岭开办，是为“平湖乡中心小学”。1956年，政府在纪勋劳国民学校原址开办中学，取名“平湖中学”，“文革”期间一度停办。

平湖中学师生一直牢记着先贤刘铸伯的创校之恩，“正德博学、为善自强”是平湖中学的校训，改革开放后学校几经迁建，现址在平湖街道凤凰大道297号，校园占地面积62155平方米，建筑面积22669平方米，现有36个教学班，学生1921人，教职工202人，其中专职教师162人，高级教师28人。



平湖中学校门

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里谈到：老地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指引着远行客回家的路。老地名的消失实则是传统文化沦落的信号，预示着乡土文化的集体沦陷。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刘铸伯当年创建的平湖守珍街，近百年间变化多多，老街名一直沿袭至今；被破坏的凤凰山“守真园”，亦在修葺恢复中。我们也希望，平湖中学能够早日恢复“纪劬劳学校”或“纪劬劳中学”名称。

这在深圳教育发展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譬如，康有为弟子欧榘甲在坑梓籍南洋华侨的支持下，1906年创办坑梓光祖学堂，1926年学堂始办中学，开广东乡办中学之先河。1935年因社会经济凋敝、侨汇短缺，光祖中学停办，改为光祖小学。1950年初，学校校名改为秀新小学。1982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复办中学。在南洋华侨、坑梓父老与黄惠波等中青年教师的强烈要求之下，学校更名为“光祖中学”。

平湖中学恢复“纪劬劳学校”或“纪劬劳中学”名称，有利于打通绵长文脉，延续光荣传统，也是对先贤刘铸伯的一份纪念。这么一来，该校的办学历史，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追溯到1916年。

一所学校的出现，就像星斗照亮了一方土地。《话说平湖》一书，收录了一批平湖街道近现代著名人物小传，他们大多受教于纪劬劳学校。笔者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不久，结识了1978级学姐常丹琦女士。她说，自己的母亲刘宝英曾经就读于纪劬劳学校，抗战时期担任过平湖党支部书记，在红朱岭学校以教书为掩护宣传进步思想，领导路东情报站的工作，为东纵端掉日军凤凰山哨所、袭击元屋围的伪军警察中队、策反日军士兵携枪投诚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从常丹琦学姐那里，我首次听说到“乐善好施”的刘铸伯这个名字。常丹琦学姐毕业后从事出版事业，书比人高，不幸于2013年2月17日中午11点40分仙逝，我作文《最美好的岁月，最早消逝》以为缅怀。

1993年调到深圳工作，我又陆续结识了一些纪劬劳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就包括纪劬劳学校首任校长刘彭龄的孙辈刘旦华。我孩子的小学一年级班主任刘宪明老师，也是纪劬劳学校的毕业生。谈到乡贤刘铸伯其人，他们无不充满敬仰之情。刘旦华曾经抄示其父刘仲德先生晚年诗作《守真园话今昔》：

> 少年游思尚温存，暇日寻幽过北门。
> “追远阁”前呈府柏，“娱亲庭”北映堂萱。
> 长阶历乱飘红雨，修竹参差罩翠园。
> “守得名山依梓里，真疑尘世有桃源”。
>
> 筑得名园号“守真”，花香鸟语草如茵。
> 猕猴跳索惊游伴，孔雀开屏炫客人。
> “啜茗亭”间谈乐趣，“读书斋”外隔嚣尘。

浮想当年嗟逝水，几回人忆武陵春。

浩劫频来梦一场，墙倾栋折毁华堂。
棋坛有恨留残局，画舫无踪剩野塘。
携侣重来伤皓首，折花为去动柔肠。
即今景物成陈迹，尚有游人访故庄。


刘铸伯家族墓地一角

该诗自注有云：“守真园的入口处刻有对联一副，取铸伯公别号‘守真’两字嵌在句首：‘守得名山依梓里，真疑尘世有桃源。’是先父紫东的遗墨。沿着阶级层层直上，两旁栏杆外，都种上桃、杏等花树，微风吹来散落有如红雨。行人道上则到处覆盖着青葱的绿竹，凉风摇动咿呀人韵。近山顶处筑有‘追远阁’是追念祖辈的，‘娱亲庭’是为母亲提供娱乐的。”

其实，这里有些不确之处。临近墓地的“娱亲庭”，并非刘铸伯为母亲提供娱乐的处所，也不是像一些文章里讲的“刘铸伯别墅”。况且，刘铸伯之母伍氏一直与儿孙住在香港。1922年刘铸伯仙逝，他的母亲尚健在，据《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记载，伍氏当时84岁，正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

那么，这座建筑物用途何在？我们觉得这是一处享堂。所谓“享堂”，又称祠堂、孝堂。墓上享堂、房屋等建筑是作为死者亲属祭祀先人和长期守孝居住之用，依照旧制，孝子守孝要在墓上居住三年之久。这种丧葬形制在旧时比较普遍，但后世很难保存下来，因而至今发现极少。平湖清奇坑这种礼制性建筑，规格较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也许是深圳目前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享堂”。

第三节　兴学施医（下）

“兴学施医”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有效方式。1881年，来自伦敦传道会委员戴维斯在太平山以自己母亲那打素的名字设立那打素诊所，为当地居民服务，深受欢迎。

1887年，中央书院早期毕业生何启爵士为纪念在1884年去世的亡妻雅丽氏，捐资于上环荷李活道兴建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成为香港首间为贫苦华人提供西医治疗的医院。同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成立，首创医科学生训练，以雅丽氏纪念医院为教学医院。

1904年，何启爵士创立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Alice Memorial Maternity Hospital），这是香港第一所产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产科医院之一；1906年，由于雅丽氏医院和那打素合并后，病床仍出现不足情况，何福堂牧师之女何妙龄（何启为其胞兄）于是捐款并选择于卑利士道一址兴建新医院，故起名何妙龄医院（Ho Miu Ling Hospital）。至1954年经立法定案，那打素医院、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及何妙龄医院三家医院合并为“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

刘铸伯在“兴学施医”方面从来不甘人后。他是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华人值理之一，据1902年11月22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请助医费》一文可知：十一日，雅丽氏医院举行华人值理聚会，商议筹集医药费问题，刘铸伯与何启、何福、刘渭川、蔡紫薇、冯华川等参加聚会，会上提出，“本医院急需五千元，本院专为华人之负病者而设，自当恤之”。刘铸伯与众值理当场提出，通知各行会商捐，很快就解决了雅丽氏医院燃眉之急。1904年香港流行疫症，刘铸伯与何甘棠（何福）、冯华川等创办公立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疗。1907年，他成功协助何启爵士建立广华医院，并出任该院倡建总理。担任洁净局议员期间，刘铸伯极力为华人争取自治自理的权利。

深圳第一家为贫苦人提供西医治疗的医院，是刘铸伯捐资创办的平湖念妇贤医院。这是他为纪念发妻潘氏而设立的一所医院。

刘铸伯毕业于中央书院不久，娶妻潘氏，育有四子，可她不幸于1910年病逝。时任香港孔圣会会长的刘铸伯，曾经遵循礼仪为亡妻操办丧事，可见夫妇感情弥深。但是，这番“大操大办”，却引起香港基督教人士的非议，譬如，麦聘臣在上海《中西教会报》刊文《孔圣会监督丧妻之闹热》，予以大肆抨击，原文如下：

基督教之领袖，有称教主、主教、监督、主席、会正等名词，诚不一而足，而要必以恪守本会规章，兼有才德者为合格，其席位原不能以富有资财者所能觊觎也。泰西之教会，虽至专制之天主教，苟教主娶妻，或拜他教之像，必排斥而不能徇情也。虽至自由之福音教，苟会督忘为，或拜古人之偶，必革除之而不能回护也。即中国之儒教，昔虽未有立会，而每岁祭圣，必推正途科第者为主祭，而捐班功名不敢窥视也，其纯净之理学家，亦必凛遵孔道，虽无旁人监督之，亦断不容有异端之道，掺杂于其间也。

而近来港中之孔圣会，刘君铸伯，议会事则位居主席，操会政则权属总理，行礼拜则推为主祭，为皇仁书院之高足，为屈臣洋行之买办，为香港之局绅，为书社之值事，资财甚富，交游甚广，谓非为孔圣会之头目不可得也。乃不料六月十八日，刘君之夫人潘氏出殡，所陈列之倚仗于街衢，如彩亭金牌，连旗引采等物，五光十色，不知者疑为出游会景，及见孝服，方知出丧。而最特色者，硬架灯笼四对，大书特书，一曰“福胜庵”，二曰“海幢禅林”，三曰“六祖道院”，四曰“孔圣会”。其宅内则法鼓灵璈，喃喃不已，送丧者僧道尼念经之外，有孔圣会同人，有育才书社教员学生，观礼者中有中西男女，挤拥于途。刘宅本在港半山之西，以人众之故，因取道自西至东之山口马路，至雪厂直落至海旁上之大马路，自东至西，而往大口环，其行几运遍香港，务使观者无向隅之憾。其柩暂停东华医院义庄，或侍牛眠地，或侍吉日，或待好方向，外人不能悬揣。

其讥刘君者则曰：不守孔教宗旨，迷信神权，非圣人之徒也，焉得为会督？

其护刘君者则曰：刘乃和平之人，何妨三教共和？如纯守孔道，则尼姑、和尚、道士及纸扎店，从何觅食乎？此亦假丧事而为施主之道也。

吾则曰：孔圣会首领，名则尊孔，实则污孔，同人中不闻有规正者，诚非刘君之直友。盖刘君固深于英文，而浅于孔道，未尝不欲有人指正者，其不肯指正不敢指正者，过在会中之同人，是直谗蹈面谀之所为而已。呜呼，孔子在天有灵，能勿喟然叹曰：若辈以我为傀儡，吾道其衰矣乎！

刘铸伯夫人潘氏事迹不详。1916年，刘铸伯决定在平湖捐建一所医院纪念亡妻，同时解决父老乡亲缺医少药之苦痛。他在给广东大员的禀札中说明了建院原委：“复以敝乡村人贫苦，若遇疾病，苦无良医为之调理，并妇人生产亦无练习接生，以致夭折甚多，残乖天道，故复独自捐资，建设医院一所，名曰‘念妇贤医院’；一则拯乡人之疾苦，一则念故室内助之贤，亦以示不忘之意。”

对于刘铸伯的这番善举，出席医院开幕礼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在演讲中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刘铸伯）又竟其亡室未逮之志，创为念妇贤医院，合中西医法，以行其施赠之实惠；盖刘君之夫人素好施舍，刘君即圆其心以成其志，博施济众，本于推爱妻

之心以爱物，可谓善推其所为者矣。”也就是说，在故里平湖捐资设立一所医院，也是素好施舍的潘氏遗愿。

念妇贤医院，坐北向南，位于平湖车站北面，与纪劬劳学校在平湖墟南北相望。该院为三开间的二层楼房，面宽为17.2米，进深11米，门前筑有围墙，大门上方书有匾额，一为刘铸伯手书“念妇贤医院，丙辰仲春，铸伯氏立”；另一为黎元洪大总统题赠匾额曰：“乐善好施，大总统题褒绅士刘铸伯，中华民国四年十月。”

民国初年，战乱频仍，盗贼蜂起，地方不靖，惠东宝一带匪患尤为猖獗。有鉴于此，刘铸伯在学校、医院竣工前夕，曾经分别致函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德馨，禀请政府出示布告，予以保护。刘铸伯致广东督军陆荣廷信函有云：“刻下小学堂及医院两处，举工构筑以来数月，于兹工程均将告竣，开幕在即，用特肃函，敬请钧座给予宪示，俾资保护而兴观感，异时学风丕振，寿域宏开，无一非凭福曜所赐也。”



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布告碑（念妇贤医院）

应刘铸伯之请，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德馨分别发出布告，要求政府与军民人等予以保护。在该医院的围墙上立有石碑三方，分别为广东省长朱庆澜、广东督军陆荣廷、宝安县知事周德馨的布告和告示。1916年12月24日，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发布第七三号布告云：

> 刘绅铸伯，独自捐资，于宝安县平湖乡创立念妇贤医院，原为医理贫病乡民而设，不特惠乐乡人不小，并可助政府举办地方公益之进行，自应合力维持，俾垂久远，合行布告，军民人等，一体知悉。须知该医院为怜恤贫病乡人之所，事属公益，保护宜周，倘有骚扰情弊，定必查拿重办，决不宽贷，其各凛遵毋违。

陆荣廷的布告也重申：“查该绅独力捐资，在平湖乡倡设学校、医院各一所，具见热心公益，殊甚敬佩，所请出示，保护自可，照准行布告，仰该乡各界人士知悉，尔等须知设立学校、医院系嘉惠贫民，拯救疾苦起见，务各劝勉维持，以成善举，毋得藉颀端阻挠为要，特此布告。”

署理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德馨，于1916年12月29日“出示保护”。全文



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德馨布告碑

如下：

五等金质单鹤章、一等银色嘉祥章，署宝安县知事兼警察事务所所长周，为出示保护事：

照得疾病扶持，讲明亲睦；倡随眷念，拯济幽忧。就暖支羸，望闾阎而知疾苦；针盲起废，怀乡里而溥仁施。

念妇贤医院者，系邑绅刘铸伯所经营，为原配潘夫人而创建者也。玄霜空捣，绛云难求；獭髓虚传，蜨魂不返。柿叶写悼亡之句，杏林开治病之门。知萱斋萱莫之虚，惜金钱之浪掷：悉调阴调阳之妙，教针石之兼施。凤楼之仙侣，空怀龙府之神方宛在。怅幽明之永隔，痛切封茅；怜贫病之相连，情殷馈药。医曾折臂，代延治疾之国王，院可栖身，不减庇寒之广度。列灶各分，煮药寒门，而老幼沾仁；救灾尤重，恤怜行道，而幽冥资福。礼罗扁鹊，岂徒为带下之医；谊笃梁鸿，终未忘眉齐之案。切脉而沉疴并起，比肩而淑德同称。惠泻青囊，美彰彤管，比似棠阴带，舍期翦伐之。体加共看，药院苔纹，愿维持于不蔽。本知事特为示谕，尔民人其各凛遵。

1916年春，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破土动工，同年底落成。同年12月31日（农历丙辰己亥初七），刘铸伯邀请省港大员参加学校、医院开幕典礼，当天宝安县平湖墟冠盖如云，热闹空前。据1917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记载：“省中政界大员，港中中西巨子，到会者济济有众。上午十点半钟，朱省长乘花车而至，同时有政务厅长罗树森、督军代表胡清瑞、教育科长吴在民，及统领魏邦屏、袁带等约百余人。本港则有新界理民府罗士，大绅何东及夫人，及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同人等共有二百余人之多。至两点半钟，由刘铸伯君举行开幕礼毕，至四点钟，省政界方趁专车返省，港商则于五点半钟返港，惟刘君铸伯于初八（一号）下午五点方返港。”

远道前来参加这场开幕礼的中西嘉宾，均为民国初年省港两地卓有声望的人物：那位乘花车而至的朱省长，就是当时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至今镌有广东省长公署布告碑；督军陆荣廷未能参加开幕礼，广东省督军署布告碑依然镌刻在学校、医院的墙壁上，代表陆荣廷参加典礼的胡清瑞则是曾任广东都督的民国要人

胡汉民之胞兄；统领魏邦屏1916年参加讨伐龙济光，任护国军第五军总司令兼广东省警察厅厅长，孙中山任大总统时委任其为广州卫戍司令；袁带曾任第一集团军总部咨议，抗战时期先后任第四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少将军衔）、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驻防中山、顺德，1941年2月率部击毁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的座机，大角岑生成了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阵亡官阶最高的海军将领；教育科长吴在民是民国年间著名教育家、侨务家，终其一生从事教育行政工作，1917年任广西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时期出任私立广东国民大学校长、广东省参议会议长。



念妇贤医院旧址

开幕典礼上，省港各政界人员均有演讲，广东省长朱庆澜演讲词有云："我国民族最富有进取心，亦最富有爱国心。世人诋之以守旧，目之以散沙，此未免一孔之见，盖在专制时代，内地人民一切行动，皆当受政治之支配，故耳目有所锢蔽，能力亦无由发展，唯交通处所与外人相接近者，则类能吸取世界文明以发扬其特性，于团体则务为结合，相与谋公共之治安，与国家则务为协助以为之后盾，不特其所营之各工商事业，足与世界相颉颃已也，盖于世界竞争之理，人类生存之故，知之较真，故行之尤力。"他高度评价了刘铸伯的进取精神、爱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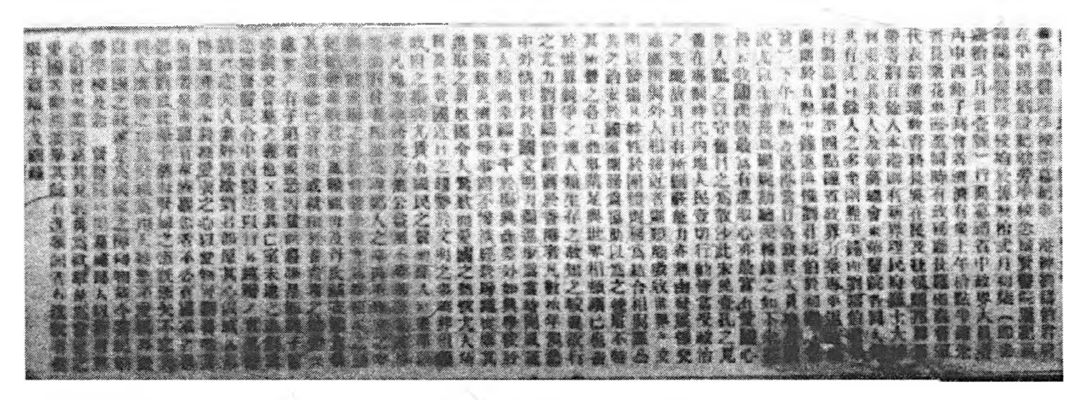
刘君铸伯，经商于香港数十年，洞悉中外情形，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为当时开风气，为人类造幸福，生平于振兴商业外，如兴学校、设医院、救灾济贫等事，罔不惨淡经营，踊跃从事，其进取之勇敢，固令人惊叹，而爱国之热忱，尤人所难及。

夫我国近日之趋势，于文明之事业，非但赖政府之振兴，尤贵有国民之赞助，鄙人自莅粤以来，凡地方学务及其他公益，无不□□□□□，多得如刘君铸伯者相助为理，鄙人之幸，抑亦地方之幸。刘君就前办之孔教会义学，扩充为学校，名之曰纪劬劳者。刘君少孤，赖祖母及母氏减衣节食，供其读书，念己身有所成就，由于养育者之劬劳，又虑世之有子弟者，或恐因贫而废学，是即"与子言孝，与父言慈"之义也。又竟其亡室未逮之志，创为念妇贤医院，合中西医法，以行其施赠之实惠；盖刘君之夫人素好施舍，刘君即原其心以成其志，博施济众，本于推爱妻之

心以爱物，可谓善推其所为者矣。

世谓“有家族观念者，不必有国家之思想”，想如刘君此举，于慈母贤妇之德，既永矢不忘，于利人济物之功，且交相为用，人特患不爱国耳，岂以家族之故，遂足为国家之障碍物哉？今当纪劬劳学校及念妇贤医院开幕礼，鄙人以刘君热心社会事业，深嘉其见义勇为，欲举是为当世之爱国者劝焉。

《纪事》说，朱庆澜演讲之后，“其余有进颂词者，有演说者”。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该文作者说限于篇幅，未能一一细录。这样一来，刘铸伯在开幕式上的演讲，还有华商总会、东华医院、育才书社、孔圣会等团体与平湖乡耆老宣读的颂词，以及其他中西政要的演讲，也就随风而去，杳无踪影。但是，感谢上苍，《纪事》及时报道了朱庆澜对刘铸伯的评价，我们今天读来，深感此话剀切不易，并非溢美之辞。



1917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平湖医院学校开幕纪事》



念妇贤医院被列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城乡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得到改善。1958年公社化后，原宝安县各个公社都设立了公社卫生院，平湖在念妇贤医院原址成立了平湖公社卫生院，继续为平湖百姓健康服务——尽管它已经更名为“平湖公社卫生院”，但是老百姓已经习惯叫它“念妇贤医院”。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念妇贤医院仍然肩负着平湖地区中心医院的重责，

乡民受惠无算，众口称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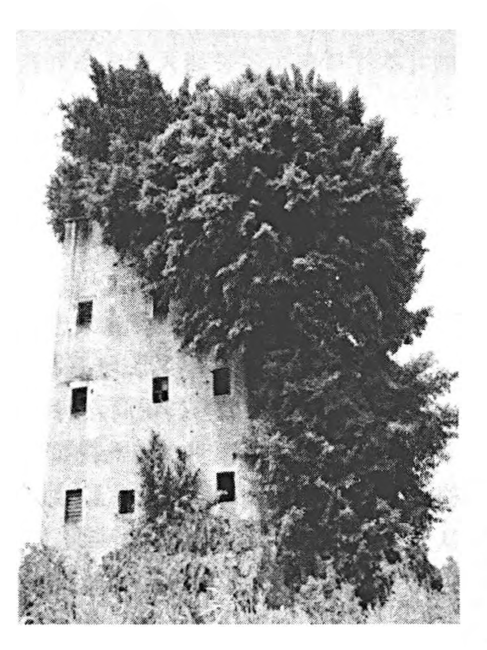
念妇贤医院现存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开办迄今，弹指间百年过去，该医院已经废弃多年，上层的楼板已经被毁，楼梯也不见踪影。2001年6月，念妇贤医院旧址被深圳有关部门列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

念妇贤医院落成后，刘铸伯长子刘德谱担任念妇贤医院董事长。开业之初，聘请医生四五人坐诊，乡民反映医院只看病不留医，略嫌美中不足，于是刘铸伯在医院侧面增建“周马氏留医所”，从香港请回西医，负责门诊及住院事宜。后来续有增建和改建，中医、西医兼有，门诊、住院俱备，妇科、产科齐全，为平湖及附近村民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成为民国时期宝安县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医疗机构。

第四节　发展实业

20世纪初年，刘铸伯出资（集股）兴建的平湖新墟上大街、下大街、正大街、守珍街、昌平街、述昌街竣工后，火车站附近街巷井然、商铺林立，学校、医院设施齐全，被誉为“模范”乡镇，引领一时风骚。平湖得广九铁路交通便利，新墟建成后，一跃而成了惠东宝地区小商品的集散地。

刘铸伯创办的平湖昌裕公司，设在守珍街西边尽头的一座碉楼里。这座碉楼有4层高，据说许多建材都是购自国外和香港，连砖都专门烧制，盖有红印。弹指间百年过去，碉楼东侧被一棵大树环抱，枝繁叶茂。据平湖耆老回忆：“这座碉楼，也是由刘铸伯投资兴建的，起名昌裕公司。碉楼里有十几间店铺，从香港、南洋等地买来的时尚货品，都在这里销售，也是当时平湖的地标性建筑。”



平湖昌裕公司设在守珍街西边的一座碉楼（陈俊超摄影）

广东地处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接处，

是国内具有丰富矿产资源的省份之一，素有“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之乡”称号。1908年3月4日，《申报》以《粤省设立矿务公司之计划》报道：“粤省农工商局去岁招集官商股本合办一矿务有限公司，开采全省矿产。当经拟定章程，禀奉粤督派委朱道恩缙，前往各属查勘在案。现该局以官办曲江、乳源各处矿产已着有成效，其余虽经查勘，尚未兴办之处共有二三十起。拟设法招股实行开采，以辟利源……”民国时期，全省已找到矿产148种，探明储量的有101种。

宝安县是广东省矿产资源丰富的县份之一，金属矿产有铁、铅、锌、钨、锰、锡、铋等。坪山打鼓岭、葵涌高圳头的铁矿，黄岗山仔下以铅为主的多金属矿，坪山碧岭一带的锡矿和十多处钨矿，规模不大，但可供地方开采。矿点有横岗西坑的铋矿、大鹏岭澳的铝矿等。

最为难得可贵的是，民国初年，刘铸伯创办的平湖昌裕公司，参与了家乡矿业的勘察与开发。他的儿子刘爵华（刘德谱）、刘裔华（刘昆谱）与人合作，发起成立了“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

刘德谱，1888年生，刘铸伯长子，少就读于香港育才书院，毕业后即进入商界，任香港华英教育代理物业银两有限公司司理。旋赴上海，任昌成洋行司理。又服务于广东，任全省酒税局总办。少壮之时，即在港沪粤商界驰骋，曾获国民政府三等嘉禾章。还担任过信德银号董事，平湖振兴公司总经理。其他社会职务还有保良局值理、华商总会值理、孔圣会值理、香港佛学会会长、平湖纪劬劳学校董事长、平湖念妇贤医院董事长等。

1917年，宝安县李朗上村地方发现锰矿，据刊于《广东财政月刊》同年10月第10期的《本厅呈督军省长商人刘爵华刘裔华等承办宝安县李朗村上坑等处锰矿》称：“案据宝安县知事周德馨呈称：窃照知事访闻县辖李朗上村地方发现锰矿，乡人聚众争挖情事，当经咨会警卫军第十二营魏营长觌明，就近派队驻扎弹压，制止开挖，一面飞饬该管警区勘覆去后。嗣据第二区分所长林中鹤复称，查勘该矿山，系在乡民刘奠安屋后山，高约二十丈，山脚过围约数十丈。上坑村住户十余家，山左右两协俱民田，所出矿苗乃是锰质，可供制造炮码之用，香港收买每斤四毫，运往外洋每斤可得七毫。其初开挖者尚少，近日邻县赶来者愈聚愈众，刘姓以山在村前，即为己山，远近来挖者以为官山，彼此争执，恐酿事端，唯查该矿山实系官山，应归国有等情前来。正拟据情呈报间，即据县属平湖昌裕公司商人刘爵华呈称……”

平湖昌裕公司探明李朗上村（今属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上李朗）地方锰矿之后，遵照部颁矿业条例，绘就矿区图说，刘爵华、刘裔华火速呈报宝安县知事周德馨，请求从速暂发临时开采执照。这封呈文写道：

窃我中国地大物博，矿产极丰，年来科学发明，国民智识日增进化，对于开矿种种实业，无不毅力经营，是以近年以来，各省各县开出五金矿、煤矿、石矿等，亦属类多，成绩显然。商人等查得敝乡平湖附近之李朗上坑村地方，发现一种锰

矿，纵横二十余里，皆属荒地，现在土人争掘，日得万斤，唯村人愚鲁成性，往往因争掘锰矿，互相殴打，危象环生，若不早事排开，将来何难酿成械斗。

商人历办实业，对于矿务更有心得，查此种矿质名之曰锰，用途浩广，如电灯胆内之游丝，电具一切机件等，需用甚多，应以机械开采，矿苗必富，若令无识乡人用锄力掘，必致损坏矿源，殊深可惜，商人等因欲保全矿产起见，爰集里人，会同该处正当绅士，集资领办，庶几天然矿产不致损伤，无识土人免滋争斗。兹遵照部颁矿业条例，特具呈请书，连同注册费二百元，呈文费三十元，绘就矿区图说，呈请尊署俯赐核准，迅赐转详，唯矿业执照如候农商部批给，时期未免太延，可否敬恳量予变通办理，先行晓谕该处土人不得争掘，免伤矿产，并请从速暂发临时执照，以促进行，是否有当？仍希批示祇遵等情。计缴呈文费三十元，注册费二百元，图说三纸到县。据此。



《广东省财政月刊》1917年10月第10期《本厅训令矿商刘裔华等该商呈请设立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案经奉督军、省长批准立案》

宝安县知事周德馨呈递省长朱庆澜、督军陆荣廷的文件称："查该商刘爵华系殷商刘铸伯之子，资本充足，办事实心，现所呈请书所称各节，系为振兴矿业，以杜纷争起见，既据遵章备缴呈文、注册各费，并绘送矿区图说到案，核与矿业条例相符，应否批准其承领开采，先给临时执照，以免阻滞进行之处，知事未便擅专，除呈督军、省长察核指令遵照外，合将呈文、注册各费，连同图说，一并呈缴核收，俯赐批示饬遵，并恳印发批回备案等情。据此，当经本厅核明，准予承办。嗣又据该商遵照条例，请将原领李朗等处矿山分作四区，每区限定五方里，由该商刘裔华等分领承办，声明以枫树窝等处为一区，旗头山等处为一区，由刘爵华承办；以牛尾岭等处为一区，松元头等处为一区，由刘裔华承领，并分别绘具图结，连同各案，探矿呈文注册等费，呈缴前来，核与条例相符，自应准予转呈立案，以兴矿业，除照例注册填就矿照四纸，发交该商等收执，并分呈督军、省长察核外，理合呈请省长、督军察核，俯赐核明，准予立案，实为公便谨呈。"

为了大规模地科学开采广东钨矿、锰矿，收购广东全省出产的钨砂、锰砂，刘裔华、余国霭提请筹备商本银25万元，由官督商办，设立"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

局”，呈文原件如下：

窃维天地自然之利，久蕴必宣；国民致富之源，得人则理。粤省东江各属，本年发现钨锰两矿，所在皆有，以惠阳属为最旺，皆由土人私采私运，坐使公家税源丧失，商民亦尠食利，甚且滋生事端，地方官遵例封禁，尤为弃利于地，商窃惜之。

近来各属商人调查有得，亦多呈请承领矿区，其实自行开采者甚少，盖由矿砂散漫，领区则多所限制，从事开采费重利微，皆不过以领区为名，实则自由收买而已。且运销出口，亦未见领照纳税，尤属以私废公。

商等现为裕饷利民起见，拟请筹备商本银二十五万元，由官督商设局，收买各属钨锰矿砂，发给本局执照，督运出口销售，每百斤除缴例定矿税外缴助军饷响四元，先从广惠各属试办，如果西、北各江及高、雷、琼、崖各属，探有此项矿质，徐行推广，添设分局办理。

以现在东江各属出产计之，每日约收砂万斤，每月即可助饷万余元，如能扩充，其裨益或将倍蓰十百。所有局用运销各费，悉由商人自行支理，在公家并不烦费而此饷源，在土民仅出劳力而亦厚地利，商等经营其间亦可借获什一，实属一举而三善皆备。惟是地不爱宝，尤赖官力提倡，拟请将凡有此类矿质出产，除民业外所有官荒悉予弛禁，准听商人招集土民开采，交本局收买，不得私运出口及售与零星商贩。至已承领矿区各商，应请饬领就区开采，不得私自收买，所有在区内采得矿砂，应按照本局定章，每百斤缴银四元，请领本局执照运销，以规划一而杜搀夺。

“官督商办”是晚清洋务期间兴办企业、发展工商的一条重要政策，它实际上是一种由商民私人集资，而洋务派官僚控制实权的特殊企业形式或经营模式，也是洋务派官僚举办民用工业最主要的一种形式。由于在办军事工业时洋务派已感经费困难，举步维艰，若再由官府大量投资举办民用工业，官府万万无此财力，于是不得不利用民间私人资本，而当时在民间也已形成了相当数额的买办资本。总之，官督商办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刘裔华、余国霭认为，由他们集资25万元筹备设立的锰矿务局，名义上拟定名为“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在省会广州设立总局，作为总办事机关，在惠阳县属的龙岗墟（今天的深圳市龙岗街道）、宝安属的平湖墟（今天的深圳市平湖街道）等处设立钨锰矿务局分局，具体办理收砂运销事宜，“总局设总办一员，俟奉批准，由商等公举，呈请钧厅委任，以便规划进行”。此外，他们还拟订定创办章程大纲十三条，“仰恳钧厅迅赐核准立案，克期开办，以兴实业而裕饷源”。

广东省财政厅呈文中所说的“创办章程大纲十三条”，就是刘裔华、余国霭拟定的《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章程》，原文如下：

一、本局因振兴矿务，筹助军饷，奉准广东财政厅呈请督军、省长核准立案，采运各属钨、锰两矿，先从惠属试办，徐行推广全省各属，故定名为“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

二、本局由宝安县平湖昌裕公司呈请试办，拟筹备资本二十五万元，全华股，存放殷实银行，以资周转。

三、本局由财政厅监管，设总办一员，由本局举委，以司收运事宜，稽核产销及收饷等件。

四、本局营业部设总理一员，由各股东公举，呈请财政厅立案，其余办事人及薪工数目，本局随事随时自行酌定之。

五、在省城设立总局，并于惠阳属龙岗墟、宝安属平湖墟设立分局，先从惠阳、东莞、宝安等县所属矿山试办收买矿砂，其余全省各属如有钨、锰两矿发现，得随时呈请，另设分局，陆续试办。

六、本局所收矿砂，随时运行出口销售，由财政厅发给运照，咨行各海关、税各局，一体验明放行，各关局如有例应纳税者，仍照章程办理。

七、本局所收矿砂运销省港及出口，除矿产税仍照例缴纳外，每百斤捐助本省军饷银四元，按月由督办核明数目，呈报财政厅，如数清解。

八、各属矿山，如别商已经奉准承领矿区者，只准在所领矿区内采，所采矿砂，仍照定章每百斤缴饷四元，交本局转请运照，各商不得自行请照运行，以保饷源而杜搀夺。

九、各属矿苗发现区域，无论官荒民业，凡由土民自由开采者，一律售归本局收买及照缴饷，请给运照，不得私售。

十、各属矿山，如有殷商遵照条例领区开采者，仍由财政厅核准承办，唯所采矿砂，须照本章程第八条办理。

十一、各属如有发现私收私运之事，由本局委员随时知会地方营警，截缉充公，没收矿砂由本局缴价承领，以保利权。

十二、本局试办暂以二年为限，如成效大著，得随时呈请，定为永久办理，如各属矿产不旺，亦得随时呈请停办。

十三、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及有必需更改条款时，随时呈请财政厅核明立案。

《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章程》揭示的条款，可视为一份详细的钨锰矿砂专卖“条例”。所谓“专卖”指专控商品需要得到相应的许可才允许生产或销售，我国古代称为“榷”，如榷盐、榷酒、榷茶。不同社会制度下专卖有不同目的。从春秋时期到明、清、民国，也曾对盐、铁、酒、茶、醋、矾等产品实行过专卖。通过垄断的专卖价格，攫取巨额财政收入，具有维护国家政权的政治经济目的。

国家对某种产品的生产、销售，限定由国家设置的专门机构独占经营和管理的一种

制度。有完全专卖和不完全专卖等多种形式。前者是对产品的生产、收购、运输、销售的整个产销过程，都由专卖机构独占经营；后者只对产销过程的某个环节（如生产环节或收购、销售环节）独占经营，其他环节允许别的单位或个人在国家管理下经营。凡属专卖的产品，都由国家专卖机构严格进行管理。除国家专卖机构外，任何单位或个人违法经营的，都要受到惩处。这是专卖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产销业务的重要标志。

显然，这份《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章程》，得到了广东省财政厅的首肯。因为自从宝安、东莞、惠阳等东江流域县份勘探到钨矿、锰矿之后，陆续为商人承包开采，但是承包商抱怨“费巨利微”，而且乡民私采私运，所在皆是，既失税源，又多滋生事端，当初曾有收归官办之议。他们在接到平湖昌裕公司刘裔华等人的呈文之后，在转呈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的呈文中写道：

> 查东江各属，本年发现钨锰各矿，前经本厅迭次派员调查，均称矿砂散漫，各商领区开采费巨利微，故多观望不前，而土民私采私运，所在皆是，既失税源，又多滋生事端，当日曾有收归官办之议。嗣后，时据商民呈请领区开采，均经查明，分别准驳各在案。唯数月以来，各商多未呈报开工究竟，采得矿物若干，亦未据报纳税，请照运行。访闻各商办法，大率不外私收私营，勘就区开采，本厅正拟别筹整顿之策，以维税源，现据该商等呈请设立“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除已领矿区应听各商自办外，其余土民私采矿砂，悉由该局收买运行，每百斤照例缴纳矿税之外，另捐助本省军饷四元，请领运照行销，先从广惠属之东莞、惠阳、宝安试办，徐图推广各属，并令领区各区，就区开采，亦照纳税捐运行，以归一律等情。

并且认为：刘裔华所拟《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章程》，“既于国税无损又可增益本省饷捐，而矿商及土民固有利权，且得借资维持，洵属官民两利章程，大纲十三条，亦尚妥协，似可照准试办。除此批示外，理合抄录章程，呈缴督军、省长俯赐察核，准予立案，俾兴矿业而裕饷源。是否有当，伏候指令饬遵。谨呈”。

当时统治广东的是桂系军阀，他们乘护国战争之机进入广东之后，即以两广作为其建立“霸业”的基地。1916 年 10月2日，陆荣廷正式就任广东督军，10月10日率部进入广州。在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为抵抗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陆荣廷加入护法战争，响应“护法”，实际上是以护法之名行割据之实。桂系军阀把大量军队开进广东，需大量的军费，广东虽号称富庶之省，但由于护法战争前各省军队的骚扰，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困境。

1916年广东全年的贸易仅及常年的四分之一，财政收人大减，省城广州竟靠鸦片烟税、酒税、赋税为大宗收人。桂系军阀进驻广东后，不顾民生疾苦，把大笔大笔的金钱花费在扩军和挥霍上。也就是这样，《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章程》第七条规定：“本局所收矿砂运销省港及出口，除矿产税仍照例缴纳外，每百斤捐助本省军饷银四元，按月由督办核明数目，呈报财政厅，如数清解。”第八条规定：“各属矿山，如

别商已经奉准承领矿区者，只准在所领矿区内采，所采矿砂，仍照定章每百斤缴饷四元，交本局转请运照，各商不得自行请照运行，以保饷源而杜搀夺。”对于陷入财政危机的桂系军阀来说，这份《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章程》的出现，无异于使他们找到了一份供自己继续扩军和挥霍的“福音书”。

平湖昌裕公司关于成立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的构想，很快获得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的批准。1917年9月28日，财政厅发布《本厅训令矿商刘裔华等该商呈请设立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案经奉督军、省长批准立案》：

> 案据该商等呈请设立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先从广惠之惠阳、东莞、宝安着手试办，并拟订章程十三条呈核等情，业经明白批示，并呈请督军、省长察核在案，兹奉督军指令开办，呈准予立案，仍候省长公署核示，饬遵，此令，章程存。
>
> 又奉省长指令，开呈及章程均悉，应准立案，仰即知照，此令，章程存各等因。奉此，查该局既奉核准立案，仰即由该商等查照原定章程，将该局应设总办一员，迅即遴选，委员公举，呈请以凭委任，其余应行筹备及开办事宜，亦即由该商等妥为规划，随时呈请本厅核示饬遵，以资进行，此令。

于是，平湖昌裕公司发起的“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得以顺利创办，但企业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款可以坐收“官利”。依靠官方的庇护，企业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专利等特权和优惠。组织机构类似衙门，设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职，官商矛盾日益尖锐，政府的勒索手段主要是“报效”。没完没了的“报效”，窒息了企业发展的生机，最后的结果是，既“报销”了“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也“报销”了“平湖昌裕公司”。

但是，刘铸伯、刘德谱、刘昆谱父子发起成立平湖昌裕公司那段时间里，该公司曾经参与了宝安、惠阳、东莞等县份矿业的勘察与开发，这些矿山的开采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其中，有些开采过的矿山被命名为国家级“矿山遗迹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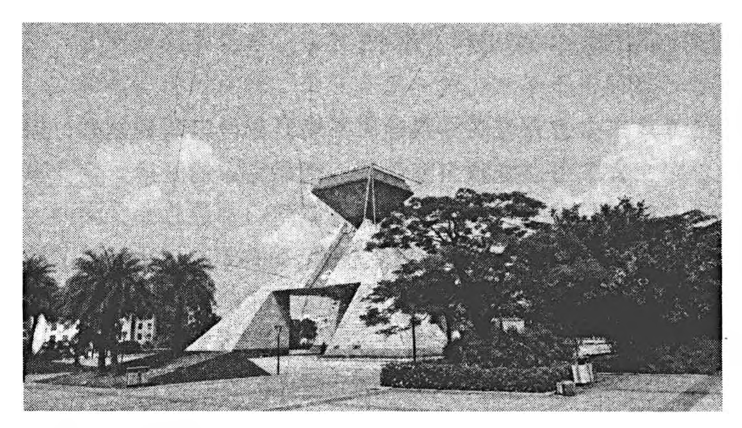
中国的矿业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国土资源部门针对目前众多矿山和矿业城市面临严重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等问题，提出建设矿山公园的构想，认为建设矿山公园是促进矿业遗迹保护的重要手段，是展示人类矿业文明的重要窗口，对改善矿区生态地质环境、推进矿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呼吁要竭尽全力保护矿业开发遗留下来的最重要、最典型、独具特色的矿业遗迹，千方百计弘扬矿业文化。

2005年8月，深圳市平湖凤凰山矿山公园通过国土资源部的评审。2007年12月，凤凰山矿山公园完成了立项工作。

2008年5月15日，平湖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举办深圳市凤凰山矿山公园开工典礼，国土资源部有关领导与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锐锋出席庆典。吕锐锋表示，



国土资源部有关领导与吕锐锋副市长等出席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开工典礼



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

深圳市将主动承担国家矿山公园建设的社会责任，把凤凰山矿山公园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优美、矿业文化彰显、福荫子孙后代的美丽家园。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并保护和改善矿区生态环境，积极关心和支持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建设。

深圳市平湖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项目一期建成后，主入口广场成进出公园的最大集散广场，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健身、休闲、交流的空间。高21米的矿山公园标志碑塔身装饰由砂岩板镶嵌辉绿岩板材构成，这也正是凤凰山岩石的主要构成岩石，突出“都市中的矿山，矿区中的公园”特性。

据介绍：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总面积为88.13万平方米，北面和东北面接东莞市凤岗镇，东南邻横岗镇，西南靠布吉镇，西北与观澜镇接壤，是深圳至东莞、龙岗至宝安的交会点。公园内的矿业遗址包括典型的辉绿岩矿床地质剖面，典型的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大型矿山的采场与加工工厂、矿业活动遗址，辉绿岩矿业制品等多种类型，这些矿业遗址构成凤凰山矿山公园的核心景观，突显生态环境整治和独具特色的矿业遗迹两大主题，以及露天矿区和凤凰山的人文景观。

2012年，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初步达到国家矿山公园的建设标准，顺利通过国土资源部的考核验收。7月8日上午，国土资源部在平湖街道隆重举行广东深圳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揭碑开园仪式，国土资源部、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共同为公园揭碑。

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得以顺利开园，成为全国首批28家国家矿山公园之一。总投资约2亿元，主要分为矿山风景区和康体休闲区，集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园区整体规划布局为“三轴、四区、六园”，三轴为景观主轴、生态景观轴及

人文景观轴；四区为矿业遗迹科教博览区、雅客休闲区、康体娱乐区及生态体验区；六园分别为科教乐园、历史文化园、健身乐园、休闲乐园、体验乐园和水景乐园。

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的开发，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弘扬了矿山文化，普及了矿业知识，提升了群众福利，实现了矿山遗迹的保护利用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发展。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的开发建设，对全国矿山企业的科学发展和矿山遗址的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探索和示范意义。

目前，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仍处于建设期，当地政府以揭碑开园为契机，加快二、三期建设，认真按照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高标准规划、高标准建设，切实做好矿业文化的保护、挖掘、开发和利用，进一步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功能，提升文化品位，提高公园管理水平，努力把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建成一个环境优美、功能多元、设施完善、管理规范的国家级矿山公园，打造深圳文化旅游的响亮名片。

刘铸伯家族墓位于在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的清奇坑，这里长眠着他的祖母梁氏、母亲伍氏、妻子潘氏。20世纪初期，他在凤凰山清奇坑谷地和山冈上兴建守真园，占地70余亩，入口处刻有一副刘彭龄撰写的对联："守得名山依梓里，真疑尘世有桃源。"取刘铸伯的别号"守真"两字分别冠上句首，建有昌裕堂、追远阁、娱亲庭、啜茗亭、读书斋、棋亭、茶亭、马房、水井、莲池等。

黄惠波介绍说：随着凤凰山矿山公园的兴建，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在战乱、动荡年代遭严重破坏的守真园遗址以及刘铸伯家族墓正在保护修缮之中。



第八章　风头浪尖

在激进思潮大行其道的20世纪初叶，学富中西的刘铸伯无疑属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说："先考无党见，顾盱衡时变，往往私忧窃叹，于兴革损益，多所主张，每有发抒，不曲徇时俗，亦不为过高之论，务求平实可行……"也就是这样，刘铸伯经常处于"风头浪尖"，正宋语所谓"半落不架"，今语所谓"两边不讨好"，或者俗语所说的"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1921年—1922年，在香港"婢制存废"之争过程中，刘铸伯、周寿臣、何泽生（何福）等华人绅商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及其所受到的诟病，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极力主张废除婢制的香港礼贤会王爱棠牧师，甚至公开撰文抨击刘铸伯——"在上则傀儡国家之议员，在下则傀儡侨港之黎庶（小民）"。

而在调停海员大罢工过程中，刘铸伯又处于"风头浪尖"，其结果正如宋语所谓"半落不架"，今语所谓"两边不讨好"，或者俗语所说的"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行述》说："今年春（1922年），海员罢工事起，相持久不下，商民交困，群推先考出任调停。先考为华侨大局计，不惮趾疲舌敝，屡向所司力争，局外亦多有不及知者。众情不谅，疑谤交集，迨事获解，而先考之心力益瘁矣。"

水夫罷工近聞

《申报》1922年2月28日发表的《共产会（党）广州支部向罢工海员发一宣言书》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证章

第一节　婢制废除之争（上）

太平绅士制度是英国创立的一套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司法辅助制度。英文名称为：JUSTICES OF THE PEACE，简称J.P，译意是“和平公证人”或“治安推事”，后正式译为“太平绅士”。1843年，香港第一任总督钵甸乍，特选了44位英国人，组织成立了“英属香港治安委员会”，任命为第一批治安委员。后来易名为“太平绅士”，权力亦得到扩大。

早期被获委任的太平绅士，几乎全属英国人。直至1883年12月，香港高等法院首位华人陪审员黄胜（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同学），才被委任为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此后，又有第一位华人立法局议员伍廷芳律师、首位获册封爵士的华人何启、保良局创办人韦宝珊等一批华人被委任为太平绅士。

进入20世纪，刘铸伯也被香港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在1922 年出版的*Anglo-Chinese Directory: Hong Kong*一书中，我们看到一个“太平绅士芳名”栏目，当中所列举的29名华人太平绅士中，六人为何东家族的核心成员，包括何东、何福、何棣生（甘棠）、何（世）荣、何（世）光及何（世）亮；四人为姻亲，如黄金福、罗长肇、罗旭龢及罗文锦；另有六人如韦玉、周少岐、刘铸伯、唐丽泉、周寿臣及莫干生等，则或同属中央书院旧生，或同属买办，或同属生意伙伴，或同属知己友好，彼此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以上这则资料，一方面说明了“太平绅士”的显赫地位，另一方面则若隐若现地带出社会网络的彼此纠缠关联。

香港实施的太平绅士制度，是一个有效的监督、视察制度。它提供一个独立渠道，方便有需要人士提出投诉，并让有关方面按规定就投诉进行调查、跟进工作。此外，相关的决策局或部门也可借太平绅士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改善有关设施和服务管理的问题。香港回归之后，太平绅士制度得以延续。

但在激进思潮大行其道的20世纪初叶，包括刘铸伯在内的一批学贯中西、富甲一方的“太平绅士”，无疑属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说：“先考无党见，顾盱衡时变，往往私忧窃叹，于兴革损益，多所主张，每有发抒，不曲徇时俗，亦不为过高之论，务求平实可行……”也就是这样，刘铸伯等“太平绅士”经常处于“风头浪尖”，正宋语所谓“半落不架”，今语所谓“两边不讨好”，或者俗语所说的“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1921年—1922年，在香港“婢制存废”之争过程中，刘铸伯、周寿臣、何泽生（何福）等“太平绅士”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及其所受到的诟病，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极力主张废除婢制的香港礼贤会王爱棠牧师，甚至公开撰文抨击刘铸伯——“在上则傀儡国家之议员，在下则傀儡侨港之黎庶（小民）”。

香港在英国割占之前，华人蓄婢（婢女又称“妹仔”）的习俗就已普遍存在。1841年2月 2日，英军中尉、商务参赞义律（Char les E Uiot）代表英廷宣布依照中国的风俗与法律治理在港华人。此后，璞鼎查被英国女皇任命为首任港督，在香港继续推行“以华律治华”的统治政策，华人一循《大清律例》，富人可以继续蓄婢，政府不加干涉，使得蓄婢习俗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香港得以延续。

在英国割占香港之后30 多年里，港岛上的婢女制度与英国在港推行文明化进程一度并行不悖。首先打破这种平衡的是英国人斯梅尔（John Smale）。斯氏是港督轩尼诗时代（1877年—1882年）的正按察司，他思想激进，支持港督提高华人政治地位，主张严禁苦力贸易和拐卖妇女儿童。轩尼诗曾经明确表示，斯梅尔与他“完全协调一致”，他曾经考虑要废除蓄婢制度，但是得不到当时社会的支持。

保良局代表全体华商郑重上书港督称：“今闻督宪审讯卖良为娼之案，其堂判内有云买卖婢女，均有罪名，本居民实深惶恐。”并列举蓄婢10大理由，力陈“买子立嗣、买女为婢”是华人下层解决荒年、贫困与溺婴恶习的最主要方式，请求港督允许华人社会蓄婢，“因例波及之款，变通办理”，“俾阖港贫富均安”，反对港府对妹仔问题采取过激行动。

保良局代表上流华人，坚决要求维护蓄婢习俗。在这种情况下，港府内部也对蓄婢习俗的合法性问题产生分歧，华民政务司欧德理（ E.JE itel）就是全力维护华人蓄婢风俗的欧人代表之一。他根据自己在新安县传教以及在香港十余年的生活经验，撰写长篇报告，批驳斯梅尔反对蓄婢的观点。报告详细阐释述华人蓄婢习俗，指出婢女不同于黑奴，蓄婢符合中国文化，有着自身的合法性与社会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蓄婢旧俗终将消亡，但若盲目干预这个进程，只会造成华人社会的混乱。

1883年，华民政务司罗素曾就蓄婢习俗向港督宝云提交报告，并转送殖民地部。这份报告重申保良局坚持蓄婢的观点，但也建议政府注册妹仔，并对妇女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港府因应这份报告，修改例律加强对香港妹仔的管理。1886年通过条例，“更好地保护妇幼”。1887年重新修订《保护妇孺则例》，保障妇女的权益和人身安全。港府积极修改例律，成功地化解由斯梅尔在港引发的第一次废婢争议。

1917年12月，香港最高法院受理一宗拐卖婢女案，再次引发香港社会对婢女合法性问题的争议。在法庭上，被告律师辩称，虽然中国允许蓄婢，可是在香港，婢女有权获得自由。因为根据英国及其殖民地不准蓄养奴隶的法律规定，婢主不拥有对两婢女的合法监护权，被告的行为不构成拐骗罪。被告最终以其他的辩护理由胜诉，但是此案引发的婢主权益及蓄婢习俗合法与否的争议，并没能在法庭上获得解决。

此案引起香港社会，尤其是许多在港英国人的关注。英国上层人士尊获（Colon 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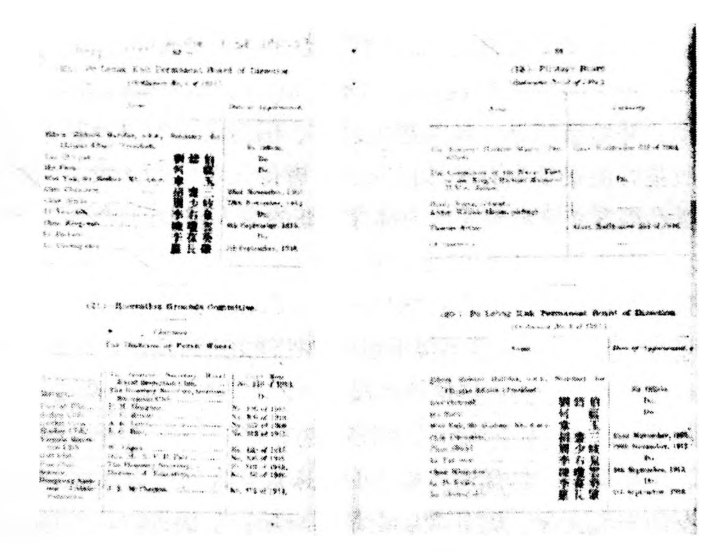
John ward）率先以其个人影响，对英国国会施加压力，并且促成香港社会出现反婢舆论。尊获是英国国会议员、陆军中校。当时他因公事途经香港，闻悉此案在港开庭，备感关注。鉴于案件审理不尽如人意，遂于1917 年10月27日，写信给英联邦商会秘书长埃普林顿，详细提及香港蓄婢风俗。尊获指出，英国本土早已废止奴隶制度，但是作为其海外殖民地的香港，居然还能公然允许奴隶制度合法存在。

这封信在英国殖民地部掀起轩然大波，殖民地部官员早已淡忘30多年前的那次争论，立即指示港督修订法律，并针对蓄婢习俗可能引发的各种质疑采取积极的改进措施。

1918年8月，港督梅含理给殖民地部送上一份报告，对香港蓄婢习俗做出详细的解释和充分的辩护。报告指出，奴隶制度在香港确实是非法的，但是妹仔是家庭女佣而非奴隶，代替佣金的是免费的食宿，有时甚至是免费教育。尽管妹仔有时会受到虐待或误用，但这种习俗常常是防止饥馑或溺婴恶习的唯一途径。梅含理的报告虽然提到30多年前罗素撰写的报告，但没有采纳其中的改革方案。殖民地部对梅氏近乎自得的答复不甚满意。于是该部根据罗素报告， 向港督提出诸如在将来要对妹仔支付佣金，并给予她们选择主人的充分自由等改良措施。其最终目的是将蓄婢习俗逐渐转化为普通的雇用女仆制度。

但是，这个提议却受到代港督施勋（Claud Severn）的抵制。施勋坚持梅氏论调，声称不少妹仔都是从死亡在线挽救回来的，如今她们衣食无忧，吃住不愁，有时还能从雇主那儿得到良好的教育，这都足以补偿她们操持家务的辛劳。妹仔也有选择雇主的自由，但是，由于她们多数年龄偏小，缺乏经验，若自由选择雇主，很可能会遇到危险，甚至落入鸨母之手，沦落风尘。施勋的报告还特别提到，蓄养妹仔在粤省一带依然合法存在，允许香港蓄婢，符合“以华律治华”的政策。于是，英国殖民地部的官员们接受施勋的主张，不再追究婢女的最终命运。

在香港早期反对蓄婢的活动中，其主角都是来自欧洲的居港人士，如香港按察司斯梅尔、英国国会议员尊获等。但他们势单力薄，主要以英国法律为武器，向香港的蓄婢旧习提出挑战。港督代表香港本土的利益，坚决支持以保良局为核心的上流华人，两者组成坚持蓄婢的强大力量。尽管



1922年出版的《香港行政事务名录》（Hongkongcivil service list）显示，刘铸伯与何福、韦玉等此时任保良局总理

反对蓄婢力量不受港督及上流华人重视与欢迎，可是他们却能利用与英伦本土的联系，把带有东方封建色彩的香港蓄婢问题交由早已充斥资本主义文明的母国国会裁决。香港早期的两次废婢尝试虽然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却向香港蓄婢陋习发起挑战，蓄婢陋习已经不符合时代进步的潮流。





希士路活先生及夫人

香港19世纪20年代掀起的废婢运动，与希士路活夫妇密不可分。希氏夫妇是开明的英国人士，他们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热心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希氏夫人还曾于1914 年参加法国战地救护队。1919 年，希士路活抵港接任英国驻香港的水师副司令，其夫人陪同前往。在港期间，希氏夫妇亲眼目睹婢女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希氏夫人曾写信给各大报纸，激烈抨击香港的蓄婢习俗。这就引起香港政府与上流华人的不满。新任港督司徒拔多次委婉地提醒希士路活先生，要求限制其夫人的过激言行，遭到希氏的拒绝。

于是，司徒拔写信给海军部，要求将希氏调离香港。希士路活被迫退役回国。然而，希氏夫妇的离去，不仅没有消弭香港的废婢之争，反而使港府陷于更为被动的境地，并最终促成20世纪20年代香港废婢运动的高涨。

希士路活夫妇返回英国本土后为了寻求解决香港受压迫妹仔的根本办法，四处活动，并给新闻界、各类慈善机构、国会议员们以及其他许多重要人物写信。他们还广泛收集香港报纸中有关妹仔问题、虐待儿童问题、童工问题或是妓女问题的资料，向英国社会揭露在香港殖民地内部存在着的令人震惊的现实。

希士路活夫妇的活动唤起英国开明人士的关注。国会议员频频向殖民地部提出质疑，要求解释并对香港妹仔风俗采取必要的措施，仅1921年与1922年，来自国会的质问就多达8 次，殖民地部不得不想尽种种理由进行搪塞。此外，许多重要人物的署名来函和各类社团代表的来访，也使得殖民地部疲于应付。诸如费边社、国际联盟、国际妇女救助联盟等英国社团，都在呼吁香港废婢的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香港，总督司徒拔也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 其中既有殖民地部官方意见，又有密友的知心劝谏。国务大臣密尔乐与丘吉尔根据以往的港督报告，建议港府对妹仔习俗采取必要的行动，如设立一个专门机构以保护并提高妹仔地位与生活状况，增加欧洲人士进入专门机构，以调查儿童的受雇佣情形，或设立一个欧洲人团体对香港蓄婢问题进行

监督等。他们的建议反映出英国朝野要求香港改革的呼声。虽然这些建议受到港督的强烈抵制，可是英国殖民地部在国会各方的压力下，终于通过决议，要求征集居港华人对于华人蓄婢旧习的意见，以便香港政府酌情处理。于是，婢女去留问题成为华人关注的热点，香港社会鼓荡起废婢声潮。

在废除婢制之争过程中，麦梅生、王爱棠、杨少泉等基督教华人信徒是坚定的“废婢派”。麦梅生《香港蓄婢问题原叙》（作于1922年9月1日）写道：“天下最惨无人道者，莫如蓄婢制；而天下最极无人格者，莫如奴婢身；故文明之国，必禁买卖奴婢，所以重人道而崇人格也。我国之有婢制，由来已久。虽主张优待奴婢之说者，代有其人，实行宽待奴婢之法者，尝闻其事，唯提倡放婢者，自基督教传入以来，无论信教与否，均有鄙夷蓄婢之事，视为不合人道矣，足见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道德之进化，于斯益有证矣……”以刘铸伯、周寿臣、何东、何泽生等为代表的华人绅商，则主张保存并完善蓄婢制度，双方为此展开了辩论。

1921年7月22日，刘铸伯、何泽生以香港定例局华人议员身份发出《通告》，邀请各界人士到太平戏院商议研究婢制问题，“期集众议意，以定从违”。该《通告》原文如下：

> 启者，现因有人在英京下议院提议，并在各方面鼓吹，请理藩院令行香港政府，取缔我华人养婢之旧习，故特请我旅港华侨于阳历本月三十日，即星期六下午两点半钟，假座太平戏院，将下列各款，细为研究，从众取决，将公共之意见，详呈港政府，俾知适从。此事关于我华人习惯，甚为要大，届时务祈踊跃贲临公议，幸勿放弃，是所至盼。计开：
>
> （一）养婢是否系养育以为妓女？
>
> （二）为婢者是否为奴？
>
> （三）为婢者是否供男子取乐之用，俟男主人厌弃之时，即转售与他人？
>
> （四）养婢之习惯，中国旧例禁否？
>
> （五）为婢者其主人是否可任意将其难为？
>
> （六）其余关于养婢之内容各事。
>
> 以上各款，如经共同研究确属事实者，即宜请港政府定例永禁，否则亦宜由我华人自行订定如何维持之，以免外人有所借口。
>
> 香港定例局华议员刘铸伯、何泽生谨启
>
> 一千九百廿一年七月廿二日

1921年7月30日，商议研究婢制存废会议如期在西环太平戏院举行，到会者300余人，参加会议的有中外报纸记者、基督徒、工商会等社团，主席为刘铸伯，著名绅商有何泽生、周少岐、曹善允、周寿臣、李葆葵、李亦梅、李幼泉、叶兰泉、罗旭龢、何世耀、尤瑞芝、岑伯铭、黄广出等。大会主席刘铸伯发表演讲：

今日邀请列位男女界到来众议此事，关系于我华人之习惯及华人之体面，兹事颇为急要，务请列位持平，将自己目击耳闻之情形，详细表示出来，以便当众研究。

近数月来英国有人在下议院质问云：香港乃英国属土，何以仍不禁止买奴，又何以任为婢者被主人虐待，均经本港政府将内容详细辨明，又经西报访员到鄙处求取意见，照登报上。今复有人在英京各方面传说，谓我华人在港购蓄妇女为娼，为男主人之享用，而享用厌时，即转售与他人，及婢女每受主人苛待，常被鞭挞等等之残暴，力请英廷令行本港政府立例禁止购蓄婢女，或限制蓄婢女家，要其报名注册，并派差时到其家视察婢女。今鄙人先将自己向日所目击耳闻之情形逐层表示，请列位谛听，与列位之耳闻目击比较，何异何同，然后定决，人之谓我者全系实事否，我之谓人诬责我者又系实事否。总而言之，吾人须细心着想人之谓我者如非事实，即当证出其非，并将蓄婢之实在情形详列，呈明本港政府，以便传达英廷。至于其中或有少数无意识之主人，苛待其婢女者，吾人又当设法使其勿加苛待。西人对于禽兽之被人虐待，尚为之设会维持，何况吾人对于自己之养婢，有不愿设法维持者乎？兹谨将鄙人平素对于我华人蓄婢之情形，所目击耳闻者，详加论列，请列位听后，详细研究是荷。

他说："日前鄙人对西报访员所陈各节，今不欲再言，以免多费列位之光阴，亦不欲如前与他人之辩论，再行剖解，唯他人已听言谓此次叙会，系为保存育婢之习惯而设，似无庸辩为非是，缘列位均知婢女之事，系关于中国经济问题之一种、中国人民生计一日不能整顿，凡欲禁绝之者，均不能去贫民之苦况，诚恐反而增之也，又请叙会之告白内，经已声明请列位来研究，他人之责我者，取众意以证其讹，可知非专为保存而设叙会明矣，即将奴隶及婢女问题详论，今讲仆同事定例局普乐君问题，《孖刺西报》主笔问题，剖解该两问题，系请今日会议之告白，登场后，方刊登于西报者。"

《孖刺西报》开列的问题是：一、婢女服役家务是何意义？家奴是何意义？二、买蓄婢女多属慈善性质乎？抑为养业谋利乎？三、如买婢系因悭工金起见，有何法以防其苛待之乎？四、蓄婢之家，享受其中利益者，岂可以之为公证，以取决禁止蓄婢乎？五、蓄婢之习不禁，岂非分种类乎？六、苛待婢女之人，肯到此叙会，将情由实说否？

定例局议员普乐开列的问题是：一、买婢之人是否有权以其婢为享用品，即男主人任意令其婢为妾或为所私之妇，及可任意令其婢操作家内各项工作，除刑事法律所禁止者；二、买婢是否为省俭费起见，即如蓄婢每月不给予工钱，比较雇工相宜；三、是否多假借买婢为名，实蓄养为妓？四、买婢之人能否将其转卖与别人，其转卖时，例应商知其婢之父母，或原卖之人否？五、婢之父母或原卖之人，能向买家备价赎回该婢否？以上各问题，须俟明白答复后，吾英人方知为婢者系为何等人格，然后定决应否准在本港买蓄，或将此风改良。

为答复上述提问，刘铸伯将以前及近日所采集的各方面意见，及自己耳闻目睹的事

情，详细申说，并请各位将意见及所见所闻仔细剖白，“盖此种意见，系该两问题中之最要点也，虽不用逐层伸论，然亦各依次序言之，今因特欲将事表白，故日前之言论再复提出”。以下，节录自刘铸伯发表的长篇演说：

一、有两等级人购蓄少年女子，彼此不同宗旨者，其一蓄婢为家常服务者，其一系购买为妓者，此两等人不能混合。盖养少年女子为家常服务者，系顾存名誉之人，实不愿以乌龟自居，以污其名者，况买人为娼者，常受当道之牙爪及土豪敲诈，为人类所不齿，凡买少女为娼者必须秘密从事，实为例所惩办者也。而家常服务之婢女，若非其父母及本人允愿，不能逼令为娼，凡此罪名者，即要赔价巨款，并以法律惩办，又要将女子交回其父母，并不给值。凡购买女子为娼者，必须与其父母特别订约，给以重价，有时托言买为育女。职是之故，卖契有三种，送帖、开身契、育女契是也。

二、今日中国实无奴隶，虽或有之，亦系少数，然亦非奴隶对待者，盖此等人或因不欲离其旧时主人，因其东主所给之工金，比之别处更丰也。向来女子不以奴隶称者，女子于年幼购买者居多数，而无人愿买年长之女子，盖年长者实难管束，又因子年后即要出嫁也，此等年幼女子，因年太幼，未识料理其本身，其主人之仆妇，或其妻女，为之穿衣洗浴等事，直至年长方能有用，其父母亦准常到探视，并留其住宿，给以饭食，并其来往费用，亦多由主人发给者，更有富厚之家，亦常送给银两及旧衣服等与之。

三、常有以其本族之子女为婢女者，凡同姓之女子，不能结为妻室，又不能做妾，家中事务均由主妇经理，若男子欲立之为妾，必须先与其妻继与婢女之父母，商酌允洽，又要该婢女愿意方可，若秘密做事，虽婢女本人允愿，亦必要其妻答应方可，对于其妾之婢女亦然。凡男子与婢女做事不正当，则有种种危险，若男人与其婢女苟合后嫁与人，其夫见得该女子不贞，而婢女认明此事，其男子非独为亲朋所鄙，并爱其妻妾咒骂，理要赠巨款与其夫及其父母；又有等有势位之人，私立其妻或其妾之婢女为妾者，但必要纳贿与其父母，另寻地方居住，在后生育儿女，亦承认为正式后裔；亦有立婢女为妾，未先得其妻允肯，致惹起家庭大风潮，逼得私交巨款与之，送回其父母，守候与否，听其自择，任从转嫁别人。又闻有立婢为妾，而得宠专房，其妻与旧妾打落冷宫者，此则华人所谓弃妻重妾也，为法律所禁焉，未闻男主人可随意将婢女为所欲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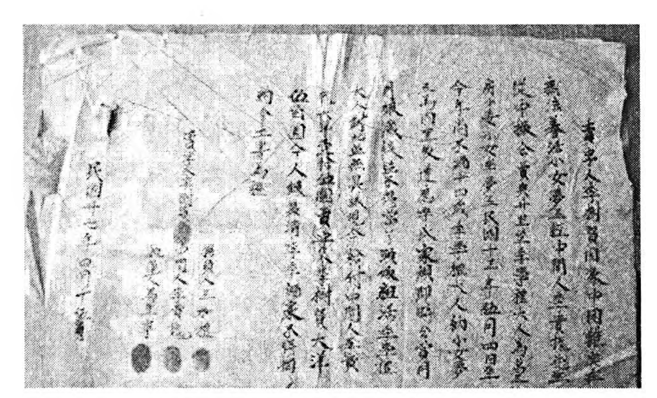
四、中国政府直至今日尚未颁行法律禁买婢女，于中华民国初年，粤垣警厅试行之，通令蓄婢之家，将婢女交出，将多数婢女设所留养，未几则请各家收回婢女，因各婢女在居留所，未有如在其主人家好衣裳及好食用也，故大为嘈闹，而年长者要警厅代觅好丈夫，或准其出外自由配择，而年幼者，又要雇使妈扶养，如此繁难，不胜其扰，加以贫寒之家，有自愿将女送入居留所者，职是之故，事不果行。维新人物，曾献议将妾婢两种禁绝，唯事难行，终议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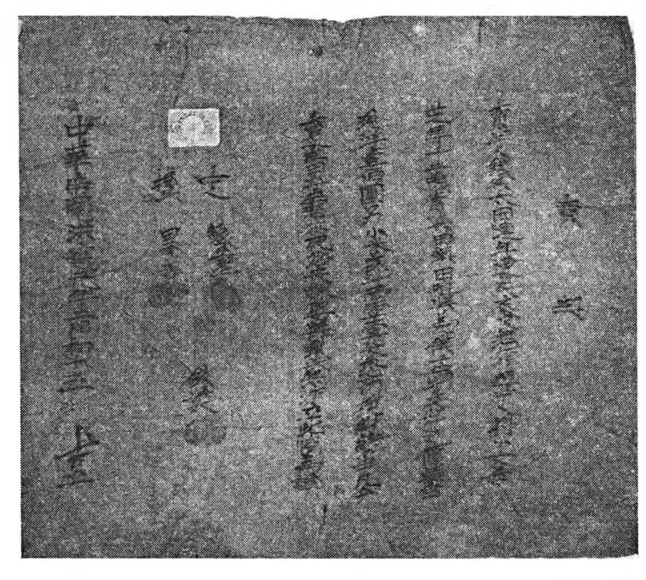
1921年7月30日，刘铸伯在太平戏院的演讲

五、凡女子售与富厚之家，极为安乐，甚少工作，若售与中等人家，工作或有艰辛，或亦甚少工作，全凭其人有福与否耳。在富厚之家，婢女为其子女作伴，跟随主妇出入，或单做针钱，或侍候到探女客。在中等人家，则帮助煮食、缝纫、洗衣、洒扫、往市购物等，然此等服务，其主人之女亦为之者，为婢者衣食丰足，若随同父母，难免有饥寒之憾。亦有女主人过于苛求，或品性过烈，或凶恶薄待婢女者，此等妇人品性生成，待自己女儿亦一式。常有婢女因刁顽懒惰不服教训，其主人自愿交回其父母，任从交回银多少，凡除写开身契之婢女（立此等契者广东甚少），其父母常到探视，为主人者，必须报知如何相待，及何项工作；若其父母有钱，又可能将女赎回，或婢女为主人薄待，其本人常劝其父母将他赎回，再找寻好人家领受者；对于婚嫁事，其父母亦可发言，常有未得佳偶，其主人劝其交回款项若干，带回家择配者，而男主人常阻止其妻妾将婢女薄待，以保存名誉者；若有刻薄等事，其仆妇与邻人等定必知之，该婢女亦必讲及，而因此逃走者亦属不少，至于薄待等事，虽系其本人儿女，局外人鲜有不宣传者也，然暴虐之事，实为法律所禁，若地方官查出，定必惩办焉。有多数婢女学识理发针钱等，不愿出嫁，自愿与主人酌商，再留服务一两年，期满时，或往别处雇工，或仍在主人处听命，辛金照给，此则所谓婢女服务时期，约八年或十年，为主人者要供给衣食药费等，凡亲朋赏给仆人利是等，婢女亦沾润焉。婢女常有积蓄多金者，若其主人见其婢好品性，

有给以首饰配戴者，此等奖品，有时与其身价相等，则所谓许其自由矣。

六、凡衣食丰足之人，决无将女卖作婢者，而所卖者匀系无工作，或为饥寒所逼之人，有时将其女售卖，以救回其生命者，或因借此款以抒目前之苦况者，或免其别儿女饿死者，又有售女以抵葬费者，或因地方官逼交税捐或罚疑者，若逼于此等事，虽其幼仔亦要售卖，凡卖仔者不能赎回，盖买仔者系用作螟蛉者也，唯女虽再转卖亦可能赎回。婢女多系由四岁至十三岁买入，至少要候至十岁或十二岁方能有所操作，其实在服务时期，系由十二岁至十八岁，到十九岁时，婢女发生意见，必要没法嫁之，或与之酌订条件。卖婢之价直以每岁计，每岁由十元至十五元，若于四岁买入，其价值四十元或六十元。在饥荒地面其价较平，前次北省苦饥，男女童之数，奄奄待死者如此之巨，其父母恳人收领，并不取价值，但此系意外之举，不能并论者也。婢女逝世，必要将之安葬，不能向其父母追计损失及费用，然由四岁至十二岁，其衣食等费及其父母间或到探给以来往及食宿费用，此数必要计入于卖价之内，盖由十三岁至十八岁方能服务，由十八岁至二十岁出嫁，身价若得一百者，必要扣出五十元至七十五元为出嫁衣裳之用，并将其所积蓄之利是等，及所配戴之首饰，亦一并相与也。然婢女系当作家内人，可信托照管贵重什物，至少可服务八年或十年也。感情之婢女，出嫁后亦有其主人作亲属来往，照旧习亦互相提携，彼此有关系，尤与儿女交情更笃。而对于婢女方面，其幼时免受饥寒，学识针钱，又识字，又习染好行为，若系贫人之女，焉能得此也？婢出嫁与人，又得好人家，若有余资，又可能相助其父母兄弟，盖有多数婢女，因嫁得好人家，有资以扶起其父母兄弟者。有等村乡初生女孩，无人领受，将之溺死者，若一穷汉，其人





两份民国年间的卖身契

息不敷养家中众口，逼得将其女舍弃，或连其妻亦不能保存，至于其年迈之母，亦凭人怜恤而已。

以上理由，可能答复慈善及谋利问题也。尚有数小事，可能研究者。于未有奴婢之前，子侄奉侍父兄叔伯，为女者，侍候老母伯母等，则经书所言，卑辈向尊辈定省晨昏，唯命是听，执卑贱之役，加以劳力于田亩及畜牧等，并无工直者也，若未得尊长之欢，即背鞭跪下请挞，若有尊长命其死，亦不得不死者，无论公平与否，亦无法可挽救。自有奴婢之后，为子侄者，亦渐渐除去担负，以奴代之，此等旧习，现已全失，与今日所议者实系不同。我英人朋友对于妹仔问题，谓系属奴字意义，故要详解，而前者西报向仆询问，经已将意义详论，照吾人意见，为父者积蓄资财，遗下其儿女，亦系奴字意义，盖不辞劳苦难博利，为其儿女谋幸福，非奴而何？故为子者可称之为东主，为父者可称之为奴矣！即如余为汝做事，余亦可称之为奴矣，盖余为汝干事，亦入奴字之意义也。凡妹仔或仆人所做之工作，未有若中国内地农民妻之工作如此艰辛者，盖彼辈天未晓则起，向河或井担水煮饭，向山上割草伐木为薪，帮助掘地种植，补缝衣服，抚育儿女，养鸡猪，侍候家姑，或织布制线洗衣舂米等，由天明至入夜，终日劳苦日日如是，并不少息。虽其子长大立室，其工作亦不息，盖仍要助其媳作工也，而所衣所食均甚极劣，又当其夫生气时，致被责骂，或被鞭挞者，此等妇人，各处地方均有。所谓妹仔者，系此此等妇人之女，其母如此艰辛，方能保存生命，为女者其苦况可知矣，常有年少女子，在山上看牛割草，负重来往田中，此等女子，长大即系此等妇人也。

至谓妹仔问题，有关乎分别种类之说，此说余不甚了了。若谓此系华人习惯，若不除，华人则终系华人，英人终系英人之说，然虽立例废除，能使两种人之情性、思想联合而为一者乎？然种类分别最昭著者，莫如现时所行华人则例，设立华民政务司，特别留开地方，与欧洲人居住，又只系华人犯罪者，施以枷号示众及笞刑等，此说本不欲牵入今日所议者。然因《孖刺西报》询及分别种类问题，故备为答复耳。今日在座诸君，有多数未养妹仔者，故今日之意见，非系因养妹仔有益而发表意见者也。对于废除与否，余未有何种关系，所要磋商者，系对贫民有莫大影响，然若废除之，此等女子与其父母实有益与否？譬如今日香港政府照十年前粤省警厅一式行事，则有一万至一万五千婢女，交出与政府接管，其中有年纪幼稚者，有年已及笄者，此等婢女，系拨公款以养之乎？抑或交回其父母乎？若有多数父母不愿意归政府管理，或不愿回去与父母相处者，政府则施其权力，将凡有婢女之家，逐离本港乎？或强将婢女牵去，另择地方留养乎？前议在港建设工艺所，以教育在街上无牌照售物及犯罪之童子，尚恐内地之童子源源而来，人数过多，今若将妹仔之数减少，岂不畏娼妓之数，大加特加乎？然所谓养女者育女者，系一种人欲买女子为娼之掩耳盗铃名词也，余今已将所采集意见，伸说一切，还请诸君答复此问题，及呈达意见，免为人指责，及是否有不合之处，必须干预者。

刘铸伯演说之后，何泽生接着发言。他说，中国内地贫苦人家，如有儿女数口，扶养艰难，将一女卖与人为婢，胜过在家挨饥抵饿，也有将女卖去得回银两，借以做小生意救活一家数口，如果不买女为婢，恐难免有将女儿溺死或揸死等弊端发生。何泽生还特别强调：“本港之婢女，其数约计有数千口之多，若定例永禁，必预先筹善法，将并数千婢女妥为安置方可，况香港例禁，而内地不禁，亦无补于事，倘要婢女注册，必须随时巡视，然难免差人穿房入舍之骚扰，何不由我华人结一团体，选举值理一班，劝谕养婢之主人，切勿虐待婢女，并有权代被虐之婢女申诉？是否有当，仰祈酌裁。”

接下来是参会人员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展开论辩。杨少泉医生、王爱棠牧师等基督教人士主张废除婢制，发挥自由博爱之说，但大多数华人绅商主张继续维持婢制，只是要“研究维持之法”。

最后，刘铸伯提请与会者，对养婢者是否系养育以为妓女、为婢者是否为奴、为婢者是否供男主人取乐及厌弃时即将转卖别人、养婢之习惯中国曾例禁否、为婢者其主人是否可任意将其难为等五个问题，举手表决，竟然无人举手。问到“养婢之习惯中国曾例禁否”，当时有何丽臣、王爱棠牧师及教会中人共四名举手，但是，少数服从多数，四名举手表决无效。刘铸伯说：“今日已解决此五条问题，可见皆无人肯承认，唯诸君子有欲请政府行禁例，禁止买卖婢女，鄙人素好做带头人，但恐君等口是心非，口讲得而造不来耳，吾人在公众社会办事，总要问良心，诸君皆系慈善大家，今日对于婢女要如何维持，请由各位定一日期，再开一大叙会，那时诸君可以整顿全国，改良教育，开放女子，唯诸慈善界之命是听也。”

这次辩论会，取得刘铸伯等预期的效果。他说：“自有定例局以来，华人议员，因政府立例，而在公众之地开大叙会者，此实为创举也，盖在三十年前，中国人对于公众事业，尚少注意，今则与前不同，盖今日程度已大增进，良堪贺喜矣，但自此次以后，如英国行何种则例，我两华人议员不力争，诸君尚敢骂我溺职否？”

会上，黄广田倡议设立“婢女维持会”，辅助保良局之进行，汤寿山和议，全体赞成通过。

第二节　婢制废除之争（下）

在刘铸伯出面召集的研究婢制存废问题大会上，正反双方各持己见，争论相当激烈。一方主张废除婢女制，还婢女以自由平等；一方则认为婢女在富人之家极为“安

乐”，不同于奴隶，并以香港婢女数量多，难以安置为由，反对废除蓄婢。最终表决的结果是：少数服从多数，香港与英国国情不同，继续保留婢制，但要加以改善。

8月2日，礼贤会王爱棠牧师在《大光报》撰文《揭明蓄婢会议之否认原因》，批评大会主席刘铸伯在研究婢制问题大会上“立言之巧”“措词之狡”，他说：“未开议时，先由主席解说甚详，及后讨论，大概皆以取缔蓄婢，为理所应宜，不料付表决时，则众皆否认，即赞助取缔蓄婢者，亦同声否认之，于是主席遂宣告一至五题，全场否认矣。噫！全场果是否认此五题所言蓄婢之事实哉？其中盖有术在也。”



香港礼贤会教堂

王爱棠牧师认为，刘铸伯“立言之巧”的表现在于，当天2：45开会，主席宣告大旨后，即将一至五题详细演说：“指明所言之失宜，如养婢非养为妓，婢与奴不同类，婢非供人取乐之用，婢不可任意难为，逐一解说，连篇累牍，使发此五问者，无可直辩，至四点正钟，然后演毕，所费时间，一点零十五分，居全场议事时间，几至二分之一，可知当时主席已将否决之意，满注于众人心目中矣。”他说，根据议举章程，大会主席切忌详谕演说，并指出即刘铸伯撰写的《自治须知》，也规定“主席只须将其事之始末，略令同人明白便了”，但是，“今乃长篇大论，居全会发言之半，即破坏其手订之议规而不恤，无他，盖欲以其个人之意，而左右会场也”。对于刘铸伯会上所言“港政府对华人立例之不公，如居处则别其地方，治理则异其官长”“华人当自办己事，不宜与外人干涉”，王爱棠牧师也提出批评，认为“此种言语，一以起中西之见，一以生偏护之私，于是遂有倡说婢女救济会者，而政府取缔蓄奴之善意，遂于会众心中，已多数无形打消矣，此余所以谓主席立言之巧者”。

王爱棠牧师批评刘铸伯演讲“措辞之狡”，辩言乱致，舞墨弄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责他把讨论议题之内容缩窄，使得与会者除“是否”二字之外，无法作答者，这么一来，“一令人疑英议员诘问之语为辱华人养婢之家，一令聚议者必居于否认之地，而以此归咎于港侨身上”，刘铸伯“在上则傀儡国家之议员，在下则傀儡侨港之黎庶，其用心诚亦狡矣”。但是，这次会议一致否认问题存在，既非否认取缔蓄婢为不宜，也不是认定蓄婢流弊为非实事。

8月9日，《香港华字日报》发表王者的商榷文章。他说，王爱棠牧师《揭明蓄婢会议否认原因》一文，“持论对于华人两代表前日邀集各界会议蓄婢问题一事，多不满意

于主席。鄙人对于社会事务素无成见，唯以主持公道为职志，今见所论多属客气用事之言，而非出于公道之议，如鲠在喉，不能不吐，用特着词与王牧师讨论之”。

对于王爱棠牧师所谓“当日全场否认英议员所设一至五各问题，非果出于众人之本意，其盖有术”的说法。王者反驳说，王牧师“不知英议员所设之问题，于吾华人之体面习惯大有关系，主席否认此五问题，其持之正确，系吾华人心中所欲吐之言，并非主席一人私见，苟吾华人肯承认此种问题，则吾华人之蓄婢者均属以为妓为奴，为男主人所取乐，如此吾华人尚有人格乎？尚有面目以对世界各国乎？且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承认矣。以万不能承认之问题，而众人否认之，理至当也，安得谓为有术哉”？

对于王爱棠牧师指责刘铸伯发言“乃长篇大论，居全会事发言之半，为破坏议规”云云，王者回应说：“不知会议法则，随事不同，苟所议之事为寻常事件，而主席对于其事又无意见表示者，自当照通常议事规则，只将事之始末说明，以俟众人公议。今所议之各问题，乃关于吾华人之体面者，其事至为重大，且英人对此问题中，多诋毁我华人之意，为主席者若不将其所抱之意见详细表出，以与众人讨论，是失主席之职责也，故主席所发言虽极长极多，苟非题外之语，均不得认为不合议事规程。”

对于王爱棠牧师指责刘铸伯“又言港政府对于华人立例不公，如居处则别其地方，此种言论是起中西之见”云云，王者回应说：“不知主席之发此言，系答复《孖剌西报》所询不禁蓄婢是分别种类中之一语，并非有意分出中西界限，主席当日在场，已声明此意，今何得指为惹起中西之见乎？”并且声明：“鄙人虽与主席相交甚浅，唯见其平日持论行事，无一不以融和中西方之意见，解释中西之嫌疑为事，此彰彰在人耳目，非鄙人个人之私见也。今王牧师乃借此一言，而谓主席为惹起中西之见，吾谓王牧师之为此言，实欲挑拨中西恶感耳，如王牧师之流者，恐不止于此也。”王者最后说，至于香港蓄婢风俗是否应该取缔，这个问题，既与中国数千年积习有关，又与人民生计问题大有关系，“非一人所能武断，非空言所能收效，要当各抒所见，以期集公论而收研究之功，不应肆意诋毁，以快个人之私见”。

8月13日，《华商总会报》发表署名不平子的文章《蓄婢问题之辩误》，批评王爱棠牧师《揭明蓄婢会议之否认原因》一文：“更属节外生枝，谓‘众人否认蓄婢之六问题，为主席立言之巧，以主席发言时候太久，议论太详，已将否决之意满注于众人心目中，付表决时，众皆否认此五问题’云云。使主席之言不是，虽演尽日，亦不能动人之听，今一致赞成，是人人心理有同然也，安得‘以立言太巧’讥之哉？”

此后，香港报刊就婢制存废问题，继续展开争论。

研究婢制问题大会结束后，持两种不同意见者分别建立相应的组织，即主张禁婢的“反对蓄婢会”和反对禁婢的“防范虐婢会”，各自加紧活动。

8月8日，以基督教人士为代表的华人，在杨少泉的牙医馆召开“反对蓄婢筹备会”，与会者26人，公推黄茂林为临时主席，杨少泉为副主席，通过了成立“反对蓄婢会”决议及《反对蓄婢会简章》，并申明：“本会以维持人道、废除婢制，使婢主得觉悟、婢女得解放为宗旨。”同时通过了《反对蓄婢会宣言书》。《宣言书》回顾了香港

婢女问题的由来，揭露了蓄婢的种种流弊，指出：第一，蓄婢有伤人道；第二，败坏道德、丧失品行；第三，有伤风化，扰乱社会治安。因此，婢制必须革除，养婢恶习尤当禁止。《宣言书》还提出了今后开展禁婢运动的根本办法：一、要设法鼓吹，大力宣传，制造舆论，使社会各界明白蓄婢的危害性；二、要求政府立例注册，取消契约，使婢女获得人身自由；三、设立监护人，由政府委任加以监督；四、创办教养院等公益场所，收留无依归之婢女。

在组织方面，“反对蓄婢会”设有调查部、演说部、司库、文书以及中西文文牍员，分别负责调查、宣传、财政、组织活动记录以及与中外社会的交流。其中，调查部负责调查婢女的数量、规模与生活情况，演说部以宣传废婢运动为主旨，司库负责经费的支出与增值，文书记录、保管该会的各种文书数据，中文文牍员加强该会与香港华人的交流，西文文牍员以英文与国外进步人士以及各类社团进行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废婢运动。

“反对蓄婢会”会员，主要来自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等相关的教会组织，以及信仰基督教的人士。他们以宗教的热忱积极投身反对蓄婢的运动，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会后，的全体会员分赴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广泛发展会员，筹集活动经费等。

10月13日，“反对蓄婢会”在《南华早报》发表公开宣言，主要内容分为五部分：一、妹仔制度的弊端；二、废除的理由；三、此制度并非善举；四、以说服来推行改革的无效性；五、废除此制度的试验性建议。该会强调妹仔制度是伪善的行为，婢女如同奴隶，又指出保护妹仔协会的成立，等同猫为了老鼠的利益而组成的联盟，是荒谬的处理方法。他们建议废除妹仔制度，取消买卖文件，妹仔改称为佣妹或女佣，买婢女的支出作为预支的薪金，婢女工作一段时间后便可获得自由。该会四处进行宣传和举办讲座，还组织调查虐婢事件的工作。

反对禁婢的刘铸伯、何泽生、周寿臣等香港华人绅商也不相让，他们组织成立了“防范虐婢会”，假座东华医院大堂开初次叙会商议进行事宜，并选举值理主席，及举分任值理、章程各事，是日与会者二百余人。刘铸伯主席在会上说：

> 今日叙会，各位已知，不必赘述，前者在太平戏院叙会，大多数以为应筹设之会，劝人勿虐婢女，所以本会之设，系由于当日在太平戏院多数通过者也，鄙人与同事何泽生代表多数人意见。自登报以来，报名入会者已有四百余人，已缴纳会费者三百余人左右，今日在座者皆本会同人也。照鄙人愚见，以为二元之费会，一次过收足，则不可再收年费，手续较易办理，因将来会务发展，同人自必增多，收费极难，如孔圣会数千同人，每年收取年费亦太不易也，若收一次过二元，则作为永远同人，若有事开销，则向同人签捐，听其随缘乐助，敢信热心同人极多，则使用不愁无着者，愚见如此，未悉诸君之意若何?
>
> 至此会现时已有几百人，已足数成立，今日最要者为选举值理，方能办事。照

鄙见值理须分为总值理一班，各环分任值理又一班，如此办事方能周到。弟回忆办理公立医局时亦然，由总理之中选出司库司理两位，但两定例局员不可举他为正副主席，因他两位为各界代表，系代表本港各方面者，照鄙见举两华人代表为名誉会长，至常川办事者，则仍由值理举出正副会长，此后每届之定例局员则为名誉会长斯可矣。至于总值理由二十五位至三十位，各环之分任值理，则以每环之大小不而定多寡，至今日议事手续之最要者，莫如司理，须先举出一司理，办事方有端倪。弟倡议以司理一职，黄君广男为最合格。

这次会议，公推当年保良局首总理为“防范虐婢会”正主席，副主席则由保良局前任首总理担任。被推举为总值理的还有曹善允、周少歧、周寿臣、何棣生、李右泉、郭少流、冯平山、李葆葵、李亦梅等26位社会名流。会议规定保良局、东华医院、华商总会、华工总会以及各环公立医局、分局为虐婢投报点，负责接纳各方投诉、安置受虐待婢女。刘铸伯最后说：“居民对于保护婢女，见有虐婢女，须往投报分任值理，但若寻分任值理难觅其信址者，事颇繁琐，不若效公立分局办法。居民有事关于婢女要投报者，可到东华医院、华商总会、保良局、华商总会，与及各环之公立医局分局，投报则可……今日所议之件已完，甚望各位办理此事成功，进行不懈，因此乃我华人自己人之事，凡系华人，皆要办到妥善者也云云。”

不久，“防范虐婢会”假座华商总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叙会，讨论分任值理制定的《防范虐婢会章程》，并表决有关事宜，公举李荣光为主席，是日开会时，李荣光谦逊不已，转举刘铸伯为临时主席，先由司理黄广田宣读报纸所登叙会告白，刘铸伯说：“今日本当由李荣光为主席者，奈他太过谦逊，据云须各章程妥定后，方肯为临时主席也，本会之宗旨，前已讲解，今不赘述，唯分任值理，目下已将章程订定寄回，今日特请同人表决，此章程未表决之先，请逐条参订。”

司理黄广田将《章程》逐款读毕，刘铸伯倡议将章程第二款之宗旨“本会以人类互相善爱为前提”句，删去“人类”二字，以免语赘。周寿寿提议，将第十三款“埋一总结”四字删去，免重叠而归简略。除此以外，一律通过。

刘铸伯说，各章程意义，将交由分任值理译为英文，又请黄君广田将中下环及各处之值理芳名述出，当堂通过毕。他还说：“尚有四环公立医院之值理，未曾加入，请司理行信，请其加入。前数日九龙有一婢女诉苦，有为难之处，后托曾富君调查，极有效果，所以分任值理，各处皆当推举多人，较为利便也。”

这次会上，罗世基倡议将《章程》译就英文，寄一份给华民政务司，提议获得通过。汤寿山说：“各分任值理，须要极力帮助此会，介绍多些人入会，本会即多些耳目，办事进行之消息，亦较灵通，异日本会之结果，亦归于妥善，各宜有众志成城之心，不可放弃责任，是弟所厚望也。”叶兰泉说：“最好由分任值理组织征求队，更易着手。”

“防范虐婢会”不仅是香港华人绅商势力的聚集，而且更主要是上流华人与港府力

量的联合。这是因为该会会员大多在政府担任公职，素与港督及港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港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华人上层意志的体现，这也是港府极力为香港蓄婢旧习辩护，并强烈抵制殖民地部改革要求的最主要原因。因此，“防范虐婢会”的建立，标志着华人上层与港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香港蓄婢问题上声气相通，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与同步。这也促使“防范虐婢会”在香港废婢运动早期居于主导地位。

但是，“反对蓄婢会”成立后，很快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8月16日，《士蔑西报》刊登《麦干治牧师对于制婢制问题之演讲》，略谓：“近闻华人中之有势力者，谓英国国旗下虽不应有奴制之存在，而‘婢女’之制，则与奴制异样，予亦信少有不同，不过予终觉除‘奴’字外，终难觅得适宜之字以名之，否则诚恐有名义与事实相违之处，盖‘奴’字之一义本多歧，而‘奴’之制度亦无一定之变更也，吾人于此一道及‘奴’字，不禁触及美洲西印度等处贩卖黑奴之感想，然中国家庭蓄婢之制，其惨酷或尚不至于此，故今日直视蓄婢为奴制，不免遭一部分人之反对，唯含此不用，则此等不幸之女童，由己家而被卖入他家之真相，竟莫由得出矣，至港政府答复英京聚议院之质问，有港中并无买卖奴婢之语，试思在英伦之人，一无所见，何由辨认？否则其感想将何如，此无他，不外字义之不同，致事实莫能畅达，遂令此报告流于虚假耳……”

10月3日，《光明报》刊发署名废五的《防范虐婢会与反对蓄婢会》一文，认为，人类正在趋向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蓄婢、虐婢之事很快就要结束，防范虐婢、反对蓄婢纯属多事之举。废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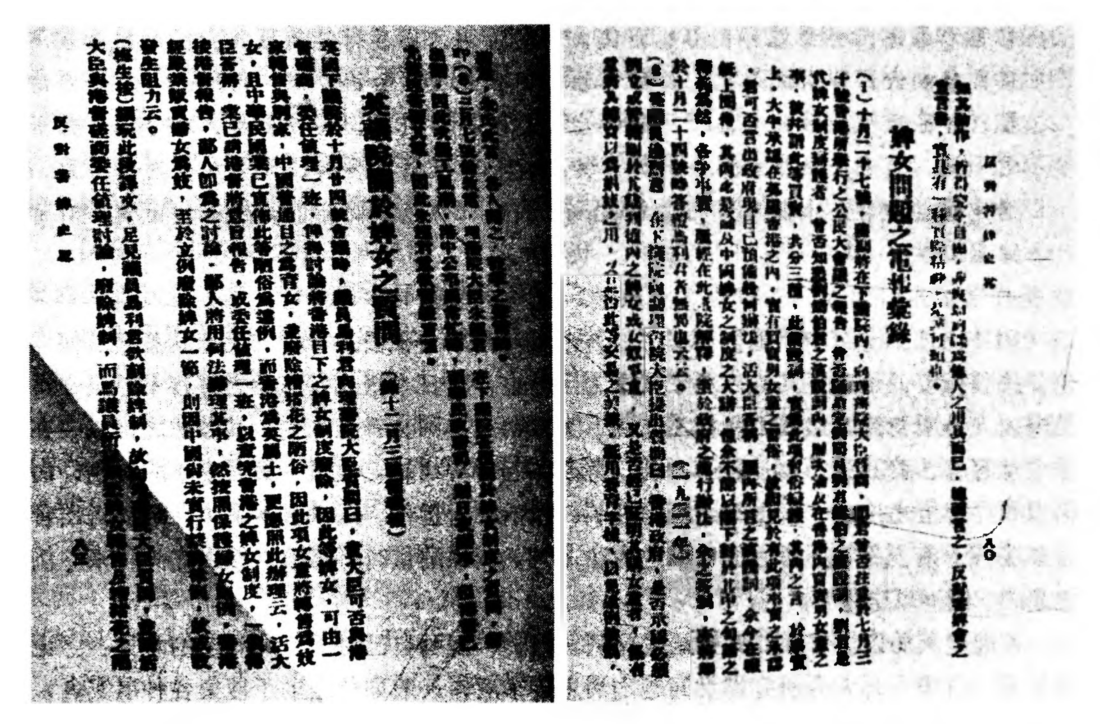
> 世界潮流，渐趋向于社会主义，将见人类平等，孰为主奴，莫由分辨，而所谓富贵人家，早已等诸无何有之乡矣，更谁蓄婢者？防范虐婢会，无乃矫强乎？反对蓄婢者，无乃多事乎？虽然，此迂论也，社会主义，现正萌动，他日结果时之若何福乐，只在吾人幻想中，纵使循规直行，犹不能按日计程，达其所止，吾人置身现社会，亦唯有尽厥天职，培养其萌芽，而与潮流相周旋而已，是则二会之是非，又恶容已于论列哉？彼曰蓄婢习惯也，吾将曰虐婢习惯也，既曰维持习惯也，是不啻亦维持虐婢习惯也。若曰保留其蓄婢习惯，而防其虐婢习惯，吾不知彼具何等权力，用何种手段，而能收防范之功也，无亦助长虐婢者之习惯已耳。阅者疑吾言乎，请伸吾说，夫蓄婢者非所谓富厚家耶？蓄而虐之，尽在于我，固无待他人之干涉，讵料物极则反，竟来外人之责言，乃不得已而立此会，以为掩耳盗铃之计，若可敬尤可鄙也。为问发起此会之诸君，曾亦知加入此会为会员者，多是蓄婢之人乎？既多蓄婢之人，则难免有虐婢者，可断言也。若辈既成其虐婢习惯，而谓一入此会，便蠲弃其习惯乎？必不然也。吾恐若辈异日，仍习其所惯，致或被发觉，将振振有词曰：“吾某会会员也，何至尔尔？”人亦曰：“彼某会会员，彼未尔尔。”则无告之婢女，更深堕一层地狱矣，可哀也夫。孟子曰，如知其非义，斯既已矣，何防范为？非然者，毋宁多加二字，谓为“防范虐婢发觉会”之为愈也。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人非至愚，畴不欲者，而“反对蓄婢会”诸君，竟唾弃之，是

君等之愚也，苟诸君为良心所驱使，不忍苟同，亦各行其是可矣。反对胡为者，且反对者云，待对之谓也，处兹恶浊，何言公理？金钱万能，何所不可？吾愿诸君，破除成见，改此会为“不蓄婢会”，从片面进行，鉴彼丑形，或令他有觉悟之一日，虽未能从根本解决，而可怜之婢女，受赐已多矣，而必从反对者着力，则是诸君沽名，市此不可必之恩也，吾故曰“防范虐婢会”为矫强，而谓反对蓄婢为多事也。

10月10日，《南华早报》刊文说，香港反对蓄婢会积极进行，“无论其惹起若何评论，迹其行事，足以证其为一勇于任事之团体也，昨日本报刊发该会之宣言书，虽强半为港内人士所稔知，然其中所拟之办法，类皆精当，则觉有意味也，其办法之优点，在乎立意容忍，盖其已虑及凡政革古制，势必惹起种种纠纷，故虽一面力主革除婢制，而仍求顾存婢主之权利，该会封于废除婢制，拟请政府担任，以求极本解决，继复提出善后办法若干条，此等办法，他日编定为法律时，或须酌量时势修致，然以之为将来立例之基础，则洵可宝也”。

香港定例局议员普乐，亦投函《孖刺西报》，阐明自己对于养婢问题的意见：“记者足下：自华人开大会研究婢女问题之消息传来后，一般如仆之勤于搜集各种事实者，均视为佳音，唯不幸而受下言两种原因所打消：（一）大会之召集，公然为保存华人习惯起见，及（二）拟于大会提出之问题非真能为婢女问题探本求源，及搜察由该习惯而发生可能之弊端，细味大会所研究之六款，第一与第五不独搜察不详，更似足令英京议院有等议员懵然不知所从也，第一与第三问题之措辞太过概备，第二问为婢者是否为奴，应改为买婢者对于婢女有何种权限，第四问之答语殊耐人寻味，唯英领土政府之如何办法未能决定，第五问之答语则明明为否，盖凡虐待他人，无谕是否婢女，均属违法也。至仆献议，以为华人大会应提出下列：（一）买婢者是否全权管辖之例，如是否有权令其（甲）做彼之妾，（乙）做彼之妇，（丙）为彼管理一切家务，（丁）括言之从彼指挥而做不犯法律之各种事务；（二）是否每买入婢女，系为经济原因，欲得廉价之劳工而已，（三）买婢问题是否有时假为借口买婢专为做娼起见，（四）买婢者能否将之转卖与他人，如将转卖，婢之父母或将买出之原人，能否参与磋商，（五）婢之父母或将之卖出之原人，如欲赎回婢女，即将之买回，则有何等权限，（甲）由原主赎回，（乙）由转手卖人之手赎回，如以上各问题能完全答复，则余辈可自行番察于英国属土中（一）婢女之情状为何若，（二）婢女之习惯应完全续行，或根据现状续行可也。”

刘铸伯1921年7月30日在研究婢制存废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也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据《婢女问题之电报汇录》记载：“10月27号，获副将在下议院内，向理藩院大臣质问，谓君曾否注意于7月30号香港所举行之公民大会议之报告？曾否诵读定例局员刘君铸伯之演说词？刘君是代婢女制度辩护者，曾否知悉刘铸伯君之演说词内，屡次论及在香港内买卖男女童之事，彼并谓此等买卖，共分三种，此演说词，实为此项习俗辩护，其内之言，于事实上，大半承认在英属香港之内，实有买卖男女童之习俗，故因见



《反对蓄婢史略》收录的《英议院关于婢女之质问》

《反对蓄婢史略》收录的《婢女问题之电报汇录》

于有此项事实之承认？君可否言出政府现目已预备设何办法？”

获副将在英国下议院质问理藩院大臣，是否读过刘铸伯的演讲词，并说刘铸伯演讲中“屡次论及在香港内买卖男女童之事，彼并谓此等买卖，共分三种，此演说词，实为此项习俗辩护”。显然他对刘铸伯的指责有些断章取义之处，譬如，刘铸伯开头的演讲原文是：

> 中国旧日之立法，除颁行之律例外，如上谕及官厅所出之告示，亦均认为法律，非如立宪国法律必由上下议院讨论而产出者也。前清末年，只有放奴之上谕，并无禁婢之明文，间或地方官因见拐骗妇女之事日多，有出示禁止贩卖人口出境者，然亦不过一时一地之命令，民间买卖人口之习惯，固未尝因此而遏止也，此可证明无禁止买卖婢女之定例矣。至内地蓄婢有写契据听明卖断者，有写送帖者，写送帖者以送字避去卖字，而将身价改为匿醋金，以示别于售卖人口。广东人之蓄婢，均用送帖者为多，又买育少女为婢，与妓不同，为妓者为法律所严禁，《大清律例》有载不准买良家妇女为娼，犯者严究，故买育少女为妓之人，多称买以为女，或为童养媳，每由远处买来，以避其父母之察觉，或在年幼无知之时期买育，使其长大，不知有生身之父母，此等实与育婢者不同。今日英国所责难者，系将育妓与育婢混而论之，实不明其内容也。

香港保良局之设，系为防范拐骗贩卖人口之弊，所以凡由内地来港为妓或出洋为妓者，均须先到华民政务司署问话。尚年岁不足，或言语糊涂，则发交保良局绅董再行查询，如属被告拐或被骗者，则将其携来之人控官应办，如属骗诱为妓，而本人被惑，并非出于素愿者，则留局择配。查在港为妓之妇女，多由内地移来，间有少数系本港居住之妇女，此种若非系名节已坏，不能嫁人之人，即系甘愿为贱，不愿为良者也，其中亦有由鸨母从内地购来，养大为妓。至于婢女，如遇有受主人虐待，保良局亦收留代理。查在港之婢女多由内购来，甚少在本港买卖，现香港华人，多知本港政府不愿人买卖妇女，亦知受人骗者无法挽救，历经发生有案，其将女出卖者，多有串同媒家，于交易后，即请伊女走失，或被人拐骗，直往买家索还其女，而分文不赔回，买家又不敢报官控追，以此之故，非详知底细者，多有不敢轻易买受也。

日前鄙人对西报访员所陈各节，今不欲再言，以免多费列位之光阴，亦不欲如前与他人之辩论，再行剖解，唯他人已听言谓此次叙会，系为保存育婢之习惯而设，似无庸辩为非是，缘列位均知婢女之事，系关于中国经济问题之一种，中国人民生计一日不能整顿，凡欲禁绝之者，均不能去贫民之苦况，诚恐反而增之也，又请叙会之告白内，经已声明请列位来研究，他人之责我者，取众意以证其讹，可知非专为保存而设叙会明矣，即将奴隶及婢女问题详论，今讲仆同事定例局普乐君问题，《孖剌西报》主笔问题，剖解该两问题，系请今日会议之告白，登场后，方刊登于西报者。

理藩院大臣仔细读过刘铸伯的演讲词，对于获副将的断章取义及其对刘铸伯的指责，显然不满。他在回答获副将的质问时说："题内所言之（定例局员刘铸伯）演说词，余今在报纸上阅得，其内多是论及中国婢女之制度之大谱，但余不能以阁下对于其中之句语之释义为然。各项事实，屡经在此议院解释，至于政府之进行办法，余之答词，亦将如于10月24号时答复马利君者无异也云云。"

12月3日，《循环日报》刊登《英议院关于婢女之质问》："英国下议院于10月24号会议时，议员马利君向理藩院大臣质问曰，贵大臣可否与港督磋商，委任值理一班，俾得讨论将香港目下之婢女制度废除，因此等婢女，可由一家转售与别家，中国普通目之为育女，并废除'槽猪花'之陋俗，因此项女童将转售为妓女，且中华民国业已宣布此等陋俗为违例，而香港为英属土，更应照此办理云。活大臣答称，业已请港督将意旨报告，或委任值理一班，以查究香港之婢女制度，一俟得接港督报告，鄙人即为之讨论。鄙人将用何法办理其事，然按照保护婢女则例，香港经严禁贩卖妇女为披，至于立例废除婢女一节，则因中国尚未实行禁婢律例，故或致发生阻力云。"

香港"反对蓄婢会"自筹组、成立之际，就与英国、广东以及香港的进步人士与社团建立良好联系，为香港废婢运动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该会散发了包括《英议院关于婢女之质问》在内的英国国会关于婢女存废的辩论，以及有关电报——

——英议员边烈君，在下议院向副理藩院大臣提出质问曰：香港政府，是否承认必须例立或管辖关于其裁判权内之婢女或女奴事宜？又是否经已证明其购女童者，意将其转卖为妓之用？又是否此等交易之契据，只用养育字样，以免违例被罚？又除刑名则例外，女婢之主人，对于命此婢辈作工或责罚，或为妾侍之权利，是否有无限制？副理藩院大臣活君答称：边君之上质问，请参观十月二十四号时之答复，鄙人曾表明香港系严禁贩卖女童为娼，至于虐待过继子女，乃属严禁，鄙人深悉华人习惯，若欲立妾侍，须得本人之妻并该女子，及该女子之父母允肯方可云。

——十一月二号伦敦电，婢女问题，又再在下议院提出讨论，当质问此事之时，边尼君质问：谓除刑律之外，实有无限制购买婢女任意使用，及随时鞭挞，或以妾侍看待彼等之事。副理藩院大臣活君，答谓在香港及无论何处，对于限制虐待养女等事，除刑律外，亦将有公论，据彼所知干，则中国习俗，凡为侍妾者，必先得该男子之妻，及该女童，与其父母之允许，始行成事。屈活副将问谓，此习俗于中国实为合例否，及是否只在英属为合例，而其情义如奴役。副理藩院大臣答谓，彼与其前任之人，对于此项习俗，均继续拒绝加以奴役二字，故彼甚望屈活副将亦不用此名辞，彼信中国曾设定律例，遂致此习俗在英属之外为不合例，但中国则准以备用制度而养育女童，先行给款一宗，直至二十五岁乃为满期云。

——二月十四号伦敦电，于质问及香港奴婢问题之时，获少将质问，谓理藩院大臣朱超君，是否不以在英属废除买卖人口之权为过期，彼则以其为有玷辱英国帝国，朱超君提议，请将此事于下议院讨论理藩部预算表时，提出讨论（一九二二年）。

——二月十五号伦敦电，国会议员数人，昨日及今日在下议院，于质问时间，经极力质问关于香港买卖童孩问题，理藩院大臣朱超君，谓倘有一机会，彼甚原查确全议院对此事之感觉，但彼甚知悉，因何此习俗不完全推翻，且在中国亦甚普通者，彼意以此习俗之大纲，但可反对，但信其执行时，则不然也。反对蓄婢会倡议所招集之会议，于开会时，各社会之派代表赴会者甚众，该会议由奇列士顿子爵夫人主席，随后通过一议案，宣布婢女制度，实为香港之恶习，并力促理藩院，委任一负责男妇委员会，往游香港，向中西人士询查，俾得设立一可行之办法，以阻止买卖人口，与将人类作为奴役，及其余因此而生之恶习。前任印度副理藩大臣罗披士君，亦有宣言，而希士路活司令，则极力反对此等制度，在英旗下继续进行，盖实为玷辱国家及是丑事也。至于其余之演说者，则虽要求修改此等恶习，但指出谓继续办法，乃中国教例上之一部，有一妇人，谓彼对于具有教育之中国妇女，较之别国妇女，尤为尊敬，故信倡议废除此种恶习，彼等将必极力赞成也。

——二十号伦敦电，众议院质问香港婢女问题，理藩大臣楚治路请将质问展延，因伊对于此问题大旨，不甚满意，须与香港总督函商，故未能答复云。

——二月二十一日伦敦电，理藩院大臣朱超君，在下议院请展期讨论关于香港婢女问题，谓彼意致函香港总督询问此事，因其对于在下议院之质问及问题，未得完全满意。朱氏此言，各人闻之，鼓掌之声雷动。

——三月七号伦敦电，理藩院大臣朱超君，在下议院答复关于婢女制度之质问，指出谓，因此次罢工风潮，港中公事异常忙碌，而华民政务司，则日夜办事，但港督已允从速答复其电，因此朱超君意欲暂缓宣言。

香港开展禁婢运动的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也积极开展禁婢运动，并通过了禁婢决议案。1922年2月24日，大总统孙中山发布了严禁蓄婢令：

蓄婢之风，前清末造，业已成为厉禁，凡买卖人口者，科以重刑。民国成立，人民一律平等，载在约法，所有专制时代之阶级制度，早经完全废除，乃查私家蓄婢，至今未已，甚至买卖典质，视同物品，贱视虐待，不如牛马，既乖人道，尤犯刑章，兹特明令严行禁止，嗣后如再有买卖典质人为婢及蓄养者，一经发觉，立即依法治罪，着内务大理院分别咨令各省行政司法长官令所属一体奉行，并着内务部通行各省安筹贫女教养办法，以资救济。此令。

孙中山发布的禁婢令，对于香港的反蓄婢运动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持。尔后，内地和海外华侨也都先后开展了禁婢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禁婢运动的深入开展。

3月20日，《大光报》发表英国“世界女子平权同盟会”（总办事处设在伦敦亚但街十一号世界女权报）总干事杜兰顺女士函询蓄婢陋俗致大总统夫人书：“广州大总统孙逸仙夫人赐鉴：余等渴欲知中国现在所有妹仔（按粤语称婢为‘妹仔’，此语英国极通行，原文如是，故照译之）之真地位，今提出数问题，请为答解：（一）各处此种风俗，是否与香港相同？（二）现时外国人，于妹仔之纪载，是否言过其实，或更有所未知者？（三）现时保护妹仔之社团有几？（四）现时关于禁革此种风俗之



孙中山与宋庆龄

社会（组织）有几？（五）中国进步的女士之有意改革此俗者，能举其名以告否？以上数问，希为详细见示幸甚。附寄本会国际通信片二纸。”

由于香港反对蓄婢会与英国进步力量遥相呼应，英国殖民地部在各界的诘难中四面楚歌。国务大臣丘吉尔如坐针毡，终于决定在1922年向港督发出一份语气强硬的电报：“我不愿再为它（指香港蓄婢习俗）在英国殖民地的持续存在两辩护。……只有采取行政手段，才能使之（婢女）获得自由。”他建议成立一个包括赞成改革人士在内的委员会，调查有关妹仔的问题，并要求港督将调查“报告随你的改革建议一同寄给我……（并且）必须立即通告所有的婢主与婢女，明确妹仔……将不再受到香港的承认，特别要指出到了年龄的妹仔有随意离开婢主的自由， 对此不得采取任何干预手段”。

港督收到电报后不敢怠慢，1922年3月13日，华民政务司委托反对蓄婢会与防范虐婢会合议条陈办法。3月24日，香港反对蓄婢会将报告译成中文，登报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宣传。此后，反对蓄婢会派出黄茂林为首的7 位代表，防范虐婢会派出以罗文锦为首的7位代表，共同组织委员会，就丘吉尔提出的几个问题对婢女进行调查。

4月14日，港督指示华民政务司要求在全港范围内设立布告栏，通告香港禁止蓄婢：“华民政务司夏，为示谕事，照得现奉督宪谕开奉理藩院谕，在大英国全境内不准蓄奴，故尔等居民，须知婢女非主人所私有，凡来港婢女，其欲离去主家，并已及自能决断年岁，必须任其往求华民政务司为之处理，唯应告饬汝等婢子，必待寻有职业，方可离去主家，否则恐被人诱为娼妓，又特为诫饬为主人主妇者，凡其婢女如欲往见华民政务司，毋得阻止，等因奉此，合亟出示晓谕，俾众周知，为此特示。”港督还要求成立委员会，对婢女问题进行调查。

1923年5月29日，委员会拟就《禁婢新例草案》，经各委员亲笔签名后，送呈港府议决——此时刘铸伯已经仙逝年余。

第三节　调停罢工风潮（上）

辛亥革命爆发后，广东宣布独立，因时局动荡，广东革命政府面临财政危机，试图向香港与海外华人社群、招募捐助，可是港英政府多方阻扰，处处为难。与此同时，广州及华南地区通行的硬币“银双毫”严重贬值，港英当局担心营商环境受损，遂颁令阻止其在香港流通。香港电车公司响应要求，禁止乘客以此支付车资，引起部分在港华人居民不满。

港英当局既不准广东法币在香港流通，又禁止广东公债奖券在港发行，激怒了许多华人，特别是旅港四邑工商总会成员。洋人经营的香港电车公司，拒收广东钱币当车费，激起华人的愤怒，1912年香港爆发“杯葛电车运动”。

“杯葛”是英文boycott的粤语音译，意为“联合抵制”或“拒绝参加”。民众纷纷上街游行，阻止乘客搭乘电车，导致港岛交通混乱不堪。1912年11月22日，香港街道从西营盘到筲箕湾一带，到处张贴杯葛海报，也有漫画，讽刺电车乘客是猪犬畜生。24日，群众千余人众集筲箕湾，阻扰电车，高呼“杯葛”。英人警官逮捕一名华人，民众向警官投石喊打。26日，中区德辅道，又有千人的群众骚动，抛石头袭击英人警察。大批警察赶到，逮捕四位民众。此后，警卫日夜巡逻电车通道，并有五十名士兵，分乘各路电车当纠察。不过，民众坚持杯葛，甚少华人乘坐电车。

12月18日，梅轩利总督召集一百五十名华人绅商，解释电车公司拒收广东铜币，并非有意侮辱中国，而是因为它比香港铜币轻贱；他威胁要对居民征收特别税，以补偿公司的损失。此外，梅轩利总督邀请刘铸伯等华人领袖居中调停，出面劝说抗议民众，他又与何东、韦玉、刘铸伯、陈赓虞及其他多位绅商带头坐电车，以为示范，以打消市民疑虑，鼓励大众乘车。经刘铸伯多方斡旋，“杯葛运动”方渐告平息。港督梅含理在给英国政府殖民地部的报告中，承认此次风波得以平息，刘铸伯及华商公局绅商出力最多。

其实，有些华人绅商，拥有电车公司股份。他们也希望早日结束杯葛，所以诚心与港英政府合作。比如，刘铸伯是电车公司股东兼理事，与港英政府真诚合作，他收到“敢死会”的一封恐吓信。陈赓虞也收到一封。韦玉（立法局委任议员，代表华人）收到不只一封恐吓信，对他谩骂，指责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洋人、鄙视华人同胞、跟殖民政府勾结共谋、狼狈为奸。

关于辛亥革命后刘铸伯与孙中山的交集，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1912年）5月21日晚，赴刘铸伯等于华商公所之宴会；9时至洞天酒楼赴香邑华侨之宴。连日先生接见友好多人，又与孖刺西报访员纵谈民生主义、铁路国有政策。（《民生日报》1912年5月23日）。”另据14岁即加入兴中会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事略》中记载，刘铸伯曾赴上海，拜访首次护法运动失败后离开广州避居沪上的孙中山，表示“愿在港筹饷襄助革命”。原文说：1919年“（余育之）尝引港商刘铸伯谒总理于上海。铸伯极致企慕，愿在港筹饷襄助革命，归港未几即以病逝世，事遂不果”。

对于1919年“（余育之）尝引港商刘铸伯谒总理于上海”这一记载，《孙中山年谱》未予采信，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们从香港档案馆里查到一则文献：1919年12月30日，刘铸伯宴请广东军政府莫荣新上将一行（1919，Dec.30-SCMP-Dinner given for advisers be Genl Mo Yunghin， Military Governor of Canton among guests Lau Chu Pak）。文献里的“SCMP ”是英文报纸*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的缩写，也就是

1919, Dec. 30 - SCMP. - Dinner given for advisers by Genl. Mo Yunghsin, Military Governor of Canton - among guests Lau Chu Pak

1922, May 6, SCMP., died May 3, Honbl. Mr. Lau Chu Pak, aged 56 years.
1922, May 4, SCMP., Obituary of Lau Chu Pak, born June 5, 1867. Central School student, 1885 first clerk of Hong Kong Observatory, gave up 1888 to become compradore of West Point Godown Co. Following year appointed Senior AngoChinese Master of Formosa Government School. But in 1890 started an business on his own as tea merchant. In 1903 became first Chinese assistant and compradore of A.S. Watson and Co. 1897 elected Tung Wah Committee. Condemnded by some for his alleged foreign leanings.
1922, May 8, SCMP, funteral Mr. Lau Chu Pak, residence

《南华早报》的报道

说，当日的《南华早报》报道过这场饭局。

桂系军阀（旧桂系）莫荣新（1853—1930），也算是民国初年的大人物，1917年11月擢升为广东督军，与南下护法的孙中山及其护法军政府分庭抗礼，拘捕孙中山大元帅府卫兵数人，并加以杀害。孙见其欺人太甚，令军舰炮击莫荣新观音山督军府，莫第二天即到大元帅府问安。1918年2月，莫指使歹徒刺杀海军总长程璧光。1918年5月，在滇、桂系军阀的排斥下，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香港燃料一直短缺，为解决这个的问题。港英政府早在1917年就已觊觎广东省地下蕴藏的丰富资源。经港英政府安排，英华工程师协会派人对广东全省进行了地质勘探。为了攫取广东的地下资源，香港英资企业汇丰、怡和、太古等大公司均参与了开发计划的制订。经港督推荐，英国政府最后选定了由退伍少校卡赛尔提出的计划。1920年4月，卡赛尔所办公司与桂系军阀莫荣新草签了合股开采煤矿的合同，亦即“卡赛尔煤矿合同”。依照所签合同，英方有权开发广东的煤矿及控制全省的水陆交通，修建连接广九和粤汉线的铁路。

香港華商總會報號外

莫榮新轟燬兵工廠

九時將兵工廠燬燓

莫榮新確已逃遁

《香港华商总会报》庚申年九月十九日（1920年10月30日）派发的一张“号外”

由此可见，刘铸伯1919年12月30日组织的这场饭局，实则与促成莫荣新草签合股开采煤矿的“卡赛尔煤矿合同”有关。况且，20世纪初年，刘铸伯已经转向矿业开发。1917年，宝安县李朗上村地方发现锰矿，刘铸伯之子刘爵华、刘裔华火速呈报官厅，请求从速暂发临时开采执照。此后，为了大规模地科学开采广东钨矿、锰矿，收购广东全省出产的钨砂、锰砂，刘裔华、余国霭提请筹备商本银25万元，

由官督商办，设立“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并拟定《广东全省官督商办钨锰矿务局章程》。（详见第七章第四节）

明白了以上历史背景，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关于刘铸伯曾赴上海拜访护法运动失败后的孙中山，表示“愿在港筹饷襄助革命”等说法，就变成了无根游谈。

但在第二次护法运动（1920年11月—1922年8月）期间，坚决北伐的非常大总统孙文，与倾向地方自治的广东军政实力派陈炯明，意见相左，貌合神离，而刘铸伯则在港英政府的指使之下，试图在广州组织“商人政府”。

1920年8月，粤军陈炯明所部在福建漳州誓师，分三路回粤讨伐盘踞该省的桂系军阀。同年10月，粤军击溃桂军，占领广州，驱逐了莫荣新、岑春煊和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势力。庚申年九月十九日（1920年10月30日），刘铸伯担任主席的香港华商总会旗下的机关报《香港华商总会报》，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莫荣新轰炸兵工厂”“莫荣新确已逃遁”的消息，免费向香港市民派发。这也可见他对莫荣新的横征暴敛，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随后，陈炯明多次电邀当时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回粤主持大计。11月25日，孙中山偕同伍廷芳、唐绍仪等人离开上海，经香港前往广州。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再次主粤，在英国历来控制的在华势力圈内展开更大规模的护法斗争，提出接收海关、废除“卡赛尔煤矿合同”，直接动摇了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在华南的利益，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恐慌。然而，鉴于英国在华南拥有重大商业利益和孙中山的巨大影响，公开进行反对无疑对其不利。因此，英国政府对广州政权的态度是，既不承认这一与北京对抗的地方政权，也不卷入该地方的纷争。但是，在对孙中山和广州政权的态度上，港英当局却持激烈的敌对态度。

香港当局之所以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如此仇视，余绳武、刘蜀永先生所主编的《20世纪的香港》曾做过具体深入的分析：香港与广东有着特殊的地缘与人缘关系，因此，广东在港英当局发展对华贸易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香港输往华南各地的货物绝大部分须经广东分发；另一方面，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土特产品也要经广东转运香港出口。港英当局为此控制了广东的水陆交通、铁路和能源等主要经济命脉。可以说，香港作为远东转口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除其自身的条件外，广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香港政府对于广东政局的变化格外关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抵粤，是对在粤拥有巨大权益的港英当局的威胁，当然也就不为他们所容。双方的矛盾很快尖锐化和公开化。

广州护法军政府重建后不久，英国政府便觉察到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存在矛盾。1921年3月，驻华公使艾斯敦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不好，他显然不赞成后者的过激计划，甚至拒绝支持因为南方海关问题而与列强交恶。给人总的印象是，孙中山、伍廷芳和唐绍仪不足挂齿，陈炯明在将来注定会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孙、陈不睦，英国外交部坚持其不卷入地方纷争的政策，采取观望态度。但是，香港当

局对此却如获至宝，大做文章。

在香港政府的授意下，时任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华商总会主席的刘铸伯提出了一项援助陈炯明的计划，主要内容是：由陈炯明在广东任命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资政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商人各5名组成，其中港商占3人。该委员会将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陈炯明募集资金，从财政上支持陈炯明，但前提条件是陈炯明必须与北京政府妥协，并和孙中山断绝一切联系。为使该计划获得实施，刘铸伯于3月26日专程前往广州，与陈炯明举行了会谈。（《刘铸伯致罗斯》，1921 年 3月30日，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C.O. 129/471. 第590页）

港督司徒拔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此事时说，他特别希望殖民地部同意这项计划，因为该“资政委员会”若能有香港的议员参加，将会给香港带来无穷的好处。英国殖民地部拒绝了司徒拔的建议，指出：“香港卷入广东政府内部事务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

此外，在广州，陈炯明自觉羽翼未丰，尚不敢公开与孙中山决裂，婉言回绝了刘铸伯的提议。（《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致驻华公使艾斯敦》，1921年3月30日，英国殖民地部档案 C. O. 129/471，第596 页）于是，这一从内部分化瓦解广州政权、成立“商人政府”的计划遂告夭折。

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向被帝国主义压抑摧残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因之进一步壮大。中国产业工人在 1913 年以前只有 60 多万人，到“五四”前夕，已达到 200 多万人。

中国工人阶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断进行着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斗争日益激烈。据统计，从1914 年到五四前夕，工人罢工有 108 次之多，其规模、参加的人数和斗争的激烈程度，都大大超过以前的罢工，形成了自发斗争的高涨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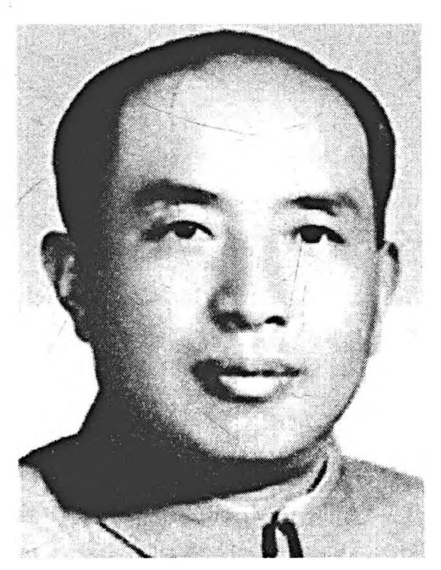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拖累，香港战后的经济受到一定的困扰，而战后的通货膨胀，百物腾贵，更使社会低层深受困扰。1920年4月，受生活所迫，香港华人机器会率先1920年4月，香港机器工人因工资太低，难以维持生活，又因外国资本家以营业衰减为借口辞退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资方增加工资40%，资方初时拒绝，遂使5000名工人愤而返回内地，坚持斗争25天，最终资方迫于无奈下，加薪32.5%，事件才得以解决。1921年6月14日，广州机工万余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这次罢工是与粤汉、广九铁路上的机工一致行动的，声势浩大。3 天后，铁路当局不得不同意增加工资25%到 50%。

香港是亚、非、欧的交通要冲，远东的转运中心。随着香港海运业的发展，海员人数也在迅速增加。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继续组织力量，发起讨袁运动。由于他经常乘船外出，四处奔走革命，与海员的接触自然很多。他十分了解海员们的生活遭遇，开始向海员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为自由而斗争。孙中山的话使海员

们深受启发。1913 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秘密召见了“满提高轮”上的西崽（服务生）陈炳生、赵植之等人，说明他们建立了海员组织“联义社”。

陈炳生，原名陈炳，字炳生，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镇陈屋村人（今属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据卢子正《香港海员罢工领导人陈炳生二三事》记载：“陈炳生世代为雇农，家境清贫，自幼失学，成年以后，仍认字不多，更不能执笔为文，但思维敏捷，长于应对，且体格魁梧，仪表堂堂，老年以后，上唇留有日本式胡子，颇像斯大林；中年时代，经历锻炼成为一名小团体的头头，每有集中发言，辄能使群众悦服。南头镇陈屋村人多数从事航海劳动，及乎晚年离船登陆，多在香港干诺道中一带，开设行船馆营生：所谓‘行船馆’，实质是中国海员的职业介绍所，因为行船馆老板，多与各国轮船公司有密切联系，凡公司辖下的轮船需用中国海员时，都委托行船馆介绍和担保，而中国海员有病或休假，多数住在行船馆为托足之所。陈炳生十多岁时，经过同村叔伯掖助，先在行船馆做小杂工，学习了不少航海知识，年龄稍长，乃到那些外国远洋船上正式做海员。”

这里顺便插上一句，省港大罢工领袖人物、中国工人运动先驱者和领导者之一陈郁，广东省宝安县南头陈屋村（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人。陈郁，原名陈旭贵，1901年11月11日出生，后改名为陈郁，年轻时做过各种杂工，还做过水手。1922年起开始从事工会工作，参加过海员大罢工，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省港大罢工领袖。


陈郁（1901—1974）

陈炳生等人在孙中山说明下建立的海员组织“联义社”，积极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帮助革命党人输运军火，另一个经常性的活动是演戏。募捐收集到的钱，一部分救济难友和家属，另一部分送给孙中山，支持国民革命。联义社发展很快，旧金山、香港很多船上都有它的组织成员。联义社总社设在“满提高轮”上，而它的海外交通部则设在香港。联义社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苏兆征、林伟民都是社里的骨干分子。

1914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准备“再次革命”。孙中山接受了失败教训，严密组织纪律，慎重发展党员，重视在下层革命群众中发展革命党人。海员陈炳生被孙中山委为“满提高轮”上联义社分部部长。陈炳生等又在“满提高轮”上成立了“海员公益社”。随着斗争的发展，“公益社”不断壮大，俄、日等国的轮船上也有了“公益社”的组织。1918 年，为适应发展形势，总社从“满提高轮”上迁到香港，并向香港政府的华民政务司注册，要求备案，成立正式的公开组织。但香港 政府不同意用“公益社”的名称，后改为“慈善会”。会址设在香港干诺

道。“慈善会”成立后，迅速扩大到各船，在各船上都建立了自己的支部。

1920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被推选为非常大总统。广州成为全国最开明、最进步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广东、香港海员中的积极分子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展活动，筹组工会。海员陈炳生、瞿汉奇、林伟民、苏兆征等人以“慈善会”的名义联合各种馆口的工人海员，积极宣传建立海员工会的必要性，经过各方面的反复协商，决定成立正式的海员工会。孙中山也热情赞助，并将工会命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总工会设在香港。


第16任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

当时的香港总督正好是英国工党的司徒拔。工党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为工人服务的，工党当然应该支持工人成立工会。所以当海员向英国政府申请正式注册立案时，司徒拔虽然借口香港没有成立工会的先例，但在海员们的强烈呼吁下，还是将报告送往伦敦。经过几个月的周折，伦敦批准了海员工会的成立。

1921年3月6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海员的第一个工人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大会选出了第一届海员工会领导人，陈炳生为总会会长，蔡文修为副会长，翟汉奇为司理（主管财务），罗贵生为司库，林伟民、邝达生为交际，冯永垣为调查，共设七个委员。海员工会成立后，立刻从替海员办交涉入手，树立自己的威望，显示了海员工会组织的力量。许多中国海员，无论是中国船上的，还是在外国船上工作的海员，都纷纷加入了“中华海员联合工业总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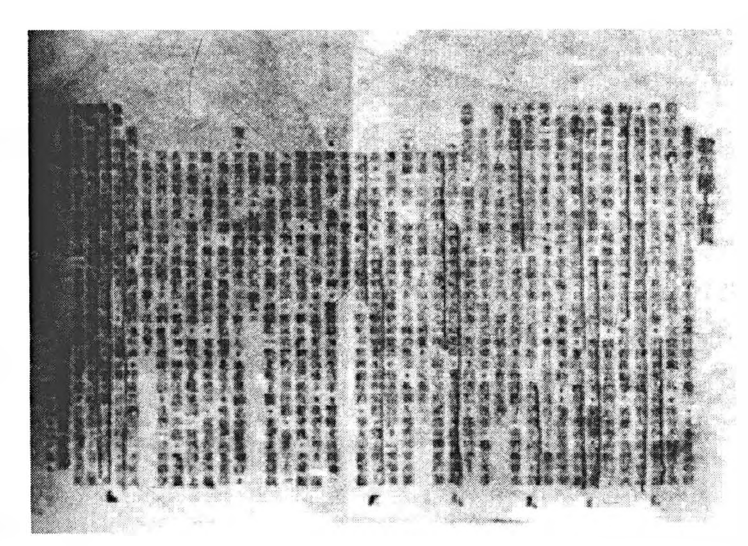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的香港社会，物价不断上涨，海员生活无法维持。他们迫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受到香港华人机器会罢功成功的鼓励，海员工会1921年 5 月讨论并通过了向船主提出增加工资要求的方案，并将这一决定通知海员，征求意见。6 月份，工会召集干事会和全体海员大 会，就有关增资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大家热烈拥护这一决定，并开始着手大罢工的各种准备工作。成立了“海员加薪维持团”“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等秘密机构，来促进罢工的实现与胜利。为使罢工能够坚持到底，工会还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准备安置罢工后回广州的海员。关于罢工的经费，工会也派人募集，并和外埠海员联络，请 求他们声援。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海员工会于1921年9月，正式向渣甸和太古一类的外资船务公司提出增加工资的三条要求：第一，增加工资，要求海员工资10元以下的加五成，10元至20元的加四成，20元至30元的加三成，30至40元的加两成，40元以上者加一成；第二，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第三，签订雇工合同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

这些条件向资本家提出后，他们置之不理。同年11月，海员工会再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他们仍然不予理睬。1922年1月12日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限令24小时内予以答复，否则香港海员将一致罢工。

资本家对海员的最后通牒仍未予理睬。他们认为海员工会没有什么实力，罢工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就在12日下午，在某轮船公司的“海康轮”上，苏兆征第一个拉响了罢工的笛声。这艘船原准备开往汕头，现在停开。接着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梧州等地的内河轮船，以及由外地开到香港的英、美、法、日、荷等国的海轮，船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参加了罢工。最早参加罢工的船有90多艘1500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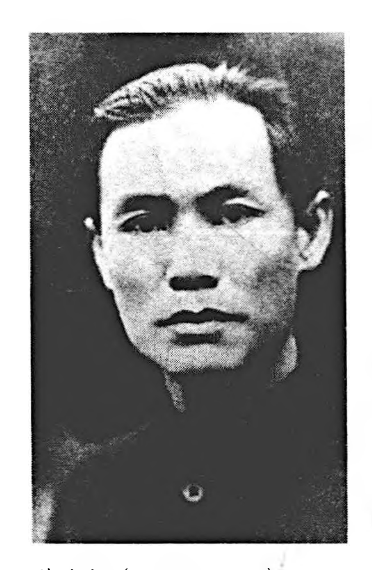
海员们的一致行动，使香港政府大出意料。当晚就派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前往海员工会谈判，企图阻止罢工。他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这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港政府，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搞罢工，难道就不怕饿肚皮吗？”工会负责人苏兆征告诉夏理德：“我们提要求已经3次了，每次都通知你。你为什么不早出来说话？要复工，除非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饿不饿肚皮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不必操心。”


告罢工海员书

1922年1月22日，上海《申报》发表《香港海员大罢工之罢工宣言及停工规则》，宣言说：

值诸潮流冲动，人心有团结之趋向，由斯社会结成同业，无秦越之歧视，本会顺潮流而崛起，联同业之感情，经营一载，成绩可观。实践工党主义，维持工人生计，幸福谋于公共，匹夫原属有责，凡我海员，孰非工人之一分子，理宜声应气求，互相友助，庶符我海员表表之人格也。回忆我们海员，离乡别井，搏于惊风骇浪之生命，胼手胝足，受重重痛苦之黑幕。近兹时代，百货腾贵，工值有限，仰事俯蓄，经济不敷。经同人大叙会提出要求加薪问题，而本会众表决，积极执行，曾函请各行船东第一、二次要求矣。因无表示答复，本会岂可自甘放弃，失却我中华海员工党之光荣誉，卑靡我数万海员之人格乎？义之所在力而行，百折不回，目的求达是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临场走马，岂肯停鞭。特于一月九日提出第三次要求，限期二十四点钟内完满答复。若其仍然见拒，此视我海员之人格何如耶？此

视我海员势力何如耶？噫，以今视昔，则非也，今日本会完全海员组织，有本会一日之名目，即海员一日之光荣，万一此次失败，固知本会之名目颓落，而数万海员之光荣尽丧矣！人生于世，生命居一，名誉其次。经济不足，生命何存？死之必矣。人格不保，名誉扫地，耻之甚矣。若夫以耻为荣，则虽生犹死也。是以我海员表表之人格顾名思义，痛痒相关。知耻近乎勇，力行近乎仁，此其时也。本会谨守文明秩序，固当文明解决。凡我海员遵守停工规则，万众一心，风虎云龙，获收效果，庶乎有期。



苏兆征（1885—1929）

为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颁布了《停工细则》十款，其中包括：罢工海员一律返回广州并向总会报告，食宿由广州总办事处负责解决；各海员不愿回广州者费用自备，等等。

罢工次日，粤籍海员纷纷搭乘火车回到广州，受到广州工人和工会的热情接待。广九铁路加派车卡载运罢工海员，广州工人冒雨列队到车站欢迎，并高举大书“欢迎海外海员归国”的旗帜，情绪热烈。罢工海员抵广州后即与广州工人一起游行。跟着，便安排好罢工海员的食宿，分驻十四个招待所，对外省海员如宁波籍海员则安排住城内各旅馆以示优待。

此时，香港海员的罢工继续发展，所有抵港的轮船，华籍海员一律罢工。罢工还逐渐蔓延到汕头、北海，琼州（海口）、江门等地，这些地方的海员先后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连上海的海员也卷进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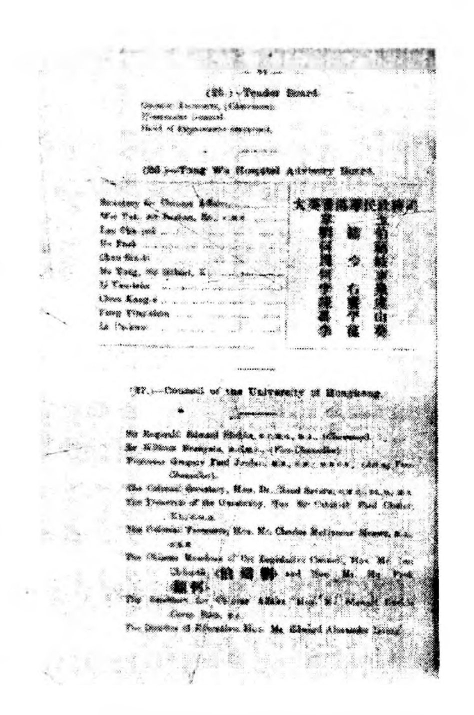
林伟民（1887—1927）

罢工还影响到新加坡、暹罗等港口。这时从香港开往各港口的轮船，一经靠岸。香港海员即纷纷上岸，实行罢工。甚至从欧美开往香港的轮船，船上的香港海员在航行途中听到罢工的消息，就纷纷做好罢工准备，因此，有些船东不敢按原计划把船开往香港，有些想途中撤换香港船员。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制止罢工的迅猛发展。

罢工不到一个星期，罢工海员人数已达6500人之多，香港政府开始恐慌起来。香港政府为此惊呼：“随着斗争的持续，种族因素日趋显著，该因素在整个事件的背后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港督司徒拔在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罢工形势时说：“形势有些严峻，因为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最终目的无疑是迫使英国人撤出香港”。因而从罢工开始香港政府便

试图采取高压手段，打压大罢工。

作为一个关心民瘼的香港大慈善家，刘铸伯同情罢工海员；作为一个买办商人，他又为香港即将沦为“死港”忧心忡忡。早在1919年，刘铸伯就在《社会主义平议》一书中探讨过欧美发达国家罢工事件。他说：“欧美各国，劳动家为资本家所压制，抑郁愁苦，几无复生人之乐，故恒与资本家冲突，屡发生联盟罢工之大风潮，平富不均之，由此可见矣。”他还进一步这样写道：


Tender Board.

Tung Wa Hospital Advisory Board.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刘铸伯当时的身份是香港华人事务司华人议员

> 往者西国大工厂，其劳动家对于资本家之冲突，往往生联盟罢工之大风潮，在劳动家所要求之条件，曰加增工值，减缩时间，而资本家则坚持其故态而与之抗，相持久之，而工值卒未当加也，时间未当减也，乃相持旬日，而劳动家之储资已罄矣，相持兼旬，而劳动家储资愈罄矣。
>
> 夫以联盟罢工之事，在劳动家既罄其储资，又失工值，故不能持久，而资本家每获取后之胜利，而劳动家受资本家之压制也如故……平心而论，以工厂之劳动家，终日疲精费神于尺寸之地，手不停处，足不移咫，加以煤气熏蒸，炭养充塞，呼清吸浊，易成疟疾，继不成疾，而其人又大都夭而不寿。
>
> 推之各种之劳动家，亦大率类是，而所得工值，又复至微，数口之家，恒不足以自赡，出则胼手而胝足，入则啼饥号寒者絮聒于其旁，处境至此，几无复生人之乐，毋亦仁人君子，所闻之而恻然心动者乎？故为体恤贫民起见，莫如由国家定为条例，凡一切工厂劳动，定为适宜之工值，及适宜之时间，而对于劳动者之身体及其健康，尤须加意保护。其工厂、工厂之取归国有者，则由政府委员直接执行，其未收归国有者，亦须一律遵守，庶劳动家与资本家两者不相为难……

这段文字，对工人的生存状况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为了消弭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冲突，刘铸伯甚至提议工厂与工场应该收归国有，由政府出面组织一委员会保障工人各项权益。这个建议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据陈炳生口述、卢子正笔录《中华海员工会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回忆》一文记载：“民国十一年春，一月十日上午十时，余签署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第三次加薪要求书，对资方做最后通牒。余签署后，急速化装。余向日衣西服，此时乃易长衣，戴小帽，架眼镜，秘密离会，避免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之留难。……余并布置密室

《申报》刊登的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与粤侨商业联合会来往电文

于康诺道某地，暂与外界不相往还，一切通信，均用暗号，尽量遮掩巡者耳目。一面电令广州方面负责人，克日完成招待工作任务——如车辆、食宿等。是时广九路规定广九往返车费照三等计，每次一元八角。后经海员会派员与铁路当局洽商，以一个月为限，凡海员乘车往返，每次按一元三角算，示优待也。既而各工人知海员会已发出第三次加薪要求书，情绪高涨，兴奋热烈，蓬勃之气，非笔墨所能形容万一。行驶省港、澳各轮船工友，不待海员会十一日十时罢工命令之发表，于十日下午七时许，争先恐后，相率离船。”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加薪要求书，曾经送递香港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处，为此，他曾召集船东商讨加薪事宜，各船东答应海员及时复工可按原薪增加一成五。据陈炳生口述、卢子正笔录《中华海员工会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回忆》一文记载：

> （1月）13日，香港绅士刘铸伯，以私人资格，劝海员即日复工，将来由刘负责要求各轮船公司按原薪增加一成五。唯海员会要求资方提供保证，刘铸伯无法答复。后有传言，刘铸伯为工人吓死者。此反动分子之谰言也。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刘铸伯最早主动出面调解罢工文字记载。刘铸伯以私人身份参与调解，那是因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会长陈炳生是宝安南头人，刘铸伯则是宝安平湖人，两人有同乡之谊。

香港海员大罢工直接威胁了中西方船东的利益，造成了恐慌。刘铸伯以私人身份出面调停，初见成效，华人各航业公司代表恳请刘铸伯担任调停人。据《申报》1922年2月1日《香港海员大罢工再记》一文说：“据云本年1月13日午后，华人各航业公司，派出代表7人，往华民政务司署，请托华商总会为公证调停人，西人船务公司，则主张并请港政府派高级官员为公证调停人，海员工会亦赞成此议，于是工会方面有16日复职之通告。”

但是，到了次日，罢工工人复业一事又变成泡影。刘铸伯等再次出面调停，苦心劝解。据上引《香港海员大罢工再记》一文记载：“迨14日午后，该工会方面，以华民政务司，虽布告劝谕工人复业，愿工会与东主方面协商加工（薪），究属几许，尚未明白答复，所谓复职之议，遂即打消，至是日东西两家会议情形，系由华民政务司夏氏饬侦探糜北松，到海员工会，传翟汉奇、陈祥两办事员，及刘铸伯、周寿臣与华人航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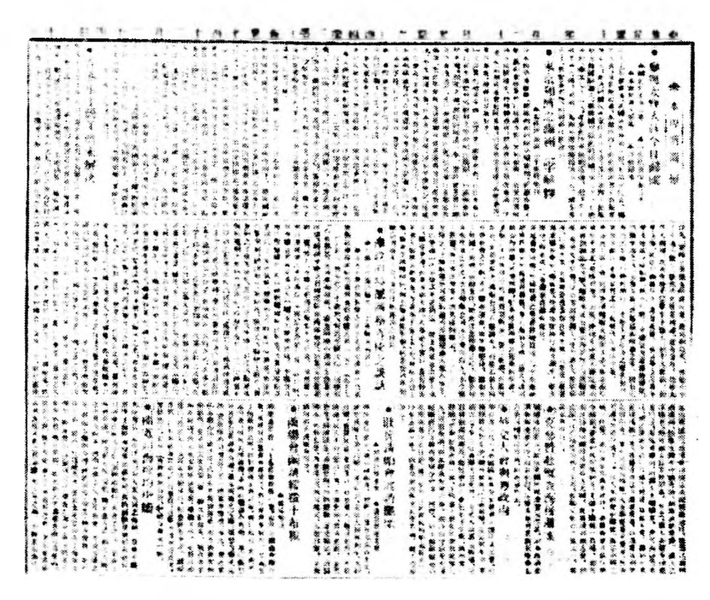
二十七家公司代表周少岐、周雨亭，到署共同讨论。夏氏先将报馆所派之传单，及该工会宣布复职之原文，同翟、陈两办事员，此事是否当真。答称是，并谓因始初司宪云东家已肯加工（薪），华商总会又肯为公证人，所以本会即分发传单，劝工人开工，但省城工人，咸谓东家方面虽应允，但未言明所加几何，似无诚意，故咸不肯回港云云。”

在这次调停中，刘铸伯劝工人宜立刻开工，并说：“凡事要彼此让一步，今既有华商总会及我华人绅士肯出任调停，若先行开工，如有彼此未协之处，尽可商托。”但为翟汉奇、陈祥拒绝。这次调停毫无结果。

1月15日，民政务司夏理德第二次亲到海员工会，要求海员工会派出代表随同返署与船东代表磋商，海员工会推陈观民、蔡军保、邝达生、林伟民四人为代表前往磋商。由于船东代表坚持要工人先开工，含糊表示“薪金应加者由元月一号起计”，海员工人代表坚持资方须声明愿加若干成方有磋商余地，这次谈判同样毫无结果。

罢工开始后，香港政府感到事态的严峻性，他们不是采取有效的疏导办法，而是关闭了谈判之门。1月16日，在香港的中西船东开会，决定对工人采强硬态度，不再与工人磋商，目前应允之增薪条款，亦一律取消，香港当局宣布在省港轮船码头戒严，并宣布非有凭照，不得自由出入香港。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限制海员的活动，阻止他们离开香港，就可以制止罢工。

孰料此举只是激发了矛盾，海员根本不予理睬，罢工的意志更加坚决。眼看这一招不灵验，为了缓和罢工工人的情绪，香港政府以华民政务司的名义，于1月17日发出一份《通告》，声称轮船老板已答应了罢工工人的增资要求，所有罢工人员于1月17日中午回港复工。为此，华民政务司出面再次邀请刘铸伯任调解人。



《申报》刊登的《香港水手罢工尚未解决》通讯

刘铸伯在香港华人圈卓有威望，同时与香港政府关系密切。在港英政府看来，他是最理想的调解人。应华民政务司之请，刘铸伯、周寿臣出面斡旋复工事宜。陈炳生是宝安南头人，刘铸伯是宝安平湖人，周寿臣虽然出生香港、留学美国，填写籍贯时一直写的是新安（宝安）县。三人相见，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兼之香港政府已经以官方身份发出复工加薪通告，经过一番磋商，陈炳生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名义，发出复工通知，命令罢工工人于1月17日回港复工。

但是，苏兆征、林伟民收到陈炳生的复工通知，立即派人调查并致电各报社，公开说明："经同人等严密调查，如知全非事实，显系二三办事人所为。事非公决，势难承认。同人态度已定，宗旨已决，加薪条件，一日未有保证之签字，则一日未便开工。"苏兆征还致电夏理德郑重声明："增加工资未签字之前，决不开工。" 由于苏兆征等人的坚决斗争，使罢工不但坚持下来，而且还日益扩大。

海员罢工使香港市内物价飞涨，仅几天的工夫，米价就从1角3分涨到3角2分。市内生活秩序大乱，洋人资本家、华人大老板叫苦连天。1月19日，香港当局派出"金山"和"香山"号两艘轮船，由英国水兵开到广州，购运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由于广州各阶层人民抵制，不为接驳搬运，结果两轮一无所获，空船回港。

海员在罢工中逐渐认识到，要想取得最后胜利还得团结更多的工人兄弟，同情并支持罢工。于是他们又与香港的运输工人、码头工人、运煤炭的工人、仓库搬运工人联合，于1月27日，举行了同情罢工，使罢工总人数达到3万以上。其中海员1万多人，罢工的轮船 160 多艘。香港这个世界级的贸易大港濒于绝境。

海员大罢工爆发后，香港各大小工会纷纷加入，罢工人数很快就上升至12万人，而且数以万计的工人更相约返回内地，使香港上百只轮船滞留，各行各业渐渐陷于停顿，甚至港督府也只余2名华籍佣工，亦使后来韦尔斯亲王在4月访港的行程安排遭到打乱。

海员罢工潮一发不可止，香港政府惊恐万分。他们感到不安的主要原因是，相信广州政府和国民党卷入了这场运动。港督司徒拔在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罢工的形势时指出："形势蠢些严峻，因为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此次罢工的幕后组织者。广州政府已完全处于这一具有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组织的控制下。毫无疑问，极端主义者站在孙的一边。"在另外一份报告中，司徒拔进一步指出广州政府和国民党参与罢工对香港可能造成的危险，他强调道："我们必须认识到，整个事件完全是政治性的，其最终目的无疑是迫使英国人撤出香港。"

2月1日，香港政府决定镇压罢工，出动50多名武装警察，以"危及本港治安与秩序"为由，宣布"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为"不法会社"，并立即予以查封。他们摘掉工会招牌，逮捕工会办事人员，抢走工会的家具，还用大炮对准了海员工会。但是，香港当局的这一高压政策，并没有使罢工海员们屈服，反而激起了香港各业工人和各界人士对海员的同情。2 月中旬，香港各工会派出七个代表，前来广州和苏兆征、林伟民商量决定，发动全港工人大罢工，以示支持。

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得到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2月9日，广东支部拟定并在海员中散发了一份宣言书。2月28日，《申报》发表27日香港电讯稿《共产会（党）广州支部向罢工海员发一宣言书》，大意如下：

> 吾辈争生存而罢工，凡正谊和平之人而非资本家或官僚派者，咸表同情。吾辈为人人争求有意思有兴味之生活，不愿受少数人视同奴隶牛马之待遇。故吾辈对资

本家宣战，而发起阶级战争，此种伟大豪迈之行为，已增吾辈之光荣，终必获胜。资本家依目前生产制度，吸劳动者之膏血，脑满肠肥，故斤斤保持阶级之差异，但适自掘其墓耳。世界各处工党勃兴，收回利权，决非资本家所能践蹈以死。吾海员要求正当，决不失败。但吾辈不可稍懈，资本家伎俩颇多，间谍四布，虚伪宣传，使人迷惑，吾辈须牢记下述四点：

1. 坚持到底。吾辈提交船主之最近条件，以接近社会个人生活之需要比较之，可谓低于极度。吾辈不可因压力或引诱而退让一寸。无论调处者为人，吾辈不达目的必不轻诺。

2. 固结团体。外人常耻笑吾华人无持久性质，无团结能力。谚有之曰：“众擎易举”，劳动家可致胜资本家之有力点，在人数之众多，但若不行动如一，则资本家不难破坏我团体。

3. 严守秩序。吾辈仇敌为资本家，吾辈当慎重勿得罪助我之人。吾辈言行，不可逾出范围。吾辈必恪遵文明方法，吁求友助，共御吾敌。

4. 注重自治。吾辈在广州不下数千人，对于同情者所表示之扶助与善意，深为感激。但吾辈须知敌人间谍巧于诬蔑，假冒海员，故意为非，以期减弱吾辈之粘力。故吾辈虽对于极细微事，亦当慎重顾虑，否则将予人以口实，讥吾辈程度不高，吾辈须时常自省，我所为者是否有可引起不美满批评之处。

吾辈知资本家现正作最后呼吸，然灯将熄时必有回光，吾辈当倍发精力，慎加预备，以防其最后之打击。本会以为阶级战争现已开始，而海员此举实开其端，竭我全力为其后援，本会之责也。奋起奋起，注视我旗帜以斗，吾引领以盼汝辈之荣誉凯旋。

《申报》1922年2月28日发表的《共产会（党）广州支部向罢工海员发一宣言书》

这份宣言书还有一个白话本，收入各种历史文献。我们在这里节录白话本结尾一段，可以比较鉴定："我们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我们应该抖擞精神，完成我们的这一次伟大举动。我们晓得，资本家已到运命的末日了！但是，也要晓得将熄的灯火，他有回光返照的幻象，我们更是应该鼓起百倍的勇气，防备他回光返照样的一大打击。本党以海员同志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海员同志们啦！快快共同一致地望着我们的目标奋斗，以期得到我们的最大光荣最大胜利啊！"

除了发表宣言，中共广东支部的约三十名成员与即将成立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关负责人主动参与宣传工作，竭尽所能为罢工提供帮助。在陈独秀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他们发表演讲支持罢工，为罢工海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共广东支部的机关报《广东群报》以及青年团主办的《青年周刊》大量报道罢工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于3月中旬正式成立之前，他们就创办了《青年周刊》，组织了演讲队、青年剧团等开展多种活动，支持海员大罢工。

第四节　调停罢工风潮（下）



海员大罢工期间的香港码头

海员罢工前后，正值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处于鼎盛时期。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广州政府对这场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劳工运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海员罢工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整军筹划北伐。他得悉罢工的消息后，急电令国民党员马超俊"迅速赴港慰问，并予就地调处"。马氏接到命令后，星夜到港，亲切慰问罢工海员，"海员得悉国父的关切，更为感奋"。

香港海员和运输工人的罢工，固然使轮船资本家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如中国邮船公司属下之"中国"号轮船，因罢工滞留香港一月，据称

"每日至少损失三千元，即此一轮已蒙九万金之损失"；"南洋班、沪港班等停留港埠之船达百余号，统计损失当在百万元以上"。至于间接损失，如因无人卸货、积压霉烂货物，向货主赔偿损失，香港不能卸货转运至上海或其他港口，将货物困积船上或码头等处，这些损失都无法统计。

罢工风潮也使香港的商业资本家在经济上受到影响，广州、上海等地资本家同样受到牵连，因此，他们都纷纷吁请港英当局同罢工工人进行谈判，要求刘铸伯出面调停罢工。

1月21日，上海《申报》刊文《香港水手罢工尚未解决》，文内有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因海员罢工事宜与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往来电报两份：

香港东华医院华商总会刘铸伯先生鉴：

轮船水夫要求加薪罢工，运输停顿，商务大受影响，望公等出作调人，双方让步，俾早解决，以安各业。

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叩（啸电）

刘铸伯的复电是："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鉴：啸电悉，现港地官绅已极力调度，双方坚持，仍未就范。香港华商总会复（效电）。"

1922年2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还刊登了广州总商会致函香港华商总会主席刘铸伯电文：

海员罢工，凡与港沪来往各行号及办出入口货物者，均蒙影响，商务因而停滞，物价由是奇昂，牵动各方，感受损失。各行商异常优虑……就近双方调停，望早日解决，以利交通而维商务……

海员罢工刚刚开始，刘铸伯就以私人身份出面调解；此后，罢工潮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广州、上海粤籍各商业联合会的吁求，刘铸伯复电"港地官绅已极力调度"。

出面调解的香港官绅，刘铸伯之外，尚有周寿臣爵士、何东爵士、罗旭龢、罗文锦、曹善允、何福、何甘棠等太平绅士或香港上流社会华人。其中，周寿臣爵士肄业于中央书院，是容闳的留美幼童之一，1881年任多处海关税务，1903年任天津招商局总办、京奉铁路总办及清外交部大臣，官至二品。1905年7月，任唐山路矿学堂（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总办（校长）。辛亥革命后退隐，任多间中外商号之董事。周寿臣为香港殖民地时期第一名华人议政局成员，作为政府及民间华人的沟通桥梁。另外，周寿臣亦热心公益，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以香港人治香港"，是港英政府的一贯策略。海员罢工期间，港英政府同样吁请卓有声望的香港华人绅商领袖与社团出面"摆平"。15日，香港东华医院、保良局、华商总会、华工总会、工团总会等代表与香港海员代表苏兆征、翟汉奇、陆常吉、卢俊民

等进行谈判。但是，会谈陷入僵局。有本1979年出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小册子说："在会上，各调停代表均替香港当局讲话，对海员代表又骗又压，软硬兼施，但代表不为所动，义正词严地与之进行说理斗争，谈判毫无结果。"据《申报》1922年2月22日刊登《港海员工潮调停渐接近》记载：

> 香港消息云：十五日正午，东华医院再与调人开第二次叙会时，议至半途，忽华民政务司署有电话到院，请主席卢颂举到署，无何第二次电话再到，请海员与调人代表一律赴华民政务司署。遂由华绅刘铸伯、周寿臣两君，在政务司前，将督宪意旨四条对海员代表宣布，并命海员代表返省，布告大众，速行复职，则督宪可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十字恢复，加薪条件，交由公正人判断云云。
>
> 海员代表翟汉奇即于十五号晚搭尾车上省，余三代表亦于十六号早返省。又开全体紧急会议，仍假座广西会馆为会议地点。唯因该会长陈炳生，因杀妻案被捕，故先改选会长，然后开会。众推苏兆征为会长，所遗代表一职（苏为四代表之一）；则举林伟文继任。旋由苏兆征为主席，宣布香港政府开列四条办法，咨询大众。众意仍注重工会一事。工会问题解决，则一面与船东磋商条件，一面开工，则风潮不难解决云云。谈毕，除以公文答复外，并请各代表再行赴港磋商。故昨日（十七）下午，海员代表翟汉奇、林伟民、卢俊文三君，再搭车到港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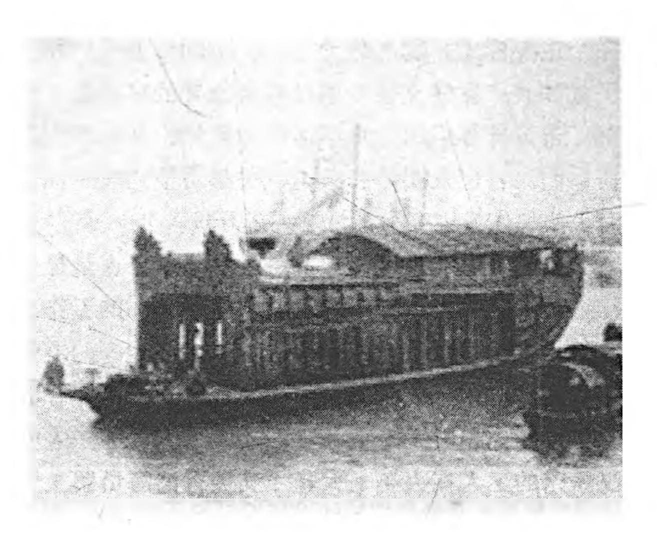
由东华医院主席卢颂举出面召集的这次调解叙会，收效几乎等于零。最后，民政务司署请海员代表与调解人刘铸伯、周寿臣赴华民政务司署，由太平绅士刘铸伯、周寿臣在政务司夏德理面前，对海员代表宣读并解释香港总督有关取消封禁工会等四条意见：

> 1. 海员工会之被封闭，全因工会溢出正常范围，违反香港规例，而并非因其要求增加工资。
>
> 2. 香港总督认为，要证明海员工会确实没有违反规例，政府才能改变现时之态度。
>
> 3. 如欲证明海员工会确无违反规例，各海员及参加罢工的各行工人一律回港复工，使香港恢复原状，方能作非犯法之证据。
>
> 4. 如工人愿依照船东所许之三条件，先行回船复工，船东答应可按照允许的条件加薪，至于今后或加或减，再交公证人判决。

香港当局声称，要工人按照这些条件先复工，港督才会宣布取消封禁工会之令。对此，海员代表当即拒绝。香港当局一再要求他们把这些条件带回广州，交大家考虑。代表郑重声明，带回公文可以，但这样决不等于接受了公文上的任何条件。同日，海员代表返回广州。

在这几次谈判中，以苏兆征为首的海员代表，机智应付，不屈不挠，表现了中国工

人阶级“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斗争精神。2月16日，海员代表根本没理会请示港督的事，就撤回广州。正在这时，中华海员联合总会会长陈炳生因包养情妇，用手枪打死了前来广州的发妻龙氏，触犯了刑法，被逮捕关押。罢工海员便一致推举苏兆征为代理会长，谈判代表一职由林伟民继任。罢工仍然坚持进行，且规模越来越大。



罢工海员住的珠江紫洞艇

海员罢工初期，广州政府支持和协助香港海员工会，在安置罢工后返穗的香港劳工和提供给养上做了大量工作，“广州党政当局星夜办公，党方派出马超俊，政方派出古应芬，经常与加薪维持团切取联系，设法关照”。除了在组织协调上给予支持，广州政府更在经济上鼎力相助。据邓中夏记载，为了解决罢工经费拮据问题，广州政府每月借出数千元，前后计约10万元。另据马超俊的记载，当时广州政府政务厅长古应芬、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邓铿、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同情海员罢工，先后为之设法筹拨公币50多万元。广州政府的支持是罢工最后取得胜利的保证。

罢工海员生活虽然很艰苦，缺衣少食，但他们坚持罢工的意志没有动摇。大家相互鼓励着：“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这是一句在罢工工人中广为流传的广东话，意即坚持到底，别被他人看轻。为了活跃生活，他们组织宣传队上街表演；还修球场，开展体育活动；组织义务劳动，在观音山（越秀山）旁修筑了一条马路，并定名为“海员罢工路”，以资纪念。后来这条马路路名被国民党取消。

早在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

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1922年是中国职工运动高涨的一年。1922年初，香港海员罢工是那时职工运动发展的



张国焘（1897—1979）《我的回忆》书影

一个主要标志。罢工后，不少海员陆续返回广州，表示不愿屈服的意向；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援。国民党所领导的广东总工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等组织，热烈地招待他们，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广东省政府也在经济上支援他们。各民众团体和舆论机关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大为高涨，同时也使那位过境客马林为之兴奋万状。”

张国焘继续写道：“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是最先表示支持海员罢工的，它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更为支持罢工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原来中国的海员中主要有广东、宁波两帮，这次罢工多系广东籍的海员。在上海的书记部总部就在宁波帮海员中展开活动，要他们与广东帮的海员采取一致行动。结果，香港各轮船公司在上海征募新海员去代替罢工者的计划归于失败。我们还在全国各地工人中募集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在火车上大张‘支援香港海员罢工’的旗帜，极具宣传效果；各地工会纷纷函电汇款慰问罢工海员，声势显得相当浩大。这些情形不但使罢工的海员感到兴奋，并且促成了全国工人团结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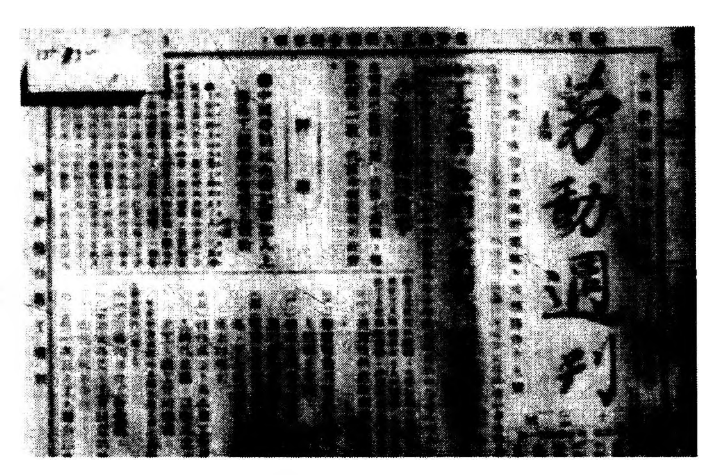

李启汉（1898—1927）

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后，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自始至终予以关注，李启汉等在上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阻止香港英国轮船公司在上海等地招募新工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发动各地工人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斗争。北方铁路工人、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等铁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他们开大会、发电报、捐款支持海员斗争。京汉铁路的火车头上挂着“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到武汉。这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是破天荒的英勇行动。中共广东支部也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书（见本章第三节），在斗争策略上予以正确指导。国外华侨捐款也不少。各国工会也纷纷致电声援。广州的“俄华通讯社”每天向全世界报道海员罢工的消息。

而在广州方面，英国驻穗副领事及斯华德、万乐斯约互助社总理谢英伯（曾任教于广州育才书社）与海员代表苏兆征、冯永垣、严翼等磋商，要求海员工会着海员先行开工，并声称，如海员仍不开工，“则欧洲太平洋各船东唯有转雇别人行驶”等。经磋商，议定由广东省政府、港政府、西人船东、华人船东、海员代表、英驻省领事共同会商，此议由副领事再请示港督。1922年3月2日，《申报》刊出《无法调停之港海工潮》：

自礼拜六（二十日）午东华医院调人叙会后，在华民政务司署订定三条件：（一）各船务公司允愿将来交公正人议决之工金，则以其前所答应之工价为至低之价目；（二）开复海员会，照督宪二月十五号之命令办理；（三）至于委任公正人，如船东与船员彼此允愿欲照何法荐举，则由宪酌量办理。此项条件骤观之，似有转圜余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劳动周刊》

不意事有出人意外者，昨日上午驻港海员代表翟汉奇、林伟民、卢俊文等又接到省城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会长苏兆征来电一通。电文略云先要香港政府完全规复工会，一面再妥定所加之薪金，务得船员满意，然后肯开工，如以上条件不能达到目的，则无磋商之必要，各代表可立刻返省云云。各代表昨偕局绅刘铸伯、周寿臣及东华医院首总理卢颂举、华商总会代表罗旭龢往见华民政务司夏理德。是日由刘铸伯为两方面通传言语，华民政务司对海员代表云，海员如要恢复原日所有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须要证明工人并无法外之举动，如欲证明无法外举动，则当从速复职，政府方得将会名恢复，取消从前之封禁命令。至于薪金问题，即以船东首次提出所还之价格为底。船员一方面亦以其所肯减些少之让步价格为底，两方面既有一划定底价，则由公正人出而判决，有加无减。从前督宪有或加或减四字，今只有加无减，工人方面可满意矣。海员代表并无实在答应，只云须返省再征求全体海员同意，彼三个人不能毅然应允云云。

海员四代表遂于二十一日携港中华民政务司所订之三条件回省复命，海员同人即于二十二日假座广西会馆开紧急同人全体大会议。首由翟代表汉奇报告赴港磋商经过情形，并将港政府所订之三条件宣布后，全体一致反对。续由主席苏兆征读汕头海员来电云：敝同人罢工共一千二百余人，今蒙二十七工团维持援助，港中交涉情形忻即示教云云。并由某行商代表辛某述该行之宗旨及办法，咨询众意。林伟民主张订立合同，仍请该代表回汕头磋商，以谋永久对待方法。继由机器工团黄焕庭演说，勉励海员坚持并提出答复港政府三条件，请海员同人商榷：（一）先须港政府恢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原状，其余条件可由各界代表及港政府为公正人调停解决；（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所认各界举出之代表及港政府均为公正调停人毋须官厅委任。（三）本会四代表携回港政府之三条件，认为无诚意，须再有切实解决办法。又由谢英伯演说勉励工人忍耐此五分钟以求解决，成败在此一举，若果

坚持必可达目的云云。

主席苏兆征复谓：今日四代表再赴香港交涉，其消息如何，当即开会解决，各同人切不可误听谣言前往开工，以碍团体之进行云云。遂散会。四代表亦即于是日为第三次赴港磋商。

在海员大罢工过程中，刘铸伯等太平绅士、华人绅商、华人社团出面的所有调停努力，最后都归于零；香港政府与海员工会的谈判，也最后破裂。

调停破裂以后，为了摆脱困境，香港当局决定到上海等地招募新工人顶替罢工海员，又派人到非律宾、印度等处招集新工，企图破坏罢工。香港宝泰公司发电，要上海包工头桂阿茂帮助在上海招募新工人，火速来港，以救危机。对资本家的这一手，海员工会早已料到，他们在罢工同时，就向上海中共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工会发去电报，通知他们香港“海员全体已罢工，请同乡切勿受雇，破坏团结”。香港海员又电请劳动组合书记部，设法阻止新工人到港。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此消息后，便纠合宁波海员公所阻止招募新工行动，李启汉因此被捕入狱。但从上海招得来的几百人新工，经过汕头时被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了一大半，一小半到了香港。有几只船是给新工开走了，但技术不好，在海上发生了危险。在非律宾印度招募得来的新工，情形大致相仿。

海员工会除通电各处工人团体请求制止招募新工外，并派“防护破坏罢工队”暗杀招募新工者，在香港刺杀招工头梁玉堂，造成极大的恐慌。因此香港政府这一招又告失败。

与此同时，罢工海员加紧封锁香港，扩大纠察队的组织，分派到各海口去，禁止粮食运往香港，到处受农民工人的帮助，甚至小商人和“三合会”成员也起来帮助了，此时真是一茎菜、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香港粮食更行恐慌。从此双方对峙的局面更加严重。

2月27日，总同盟罢工即将爆发，香港当局悍然宣布总戒严令，将停泊在中国各口岸的英军舰调集香港，禁止火车通行，加岗巡查街道，宣布离港者要店铺担保，香港变成战时状态。这时，传说纷纭，居民十分恐慌，可是，香港工人罢工的决心已下，他们在月底领得工钱以后，便立即罢工，所有邮电、银行、酒店、茶居、菜市场、饼干店、面包店的工人，连同受雇于私人家庭的仆役、厨师、轿夫、园丁都加入罢工行列，罢工浪潮席卷整个香港。

到3月初，罢工人数已超过10万。香港市内交通断绝，生产停顿，商店、饭店、旅店关门，市面冷清，香港顿时变成了死港。顽固的香港政府，还想以武力压服中国工人。因香港政府已发布轮船禁运、火车停驶的命令，林伟民和苏兆征决定组织工人步行回广州。

3月4日清晨，数千名罢工工人从九龙油麻地出发，准备步行回广州。他们不顾军警阻拦，坚持前进。当队伍行至沙田地方时，遭到大批军警拦阻，双方发生冲突，这批武

装军警竟向工人开枪，当场打死4人，伤数百人，后又有重伤致死2人，一手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沙田惨案”。

沙田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大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声讨港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誓死与之对抗到底。中华海员罢工工团联合办事处代表苏兆征、严日生一面发出通电，向国内外各界人士揭露事件的真相；一面督促广东省政府向香港当局交涉，提出严重抗议。电文如下：

> 为破坏公法，乱枪伤人，恳求交涉维持，以重民命事。香港政府对于华人罢工之要求，不加体恤，近更颁行苛例，禁止火车载运华人出口。查香港为交通口岸，向准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乃本月一（四）日有各工会会员，因在港觅食维艰，徒步回省，行至上水车站左近，突有英兵聚山顶放枪击下，一连数百响，当场击伤梁全英等八人，身死者四人。凶横若此，民不聊生！为此恳求提出抗议，向英领使严重交涉，以重民命，而敦国交，实为法便。谨呈广东省长公署均鉴。

3月4日，在广东政府的支持下，海员代表与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的香港当局举行谈判，陈炯明还派出了特派员陆敬科为代表参加谈判。谈判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讨论解决海员与船主有关系的各项条件，经双方签字后，第二步再讨论解决海员工会与香港政府有关系之各项条件。到3月5日，谈判基本结束，双方达成了协议，订定了条约，并由海员代表发出准备复工的传单。双方签订的条约签字的有香港船东委员会代表包特伦，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詹米生，广州交涉司署秘书陆敬科，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表翟汉奇、林伟民、陆常吉、卢俊文，由何东爵士担保。

至此，罢工斗争以海员的最后胜利而告终。3月5日下午，林伟民等4人以谈判代表的名义散发传单说：“本会同人代表连日来在大会堂与中西船东磋商一切，本日已将各条件谈妥，双方署名为据，凡我同仁，预备复工为盼。”

3月6日，香港当局发表《特别公告》，宣布取消查封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命令。下午3点半钟，香港政府派人将招牌送回。数百名海员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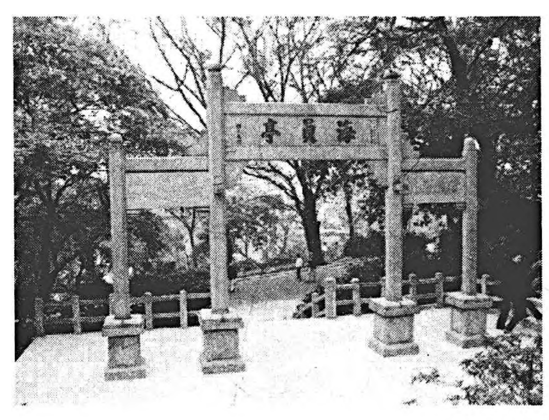
香港海员与市民欢庆罢工胜利

会打扫得干干净净，会所内外张灯结彩。海员们手举彩旗，迎候招牌归来。

香港政府委派全港教会地位最高的洋牧师会督，亲自将招牌挂回原处。当会督恭恭敬敬地将招牌挂起时，数万名罢工海员及香港工人欣喜若狂，他们振臂高呼“工人万岁”“海员工会万岁”，参加庆祝的人不下10万，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全港，其欢腾热烈的气氛比过年还热闹。

3月7日，香港工人和各界人民又以海员公会旗帜为前导，举行游行活动，他们情绪高昂，扬眉吐气，表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没有的民族自豪精神。3月8日，工会通知海员正式复工。至此，从1月12至3月8日，坚持斗争56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地落下帷幕。3月8日，广州10万群众举行欢送海员复工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人们高呼“欢送海员复工”“劳工神圣”“工会万岁”的口号。

这场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它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一次重大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运第一次高潮的起点。位于越秀山小蟠龙岗上的海员亭牌坊，是纪念香港海员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摆脱包工制而斗争的一场大罢工的历史功勋，而建造的一座重檐八角尖顶亭。





海员亭

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早已写进了辉煌的史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8月北京第1版）这样写道：“在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前后，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 年 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香港海员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它开始于香港，波及于长江，前后约经四个月。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他们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克服港英当局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将罢工坚持了五十六天，使香港的海上航运、市内交通和生产事业全部陷入瘫痪，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邓中夏语）。这次罢工由于它的反帝性质，得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成员合影

也对长江海员罢工给予援助。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但是，罢工胜利后也暴露出一些大的弊端，那就是领导层的贪污腐败。譬如，参加过海员大罢工的冯永垣在《苏兆征二三事》中写道：“当时翟汉奇任司理管账目，陈炳生打死老婆被捕后不能回港，遂挟款至上海开办馆。翟汉奇贪污舞弊，不肯交数。下届大选期近，苏兆征催翟回港交数。当时在紫洞艇上发生冲突，苏要翟回港交数，翟说：你是罢工期选出的临时会长，我是香港正式选出的司理，要交数不能由你个人，要由干事会；要交数就只有香港华民交数。最后双方打成一团，后双方侦缉拔枪，翟跳水逃跑。以后，翟回港，追他交数他交不出，就被赶下台。罢工胜利后，陈炳生挟款去上海，翟汉奇挟款又不肯交数，航海工会（黄色的内河工会）造谣破坏说：罢工赔偿费约有三十万元，被委员分掉。而银行当时又不肯将罢工赔偿款交给我们罢工代表，推说要工人各人自己去领。而‘洗马沙’（粤语‘包工头’）又恐吓工人，工人又不敢去领，于是造成当时工会经济非常拮据。”

陈炳生因为杀妻被拘禁看押，后由孙中山特赦。1922年12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西报载孙总统最近谈话》一文，他在回答约翰·白莱斯福特提问“君之特赦犯杀

妻罪之陈炳生，尤受人指摘，即君之友人亦有不以为然者”时说：“余之友人当知特赦问题之由来，实经当然之轨道。余为总统，有特赦之权。该案经省当局详细考查，据云陈妻犯奸，故陈杀之。为此杀妻，依中国旧习，实不认为刑事罪名。而余所接之公牍中请余特赦，省当局及伍廷芳博士均赞成此议，余遂执行余之特权而赦之，不料乃大遭反对也。”

海员大罢工期间，广州、上海、香港报纸对陈炳生杀妻案多有报道，略谓：携带姘头住西堤粤华酒店，妻子龙氏闻讯前来问个究竟，陈炳生以偕妻游白云山为由，在偏僻处朝龙氏连开数枪。龙氏大难不死，次日被人救起，送往医院，毙命前供出是亲夫所为。

但是，陈炳生被特赦后，似乎感到自己戴顶“绿帽子”上街不舒服。若干年后，他请同事卢子正捉刀写了篇《中华海员工会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回忆》，其中特别交代自己“因公杀妻及特赦经过”——

> 余以领导罢工运动工作甚忙，每日上午七时至下午八时半，在极度紧张之空气中工作，余办公地点，在天字码头湾泊之紫洞艇，休息睡眠则在西堤粤华酒店。余个人出入，全无保护。自信为大众谋福利，正直无私，光明磊落，必无旁人暗算。然事竟有为余所不及料者！
>
> 余妻龙氏，女子协进会中坚分子也。当罢工进行，正在紧急状态中。余忽接密报，谓余妻勾结香港工人汉奸，日内将来省不利于余。无何，龙氏果来省，且侦知其欲放毒杀余。
>
> 时，余三十四岁，血气方刚，只知有工人群众，绝不虑及家庭。余暗思应付之策，计唯置龙氏于死地，别无他法。意既决，余诱龙氏游白云山，在山上僻处将其枪毙。事后被司法当局侦悉，捕余入狱，判余以杀妻罪。幸承孙大总统特赦，否则余已非世人矣，抚今追昔，能不怆然！
>
> 当总统特赦余时，尚有一部分人士不满，指责总统不应特赦杀妻罪犯。然总统解释谓“陈妻犯奸，故陈杀之。依中国旧习，实不认为刑事罪名”云云，盖总统当时因环境而立言，余妻非真犯奸也。是时海员罢工一了，各国人士多误会为孙博士所命，今余因龙氏破坏罢工运动而杀之，余既犯罪矣，总统又特赦之，谓非有所命，其谁能信？用是，总统引中国旧习而下令特赦，以示无政治背景存焉！
>
> ……
>
> 于此，又有一事可资补述。先是，在港负责秘密情报之同志来省报告，谓资方组织暗杀团，即日派人到广州行刺陈炳生及谢英伯等语。各同志以情势严迫，纷论卫余之策。其中谢良牧同志请余至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支部（部址设长堤中国银行侧）暂住。余以会务诸待亲理，却之。办事处乃指定员两名，便装随余出入（无手枪携带）。余则怀手枪以自卫。某日晚八时许。余自办事处返粤华酒店休息。余之卧室在二楼。十一时左右，广州地方法院，以余杀妻事，密派法警多名捕余。余未之知也。法警数人埋伏于粤华酒店三楼电话旁，另遣人由别处打电话来店，诈称

> 谢英伯先生请余亲接电话，有要事磋商。当时余闻侍者报告，以夜深人静，忽来电话，心中不无疑异，急插手枪于裤袋而登三楼。行至离电话数步处，便装彪形大汉数人突起扑余，余于纷乱中，忘手枪，唯奋力与扑者搏。乘间疾奔下楼。失足，自楼头直滚而下，急翻身夺门出。

经过陈炳生的这番自我“包装”，首先澄清了龙氏没有“奸情”，“总统引中国旧习而下令特赦，以示无政治背景存焉”；其次，他把自己奸情败露而杀妻，包装成“自信为大众谋福利”而大义灭亲。

国共两党党史上，都把香港海员大罢工当作革命的胜利。罢工期间，大批香港海员在广州加入国民党。2月中旬，陈炳生涉嫌谋杀妻子而被逮捕，苏兆征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当时罢工时间已经过半，苏兆征还是发挥了主要的领导作用。但是，苏兆征和林伟民当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而且根据邓中夏的叙述，苏兆征当时知道有共产党员在广州，却没能联系上。当时的广东共运还处在初创阶段，尚未发展到香港。



中华海员总工会会员证章

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书也说：“香港海员工会经过上次罢工的锻炼，虽同系国民党所领导，与广东机器总会比较起来却大不相同。它显得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急进的年青工会……前此，各工会多半受到国民党的影响，中共在香港工人中那时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就由这次我们访问香港开始（说明：1922年5月，香港各工会以海员工会为首，联合邀请外省各工会代表，到香港去与各工会举行联欢），中共的影响初步到达了香港和海外。后来，海员工会也逐渐转到了共产党手中，所以1925年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始终能由共产党人主持。”

总之，在海员大罢工之前，苏兆征和林伟民两人既未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也没有和共产党员有过重要的接触。事实上，他们分别在1924年夏和1925年春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两人接着在1925年—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中成为主要领导人。有位学者作了恰当的推论：“苏兆征等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恰恰表明海员大罢工是个训练潜在的共产党员的时机。事实上，与其说共产党激发了海员大罢工，倒不如说海员大罢工推动了共产党的发展，这样说更公正些。”

至于海员方面，大罢工胜利后赢回了一块被香港政府摘走的牌子，工资增加百分之十五。此后，苏兆征继续回船工作，林伟民参加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之后，赴上海筹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后被选为支部的会长，留在了上海，香港海员工会为翟汉奇把持。据刘达潮《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的经过与海员大罢工的情形》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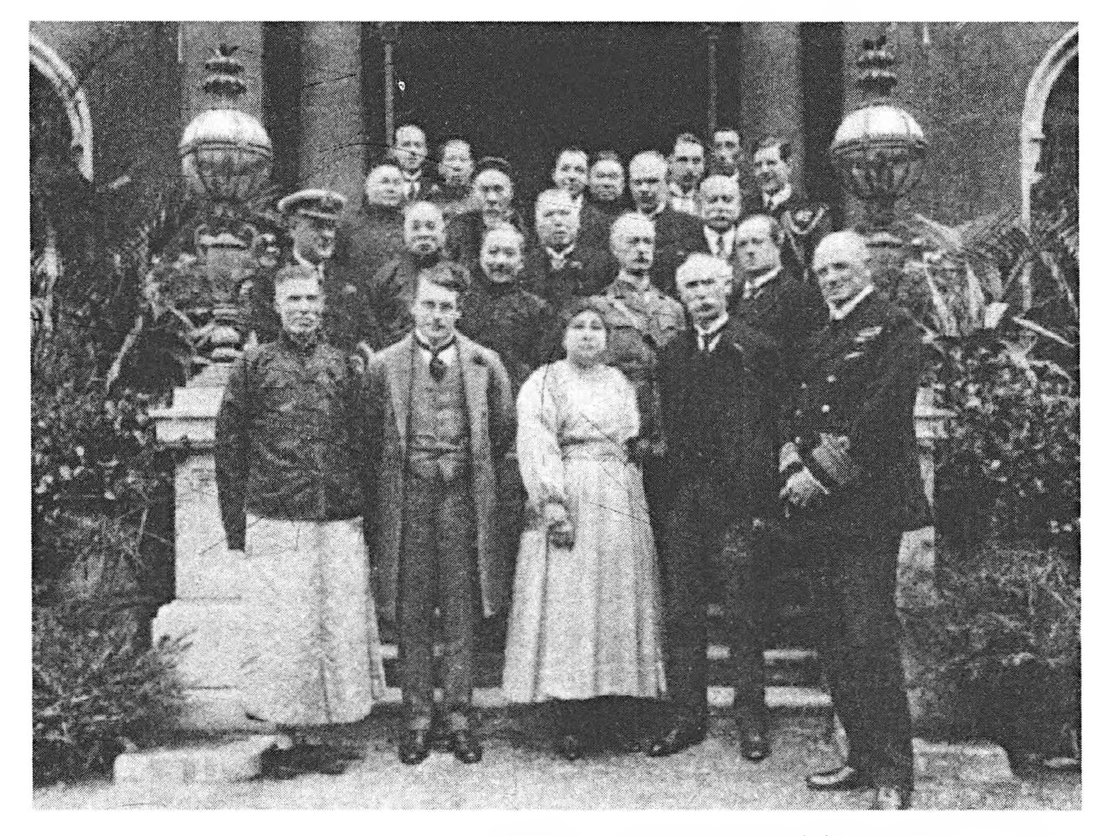
（罢工胜利后）港海员总会，则为会计翟汉奇所把持，又重演不良习惯，醉生梦死花天酒地；大为海员进步分子不满，即发动各宿舍筹备改选。经过选举（揭）晓时，谭华泽得票最多，遂为主席，其余苏兆征为司理，罗贵生为司库，等等。即决定日期在广州交代（因罢工期内，所有数目存在广州）。当广州交代时，因存广东纸币问题，发生争执（其时广东省银行纸币停兑，变成废纸，而翟汉奇之数目，香港币与广东币不符），而致动武。而翟汉奇此际当众声明，此等数为陈炳生手续，须待陈回方能清楚（借此以为转弯）。是晚翟即私逃返港，即散布谣言，谓谭苏等用枪指压其填补陈炳生经手的数目，否则将其枪毙，因此其泅水逃返港中。又谓抚恤梁和家属之款（这笔款是罢工时期，因涉孖沙宏记司理梁荣，包雇工人落蓝烟囱船工作，破坏罢工，有工友梁和奋勇将涉孖沙梁荣枪毙，而后为港府捕获，和直认不讳，致受环首之刑，工会念其忠勇，抚恤其家属费一千元），谭苏等亦否认此数，亦要其填补，等等，以挑拨工友对谭苏等发生恶感。以后谭苏等返港时，翟则匿不交代，并扬言，如要翟某交代，除非对质法庭等等恐吓谭苏等新职员（据司数人的估计，香港总工会存款，有一万五六千元在翟手中）。其时新的被选职员，找不到翟汉奇交代，更有些工友（内河船的居多），黑白不分，只谓新旧职员立争职位，故不交月费，以抵抗职员不法。其时工会内部，经费发生危险。及后用宣传解释方法，向船上工友详细说明，方能首先得到总统船（加兰总统工目罗奇生）鼎力募捐，以及加拿大皇后船继续捐款，以（维）持会中经费（其时工会的费用，每月需七百元以上），并由该两轮转函号翟各船，请各工友必须尽力维持团体，因此工会方能继续发展下去（幸有签约全权）。

香港海员大罢工领袖人物之一的翟汉奇，就像一滴油污似的，消失在汪洋大海里了。据刘达潮、冯燊回忆，当时工会有规定，工人入会满三年以后，死了可由工会负担棺材埋葬。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翟汉奇利用与工会的“老关系”，开了一间很红火的棺材铺，专营海员丧葬“生意”。海员工人对他深恶痛绝，说：“翟汉奇盼着我们早死。”

陈炳生被特赦不久回到香港，港英当局认为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强行用武装小轮押解回原籍宝安。据卢子正《香港海员罢工领导人陈炳生二三事》说：“陈闲居后，由广东宪兵司令林时清推荐，投入陈济棠统治下的广东宪兵司令部担任政治侦缉长。西南割据局面结束，陈炳生到开建县任警察局长及税捐处课长等职。日寇投降后，陈炳生又回宝安原籍。土地改革前夕，他去了香港。笔者与陈炳生在1939年—1943年间，同事于开建县，工作之余，陈口述海员组织产生的经过及香港罢工事迹，要求笔者代拟《中华海员组织之产生与民国十一年的奋斗》一文，该文经陈树人、居正、冯自由等联名推荐，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旬刊发表，并由考试院铨叙部发给陈炳生革命勋绩证明书。”

郑宏泰、周振威合著《香港大老周寿臣》收录了下面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书中的

照片说明文字是："1922年，周寿臣与港督司徒拔（前排左二）、何东（前排左一）、何东夫人麦秀英（前排中）、何福、何甘棠、遮打、罗旭龢及罗文锦等摄于何东大宅——红楼（Idlewild）。"



调停罢工风潮的主要华人绅商（约摄于1922年3月）

我们发现，刘铸伯也在这张照片里，他站在周寿臣旁边（第二排左三），面容十分憔悴。从各人穿冬装看来，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1922年3月份海员大罢工结束之后，因为参加调停罢工风潮的主要华人绅商，几乎都在这张照片里。这张照片里，司徒拔神色严峻，很容易令人想起海员大罢工期间他讲的那句话："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最其最终目的无疑是迫使英国人撤出香港。"

可以推断，这是香港海员罢工潮消弭后，港督司徒拔及其同僚在何东的半山豪宅举行的一次"庆祝"或"答谢"活动。选择在何东家举行这个活动，是因为"沙田惨案"发生后，劳资双方（包括广东政府代表）重启谈判，身为航运业巨子的何东，为免得各方努力，因为港府及资方拒绝"支付罢工期间一半工资"，而让整个谈判付诸流水，他主动提出折中方法，表示自己可以捐款支付该笔工资。并且，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签订条约，由何东签字担保。

何东最后有否拿出"真金白银"，支付工人罢工期间的全部工资呢？陈伟群的

研究指出，何东最后并没兑现自己的承诺。正因如此，有海员曾经向国际劳工会议（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寻求协助，甚至斥责何东为“工贼”与船主资本家合谋，欺骗海员。郑宏泰、黄绍伦从一些殖民地部秘密通信中发现，到了1929年，日内瓦的国际劳工会议秘书长谭马士（Monsier Albert Thomas）仍有跟进何东未能兑现承诺捐款支付罢工海员工资的事件，只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注意到，国际劳工会议乃“无牙老虎”，故指示港府知会何东，不要公开响应指控，或是接触谭马士，希望以“拖”字策略平息事件，因而令何东失去了答辩的机会。事实上，由于内地政局不久又风云再起，诡异多变，有关的指控最后无疾而终。

第九章　蒹葭苍苍

1922年5月3日（旧历壬戌四月七日），刘铸伯遽然病逝，享年56岁。中西各报均以显著位置发布消息，指出刘铸伯的逝世是香港政府、香港华人的巨大损失；英国政府追授他为“最卓越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

刘铸伯长子刘德谱，少时就读于香港育才书院，“具盘盘之大才，不屑屑于章句”，毕业后即进入商界。刘铸伯去世后，其家族产业由刘德谱继承，1924年，刘德谱与友人集资创办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抗战时期，刘德谱大力支持祖国的抗战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德谱曾收到一封叶剑英亲笔信和毛泽东主席签名赠送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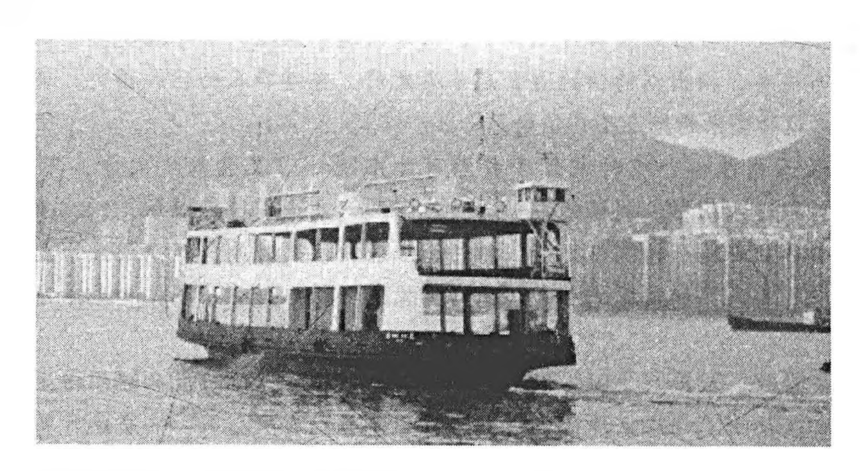
刘铸伯去世时，长孙刘镇国（刘德谱之子）年仅12岁，他长成后继承祖业，任香港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油麻地建设有限公司、香港船厂有限公司、油麻地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一生热心社会公益，支持社区慈善活动。

刘铸伯曾孙刘定中，早年赴美留学，获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曾任香港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油麻地建设有限公司、香港船厂有限公司、油麻地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香港油麻地轮船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油麻地地产有限公司、油麻地旅游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冷联轮船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1981年被委为太平绅士。

1977年4月，刘定中、胡平夫妇应邀赴京观光，受到廖承志的接见，被廖公认为“外甥”。晤谈时，他对廖公提出开通中断了近三十年的港穗直通船的设想，当即获得赞成。

1978年11月17日，香港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港穗飞翔船举行启航仪式。刘镇国、刘定中父子在接受访谈时认为，此举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可以说，刘镇国、刘定中父子堪称改革开放初期，飞进国门的第一只春燕。

《香港华字日报》刊登的《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1922年5月4日）



香港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的轮船（20世纪9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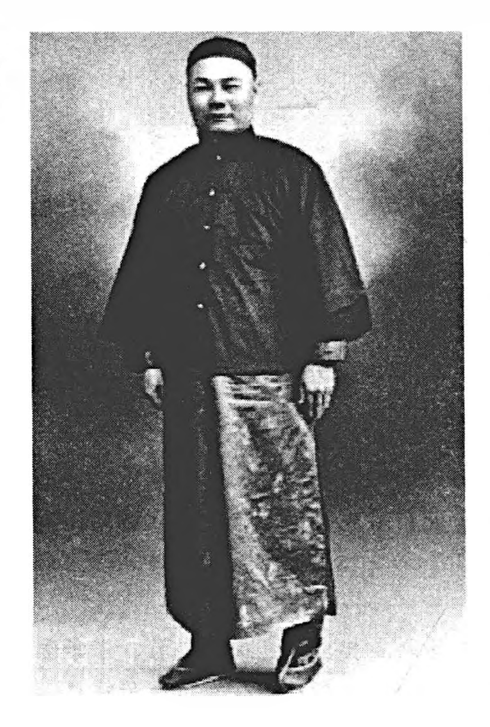
毛泽东1951年12月赠送刘铸伯长子刘德谱照片

第一节　铸伯之殇

1922年 5月3日（旧历壬戌四月七日），刘铸伯遽然病逝于香港寓所，享年56岁。6月17日（旧历五月二十日），归葬于平湖凤凰山青奇坑。由他的儿子刘富宗、刘荣宗、刘耀宗、刘光宗泣述。从叶兰泉填讳的《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中，我们可以隐约得知刘铸伯的死因：

> 先考前后历任治安局员、国防局员、公立医局副局长、保良局副局长、东华医院常年顾问、保良局总理、搜查稽审值理、卫生局则例审查员、粮食价值稽核员、征收轮船战务用品值理、战务恤款值理兼干事员、教育研究值理员研究值理、考查工程司局员、法例审查员、公项稽核局员、孤寡恤款干事值理、英国钦设工艺制造研究会会员、北般乌工艺制造会永远会员、华人永远坟场干事值理，皆能衡量事理，审查情势，调剂中外。而克协其平，故万端坌集而事无不济，要皆不及备述，谨述其荦荦大者，然责重事繁，心力交瘁，先考之病，伏于此矣。
>
> ……
>
> 今年（1922年）春，海员罢工事起，相持久不下，商民交困，群推先考出任调停。先考为华侨大局计，不惮趾疲舌敝，屡向所司力争，局外亦多有不及知者，众情不谅，疑谤交集。迨事获解，而先考之心力益瘁矣。
>
> 夏历四月五日（5月1日），饯世伯何绅棣生（何甘棠）之行归，尚与众孙嬉，未几，登楼呼腹痛，家人扶之卧，则痛益剧。众医断为胃癌，谓初患可治，溃则不治，今登楼而痛，殆癌溃也。越二日，卒于港寓，时为壬戌四月七日（5月3日），享年五十有六，而先考遂弃不孝等而长逝矣！呜呼，痛哉！越五日，权厝灵柩于东华医院义庄，以五月二十日（6月17日）归葬于平湖。

《行述》述及刘铸伯死因，不外有三：一是他毕业后献身社会，“责重事繁，心力交瘁，先考之病，伏于此矣”；二是调停海员大罢工期间，“不惮趾疲舌敝，屡向所司力争”，但是“众情不谅，疑谤交集。迨事获解，而先考之心力益瘁矣”；三是在甘棠第宴会后归家，与孙辈喜乐，“未几，登楼呼腹痛，家人扶之卧，则痛益剧。众医断为胃癌，谓初患可治，溃则不治，今登楼而痛，殆癌溃也。越二日，卒于港寓”。


何棣生（1866—1950）

刘铸伯病故前夕，心情十分低迷：先是在1921年—1922年间香港“婢制存废”之争过程中，刘铸伯、周寿臣、何泽生（何福）等太平绅士与华人绅商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受到诟病，极力主张废除婢制的香港礼贤会王爱棠牧师，甚至公开撰文抨击刘铸伯——“在上则傀儡国家之议员，在下则傀儡侨港之黎庶（小民）”；后是在调停海员罢工过程中，他作为调停人受到威胁与诟骂。《南华早报》5月4日发布的“讣告”，引述了刘铸伯5月1日与华商总会同人在陶园欢宴何甘棠荣休茶会上的一席话：“我姑妄相信他的行为（按：指何甘棠退休之事）是被现今的趋势所迫。如今真理与谬误、对与错之间的区别，不再泾渭分明。不管一个人尽多大气力地为华人社区的利益奋斗，他的努力不仅得不到感激，而且通常还会被许多人批评，如果他的行为不被认为是一种冒犯的话。因此，热心公益的人们对公共事务热情不再，也就不奇怪了。”

前引《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所记，刘铸伯之死，实在与这场最后的饭局密切有关：“夏历四月五日（5月1日），饯世伯何绅棣生（何甘棠）之行归，尚与众孙嬉，未几，登楼呼腹痛，家人扶之卧，则痛益剧。众医断为胃癌，谓初患可治，溃则不治，今登楼而痛，殆癌溃也。越二日，卒于港寓，时为壬戌四月七日（5月3日），享年五十有六。”

《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更具体地谈到，华商总会的这场饭局设在陶园：“但刘君未死之前，于星期一日，华商总会同人，欢宴何君棣生于陶园，尚畅为演说，忽觉两肋受痛，四点半钟回寓，至七点时，只食饭少许，后觉痛苦异常，不能食，须要人扶之，仍痛不止。当时大医生暨西医生数人，中医生数人，都未有决断其何病。星期三早，尚能认友，及去世时之前一点钟，何君棣生到候，仍可握手，迄中午十二点三十五分钟，乃与世长辞矣！唯刘君之母年八十四尚在堂，而刘君生子四人，其长子德谱在沪，已急电报知。昨早接德谱回电，伊于昨早附搭施利士化士东轮船回港，待他回港后定期出殡云。”

《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说中医西医束手无策，无法确诊刘铸伯患了何种疾病；《行述》说，医生当日给出诊断结果是胃癌，两文记载互相矛盾。并且，胃癌说十分可疑。我们曾专门请教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注册中医师严丽明（Dr. Yim, Lai Ming）女士。她仔细阅读《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并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给出的结论是：刘铸伯的病状，与当年中医西医诊断的

"胃癌晚期"明显不符；他可能死于心肌梗死，或急性胰腺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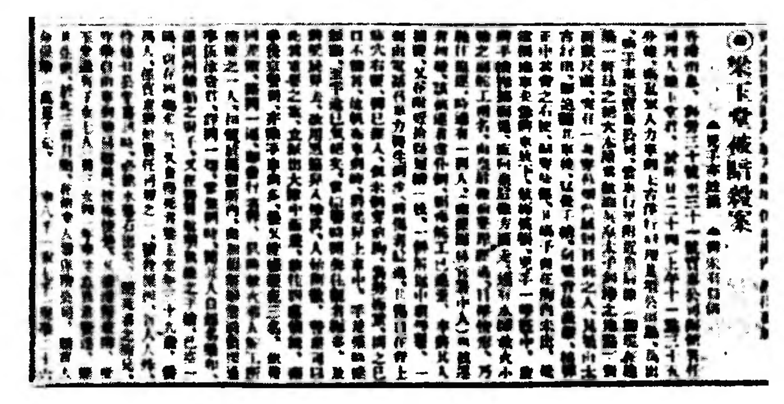
严丽明中医师说："刘铸伯与同人在陶园欢宴何棣生，当场还畅为演说，就是说他置身朋友圈，身心愉悦，宴席上'忽觉两肋受痛'，这就可能与食物有关。当然，不排除食物中毒，或有人蓄意投毒。《行述》说：'夏历四月五日（5月1日），饯世伯何绅棣生（何甘棠）之行归，尚与众孙嬉，未几，登楼呼腹痛，家人扶之卧，则痛益剧。'如果是被人投毒的话，那就是说，毒性尚未当场发作，他只是感到'两肋受痛'而已，所以回家后还能与儿孙嬉乐……总之，有份致命的食物，诱发了刘铸伯的心梗或胰腺炎，终于不治，三天后去世。"

我们感到，《行述》《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二文对于刘铸伯死因之表述，似有诸多难言之隐。陈炳生口述、卢子正笔录《中华海员工会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回忆》中的一节文字，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陈炳生这样写道：

刘富宗等《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 （1月）13日，香港绅士刘铸伯，以私人资格，劝海员即日复工，将来由刘负责要求各轮船公司按原薪增加一成五。唯海员会要求资方提供保证，刘铸伯无法答复。后有传言，刘铸伯为工人吓死者。此反动分子之谰言也。

陈炳生此文，还交代了一件暗杀案："先是，香港宏记办馆工人汉奸梁某，甘为资方走狗，在罢工期间代各轮船公司包雇工人，未几为省方工人暗杀。事发，全港震骇，各界侨旅，纷纷离港，惧同样事



1922年3月5日《申报》刊登的《梁玉堂被暗杀案》


宋寒松书法《慎独》

态之继续发生也。”被省方工人暗杀的梁某，即是宝泰公司办馆署任司理梁玉堂（1921年陈炳生曾被该办馆开除），杀人者梁和被当场拿获，直认不讳，后被判处绞刑。罢工胜利后，“工会念其忠勇，抚恤其家属费一千元（一说三千元）”，但是这笔款项最后被工会会计翟汉奇贪污。

刘铸伯在调停斡旋期间，唇干舌燥，焦头烂额，罢工工人代表曾经扬言：“如果番鬼佬不答应条件，我们要烧掉香港才走。”同时，他还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而早在1912年—1913年调停香港市民“杯葛”电车运动期间，刘铸伯就不止一次收到“敢死会”的恐吓信，对他谩骂，指责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洋人，鄙视华人同胞，跟殖民政府勾结共谋、狼狈为奸。恐吓信里还夹有几粒子弹。这次调停海员罢工风潮，刘铸伯再次收到多封恐吓信，但他在华商总会召集的会议上，勉励各位出面调停的绅商：“不可畏首畏尾，尤不畏人今日话杀、明日话劏，不肯出来办事。个人出来办公益，杀只管任人杀，只问良心，兼就正来做便是。”但是，如上所述，调解过程困难重重，各方利益瓜葛纠缠，关系千丝万缕，刘铸伯作为调停人，因为“众情不谅，疑谤交集”，落得一身骂名，对此感到无可奈何，身心疲累。

再说陈炳生杀妻被特赦后，于这年4月返回香港海员总工会，当即被香港政府拘捕，起因是陈炳生妻兄控告他枪杀自己的妹妹。此后，虽经审讯无事，但香港政府仍谓陈是不良之徒，判处递解出境，经过律师辩论，亦无济于事。

海员大罢工期间（3月5日），陈炳生指使省方工人梁和，暗杀香港宝泰公司办馆署任司理梁玉堂，理由是其“甘为资方走狗，在罢工期间代各轮船公司包雇工人”，可谓冠冕堂皇，但他未讲自己一年前曾被该办馆开除，而把自己因奸情败露而杀死发妻龙氏，包装成“自信为大众谋福利”而大义灭亲。

罢工潮初起，刘铸伯以同乡身份找陈炳生斡旋。关于刘铸伯之死，陈炳生说：“后有传言，刘铸伯为工人吓死者。此反动分子之谰言也。”这是否等于间接承认自己与刘铸伯之死有关？而且，就是陈炳生回港被递解出境期间，刘铸伯遽然病故……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刘铸伯作为香港孔圣会会长、主席，入民国后与康有为以及康门弟子伍宪子、徐勤等关系密切。海员大罢工期间，徐勤奉康有为之命赴香港办事。他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札中写道：“敬禀者，二月四日午间到港，罢工风潮益烈，由轮船搭小舟抵岸，费银三元，行李运往旅店，不及廿尺之远，又需三元。凡各工人皆耀武扬威，怒目相视，各店东莫敢出一言。现茶楼、酒馆、机器、车、衣、西役等行已一律罢工，自开港以来未有

之惨状，商人被刺被击者日有所闻，已下戒严令。刘铸伯已逃匿，港政府对粤政府恶感已达极点。乞饬子胥转告侣鹤，闻广州已密派五百暗杀队来此，一切商人皆敢怒不敢言，列宁政策或竟行于故乡。弟子已托人问此间上峰，关说有效与否，容日奉闻，子胥能运动侣鹤，衔命来此就商，必有效果。数日前林俊廷特派其弟来访，弟子允携手，其宗旨在专去孙陈，弟子启行智，若大山适来，二函乞拆视便悉一切。林氏之弟已归，彼对于士衡等甚怨愤，林已破家支危局，士衡一钱不济，其弟回去再携一公事证书来，其意欲求我等与通敝本家及侣鹤，彼之力可以追踪行者，但求前途允夹，攻则彼时时可动，彼之部下，皆欲拥其为桂督，弟子欲派大山人主其事，昔年曾派大山人其军，助以款，故甚感我等，寄上林部各人名，乞转子胥，饬其与侣鹤疏通，他日西南大局必收奇效，弟子俟公学事了后即来，如能先得二三千之数，或即回沪。子胥行后有信来否，非连之事最近有信来否，念甚念甚，凡有来，弟子即乞拆视，以免阻误事机。匆匆即问春祺。弟子马蘧叩禀。二月四日。子胥函乞代寄，顷港中戒严，来往信检查，赐示乞慎之。林俊廷乞勿与党等言。”

徐勤致康有为信札

徐勤此信，对康有为详述香港海员大罢工状况及林俊廷来访之事。开篇所说行李运旅店被不断加价一事，即可反映出当时香港社会动荡严重，海员大罢工所导致劳资关系恶化，“自开港以来未有之惨状”，可见一斑。信中第二要点即在报告筹款一事，“林俊廷特派其弟来访，其宗旨在专去孙陈”，孙、陈即指孙中山和陈炯明，而桂系将领林俊廷相对于此二人来说为第三方势力。

刘铸伯乃徐勤此番筹款的主要对象，但他抵港后找不到刘铸伯的人影，主要原因是“凡各工人皆耀武扬威，怒目相视，各店东莫敢出一言”，“商人被刺被击者日有所闻”，又听闻“广州已密派五百暗杀队来此，一切商人皆敢怒不敢言”，“刘铸伯已逃匿”，等等。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陈炳生为自己辩诬的所谓“后有传言刘铸伯为工人吓死者，此反动分子之谰言”的说法，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节　极尽哀荣

1922年 5月3日中午12点35分，刘铸伯在寓所溘然逝世，香港各界为之震惊不已，中西各报均以显著位置发布这一消息，指出刘铸伯的逝世是香港政府、香港华人社会的巨大损失，一致肯定刘氏竭尽心力，为香港的公共事务及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大量工作和杰出贡献。

刘铸伯逝世次日，《香港华字日报》“香港新闻”栏目刊登《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一文，对一代慈善家的不幸去世深表哀悼：

> 刘君铸伯，于昨三号正午十二点三十五分钟，在其府上逝世，年五十六岁。按：刘铸伯君少丧父，其母极贫，操女红度日，教子读书于大华民义学，只穿木屐，旋入义学，校中小费，亦难支持，而其母仍竭力支持之，继由西营盘义学，考得首名，送中环大书馆，即今皇仁书院，免费。考得天文台书记，转赴台湾西学堂当教员，回港后任屈臣氏买办，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太平局绅，又任洁净局绅


香港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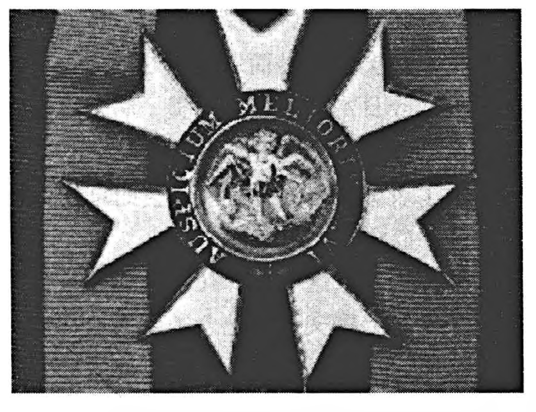
1922年5月4日《香港华字日报》发表的《刘君铸伯逝世及其小史》

五年，曾办理局员受贿案。又当定例局员八年，为华人谋利益之事甚多，倡设公立医局，其最著者也，其关于不便人之则例，莫不力辩驳。又，创设华商总会并孔圣义学、育才书社及各义学，刘君因自己少年家穷，无钱读书，故乐设义学，以栽培贫民子弟之计。刘君在港办理义学，垂三十余所，无不尽力，闻者惜之……

5月7日，刘铸伯出殡，灵柩暂厝东华医院义庄，送丧队伍浩荡，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极尽哀荣。蔡惠尧《深港闻人刘铸伯：生平、志业与意》一文引述《南华早报》"讣告"中的有一段评价文字，认为这是时人对刘铸伯一生较为公允的评价：

刘铸伯先生一直力图在华人圈和外国人圈中寻求一种和谐，并想办法减少他们之间的摩擦。有些同胞却声称铸伯先生喝了点洋墨水，老为外国人服务。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想尽一切办法为中国人服务，为他的祖国谋求最大的利益。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一定要努力学习汉语，永远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还经常由于强烈地批评那些看似跟祖国没有了联系，忘记了中国习俗、中国文化的归国留学生而被人致信媒体批评他，甚至是污蔑、辱骂。我想，就算是铸伯先生某些地方做错了，那也是因为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迎合各个方面的人。他意识到合作比坚守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要有用得多，他一直想寻求一种可以达成合作的媒介。虽然香港华人的生活条件还不是很好，但老百姓从过去备受压制和忽视到能过上今天这种相对自由和舒适的生活而没有经历大的动荡，完全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好的领导人。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他的做法是合理的。

鉴于刘铸伯在香港取得的功绩，1922年，英国政府授予他"最卓越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The Most Distinguished Order of Saint Michael and Saint George），简称"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这是英国荣誉制度中的一种骑士勋章，于1818年4月28日由威尔士亲王乔治（后来的乔治四世）设立，当时他正代替其父王乔治三世，摄理君职。



刘铸伯获得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

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分为三等，依等第如下：爵级大十字勋章/一等勋爵士（Knight/Dame Grand Cross）（GCMG）；爵级司令勋章/二等勋爵士（Knight/Dame Commander）（KCMG/DCMG）；三等勋章/三等勋爵士（Companion）（CMG）。该勋章一般授予对英联邦或外交事务做出贡献的人士，不少前港督皆获此勋位。勋章的格言是Auspicium melioris aevi（拉丁文，指"憧憬更美好的未

来”），至于勋章的守护神，一如其名，是天使长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圣米迦勒制服撒但的情景，则是勋章的象征。

1922年6月2日出版的《伦敦宪报》（*London Gazette*）副刊第32716号，曾经刊登刘铸伯获勋的消息。关于英国政府授予刘铸伯“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一事，其后人所撰《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写道：

> 联军战起，吾国参为。先考援国民外交之义，协大有银号，赠联军以飞机一乘，己则赠以红十字摩托车一辆，而中英邦交益加亲睦，论者咸以为识大体云。……以襄办港事叠著劳绩，英廷传谕嘉奖，并奖给二等宝星，然使命在道，先考已不及拜命矣。

第三节　身后之事

刘铸伯去世后，李葆葵接任他生前担任的华商总会主席、孔圣会主席职务。在华商总会的一次叙会上，李葆葵高度评价刘铸伯的创会之功：“刘君以华商公局为华侨领袖机关，非扩大之不足以提挈华侨、振兴商务，于是发大愿力，联合同人，改组华商公局而成华商总会，自是而后，刘君致力会务，到底不懈，主席十年，为有会事鞠躬尽瘁之慨……以今日本会成绩之优美、名誉之隆大，下而至于局面之堂皇言之，弟意为非得到刘主席之提挈，未克臻此。”

为了表彰刘铸伯对华商总会的卓越贡献，1933 年 4月，华商总会内竖立一尊刘铸伯的铜像，以资永远纪念。

刘铸伯去世这一年，孔圣会继续举行孔圣诞庆祝活动，李不懈在当年出版的《纪念圣诞》专号上撰文《因纪念圣诞而追忆刘君铸伯》，其中谈到：“事有隔世而相感者，匹夫慕义，往往思前代而激昂，此太史公所以思晏子而愿为之执鞭也；夫前代之哲人，尚令人纪念不置，况前代之圣人乎？况圣如孔子，为前代生民所未有者乎，间尝静思，我今日何以尚知仁义礼智者，谁使之？孔子也。我今日何以尚知伦常道德者，谁使之？孔子也。我今日处此乱世，邪说横行，而我尚知道义，不至为禽为兽为妖物为畜类者，谁使之？孔子也。孔子于我，实无异生我之父母也，既无异生我之父母矣，而儿犹不纪念之，非人也。此仆所以每年八月廿七，必纪念圣诞也，亦无异于十月初二、十二月十二，纪念我之父母也。虽然，孔子千百世以上之圣人也，千百世以上之圣人，吾拳拳纪

念之，则与吾同时发起纪念孔子之故人，吾独能不追忆之乎？斯何人？斯何人？则刘君铸伯也。”而且，在孔圣会主席李葆葵的主持下，孔圣会义学还在不断增加。更多的失学儿童，及时得到较好的教育。

刘铸伯去世后，他遗下的定例局非官守议员一职，香港政府任命另一位华人领袖伍汉墀担任。可是，伍汉墀在定例局供职仅10个月，也因病猝死于任上，终年仅46岁。

育才书社总主席嘉道理，与刘铸伯同一年先后去世。他们去世后育才书社筹集办学经费日益困难，广州育才学校遂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停办。



刘德谱曾经获得国民政府三等嘉禾章

刘铸伯长子刘德谱，少时就读于香港育才书院，“具盘盘之大才，不屑屑于章句”，毕业后即进入商界，任香港华英教育代理物业银两有限公司司理。旋赴上海，任昌成洋行司理。刘铸伯去世后，其家族产业由刘德谱继承，一度担任广东省全省酒税局总办，驰骋于港沪粤商界，曾获国民政府三等嘉禾章。

1924年，刘德谱与友人集资创办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and Yaumati Ferry Co. Ltd，简称油麻地小轮或港轮），经营港九两地及与离岛地区的航线，担任总经理。

关于刘德谱的生平事工，吴醒濂编著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The Prominent Chinese in Hong Kong*，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版）一书，曾经收录为他写的一份小传，全文照录：

> 德谱先生，广东省宝安县人，年四十有九，为作古闻人蜚声香岛之刘公铸伯哲嗣，现本港油麻地轮船有限公司之总理也。生于丰厚家，而无纨绔习，具盘盘之大才，不屑屑于章句，以为我国积弱，在乎患贫，急治其标，商业是尚，故仅毕业于育才书社，即出而角逐于远东第二市场，当香港华英教育代理物业银两有限公司司理，继乃周旋于我国唯一商埠，充上海昌成洋行司理，中间服务于宗邦革命发源地之广东，任全省酒税局总办。少壮时期，已展长才，驰盛誉进也可知。
>
> 吾慕其人，嘉其志，尤庆我国商界有此卓绝奇才，故乐为之记。
>
> 先生忠孝禀乎天性，早年服劳党国，曾获中央政府宠锡三等嘉禾章。
>
> 对于贡献本港社会，更能善体亲心，秉承遗教，前任保良公局值理、港府特委电报检查员、华商总会值理，现充宝安商会值理、孔圣会值理、中华圣教总会永远名誉协理、佛学会会长、中南中学校董、西南女子中学校董、养中女子中学校董、华商俱乐部会员、华商会所会员、五陵会会员、平湖纪劬劳学校董事长、平湖念妇

贤医院董事长。至商业经营，举其大者，除主油麻地轮船公司事外，且任德银号董事、平湖振兴公司总理焉。

夫人曾文仪女士，邃于国学，系出名门；男公子镇国，年念七，毕业于拔萃男书院；女公子慕仪，年十七，攻读于拔萃女学校。

刘德谱"服务于宗邦革命发源地之广东，任全省酒税局总办"具体时间不详，但从零星材料看来，广东大革命时期（1924—1927），他似乎与陈炯明关系颇为密切。

陈炯明1917年拥护孙中山南下护法，被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18年击败福建督军李厚基后占据闽南地区，1920年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任内，在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在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在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在社会生活方面，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1878—1933）

1921年5月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成立，陈炯明任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 。1922年4月因阻挠北伐被免去陆军总长以外的各项职务。1922年6月16日发动军事叛变，炮击广州总统府，企图杀害孙中山。1923年1月陈部被逐出广州，后指挥旧部盘踞惠州、潮汕、梅县一带，与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相对抗。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到3月底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6月，东征军自东江回师广州，在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的大力协助下，平定了刘杨叛乱，陈炯明被迫逃亡上海，联络各方政治势力，企图卷土重来。9月份，陈炯明"潜行到港，是领香港政府帮助援粤之军费二百万元，闻现在实交三十万。至于陈氏领得此款亦不能有所作为。盖汕头军队其重心已在林虎手上。丽林氏此次又另与北廷密订条件，不肯与陈炯明合作，故陈氏迟迟未肯赴汕，亦为此原因"。另据1925年10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陈炯明宴会港商之详情》一文记载：

昨据香港归客云，陈炯明自抵香港后，即居住于前港绅刘铸伯之子刘德谱住宅，连日与一班港商会议，甚为秘密。昨旧历十五晚，陈氏假座西环金陵酒店，通请港商何世光、何世荣、周某、谢某及保皇党徐某等数十人宴会，酒至数巡，陈炯明起立，向各港绅曰：今天请各位赴会，系关于出兵东江，最要者饷项接济问题，

倘接济不续，于军事前途，必受影响，前蒙何先生（指何世光）交来军饷二十万元，亦已发给迨尽，今请各位设法继续接济，并请从速发给第二期饷银二十万元云云。（查港绅方面接济陈军饷项，系分期发给，倘陈氏确有把握时，然后发给第二期。）再谓现在本军已出发，决与孙军一战，（陈指革命军为孙军）倘孙军败，我辈一定以实力统一广东，倘孙军胜，我辈无立足根据地。现闻说在座各位，有联络魏邦平在南路发展等语。但魏氏本人，殊不足靠，各位果真如此，广东终无有安宁之一日云。陈氏说毕，徐某一言不发，遂退席，陈氏及在座港绅，观此景状，手忙脚乱，纷纷挽留，徐某即向众谓我速去找寻魏丽堂（邦平）一语而去。当时列席者知徐氏不满意于陈氏所讲排挤魏氏的话，乃纷纷退席，陈虽极力挽留，仍不可得，遂无结果而散。事后魏氏以电话质问陈炯明，陈氏即派刘德谱代表谒见魏氏，疏通一切，至疏通情形如何，结果不得而知，但陈当时已恨徐某不已云。再查港绅方面，以陈魏两人，因此而生恶感，现有自观成败，再行定夺云云。



刘铸伯子孙刘德谱、刘昆谱、刘镇国、刘镇潘、刘镇武等，在刘铸伯铜像前合影（后排铜像）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至11月初便收复了东江，解放了潮汕，痛歼了陈炯明反动武装，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10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陈炯明在港造谣之失败》一文，略谓："香港一般商人，从前对于国民政府一切设施，不甚明瞭，加以受香港造谣报纸及反革命空气包围，被帝国主义者诱惑，故向持反对态度。此次陈逆受帝国主义者唆使，在港揭其所谓反共产口号，向香港商人骗款筹械，初时陈逆本勾结商团余孽陈廉伯及洋奴何世光、罗旭和等，假借华商总会、廿四行商会名义，四出鼓动无意识商人，骗具代筹军饷打广州。故当时被其愚惑者确有少数，曾由洋奴刘德谱等经手交二十万与陈逆。但陈逆以为尚未足原定十分之一（初时陈逆勾结洋奴等本欲向商人筹三百万），故留港不去，催逼甚紧。商人以其只知骗款，而东江前敌又着着败退，故已渐渐看破陈逆诡谋，不肯受其愚惑……"

但在抗战时期，刘德谱深明大义，全力支持祖国的抗战大业。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旋即攻占香港，强行接收了刘德谱的企业，直到二战胜利后，刘德谱才收回包括油麻地小轮在内的家族产业。

第四节　家国情怀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龙斗于野，血流漂杵。到了1949年，一党独裁、腐朽没落的蒋家王朝，已经土崩瓦解。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进到宝安县平湖、布吉一带，严正待命。

早在解放军抵达深圳之前，香港政府已在粤港边界部署重兵。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抵达深圳之后，中国政府为避免发生纠纷，严禁野战军驻防边境线，另派保安部队一面维持边界治安，一面监视英方行动。嗣后，英方见中方如此镇静稳重亦将军队后撤，只留少数警察维持秩序。香港政府在1949年的年度报告中说：“10月16日，中共正规部队到达中港边界的沙头角，几天以后控制了整个边界的中国一侧。没有发生什么事件。英国与中国当局在边界的关系是正常的，符合一般准则。”

香港政府与绅商市民曾经认为，香港的日常生活供给都来自广东，只要新政权断绝了食品供给，不出几个星期，香港就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了。事实上，毛泽东不但没有继续进军，也没有断水断食品，周恩来甚至亲自指示要保障香港的饮用水供应。关于此事，新政权有个通盘考虑：一是毛泽东利用香港，打破了英美的同盟，突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而且英国在1950年就宣布承认新中国；二是不收回香港，也使中国不必过于依赖苏联；三是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一个窗口，中国从香港进口大量的物资；四是保障了香港的稳定，以及促进了香港此后的发展。



毛泽东1951年12月赠送刘德谱照片（邬少洪提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立即对香港上层华人绅商展开统战工作。叶剑英元帅主政广东时，曾经委托张季民（其人身份不详）面交刘德谱一封亲笔信和毛泽东主席签名赠送的照片。

刘铸伯曾孙刘定中委托其外甥邬少洪，提供毛泽东主席签名赠送刘德谱的照片、叶剑英给刘德谱的亲笔信，供本书作者使用。叶剑英元帅的亲笔信如下：

德谱先生赐鉴：

夙仰浔辉英名钦佩，兹者邦基初奠，经纬万端，亟赖贤豪共襄大计。执事以经济长材，作航业巨子，社会事业，致力既殷，工人福利，成绩尤著，朔方遥企，倍切瞻依。张季民同志等再度公出赴港，特封毛主席玉照乙帧存念，并希今后对张同志等，多所联系为祷。顺颂近祺。

叶剑英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廣東省人民政府用牋

葉劍英

叶剑英1951年12月19日给刘德谱信函（邬少洪提供）

但是从笔迹上看来，毛泽东照片题字与信函字迹似乎出自一人之手，并非毛泽东或叶剑英的笔迹。而且，我们还注意到，郑宏泰、周振威《香港大老——周寿臣》一书中，收有一张毛泽东题赠周寿臣的照片，与题赠刘德谱的照片相比照，照片相同，笔迹亦同。略有不同的是：毛泽东题赠周寿臣的照片上印有“延安复光路三十七号”字样，而题赠刘德谱的照片印有“星光影相馆北京新民路一百四十五号”字样。

那么，究竟是谁人或哪个部门奉命，以毛泽东的名义赠送照片、以叶剑英的名义致函刘德谱？此事或许已经成了悬案。但是，无论刘德谱及其后人，还是周寿臣及其后人，均对毛泽东赠送亲笔题名照片一事深信不疑。叶剑英致刘德谱函件中有“张季民同志等再度公出赴港，特封毛主席玉照乙帧存念，并希今后对张同志等，多所联系为祷”一句，这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不久，“张季民同志”这位特使级的神秘人物，已经与刘德谱私下里取得了联系。

20世纪50年代，到香港找工作的平湖刘氏乡亲越来越多，住宿成了大问题。有鉴于此，刘铸伯之子刘德谱、刘昆谱兄弟和平湖乡亲刘长佑（在香港从事建筑业、百货业，平湖新南大草埔人，曾任宝安同乡会会长，平湖第一届侨联主席）出资，租下了庙街61号二楼一个单位作为平湖同乡的憩息之所，取名为“刘敦义堂”，解决乡亲燃眉之急。

乡人回忆说：刘敦义堂成立后，除了固定的五元宿费外，其他经费都是依靠同乡的捐献或靠赌博抽水。也许是敦义堂的名称缘故，看上去好像是什么社团组织，很多时候被抓赌，不管是赌的，没赌的，还是趁热闹的，两人抬一张台，一人担一把椅子，一个跟着一个并列着带到差馆。但是，只要给德谱叔公打一个电话，差馆实时用警车将人及家具原封的送回刘敦义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德辅叔公就将一幅家族全体照片

挂在敦义堂大厅中，从此就少被差人抓赌拉去差馆了”。

刘铸伯去世时，长孙刘镇国（刘德谱之子）年仅12岁，他长成后继承祖业，任香港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油麻地建设有限公司、香港船厂有限公司、油麻地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1955年冬，刘镇国与父辈发起成立香港刘氏宗亲总会，以“敦睦宗谊，敬老掖幼，奖学助读，奉公守法，伸张正义”为宗旨。

1968年，由刘子元、刘成挂、刘伯寿、刘则明、刘润珠、刘裕彭、刘联芳、刘德修等平湖旅港刘氏宗长发起，筹募资金购买会所，得到刘镇国、刘长佑、刘巨龄、刘培龄、刘聚荣、刘聚贵等鼎力相助，以及海外平湖侨亲、香港宗亲的支持，捐款接踵而来，数月间已募集一笔巨款，购置了荔枝道186号五楼作为永久会址。1970年，旅港平湖刘敦义堂同乡会以有限公司注册正式成立，拥有会所物业（位于香港旺角荔枝道186号）以及基金恒产。

刘镇国一生热心社会公益，支持社区慈善活动。晚年关心支持家乡建设，推动深港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他与众乡亲购置的旺角荔枝道186号“刘敦义堂”，一直被平湖籍旅港人士誉为“港湾”。



刘铸伯后人的合影，后排右一为其曾孙刘定中（拍摄时间大约为20世纪70年代）

刘铸伯曾孙刘定中，1940年生于香港，早年赴美留学，获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曾任香港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油麻地建设有限公司、香港船厂有限公司、油麻地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香港油麻地轮船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油麻地地产有限公司、油麻地旅游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冷联轮船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

“文革”十年内乱，正如刘铸伯当年预言的所谓“为子者归而革其父，为弟者归而革其兄，为妇者归而革其夫，为卑幼者归而革其尊长，为学生者归而革其校长，为庸役者归而革其厂主，为火伴者归而革其肆主”。1967年发生的“香港暴动”，直接影响到了刘铸伯子孙辈的家族企业。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政治生态逐渐走向正规。

1976年初，香港许多机构都存在硬币短缺的问题，特别是中资银行，如果没有硬币，客户兑换不了钱，生意也就没法做了。那时候，油麻地小轮的几十个码头，全部用投放硬币方式收费。刘定中从在中银工作的舅父廖恩德那里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帮助中

资银行解决“硬币荒”。是年，刘定中曾获邀赴偕夫人北京观光，但因局势暧昧难明、时机不成熟而作罢。

1977年10月，刘定中的舅父廖恩德接到廖承志的邀请；次年4月，刘定中、胡平夫妇陪同廖恩德取道深圳赴京，见到了廖承志，被廖公认为“外甥”。晤谈时，他对廖公提出开通港穗直通船的设想，当即获得赞成。从北京返回香港后，刘定中立即晋见港督麦理浩，并向他提出要开办港穗直通气垫船（飞翔船）服务，以及已取得中国有关领导的批准。麦理浩也当即予以批准。

为加强新时期的港澳工作，1978年8月12日，批转《关于港澳工作预备会议的报告》。中央批示：开展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的做法，要解放思想，大胆放手，多想办法，加快步伐，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中央决定成立港澳小组，以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中央港澳小组设立处理港澳事务的办事机构——港澳办公室，由廖承志首负其责。港澳办（后改隶国务院）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研究、拟定解决港澳问题的政策和掌管港澳政治经济动向。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香港问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廖承志的亲切关怀下，刘镇国、刘定中父子忙于筹备港穗通航工作。1978年11月，港穗直通气垫船（飞翔船）开通前夕，刘定中接受《大公报》名记者侯冕祖专访。他说：无论从任何角度，这条航线的开办，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对我们公司有好处，对香港、对各个方面都有好处。有了这条航线，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水面客运交通开始沟通了，两地的距离缩短了，港穗两地，应该有更密切的交链。因为除了交易会举行期间，香港居民经常到广州探亲访友，游览小住，外国游客也希望能到中国一游，这条航线的开办，对促进港穗的客运往来，有一定的作用。

11月17日，《大公报》以《中断近卅年海上客运恢复港穗飞翔船今天正式通航 油麻地小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定中喜谈展望》的大标题，刊发了刘定中的谈话。在回答这条航线究竟是怎样办起来的这个问题时，刘定中说：“该从今年四且谈起，当时我在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谈及关于港穗交通问题，探讨开办这条港穗航线的可能性。六月初，我们公司的气垫船经大铲到黄埔，广东省的负责人参观了我们的飞翔船，观看了飞翔船航行表演，他们详细地了解了气垫船的设备、性能和航行的各项情况。九月初，我和广东省航运局副局长郭仁杰先生正式会谈港穗线飞翔船的开办细则。由于受到广东省领导方面的关怀和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可以说，只在两天的时间内就拟好了具体的合约和计划，到了10月12日，双方圆满地就各项细则问题达成协议，13日，双方签订协议。”

对于开通港穗飞翔船的内幕，刘定中的答记者问有所保留。比如，1978年4月，廖承志通过他传话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中国；比如，同年5月，飞翔船穿越禁区，首次开进黄埔港，登船试航的就有时在广州调研的廖承志以及主政广东的习仲勋等省委、省政府领导人。

1978年11月17日，香港油麻地小轮有限公司港穗飞翔船举行启航仪式。次日，《大公报》第四版刊发通讯稿《两地昨举行飞翔船启航礼 港穗喜见客船飞》：

本报讯　港穗气垫船昨日举行启航仪式之后，今日开始每天三一班，为客运服务。通航仪式昨日上午在黄埔港和九龙大角咀港穗码头同时举行。随后，两艘首班气垫船对开，港穗两批嘉宾作为期两天的互访。

昨日上午，黄埔客运站彩旗飘扬，充满热烈气氛。九点十五分，启航仪式开始，广东省航运局副局长宋迪民和油麻地小轮公司总经理刘定中先后致词。广东省航运局副局长郭仁杰主持剪彩。

宋迪民在致词中表示，穗港飞翔船的通航，将为我国发展旅游事业、增进对外交流起良好的促进作用，也将为广大华侨、中国血统外籍人士、我国港澳同胞、外国朋友来往广州、香港提供交通便利。

刘定中致词说，油麻地小轮公刘定中致词说，油麻地小轮公司的气垫船能够行走港穗航线，使我们的渡轮服务范围可以扩展至广州，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喜事。这条航线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顺利通航，全赖广东省各单位的支持和衷诚合作才能达致。他希望今后将继续保持这种宝贵的合作精神，发展双方之间的航运业务，为旅客提供完善的服务。

参加通航仪式的还有中国出口交易会副主任郑少康、副秘书长陆茨、广东省革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杨青山，广东省中国旅行社经理叶刚明等，以及刘定中夫人，东亚银行总经理、油麻地小轮公司董事简悦隆夫妇等数十人和近千群众。

九点半，以郑少康为团长，陆茨、郭仁杰为副团长，包括广东省航运局、广州港务局、珠江航运公司、黄埔港务局、黄埔客运站中国外轮代理公司广州分公司、广东省中国旅行社、国际旅行社广东分社、广州市服务局、广州市人民银行、广州海关、广州卫生检疫所、新闻机构、对外友协广东分会、广东省政协、工商界等单位的负责人的访问团，在刘定中的欢送下，乘首班飞翔船来港。

同一版，还刊登了通讯《港穗嘉宾分受欢迎 香港随船赴穗者多为知名人士》，其中说："中午，船抵大角咀码头，油麻地小轮公司总裁刘镇国、副总经理杨展翘、公关兼办事处经理吕超俊等在码头欢迎。油麻地小轮公司昨晚并在'民俭'号海上夜总会欢宴嘉宾……"作为油麻地小轮公司总裁，刘镇国在接受访谈时说：开通港穗飞翔船意义十分重大。

1978年11月17日，油麻地小轮公司开通港穗飞翔船；同日，《大公报》刊登香港华商会，以及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汤秉达、副会长王宽诚、孙城曾、王美、郭宜兴、古胜祥、颜同珍等社会团体与个人的贺信，"恭祝油麻地小轮公司港穗飞翔船启航，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之互惠关系更进一步"。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刘镇国、刘定中父子堪称改革开放初期，飞进内地的第一只春燕。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7月8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蛇口工业区响起填海建港的开山炮，预示着中国改革开放春天的来临。这一炮，被后人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1979年，国务院批准招商局的提议，允许招商局自筹资金开发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最早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1981年，刘定中被香港政府委为太平绅士。11月20日，刘镇国、刘定中父子的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一艘60个客位的飞翔船，从九龙大角嘴码头首航蛇口，9时30分出发，10时15分抵达蛇口港，途中仅航行45分钟。从此，停航31年的香港—蛇口航线得以恢复。

1982年起，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中英双方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了1997年7月1日起，中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行使主权和治权。

香港回归之前二十多年间，刘定中为促成回归大业，献计献策，八方奔走，牵线搭桥，不辞劳苦，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角色，素有"香港007"雅称。

1988年9月29日，刘定中上书邓颖超，提供自己对香港回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国内经济危机的理解和建议。刘定中认为，从时间表上倒数，香港尚有九年期限， 便会重投中国之怀抱，并将成为中国的高度自治行政特区。在此过渡期间，香港政府之一切措施与计划，对香港未来前途的发展，肯定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教育、医疗、建设、社会福利及行政架构如何转变與适应等，均须密切注视，不容忽略。刘定中在信中写道：

> 目前亟需注意的问题，应包括以下四点：中国对香港事务的处理方法：现中国在香港的投资后果，引致对香港的经济市场受到严重影响。香港已日渐成为罪恶中心，亦是犯罪者的天堂。香港移民潮虽有影响，但非十分严重，亦不能归咎于1997年之信心问题。为此，刘定中详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
> 中国推行经济开放与市场自由买卖的政策后，当时出现了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包括通货膨胀及物价暴升，各大城市发生严重的恐慌抢购和银行挤提狂潮，如果不能及时制止，后果堪虞。刘定中说：应付办法，愚见认为先从改善现时之经济架构着手。要有一个完善的经济架构，必须具有三大条件：（一）完善之通信系统；（二）充足之仓库设备；（三）灵活联运的交通网。否则产品之供求调配便难以控制，无法协调，造成通货膨胀一大主因。就我所知，上述之三大条件，至今仍未见有大改善。

此外，刘定中还在给邓颖超的这封信中提出"特别建议"——国务院在制定重大决策时，要礼聘国内外专家学者集思广益。他这样写道："令日世界各国政府的首脑，他们日理万机，政务纷繁，加以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故需设有智囊团

或类似顾问之组织，聘请各种专业人才协商政事。在加拿大和美国亦设有同类组织，以便专家提供意见，作为决策之用。至于不少国际著名私人公司除已聘有顾问，每两或三个月开会一次共商业务大计外，如遇重大决策时，更特别重金礼聘外国著名专家提供具有决定性之意见，以备参考。古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集思宝益’，故不忖冒昧，特别向总理建议在国务院内，除聘请国内专家参与商议政事外，更须经常礼聘外地专家，尤其是华裔人士返国会商，既可表示礼贤下士，对国家发展大计亦当有所裨益，请加考虑。”

1992年，经过邓小平的过问，中央政府委任刘定中为“香港事务顾问”。1996年3月10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北京联名签署的一份聘书云：“兹续聘刘定中先生为香港事务顾问，任期自1996年3月11日起，至1997年6月30日止。”

香港回归档案，还没有到全部解密的时候。在此，我们节录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鲁平1994年1月31日给刘定中的一封复函：“定中兄：你曾多次向我提及香港的公务员对平稳过渡的重要性，及需要维持他们的士气和对前途的信心。我同意你的看法。你身为港事顾问，希望你继续对此多关注，多做贡献。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随时告知。”

新中国成立后，刘铸伯的长子刘德谱曾经收到毛泽东签名赠送的照片、叶剑英元帅的书信（见上）。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刘铸伯的子孙后人逐渐与故里平湖失去了联系；平湖乡邻碍于“海外关系”这顶吓人的大帽子，也不敢主动与刘铸伯的后人取得联络。深圳河是宝安县与香港之间的界河，这条河很浅，但是，深港两地居民只能站在岸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不敢越雷池半步。

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央提出“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左”倾雾霾逐步得以肃清。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侨务政策。1978年，刘铸伯后人收到宝安县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的一份通知书：

> 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8）3号文件关于侨改户问题的指示精神，经过调查核实，并经宝安县革命委员会批准，确认新南大队生产队刘德普的家庭成分为工商业。特此通知。

宝安县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文件的签署日期为：1978年10月30日。有了这份“通知书”，刘铸伯后人的家庭成分被确认为“工商业”，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土改”时认定的“资本家”。但是，通知书里把“刘德谱”写成了“刘德普”。

这份“红头文件”，显然带有“示好”的意思，但也有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处：开半间豆腐店的升斗小民，土改时划成分，也有被划成“资本家”的，1978年改划为“工商业”；刘铸伯的子孙在香港拥有那么大的企业，如今也被划为“工商业”，看来，要与开半间豆腐店的小老板坐同一张板凳喽。当然，这毕竟是一番情谊，一份来自故乡

的情谊。因为，当时在国内的政治语境与民众的思维里，“资本家”还和“剥削”“罪恶”捆绑在一起，而平湖的父老乡亲悄悄为刘铸伯的子孙辈“松绑”，让他们和豆腐店小老板坐在一张桌子上，这样就好为他们摆上几双碗筷了。

我们前面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个月（1978年11月17日），油麻地小轮公司开通港穗飞翔船，刘镇国、刘定中父子堪称改革开放初期，飞进内地的第一只春燕。此后，他们在经营家族企业的同时，积极投身香港回归祖国大业。

自从1978年10月“家庭成分”被认定为“工商业”之后，刘铸伯的子孙逐渐与故里平湖建立了联系。

通知书



宝安县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1978年签发的刘德谱“家庭成分”认定“通知书”

1984年11月9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递交《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意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在落实华侨私房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多数地方已经基本清退十年内乱期间挤占、没收的华侨私房。但对土地改革中没收、征收和私房社会主义改造中错改造的华侨私房以及代管的华侨私房，长期没有归还。对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反映十分强烈。各级领导必须认识到，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对于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促进四化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尽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提出以下处理意见：一、在土地改革中，农村和城镇没收、征收的华侨私房，一律退还华侨房主；二、在私房社会主义改造时错改造的华侨私房，包括原自住房、改造起点以下的出租房、不属镇建制的集镇的出租房、经机关团体动员出租的借用的房屋、所收房租用于公益事业的房屋、解放后用侨汇购建的房屋被错改造的，应一律撤销改造。改造起点以上的出租房屋，一律不再改造；三、代管华侨私房（含当时去台人员，后转为海外侨胞的房产），参照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处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83〕139号）和本意见的有关规定办理；四、上述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各项规定，适用于处理当时系港澳同胞、外籍华人的私房；五、腾退华侨私房所需经费，按谁占用谁退还的原则，根据隶属关系分别由各单位解决。

《意见》特别提出，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必须继续清除“左”的影响。要加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策教育，做好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华侨政策。由于时间较久，情况复杂，牵涉面广，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工作难度较大。建议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加面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任务较重的地方，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主管这项工作。并组成得力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好。各地在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工作中，要加强调查研究，逐个市、县摸清情况，制订处理方案，分期分批解决，力争在五年内完成。各级领导和城建、房管、财政、侨务部门，都要加强督促检查。各地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进度和存在的问题，请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每半年向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报告一次。

1984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办发〔1984〕44号文件形式转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已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这份"红头文件"发至县、团级。应该说，深圳市（宝安县）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力度较大。1984年12月，刘铸伯长孙刘镇国接到平湖区侨联来函：

刘镇国先生：

兹将刘铸伯先生之留在平湖产业（如念妇贤医院、纪勋劳学校以及圩镇房屋一部分等），拍照呈上，谨供参考。对于上述产业所有权，政府已经批准归您所有，日后具体如何处理，还请您老人家提出宝贵之意见，以供我们参考为荷。

归还刘铸伯家族物业及其在平湖其他产业，是深圳市、宝安县落实新时期华侨政策的一大举措，《深圳特区报》当时曾经做过大幅报道。房产退还时间大约始于1984年，因为这年4月9日，刘镇国睽别几十年的总角之交冯振声从上海写信给他说："今天阅读《深圳特区报》得悉，吾兄在宝安县平湖墟被代管的房屋已退还，真是可喜之事！……"（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国家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在国内与海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是，这一举措也势必触动诸多方面的利益。有鉴于此，198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的通知指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已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落实华侨私房政策是一项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发扬广大侨胞爱国爱乡的热情，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加强领导，做出规划，善始善终地完成这项任务。处理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问题，主要是解决回来定居的一些人的住房问题。少数知名爱国人士回国定居可尽量安排原房居住，但不作为代管房发还。"

《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指出：一、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必须由产权人提出申请。产权人提出申请时交验的证件，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二、对属于应落实政策的土地改革中在农村和城镇没收、征收的华

侨私房，如房屋不只一处或一处面积较大的，可酌情腾退一部分自住房给产权人。三、进行私房社会主义改造时的华侨私房，系指私改时产权人已具备华侨、侨眷（华侨在国内的配偶、子女、父母）、归侨、归国华侨学生身份的私房。属于按照中办发〔1984〕44号文件有关政策规定，确系错改造的，应撤销改造。撤销改造后如何处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四、城市代管华侨私房，系指房屋代管时，产权人已具备华侨身份的私房。处理代管华侨私房时，对原自住房，如产权人确需回国居住，经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可视情况腾退；原自住房不只一处（包括在同一城市或不同城市）或一处面积较大的，经批准可腾退一处或其中一部分给产权人居住。凡属因国家特殊需要不便腾退原房或腾退原房确有困难的，经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可另行安排住房。五、关于对我国四化建设及社会统一大业有较大贡献和在海外有重大影响的华侨，如本人确需自住，要求发还私改和代管的华侨私房，可按适当放宽的原则腾退一处原自住房或一处原以自住为主、建筑结构相连的私房。这部分私房的处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务办公室商房产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六、产权人接受发还其自住房时，原住的公房应同时交还。七、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应按中办发〔1984〕44号文件及本《补充意见》执行。《补充意见》对中办发〔1984〕44号文件的个条款做了明确规定的，以《补充意见》为准。各地规定与此不符的，要自行纠正。

《补充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安排工作。并且特别说明：本补充意见和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工作，不做公开宣传报道。

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刘铸伯家族物业未能及时物归原主，而是长期处于“代管”状态。20世纪末期，刘定中与夫人胡平女士定居加拿大，更是无暇处理平湖祖业。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平湖镇历届班子对于刘铸伯的功德铭记于心，政府曾经多次拨出专款，修缮刘铸伯留在平湖的物业。2001年6月7日，刘铸伯创建的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旧址，被深圳市有关部门列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平湖撤镇改街道，平湖归国华侨联合会致函刘定中：“刘定中先生：您祖辈刘铸伯先生在平湖圩创建的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及三十三间店铺，在1984年落实侨房政策中已退还给你们，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办理好移交接管手续，一直以来由平湖侨联给予代管。希接函后，请委派代理人回平湖办理接管事宜。”

时过不久，平湖归国华侨联合会收到刘定中复函，与平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何小培等具体研究商洽刘定中归国办理祖业移交接管手续一事。2004年1月15日，平湖街道办事处致函刘定中：

刘定中先生：

刘铸伯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对平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他于1916年修建了述昌街、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等，并说服当时广东省府将规划中的广九铁路延伸到平湖。平湖墟镇之雏形，始自铸伯先生这一热爱家乡之壮举。因此，平湖历届政

府及广人群众，对刘铸伯先生一直是感谢、尊重和怀念的。

这些年来，我们派人认真代管先生在平湖的房产，维护铸伯先生的母亲墓坟。2001 年修建凤凰公园时，在坟墓四周划出保护区域，政府当时曾有过修缮之念，但因未能直接征求铸伯先生后代的具体意见而不敢随意动作。2004年，为纪念平湖撤镇改街道，政府耗资百万在平湖广场建造了“百年平湖”铸铜浮雕墙，记载平湖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其中专门以“典基雏形”篇，记叙铸伯先生捐建平湖墟镇的壮举。

获悉您派人办理铸伯先生房产一事，我们将按国家侨务政策，积极配合，完成此事。同时，借“百年华湖”浮雕的落成、平湖迈向城市化之际，热情邀请您回家乡看看，并对修缮铸伯先生母亲之坟等事宜提出意见。

此后，在何小培等当地领导关怀下，平湖街道举办了“刘铸伯先生房屋产权移交仪式”，刘铸伯在平湖的房产物业圆满移交给其继承人。

2005年初，刘定中由加拿大回香港处理商务，何小培等专程赴香港拜会。何小培对刘定中说：“平湖乡亲知道，在旧民主革命时期，阁下曾祖追随孙中山，在推翻帝制，振兴中华，支援革命，兴教救国，禁烟禁毒，以及支援家乡建设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巨大贡献；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先生祖父也为毛主席所敬仰；乡亲更清楚，先生成长后，继承父业，在经营油地小轮公司的漫长岁月里，曾将大量到香港谋生的乡亲纳为自己公司员工，服务香港市民，有效解决其生活来源，给予再造之恩；九七来临，为使香港能顺利回归，阁下毅然放弃自己的事业，光荣出任港事顾问，频频穿梭于京穗港各地，与高层人士商洽绸缪，为国为港做出了新的贡献。先生祖孙四代根植民心，饮誉乡梓。”

来自乡邦的慰问令刘定中十分感奋，他与客人谈及百年家族史，谈到自己关心的深港一体化愿景。在何小培的记忆里，刘定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胸襟坦荡，举止斯



何小培主持刘铸伯房屋产权移交仪式



刘铸伯曾孙刘定中（右）与何小培

文，言辞凿凿，处处流露出爱国爱乡情愫，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平湖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与平湖同乡会、平湖侨联负责人此行，还参观了位于荔枝角道的原“刘敦义堂”旧址，当即决定拨款予以修缮。

2005年11月，平湖街道办事处致函刘定中：“如今，居港乡民日益增多，他们出于对故乡的眷恋，提议成立香港平湖乡会，为旅居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构建联络、咨询家乡之平台。对此，我处极为赞赏和支持，已拨款二十余万元，将荔枝角道原‘刘敦义堂’旧址装修一新，为‘香港平湖同乡会’会址，并定于今年12月4日在香港举行成立大会。目前筹备工作即将就绪。乡亲一致认为，该会要有一位威望最高、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士出任永远荣誉会长，此人非先生莫属。我处极赞成此意见，希勿推却，敬候复音。”

在这封信里，他们还谈到：2005年10月，凤凰山一带被国家地矿部批准为全国首批国家级“矿山公园”，清奇坑守真园旧址作为矿山公园的重要景点，将永久保留并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至于园中之楼台如何修复及有关事宜，还望刘定中提供宝贵意见。“‘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平湖父老乡亲企望先生能回乡观光视察，一叙乡情。”

香港平湖同乡会成立后，刘定中与叶浩荣、刘聚荣、刘聚贵、刘聚富、刘培龄、刘伟林、欧少英（女）等当选为永远荣誉会长。何小培、钟春平、王泽恩等当选为名誉会长。

刘定中继承祖业，大半生叱咤商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刘镇国、刘定中父子油麻地小轮公司开通香港——广州飞翔船，堪称改革开放初期飞进内地的第一只春燕。此外，刘定中晚年曾经赋诗遣怀，且录一二：

自古成败论英雄，周瑜把酒迎东风。
爱听长江春逝水，雪送孤帆一梦中。

寒云又是汉时春，泪洒征袍青海流。
铁骑纵横归寂寞，长沙万里不成愁。

叶落长城已秋深，故人欢笑何处寻。
兄弟相逢君不在　恩仇泯灭寄丹心。

有道是“言为心声”，又有道是“诗无达诂”，我们不准备对该诗做具体解读。但该诗有则小注：“廖公曾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说‘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由此可知，刘定中对于廖承志的知遇之恩终生铭记在心。

刘定中与夫人胡平女士现定居加拿大，出版有回忆录《明灯》等著述，一直关心香港未来和家乡建设。2005年3月28日，他在给平湖街道办与有关部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先祖刘铸伯先生之曾孙刘定中，系香港居民，两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任命的‘港事顾问’。先祖刘铸伯先生当年在平湖镇曾建造‘念妇贤医院’一座，治病教人，造福桑梓。1984国家落实侨房政策时，已归还‘念妇贤医院’。我已年过花甲之年，念及先祖乐善好施，济世救人之宏愿，故而恳请贵政府及有关部门同意并协助我等重开‘念妇贤医院’，也使我能为父老乡亲尽微薄之力。因世事变迁，当年的‘念妇贤医院’已停业，今日我等想暂拟作‘念妇贤门诊部’复业。望贵府有关部门能给予批准及办理牌照为谢，拜托！”

平湖街道办组织有关部门对念妇贤医院进行了一番修缮，修旧如旧，保留了这座具有纪念意义的老建筑原有风貌。



修葺一新的纪劬劳学校

凤凰山下，凤凰大道两旁遍植黄花风铃木，这种原产于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的树木，在刘铸伯的故里蔚成一道风景。

今年（2016年）12月31日，是刘铸伯创建的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正式落成一百周年。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旧址，2001年6月被深圳有关部门列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平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

任黄惠波告诉笔者：在战乱年代、动荡岁月，刘铸伯创建的学校、医院及其家族墓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令人扼腕叹息；平湖父老乡亲与平湖街道历届班子成员，一直筹谋早日修复刘铸伯家族墓，修葺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等承载荣光的历史性建筑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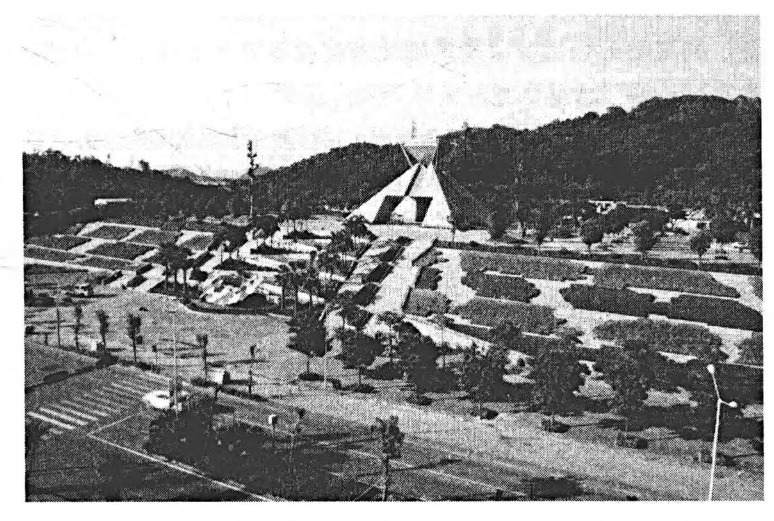
黄惠波说：改革开放数十年间，深圳一直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前沿裂变地带，刘铸伯的故里平湖自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深知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把乡邦先贤、文献文物视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它承载悠久的文明，传承历史记忆，维系族群精神，延续城市文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怎样让乡邦先贤从似是而非的传说中“站起来”，让乡邦先贤的言行泽被后世、惠及远人，怎样深翻细作“道德沃土”，让“文化息壤”用之不竭，助推社会和谐发展进步，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未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平湖街道办拟与有关部门联手，正在规划建设刘铸伯纪念馆等永久性文化设施。



黄惠波等在纪勋劳学校旧址现场办公

黄惠波告诉笔者：位于平湖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青奇坑的刘铸伯夫妇墓，及其祖母墓、母亲墓以及享堂等，亦在修葺恢复之中，即将成为深圳的一处人文景点。

刘铸伯造福乡梓的大手笔之一，就是清朝末年，他利用自己盛极一时的声誉与广泛的人脉，促成省港大吏同意修改最初设计的广九铁路行经线路图，并由他负责出资在家乡平湖创设火车站（见本书第七



平湖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刘铸伯家族墓葬所在地）

章）。关于此事，《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写道："平湖者，先人之庐墓在焉。先考既为国人谋，尤笃爱其乡。广九铁路方建设时，先考请于省吏，将原之路轨改近平湖，并于其地设车站，乡人称便，而路亦不纡。乡农贫苦，时以子妇质钱而困于重息，子女多没为奴婢，先考悯之，乃创设昌裕公司，储资出贷，取息甚微，农人咸称颂不置。"民国时期的平湖，曾经被誉为"模范乡镇"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平湖更是成为惠东宝（今称"深莞惠"）交通枢纽。

在历史新时期，平湖火车站是广深铁路、京九铁路、平南铁路及平盐铁路的四等站，由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管辖。但是，随着广深铁路历次提速，停靠平湖站的旅客列车数量越来越少，进入21世纪初，广深线只剩下N651/N652次和一对慢车停靠，长途列车也有前往岳阳的N722次在这站停靠。随着广深铁路最后二对普快列车N651/ N652次于2006年停运及N722次取消停靠平湖站后，刘铸伯昔年规划创设、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平湖火车站，从此再无旅客列车停靠，不再办理旅客乘降、行李、包裹托运，偶尔只有一些慢车在平湖站待避高速列车停留。

2009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正式确定将深圳、东莞和惠州三地，作为深莞惠经济圈和珠三角一体化的重点区域。2014年10月，深莞惠经济圈再次"扩容"，广东省政府正式批准河源、汕尾加入行列，形成现有的深莞惠（3+2）经济圈格局。目前，深莞惠（3+2）经济圈已进入初步的融合阶段。

为了破解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深圳"西强东弱、西密东疏、西重东轻"发展不均衡局面，深圳提出了"东进战略"，首要目标是解决自身发展的不均衡，然后逐步推进区域发展一体化问题。东进战略不但要解决自身发展不均衡，还要解决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

而在深圳实施"东进战略"、打造"东部中心"的大背景下，毗邻东莞的平湖街道发挥自身的区位、交通、资源、后发、历史人文五大优势，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商务物流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这为平湖打造成深圳实施"东进战略"的重要桥头堡打下坚持基础。

2013年初在深圳"两会"上，黄翔、严锡培等5位市人大代表建议在平湖增加动车停靠营运站点。建议称，动车在深圳平湖增设站点，既有利于加快深莞惠一体化进程，可形成深圳与东莞、广州城市交通的对外衔接，又有利于缓解平湖片区交通拥堵压力，提升平湖片区综合竞争力。市交委答复称："建议理由充分，思路清晰，极具前瞻性和可行性。平湖作为深圳8个城市组团中心之一，完善广深铁路平湖站的客运设施，增设动车停靠运营点，有利于促进平湖社会经济发展，加快特区一体化和深莞惠一体化的进程。"这份答复称："平湖站规模为3台8线，原有基础设施良好，具备一定的客运改造条件。目前该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已经通过铁路行业审查，并已完成初步设计，正进行初步设计审查工作。"

2014年底，平湖火车站停运8年后正式启动改造工程。广深铁路设置平湖城际客运

站之后，规划中的深惠城际线、地铁10号线、地铁18号线等接驳平湖火车站形成综合交通枢纽。此前，平湖火车站改造工程因工程量增加等原因导致工期延长，平湖火车站的重启时间表一再推后。目前整体改造工程已经进入尾声，火车站前的主体建筑“修旧如旧”，站前遮阳雨棚崭新亮丽、候车厅内整洁敞亮。

据了解，平湖火车站改造后，不仅可以通往广州、罗湖，今后还将连接厦深铁路，以后去汕头、潮州、厦门，都可以在平湖坐动车。根据此前有关部门的规划，深惠城际铁路也计划接进平湖火车站，《深圳市轨道交通规划（修编）》调整了深惠城际铁路的线路走向，由前海妈湾沿原平南铁路至平湖、穿越龙岗中心城往惠城方向，在深圳段约70公里，设站约10座。同时，在平湖火车站的基础上规划平湖交通枢纽，除了两条城际铁路外，还有两条城市地铁。地铁10号线（福田口岸—平湖中心站）计划纳入地铁三期建设，并且在平湖火车站设站；地铁13号线（大空港—平湖站）也将在平湖火车站设站。

据黄惠波介绍，平湖火车站预计7月初完工，车站内部施工已经进入尾声，启用后将开行广深和谐号动车组，具体开通时间和开行线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布。平湖将结合火车客运站重启运营，逐步将平湖片区打造成集广深铁路、深惠城轨及数条地铁线汇集的轨道交通枢纽。届时，未来从平湖去福田，可乘坐地铁10号线，20多分钟到达；过罗湖可乘坐地铁17号线，同样20多分钟可到达；去南山、前海可乘坐深惠城轨，半小时到达；往广州、东莞可乘坐广深动车。黄惠波说：“毫无疑问，在可预见的将来，刘铸伯当年规划建设的百年老站——平湖火车站，即将重现华彩、迎来新生，再次为他的故里平湖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改造后面貌一新的平湖火车站

附录　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

先考讳鹤龄，字守真，铸伯其号也，世为宝安县平湖乡人。先王父朝瑞公，服贾香港，挈眷居焉，以丁卯年诞先考于港寓。先考生而岐嶷，性聪颖，甫七岁即慕学，以家贫无力就傅。偶与群儿戏于衢，睹群儿挟书赴塾，心好之，归而吁朝瑞公，愿就读；公乃命肄业于西营盘冯富义塾，遂苦学不辍，试辄列前茅，塾师怜而嘉之。十二岁，先王父见背，家益贫，祖慈事女红，恒达旦不寐，始克具修脯。未几，兼习旁行文，益自刻苦，试亦恒冠其曹，获奖免费生。旋入皇仁书院，所学益大进，试辄获奖金，修脯衣履，皆有以自给，祖慈乃稍纾。十七岁，毕业归，自是而先考遂献身社会中矣。

香港隶英版图，而我华人之侨居于是者，凡数十万，故政治之良楛，咸我华侨身受之。中西政俗互异，港吏以为善者，我华侨或不乐受，先考深有见于此，即慨然思有以自效。自毕业后，浮沉于士商者十年，而学行言论，已翘然异于众，中西人士咸倚重之，每遇艰巨，皆引先考为助。前后历任地方要职以数十计，靡不竭其心力所能至，务使人蒙其福而后即安。

当其被选为东华医院总理也，同时被任为香港洁净局员，会疫甚，港吏防传染，昕夕遣吏役按户籍察，遇病者即舁入医院，疗与习违，入者多死，华侨惮焉，欲迁入内地，又为法令所禁。且患疫之家，例须熏洗，辄连及十余户，家具摧残，不可以目。居民畏扰，至有弃尸不顾，伺隙逃去者，全市萧条如游墟墓。先考恻然伤之，具以闻于港吏，且与洁净局力争。当熏洗时，先考必亲往监视，其不应洗者禁勿洗，其应洗者禁勿扰，自旦达暮，奔走汗喘，略无倦容，吏役咸戢戢受约束，故民居市肆多获保全。且力请港吏将禁迁之例革除，民始安集，而市肆渐复旧观。先考在局凡十二年，凡局例之不便者，必据理辩争；争之不获则奋髯抵几，未尝少屈，务得当乃已，故华侨之阴受其赐者，赜不胜举，此则其较著者也。

当其被任为定例局员也，所以为华侨谋者，益复奋厉，遇事靡所阿附，崭然以风骨自见，一如其在清净局时。先考侨港数十年，于港中利病得失，知之最审，且居恒于政治、法律覃精研思，遇事剖析，毫芒曲折毕赴，闻者称为辩才，故于立法行政，多所献替，当轴者莫能难。历任凡九年，全港华侨，其以先考一言而获享安全之福者，亦赜不胜举，局外人固不尽知之也。在局同人，皆仰之如泰斗，遇疑难事，咸乐就商榷，先考靡不竭诚相告，有不协者面折之，友邦人士咸敬惮焉。

顾先考虽生长香港，自学成后，固未尝一日忘祖国。有清戊子，应台湾巡抚刘中丞之聘，任淡水西学堂教员，兼洋务委员，勤敏英轩，克称厥职，刘中丞称之。越二年，洊充总教员。未几，以费绌辍办，乃返港。越乙巳（1905年），应北洋大臣杨制府之招，任渔业总办兼洋务会办，而卫生局、巡警局皆资佐理。然其时国是未定，财力亦绌，先考以大纲不具，徒从事一二节目，终未有能济者，遂决然引退。未几，农工商部

某巨公屡电促入都，将任以要职，辞不就。

民国之初，粤吏欲任以财政厅长，亦辞不就。先考语人曰："吾性不乐仕进，但欲于国事有所补救耳，顾以格于时势，既一再试而不效，屡出亦复何补？故终不愿为冯妇，非敢以是鸣高也。"闻者韪其言。先考无党见，顾盱衡时变，往往私忧窃叹，于兴革损益，多所主张。每有发抒，不曲徇时俗，亦不为过高之论，务求平实可行，一时士大夫多传述之。元首及疆吏闻其贤，屡以礼聘为顾问，先考以职在宾友，无官守言责，未尝不勉就焉，然事权不属，亦聊自效于万一而已。然先考之为祖国谋者，固不必规规于政途中也。

当有清季世，我华人知立国之道，莫先于教育。其时各省，学校方始萌芽，先考乃与爵绅嘉道理先生，集资二十余万，设育才书社于香港，分设于广州、上海，以教华人子弟。广州之有公立学校，自先考始也；其后，港立大学集资至七十余万，亦先考赞助之力为多，华人子弟其英秀者，多就学焉。两校成绩，至今固彰彰也。

外人诋吾华为无教国，识者引为大戚。清季升孔子为大祀，许庶民皆得祀孔子，使孔子德意，有以感被夫人人之心，先考乃倡设孔圣会于香港，附设义学校三十余所，以为传宣孔教之地，就学者逾千人。海外之有孔圣会，亦自先考始也。自时厥后，薄海内外，闻风回应。论者谓孔教不坠，先考与有力焉，盖敬教劝学，一以振兴祖国为主旨，先考之素志然也。

平湖者，先人之庐墓在焉。先考既为国人谋，尤笃爱其乡。广九铁路方建设时，先考请于省吏，将原定路轨改近平湖，并于其地设车站，乡人称便，而路亦不纡。乡农贫苦，时以子妇质钱，而困于重息，子女多没为奴婢，先考悯之，乃创设昌裕公司，储资出贷，取息甚微，农人贤称颂不置。吾国无市政，先考乃请于省吏，小试于其乡，创市场，设学校，立工厂，建医院，附以农林实业，规模粗具，于时人所称模范村者，庶几近之，其施于乡有如此者。

其间，在香港设华人永远坟场，设恤孤寡局，设栖流所，设种痘局，设公立医局，设华商总会，设东莞商会，设宝安商会，在油麻地设广华医院，凡所以为华侨谋者，悉不遗余力。自余若中外凶灾，莫不竭力捐募，以资赈恤。民国二年，汉阳惨罹兵祸，先考以义当急赈，毅然发公储赈款十五万，发付灾区，存活尤众。有持异议者怵以危词，亦屹不为动。闻者嘉之，谓此事诚出于仁爱，而识力之坚定，尤不可及也。联军战起，吾国参焉，先考援国民外交之义，协大有银号，赠联军以飞机一乘，已则赠以红十字摩托车一辆，而中英邦交益加亲睦，论者咸以为识大体云。

先考前后历任治安局员，国防局员，公立医局副局长，保良局副局长，东华医院常年顾问，保良局总理，搜查稽审值理，卫生局则例审查员，粮食价值稽核员，征收轮船战务用品值理，战务恤款值理兼干事员，教育研究值理员、研究值理，考查工程司局员，法例审查员，公项稽核局员，孤寡恤款干事值理，英国钦设工艺制造研究会会员，北般乌工艺制造会永远会员，华人永远坟场干事值理，皆能衡量事理，审查情势，调剂中外，而克协其平，故万端坌集而事无不济，要皆不及备述，谨述其荦荦大者。然责重

事繁，心力交瘁，先考之病，伏于此矣。

先考素性恬淡，徒以荣亲故，纳票得同知。寻以刘中丞奏保，加知府衔，赏戴蓝翎。乙卯，顺直赈捐出力，杨制府奏保，以道员候选，加盐运司衔，赏换花翎。鼎革后，以有功民国，奖给四等嘉禾章，寻晋给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以襄募内国公债，传令嘉奖，赏给“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等匾额。以襄办港事迭著劳绩，英廷传谕嘉奖，并奖给二等宝星，然使命在道，先考已不及拜命矣。

食货者，国之大命，故先考虽致力群事，而究以货殖为本业，先后创设巨肆凡十有二，皆归先考主持。治事之暇，亦间事著述。以中西异礼，交涉恒衔，召侮取讥，衅隙斯伏，乃著《自治须知》一卷、《西礼须知》一卷；社会主义，用济不均，偏激失中，遗祸滋大，乃著《社会主义平议》一卷，皆已刊行于世。

今年春，海员罢工事起，相持久不下，商民交困，群推先考出任调停。先考为华侨大局计，不惮趾疲舌敝，屡向所司力争，局外亦多有不及知者，众情不谅，疑谤交集，迨事获解，而先考之心力益瘁矣。夏历四月五日，饯世伯何绅棣生之行。归，尚与众孙嬉；未几，登楼呼腹痛，家人扶之卧，则痛益剧。众医断为胃癌，谓初患可治，溃则不治，今登楼而痛，殆癌溃也。越二日，卒于港寓，时为壬戌四月七日，享年五十有六，而先考遂弃不孝等而长逝矣！呜呼，痛哉！越五日，权厝灵柩于东华医院义庄，以五月二十日归葬于平湖。

不孝等苫块余生，昏迷失次，何敢有所觏缕？然失今不述，一旦溘先朝露，则先考之性行，不免有传闻异辞之惧，用敢腼然偷息，谨述梗概，用以告哀，伏维矜鉴。

不孝 刘富宗 刘荣宗 刘耀宗 刘光宗 泣述

叶兰泉 填讳

说　明

"行述"又称"行状"（亦谓之"事略"），这类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行述"或"行状"的写作始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唐代则规定凡重要官员去世，都由家人简录其生平行事，报送中央修史机构存档。行状之撰写遂大增，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写，也有出钱委托当时著名文豪代写，文笔多有溢美之辞。

刘铸伯逝世后，其子刘富宗（刘德谱）等1922年撰《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详述刘铸伯生平事迹，是一篇较翔实可靠的"刘铸伯小传"，史料价值颇高。东南亚爱国华侨吴醒濂所撰《刘君铸伯传》（收入其编著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出版），即根据这篇《行述》裁剪而成。深圳市博物馆蔡惠尧先生作《深港闻人刘铸伯：生平、志业与意义》，承蒙香港岭南大学荣誉教授刘蜀永先生提供《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影印件；我们在写作《刘铸伯传》、辑录《刘铸伯文集》过程中，又承蒙蔡惠尧先生提供此影印件，现将《行述》点校稿及影印件附录于书后，以便读者得窥全豹，特致谢忱。

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影印件）

先考鑄伯劉公府君行述

先考諱鶴齡字守真鑄伯其號也世為寶安縣平湖鄉人　先王父翱瑞公服賈香港挈眷居焉以丁卯年誕　先考於港寓　先考生而岐嶷性聰穎甫七歲即慕學以家貧無力就傅偶與羣兒戲於衢觀羣兒挾書赴塾心好之歸而顯　翱瑞公願就讀　公乃命肄業於西營盤馮富義塾遂苦學不輟試輒列前矛塾

一

師憐而嘉之十二歲　先王父見背家益貧祖慈事女紅恆達旦不寐始克具脩脯未幾兼習旁行文益自刻苦試亦恆冠其曹獲獎免費生旋入皇仁書院所學益大進試輒獲獎金脩脯衣履皆有以自給　祖慈乃稍紓十七歲畢業歸自是而　先考遂獻身社會中矣香港隸英版圖而我華人之僑居於是者凡數十萬故政治之良楛咸我華僑身受之中西政俗互興

港吏以為善者我華僑或不樂受　先考深有見於此即慨然思有以自効自畢業後浮沉於士商者十年而學行言論已翹然異於衆中西人士咸倚重之每遇艱鉅皆引　先考為助前後歷任地方要職以數十計靡不竭其心力所能至務使人蒙其福而後即安當其被選為東華醫院總理也同時被任為香港潔淨局員會疫甚港吏防傳染昕夕遣吏役按户稽察遇病

二

者即舁入醫院療與習違入者多死華僑憚焉欲遷入內地又為法令所禁且患疫之家例須薰洗輒連及十餘户家具摧殘不可以目居民畏擾至有棄屍不顧伺隙逃去者全市蕭條如避墟墓　先考惻然傷之具以聞於港吏且與潔淨局力爭當薰洗時　先考必親往監視其不應洗者禁勿洗其應洗者禁勿擾自旦達暮奔走汗喘略無倦容吏役咸戢戢受約束故民

居市肆多藉保全且力請港吏將禁違之例革除民始安集而市肆漸復舊觀　先考在局凡十二年凡局例之不便者必據理辯爭爭之不獲則奮髯抵几未嘗少屈務得當乃已故華僑之陰受其賜者睹不勝舉此則其較著者也當其被任為定例局員也所以為華僑謀者益復奮厲遇事靡所阿附嶄然以風骨自見一如其在清淨局時　先考僑港數十年於港中利病

三

得失知之最審且居恆於政治法律章精研思遇事剖析毫芒曲折畢赴聞者稱為辯才故於立法行政多所獻替當軸者莫能難歷任凡九年全港華僑其以　先考一言而獲享安全之福者亦睹不勝舉局外人固不盡知之也在局同人皆仰之如泰斗遇疑難事咸樂就商權　先考靡不竭誠相告有不協者面折之友邦人士咸敬憚焉顧　先考雖生長香港自學成後

國未嘗一日忘祖國有清戊子應台灣巡撫劉中丞之聘任淡水西學堂教員兼洋務委員勤敏英幹克稱厥職劉中丞亟稱之越二年游充總教員未幾以費絀輟辦乃返港越乙巳應北洋大臣楊制府之招任漁業總辦兼洋務會辦而衛生局巡警局皆資佐理然其時國是未定財力亦絀　先考以大綱不具徒從事一二節目終未有能濟者遂決然引退未幾農工商部

四

某鉅公屢電促入都將任以要職辭不就民國之初粵吏欲任以財政廳長亦辭不就　先考語人曰吾性不樂仕進但欲於國事有所補救耳顧以格於時勢既一再試而不效屢出亦復何補故終不願為馮婦非敢以是鳴高也聞者韙其言　先考無黨見顧盱衡時變往往私憂竊歎於興革損益多所主張每有發抒不曲徇時俗亦不為過高之論務求平實可行一時士

大夫多傳述之元首及疆吏聞其賢屢以禮聘為顧問　先考以職在賓友無官守言責未嘗不勉就焉然事權不屬亦聊自効於萬一而已然　先考之為祖國謀者固不必規規於政途中也當有清季世我華人知立國之道莫先於教育其時各省學校方始萌芽　先考乃興爵紳嘉道理先生集貲二十餘萬設育才書社於香港分設於廣州上海以教華人子弟廣州之

五

有公立學校自　先考始也其後港立大學集貲至七十餘萬亦　先考贊助之力為多華人子弟其英秀者多就學焉兩校成績至今固彰彰也外人詆吾華為無教國識者引為大戚清季升孔子為大祀許庶民皆得祀孔子使孔子德意有以感被夫人人之心　先考乃倡設孔聖會於香港附設義學校三十餘所以為傳宣孔教之地就學者逾千人海外之有孔聖會亦

自　先考始也自時厥後溥海內外聞風嚮應論者謂孔教不墜　先考與有力焉蓋敬教勸學一以振興祖國為主旨　先考之素志然也平湖者先人之廬墓在焉　先考既為國人謀尤篤愛其鄉廣九鐵路方建議時　先考請於省吏將原定路軌改近平湖并於其地設車站鄉人稱便而路亦不紆鄉農貧苦時以子女質錢而困於重息子女多沒為奴婢　先考憫之

六

乃創設昌裕公司儲貲出貸取息甚微農人咸稱頌不置吾國無市政　先考乃請於省吏小試於其鄉創市場設學校立工廠建醫院附以農林實業規模粗具於時人所稱模範村者庶幾近之其施於鄉有如此者其間在香港設華人永遠墳場設恤孤寡局設栖流所設種痘局設公立醫局設華商總會設東莞商會設寶安商會在油麻地設廣華醫院凡所以為華僑謀

者亦不遺餘力自餘若中外凶災莫不竭力捐
募以資賑恤民國二年漢陽慘罹兵禍　先考
以義當急賑毅然發公儲賑款十五萬齎付災
區存活尤衆有持異議者怵以危詞亦屹不為
動聞者嘉之謂此事誠出於仁愛而識力之堅
定尤不可及也聯軍戰起吾國參焉　先考援
國民外交之義協大有銀號贈聯軍以飛機一
乘已則贈以紅十字摩托車一輛而中英邦交

七

益加親睦論者咸以為識大體云　先考前後
歷任治安局員國防局員公立醫局副局長保
良局副局長東華醫院長年顧問保良局總理
搜查稽審值理衛生局則例審察員糧食價值
稽核員徵收輪船戰務用品值理戰務恤款值
理兼幹事員教員研究值理考查工程司局員
法例審察員公項稽核局員勸募恤款幹事值
理英國欽設工藝製造研究會會員此般為工

藝製造會永遠會員華人永遠墳場幹事值理
皆能衡量事理審察情勢調劑中外而克協其
平故萬端叢集而事無不濟要皆不及備述謹
述其犖犖大者然責重事繁心力交瘁　先考
之病殆伏於此矣　先考素性恬淡徒以榮親
故納粟得同知尋以劉中丞奏保加知府銜
賞戴藍翎乙卯順直賑捐出力揚制府奏保以
道員候選加鹽運司銜　賞換花翎鼎革後以

八

有功民國　獎給四等嘉禾章尋晉給二等大
綬嘉禾章二等寶光嘉禾章以襄募內國公債
傳　令嘉獎　賞給樂善好施急公好義等扁
額以襄辦港事叠著勞績英　廷傳諭嘉獎并
獎給二等寶星然使命在道　先考已不及拜
命矣食貨者國之大命故　先考雖致力群事
而究以貨殖為本業先後創設鉅肆凡十有二
皆歸　先考主持治事之暇亦閒事著述以中

西異禮交涉恆懲召侮取譏釁隙斯伏乃著自治須知一卷西禮須知一卷社會主義用濟不均偏激失中遺禍滋大乃著社會主義平議一卷皆已刊行於世今年春海員罷工事起相持久不下商民交困羣推 先考出任調停 先考為華僑大局計不憚趾瘃舌敝屢向所司力爭局外亦多有不及知者衆情不諒疑謗交集迨事獲解而 先考之心力益瘁矣夏曆四月

九

五日餞世伯何紳棣生之行歸尚與羣孫嬉未幾登樓呼腹痛家人扶之卧則痛益劇羣醫斷為胃癰謂初患可治潰則不治今登樓而痛殆癰潰也越二日卒於港寓時為壬戌四月七日享年五十有六而 先考遂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越五日權厝靈柩於東華醫院義莊以五月二十日歸塟於平湖不孝等苫塊餘生昏迷失次何敢有所覶縷然失今不述一旦遺先朝露則 先考之性行不免有傳聞異辭之懼用敢覼縷然偷息謹述梗概用以告哀伏維矜鑒

不孝劉宗富榮耀光泣述

葉蘭泉填諱

参考书目

刘鹤龄：《自治须知》，1907年。

刘铸伯、谭汝俭：《社会主义平议》，香港华商总会报社出版，1919年。

屈臣氏：《妙药同人》，光绪七年（1881年）。

屈臣氏：《惠济全书》，光绪十七年（1891年）。

刘中国、余俊杰编：《刘铸伯文集》，花城出版社，2016年。

《香港华字日报》

《祖国文明报》

《孔圣会旬报》

《孔圣会星期报》

《中西教会报》

《华商总会报》

《新民丛报》

《申报》

《两广官报》

《广东省财政月刊》

《大公报》

刘师复：《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

唐仕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师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一大”前后广东的党组织》，内部出版物，1981年。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

陈公博著、韦慕庭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91。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三联书店，

2012年。

佚名：《反对蓄婢史略》，1933年。

胡礼垣：《胡翼南先生全集》，胡氏家印本，1917年。

朱英和、沈琼楼：《清末广州河南两间私立学校——育才书社和南武公学》。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十辑，内部发行，1963年。

段力佩：《育才中学的历程》，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郝延平著，李荣昌、沈祖炜、杜恂诚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施其乐著、宋鸿耀译：《历史的觉醒——香港社会史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

《督院张批柬劝业道详平湖振兴公司总董刘鹤龄等拟在湖乡建设商场缘由文（附件一）》，《两广官报》编辑所，《两广官报》第十四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

刘富宗等：《先考铸伯刘公府君行述》（不署年月），蔡惠尧提供。

宝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

丁新豹：《善与人同：与香港同步成长的东华三院（1870—1997）》，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

王齐乐著：《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6年。

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 公司，1997 年。

弗兰克·韦尔什著，王皖强、黄亚红译，《香港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

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 1994年。

李东海：《香港东华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中国文史出版社

吴醒濂：《香港华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书局， 1937年。

周佳荣、钟宝贤、黄文江：《香港中华总商会百年史》，香港中华总商会， 2002。

东华三院教育史略编纂委员会：《东华三院教育史略》，香港东华三院壬寅年董事局出版，1963年。

保良局百年史略编辑小组委员会：《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保良局， 1978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杨耀林：《深圳近代简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刘润和：《香港市议会史：从洁净局到市政局及区域政局》，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2002年。

刘泽生：《香港古今》，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年。
刘仲德：《劫后集》（非公开出版物）。
郑宏泰、黄绍伦：《香港大老——何东》，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
彭全民：《深圳掌故漫谈》，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5年。
蔡惠尧：《深港闻人刘铸伯：生平、志业与意义》，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50期，2013 年 12月。
《话说平湖——百年转型中国的小镇志》，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
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
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合编：《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百年大事记》（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1 9 8 2 年 6月。
邓家宙编著，陈觉聪校点：《香港华籍名人墓铭集（港岛篇）》（香港史学会丛书），2012年。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清实录〉广东史料》（1—6），广东地图出版社，1995年。
中共惠州市委统战部、中共惠州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东征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区志坚、彭淑敏、蔡思行：《香港记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黄树森著：《黄说》，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
黄树森、于爱成、夏和顺、刘中国：《深圳九章》，花城出版社，2008年。
汪开国、刘中国：《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海天出版社，1997年。
舒国雄、刘中国等：《明清两朝深圳档案文献演绎》（四卷本），花城出版社，2000年。
舒国雄、刘中国等：《民国时期深圳档案文献演绎》（四卷本），花城出版社，2002年。
舒国雄、刘中国等：《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四卷本），花城出版社，2004年。

后　记

刘中国

1996年夏天，曾经有过一个到平湖工作的机会。时任副书记的姚任校友找我谈话，仔细描绘了平湖的发展蓝图，我确实心有所动。姚任校友学的是历史专业，他建议我写完《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之后，好好写写平湖乡贤刘铸伯，因为这位乡贤实乃深港文化交流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是，当时平湖的交通不像如今便利，而我又离不开图书馆，终于还是和平湖失之交臂。

就是那次平湖之行，在凤凰山青奇坑捡了一块粗陶片，虽然来深圳后搬了好几次家，一直舍不得扔掉。我把它放在书桌对面的书架上，作为一个无声的“提醒”，提醒自己欠了平湖一个人情。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早点写出《刘铸伯传》，编一本《刘铸伯文集》，也陆续收集了一些文献。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查找资料困难重重。这情景，犹如纪勋劳学校首任校长刘彭龄《过古皮城》一诗所云：“城市蜿蜒尚有形，行人至此望郊坰。浮瓜沉李千年远，谷变陵迁几度经。射雉台荒秋草白，坠珠楼废野磷青。停车拟考前朝事，碑卧斜阳不辨铭。”好在，我们并没有打退堂鼓，而且先后得到了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大副主任何小培先生，平湖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主任黄惠波先生的支持。小培先生是我在龙岗区文化局工作时的老领导，惠波先生是我多年的文友、诗友，他们都对平湖这片土地充满深厚的感情，认为刘铸伯是深圳的一面文化品牌，值得大书特书。

五年前的夏天，我邀请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苏炜先生来深圳讲学，顺便请他题写了书名——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提醒”。

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主席刘斯奋先生，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黄树森先生，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原负责人苏炜先生，中山大学中文系黄天骥教授、金钦俊教授、易新农教授、叶春生教授、谭步云教授、王坤教授，中山大学图书馆彭绮文馆员、张梅芳馆员，中山图书馆倪俊明副馆长、陈杏馆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第四局局长宋寒松先生，新华社国内部今日新闻编辑室

主任周立宪先生，《光明日报》副总编陆先高先生，《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梁永琳先生，《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先生，《羊城晚报》原副总编李树政先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丘克军先生，《南方日报》资深编辑陈美华女士、梁建华先生，《广州日报》资深记者施绍宗先生，深圳市委原副书记李意珍先生，深圳市原常务副市长吕锐锋先生，深圳市委原宣传部长王京生先生，深圳市文化局原局长苏伟光先生，深圳市档案局原局长舒国雄先生，深圳市社科院院长张骁儒先生，深圳市史志办主任黄玲女士，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局长张合运先生、副局长钱强先生、巡视员柴凤春女士，深圳市宝安区区长姚任先生，深圳巴士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志龙先生，深圳市龙岗区人大原副主任何小培先生，深圳市龙岗区副区长黄惠波先生，平湖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主任张志华先生，龙岗区委宣传部文明办副主任张棣女士，平湖街道办宣传部部长尉晋英女士、副部长边疆红女士、调研员陈建平先生，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商会会长李振声先生，平湖侨联主席王桂庆先生，香港平湖同乡会会长刘鉴荣先生、秘书长莫顺发先生，平湖作家李建国先生、薛国良先生，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士芳先生，深圳市博物馆副馆长蔡惠尧先生，深圳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彭全民先生，香港历史档案馆政府档案处档案主任刘善君女士，香港理工科技大学图书馆馆员王小雷女士，香港名医严丽明女士，香港书友梁家荣先生，《深圳商报》资知记者夏和顺先生，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于爱成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薛国林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在鸣教授、古远清教授、李军湘教授，刘铸伯曾孙刘定中先生的外甥邬少洪先生，平湖纪劬劳学校首任校长刘彭龄（字紫东）长孙刘旦华先生，平湖中学校长廖波先生，“龙城文学社”发起人何小培、黄惠波、赖房千、魏琦、温波、陈少鹏先生，以及国家图书馆、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深圳市档案馆、深圳市图书馆、招商局历史博物馆、深圳市白坭坑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鹅公岭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新南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山厦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辅城坳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良安田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平湖新木股份合作公司、深圳市上木古股份合作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或者惠借珍贵的图书报刊资料，或者代为查阅复制历史文献，或者提供线索、答疑解难。2001年11月22日，刘善君女士寄来复制的历史档案文献，还写了一份便条，一转眼15年就这样过去了。2005年邬少洪先生专程抵达深圳，送来一批珍贵的照片，一转眼也十几年了。

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借鉴吸纳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彭全民学兄20世纪80年代写出长文《爱国港胞刘铸伯》，他是最早系统介绍刘铸伯生平的学者。蔡惠尧先生2013年12月发表于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50期上的长篇论文《深港闻人刘铸伯：生平、志业与意义》，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刘铸伯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学术论文。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两本书稿终于杀青。金钦俊教授今春来寒舍小住，校对他的文集《记忆树上的杂花》之余，审阅了这两部书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金老师把玩弟子二十年前在青奇坑捡到的粗陶片（坛子底），建议交给编辑，看看能不能作为封底插图，让读者去想象坛子当初的模样。

窗外，春雨淅淅沥沥。金老师谈起美国诗人沃莱斯·史蒂文森的诗作《坛子轶事》：

我把一只坛子放在田纳西，
坛子是圆的，置于山巅。
它使凌乱的荒野
围着山峰排列。

于是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再不荒莽。
坛子圆圆地置在地上
高高屹立，巍峨庄严。

它君临着四面八方，
坛子是灰色的，未施釉彩。
它无法产生鸟儿或树丛
不像田纳西别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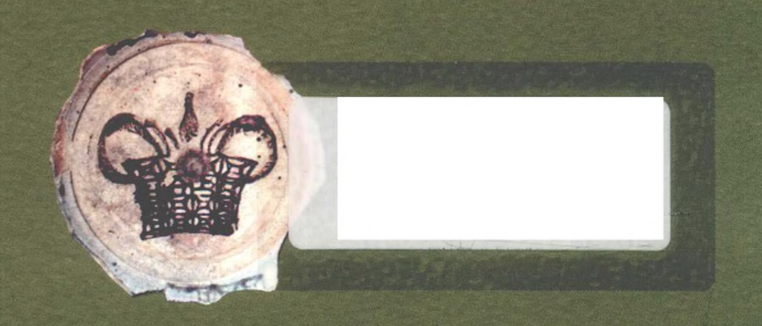
金老师说：史蒂文森常被称为“诗人的诗人”或“批评家的诗人”。诗中的“坛子”是艺术想象力的象征。史蒂文森认为，艺术不能产生“鸟儿或树丛”那样的现实事物，却能赋予混乱、荒莽而又喧嚣的世界一种崭新的秩序。一部人物传记的写作，就是打捞历史的碎片，还原一个丰饶、圆满、真实而又充满矛盾的生命。

今年恰巧是刘铸伯捐建的平湖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落成100周年。而在1916年12月31日举行的开幕典礼上，应邀专程前来参加庆典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在致辞中说：“刘君铸伯，经商于香港数十年，洞悉中外情形，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为当时开风气，为人类造幸福，生平于振兴商业外，如兴学校、设医院、救灾济贫等事，罔不惨淡经营，踊跃从事，其进取之勇敢，固令人惊叹，而爱国之热忱，尤人所难及。”这是时贤对他的最高评价，正好用作封底文字。

黄树森老师、金钦俊老师、黄惠波先生、何小培先生先后审阅书稿，分别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树森先生、惠波先生并赐大序，予以褒扬；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女士，本书责编李谓先生、陈泽民先生的大力支持，深圳报业集团柳莉女士统筹全书图片编排，在此一并敬表感谢。

囿于编著者史料掌握、写作能力、理论水平所限，本书在史料的选择、文字的表述以及事件的论述诸多方面，疏漏与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殷切期望方家的批评指正。

2016年5月于深圳



刘君铸伯，经商于香港数十年，洞悉中外情形，于我国文明力图进步，为当时开风气，为人类造幸福，生平于振兴商业外，如兴学校、设医院、救灾济贫等事，罔不惨淡经营，踊跃从事，其进取之勇敢，固令人惊叹，而爱国之热忱，尤人所难及。

——朱庆澜在纪勋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开幕式上的致辞（1916年）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5360-8188-8

9 787536 081888 >

定价：58.00 元